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1864年10月—1868年12月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01-003429-X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595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二十一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5 月第 2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5.875 插页 8

字数:64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429-X



9 787010 034294 >

ISBN 7-01-003429-X 定价:48.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朱霞 沈红文 闫月梅 裘挹红
蔡长缨 章林 张红 李其庆
李兴耕

参加编辑和资料工作的有：

胡永钦 章丽莉 卢晓萍 夏静
刘洪涛 朱羿 李楠 沈延
冯如馥 耿睿勤 蒋仁祥 吴海涛

全卷译文由孙魁 杨彦君 冯世熹审定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64 年 10 月至 1868 年 12 月,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初期所写的著作,包括报告、宣言、书信、小册子、声明、演讲稿、文件草稿、书评和札记等。

1848 年至 1849 年欧洲革命风暴平息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抗随之加剧。1857 年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各国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斗争。他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他们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联合的必要性。当时,意大利争取统一的斗争、美国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1863 年至 1864 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等反对奴役和争取社会进步的重大事件把广大工人群众卷进政治斗争,并加强了各国工人采取联合行动的愿望。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大会上宣告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性群众组织。它的成立开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时期,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广泛传播提供了新的条件。

马克思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事实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起草了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呼吁书、声明、决议和报告等,并作为国际的领导成员亲自或通过自己的战友指导国际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工作,为争取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在国际中的主导地位而

进行斗争。恩格斯虽然当时不在伦敦,但积极参加了国际的活动。马克思随时跟恩格斯通报情况,交换意见。恩格斯全力支持和配合马克思。

在创建国际的时候,马克思不能不考虑到国际的组织状况,各国工人运动的斗争条件,工人运动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理论认识,正如他在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定,形式上温和。”

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过程中抵制了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民主派把他们的错误的理论原则强加于国际的企图,把国际的纲领和章程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之上,把国际的发展纳入正确的轨道。

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控诉了1848年以来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和对工人政党的镇压。马克思告诉工人们,欧洲的工商业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无产阶级依旧处于贫困状态。他写道:“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见本卷第10页)

马克思十分赞扬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顽强的斗争取得的两项重大的新成果: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合作运动的发展。他指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实施对于工厂工人体力、道德和智力的发展非常有利。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见本卷第 12 页)谈到合作运动时,马克思认为,这一伟大的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 13 页)同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实践证明,只要资本家和地主还保持着政治特权和经济垄断,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都不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 14 页)。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工人阶级只有人数上的优势是不够的,必须组织起来并接受正确理论的指导。

《成立宣言》深刻地论述了关于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马克思强调,“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遭到共同的失败。”(见本卷第 14 页)最后,马克思再次发出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发出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本卷第 15 页)

《协会临时章程》的前言部分特别重要。它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目标、策略和组织形式。《临时章程》明确规定,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原则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见本卷第 16 页)

《临时章程》提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而政治运动是服务于这一伟大目标的手段。劳动的解放涉及到一切

现代国家，“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见本卷第16页）。国际工人协会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1866年马克思为即将召开的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草拟了《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指示》具体落实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中规定的原则，拟定了代表大会的具体议题。实际上，《指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共同行动纲领。正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9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所说的，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

马克思根据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总目标规定了具体任务。《指示》要求在协会的帮助下实现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反对资本家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雇用外国劳工顶替本国工人的阴谋。《指示》建议进行一次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这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并拟定了调查的大纲。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做好这件事，可以说明工人阶级有能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指示》把限制工作日作为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先决条件提出来。《指示》建议争取把工作日在法律上限制为八小时，代表大会应当使争取八小时法定工作日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指示》还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保护女工和童工。《指示》特别提到工人后代的成长，认为工人阶级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一代工人的教育。《指示》提出一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工人的设想。

关于合作劳动，《指示》再次强调《成立宣言》中所论述的基本观

点：“现在这种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制造贫困的残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见本卷第271页）《指示》进一步说明，不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不把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仅靠劳动者个人努力创造的狭隘合作形式，决不能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同时，《指示》还提出几点措施，以保证合作运动的健康的发展。

《指示》关于工会的部分简要地叙述了工会的产生及其作用。《指示》要求工会“必须学会自觉地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它们对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必须给予支援”（见本卷第273页）。工会必须让全世界相信，“它们的奋斗决不是出于狭隘的私利，而是为了使千百万被压迫者获得解放。”（见本卷第273—274页）

《指示》还提出一些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和取得共识的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密切相关的问题：直接税和间接税问题、波兰问题、军队问题、宗教问题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波兰问题的演讲、文章和文件等在本卷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他们认为，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贵族或资产者都把那个居于幕后的阴暗的亚洲强国看做是抵挡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地位的汹涌浪潮的最后一个救星……在欧洲这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阶级的运动总是要遭到打断、遏止或阻碍。”（见本卷第276页）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的演说中宣告，在波兰问题上，“对欧洲来说就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必须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

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见本卷第 287 页)大会的决议草案作出的结论是:“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见本卷第 281 页)

波兰解放运动的支持者彼得·福克斯在国际领导机构的会议上替西方列强,特别是法国统治阶级的波兰政策辩护,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法国对波兰的态度的演讲草稿(同彼得·福克斯论战)》。马克思利用几个世纪的外交史说明,无论是封建的法国或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没有支持过波兰人民的独立斗争,相反,它始终实行自私的扩张的外交政策。

当蒲鲁东主义者和民主派分子反对把旗帜鲜明地支持波兰独立作为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时候,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撰写了《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组文章。恩格斯在这组文章中论述了“已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的对外政策”。他说,国际工人协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抵抗俄国对欧洲的侵犯——恢复波兰”是充分表达了工人阶级的真实感情。他指出,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应当坚决地支持民族自决的原则。这同法国波拿巴第二帝国炮制的所谓“民族原则”是两回事。这种所谓的“民族原则”实质上是利用一些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来达到反动的目的。

收入本卷的相当一部分文件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注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863 年拉萨尔成立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德国工人运动迈出的重要一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接纳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在德国为国际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中包含有拉萨尔的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错误观点。拉萨尔引导工人联合会支持普鲁士政府以普鲁士为霸主自上而

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工人联合会施加影响，使之放弃改良主义纲领，答应与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施韦泽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合作。

1865年1月蒲鲁东逝世之后，应施韦泽的请求，马克思写了一篇文章《论蒲鲁东》。他在文章中对蒲鲁东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但并不讳言他与蒲鲁东之间理论上的根本分歧。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指出小资产者在科学上招摇撞骗和在政治上投机。在这里，马克思也是不指名地批判了拉萨尔。

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首古老的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的德译文并加上一段评语。恩格斯强调了农民运动的革命作用，暗示农民不是像拉萨尔所说的“反动的一帮”。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施韦泽等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无意放弃拉萨尔主义路线。他们在两篇《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以及《人类主席》等著作中谴责了施韦泽等人，毅然断绝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关系。

恩格斯撰写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也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德国各个阶级的利益和政治立场。恩格斯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这个工人政党的任务，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不彻底性和懦弱，而且要同普鲁士反动容克地主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工人政党在这个斗争中要警惕俾斯麦政府采用法国统治集团的政治手法，在各个阶级之间投机取巧，利用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以保全他们的反动统治。恩格斯告诉德国工人，一旦反动派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回答它：“我们将手持长矛去接受你的礼物，矛头对矛

头。”(见本卷第 115 页)

马克思专门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简介》，介绍恩格斯的小册子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有了成效。1868 年 8 月，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汉堡大会通过决议，赞成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和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马克思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恩格斯在《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中对此予以肯定。

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又称《价值、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它是马克思针对国际的领导成员韦斯顿发表的否定经济斗争，否定工会作用的错误言论而写的一篇报告。马克思的这篇报告写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两年，但是，马克思在这篇报告中已经以通俗的形式精确地表述了《资本论》的一些主要原理。首先，他揭示了剩余价值是怎么形成的，从而阐述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性质。

马克思在这篇报告中说明，资本家想把工作日延长到最大限度和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即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仅够维持工人及其家眷生存的水平，这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规律。他指出，劳动力的费用是可变的，它不仅取决于物质因素，也取决于社会因素，即各国生活水平，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尤其是取决于工人对资本家的反抗程度。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联系。工人为劳动力的价格而与资本家斗争的必要性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被迫把自己当做商品出卖的地位。但是，工人不能满足于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信守“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

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的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所以,工人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见本卷第211页)。

1867年9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资本论》第一卷问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资本论》第一卷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它为无产阶级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恩格斯在评价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时说道:“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见本卷第362页)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沉默抵制,为了广泛宣传《资本论》的问世,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书评,并且建议他们的战友们多写评论。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书评多半是为自由派和民主派报纸写的。恩格斯采用匿名的方式,以客观的学者笔法,从学术的方面进行评论。恩格斯时常用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权威相对比的方法,以便引起讨论。而在给工人报纸写评论时,恩格斯才全面地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实质内容。他在给《民主周报》写的书评中对《资本论》中的理论成就和崭新的方法论做了高度的评价和通俗的解说。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可能是恩格斯为一本专门小册子而写的大纲,只写到《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四节《机器和大生产》。这个《提要》以通俗的语言记述了《资本论》第一卷前半部所考

察的经济理论的要点。

马克思的《剽窃》一文揭露了拉萨尔分子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庸俗化。

马克思在《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中回击了资产阶级学者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对马克思的诽谤。

本卷附录收入马克思的发言记录、报刊有关马克思发言的报道和马克思的支持者的反映马克思的观点的发言和文章等,以及一些有史料价值的文件。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 13 篇,其中收入正文部分 9 篇:《关于法国对波兰的态度的演讲草稿》、《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草稿》、《致海尔曼·荣克的便函》、《伦敦代表会议(1865 年)通过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1866 年 1 月 16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议程》、《关于向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中央(总)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感谢的决议》、《1867 年 1 月 22 日在伦敦召开的波兰会议的决议草案》和《统计学家奥托·许布纳尔关于德国民众贫困的论述》;收入附录部分 4 篇:保尔·拉法格《国际工人协会的先驱》、海尔曼·荣克和保尔·拉法格《国际工人协会发展概述》、《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1867 年 2 月 8 日)和欧仁·杜邦《在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1867 年)上的发言》。收入本卷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0 卷、1985 年英文版第 20 卷、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1977 年俄文版第 44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目 录

前言	1—10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5—15
卡·马克思 协会临时章程	16—19
卡·马克思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20—22
卡·马克思 *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 条件的决议草案	23
卡·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24—26
卡·马克思 *给《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	27
卡·马克思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	28—31
卡·马克思 *关于法国对波兰的态度的演讲草稿	32—52
卡·马克思 *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草稿	53
卡·马克思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54—63
弗·恩格斯 提德曼老爷 古代丹麦民歌	64—66
卡·马克思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67—68
弗·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69—115
一	74
二	90
三	1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 编辑部的声明	116—117
弗·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简介	118
卡·马克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	119—120
卡·马克思 *关于巴黎支部冲突的决议最初方案	121—122
卡·马克思 *中央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 决议	123—124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 德国工人政党》简介	125—126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 德国工人政党》简介	127
卡·马克思 *关于不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 声明	128—132
卡·马克思 *写给海尔曼·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 冲突的便函	133—138
卡·马克思 *致海尔曼·荣克的便函	139
卡·马克思 *致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	140—141
卡·马克思 “人类的主席”	142—147
卡·马克思 更正	148—149
卡·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150—152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报告结束时提出的 决议草案	153—154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155—212
[引言]	157

1. [生产和工资]	157
2. [生产、工资、利润]	162
3. [工资和通货]	170
4. [供给和需求]	174
[5. 工资和价格]	176
6. [价值和劳动]	178
7. 劳动力	187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190
9. 劳动的价值	192
10.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194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195
12. 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	198
13. 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200
14. 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206
卡·马克思 *关于在 1866 年召开国际全协会代表 大会的决议	213
卡·马克思 *伦敦代表会议(1865 年)通过的日内瓦 代表大会议程	214—215
卡·马克思 *1866 年 1 月 16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	216—217
卡·马克思 *关于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程序的决议	218
弗·恩格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219—232
一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219
二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223
三 民族理论用于波兰	228
卡·马克思 警告	233—234
弗·恩格斯 德国战争短评	235—259

一	237
二	242
三	247
四	252
五	256
卡·马克思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议程	260—261
卡·马克思 *关于争取意大利工人团体参加日内瓦 代表大会的决议	262
卡·马克思 *常务委员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 建议	263—264
卡·马克思 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 指示	265—277
卡·马克思 *关于向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中央(总) 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感谢的决议	278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279—280
卡·马克思 *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召开的波兰 会议的决议草案	281
卡·马克思 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 大会上的演说	282—287
卡·马克思 *辟谣	288
弗·恩格斯 *瑞典和丹麦旅行札记	289—295
卡·马克思 *有关洛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296—297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	298—301
卡·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 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302

卡·马克思 统计学家奥托·许布纳尔关于德国民众 贫困的论述	303
弗·恩格斯 *为《未来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 书评	304—307
弗·恩格斯 *为《莱茵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 书评	308—312
弗·恩格斯 *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写的《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	313—315
弗·恩格斯 *为《杜塞尔多夫日报》写的《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	316—318
卡·马克思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与国际 工人协会	319—320
卡·马克思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发言提纲	321—328
卡·马克思 剽窃	329—334
弗·恩格斯 *为《观察家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 书评	335—337
弗·恩格斯 *为《符腾堡工商业报》写的《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	338—340
卡·马克思 *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 提纲	341—358
弗·恩格斯 *为《新巴登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 书评	359—361
弗·恩格斯 *为《民主周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 书评	362—370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	371—423
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	373
一、商品本身	373
二、商品的交换过程	375
三、货币或商品流通	377
A. 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货币)	377
B. 流通手段	378
(a)商品的形态变化	378
(b)货币的流通	379
(c)铸币——价值符号	380
C. 货币	381
(a)货币贮藏	381
(b)支付手段	382
(c)世界货币	384
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385
一、资本的总公式	385
二、总公式的矛盾	388
三、劳动力的买和卖	390
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393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393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395
三、剩余价值率	397
四、工作日	398
五、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401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404
一、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404
二、协作	405

三、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409
四、机器和大工业	413
(a) 机器本身	413
(b) 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	415
(c) 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	418
(c') 或 (d) 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	419
(c'') 或 (e) 机器和剩余价值	421
五、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	423
卡·马克思 *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关税税率问题上的 立场	424—425
弗·恩格斯 * 为《双周评论》写的《资本论》第一卷 书评	426—450
卡·马克思 * 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代表大会 地点的决议	451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关于费·皮阿演说的决议	452
卡·马克思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	453—455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政府对沙皇俄国 态度的声明	456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	457
卡·马克思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	458—459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	460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	461—467
弗·恩格斯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	468—469

弗·恩格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	470—473
弗·恩格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	474—475
卡·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组织的 关系	476—478
卡·马克思	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 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	479—481
卡·马克思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出版说明	482
卡·马克思	*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 声明	483—484
卡·马克思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 评语	485—491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492—494

附 录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 报道	497
卡·马克思 *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参加国际的手续的 决议	498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卡·马克思在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 会上的讲话记录	499—500
*入会团体的证件	501—502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	503—504
中央委员会1865年7月25日全体会议修改和通过的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	505—507
海尔曼·荣克 *给皮埃尔·韦济尼埃的公开信	508—518
*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的 发言记录	519—520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521—524
保尔·拉法格 *国际工人协会的先驱	525—526
海尔曼·荣克和保尔·拉法格 国际工人协会发展 概述	527—532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 1866 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 决议	533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534—538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539—541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卡·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 27 周年纪念会上的 讲话记录	542—543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	544—548
*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	549—551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 同盟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	552—553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 1867 年洛桑代表大会的 报告	554—576
欧仁·杜邦 *在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1867 年)上的 发言	577—578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	579—581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代表大会地点的	

发言记录	582—583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取得的成就的 发言记录	584—585
*卡·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 后果的发言记录	586—588
*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发言记录	589—590
告伦敦德国工人书	591—592
注释	595—693
人名索引	694—746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747—748
文献索引	749—779
报刊索引	780—791
地名索引	792—800

插 图

弗·恩格斯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证	116—117
卡·马克思的《写给海尔曼·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 冲突的便函》的手稿第 5 页	135—136
卡·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手稿第 1 页	159—160
1922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 卡·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的中译本和 1939 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收有该文中译文的《政治经	

济学论丛》(作为“马恩丛书”第6种)一书的封面和部分译文	162—163
普奥战争(1866年).....	242—243
弗·恩格斯画的瑞典卡尔斯堡要塞平面图	291—292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64年10月—1868年12月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PRICE ONE PENNY.

PRINTED AT THE "BEE-HIVE" NEWSPAPER OFFICE,
10, BOLT COURT, FLEET STREET.

1864.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第1版的扉页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协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¹

工人们! ①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 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 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 1864 年 4 月 7 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1863 年已经增加“到 443 955 000 英镑! 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 1843 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²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

① 在 1866 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编者注

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最高层贵族社会的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³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⁴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⁵，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格令^①碳素和1 330格令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②。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③

① 1格令 = 0.065克。——编者注

②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或动物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

③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17页。——编者注

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①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 1864 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②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 1863 年 4 月 16 日在下院的讲话。——编者注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 1842 年到 1852 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 6%…… 在从 1853 年到 1861 年的 8 年内，如以 1853 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 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⁶

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①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 1863 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将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己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塔福德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②。

①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 6 号报告。1863 年》1864 年伦敦版第 25—29 页。——编者注

②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委员会委员的第 1 号报告》1863 年伦敦版第 24 页。——编者注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工人的申诉》^①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议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10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

^① 休·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编者注

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①。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②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来说，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③，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③ 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拉芒什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⁷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 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 30 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⁸的通过。这一

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①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②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

① 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①,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②,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

① 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

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⁹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¹⁰。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①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¹¹。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

^① 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编者注

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修订于 1864 年 10
月 21 日—27 日之间

载于 1864 年 11 月在伦敦出版
的小册子《1864 年 9 月 28 日在
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
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
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协会临时章程¹²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因为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所有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国家，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在本章程后面署名的由 1864 年 9 月 28 日伦敦圣马丁堂公开大会授权之委员会的成员，采取了必要步骤，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他们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¹³。

根据这种精神，他们制定国际协会临时章程如下：

1.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2.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3. 1865 年将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¹⁴，由已参加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使命是在全欧洲面前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确定国际协会的正式章程，研究使国际协会能顺利进行活动的方式方法，并任命协会的中央委员会。全协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4. 中央委员会设于伦敦，委员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中间产生。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委员中选出为处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如主席、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5.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每年的会议上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工作的公开报告。每年由代表大会任命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增加委员的名额。在紧急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6. 中央委员会是互相合作的各国协会之间的一个国际机构, 它的任务是: 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 以同时并进和共同领导的方式对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进行调查; 使一国协会组织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所有各国协会组织加以讨论; 在需要立即采取实际步骤例如在发生国际争端时, 使各国协会组织能同时一致行动。凡遇有适当时机, 中央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组织或地方性组织提出建议。

7. 因为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 另一方面, 国际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小而分散的地方性组织联系, 所以, 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组织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 不言而喻, 本条规定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 除非存在法律障碍, 任何独立的地方组织均可与伦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通信。

8.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1864 年 9 月 28 日选出的委员会作为临时中央委员会进行工作, 力求在各国工人协会之间建立联系, 在联合王国中吸收会员, 筹备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并同各国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组织讨论应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

9.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 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 将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援助。

10.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 在彼此结成兄弟般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 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注: 英国居民每年交纳 1 先令即可成为协会会员并领到一张会

员卡。

卡·马克思修订于 1864 年 10
月 21 日—27 日之间

载于 1864 年 11 月 12 日《蜂房
报》第 16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
成员的决议¹⁵

[一]

居住在英国任何地方的人均可参加协会,但是凡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参与议事的会员,不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¹⁶。

[二]

本协会会员未预先缴纳其一年会费者,不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三]

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至少应在选举前一周进行,选举时候选人不得在场;只有领取了会员卡的人才能被提名为候选人。

[四]

缴纳会费的时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五]

由书记写信给尚未领取会员卡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通知他们,如果截至 4 月 25 日不领取会员卡,即被认为是自愿退出中央委员会,从而被从委员名单中除名。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决议是必要的,因为有人对从未有这样一项决议正式传达给缺席的委员们提出了意见。

[六]

大陆上的通讯员是中央委员会的**当然委员**。

卡·马克思于 1864 年 11 月 8 日、29 日和 1865 年 1 月 24 日、31 日及 4 月 11 日、25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
协会的条件决议草案¹⁷

[一]

邀请各工人组织作为集体加入本协会,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酌情确定自己缴纳会费的数额。

[二]

加入本协会的团体有权各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

卡·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2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1864年11月26日《蜂房报》第16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¹⁸

阁下：

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

如果说反抗奴隶主的权势是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留有余地的口号，那么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口号则是：让奴隶制死亡。

从美国的大搏斗⁵开始之时起，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同星条旗息息相关。难道引出这段悲壮史诗的领地之争，不正是为了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与移民劳动相结合还是应当被奴隶监工的践踏所玷污吗？

代表着 30 万奴隶主的寡头集团竟敢首次在世界历史上把“奴隶制”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第一次出现了建立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由此产生了第一篇人权宣言¹⁹，并给予 18 世纪欧洲革命以第一次推动；而恰恰是在第一次出现建立伟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这个地方，反革命势力却得意扬扬全面彻底地推翻了“制定旧宪法时所依据的思想”，说什么“奴隶制乃是仁慈的制度，实为劳资关系这一大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并且无耻地宣称，把人当作财产的制度是“新大厦的基

石”。^①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工人阶级甚至还在上层阶级狂热地倒向同盟老爷们一边从而发出不祥的警告之前就立即看出：奴隶主叛乱是一场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即将开始的信号，对劳动者说来，不但他们未来的希望，就连他们过去争得的权益也因大西洋彼岸那场大冲突而陷于危险之中。因此，无论是哪个地方的劳动者，都甘愿忍受棉花危机⁵给他们造成的艰难困苦，强烈地反对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大人先生”们千方百计站在奴隶制一边进行干涉，而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劳动者为正义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作为北部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曾容许奴隶制玷污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他们曾在那些未经本人同意就被收作奴隶或出卖的黑人面前夸耀地表示，自己出卖自己、自己选择主人乃是白皮肤劳动者的最高特权。那个时候，他们不能获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的欧洲弟兄的解放斗争。但是这种阻碍进步的意识现在已经被内战的血浪涤荡干净了。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²⁰开创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一样，美国的反奴隶制战争⁵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他的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

勒吕贝——(法国)通讯书记；弗·雷布钦斯基(波兰)；埃

^① 见亚·汉·斯蒂芬斯《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演说。1861年3月22日》。——编者注

米尔·霍尔托普(波兰);让·巴·博凯;海·荣克——瑞士
 通讯书记;莫里索;乔治·威·惠勒;茹·德努阿尔;
 P.博尔达日;勒鲁;塔朗迪埃;茹尔丹;杜邦;罗·格雷;
 多·拉马;C.塞塔奇;F.索卢斯特里;P.阿尔多夫兰迪;
 D.G.班尼亚加蒂;G.P.方塔纳——意大利通讯书记;
 乔·莱克;詹·巴克利;乔·豪威耳;约·奥斯本;威·
 狄·斯坦斯比;约·格罗斯密斯;格·埃卡留斯;弗里德
 里希·列斯纳;N.沃尔弗;卡·考布;亨利希·博勒特;
 路德维希·奥托;N.P.汉森(丹麦);卡尔·普芬德;格奥
 尔格·罗赫纳;彼得·彼得逊;卡尔·马克思——德国通
 讯书记;亚·迪克;路·沃尔弗;J.惠特洛克;詹·卡特;
 W.摩尔根;威廉·德尔;约翰·韦斯顿;彼得·福克斯;
 罗伯特·肖;约翰·H.朗梅德;罗伯特·亨利·赛德;威
 廉·C.沃利;W.布莱克莫尔;罗·哈特韦耳;W.皮金;
 本·鲁克拉夫特;约·尼亚斯;
 乔·奥哲尔——委员会主席;
 威廉·兰·克里默——名誉总书记

卡·马克思写于 1864 年 11 月
 22 日—29 日之间
 载于 1864 年 12 月 23 日《每日
 新闻》第 581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给《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²¹

1864年11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编辑先生：

随信附上一份有关卡尔·布林德先生的文件^①，请予刊登。

我已把这个声明以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部的信的形式寄给几家普鲁士报纸发表，同时我还将设法把它发表在这里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因此，责任由我独自承担。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1月
28日

载于1864年12月3日《观察家
报》第28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28—3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²¹

阁下：

卡尔·布林德先生通过他在布拉德福德的代理人布罗纳医生寄给您一篇卡尔·布林德先生写的、维护卡尔·布林德先生利益的、关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东西。在这篇滑稽可笑的东西中夹杂着这样一段话：

由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而引起的那场争论,是已经“通过全面的解释而得到解决、但又被编辑部重新搬出来的旧争论,在这里我不想再提到那场争论”。^①

他“不想再提到那场争论”!多么宽宏大量啊!

只要提一提我那本反对福格特的著作^②,就足以证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妄自尊大的虚荣有时使卡尔·布林德先生不再有单纯的幽默感。您和您的读者从布林德的回答中想必会得出结论,以为这本著作中对于卡尔·布林德先生的谴责已经“通过全面的解释而得到解决了”。而实际上,从我的著作发表至今,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一向乐于写作的卡尔·布林德先生从未敢哪怕只言片语“再提到旧的争论”,更不用说通过“全面的解释”“再提到旧的争论”了。

① [卡·迈尔]《谦逊——一件礼服》。——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 1860 年写的《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不如说,卡尔·布林德先生对于他被斥责为“可耻的撒谎者”(见我的著作第66页和第67页^①)表现得颇为冷静。卡尔·布林德先生此前曾公开声明,他不知道是谁炮制了反对福格特的传单,“他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等等。此外,卡尔·布林德先生还发表了印刷所主人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证词,并有另一篇排字工维厄的证词作旁证,声称传单既不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印的,也不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写的。在我那部反对福格特的著作中引用了排字工费格勒和维厄本人在伦敦弯街治安法庭上的 affidavits(代替宣誓的证词),他们的证词证明,正是这个卡尔·布林德先生写了传单的手稿,并要求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印刷,他亲自校对了校样,还为了反驳这些事实编造了假证词,他答应以霍林格尔的名义付给这篇假证词以金钱报酬,将来他会以自己的名义答谢,这样便骗取了排字工维厄的签名,最后,他把他编造的、上面有他亲自骗到的维厄签名的假文件作为一件义愤填膺的证据寄给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和其他德国报纸,以此证明我的“恶意捏造”。

卡尔·布林德先生在这些丑行被公之于众之后保持了沉默。为什么?因为(见我的著作第69页^①)他只能用针锋相对的 affidavits 来反驳我发表的 affidavits,但是这样一来,他就得“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在那里“刑事案件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在上述那篇寄给贵报的东西中还荒唐地谈到卡尔·布林德先生在美国的勤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从几天以前收到的约·魏德迈的信中摘录一段。您大概还记得,约·魏德迈过去曾经和奥·吕宁一起编辑出版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他一直是德国

^① 见马克思1860年写的《福格特先生》。——编者注

工人党最优秀的战士之一。美国内战⁵爆发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北部联邦支持者的行列。他应弗里蒙特之邀到了圣路易斯,在那里他先是在当地工兵部队中担任上尉,后来在炮兵团中担任中校;而不久前,当敌人的侵犯再次威胁密苏里州的时候,他突然接到组建密苏里志愿兵第四十一团的任务,目前他作为上校指挥着这个团。魏德迈从他的团的所在地、密苏里州的首府圣路易斯来信^①说:

“随信附上我从这里的《西邮报》上剪下的一段文字,剽窃者卡尔·布林德又在这家报纸上神气活现地夸夸其谈,损害了‘德国的共和派’的利益。诚然,这里的人们对于他怎样曲解拉萨尔的意图和鼓动相当冷淡;谁读了拉萨尔的著作,谁才知道应当怎样对待布林德的小丑行为;谁不曾花费力气去多少了解一下拉萨尔的鼓动,谁就可能深信不疑地赞赏这个伟大的巴登人、杰出的阴谋家、所有秘密团体和未来临时政府的成员的聪明和‘信念的坚定’;他的见解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里的人现在忙于其他事情,无暇过问布林德的抗议。但是在故乡却无疑应当好好地警告一下这个妄自尊大的小丑。因此我才把这篇文章寄给你,这只是他以前所写的这类文章中的一个例子。”

约·魏德迈给我的那篇从《西邮报》上剪下的文章的标题是《共和派的抗议,1864年9月17日于伦敦》,它是《共和派的抗议》的美国版;这同一个总是少不了的卡尔·布林德先生同时还把它用同一个标题刊登在《新法兰克福报》^②上,然后以他所素有的蚂蚁般的勤劳把它作为转自《新法兰克福报》的稿件寄给了伦敦的报纸《海尔曼》^③。把布林德的拙劣作品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正是那个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以诚实的、共和派的、卡托式的悲哀表情提出抗议的卡尔·布林德先生,在

① 见1864年10月底约·魏德迈写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② 见1864年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第270号。——编者注

③ 见1864年10月8日《海尔曼》第301号。——编者注

同一个时候在遥远的圣路易斯却肆无忌惮地说出最恶毒的蠢话和进行最无耻的勾当。如果把抗议书的两个版本加以比较(这里篇幅所限不便于做这样的比较),那么,除此之外,还会得到一些新的非常可笑的材料,足以揭穿布林德伪造信件、通告、传单、抗议书、保留条件、辩护文章、号召书、呼吁书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严肃得令人摇头的布林德式的政治药方的手法;他离不开这些手法,正像离不开霍洛韦先生的药丸或霍夫先生的麦芽精一样。

我决不会向这个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一无所有的荒唐的马志尼-斯嘉本²²说明拉萨尔这样一个人的作用以及他的鼓动的真正意图。相反,我深信,卡尔·布林德先生凌辱一只死狮,仅仅是执行大自然和伊索赋予他的使命^①。

卡尔·马克思

1864年11月28日于伦敦梅特
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1月
26—28日

载于1864年12月10日《北极
星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① 暗指伊索寓言《年老的狮子》中的驴子。——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法国对波兰的
态度的演讲草稿²³

(同彼得·福克斯论战)

福克斯先生对法国旧政权的对外政策做了相当荒谬的描述。根据他的观点,法国与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结盟,是为了保护欧洲不受俄国的侵犯。事实是,法国缔结这些同盟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即波兰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现代意义上的俄国尚不存在的时候。那时只有一个莫斯科大公国,但还不存在俄罗斯帝国。因此,法国与土耳其人、马扎尔人、波兰人和瑞典人缔结的那些同盟并不是**针对俄国**。它缔结那些同盟是针对**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是法国将其势力、影响和领土扩展到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种手段。我不想讨论细节问题。我的目的只是想指出,法国在17世纪中叶利用这些同盟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²⁴,根据这个条约,德国不仅被支解,它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另一部分割让给瑞典,而且德国的每一个小邦诸侯都得到了条约赋予的出卖其国家的权利,而法国则取得了对德国的**保护权**。在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的17世纪下半叶,最盛时期的旧波旁王朝的政策真正代表路易十四为了摧毁荷兰共和国而

收买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²⁵。在大约 40 年间他对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和皮埃蒙特实行的野蛮破坏和背信弃义的一套做法,其最好的说明就是以下事实:1837 年由俄国内阁办公厅起草的向当今沙皇^①禀报的备忘录,把路易十四从 17 世纪中叶到末叶所采取的战争和外交手段推荐为俄国所应效法的楷模。

现代俄国只能从 18 世纪算起,因此,只是从那个时候起,与俄国对抗才可能包括在法国或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政策之中。

我马上就要谈到路易十五时期,福克斯先生正确地指出,这是法国对外政策最善待波兰和最敌视俄国的时代。

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发生了三件有关俄国和波兰的重大事件:1)所谓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²⁶;2)七年战争²⁷;3)第一次瓜分波兰²⁸。我将研究一下法国政府对这些事件所采取的态度。

1)所谓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在奥古斯特二世(波兰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死后,1733 年 9 月波兰贵族中的一派要推选其子^②为国王。他得到俄国和奥地利的支持,因为他曾向女沙皇^③许诺,不再要求收回原波兰封地库尔兰²⁹,而且他曾向皇帝^④保证执行国事诏书³⁰。受法国唆使的另一派则推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后称奥古斯特三世,波兰国王。——编者注

③ 安娜·伊万诺夫娜。——编者注

④ 查理六世。——编者注

选斯塔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他原先曾被瑞典查理十二世推为波兰国王，而且他当时是路易十五的岳父。结果爆发了以法国为一方、以俄国和奥地利为另一方的战争。这是法国惟一一次自称为波兰进行的战争。法国在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战争，但对它的被保护国波兰，只派出 1 500 人到当时波兰的城市但泽。战争持续了两年，结局如何呢？签订了一项和约（1735 年 10 月的维也纳和约³¹），根据这项和约，德国的封地洛林公国并入法国，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建立波旁王朝，它的最后一个活跃的代表是炮弹国王^①。从其他一切方面来看，这场“有关波兰王位的战争”的结果是：承认俄国支持的候选人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但是确保路易十五的岳父有被称为国王的特权，并由波兰每年付给他一大笔年金。这场战争是由法国以虚伪的借口煽动而进行的，结果是波兰受辱，俄国的势力扩大，土耳其和瑞典吃了大亏，法国也迫使这两国处于违反本身利益的境地，而后又把它们弃之于危难之中。但是我不准备谈这些细节问题。

法国政府的行为无法拿不列颠政府在这场所谓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阻止法国采取正确行动这一点作借口来辩解。相反，当皇帝查理六世向英国发出呼吁时，后者还坚守自 1716 年来一直维持着的、但没有任何好结果的英法同盟。总之，这一次英国并没有阻挠法国政府对波兰表达善意。

在搁下这个题目之前，我必须指出，1739 年在法国的调停下（法国大使维尔纽夫）缔结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和约³²对波兰是一个重大打击。我且摘引吕利埃尔的话。他说：

① 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绰号。1848 年 9 月初他曾令那不勒斯军队对墨西拿城炮击五天。——编者注

“它使波兰人剩下的惟一盾牌普鲁特条约失效了”(“cet unique bouclier qui restait à la Pologne”), 1739年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新条约的最后一条宣称“先前所有的条约均告无效。”

2) 七年战争(1756—1763)²⁷

我现在来谈谈七年战争。

福克斯先生告诉你们,这场战争对法国来说是很不幸的,因为它使法国丧失了大部分殖民地而使英国得益。但这并不是我们目前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要探究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对波兰和俄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你们想必知道,从1740年到1748年,在所谓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³³中,法国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结盟反对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它与奥地利和俄国结盟反对普鲁士和英国,所以,无论如何,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是俄国正式的敌人,而法国则是俄国公开的盟友。

法国首先是在1756年由贝尔尼斯神父经办,然后又在1758年由舒瓦泽尔公爵经办,与奥地利(和俄国)缔结了反对普鲁士的条约。

让我们听听吕利埃尔是怎么说的。(《波兰无政府状态的历史》1819年巴黎第2版。)

“当布罗伊伯爵于1752年作为大使到达华沙时,法国还没有在波兰结党。人们记得法国先前经常实现不了的那些诺言(auxquelles la France avait déjà si souvent manqué)。他们没有忘记,法国一个世纪以来曾经三次将一些强大的波兰派系集合在自己周围……但它在热心地(ardeur)把它们组织起来后,总是轻

率地把它们抛弃(elle les avait chaque fois abandonnées avec légèreté)。它曾使大多数被它为共和国谋幸福的虚假计划诱惑的人陷入不幸”(第1卷第213页)。(“Elle avait laissé dans l’infortune la plupart de ceux qui s’étaient livrés à la séduction de ces prétendus projets pour le salut de la république”。)

“布罗伊公爵经过三年的活动,组成了一个反对查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反对派,赢得了波兰宫廷的支持,发动了瑞典人、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建立了与乌克兰哥萨克的联系”等等。“弗里德里希二世促成建立了这个反对俄国的强大联盟,他希望这个联盟给他自己带来安全。俄国公使^①在华沙丧失了任何影响。总之,在1756年的头几个月,当英国和法国之间最先从美洲开始的战争即将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候,布罗伊伯爵得以在波兰建立了一个由法国资助、提供武器弹药、并得到许多邻国保护的联盟,这个联盟本来可以使波兰从俄国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并使这个共和国恢复法律、政府和权力。但是法国停止了一切它所许诺的援助(secours),并打乱了其大使的一切措施。”(吕利埃尔。第1卷第225页。)

顺便指出,法国滥用它的影响的轻率态度,可以从它对待瑞典的手段中看出来。它首先唆使瑞典跟普鲁士一起对俄国进行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随后又唆使它跟俄国一起对普鲁士进行战争,瑞典两次都成为法国这些阴谋的受害者,而俄国两次都从中获得了好处。

那么,法国作为俄国(和奥地利)的盟友对普鲁士(和英国)进行了七年战争,其后果是什么呢?

波兰的物质资源消耗净尽,俄国在德国建立了霸权,普鲁士成为俄国的奴隶,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欧洲最强有力的君主,波兰第一次被瓜分²⁸。这就是法国在七年战争期间的政策的直接后果。

1)在七年战争期间俄国军队把波兰当作自己的私产,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冬营地等。我且引用法维埃的话:

^① 亨·格罗斯。——编者注

“危险在于，俄国利用对普鲁士国王进行战争作借口，使它的军队强行通过波兰的领土，夺取给养，甚至把它的冬营地安扎在波兰。允许俄国一再使用这些专横的手段，就是听任这个广阔的国家成为俄国将军们的贪婪、他们的宫廷的专制以及俄国的一切未来的霸占计划的牺牲品；制定这样的计划对俄国是颇有诱惑力的，因为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对这个被分裂、被隔绝和被抛弃的国家施加各种折磨。”（前任大使路·菲·赛居尔《欧洲各国内阁的政策》180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300页。）

法国由于听任俄国这么为所欲为而使自己名誉扫地。

“它的软弱看来更不可原谅，因为……它那时可以对俄国和奥地利发号施令而丝毫不必听命于它们。”布罗伊伯爵曾经徒劳地就此提出建议……法国允许俄国把波兰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对待……波兰民族从那一刻起就把法国仅仅视为维也纳和彼得堡宫廷手中的工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丧失了信誉，在选举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时我们无足轻重，从那时起我们试图进行的或支持的一切事情都不成功。”（前引赛居尔著作第303、304页）（“la nation polonaise ne vit plus dès-lors la France que comme un instrument des cours de Vienne et de Pétersbourg. Voilà l'origine de notre discrédit, de notre nullité etc”）

根据奥利瓦条约(1660年)³⁴法国有义务保护波兰共和国。

2) 七年战争期间，尽管波兰公开宣布中立³⁵，但俄国人仍然利用它作为自己对普鲁士作战的基地。波兰人在法国的外交压力下同意这么做。正因为这样，俄国人能够在七年当中蹂躏普鲁士本土、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甚至洗劫了柏林。实际上他们像野兽一样蹂躏了普鲁士君主国，而法国在汉诺威、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也以同样方式行事。这时候根据韦劳条约(1660年左右)³⁶波兰有义务保卫普鲁士不受俄国侵犯。弗里德里希二世坚持要履行这个条约。他要求波兰人至少要奉行完全中立，不允许俄国人利用他们的国家等等，这是有道理的，这已由下述事实得到证明：自七年战争开始以来，在波兰召开的一切议会上都不可能作出任何

决议,因为爱国派宣称,只要俄国军队占领波兰领土并对普鲁士采取行动,波兰人就不能商讨问题。在战争的最后一年(1762年)波森(大波兰)的贵族甚至组织了一个反对俄国人的联盟。

假如比利时允许普鲁士在七年当中不顾它的中立而利用它作为反对法国的作战基地,法国难道没有权利把比利时视为敌国,并在可能条件下,把比利时吞并或者破坏它的独立吗?

3)七年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了一项条约²⁷,根据这项条约,普鲁士国王承认自己为俄国的附庸,但作为补偿,他被允许参加瓜分波兰。后一点已体现在俄国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签订的1764年条约³⁷中,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说明,即在同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驻华沙的大使^①都庄严地对那种“诬蔑”提出抗议,而在几年后,英国驻柏林的代表^②写信给他的宫廷说,奥地利尽管起初反对,但受它自身利益驱使将会参加瓜分波兰。

法维埃先生说:“我们与维也纳宫廷缔结的排他性的同盟使弗里德里希二世失去一切希望,迫使他必须与那个正是放手让法国来毁灭他的宫廷结盟。”同一个法维埃断言,叶卡捷琳娜以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秘密,就在于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依附于她。

这就是七年战争期间法国政策的结果。不能说这次是英国妨碍了它对波兰表达善意,因为那时法国是俄国的盟友,而英国则站在另一边。

① 盖·贝努瓦和亨·格罗斯。——编者注

② 安·米切尔。——编者注

第一次瓜分波兰²⁸

现在我必须指出,在以第一次瓜分波兰而告终的波兰战争中,即使法国采取比它实际上所采取的更为有力的行动,也不能抵偿它在七年战争中对俄国的重大效劳。在巴尔同盟战争³⁸中,把一些法国军官和经费送到波兰,充其量只能延长无效的抵抗。诚然,法国曾(于1768年)怂恿土耳其去对俄国作战,但只是为了像通常一样出卖土耳其,并给土耳其准备了一个使俄国对土耳其的霸权真正开始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74年)³⁹。

1770年。俄国对地中海的远征。那时几乎濒于死亡的威尼斯共和国显得比法国更有勇气。那一年舒瓦泽尔仍是法国外交大臣。只是在1770年底(1771年初)他才被艾吉永公爵取代。法维埃说:

“法国在与英国和睦相处时,怎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地中海订立一个中立协定呢?或者说,为什么法国不单独反对俄国在对法国的利益如此重要的地区采取这个雄心勃勃的行动?”法维埃认为,“法国舰队在地中海摧毁俄国舰队——这也许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很可能改变土耳其和波兰的事件的整个进程,而且可能教训奥地利尊重同法国的联盟。”(赛居尔《欧洲各国内阁的政策》第2卷第174页。)

但是,曾唆使土耳其去对俄国作战的法国,没有动一个指头去反对俄国1770年的远征⁴⁰,——惟一一次比较重要的远征。(土耳其舰队在切斯美的狭窄海湾被摧毁。)一年前,同一个舒瓦泽尔没有让英国的气势汹汹的恐吓(查塔姆伯爵本人)阻碍他从热那亚人手中买下科西嘉。你们不应该忘记,诺思那时是首相,他只有不惜任何代价

维持和平才能保护自己的职位。他是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之一。那时英国发生了反抗王朝的革命运动。诚然,1773年(那时俄国人进行了一次新的海军远征,但对与土耳其的战争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艾吉永公爵受到英国驻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勋爵**的阻挠,没有进攻俄国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舰队。那时第一次瓜分波兰已经完成。法国的示威行动的真正目标不是波兰,而是瑞典,而且法国做到了让**古斯塔夫三世**没有迫于俄国的压力而取消他的政变(1772年)⁴¹。

再说,这个艾吉永是个什么样的人:

赛居尔在他给**法维埃**的著作作的注中说:

“当瓜分波兰这个令奥地利害怕的、会扩大普鲁士疆域的消息刚传开时,维也纳宫廷就提醒法国,并向它表明,如果得到凡尔赛宫廷支持的话维也纳宫廷将反对瓜分。路易十五那时只忙于寻欢作乐,而艾吉永先生则忙于搞阴谋诡计,奥地利内阁没有接到任何令人放心的答复,所以它也就宁可赞成瓜分波兰,而不愿独自对联合起来的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作战。”(147页注)“梅尔西伯爵——奥地利大使——公开宣布(*répandu dans le public*),普鲁士国王已把艾吉永公爵的答复传达给奥地利公使^①,这位大臣通过这个答复向普鲁士国王陛下保证,法国不会干预可能在波兰采取的一切行动,而且它不会把柏林和维也纳宫廷可能达成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协议看成是履行盟约的理由(开战的理由)。”(243页注)

尽管我对奥地利宫廷的保证不抱什么信心,它那时所作所为极其背信弃义,但是路易十六的**法国大使(赛居尔)**在巴黎把此事公之于众这个事实本身,显示出路易十五及其艾吉永所受到的尊重,而这正是他们应当受到的尊重。

^① 哥·斯维滕。——编者注

法兰西共和国

V. 1792年9月21日至1799年11月11日

(雾月十九日的第二天,这一天督政府被推翻⁴²。)

1793年1月4日,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条约⁴³。

1792年对法国的第一次征讨⁴⁴发生了极其不幸的转折,以致在冬初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就已被法国人占领。普鲁士从战场撤出了它的军队;在凡尔登会议⁴⁵上它坚持的继续参加反雅各宾战争⁴⁴的条件是:必须允许它和俄国一起第二次瓜分波兰。奥地利将在阿尔萨斯得到补偿。

1793年底(9月)普鲁士再次撤出它的军队,由国王^①率领把它开往波兰边境(以“保护”他的波兰领地),因为普鲁士和俄国之间在某些已定条款上产生了分歧,后者似乎运用了它对即将结束的塔尔戈维奇卖国贼议会的影响来反对普鲁士。普鲁士第二次撤出军队以真正占领其波兰领地,结果迫使奥地利人从阿尔萨斯撤军。

1794年春,考斯丘什科领导的革命起义⁴⁶。普鲁士立即将它的部队开去攻打波兰。被击败。1794年9月,被迫撤离华沙,同时波森爆发起义。于是普鲁士国王^①宣布他打算退出反对法国的战争。奥地利也在1794年秋天派了一支部队去波兰,这一情况保证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了法军在莱茵河等地的胜利。将近 1794 年底，普鲁士开始与法国谈判⁴⁷。普鲁士撤军。结果是：荷兰向法国人投降（皮什格吕征服荷兰）。

这些不断转向的行动相继促使比利时被征服，在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左岸取得胜利，并使皮什格吕 1795 年征服荷兰。就在 10 月和 11 月（1794 年），当考斯丘什科被打败，苏沃洛夫占领普拉加等等，发生大屠杀等等时，法国人到处取得胜利。

1795 年 10 月 24 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条约⁴⁸。

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当整个欧洲都转向西方时，叶卡捷琳娜首先悄悄地抓住这个机会同土耳其进行战争⁴⁹。

正像教皇发布训令进行讨伐异教徒的圣战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布训令征讨雅各宾派。甚至当莱奥波德二世将法国流亡者逐出他的国土并禁止他们聚集在法国边境时，叶卡捷琳娜则通过她的代理人鲁缅采夫向他们提供金钱，并将他们安置在与法国接壤并由有神职的王公统治的边境省份。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她同土耳其的战争结束后，在得知国民议会**对奥地利宣战**以前，并没有开始对波兰采取战争行动。这个消息于 1792 年 4 月 30 日传到维也纳，5 月 18 日俄国大使布尔加科夫便向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①递交了宣战书。叶卡捷琳娜二世首先使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感到革命原则的危险，而她却一心追求自己单独的利益（在土耳其和波兰），并没有为“共同事业”提供一名哥萨克或捐助一个卢布。

在法国革命和反对雅各宾派的战争的幌子下，波兰被毁灭了。

① 斯·奥·波尼亚托夫斯基。——编者注

L. K. 皮特教士(英国首相^①的侄子或堂兄弟),英国驻圣彼得堡海外商馆的牧师,在一份秘密文件《关于保罗皇帝在位初期俄国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她(女沙皇^②)也许并非不乐意看到每个欧洲强国都在一场越激烈就越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竭。……新近占有的波兰省份的状况同样是对女沙皇的政治行动发生很大影响的重要问题。对新征服地区爆发起义的担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似乎已经被联合的列强们深深地感觉到了,它们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的正规政府。同样对起义的害怕也阻止了已故的俄国女皇^②进入这个大战场。”

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法国是怎样对待这个有益的盟友的。

让我们先来听一听法国历史学家拉克勒泰尔说的话(第12卷第261页及以下各页):

他说:“共和国对波兰的困境和不幸显得漠不关心。相反,它在安全方面的一个重大考虑是要看到俄国女皇动用她强大的帝国的全部兵力去征服和支解那个不幸的国家。不久法兰西共和国就意识到波兰使它摆脱了它最凶恶的敌人普鲁士国王……”

但共和制的法兰西实际上出卖了波兰。

目击者奥金斯基写道:

“驻巴黎的波兰代表巴尔斯向法国政府提交了在波兰正在准备的并普遍得到热情支持和认可的革命计划。他列举了那个重要和勇敢的壮举所需的各种援助。救国委员会⁵⁰认为他的要求十分合理并答应尽一切可能;但是所有谈判都只限于口头许诺。”(《米哈乌·奥金斯基关于1788—1815年底波兰……回忆录》1826年巴黎版第1卷第358页)

① 威·皮特。——编者注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编者注

“救国委员会曾许诺向考斯丘什科将军提供金额 300 万里弗赫和一些炮兵军官；但我们根本没有得到一个苏或迎来一名军官。”

这段话引自考斯丘什科的副官尤·涅姆采维奇的《1794—1796 年我在圣彼得堡被俘期间的笔记》1843 年巴黎版（见第 90 页）。

1795 年 4 月 5 日，督政府（那时已取代了救国委员会）与普鲁士缔结了**巴塞尔和约**⁵¹。根据这个和约，**荷兰和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德国北部，由分界线划出成为**中立地带**，普鲁士则通过几个德国主教管辖区世俗化而得到补偿。这个巴塞尔条约“**确保两个缔约国各自的属地**，并且不包含任何有关新近占领的波兰各省的条款，从而把这些省份的归属权交给了普鲁士国王^①。”**奥金斯基**告诉我们，当波兰人得知这些和谈的情况时，他们的代表**巴尔斯**向那些对波兰特别友好的督政府成员呼吁，要求写入一项迫使普鲁士国王声明放弃等等的条款。

“他得到答复说：因为这个条件会妨碍与普鲁士的谈判，所以不能接受；法国想要恢复自己的武装力量；与普鲁士的和平不会持续很久；波兰人应该准备好，为人们所要求的为捍卫自由和他们的国家做出新的努力等等。”同一个**奥金斯基**在第 2 卷第 133 页和 223 页告诉我们：“**法兰西共和国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缔结的条约给土耳其御前会议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后者声称如果法国在与柏林宫廷的谈判中不能为波兰争得任何东西，土耳其人单独采取有利于波兰的行动是不可能的。”

在**第三次瓜分**后，俄国被迫安静了几年。波兰人这时参加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战役，主要是在意大利。（见**霍吉科**《**东布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下的波兰军团在意大利的历史**》1829 年巴黎版）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在缔结坎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17日)⁵²以前,根据一项双方都同意的计划,经波拿巴同意,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决定经过克罗地亚和匈牙利进入加利西亚,从而转移人们对波拿巴会向维也纳进军的注意力。外交大臣沙尔·德拉克鲁瓦(见奥金斯基书,第2卷第272—278页)建议奥金斯基“煽动加利西亚暴动”。奥金斯基生怕波兰人仅仅被当作用后就扔的工具。因此他要求得到一个肯定的保证:那些牺牲将为他们赢得法国的帮助,以恢复他们的国家。德拉克鲁瓦则非常霸道地说,法国政府不需要他们;如果他们心存疑虑,他们可以到别的地方碰碰运气等等。他给奥金斯基三天时间考虑,此后他们就必须表示接受或拒绝,但是不得提出任何条件。可怜的波兰人宣称法国政府要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但是这个政府只要求他们表示正式接受,以胁迫奥地利,从而加速和约的缔结。1797年4月18日在莱奥本停战。于是签订了坎波福米奥条约,它像巴塞爾条约一样,使波兰人又一次被牺牲。

1799年,苏沃洛夫最终使法兰西共和国感觉到了波兰消失的后果。俄国军队出现在荷兰和意大利。苏沃洛夫兵临法国边界。

当1799年7月28日^①法国人将曼图亚拱手让给俄国将军维尔霍斯基时,投降书中订有秘密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奥地利人领回他们的逃兵,即加入波兰军团的奥籍波兰人。在曼图亚投降后,第二军团落入敌人手中;在东布罗夫斯基领导下的第一军团加入了大军⁵³,在几次同俄奥军队大战中几乎被彻底消灭。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4月28日。——编者注

执 政 府

1799年11月9日(雾月十八日)。执政府。波拿巴命令组成新的波兰军团,其中一个军团由东布罗夫斯基率领驻马赛,另一个由克尼亚杰维奇将军率领驻多瑙河沿岸。这些军团参加了马伦戈战役和霍恩林登战役⁵⁴。参看莫罗将军当时的命令,其中他对“克尼亚杰维奇将军和他的波兰士兵的坚定性”作了公正的评价。

1801年2月9日与奥地利签订的吕内维尔条约⁵⁵。其中没有一个条款涉及波兰。

1801年10月与俄皇保罗一世签订的巴黎条约⁵⁶。在这个条约中保罗一世和波拿巴相互许诺“不许他们的任何臣民与两国现政府的内部敌人保持直接或间接的通信联系,在通信中宣传与它们各自的宪法相违背的原则,或煽起动乱。”

这个条款一方面涉及波兰人,另一方面涉及波旁王朝及其支持者。

1801年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波拿巴亲自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为法国的野心辩护,因为法国掠取的地方无法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瓜分波兰时所获得的相比。(梯也尔《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第3卷第153页)

在和平时期波兰军团被看成累赘。其中一部分像马木留克⁵⁷一样被波拿巴当作礼物送给了伊特鲁里亚女王^①。

① 玛丽·路易莎·约瑟芬。——编者注

1802年3月27日亚眠条约⁵⁸。第一执政官^①以武力迫使波兰军团的一部分登船开往圣多明各,把另一部分奉送给新即位的那不勒斯国王^②。他们在炮火的威胁下,在热那亚和里窝那登船去圣多明各送死。

帝 国

1804年5月(1804年12月2日加冕)至1815年

1806—1807年。拿破仑在与俄国支持下的普鲁士进行战争期间,把东布罗夫斯基指挥下的波兰军团的剩余部分派往普属波兰,在那里他们为他攻占了但泽并煽动这个国家举行暴动。

1806年12月18日,拿破仑亲自到达当时属于普鲁士的华沙。波兰人显出极大的热情。上院议长托马斯·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自传(1836年巴黎版)中写道:拿破仑初次接见政府成员时说了这样的话:

“先生们,今天我需要20万瓶酒,以及同样份数的大米、肉和蔬菜。不得推托;否则我就把你们丢下吃俄国人的皮鞭……我要你们证明你们的忠诚:我需要你们的血。”(“j'ai besoin de votre sang.”)

他征召了一支波兰军队。战役持续到1807年5月6日。

1807年6月25日和26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在涅曼河畔友

① 拿破仑·波拿巴。——编者注

② 约·波拿巴。——编者注

好会晤。

1807年7月7日签订蒂尔西特条约⁵⁹。(7月9日与普鲁士签约。)

这个条约的**第五条**宣布建立华沙公国,拿破仑把它让给“萨克森国王^①,完全归他所有和统治,并依据这样的体制进行治理:在保证公国的自由和特权的同时,应兼顾邻国的稳定局面。”

这个公国是从普属波兰分割出来的。

第九条将刚从普鲁士手中夺来的波兰的一部分,即拜阿里斯托克地区割让给俄国,并“将永久并入俄罗斯帝国,以便建立俄国和华沙公国之间的自然分界线。”

但泽在成为自由市的借口下,成了法国的海军要塞。

新公国中的许多大地产都被拿破仑赠送给法国将军们。

列列韦尔正确地把这称为**第四次瓜分波兰**。

拿破仑在波兰人的帮助下打败了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以后,却把波兰当作一个战败国和他的私有财产来处理,而且处理得让俄国得利。

华沙公国小,在欧洲没有地位。巨额的王室费用;由萨克森负责民政,拿破仑负责军事。达武像帕沙一样在华沙进行统治。他实际上把这个公国变成法国招兵的场所,军需的补给站。

(萨瓦什凯维奇《波兰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命运的影响概述》1848年巴黎第3版。)

对拿破仑来说,华沙公国不仅仅是反对俄国的前哨。拿破仑占据了正是可以作为他进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基地的据点。当尼古拉

①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编者注

修筑一系列堡垒来增强那些据点时，就是按照他的精神行事的。

(拿破仑在蒂尔西特条约的开头加上一个声明说，他只是出于对亚历山大的礼貌才将普鲁士国王^①原有领土的一半归还给他，从而宣布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只是俄国的附庸。)

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使得一部分公开条款失效。例如，只是为了欺骗奥地利，公开的条约中才包含维护土耳其完整的条款。根据秘密条款，拿破仑将土耳其和瑞典奉献给沙皇，沙皇则把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和北非沿岸让给拿破仑；沙皇答应参加大陆封锁⁶⁰，并把伊奥尼亚群岛让给法国。只是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才未能瓜分土耳其。在缔结了蒂尔西特条约以后就开始了瓜分土耳其的种种安排。1808年8月，亚历山大把达尔马提亚的要塞以及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交给了拿破仑⁶¹；当亚历山大的军队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时，拿破仑命令法国驻达尔马提亚的指挥官马尔蒙准备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进军。关于瓜分土耳其的谈判在彼得堡继续进行，拿破仑派他的宪兵和密探头子萨瓦里参加。关于他与俄国外交大臣鲁缅采夫谈判的报告最近已经发表。甚至拿破仑的议员和崇拜者之一蒂博多也这样描述萨瓦里与亚历山大一世和鲁缅采夫的谈判：

“他们抛开一切外交形式，以强盗头子分赃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方式进行交易。”

根据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蒂尔西特进行的谈判，瑞典和丹麦被迫参加大陆封锁。拿破仑把芬兰(1808年被俄国人占领，从那以后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一直被占领着)让给亚历山大,此外,丹麦有意通过使挪威归属自己而对瑞典进行掠夺。这样一来,拿破仑就成功地完全击败了俄国的这个老对手。

1808年9月27日。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参加爱尔福特会议⁶²。

以前任何人都没有像拿破仑在1807—1812年间那样卖力地增强俄国的实力。从1808年到1811年波兰人被拿破仑送到西班牙当炮灰。他们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沦为专制制度的雇佣军。在公国编成的9万人的军队中,大批被派到西班牙,以致当1809年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入侵的时候,公国已无兵可用。

1809年4月。当拿破仑向维也纳进军时,斐迪南大公就向华沙进军。波兰人入侵加利西亚,迫使大公从华沙撤军(6月1日);拿破仑的盟友俄国人进入加利西亚,实际上是帮助奥地利人对付波兰人。

1809年10月14日:被奥地利人称为“新加利西亚”的波兰各省和扎莫希奇地区一起重新并入华沙公国。拿破仑在把旧波多利亚的一部分塔尔诺波尔区从旧加利西亚分出来以便交给俄国以后,把旧加利西亚留给奥地利⁶³。读一读当时发表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纸上——注明为1809年11月13日(俄历11月1日)于彼得堡——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致库拉金亲王的一封具有讽刺意味的信,就可以明白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第五次瓜分(列列韦尔语)。沙皇写道:

“条约正由法国和奥地利批准,因此,我们对后者的敌对行动应同时停止。根据这个和约的原则,奥地利由于占领加利西亚而像以前一样仍是我们的邻邦,波兰各省不是被联合为一体,而是被三个国王永远分割。因此,在波兰进行政治革命的梦已经破灭。现今的形势稳定了波兰和俄国之间的边界,俄国在这件事上不仅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相反还在波兰腹地(au sein de la Pologne)扩展了它的统治。”

波兰人这时要求给公国恢复波兰的名称。沙皇反对。1809年10月20日,外交大臣尚帕尼根据拿破仑的命令,向俄国政府发出照会,说明拿破仑赞成“不仅从一切公文中,甚至从历史上抹去波兰人和波兰的名称”。这是拿破仑为他与约瑟芬离婚后向沙皇的妹妹^①求婚作准备。

1810年1月4日:拿破仑的大使科兰库与鲁缅采夫伯爵签订秘密协定⁶⁴,大意是:

“第1条:波兰王国永远不得恢复。第2条:波兰和波兰人的名称永远不得用于以前任何构成该王国的部分,而且应从一切公开的或官方的文件中消失。”此外“大王国永远不得通过吞并任何旧的波兰省份扩大版图;波兰骑士阶层应予废除;最后,所有这些约定对萨克森国王^②、华沙大公和拿破仑本人都应具有约束作用。”(梯也尔《执政府和帝国》第11卷)

正是在为签订这个协定而开始谈判以后,拿破仑向亚历山大的妹妹^①提出求婚。沙皇的犹豫(他从12月中旬至1月中旬以不同的借口迟迟不肯表态)和沙皇母亲^③的嫌弃激起了拿破仑的恼怒,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使他别处求亲,并中止了谈判。

克雷蒂诺-若利在《面临革命的罗马教会》中谈到:

“拿破仑皇帝不允许他的政策陷于感情用事的革命词句。他的大臣^④大笔一挥就把波兰的名称甚至从历史上抹掉,而且一项条约——随后发生的事件已使之失效——就把这个名称当作地理上的虚构一样划掉。”

① 安娜·巴甫洛夫娜。——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编者注

③ 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编者注

④ 阿·奥·路·科兰库。——编者注

在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的女儿^①结婚以后,他有了恢复波兰的新机会。我来引用一位在其所写历史著作中美化了拿破仑的法国作者的话。诺文斯说:

“拿破仑在1810年终于能够实现那个崇高的计划,”即恢复波兰,“因为奥地利把新旧加利西亚都让给他,但是他拒绝了,为的是不与俄国打仗,而俄国在缔结蒂尔西特和约的第二天就准备对他开战。”

据前所述,不言自明,拿破仑对俄国进行的1812年战争完全没有考虑波兰。拿破仑是被俄国逼迫而进行这场战争的,因为俄国于1810年12月31日(俄历19日)允许进口由中立国船只运输的殖民地商品,却禁止进口法国的某些商品,对另一些商品则征收重税,并且不顾拿破仑为防止战争所作的一切外交努力而不作丝毫让步。拿破仑要么放弃他的大陆封锁,要么对俄国开战。

1812年6月28日。拿破仑进入维尔纳之日。这一天在华沙议会上宣布成立联邦的波兰(即与立陶宛建立联邦的波兰),并且进行一场民族战争。拿破仑告诉华沙的议员们说,他不需要一场民族战争。(沙尔腊斯告诉我们,由于拿破仑对这样一种战争的厌恶……百日⁶⁵。)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2月
13日—1865年1月3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卡·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手稿》1961年海
牙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① 弗兰茨一世的女儿玛丽·路易莎。——编者注

卡·马克思

* 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草稿⁶⁶

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⁶⁷的加入问题,它必须用某种方式声明它的目标与国际协会的目标一致,但是不能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通过正式决议的方式而直接加入,因为这样做会触犯普鲁士有关结社的法律。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你们的行动极为关注的柏林印刷工人和排字工人协会,也不能用通过正式决议的方式加入伦敦的团体。

不过,即使如此,后者也一定会派代表参加由伦敦委员会召开的代表大会⁶⁸。

此外,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报纸^①即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已经交给国际委员会完全支配。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1 月
24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论 蒲 鲁 东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⁶⁹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此外，我手头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愿望，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①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②，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编者注

② 指蒲鲁东的《论通用文法》。——编者注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作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悟性时使用的机智反论,致命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惟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

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①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

① 雅·皮·布里索《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编者注

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①(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②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格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

① “Sophistication”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编者注

② 即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编者注

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①。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

①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70)

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①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作超极端的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浮夸的。凡是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

^① 见我的著作第119、120页。⁷¹

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⁷²,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①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⁷³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⁷⁴在六月起义⁷⁵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⁷⁶(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庞然巨物了。

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

① 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编者注

(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59—64页^①)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②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③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4—481页。——编者注

② 见弗·巴师夏/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③ 指蒲鲁东《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编者注

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⁷⁷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①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还有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⁷⁸，在其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这些应当认为不仅是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么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

① 指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编者注

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反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1 月
24 日

载于 1865 年 2 月 1、3 和 5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6、17 和
1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提德曼老爷⁷⁹

古代丹麦民歌

清晨——天色刚刚发亮，——
提德曼老爷就在卧室里穿衣裳，
他穿上一件漂亮的衬衣。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他穿上一件漂亮的衬衣，
披上绿色华丽的丝绸外套，
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系好山羊皮靴的带子，
扣紧镀金的马刺，
他赶赴南哈尔德司法会议。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他赶赴南哈尔德司法会议，
向自由农索要捐税，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每张犁要缴黑麦七斗，
每四头猪还得缴一头膘肥体壮的，
这时一位老人站了出来。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这时一位老人站了出来：
“我们谁也缴不出这样多捐税，
在我们缴税之前，”——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在我们缴税之前，
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
南哈尔德的农民们，紧紧地围起来！”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南哈尔德的农民们，紧紧地围起来！
不要让提德曼老爷活着逃离会场！”
老人给了他第一拳，——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老人给了他第一拳，
把提德曼老爷打倒在地上，
提德曼老爷倒地鲜血流。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提德曼老爷倒地鲜血流，
犁耙在黑土地上自由行进，
猪在森林里自由地吃食。
南部人都喜欢这样。

中世纪农民战争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日德兰半岛奥胡斯城北的南哈尔德(哈尔德意为司法区)。在这个区的司法会议上除了审理司法案件外,也审理税务案件和行政案件。这首民歌告诉我们,日益强大的贵族怎样反对自由农,以及农民通过哪些方式使贵族不再狂妄自大。这首风趣的古代农民歌曲非常适合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德国,有产阶级中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一样多;无产阶级中农业无产者和工业工人也一样多,或者更多一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大约完成于 1865
年 1 月 27 日

载于 1865 年 2 月 5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 1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⁸⁰

在贵报第 16 号上,莫·赫斯先生身在巴黎竟对与他完全素昧平生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法国委员们表示怀疑,他说:

“的确看不出,即使伦敦的协会中有罗亚尔宫⁸¹的一些朋友参加,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协会是公开的……”

在前一号上^①,这位莫·赫斯先生在谈论《联合》杂志时,就曾经对伦敦委员会的巴黎朋友作过类似的暗示。我们声明他的暗示完全是无聊的造谣中伤。

此外,我们也为这一事件证实了我们的信念而感到高兴:巴黎的无产阶级依然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⁸²式的和罗亚尔宫式的波拿巴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为了一碗红豆汤⁸³而出卖他们的历史荣誉(或者,也许不应当说“他们的历史荣誉”,而应当说“他们作为革命承担者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吧?)。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

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① 指 1865 年 1 月 1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 8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2 月
6 日

第一次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1844
年到 1883 年通信集》1913 年斯
图加特版第 3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
德国工人政党⁸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65 年 1 月
27 日—2 月 11 日

1865 年 2 月底以小册子形式在
汉堡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Die
preuss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urg.
Otto Weigner.
1865.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
德国工人政党》第1版的扉页

关于军事问题的辩论,迄今只是在一边是政府和封建党派,另一边是自由的激进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现在,危机日益迫近,该是工人政党也来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我们只能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评论这里所谈的军事问题。只要德国和欧洲还保持着目前的状况,我们便不可能指望普鲁士政府的行动不从普鲁士的立场出发。我们同样也不能指望资产阶级反对派不从自己的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

工人政党在反对派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所有问题上都置身于实际冲突之外,因此它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完全冷静地和公正地讨论这些问题。只有工人政党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像对待已经过去的事情那样)和解剖式地(像解剖尸体那样)来讨论这些问题。

关于普鲁士军队在原先制度下的情况如何,经过 1850 年和 1859 年的动员实践⁸⁵以后不可能再有两种意见了。从 1815 年起,专制君主制受到公开的诺言的约束。这项诺言就是:不经未来的代议机关事先认可不征收任何新税,不发行任何公债。要违背这项诺言是不可能的;不经过这种认可,任何公债都不会收到丝毫成效。税收大体上是这样:税收所得绝对没有按国家财富增长的比例增长。专制制度是贫穷的,是非常贫穷的,1830 年的风暴⁸⁶所引起的特别开支足以迫使它厉行节约。正因为这样才实行两年制兵役,并在所有军事管理部门建立节约制度,这一制度使得为进行动员而准备的军事装备的数量和质量降到了最低水平。尽管如此,普鲁士的大国地位还得保持;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在战争一开始就有尽可能强大的第一类野战军,并为此把后备军并入第一类野战军⁸⁷。这样一来,人们担心的是,在刚一受到战争威胁时就必须进行动员,而且担心整个大厦会因动员而倾覆。这样的事情曾经在 1850 年发生,并以普鲁士的惨败告终。

1850 年,人们只认识到这个制度的物质的匮乏;整个这种情况在精神缺陷能够显露出来以前就结束了。两个议院批准的基金被用来在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物质的匮乏。所以说在可能的范围内,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物质方面准备得能够在 14 天内就把应征的预备兵装备起来使之做好战斗准备,而再过 14 天就把整个第一

类后备军装备起来使之做好战斗准备。不应忘记,常备部队中最多有三种适龄人员,而预备队和第一类后备军中总共有九种适龄人员。因此,在四个星期内至少要给做好战斗准备的常备部队中的每三个士兵配备七个应征者。这时爆发了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于是进行了新的总动员。这一次物质匮乏仍然充分地显露出来,但是远没有制度的精神缺陷严重,这种精神缺陷只是现在,当军队进行较长时间的动员时才暴露了出来。后备军没有受到重视,这是不可否认的;它的步兵营的基干大部分空缺,有待于建立;现有的军官中有许多人不能胜任野战勤务。即使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仍然是:军官不能不使自己的士兵感到他们完全是陌生的,之所以陌生首先在于他们的军事素养;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军事素养都非常低,以至于人们不能放心地把由这样的军官指挥的步兵营派去对付有经验的军队。如果说后备军的军官在丹麦战争⁸⁸中打得不错,那么不应忘记,在步兵营中是基于军官占五分之四而后备军军官占五分之一还是两者比例正好相反,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人们很快就发现本来能够预料到的情况:虽然可以用后备军去作战,特别是进行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它去打进攻战。后备军是个完全防御性的组织,只有在敌人的入侵被击退的情况下才可能用它去进攻,就像在 1814 年和 1815 年那样。后备军的大部分成员是 26 岁到 32 岁的已婚男子,当每天寄来的家信说,妻子儿女由于发给应征者家属的补助金严重不足而忍饥挨饿时,他们是不会让自己一连几个月无所事事地待在边境上的。此外还有:士兵们不知道他们应当同谁打仗,同法国人还是同奥地利人,而当时不论法国人还是奥地利人都没有使普鲁士受到任何损害。难道能够用这些由于一连数月无事可做而士气低落的军队去进攻组织良好并

惯于作战的军队吗？

很明显，必须有一个转变了。普鲁士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使第一类野战军拥有比较牢固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怎样建立的呢？

征集的 36 个后备军步兵团暂时保留，并逐渐改编为新的常备军团。骑兵和炮兵的人数也逐渐增加到同步兵部队的这种扩大了编制相适应的程度。最后，要塞炮兵从野战炮兵中分离出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改进，对普鲁士来说更是如此。总而言之，步兵增加了一倍，骑兵和炮兵大约增加了一半。为了维持这种扩大了军队编制，有人建议把常备部队的服役期限从五年延长到七年，——三年现役（步兵），四年预备役，——相反，把第二类后备军的服役期缩短四年；最后，把每年征集新兵的名额从原先的 40 000 名增加到 63 000 名。在这期间后备军仍被完全忽略了。

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按上述规模进行的扩充，同普鲁士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相适应，普鲁士人口在 1815 年为 1 000 万，到 1861 年已增加到 1 800 万；由于这个时期普鲁士的财富比人口增长得快，并且由于其他的欧洲大国从 1815 年起都以大得多的规模扩充了自己的军队，因此基干部队的这种扩充无疑并不过分。同时在所有的兵役负担中，这个建议只增加最年轻的士兵在预备队中的服役期限，相反，最年长的士兵在后备军中的服役期限减少一半；第二类后备军实际上几乎完全被撤销，因为第一类后备军现在差不多取代了从前第二类后备军的位置。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可以提出如下的反对意见：

普遍义务兵役制——顺便提一下，这是在普鲁士存在的惟一民主的制度，尽管它只是存在于纸上——与过去所有的军事制度相比是一大进步，所以，这种制度在什么地方已经存在，即使在实行中还

有不完善之处,它就不可能再永久地被取消。对于我们目前的军队来说只有两个明确的基础:或者是募兵制,——但它已经过时,只有在像英国那样的特殊情况下才可能实行,——或者是普遍义务兵役制。任何征兵制和抽签制⁸⁹都不过是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很不完善的形式。1814年普鲁士法律的基本思想是:每个身体合格的公民,在他还适合于服兵役时有义务亲自拿起武器保卫国家。这个基本思想高于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所采取的雇佣代役者的原则,而且在存在了50年后,当然不会成为资产阶级进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人肉交易”的强烈愿望的牺牲品。

既然普鲁士军事制度是以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那么只有在它的基本原则逐渐得到贯彻的情况下,它能够以自己固有的精神顺利地向前发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情况。

1815年1000万居民中有40000人应征,占千分之四。1861年1800万居民中有63000人应征,占千分之 $3\frac{1}{2}$ 。可见是后退了一步,虽然这与1859年以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进步,那时应征人数只占千分之 $2\frac{2}{9}$ 。要重新达到1815年的百分率,就需要征召72000人。(我们将看到,实际上每年参军的人数可以接近或者超过这个数字。)但是,难道普鲁士人民的军事实力只限于每年从每个居民中征召四个人吗?

达姆施塔特的《军事总汇报》根据德国中部各邦的统计再三指出,在德国应征的青年人中有**整整一半人**适合服兵役。根据《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1864年3月)的统计,1861年应征的青年人共227005人^①。这样,每年可以提供113500名适合服兵役的新

① 这里的应征人数是1862年的统计数字。——编者注

兵。如果我们从这个数字中划掉 6 500 名免服兵役的或道德不合格的人, 仍然可以剩下 107 000 人。为什么他们当中只有 63 000 人或者最多 72 000 — 75 000 人服役呢?

陆军大臣冯·罗昂在 1863 年议会开会时向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下列 1861 年征兵情况的清单:

人口总数(1858 年统计)	17 758 823	
1861 年年满 20 的应服兵役者 ...	217 438	
从往年遗留下来的应服兵 役者(对他们尚未作出最后 决定).....	348 364	565 802
其中:		
(1)下落不明者.....	55 770	
(2)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 在其他地区应征者.....	82 216	
(3)无故逃避兵役者.....	10 960	
(4)服役三年的志愿兵.....	5 025	
(5)有权服役一年的志 愿兵.....	14 811	
(6)延期服役或免役的神职 人员.....	1 638	
(7)应在海军中服役者.....	299	
(8)由于道德不合格而被除 名者.....	596	
(9)由于明显不合格而被区 委员会免除者.....	2 489	
(10)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区 委员会免除者	15 238	
(11)编入补充预备队 ⁹⁰ 者:		
(a)经过三次检验身高 不满 5 英尺者.....	8 998	

(b)经过三次检验身高 不满 5 英尺 1.3 英寸 者.....	9 553		
(c)经过三次检验暂时 不合格者.....	46 761		
(d)经过三次检验,由于 家庭情况暂不能服役 者.....	4 213		
(e)经过五次检验待命 入伍者.....	<u>291</u>	69 816	
(12)征入辘重队以外的预定 到辘重队服役者.....			6 774
(13)延期一年服役者:			
(a)暂时不合格者.....	219 136		
(b)有家庭原因.....	10 013		
(c)丧失公民权者和正 在受审者.....	<u>1 087</u>	<u>230 236</u>	<u>495 868</u>
剩下的能够应征者.....			69 934
实际征召的人.....			<u>59 459</u>
待命入伍者.....			10 475

尽管这个统计并不完善,尽管它在第 1 项到第 13 项的每一项中把 1861 年的适龄人员同过去两年的适龄人员之中待命入伍的人员混在一起,从而把整个事情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仍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

征召到的新兵为 59 459 名。服役三年的志愿兵为 5 025 名。有权服役一年的为 14 811 人。众所周知,由于服役一年的志愿兵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他们是否适于服役,检验是不大严格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半即 7 400 人实际加入了军队。这是很保守的计算;那些有资格服役一年的人,大部分本来就是适于服役的

人；而那些根本就不适于服役的人也完全不必费力去获得这样的资格。我们这里仍然采用 7 400 这个数字。根据这种计算，1861 年参加军队的共有 71 884 人。

我们继续往下看，神职人员延期服役或免役者有 1 638 人。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神职人员先生们不应当服兵役。相反，一年的兵役，露天的生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对于他们是有益无害的。因此，我们大胆地把他们列入名单；假定这一年的适龄人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四分之三是不适于服役的，那么仍然有 139 人应当列入兵役名单。

18 551 人由于身材不够高而被免除兵役。我们充分注意到，他们是被“编入预备队”，而不是完全被免除兵役。因此，在战时他们仍然应当服兵役。他们只是免去了和平时期的阅兵式兵役，因为他们的外表不够魁伟。这也就是承认，这些身材矮小的人完全适合于服役，而人们甚至打算在紧急情况下利用他们。这些身材矮小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士兵，这一点可从法国军队得到证明。在法国军队中身高 4 英尺 8 英寸以上的人都能服兵役。所以我们无条件地把他们列入国家的军事资源。上面所举的那个数字只包括那些经过三次检验由于身材矮小而最后被取消资格的人；因此这是每年都重复出现的数字。我们从这个数字中划掉一半，即划掉那些由于其他原因不适于服役的人，这样还剩下 9 275 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一个有经验的军官必定会很快把他们变成顶呱呱的士兵。

接着我们看到，除了应征入辎重队者，有 6 774 人预定到辎重队服役。但是辎重队也属于军队；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不应当到辎重队去服短短六个月的兵役，这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于辎重队都会更好一些。

因此,我们看到:

实际服役的人	71 884
神职人员	139
适合服役,但身材不够高的人	9 275
预定到辎重队的人	6 774
共 计	88 072 人,

根据罗昂自己的统计表提供的材料,如果认真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每年就能有这么多人参加军队。

现在来看看不合格的人:

由于暂时不合格而延期一年服役者	219 136 人
如前所述,经过三次检验被编入预 备队者	46 761 人
由于长期不合格而被除名者只有	17 727 人
共 计	283 624 人,

因此,由于真正的生理缺陷而长期不合格者不到所有由于不合格而免服兵役者的 7%,并且不到所有每年到征兵委员会报到者的 4%。经过三次检验而暂时不合格者每年有将近 17% 被编入预备队。这是些 23 岁的人,他们正处在体格已经开始成型的年龄。如果我们假定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年满 25 岁以后完全适合服役,那么这个估计肯定不会过高,这将会有 15 587 人。人们起码可以要求这些人在两年过程中每年在步兵部队中服役三个月,使他们至少可以受到新兵训练。这就等于把和平时期的军队扩充 3 897 人。

但是普鲁士的整个新兵体格检查制度有其独特之处。能征集到的人数往往多于能入伍的数目,同时却仍然要保持普遍义务兵役制

的招牌。按照所要求的人数挑选最优秀者,而以任何一种借口宣布其他人不合格,还能有什么做法比这样一种做法更简单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明确指出,从1815年以来直至今天在普鲁士一直存在着这种情况,不适于服役的概念得到了非常不寻常的扩展,同德国中部各邦加以比较可以最好地证明这一点。在实行征兵制和抽签制的中部各邦中,不存在任何可以宣布比真正不合格的人更多的人不合格的理由。这些邦的情况和普鲁士的情况一样;在个别的邦,例如在萨克森,情况甚至更糟,因为那里工业人口的比例较高。但是,上面已经说过,《军事总汇报》再三指出,在德国中部各邦应征的人中有整整一半的人是合格的;普鲁士的情况也应当如此。一旦爆发激烈的战争,普鲁士关于适于服役的概念就会发生突然的革命,那时人们就会懂得(可惜太迟了),很多合格的人被放过去了。

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565 802名应服兵役者(对他们有待作出决定)中包括:

下落不明者	55 770 人
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其他地区应征者 ...	82 216 人
无故逃避兵役者	10 960 人
共 计	148 946 人

因此,尽管有一个享有声誉的普鲁士监督机关,——在普鲁士凡是有过服兵役义务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年仍然有整整27%的应服兵役者不见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那82 216个因为“迁居其他地区或者应该在其他地区应征”而被除名的人在哪里呢?难道现在只要从柏林迁到波茨坦就能免除兵役吗?我们愿意认为,在这里——要知道,荷马也有打瞌睡的时候——官老爷们干脆在

自己的统计中出了差错,即他们让这 82 216 人在总人数 565 802 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他们出生的地区,第二次出现在他们迁居的地区。把这点弄清楚很有必要,——最好能由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来做这件事,因为把应服兵役者的实际人数减少到 483 586 人就会大大地改变所有的百分比。我们姑且认为情况就是如此,那么每年仍然有 66 730 人不见踪影,不论普鲁士监督机关还是警察当局都不能召他们去服兵役。这些人几乎占应服兵役者的 14%。由此得出结论,在普鲁士借口对兵役进行监督而对迁徙自由设置的一切障碍都是**完全多余的**。大家知道,从普鲁士移居国外的实际人数是很少的,根本不能同消失的新兵人数相比。在这大约 67 000 人中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迁到国外去了。大部分人或者一直留在国内,或者只是短期地移居国外。总的说来,所有针对逃避兵役的预防性措施是毫无用处的,充其量会促使人们移居国外。但是绝大多数青年人总归不可能移居国外。只要措施得当,毫不姑息地迫使那些逃避兵役的人服兵役,新兵的人数就会比以前多,根本不需要这些无用的繁文缛节。

此外为了有充分的把握,我们打算只把冯·罗昂先生本人统计的数字当做可靠的材料,即除了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以外,每年可以征集 85 000 个青年人。目前和平时期军队的人数约为 210 000 人。在实行两年制兵役的情况下,每年 85 000 人,两年累计是 170 000 人;再加上军官、士官和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约 25 000 人到 35 000 人;这样,总共是 195 000 人到 205 000 人;若把服役一年的志愿兵计算在内,总共是 202 000 人到 212 000 人。因此,如果在步兵、步炮兵中(骑兵后面再说)实行两年制兵役,改组后军队的所有基干即使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也有可能达到和平时期的满员状况。在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情况下,实行两年制兵役很可能会使军队中多

出 30 000 人来；因此，为了使人数不超过 200 000 人到 210 000 人这个数字，可以让一部分人在一年到一年半后退役。这种将提前退役作为对热心服役的奖励的做法，对于整个军队来说，也许要比让这些入再服役六个月更有好处。

军队的战时编制将大致如下：

按改组计划，四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每种 63 000 人，总共是 252 000 名预备兵。三种役龄的适龄人员，每种 85 000 人，总共是 255 000 名预备兵。可见，其结果确实同改组计划所规定的一样良好。（因为这里所谈的只是数字关系，所以，即使我们完全不去考虑减少预备队的役龄种类，情形还是一样。）

改组计划的弱点就在这里。它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强大的军队预备队的后备军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⁹¹，从而给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带来不稳定因素，这必将招致最严重的后果。两种制度不能混在一起，同时兼有两者的优点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不容争辩的是，兵役期和现役期较长的基干制能保证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具有很大优越性。人们彼此比较了解；甚至那些每次往往只能得到短期归休的归休兵，在整个归休期间都自视为士兵，并且时刻准备服现役（普鲁士的预备兵却不是这样）；因此，步兵营在初次参加战斗时就一定能表现出更为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应当提出异议的是：如果人们非常看重这一点，那么他们采取英国的十年现役制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阿尔及利亚远征⁹²、克里木战争⁹³和意大利战争⁹⁴确实远比长期兵役更有益处；采取这种制度最终只能训练出一部分能携带武器的人，也就是说远远没有把国家的全部力量调动起来。此外，经验证明，德国士兵很容易适应战斗环境，三次艰

苦的、至少胜败参半的战斗,对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良好的步兵营所起的效果不亚于整整一年的额外兵役。对于普鲁士这样的国家来说,基干制是行不通的。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普鲁士可能拥有一支最多300 000—400 000人的军队,和平时期军队的编制将是200 000人。但是为了维持它的大国地位,单是第一类野战军的出征就需要这么多人,也就是说,为了进行任何严酷战争,它需要有包括要塞守备部队、补充部队等在内的500 000—600 000人。如果1 800万普鲁士人也像3 500万法国人、3 400万奥地利人和6 000万俄国人那样,在战争时要派出如此大量的军队,那么这只有通过普遍义务兵役制,通过短期的但是紧张的服役和期限较长的后备军兵役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制度下往往不得不在军队的战斗准备方面,甚至在战争初期军队的战斗力方面有所牺牲;国家和政策将具有中立的、防御的性质;但是也应当记住,基干制的傲慢进攻战术所带来的结果是从耶拿到蒂尔西特⁹⁵,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时后备军制谦虚的防御战术所带来的结果则是从卡茨巴赫到巴黎⁹⁶。总之,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七八年兵役期的征兵制和代役制,其中约有一半的时间服现役,而后不在后备军中继续服役;或者是五年、最多六年兵役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其中两年服现役,然后在普鲁士型的或瑞士型的后备军⁹⁷中服役。但是要想让人民大众首先承担征兵制的负担,然后再承担后备军制的负担,这是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不能忍受的,甚至连野蛮好战、最有忍耐力的土耳其人也不能忍受。是实行短期现役和长期预备役训练出大批的人,还是实行长期现役和短期预备役训练出少数人,这就是问题所在,但是必须二者择一。

在威廉·纳皮尔看来,英国士兵当然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他在自

己的《半岛战争史》^①中说,英国步兵服役三年之后,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充分的训练。可是应当知道,本世纪初英国军队的成员是所有通常能够构成一支军队的人中最劣等的人。现在英国军队的成员已经好得多了,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仍然远远不如普鲁士军队的成员。难道在普鲁士这样一个拥有非常容易接受训练、一部分已经受到很好训练以及从一开始就受到道德教育的新兵材料的国家里,不能在两年期间取得英国军官在三年期间训练那些无赖时所取得的成绩吗?

当然,现在士兵要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把它当作反对两年制兵役的理由。人们总是一味强调培养**真正的士兵精神**,说什么这种精神只有在服役第三年才能养成。如果这些先生说得坦率一些,如果我们不想考虑各个步兵营上述公认的更优良素质,那么与其说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真正的士兵精神应当更多地表现在对付内部的杜佩尔⁹⁸,而不是表现在对付外部的杜佩尔。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个普鲁士士兵在服役第三年除了学会厌倦生活、勒索新兵的钱买酒以及对自己的长官开些低级的玩笑还学会了点别的什么。如果我们的大多数军官哪怕只去当一年士兵或士官,他们就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经验证明,“真正的士兵精神”,就它的政治性质而言,很快就会化为乌有,而且一去不复返。但军事性质的士兵精神仍然存在,在两年兵役之后也依然如此。

可见,两年的时间足以把我们的士兵训练得能够在步兵中服役。

^① 威·纳皮尔《1807—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1831年伦敦版第3卷第271页。——编者注

自从野战炮兵和要塞炮兵分开以后，步炮兵的情况也是这样；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可以或者通过更细的分工，或者通过本来所希望的简化野战炮兵的器材来克服。征集更多的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也同样不会有任何困难；但是正是这类人，如果他们不适宜做士官，在普鲁士军队中就根本不受欢迎。这真是反对长期兵役的一个证据！只有在拥有各种各样器材的要塞炮兵中，在具有永远不能彼此完全分开的多种工作部门的工程部队中，有才智的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才是宝贵的，但是这样的人是很少的。骑炮兵需要有和骑兵相同的兵役期。

至于骑兵，从小就会骑马的人，只需要短期服役，而从头受训练的人，必须长期服役。在我们这里很少有人从小就会骑马，所以改组计划中规定的四年兵役期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需要的。对骑兵来说惟一真正的战斗形式是亮出马刀以密集队形进攻；这样做要有最大的勇气和他们彼此间的完全信任。因此，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可以彼此信赖，也可以信赖自己的指挥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长期服役。如果骑兵对于他所骑的马缺乏信心，那么这样的骑兵也是毫无用处的。骑兵必须善于骑马，而为了能有把握驾御马匹，也就是说几乎能驾御分配给他的任何马匹，同样也需要长期服役。对于这类部队来说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无疑是受欢迎的，他们越成为真正的雇佣兵越好，只要他们喜爱这个职业。反对派会指责我们说，这意味着建立一支由清一色的、准备参加任何政变的雇佣兵组成的骑兵队。我们回答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骑兵将始终是反动的（我们比较一下 1849 年的巴登龙骑兵⁹⁹），正如炮兵将始终是自由主义的一样。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事情不会由于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而有任何改变。况且目前在大城市的街

垒战中,首先是步兵和炮兵的态度决定着一切政变的命运。

但是除了增加自愿超期服役的士兵以外,在实行短期兵役时还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手段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加强内部的团结。例如训练营就属此类手段,陆军大臣冯·罗昂本人就把训练营称做短期兵役的一种补救手段。此外,应当合理地进行训练,在这方面普鲁士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一种偏见,认为在实行短期兵役时,为了弥补其短暂性,分列行进动作必须分毫不差地准确,必须实行“严格的”操练,可笑地把腿抬得非常高,即“膝盖不打弯地”踢向空中,——这整套偏见完全是一种夸张。在普鲁士军队中人们翻来覆去地向自己唠叨这一套,直到它最终变成毋庸置疑的公理为止。但是,士兵在操枪时用枪猛烈地撞击肩膀,使自己几乎跌倒,而且给整个队列带来一阵在其他军队中所看不到的与军队极不协调的震颤;这样做有何益处呢?归根结底,应当把对青年人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看做是短期兵役的一种补救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只是人们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点成绩来。虽然在所有的乡村学校中都配备了双杠和单杠,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用它们。在每一个专区至少应指派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并且委派他来指导体育课;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掌握排和连的行动方式,并且熟悉有关口令。在6—8年以后,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那时将会有更多的身体更强壮的新兵。

我们已经说过,以上对改组计划所作的评论仅仅以实际存在的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为依据。这里还包含一个先决条件,即在目前情况下法律规定步兵和步炮兵的服役期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兵役期。我们甚至认为,不论哪个政党执政,像普鲁士这样一个

国家,如果此刻把标准服役期再缩短一些,都会铸成大错。一边有法国军队,另一边有俄国军队,并且二者有可能同时联合进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部队,它们不必在大敌当前时才去学习最基本的军事知识。因此,我们根本不考虑建立所谓完全没有服役期的民兵部队的幻想;人们所设想的这种情况,目前对于一个拥有1 800万人口而且边境完全没有设防的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其他条件下,采取这种方式也是行不通的。

在叙述了这一切之后,也许有人要问:坚持普鲁士观点的议院同意改组计划的基本点吗?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考虑,我们认为议院会同意用已经采取的方式扩充基干,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到180 000—200 000人,把第一类后备军改为大规模的预备部队,或第二类野战军,或要塞守备部队,但条件是:严格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法律形式规定服役期为现役两年、在预备队服役三年以及36岁以下的人在后备军中服役,最后,恢复第一类后备军的基干。这些条件能够实现吗?在关注辩论的人们当中,大概只有少数人会否认,在“新纪元”¹⁰⁰,也许甚至更迟一些,这是可能的。

那么资产阶级反对派持什么态度呢?

二

普鲁士资产阶级,作为整个德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部分,这时有权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它由于缺乏勇气而勉强维持着其政治生命,甚至在这个并不以勇敢见称的阶级的历史上也找不到类似的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用同时发生的外部事件来解释。1848年3月和4月,资产阶级曾经大权在握。但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刚开始,资产阶级立刻就害怕起来,并转身躲到它在工人帮助下刚刚战胜的那个官僚制度和封建贵族的保护之下。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曼托伊费尔时期¹⁰¹。最后,“新纪元”在没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任何帮助下到来了。意外的成功冲昏了资产者的头脑。他们完全忘记了由于他们自己屡次修改宪法、在官僚制度和封建主面前俯首听命(直到恢复封建性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¹⁰²)、不断地从一个阵地退到另一个阵地而给自己造成的局势。现在他们自以为又大权在握了,而完全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使一切敌对势力得以死灰复燃;这些势力从那时起就日益强大起来,而且完全同1848年以前一样把国家的实权抓在自己手里。就在这个时候,改组军队的问题好像一枚燃烧弹,突然落在了他们中间。

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种途径来取得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自己的士兵,那它就应当或者是确保工人是自己的同盟者,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势力那里、尤其是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收买政权。英国和法

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途径是没有的。

但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同工人结成真诚联盟的兴致,而且没有任何理由。1848年,德国工人政党在它还刚刚开始发展和组织的时候,就打算在非常合理的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做一点事情,但是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规模最小的独立行动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屈从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¹⁰³。从那时候起,这种对于工人的神圣的恐惧在资产者那里变成了传统的东西,直至最后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开始了他的贮钱罐鼓动¹⁰⁴。这种鼓动是要向工人证明,他们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终生使自己甚至自己的后代遭受资产阶级的工业剥削,而且工人还应当亲自促进这样的剥削,通过各种工业协会给自己搞点额外收入,从而为资本家提供降低工资的可能性。虽然工业资产阶级和骠骑兵中尉一样,无疑是德意志民族中最无知的阶级,毕竟这样的鼓动在像德国人民这样智力发达的人民当中一开始就没有获得长久成功的任何希望。资产阶级中间比较明智的人自己想必也懂得,这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于是,同工人的联盟又一次失败了。

还是要同政府讨价还价,用现金——当然是人民口袋里的现金——购买政权。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实际权力仅仅在于对税收的批准权,而且这个权利是非常有限的。可见,应当从这里着手,而且一个如此善于讨价还价的阶级,一定能在这里占到便宜。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普鲁士资产阶级反对派尤其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古典资产阶级完全相反,竟然以为,不出钱就可以赚得政权。

如果从纯粹的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并且充分考虑到提出改组军队时的那些条件,那么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正确政策应当是什么

呢？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了解自己的力量，那么它应当知道，由于它刚刚从曼托伊费尔时代所处的屈辱地位被提升起来，而且自己确实没有作任何努力，它当然没有力量阻止那个已经开始实行的计划的实际执行。它应当知道，随着一次次会议毫无结果，实际存在的新设施越来越难以消除，因此政府为征得议会的同意而出的价钱将逐年减少。它应当知道，它还远远不能委任或撤销大臣，可见，冲突拖延得越久，它所遇到的倾向于妥协的大臣也就越少。最后，它应当知道，不把事情弄到极端，首先对它自己有利。因为，鉴于普鲁士工人的发展水平，同政府发生严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独立的工人运动，从而使它在最紧急的情况下陷入窘境；或是同工人结成联盟——但是这次的条件与1848年相比要不利得多；或是跪在政府面前说：“父亲，我犯了罪！”^①

因此，自由的进步党资产阶级¹⁰⁵应当公正客观地研究军队的改组以及与此密切相联的扩充和平时期军队编制的问题，那样它也许会获得与我们大致相同的结果。同时它不应忘记，只要计划包括这么多正确的和适用的成分，它就不能阻止革新的前期的实施，而只能延缓革新的最后确定。因此，它首先应当避免一开始就采取与改组直接敌对的立场；相反，它应当利用这次改组和为改组必须批准的款项，以使用它在“新纪元”那里为自己买到尽可能多的补偿物，用900万或1000万马克的新税为自己换得尽可能多的政权。

这里有多少事情需要去做啊！这里有曼托伊费尔关于新闻出版和结社权的全部立法；这里有原封不动地从专制君主制那里承袭下来的警察权力和官吏权力；由于裁判权之争而取消了法院；这里有省

^① 见《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5章第21节。——编者注

和专区的等级会议；这里首先有曼托伊费尔时代流行的对宪法的解释，为了与此对抗，需要确立新的宪法实践；这里有官僚制度对城市自治的损害，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东西，任何其他资产阶级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乐意用向每个居民多收半个塔勒的税为代价来换取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稍微机灵一点行事，所有这一切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有另外的想法。至于说到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曼托伊费尔的法律恰恰规定了一种限度，使得资产者在其中感到安然自得。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以温和的方式反对政府；自由的任何增加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总是比给工人带来的少，因而资产阶级宁愿使自己更多地受制于政府，也不愿使工人得到进行独立运动的自由。对于警察权力和官吏权力的限制，情况也是如此。资产阶级认为，它通过“新纪元”内阁已经使官僚制度听命于它，并且高兴地看到，这个官僚制度能不受约束地随意对待工人。它完全忘记了，官僚制度远比任何与资产阶级友好的内阁更加强大和更富有生命力。因此它以为，随着曼托伊费尔的垮台资产者的千年王国到来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来收割资产阶级专制的成熟的庄稼，并且不用花一分钱。

但是在1848年以后的这些年里，已经花费了那么多的钱，国债增加了那么多，税收提得那么高，怎么能够批准这么多的钱呢！先生们，你们是最年轻的宪制国家的议员，你们难道不知道宪制是最昂贵的统治形式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这种统治形式几乎比波拿巴制度还要昂贵吗？波拿巴制度——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¹⁰⁶——就是不断用新债抵偿旧债，因而在十年内耗尽了百年的资源。现在总是浮现在你们脑际的那个令人神往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对宪法中有关继续征收一度批准的税款的附加条款怎么

办呢？谁都知道，“新纪元”在索取钱财方面是多么羞怯。由于改组的费用以书面正式确认的反让步为代价被列入国家经常性开支，还需要作少许牺牲。问题在于批准新税用以抵偿这笔费用。在这方面“新纪元”可能有些吝啬，然而对此不能希望有比“新纪元”内阁更好的内阁。如果资产阶级仍然像早先一样继续大权在握，它也就会在其他方面夺得新的权力工具。

但是，如果反动派的主要工具——军队扩充一倍，反动派不是就会更加强大吗？在这个问题上进步党资产者陷入完全无法解决的自相矛盾中了。他们要求普鲁士扮演德国的皮埃蒙特的角色，为此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们有一个暗中抱有同样观点的“新纪元”内阁，这是在目前条件下他们所能有的最好的内阁。他们不准这个内阁扩充军队。每天，从早到晚，他们把普鲁士的荣誉、普鲁士的伟大、普鲁士实力的增长挂在嘴边；但是他们不准普鲁士扩充军队，虽然这种扩充在程度上只是同1814年后其他强国对本国军队的扩充完全相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们害怕这种扩充会议仅仅有利于反动派，会使没落的军官贵族复兴，会使封建的、专制的官僚政党有力量通过政变埋葬整个宪制。

应当承认，进步党资产者不希望加强反动派的力量是正当的，而军队是反动派最可靠的支柱。但是要想使军队受议会的控制，可曾有过比这次改组更有利的机会？况且这次改组是由一个普鲁士在安定时期所见到过的与资产阶级最友好的内阁提出来的。一旦表示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扩充军队，不是恰恰能够使军事学校、贵族特权和所有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并且在增强军官集团的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获得保证吗？对于“新纪元”来说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必须加强军队。它为了偷偷地实行改组而采取的那些迂回手段，再好不

过地暴露出它心中有愧和对议员们心怀恐惧。资产阶级应当用双手抓住这一点；这是资产阶级再等一百年也等不来的好机会。如果进步党资产者不是以吝啬鬼的眼光而是以大投机商的眼光来审时度势，那么有什么东西不能从这个内阁那里零星地赚出来！

现在就来谈谈改组对军官集团本身造成的实际结果。应当为增加一倍的步兵营找到军官。军事学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以前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现在表现出来了；尉官的职位干脆被当做奖品奖给大学生、见习法官和所有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凡是在改组后再看到普鲁士军队的人，都认不出它的军官集团了。我们这样讲并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眼所见。特定的军官行话已经被排斥，年轻军官都说自己天然的母语；他们决不是一个闭塞的集团，而是比181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代表着一切有教养的阶级和全国各个省区。因此，这个阵地已经由于事件的必然进程而被夺得；现在问题仅仅在于保持住这个阵地，并且加以利用。进步党资产者不这样做，反而忽视这一切，并且继续说什么所有这些军官都是贵族出身的军校学生。但是从1815年以来，在普鲁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军官来自资产阶级。

顺便说一下，我们认为普鲁士军官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⁸⁸中灵活作战主要是由于注入了这样的新鲜血液。光是旧等级制中的下级军官是不敢这样经常地自冒风险采取行动的。在这方面政府的看法是正确的，它认为对这些“辉煌”成就起重大作用的是军队改组；除此以外，改组还在哪些方面使丹麦人感到恐惧，我们不得而知。

最后还有一个主要问题：和平时期扩充军队会为政变提供便利条件吗？军队是搞政变的工具，因此军队的任何加强都会增大政变

的可能性,这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不取决于搞政变的可能性大些还是小些,而取决于其他大国的军队的规模。谁走了第一步,也就必须走第二步。谁接受了普鲁士议员的委任状并树起为普鲁士的伟大及其在欧洲的强国地位而斗争的旗帜,谁就必须同意创建这个工具,否则就谈不上普鲁士的伟大及其强国地位。如果说为了不给政变提供便利条件而不去创建这个工具,那么对于进步党先生们来说情形也就更加不妙。如果在1848年他们的行为不是那样胆小得可笑和那样笨拙,政变时期很可能早过去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仍得承认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加强军队的必要性,而不管自己对政变如何提心吊胆,除此以外他们毫无其他办法。

然而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第一,和“新纪元”内阁商谈批准这个政变工具的问题,总比和俾斯麦内阁商谈好。第二,不言而喻,为普遍义务兵役制的真正实行所不断采取的每个步骤,都使得普鲁士军队越来越不适于做政变的工具。一旦全体人民群众都渴求自治,并且理解同所有反对自治的分子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那么20岁到21岁的青年必然也就会卷入这个运动;即使在封建军官和专制军官的指挥下,要借助他们来实行政变也将越来越困难。国内的政治教养越发展,应征新兵的情绪就越不可靠。甚至目前在政府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斗争想必也已经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

第三,实行两年制兵役足以抵消扩充军队的作用。扩充军队使政府手中用来实行暴力政变的物质手段增加,实行两年制兵役则在同样的程度上使暴力政变的精神手段减少。在服役的第三年,由于整天一味灌输专制制度的条令和惯于俯首听命,在当时,而且在服役期间,在士兵身上可能起某些作用。在服役的第三年,个别士兵在军

事方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我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服役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于按照法奥制长期服役的士兵。他们具有了职业兵的某些素质,而且作为这样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远比年轻士兵更容易被利用。如果从政变发生的可能性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从军队中解除第三年服役的士兵完全肯定能够与征集6万—8万人相抵。

可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决定性问题。我们不想否认,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局势,——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资产阶级,——在这种局势下甚至不用动员,单靠和平时期的常备军,政变仍然可能发生。但是也未必能够发生。为了实行大政变,几乎总是需要进行动员。然而这时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在国内被政府利用的纯粹工具;战争时期的普鲁士军队决不会这样。凡是曾经有机会首先在和平环境而后在战争环境看到同一个步兵营的人,都知道在人们的整个行动上以及在整个集体的性格上前后有着巨大的差别。人们参加军队时几乎还是孩子,现在又回到军队时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已经养成了自尊、自信、坚毅和对于整个步兵营是有益的性格。士兵对军官的态度和军官对士兵的态度立刻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步兵营在军事方面大有长进,但是在政治方面——对于专制制度的目的来说——它却变得完全不可靠了。这种情况在军队进驻石勒苏益格时就可以看到,在那里使英国报纸记者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普鲁士士兵到处公开参加政治游行,并且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远非正统的观点。我们把这个结果——对于专制制度的目的来说,这是动员起来的军队在政治上的堕落——主要归功于曼托伊费尔时代和“最新的”纪元。在1848年,情况还全然不是这种样子。

无论在改组以前还是在改组以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优点之一恰好就在于,在这样的军事制度之下普鲁士既不能进行不受欢迎的战争,也不能进行可能持久的政变。因为,如果连和平时期的军队也允许自己被利用来进行小政变,那么第一次动员和第一个战争威胁就足以重新使全部“成果”发生问题。如果没有战争时期军队的批准,和平时期军队在对付“内部杜佩尔”⁹⁸时建立的英勇业绩只能具有暂时的意义,而这样的批准将越来越难以获得。反动派的报纸宣称“军队”与议会相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显然他们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军官。如果有一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即《十字报》的先生们为了进行政变而需要动员起来的军队,那么他们会相信,他们将不得不对这个人民代表大失所望。

但是,归根到底,防止政变的主要保障并不在这里。这种保障在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通过政变来拼凑一个会批准它征收新税和借款的议院,即使它组成了一个愿意这样做的议院,在欧洲也没有一个银行家会根据议院的这种决议向它提供贷款。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是,自1815年许下诺言以来,以及自1848年以前曾为得到钱而徒劳无益地采取多种花招以来,普鲁士已经享有这样的声誉,即没有议院的合法的和不容置疑的决定,人们连一芬尼也不会贷给它。就拿拉斐尔·冯·埃尔兰格先生来说,他甚至贷款给美国南部同盟派⁵,但他未必肯把现金贷给由政变产生出来的普鲁士政府。普鲁士应当把这一点完全归功于专制制度的狭隘性。

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政府需要钱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迟早必然发生,政府就不得不亲自去找资产阶级要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已不是去找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机构(这个机构最终会知道自

己正是为付款而存在的),而是去找大金融家,他们愿意同政府做笔好生意,他们用衡量任何一个私人的偿付能力的尺度来衡量一个政府的偿付能力,至于普鲁士政府需要的士兵是多还是少,他们则毫不关心。这些先生们只办理有三方面签字的票据贴现,如果在票据上签字的除了政府以外只有贵族院,没有众议院,或者是由代理人组成的众议院,那么他们就会把这样的票据当作是一张空头支票而谢绝成交。

在这里军事问题要结束了,而宪法问题要开始了。现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已处于这样的窘境:它或者必须在军事问题上坚持斗争,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残余的那一点政权;至于它由于什么错误和纠葛而陷入这样的窘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政府已经对于它批准预算案的全部权利表示怀疑。如果说政府迟早必定要和议院媾和,那么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干脆耐心等待不是最好的政策吗?

既然冲突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这绝对是最好的政策。能否在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现存政府达成协议,还很成问题。资产阶级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才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它必须在这个军事问题上检验一下,它在国家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它取得胜利,那么它将同时获得任免大臣的权力,即获得英国下院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如果它遭到失败,那么它将永远不能再经过宪法途径起任何作用了。

但是只有那些很不了解我们的德国资产者的人,才认为能指望他们有这样的耐性。资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中的勇气总是同它在那个国家的市民社会中所占的分量完全一致的。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比在英国,甚至比在法国都小得多;在德国,资产阶级既没有像在英国那样同旧的贵族结成联盟,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借助农民

和工人把旧贵族消灭掉。德国的封建贵族仍然是与资产阶级相敌对的力量,而且是和政府结盟的力量。在德国,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全部社会权力基础的工厂工业,尽管从1848年以来已有巨大进步,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还是很发达。大量资本集中在个别人手中的现象,在英国,甚至在法国都是屡见不鲜的,而在德国却很少见到。因此,我们的整个资产阶级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它的生活环境和它所能养成的眼界都很狭小;难怪它的全部思想方式也是同样狭隘!在这种情况下为事业奋斗到底的勇气从何而来呢?普鲁士资产阶级很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工业活动范围内它是怎样依赖于政府的。特许制度¹⁰⁷和行政监督像梦魇一样困扰着它。每当它开办一个新企业,政府都可以加以阻挠。在政治领域内尤其如此!当在军事问题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的议院只能表示反对,完全处于守势;而政府却采取攻势,它按自己的方式解释宪法,处置自由派官员,宣布自由派的城市选举无效,动用官僚权力的一切手段,以便使资产者懂得自己所处的臣仆地位,政府实际上在一个接一个地占领阵地,从而获得了甚至在曼托伊费尔时期都不曾有过的地位。同时,预算以外的财政开支和征税工作平稳地照常进行,而军队的改组随着自己一年一年的实施越来越加大了力度。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有望取得的最后胜利一年一年地获得更加革命的性质,而政府在各个方面日益增加的局部胜利越来越成为既成事实。此外,还出现了完全不依赖于资产阶级,也完全不依赖于政府的工人运动,它迫使资产阶级或者向工人作出十分不情愿的让步,或者准备在决定性时刻不得不在没有工人帮助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资产阶级果真有勇气耐心等待到底吗?从1848年以来它本来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就它自己的意思来说,但是从议会召开这次会议时起就在

进步党中日益表现出来的急于妥协的心情,并没有说明这一点。我们担心,资产阶级这一次仍然会毫不犹豫地自己出卖自己。

三

“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和由此而引起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了充分开展自己的政治活动，工人阶级需要比目前四分五裂的德国的各邦所提供的舞台更加广阔得多的舞台。国家的分裂状态对无产阶级来说将是运动的障碍，但在无产阶级心目中永远不会是合理的存在，并且永远不是无产阶级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德国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去理睬帝国宪法¹⁰⁸、普鲁士领导地位¹⁰⁹、三位一体¹¹⁰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除非是为了把这一切清除掉；普鲁士国家需要多少士兵才能勉强维持其大国地位，这个问题在德国无产阶级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军事负担是否由于改组而加重了一些，这对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并不要紧。可是，普遍义务兵役制实行得是否彻底，对工人阶级来说便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了。学会使用武器的工人越多越好。普遍义务兵役制是对普选权的必要的和自然的补充；它使选民有可能用手中的武器来实现自己反对任何政变企图的决定。

越来越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惟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東西。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政党在政府和议院之间由此而产生的冲突当中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是伟大工业革命的产物，正是这个革命近

百年来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彻底变革了整个生产方式,起初是工业的生产方式,后来是农业的生产方式;这个革命的结果是,参与生产的只有两个阶级: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既没有劳动工具、原料,也没有生活资料,而必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向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的工人阶级。因此,现代无产者仅仅同一个与他敌对、剥削他的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直接发生关系。在彻底实现了这种工业革命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工人实际上只同资本家发生关系,因为农村的大土地租佃者也不外是资本家;贵族仅仅靠自己地产上的地租过日子,它同工人没有任何社会接触点。

在刚刚开始进行这种工业革命的国家中,例如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在德国还保留有早期的封建关系和后期的封建关系中的许多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说损害了社会媒介物(中介),使德国社会制度失去了英国发展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单纯的、明确的、典型的性质。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环境里,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我们看到一批最不可思议的活生生的古老化石: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杖笞、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裁判权之争、行政处分权等等。而且我们看到,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活化石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财产而成为新时代最强大阶级的资产阶级,则以新时代的名义要求它们交出政权。

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城关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变得富有的工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较少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主要从事零售商业。旧的城关市民阶级是社会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

级却是社会上最不固定的阶级；破产在小资产阶级那里成为一种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而接近于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其生活的不稳定性又接近于无产阶级。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生活一样充满矛盾；而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把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自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向前推进，帮助资产阶级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自由；尽管这一切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在旧的古老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论何处，迟早都会有斗争双方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开始进行行动的时候。正在衰亡的社会的封建和官僚代表号召工人同他们一起向吸血鬼即工人的惟一敌人资本家进攻；而资产者向工人指出，他们共同代表着新的社会时代，因此面对正在衰亡的旧社会形态，他们的利益无论如何是一致的。这时工人阶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有着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由此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相继产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政党应当对斗争的双方采取什么态度？

这首先取决于工人政党，即工人阶级中已经意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的那部分人，为了阶级的利益而力求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据了解，德国最先进的工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得解放，其途径就是把国家资本转交给联合起来的工人，以便在没有资本家的条件下共同地进行生产；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直接的普选权夺取政权。¹¹¹

有一点已经很明显：不论是通常被直接称为反动派的封建官僚

政党,还是自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想自愿地向这些要求让步。但是要知道,无产阶级从组织起独立的工人政党时起,就成为一种力量,而对于力量是不能不考虑的。两个敌对的政党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在一定的时候它们将愿意向工人作一些虚假的或真正的让步。工人能从哪一方获得最大的让步呢?

对反动政党来说,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存在已经是眼中钉。它的力量取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再次停顿或者至少减缓速度。否则一切有产阶级都会逐渐变成资本家,一切被压迫阶级都会逐渐变成无产者,而反动政党随之自行消失。如果反动派是彻底的,那它当然打算取消无产阶级,但是其途径不是让无产阶级走向联合,而是把现代无产者重新变为行会帮工和农奴式或半农奴式的佃农。这样的变化对我们的无产者有好处吗?如果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么他们愿意重新接受行会师傅和“仁慈的老爷”的父亲般的监护吗?当然不愿意。正因为工人阶级脱离了原先一切虚假的财产和虚假的特权,正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形成了公开的对抗,才使得统一的、人数众多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工人阶级的存在,以及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成为可能。再说这种历史倒退是完全不可能的。蒸汽机、机械化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蒸汽犁和脱粒机、铁路和电报、现代的蒸汽印刷机都不容许出现这种荒唐的倒退;相反,它们正在逐渐地和无情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并且把以前遗留下来的一切小的社会矛盾溶解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之中。

资产阶级恰恰相反,它只是把上面提到的现代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交换手段加以全面地发展并提到最高的水平;通过自己的信贷组织把那些世代代留传下来的生产资料,尤其是地产攫为己有;使用现代化手段发展一切生产部门;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

残余,从而把整个社会归结为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单纯的对抗;除此之外,它根本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任务。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这种简化,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增长起来,但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阶级觉悟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增长起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这种增长,无产阶级才逐渐成为国家中的多数、压倒的多数,英国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形;但是德国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在那里,农村中各种各样的农民,城市中的小业主、小商人等等,与无产阶级相比还占优势。

因此,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胜利的日子。相反,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从某一方面来说同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工人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使工人战胜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

现在来看看 1848 年德国工人政党的状况和目前的状况。在德国还有不少老战士,在 1848 年以前,当德国工人政党刚开始筹建时,他们就参加了这一工作,革命后,趁当时条件许可的时候,他们又帮助把它建立起来。他们都知道,就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为了发动工人运动,促进这一运动的发展,清除反动的行会分子,人们花费了多大力气,而几年以后,这一切又都渐渐沉寂下来。如果现在可以说工人运动自行产生了,那么这是由于什么产生的呢?这是由于从 1848 年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于它消灭了绝大多数的小业主和其他处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使工人群众和资本家直接对立起来,简单地说,是由于它在以前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人数极少的地方造成了一个可观的无产阶级。由于工业的这种发展,也就必然产生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

这并不是说,就不会有反动派觉得向工人让步对自己有利那一

天。但是这种让步永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这种让步永远不具有政治性质。封建官僚的反动派既不会扩大选举权,也不会给予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也不会限制官僚制度的权力。反动派所作的让步,目的总是在于直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这种让步丝毫不会扩大工人的政治权力。例如在英国曾违反厂主的愿望对工厂工人实施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⁸。那么在普鲁士可以要求政府严格遵守关于工厂工作时间的规定(现在这只不过是写在纸上),更进一步,还可以要求给予工人结社权¹¹²等等,而且这也许是能争取到的。然而,不管反动派方面作出什么让步,有一点是不变的:取得这些让步不需要工人方面作出任何回报;这是公平的,因为反动派已经使资产阶级感到不自在了,这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人也就不应当去感谢反动派,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感谢反动派。

现在还有一种反动派,它近来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并且在某些人当中非常时兴;这就是那种现在被人们称做波拿巴主义的反动派。波拿巴主义在有的国家里是必然的政体。在这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农村却被小农在人数上所压倒,它在一次伟大的革命战斗中被资本家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军队打败了。在法国,当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的大搏斗⁷⁵中遭到失败的时候,资产阶级由于这次胜利也弄得精疲力竭。它意识到,它不能再经受一次这样的胜利。名义上它还在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它统治起来太吃力了。军队——真正的胜利者——上升到了第一位,它所依靠的是主要为它补充兵员的那个阶级,即希望不受城市暴动者骚扰的小农。这种统治的形式当然是军事独裁,它的天然的领袖是它的天生的继承者路易·波拿巴。

波拿巴主义对工人和资本家的态度的特点是:它阻止他们互相

厮打。这就是说它保护资产阶级不受工人的暴力进攻，鼓励两个阶级之间小规模和平冲突，此外则不准它们有任何一点政治权力。没有结社权，没有集会权，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普选权是处在官僚制度压迫下，以致反对派的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警察专权，这种专权甚至在警察国家——法国也从来没有见到过。除此以外，还直接收买资产阶级当中和工人当中的一部分人，收买前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大量的信用欺诈，小资本家的钱由于这样的欺诈而跑进大资本家的口袋；收买后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是兴办大量的公共工程，这样的工程在大城市里除去集结了天然的、独立的无产阶级以外，还集结了人为的、拥护帝国的、从属于政府的无产阶级。最后，就是通过虚假的英勇战争使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可是这种得到欧洲最高当局许可的战争总是为了反对当时共同的替罪羊，并且只是在胜利预先得到保证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不论工人还是资产阶级所能得到的最多不过是：它们在斗争后得到喘息机会，工业——在其他有利条件下——迅猛发展，从而为新的更激烈的斗争创造条件，一旦不再需要这种喘息，斗争就会爆发。如果指望工人从政府那里能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就最愚蠢不过了。因为这个政府正是为了制止工人反对资产阶级而存在的。

现在来谈谈需要我们专门分析的情况。普鲁士反动派能给工人政党提供什么呢？

这个反动派会不会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呢？绝对不会。第一，在近代历史上，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还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这样做过。第二，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问题恰好在于，政府是应当把全部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呢，还是说它应当同议会分享权力。政

府不会真的采用一切手段，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仅仅为了以后把这种权力赠送给无产阶级！

即使没有议会代议机关，封建贵族和官僚也能保持它们在普鲁士的实权。它们在宫廷、在军队、在官吏中间的传统地位使它们的这种权力得到保障。它们甚至无须要求有独家的代议机关，因为在曼托伊费尔时期存在过的贵族和官吏的议会，目前在普鲁士要想长期存在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也想让整个议会制度滚蛋。

相反，资产阶级和工人只有通过议会代议机关才能真正正规地行使政治权力，而这个议会代议机关只有在得到发言权和表决权时才有一点价值，换句话说，只有在它能掌握“钱柜的钥匙”时，它才有一点价值。但是正如俾斯麦公开承认的，他所要阻挠的也正是这一点。我们要问：剥夺这样一个议会的一切权力，也就是说剥夺工人自己打算通过争得直接的普选权而参加进去、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其中成为多数的那个议会的一切权力，对工人是有利的吗？动员一切宣传力量以加入这样一个归根到底会是毫无用处的机构，对工人是有利的吗？当然，不是！

可是，假定政府现在废除了现存的选举法并且强制实行直接的普选权呢？好吧，假定这样！假定政府玩弄这种波拿巴主义的把戏，而工人赞同这样的做法，那么他们就是事先承认政府有权力通过新的强制手段再次废除直接的普选权，只要它愿意这样做。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直接的普选权还有什么价值呢？

假定政府强制实行了直接的普选权，那么它事先定会用一些保留条件来限制它，使它不再成其为直接的普选权。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么只要到法国去看一看就可以确信，在存在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到

严格管制的报刊、完全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进行的选举只能是非常温顺的选举。究竟有多少工人代表通过直接的普选权进入法国议会?要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由此我们就要谈到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靠农业为生,三分之一的人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毫无怨言的人^①能够牢记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他们同资本家一样,完全是德国工人的直接敌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农村短工或农村雇工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再者,神父、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在这方面也起了阻碍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最困难的,而且是最迟的;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个特权阶级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它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治势力——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几乎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外。在封建

^① 暗指拉萨尔的信徒。——编者注

贵族仍然是实在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村短工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因为这二者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分不开的——的斗争就等于是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也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就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非常坦率而必要的论述会鼓励封建主出面支持直接的普选权。那就再好不过了。

或者，也许政府限制（如果一般地说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什么要限制的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闻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仅仅是为了把自由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作为礼物赠给工人吧？的确，工人运动不是在安安稳稳地、毫无阻碍地走自己的路吗？

这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可以容忍的，它只是在政府还中意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造就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种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宣传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规定和措施，随时都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宣传鼓动；一旦这种宣传鼓动有危险，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最重要的是，工人要看清楚这个问题，不要像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那样沉迷在错觉里，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可以容忍的，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以为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新闻出

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普鲁士现存政府并没有愚蠢到自己切断自己的脖子的地步。如果反动派真的把某些虚假的政治让步作为诱饵扔给德国无产阶级，那么但愿德国无产阶级会用古老的《希尔德布兰德之歌》¹¹³中的豪迈词句来回答它：

Mit gērū scal man geba infāhan, ort widar orte.

“我们将手持长矛去接受你的礼物，矛头对矛头。”

至于说反动派可能向工人作出的那些社会性让步——缩短工厂的工作时间、更好地执行工厂法、承认联合权等等——那么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反动派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需要工人给它任何东西作为酬劳。反动派需要工人，而工人并不需要反动派。因此，当工人在自己独立进行的宣传鼓动中坚持这些要求时，他们可以指望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反动分子将提出同样的要求，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恼火；工人则以此获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一点也用不着感谢反动派。

但是，如果说工人政党除了那些用不着乞求总归能得到的微小让步以外，从反动派那里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那么它从资产阶级反对派那里能够期待些什么呢？

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新时代的两个产儿，它们在各自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虽然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彼此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破烂东西抛出船外，“船才能做好战斗准备”，只不过这一次战斗不是在两只船之间展开，而

是在同一条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展开。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就不能通过宪法和法律体现出这种政治统治。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来反对按出身划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写上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来反对行会制度，写上自由和自治来反对官僚监督。资产阶级应当干脆要求直接的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要求废除针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非常法。然而这一切也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是资产阶级，但是完全可以要求资产阶级彻底贯彻自己的原则。这样无产阶级也就能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全部武器。它借助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权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再加上上面所说的宣传鼓动手段，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自己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对工人是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有这种优秀的本能。他们在德国各邦到处都完全正确地投票支持那些有希望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还有两条道路可走！

一条道路是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推动它向前进，尽可能地迫使它扩大选举权，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行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1832年改革法案¹¹⁴以来的英国工人、1830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

正是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具有纯资产阶级的性质——比通过其他途径更有成效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这种情况终究会发生，因为资产阶级在缺乏政治勇气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退出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由命。1848—1850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这种情况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工人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有收到效果、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处于正常的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样做等于是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就是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并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抵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能丢开资产者，继续进行资产者背弃了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权和结社权的宣传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行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工人政党争取自己本身生存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空气的斗争。

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人政党决不会只是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是将以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它将一有机会就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组织相对抗，并将针锋相对地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以这样的方式保证自己有一个令人起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下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

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秋分时节热带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做好行动准备。

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工人政党在普鲁士宪制冲突中的政策。

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

尽可能地推动进步党真正地进步;迫使它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纲领并遵循这个纲领;无情地抨击和嘲笑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骤和每个弱点;

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让它自行发展好了,同时要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

但是对反动派的虚伪的引诱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持长矛去接受你的礼物,矛头对矛头。”^①

^① 见本卷第 112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¹¹⁵

下列署名者曾经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同意作为撰稿人公布他们的名字,但是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从来没有无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抨击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继续为它撰稿。下列署名者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骗人把戏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在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隆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206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已经有过详尽的论述。^①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和曼彻斯特

^① 见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2 月
18 日和 22—23 日

载于 1865 年 2 月 28 日《埃尔伯
费尔德日报》第 59 号第 2 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
德国工人政党》简介¹¹⁶

最近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将出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的小册子(定价6银格罗申),书名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同最新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①相反,这本小册子再度捍卫了1846—1851年无产阶级著作界代表们所坚持的观点,并就目前正在讨论的军事问题和预算问题发挥了这个观点,既反对了反动派,也反对了进步党资产阶级。

弗·恩格斯写于1865年2月
27日

载于1865年3月3日《柏林改
革报》第5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① 1865年2月27日恩格斯在寄给卡·济贝耳的这篇简介中对这个策略作了说明:“此外,最新的‘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亲俾斯麦方针使《新莱茵报》的人员不可能参与这个‘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的工作。”在《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刊登的那篇简介中有上面这句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¹⁷

1865 年

2月21日(星期二)。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勒吕贝,即将动身。

2月22日,星期三(晚)。勒吕贝动身。

巴黎,2月23日。邀请勒福尔在弗里布尔处会面,等等。(见弗里布尔的信)。席利信中勒福尔的答复(第2页)。

2月24日晚。弗里布尔处的会面,等等。

2月24日晨。勒福尔偕同勒吕贝访问席利。席利把勒福尔留在附近,便到弗里布尔处去了。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各种朋友,其中还有勒福尔的一个朋友^①。大家都坚决反对勒福尔插足。于是席利就去找到勒福尔,毫不隐讳地向他说明:认为他所提出的那种要求是站不住脚的(第2页)。这时勒福尔尚被蒙在鼓里(同上)。对勒福尔做了一些让步(第2、3页)。

2月24日晚。会议。勒吕贝缺席;到勒福尔那里参加晚会去了(第3、4页)。

① 可能是指让·雅克·勃朗。——编者注

关于 2 月 24 日会议的记述(第 4、5、6 页)。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4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
—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关于巴黎支部冲突的
决议最初方案¹¹⁸

我向小委员会¹¹⁹提出如下决议案：^①

(1) 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对由公民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赞组成的现在的巴黎支部理事会的职责予以确认，并对他们的热情和活动表示感谢。

(2) 吸收公民皮埃尔·万萨德参加巴黎支部理事会应该认为是适宜的。¹²⁰

(3) 伦敦的中央委员会感谢公民勒福尔在建立国际协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衷心地希望他作为顾问同巴黎支部理事会合作，但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无权强使巴黎支部理事会接受公民勒福尔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4) 委派公民维克多·席利为伦敦中央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作为这样的代表，他只同巴黎支部理事会协同工作。他将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也是巴黎支部本身认为在当前政治形势下中央委员会

① 这句话在手稿上是用德文写的。——编者注

必须具备的一项职能。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4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60 年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中央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 冲突的决议¹²¹

第一项决议。鉴于公民托伦屡次提出辞职,每次均被中央委员会所拒绝,中央委员会现决定请公民托伦和巴黎理事会再次考虑,他在当前形势下辞职是否适宜。中央委员会事先批准理事会将在这一问题上通过的任何决议。¹²²

第二项决议。考虑到 32 位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于 2 月 24 日在巴黎开会表达的愿望,并遵守民主和自决的原则,中央委员会撤销关于委派一位负责在法国报刊上捍卫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辩护人的决议。同时中央委员会借此机会向公民勒福尔表示深切的敬意,因为他不但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之一,而且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品格更是为人所称道。¹²³其次,中央委员会坚决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在我们协会里担任职务的原则¹²⁴。

第三项决议。中央委员会决定对现在的理事会予以确认,包括增补公民万萨德。

第四项决议。中央委员会恳切地敦促巴黎理事会同公民勒福尔和贝律兹达成谅解,使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派工人在理事会中

有三名代表。但是中央委员会在表示此愿望的同时却无权并且也无意发号施令。

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接受中央委员会直接派遣的代表,中央委员会据此委派公民席利担任委员会驻巴黎理事会代表的职务。

给席利个人的指示

“如不能达成妥协,则中央委员会宣布,勒福尔那一派在得到会员卡以后,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①)组成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

应当把这一点作为警告向弗里布尔及其一伙提出——但要采取秘密透露的方式——以便促使他们在勒福尔和贝律兹(人民银行¹²⁵的经理)真心敦促自己那一派成为协会会员的条件下作出必要的让步。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7 日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0 年历史考证版第 3 部分第 3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18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简介¹²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

这本极为重要的小册子分为三章。

在第一章中作者从军事科学观点批评了普鲁士军队的改组。他认为主要错误在于这个改组计划“表面上是要回到原来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这种制度没有作为强大的军队预备队的**后备军**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却倒向了**法奥基干制**”^①。

在第二章中作者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对军事问题的态度。作者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① 见本卷第84页。——编者注

“现在资产阶级反对派已处于这样的窘境：它或者必须在军事问题上坚持斗争，或者失去它尚享有的残余的那一点政权；至于它由于什么错误和纠葛而陷入这样的窘境，那是无关紧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果真有勇气耐心等待到底吗？从1848年以来它本来应当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从议会召开这次会议时起就在进步党中日益表现出来的急于妥协的心情，并没有说明这一点。”^①

在第三章中作者研究了“工人政党对这次军队改组”的态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宪制冲突”的问题。他的回答归纳如下：

“越来越彻底地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是普鲁士军队改组中惟一使德国工人阶级感兴趣的東西。”^②

工人阶级在宪制冲突中应当采取的政策是，“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尽可能地推动进步党真正地进步……但是对反动派的虚伪的引诱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持长矛去接受你的礼物，矛头对矛头’”^③。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
7日—14日之间

载于1865年3月18日《海耳曼
报》第32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99—101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02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简介¹²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
德国工人政党》(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

我们尽力向读者推荐这本小册子。它极其敏锐地、公正地和内行地阐述了当前德国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普鲁士军队原先的组织结构,军队改组的目的,普鲁士宪制冲突⁸⁴的产生,进步党对反对派的领导,与此同时发生的进步党¹⁰⁵和工人政党之间的纠纷——所有这一切都在这本小册子中得到了扼要的、同时又是独到的、极其充分的阐述。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14 日—16 日之间

载于 1865 年 3 月 17 日《伦敦通
讯》第 1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关于不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
撰稿的声明¹²⁸

冯·施韦泽先生在发表吕斯托夫先生和海尔维格先生关于不再作撰稿人的声明(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1号)时写了一篇后记,他在后记中附了一篇从伦敦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文章,想以此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的行为前后不一和心理不稳定”¹²⁹。他企图捏造事实。因此请看以下事实。

1864年11月11日冯·施韦泽先生书面通知我关于创办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事宜,并顺便说道:

“我们已经请求大约6—8个经过考验的党员或者至少是靠近党的人士为我们撰稿,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会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请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着重号是冯·施韦泽先生自己加的)和它的第一位先锋斗士给我们撰稿,才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您能在严酷的斗争中给一个遭受巨大损失¹³⁰的联合会以支持,您自己也曾经为这个联合会的建立出过力,即便是间接的。”

这封邀请信附有一份“照原稿印行”的纲领。这个纲领并没有像冯·施韦泽先生现在追随《新法兰克福报》所谎称的那样“以拉萨尔的口号为基础”,或者“在旗帜上写着拉萨尔的名字”,在这个纲领里

既没有拉萨尔的口号，也没有拉萨尔的名字。纲领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我和恩格斯显然是根据这个纲领才答应撰稿的^①。

1864年11月19日冯·施韦泽先生给我来信说：

“您对公布这个纲领有什么意见，请尽快提出来。”

我没有提任何意见。

接着冯·施韦泽先生问我：

“我们（编辑部）希望您经常来稿，此外，您是否允许我们就此通知我们的读者？”

我和恩格斯希望事先了解我们将要在哪些人当中公开露面^②。冯·施韦泽先生于是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并补充说：

“如果您对这些先生中的某个人有反感，那么请您考虑一下，一家报纸的撰稿人不会是绝对清一色的，但愿这样就不再有什么问题了。”

11月28日冯·施韦泽先生写道：

“您和恩格斯同意撰稿的消息传到党内，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惊喜。”

在最初试刊的两号报纸中就已经包含着某些令人怀疑的东西。我提出了抗议。此外我还对下面的事情表示了愤慨：从我得到拉萨尔死讯后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录一些安慰

① 见1864年11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和11月16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② 见1864年11月16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和11月18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的话，署上我的名字发表，并且无耻地加以滥用，当作奴颜婢膝地吹捧拉萨尔的“开场白和结束语”¹³¹。12月30日冯·施韦泽先生答复我说：

“尊敬的先生：请您对我们有耐心，事情会逐渐好转，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好事要等待，因此我希望您平静下来，观察一个时期。”

这时已经是1864年12月30日，当时我手里只有最初几号试刊的报纸！

1865年1月初，在前几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中的一号被没收后，我就这一事件向冯·施韦泽先生表示祝贺，并且说，他应当公开同内阁决裂。

蒲鲁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约我写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很快把文章寄了出去，不过利用这个机会，我现在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说明，“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都违背“简单的道德感”，而蒲鲁东在政变以后向路·波拿巴的献媚是“卑鄙”^①。在同一个时候恩格斯把一首古代丹麦农民歌曲^②的译文寄给他，想通过一段注解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读者切实知道同土容克阶级作斗争的必要性。

可是，还是在1月份里我不得不再次对冯·施韦泽的“策略”提出抗议¹³²。2月4日他答复我说：

“至于谈到我们的策略，请您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处境。我们一定要设法首先壮大自己，云云。”

① 见本卷第62—6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4—66页。——编者注

1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巴黎通讯中的暗示,促使恩格斯和我发表了一篇声明,在声明中我们谈到,我们为我们的观点得到证实而感到高兴:“巴黎的无产阶级依然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即土伊勒里宫⁸²式的和罗亚尔宫⁸¹式的波拿巴主义;他们从来没有打算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他们作为革命承担者的历史的长子继承权。”声明最后说:“我们把这个榜样介绍给德国工人。”^①

这时巴黎通讯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上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报道,这就使我们的声明失去了直接的理由。因此我们对于冯·施韦泽先生拒绝刊登这篇声明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但是同时我写信告诉他:“我们关于工人对普鲁士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意见,将在其他地方详细说明。”我终于作了最后一次尝试,用实际的例子,即社团问题向他说明,他的“策略”即令是出自纯正的动机,也依然有很大缺陷。^②他在2月15日回答我说:

“如果您打算像在前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理论(!)问题,那么我会感激地接受您的教诲。然而,谈到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问题,则请您注意,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您随便从一个地方并随便采取一种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是不公正的。您只有确切了解情况后才可以这样做。另外,请您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的传统的约束。事物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复杂性。”

我和恩格斯以中止为该报撰稿的公开声明^③答复了施韦泽的这个最后通牒。

① 见本卷第67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1865年2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

1865年3月15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

15日

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
革报》第67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写给海尔曼·荣克的有关
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¹³³

小委员会 3 月 4 日会议。他^①已经准备要提出自己的决议案，根据这项决议案，巴黎理事会应由以下人员组成：弗里布尔、万萨德、利穆赞、勒福尔指定的三名代表、类似仲裁人的席利。

小委员会会议。3 月 6 日。他再次提出这项决议案。

中央委员会会议。3 月 7 日。未经分组表决他就允许了对席利的委派，用议会的话说，就是他认可了这项委派。

在此之后，甚至决议还未到手，他就急速给巴黎去信。他料想，正如他所说的(3 月 14 日)，巴黎理事会将会反对席利。因为根据第五项决议[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接受中央委员会直接派遣的代表，中央委员会据此委派公民席利担任委员会驻巴黎理事会的代表的职务]，席利只被委派为驻该理事会的代表^②，对他的委派只有他们才可以提出异议。

① 勒福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24 页。——编者注

勒吕贝对他们的期望落空后便同分会里自己的一伙兄弟们密谋,把委派席利说成是他们辞职的原因。¹³⁴

他把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以勒福尔的名义反对巴黎理事会,又以代表法国支部等的巴黎理事会的名义反对席利。

福克斯先生解释说(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勒吕贝之所以在3月4日和6日的会议上忘记席利的国籍,而在3月14日又记得清清楚楚,完全是因为他认为对勒福尔先生不尊重,他要报复。勒吕贝接受了**这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他的卑鄙诽谤是:

第一,第五项决议的引言是为了争取票数而以骗人的借口加进去的。这个引言依据的事实是由勒吕贝转来并于2月28日当着托伦等宣读过的**席利先生的公开信**,其次是**席利先生给小委员会的报告**,最后是**巴黎2月24日会议通过的决议**。加进这个引言只是为了使人甚至看不出中央委员会有一点点独裁的样子。

第二,3月7日个人争吵耗费了许多时间,然后匆忙地通过最后三项决议,使大家措手不及。

第三,席利先生不是工人。这一点在原则上已为第二项决议所否定。席利应当只是**秘密地**同巴黎理事会一起活动;勒福尔则应代表协会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活动。两者情况不同。

关于勒福尔。

他要求我们委派他为在法国的报刊方面的总辩护人。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他会和托伦等人协调一致地进行活动。他这样得到了委任后,就转而以合法的身份来反对我们。根据托伦的信,在派勒吕贝去巴黎之前,我们就撤销这个委派,因为这涉及到勒福尔先生的**名义和社会地位**。(我们把它归结为:允许他写文章不

署自己的名字,而署名一位工人——这是不经我们同意他可以做的事。)由他当时写给勒吕贝的一封信来看,情况就是这样,但他表示同意。巴黎2月24日会议只犯了反对已经不存在的一项决议的错误。因此勒福尔先生或者他在伦敦的朋友,假装忘记他已放弃了委派给他的职务。他甚至威胁我们说,他要劝告所有的民主派提防我们,他忘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能劝告人们提防他。

他和他的代理人勒吕贝说,他不是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需要的只是政治保障。好吧。我们就委派万萨德,他这个人提供的保障比勒福尔和勒吕贝加在一起还要大。万萨德先生被委派后,在勒福尔和勒吕贝看来,他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对于由托伦等人提出、后来由我们批准的关于万萨德的提名,他们惟一能提出的异议之点是没有及时通知勒福尔。于是这种礼节上的无足挂齿的小事就成了他们持反对立场等等的最后借口。

协会的国际性质受到威胁,以及中央委员会委派使者的权力。
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共和主义者是形式主义者。

(1)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马克思宣布,撤销对席利先生的委派,而他之所以同意委派,只是因为这是一致通过的。

(2)委托勒吕贝通知法国理事会和勒福尔(在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指示如下:“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在得到会员卡以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因为未能达成协议,在3月1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个人

指示变成了决议。这是惟一被通过的决议。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勒吕贝应逐字逐句地把决议全文通知双方。)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14 日—18 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
—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致海尔曼·荣克的便函¹³⁵

厄内斯特·琼斯写信给马克思(3月16日于曼彻斯特)说,他将支持被派去参加曼彻斯特代表会议¹³⁶的代表团。中间阶级曾向他和胡森建议在召开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通告上签名。到写该信时为止,他还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此外他还写道:“我们打算在曼彻斯特举行区域性大会¹³⁷,以组织男子普选权运动来支援伦敦的运动。”

请(私下)把厄·琼斯的地址告诉克里默先生:曼彻斯特十字街55号。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3月
1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致柏林《改革报》编辑部的声明¹³⁸

我从寄到我这里的《改革报》第 68 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7 号上看出,冯·施韦泽先生狼狈地虚伪地企图摆脱他自己制造的“可爱的障碍”^①。随他去吧!但是我决不允许他把我 3 月 15 日的声明^②变成关于拉萨尔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我只是让施韦泽作一番自我描述。保留在我手中的拉萨尔和我约长达 15 年的通信,使得施韦泽及其同伙根本没有可能歪曲我们的私人关系,或者怀疑我对拉萨尔的鼓动采取中立态度的动机。至于另一方面拉萨尔的理论著作和我的著作之间的关系,那是学术批评的事情。以后也许会有机会来探讨这一或那一问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出于对死者的尊重,都不允许我把这样的事情变成同造谣中伤者在报纸上进行争论的对象。

卡尔·马克思

1865 年 3 月 28 日于扎尔特博默尔

① 海涅《新春曲。序诗》。——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28—132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3 月
28 日

载于 1865 年 4 月 1 日《柏林改
革报》第 78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人类的主席”¹³⁹

正当我从荷兰返回伦敦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第39号上献给我一个由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亲手烤制的臭阿魏¹⁴⁰蛋糕,它主要是用福格特的诽谤的残渣做成的。我在1860年伦敦出版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对福格特的捏造进行了有法律根据的反驳。但是这一次“人类的主席”伯恩哈德先生完全违反了自己的习惯,他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抄袭。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试图道出一点自己的东西。

“人类的主席”说:“实际上,马克思还通过德朗克把一份手稿典当了1000塔勒,这份手稿被在伦敦流亡者中四处刺探情报的普鲁士警官施梯伯赎了出来。”

我们的伯恩哈德·贝克尔在他亲自宣读主席报告的过程中曾一次比一次兴奋地三次回到这个“事实”上来。

我在《福格特先生》一书第124页上的注释中说:

“我本人于1850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蒂尔将军。他同各色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使我对他产生怀疑。但是,他出示了科苏特亲自签发给他的委任状,在委任状中,

早已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的临时警察总监的他被任命为有名无实的警察总监。他以这种方式轻而易举地打消了我的怀疑。作为为革命服务的秘密警察首脑，自然应当使自己进出为各邦政府服务的警察局的通道‘畅通无阻’。1852年夏天，我发现他扣下了我托他转交给柏林一个书商的手稿^①，并且把它悄悄地交给了一个德意志邦政府。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巴黎的一个匈牙利人（瑟美列），以及班迪亚的谜由于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的插入而被彻底揭开之后，我于1853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由我署名的公开揭露他的文章^②。”

显而易见，“人类的主席”没有读过我在12年前发表在《纽约刑法报》上的那篇详细揭露班迪亚的文章，当时班迪亚还住在伦敦。否则，他也许会使自己的捏造更接近实际情况一些。既然他这样完全沉溺于自己的着迷的幻想游戏，那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伦敦和典当这样惬意的联想更适合这种游戏呢？但是我可以担保，伯恩哈德·贝克尔从来没有典当过自己的手稿。

“人类的主席”赐予了以下的补充：

“当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维也纳的《信使报》出版时，马克思找我（即这个伯恩哈德·贝克尔）当这家报纸的通讯员，他避而不谈新报纸的半官方性质，据他说这份报纸已寄给他；相反，却强调我可以把很尖锐的文章寄去。”

当时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还不是“人类的主席”，并且有一个

-
- ①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流亡中的大人物》的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编者注
- ② 指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8—52页。——编者注

雷打不动的习惯：为伦敦的《海尔曼》胡诌一些“非常平淡的文章”。他在出于充足的理由悄悄地从伦敦溜走前不久，在一个美丽的夜晚亲自到我家拜访，使我感到很意外（在此之前我只是偶尔见过他一两次）。他在我面前凄惨地哀诉自己的不幸命运，并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一个通讯员的工作，帮他摆脱极其困苦的生活。我回答说，几天以前科拉切克先生通知政治流亡者、西蒂区的商人西·波克罕先生说，他在维也纳创办了一家新的、据称“非常自由的”报纸，他还给他寄了几号试办的报纸并要他代为招聘一个伦敦通讯员。为了满足伯恩哈德·贝克尔的热切愿望，我答应为此去找那位总是热心为流亡者效劳的波克罕先生。我记得伯恩哈德·贝克尔还写了一篇或几篇试验性的文章寄到维也纳。原来他想当《信使报》通讯员而没有成功这件事竟被用来证明我同奥地利政府有联系！显然，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以为，既然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授予他职务，那么上帝就已赐给他担任这个职务所必需的智慧！

伯恩哈德·贝克尔接着说：“李卜克内西还在有计划地做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工作，马克思也给她打了多次电报和写了好几封信，唆使她反对联合会。”

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以为，我也像他自己那样完全“有计划地”认真看待根据遗嘱交给他的那个高位¹⁴¹！在拉萨尔死后我写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那几封信是这样的：一封是吊唁信，另一封信回答她向我提出的有关计划编写一本论拉萨尔的小册子的各种问题，还有就是说明关于要求我反击某个诬蔑拉萨尔的人的问题，这一点我已经做了。^①

① 见本卷第28—31页。——编者注

不过,在1864年12月22日的信中我提醒伯爵夫人,我不同意拉萨尔的政策,为了避免误会我认为这么做是合适的。我们的通信就这样结束了,通信①中只字未提**联合会**。伯爵夫人还请求我立即写信告诉她,在计划编写的小册子中附上几张肖像在我看来是否合适。我打电报回答说:不!这一封电报竟被大诗人、大思想家和身兼大语法学家的**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当成了复数。

他说,我在这以后还参加过一次已启动的反对他的宣传活动。我在这件极其重要的事件中所采取的惟一的步骤是:有人从柏林写信②告诉我,**伯恩哈德·贝克尔**受到某些人的迫害,因为他不愿意滥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联合会**”来宣传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并入普鲁士的主张。同时还请求我把这个“阴谋”告诉索林根的**克林斯**先生——由于我们先前的联系,人们认为我对他会有一些影响——和日内瓦的**菲利浦·贝克尔**先生,请他们注意。我这样做了——告诉前者是通过一个巴门的朋友③,告诉后者是通过我在巴黎的朋友**席利**,当时席利同我一样还存有幻想,以为“**人类的主席**”总还有点人性,这一次他的确做得挺正派。而现在他当然会把事实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作为辩证法家。

但是,“**人类的主席**”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语法学家和辩证法家。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病理学家**。我患了一年半的痲病,这病碰巧在拉萨尔死后又延续了六个月,他说我患这种血红

① 指马克思1864年9月12日、10月16日、11月26日和28日以及12月22日给索·哈茨费尔特的信。——编者注

② 指1865年1月20日左右李卜克内西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③ 卡尔·济贝耳。——编者注

色病症是由于“对拉萨尔这个伟大人物忌妒得要命”。

他着重补充说：“但是他没有胆量敢出面反对拉萨尔，因为他很清楚，如果他这样做，那人就会用他的大棒把他打死，就像打死巴师夏-舒尔采那样。”

但是，拉萨尔恰好在他关于“巴师夏-舒尔采”的这一最后的著作^①中对我那本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②大加赞扬，说它是“划时代的”一部“杰作”，并且把它同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相提并论。于是，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以他固有的想像力得出结论说，拉萨尔会像把舒尔采-巴师夏置于死地那样，把我也置于死地。此外，拉萨尔对于我的“胆量”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当我在某一在此不必说明的场合写信告诉他说，恩格斯和我将不得不根据我已列举的理由公开反对他的时候¹⁴²，他写信详尽地答复了我，这封信现在就放在我面前；他在信中先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然后在结尾时说：

“在把事情公开和声张出去之前，请考虑一下这一切。况且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分裂对于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党来说，将是值得惋惜的事情！”¹⁴³

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认为，我对于某个没什么名气的国际协会¹⁴⁴（他，伯恩哈德·贝克尔，据说曾是它的成员）不闻不问，却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去年9月由伦敦工联的领导者们所创立的国际协会，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① 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582页。——编者注

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的辨别能力显然对他的推理能力大有帮助。他吹嘘说,他的协会在最繁荣的时候发展到整整“400人”;而我们的协会却没有那么谦虚,现在单单在英国就已经拥有10 000个会员。这样的事情竟然背着“人类的主席”发生了,实在是不可容忍。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特别是考虑到我只是略加暗示的伯恩哈德·贝克尔先生的那许多才能,人们就会发现他的抱怨几乎毫无理由。他抱怨说人们要他这样一个人一下子承担过多的事情;人们不仅把进行独裁统治作为他的主要职务强加于他,而且还“附带地”迫使他接受“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这样一个较低微的职务¹⁴⁵。不过,他在担任双重职务的条件下,似乎可以订出一个较好的家规。将来可以让他把“为家里买鸡蛋和黄油”当作主要工作,而只是完全“附带地”当人类的主席。

卡尔·马克思

1865年4月8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4月
8日

载于1865年4月12日《莱茵
报》第10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更正¹⁴⁶

贵报第 30 号所报道的比尔斯先生和利弗森先生的两项动议于 3 月 1 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¹⁴⁷大会上通过之后,彼得·福克斯先生(英国人)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动议:

“完整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欧洲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不具备这一条件,大陆上的革命胜利就只能是反革命长期统治的短暂前奏。”^①

彼·福克斯先生对欧洲因波兰丧失自由而遭受的种种灾难和俄国的侵略政策作了简要的历史概述,然后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自由党的立场和他所代表的民主协会的立场不一致。保守的欧洲的口号是:被奴役的欧洲要以被奴役的波兰为基础。“国际工人协会”^②的口号正相反:自由欧洲要靠自由和独立的波兰来支撑。

埃卡留斯先生(德国工人,“国际工人协会”副主席)支持这项动议,并详细地阐述了普鲁士几次参与瓜分波兰的情况。他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说:“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灭亡,是建立德国和恢复波兰的必要条件。”

① 见 1865 年 3 月 4 日《蜂房报》第 177 号。——编者注

② 福克斯发言中的原话是:“民主协会”。——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员勒吕贝先生也表示拥护这项动议。这项动议在与会者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获得一致通过。

《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自由党的”伦敦日报恼恨“国际工人协会”取得的成就，删掉了这一部分报道；还应说明的是没有国际工人协会的参与，圣马丁堂的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就根本不能举行。我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请贵报刊登这个更正。

“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4 月
13 日

载于 1865 年 4 月 22 日《白鹰
报》第 48 号，刊载时略有改动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BEE-HIVE NEWSPAPER.

A JOURNAL OF GENERAL INTELLIGENCE, ADVOCATING INDUSTRIAL INTERESTS

No. 148.

ISSUED WEEKLY ON FRIDAY MORNING

LONDON & FULHAM, MAY 26, 1848

Price Three-pence.

卡·马克思

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¹⁴⁸

阁下：

南部为维护“特殊制度”¹⁴⁹的统治发动了武装叛乱，“特殊制度”这个恶魔不会让它的信徒们在公开的战场上光荣地死去。它以叛逆方式干出的事，必然以丢丑方式告终。正如菲力浦二世维护宗教裁判所战争¹⁵⁰造出了一个热拉尔一样，杰弗逊·戴维斯维护奴隶制的战争也造出了一个蒲斯。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无须再去搜罗悲痛和愤怒的字眼了。就连那些成年累月顽固而徒劳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伟大共和国进行精神暗杀的势利小人，现在也被这普遍爆发的人民义愤惊呆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祭坛。他们现在终于发现：这是一个不会被逆境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陶醉的人；他不屈不挠地奔向自己的伟大目标，又从不轻举妄动使之受损；他稳步向前，从不走回头路；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

严厉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把阴云密布的愤怒场面化为一片光明;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而不像那些天降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小事就大吹大擂。一句话,他是一位功成业就仍善良如初的罕见人物。这位伟大而善良的人竟是如此质朴,以致只是在他成为烈士而倒下去之后,世人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光荣属于在这样一位领袖身边成为奴隶制恶魔的第二个受害者的西华德先生。难道他不是在大伙还犹豫不决的时刻就敏锐地预见到并勇敢地预言了“不可遏制的冲突”¹⁵¹吗?难道不是他在这场冲突的最艰难的时刻忠心耿耿地像罗马人那样对共和国和它的命运坚信不疑吗?我们衷心希望他和他的儿子^①在比“九十天”¹⁵²短得多的日子里恢复健康,重新回到社会活动中来,并获得应有的尊敬。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场惊心动魄的国内战争⁵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并把它和旧大陆的百年战争¹⁵³、三十年战争¹⁵⁴、二十三年战争⁴⁴作比较的话,恐怕就很难说它是九十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阁下,落在您肩上的任务就是用法律去根除那些已被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深刻地意识到您的伟大使命,将使您在严峻的职责面前不作任何妥协。您将永远不会忘记,为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美国人民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了两位劳动伟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德鲁·约翰逊。

1865年5月13日中央委员会代表国际工人协会签署于伦敦:

卡尔·考布,埃德温·科尔森,弗·列斯纳,卡尔·普芬德, N. P. 汉森, 卡尔·沙佩尔, 威廉·德尔, 格奥尔格·罗赫纳,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约翰·奥斯

① 威·亨·西华德和弗·威·西华德。——编者注

本,彼·彼得逊,A.詹克斯,H.克利莫什,约翰·韦斯顿,亨·博勒特,本·鲁克拉夫特,詹·巴克利,彼得·福克斯,纳·萨尔瓦特拉,乔治·豪威耳,博尔达日,A.瓦尔蒂埃,罗伯特·肖,约·H.朗梅德,W.摩尔根,乔·威·惠勒,约·D.尼亚斯,威·C.沃利,D.斯坦斯比,F.德·拉萨西,詹·卡特,波兰书记——埃米尔·霍尔托普;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瑞士书记——海·荣克;法国书记——欧·杜邦;财务书记——J.惠特洛克;主席——乔·奥哲尔;名誉总书记——威·兰·克里默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5 月
2 日—9 日之间

载于 1865 年 5 月 20 日《蜂房
报》第 18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报告结束时提出的决议草案¹⁵⁵

(1)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一般地说,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商品的价值则保持不变。

(2)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工资的普遍提高才可能实现。如果得以实现,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住。在现今的生产基础上,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而是降低工资。即使工资的普遍提高能保持一个较长的时期,也不会消灭,而只是减轻雇佣劳动者即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奴役。

(3)工会的良好作用在于它们抵制,即使是暂时地抵制工资总水平下降的趋势,在于它们争取缩短和限定劳动时间,亦即工作日的长度。它们的良好作用在于它们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一种手段。它们如对自己的力量使用不当,则有时会遭到失败,它们如把现存的劳资关系作为永久不变的东西加以接受,而不致力于消灭这种关系,则会遭到全面的失败。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5 月
20 日—6 月 24 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
—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工资、价格和利润¹⁵⁶

卡·马克思写于 1865 年 5 月
20 日—6 月 24 日之间

1898 年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
出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引 言]

公民们!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允许我先说几句开场白。

目前大陆上有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闹着要求增加工资。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的大会上讨论。¹⁵⁷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甚至不怕引起你们的不耐烦。

我要预先说明的另一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他不仅向你们提出一些他明知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之辩护,还自以为是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表现为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表尊敬。尽管我这篇报告措辞直率,我希望,在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将会发现,我同意的是在我看来正是构成他的论点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不得不认为,这些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我现在就来谈正题。

1. [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对全年或对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如此,对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姑且不论人口的变化,它也必然如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一旦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数,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比如说是8,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武断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

Einleitung

Das Buch ist ein 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Wertung und des Preises... (The book is a draft of a theory of valuation and price...)

2

Der Wert ist die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The value is the social labor...)

卡·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手稿第1页

工资,是很愚蠢,那么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者,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他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那个所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他就不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尽管不能而且不该提高,但是它随时可能而且应该降低,只要是资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资本家想给你们吃的是马铃薯而不是肉,是燕麦而不是小麦,你们也必须接受他的愿望,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而惟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的比英国的高,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这个方法看来不仅会简化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工作,而且也会简化对其他一切现象的研究工作。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不同于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一个牧师会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解释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颜无耻地回答,上帝愿意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决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

2. [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值5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要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被固定在值4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3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一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违背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

增多。真让人觉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①。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贵族的胃养活着国家躯体上的平民的四肢¹⁵⁸。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四肢。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

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在劳动生产力中，在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中，在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中，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怎样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要能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就能影响商品的价格。

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耗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

① 前一句中“匙子”的原文是“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此处“笨拙”的原文是“spoony”，是“spoon”的形容词。——编者注

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高价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比例。

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

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无须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这种提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减少的需求抵消。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动**。

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耗费于一切消费品,于是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耗费于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于减少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一种假

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后,又会降到原先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为了唤起你们的想像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100%。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100%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超不过1%,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100%的幻想,我想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

你们都知道1848年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⁸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发言人都曾证明——我应该指出,他们的论据比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更有力——这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

证明说,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这种工资的增加起因于并依据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惟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¹⁵⁹与这个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尽管工作日缩短,工厂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人士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¹⁶⁰,因为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这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¹⁶¹。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愿望,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将是正确的,而早在1816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①、不惜违反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新拉纳克的棉织工厂里真正予以实行的罗伯特·欧文却是错了。

在十小时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在大不列

① 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编者注

颠,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曾有过一次农业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

虽然这不是我的直接目的所要求的,为了不使你们误会,我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么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看,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尽管实际的工资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少得可怜,难以温饱。所以不应当陶醉于动听的工资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须经常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不难理解,如果10个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 $\frac{1}{4}$ 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 $\frac{1}{4}$ 的人,才真正有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数来计算,这20个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20%,就雇用他们的全部资本而论,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论,就仍然好像他们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资的平均增长额。在关于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中,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郡的工资水平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最后,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有些事起了抵消作用,例如对俄战争⁹³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¹⁶²,等等。

我就先说这么多,现在就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

平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大约提高了 40% 这件事。我可以举出大量的详细材料来证明我的论述,但是,就当前的目的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一看已故约翰·查·摩尔顿先生 1859 年在伦敦技艺协会¹⁶³宣读的《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那篇诚实的批判性的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从苏格兰 12 个郡和英格兰 35 个郡内大约 100 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再加上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 1849—1859 年间应该有惊人的上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1854—1856 年又连续歉收,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却从 1838—1848 年的每一夸特约 3 英镑,降到 1849—1859 年的每一夸特约 2 英镑 10 先令。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 40% 的同时,小麦的价格降低了 16% 以上。在同一时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 1859 年同 1849 年比较一下,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 934 419 人减到 860 470 人,即减少了 73 949 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而在以后几年又未见减少,但毕竟是减少了。

有人会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¹⁶⁴,1849—1859 年外国谷物的进口比 1838—1848 年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怎样呢?根据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国外市场上发生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猛涨,这种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发生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影响都是相同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法国在这段时期,粮价惨跌已成为人们的经常话题,美国人不得不屡次焚毁他们多余的产品,而俄国,如果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则鼓励了美国的内战⁵,因为美国佬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破坏了俄国农产品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就是:

需求的任何提高,总是在一定的产品量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决不能增加所需的各种商品的供给,只能抬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表明,需求的提高有时会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完全不变,有时也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暂时提高,接着就是供给的增加,接着就是价格再降到原先的水平,多半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条件。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解释一般的现象,和解释在工资提高这个特别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同样是困难的。所以,他的论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毫无特殊意义的,只不过表明他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规律:需求的提高引起供给的增加,而不一定会引起市场价格的上涨。

3. [工资和通货]

在讨论的第二天^①,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把他的旧主张披上了新形式。他说:由于货币工资的普遍提高,将需要更多的通货来支付这些工资。通货的数量既然固定不变,那又怎么能用这种固定不变的通货来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困难是:工人的货币工资尽管增加而工人所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固定不变;现在的困难是:商品的数量尽管固定不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

^① 指 1865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

认他的原先的教条,他那相应产生的难题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说明,这个通货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

在你们的国家,支付机制比在欧洲任何国家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集中的银行系统,只需要少量的通货,就能周转同等数目的价值,就能办理同等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例如,在工资方面,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资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环不已。由于有这套机制,一个工人的年工资假定为 52 英镑,只要用一个索维林^①,就这样每星期周转一次,便可支付了。但是,这种机制即使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并且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完善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与纯工业区域相比,却需要更多的通货才能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

你们如果渡过拉芒什海峡,就可以看到,那里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些工资是用大量的通货额来周转的。每一个索维林不能那样快地被银行家取得,或者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在英国,一个索维林就能周转一年的 52 英镑,在大陆上,你也许需要 3 个索维林才能周转 25 英镑的年工资。因此,把大陆各国和英国相比较,可以立刻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更多的通货来周转,这实际上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毫不相干。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的年收入估计为 25 000 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 300 万英镑来周转的。

^① 索维林(sovereign)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价值相等。——编者注

假定工资增加 50%，需要的通货就不是 300 万英镑，而是 450 万英镑了。工人的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能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那么，货币工资提高 50%，至多只需要补充 100 万索维林进入流通。以金银条块或铸币形式躺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金库里的 100 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补充的通货势必会有一些磨损，这 100 万的补充铸币或补充磨损所引起的少量费用甚至可以节省下来，也确实会节省下来。你们都知道，英国的通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用于商人之间的交易和消费者与商人之间的大宗支付。另一类是金属铸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通货，虽然种类不同，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大宗支付中，5 英镑以下的零数大半是用金币流通的。如果明天发行 4 英镑、3 英镑、或 2 英镑的银行券，这些流通渠道中的金币就会立刻被挤出，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 50% 所需要补充的 100 万，不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填补了。增加票据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在兰开夏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像公民韦斯顿对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增加 100%，会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且，依照他的见解，需要补充一批得不到的通货，那么，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啦！你们都知道，1858—1860 年是棉纺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 1860 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这时也很兴旺。1860 年，棉纺工人以及与他们这一行业有关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美国危机⁵发生后，那些工人的

工资忽然降到大约相当于过去数目的 $\frac{1}{4}$ 。反过来,那就是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5提高到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20降到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75%。但是在一方面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方面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纺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于棉纺织工业的工人,那么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 $\frac{1}{2}$ 。小麦的价格降低了吗?没有,它已由1858—1860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47先令8便士提高到1861—1863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55先令10便士。至于通货,1861年造币厂铸造了8 673 232英镑,而1860年只有3 378 102英镑。换句话说,1861年比1860年多铸造了5 295 130英镑。当然,1861年流通的银行券比1860年少了1 319 000英镑。现在减去这个数目,1861年的通货与1860年这个繁荣年度相比,仍然多出3 976 130英镑,大约多了400万英镑;但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减少了,虽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却是以近似的比例减少了。

现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较一下。1862年,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除此以外,单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路定期支付的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就达32 000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1842年当然会令人难以置信。然而,1862和1842年的通货的总额仍然是几乎相等的,你们还可以看出,不仅商品的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的价值在大量增加时,通货反而趋于递减。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他要是对于这个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姑且不谈工资并假定它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通常要结算

的货币交易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银行券的发行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为中介而借助汇票、支票、转账信贷和票据交换所而实现的支付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通货，市面上流通的铸币与储存或躺在银行金库中的铸币和金银条块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银条块数量和送出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银条块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他就会知道：他的通货总额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相矛盾的极大的错误。他就会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那些规律，而不致把他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了。

4. [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petitio est mater studiorum”，即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再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通货紧缩一定会使资本减少，等等。我已经讲过他的关于通货的奇谈怪论，我认为，完全不必再来讨论他的那些根据他想像的通货灾难所幻想出来的想像的后果了。我现在就把他用多种不同形式反复陈述的同一个教条，归结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他的命题的方法是非批判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者，反对因工资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例如，为什么每星期 5 先令就是低工资，每星期 20 先令就是高工资？如果说 5

与20相比算是低工资,那么20与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一开始就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决不能给人传授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谈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并不是由出售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甚至不觉得有注意它们的必要。显然,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数量的标准相比较才能够谈高或低,但他却满足于承认高低这种流行的庸词俗语,以为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如果他回答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我首先就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那样回答就会立刻使人不屑一顾。劳动的供求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上涨;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下降,尽管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采用例如罢工或别的方法来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么毅然反对提高工资,就未免幼稚无益了,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你们要是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我就再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呢?

还是把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广一些: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

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一致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时,它们就相互牵制,彼此都不向对方发生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因而停止发生作用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符合它的**实际价值**,就符合市场价格随之变动的那个标准价格。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必讨论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的一时的影响。这对于工资或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

[5. 工资 和 价格]

我们的朋友的一切论据,如果化为最简单的理论形式,就是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用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可是,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价格就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卖得贵。比较一下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我可以指出,除了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平均说来,高价的劳动生产低价的商品,而低价的劳动生产高价的商品。当然,这种现象不能证明一种场合下的高价劳动和另一种场合下的低价劳动都是造成那些正好相反结果的各自原因,但总能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

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从来没有使它公式化。相反地，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怎样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为资本家加上百分之几，为土地所有者加上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费的劳动的工资为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100%，资本家就要加上10；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100%，就要再加上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20，那么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60，其余类推。因此，提出价值由工资来调节的这一教条的所有老朽的政治经济学作家们，都是说利润和地租不过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之几，借以证明这个教条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百分之几的限度归结为一种经济规律。相反地，他们似乎以为利润是由传统、习惯和资本家的愿望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武断的和莫名其妙的方式决定的。如果说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种竞争的确会拉平不同行业的不同利润率，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决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我说的价值都是指交换价值，——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这就使我们为难

了,当然要为难,因为我们总是想依照逻辑来推论。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很少从逻辑上考虑的。就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工资规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增加了,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增加工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在开始时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在结尾时却又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

总之,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显然,我们只是躲避了困难,因为我们决定一种价值,用的是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另一种价值。

“工资决定商品的价格”这一教条,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这种同义反复只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要是接受这个前提,有关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全部推论就都变成空洞的呓语了。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彻底粉碎了“工资决定价格”这个流行已久的陈腐不堪的谬论,这个谬论已被亚当·斯密和他的法国前辈们在自己著作的真正科学的部分中驳斥了,但是又被他们在其著作的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再现出来。

6. [价值和劳动]

公民们,讲到这里,现在我必须进一步实际地阐明这个问题了。

我不能保证一定能令人很满意,因为这样做,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像法国人所说的“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怎样决定的?

乍一看,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其实,讲到价值,讲到某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比例量。但是这时又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有无限的差别。就以一种商品例如小麦来说,我们将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交换,几乎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麦的价值无论是用丝绸、黄金还是用其他某种商品表现出来,都依然是**一样的**,它必定是一种与各种商品交换的**各种交换率**显然不同而且毫不相干的东西。一定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交换,或者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某个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因为我假定小麦和铁是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这同一数量的。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在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者比较三角形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时,我们将怎样着手呢?我们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一种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

道它的面积等于它的底边和高相乘的一半,我们就能比较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

计算商品价值,也应当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关,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要生产一个商品,必须在这个商品上投入或耗费一定量的劳动。我说的不仅是**劳动**,而是**社会劳动**。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要是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费的,他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与社会没有关系。但是,一个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从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别的分工,这种劳动就算不了什么,它所以必需,是为了**补充**别的分工。

我们如果把**商品**看作是**价值**,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一块砖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但是怎样测量劳动量呢?用**劳动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说,用小时、日等等来测量。当然,采用这种测量法,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劳动或简单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所以我们便得出结论:商品具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它所含的社会实体

量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数量或劳动量决定的。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各种相对应的数量,是相等的。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想,你们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其间果真有什么区别或多大的差异吗?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和劳动数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例如,假定说一夸特小麦和一盎司金子包含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1731年发表的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这个第一篇论文里曾经用过,他也是一个最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是的,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司金子是等价的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的若干天或若干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参考一下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究竟怎样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佣劳动,我们都不管,让它作为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要是采用了雇佣劳动,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就很可能极不相等。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司金子的报酬。或者,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脱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谷物或一盎司金子的 $\frac{1}{2}$ 、 $\frac{1}{3}$ 、 $\frac{1}{4}$ 、 $\frac{1}{5}$ 或其他某种分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超过或多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可能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

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不受工资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按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决定商品价值这种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阐明。

在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以前用于这个商品原料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协助这种劳动的那些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的劳动,加到最后所费的劳动量上。例如,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纺织过程中附加于棉花的劳动量,以前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和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用于蒸汽机、纱锭、厂房等等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再三使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那样一下子就消耗完了,它们的全部价值也就会一下子转移到它们协助生产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纱锭只是逐渐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据它的平均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来平均地计算。这样,我们就计算出纱锭价值中有多少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费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多少是以前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论,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么一个人越懒或越笨,他生产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完成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然而,这样推论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社会”这个词

有许多含意。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平均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蒸汽织机和手织机开始竞争时,只需要从前的一半劳动时间就能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呢子,可怜的手织机织工,从前每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这时每天要劳动17至18个小时了。但是,他20个小时的劳动产品这时只代表10个小时的社会劳动,或代表10个小时内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用2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并不比他从前用1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有更多的价值。

如果说,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了,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同样,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生产各种商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会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实不然。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低,在同一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少。举例说,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不太肥沃的土地,要获得同样多的产品,就必须耗费更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比他从前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能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么,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加在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小。劳动生产力越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高。因此,作为一般的规律,我们可以这样说: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以上只说了价值,现在我再讲几句关于价格这个价值所表现的特殊形式。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例如,在英国,一切商品的价值是用金的价格表现的,而在欧洲大陆,主要是用银的价格表现的。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你们用本国的若干产品,即凝结了你们国内若干劳动量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凝结了它们的若干劳动量的产品。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以货换货的方法才学会用金银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为它们所消耗的各个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价值的货币表现,换句话说,仔细看看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

能具有一种既独立又同质的形式,或者,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表现为等同的社会劳动量的过程。只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法国的重农学派¹⁶⁵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么,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你们都知道,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一样的,尽管生产条件因各个生产者而会有所不同。市场价格只表现在平均的生产条件下供给市场以某种数量的某种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某种商品的总额计算的。

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它的**价值**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这种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地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情况可能有时使商品的价格高于自然价格,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略低于它。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障碍使价格背离这个稳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①

我现在不能细谈这个问题。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相当于它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供给和需求**必定**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它们实现这种平衡只是

①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47页。——编者注

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靠下落补偿上涨，或者反过来的情况。如果你们不只是观察每天的波动，而是分析较长一段时期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中所做的那样，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们的背离价值，它们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消和互相补偿的；所以，除了垄断组织的影响和其他某些限制，这些我暂且不谈，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或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波动互相补偿的平均时期，因商品的种类不同而各不相同，因为，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给适合于需求。

说得更广些，就算在较长的时期一切种类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价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的，而是指各个行业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来源于商品价格的额外提高，或者来源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那岂不荒唐。要是把这个观点加以概括，它的荒谬就显然可见了。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总不免要作为买者经常丧失掉。如果说有些人是买者未必又是卖者，是消费者未必又是生产者，这也没用。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首先应该是他们从生产者那里无偿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先拿了你的钱，然后用你的钱购买你的商品，即使你按高价把你的商品卖给这个人，你也决不会发财。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赚到利润。

所以，要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按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商品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你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

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奇谈怪论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

7. 劳 动 力

我们尽量简略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一切商品的价值的本质,现在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别的**劳动的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好像是奇谈怪论的话来使你们大吃一惊了。你们都确实以为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所以劳动是有价格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有一种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就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用这个价值的概念,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在这个工作日里有多少劳动呢?10小时劳动。如果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就等于10小时的劳动,或者,就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了。显然,我们一旦发现“**劳动的价值**”这个词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就能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应用了,好像我们一旦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动,就能解释它们表面上奇异的运动一样。

工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的确,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我确实知道一些大陆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一个人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长时间**。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奴隶制就会立刻恢复原状。如果这种出卖包

括一个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了。

英国的一位最老的经济学家和最有创见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已经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本能地发觉了这一点,而他的继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说:

“一个人的价值或所值,像其他一切东西一样,就是他的价格,即使用他的力时应付给的报酬。”^①

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确定劳动的价值,就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

但是在这以前,我们应当问,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发现市场上有一批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这些东西,除了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都是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是卖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除了劳动的双手和头脑,没有别的东西可卖;前一批人经常买进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后一批人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这种奇怪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作原始剥夺。我们一定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可是,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直到一种新的、根本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一为止。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

^① 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839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编者注

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他本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并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机器一样,也是要损坏的,所以必须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他除了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来养育儿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延续劳动者的种族。此外,为了发展他的劳动力,使他获得一种技能,还需要另外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要考察一下中等的劳动就够了,这种劳动的教育费和训练费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机会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一定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工资平等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一种决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是一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只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有不同的价值,要生产它们,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它们在劳动市场上就应当获得不同的价格。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8. 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假定，一个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 6 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又假定，这 6 小时的平均劳动也用金的数量表现出来，等于 3 先令。于是 3 先令就是这个人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他的劳动力的每天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 6 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购买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劳动力每天卖 3 先令或每周卖 18 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 6 小时，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 3 先令的价值。他每天所加的这个价值，与他每天所得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完全等价的。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难题了。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付了它的价值以后，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就有权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商品。强迫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去消费或使用它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当然有一定的限度，可是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却只受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同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全然不同一样。限制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决不能限制他的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我们已经知道,他为了每天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必须每天再生产3先令的价值,这是他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12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6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6小时,这6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例如,每天工作6小时使棉花增加3先令的价值,这个价值与他的工资完全等价,那么,他在12小时内就要使棉花增加6先令的价值,并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棉纱**。既然他已经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即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得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价值是6小时劳动的结晶,而他收回的价值却是12小时劳动的结晶。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预付3先令,每天收入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将再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此并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为资本家效力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的延长**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只抵偿他的工资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9. 劳动的价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但是，因为工人是在他劳动完毕以后领取工资的，并且知道他实际上给予资本家的正是他的劳动，所以他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必然就是他的**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假定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3先令，这是工作6小时所得的，如果他工作12小时，他必然以为这3先令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体现了6先令的价值。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面上却很像**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态的劳动的不同之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

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因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用于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他和他的主人没有订立合同，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他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白干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最近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都显然分开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分开了，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认为强迫人白干活的这种意见非常荒谬。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主人的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厂或作坊中为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例中，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的，整个交易的实质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饰了。这种无偿的劳动，在后一例中似乎是自愿的，在前一例中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以下使用的“劳动的价值”这一用语，我不过是把它作为表示“劳动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 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 出卖商品获得的

假定 1 小时的平均劳动所体现的价值等于 6 便士, 或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 6 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 3 先令或 6 小时劳动的产品。如果生产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原料、机器等等体现了 24 小时的平均劳动, 这些东西的价值就会等于 12 先令。此外, 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自己 12 小时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 这 12 小时就会体现为 6 先令的追加价值。所以这种产品的全部价值共为 36 小时的已体现的劳动, 即等于 18 先令。但是, 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 3 先令, 那么, 资本家对于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 6 小时剩余劳动, 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所以, 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卖了 18 先令, 他就实现了 3 先令的价值, 他对此并未付出任何等价物。这 3 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 资本家实现这 3 先令的利润, 并不是因为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 而是因为他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 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 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 一部分是有偿劳动, 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 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 即出卖耗费于该商品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 是必定获得利润的。

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花在商品上的费用,和商品的实在费用,是不同的两码事。所以,我再说一遍,正常的、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而是由于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11. 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都落入经营资本家的腰包。垄断土地,使土地占有者能以地租名义——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建筑、铁路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取得这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拥有劳动资料,使经营资本家能生产剩余价值,即窃取一定量的无偿劳动,这就使拥有劳动资料并把它们全部或部分地贷给经营资本家的人,简言之,即放债的资本家,能以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所以,留归经营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是所谓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从土地本身也不是从资本本身产生

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能从经营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经营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己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经营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且本人又是他使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剩余价值就会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经营资本家,不论他最终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这种关系上的。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这次讨论的公民要想模糊事情的真相,把经营资本家和工人的这种根本关系看作一个次要的问题,那就错了,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经营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这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所述,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这一部分,决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而已。但是,除此以外,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构成的,那就错了。我们先不谈工资,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独立价值之和而构成或形成的,

那就完全违反真理了。

如果 1 小时的劳动体现为 6 便士的价值, 如果工人的工作日为 12 小时, 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 那么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加 3 先令的**剩余价值**, 即没有付过等价的价值。这 3 先令的剩余价值, 就是经营资本家可以按任何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 3 先令的价值, 构成他们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并不是经营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 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 然后, 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就构成了全部价值。所以, 你们知道, 流行的观点分不清**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 和**三种独立价值相加而形成这个价值**这二者的不同, 于是就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规定的数量, 这种观点该是如何荒谬。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 100 英镑, 我们把这个数量看作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 100 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 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这个利润率显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 100 英镑。如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 100 英镑, 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 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 我们就可以说, **利润率**等于 100%, 因为预付的价值为 100, 而实得的价值则为 200。

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 而是看到**预付的全部资本**, 例如 500 英镑, 其中, 400 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 我们就应该说, **利润率**只等于 20%, 因为这 100 英镑的利润只是预付的**全部资本**的 $\frac{1}{5}$ 。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 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真正

比率,即对劳动进行 exploitation^①(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字)的真实程度的惟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所用的,并且也确实适用于某几种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词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分配给不同的人群;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词时,则总是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来测量利润。

12. 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

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原料和耗费在商品上的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即除去商品中所含的代表过去劳动的价值,这商品价值的余留部分就是**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如果 12 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 6 先令的金量,那么这 6 先令的附加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惟一**价值。这种由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他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自分得一份的**惟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惟一**价值。显然,双方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 1 200 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即根据工人

① 剥削。——编者注

的全部劳动所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一个一定的数,其中一部分在增加时,另一部分相反地总要减少。工资有了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工资下降了,利润就要上涨;工资上涨了,利润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设,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一整天中只有 $\frac{1}{3}$ 的时间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资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所以,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

但是,商品的价值——这种价值最终一定要调节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总量来决定,并不取决于这种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但是决不能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永远不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劳动的延伸或长度。纺纱劳动的生产力,在一般水平下,例如,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能生产12磅棉纱,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这就是说,如果在前一场合,12小时的平均劳动实现为6先令的价值,12磅棉纱就要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2磅棉纱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只值6便士,在后一场合,1磅棉纱竟要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异,就是所用劳动的生产力有差异的结果。生产力较高时,1小时劳动体现为1磅棉纱;生产力较低时,6小时劳动才能体现为1磅

棉纱。在前一场合,1 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 6 便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它的价格却等于 3 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这是必然的,因为 1 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于这磅棉纱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决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说的高价劳动可能生产低廉的商品,而低价劳动可能生产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不再像是什么奇谈怪论了。这只是说明了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是由消耗于商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消耗的劳动量完全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 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 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1)现在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流行的说法,即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例如,在某一国,劳动者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为 6 小时的劳动,表现为 3 先令,这个劳动者为了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就必须每天工作 6 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 12 小时,资本家付给他 3 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的一半就会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等于 100%。但是现在假定,例如,因生产率的降低,要用更多的劳动来生产同量的农产品,于是,每天平均的生活

必需品的价格就从 3 先令涨到 4 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 $\frac{1}{3}$,或增加 $33\frac{1}{3}\%$ 。劳动者要依照他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便需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 8 小时;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 6 小时减到 4 小时,利润率就要由 100% 降到 50%。但是,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获得他的劳动所增加的价值,就好像其他所有出卖商品的人在商品成本费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所增加的价值获得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必需品所增长的价值,劳动的价格也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是,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等数量的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可能从 3 先令减到 2 先令,换句话说,在一个工作日中不必劳动 6 小时,只要劳动 4 小时,就能再生产与每天生活必需品等价的价值。这时工人用 2 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 3 先令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是,这样减少的价值,仍能获得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于是,利润就会从 3 先令提高到 4 先令,利润率也会从 100% 提高到 200%。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在他的增长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例如,英国的一些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就卑鄙地背弃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 10%。工人的反抗,起初没有奏效,但是,由于我现在不能详谈的某些情况,后来又恢复所失去的 10% 了。

(2)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保持原状,但是货

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所以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更丰富的矿山的发现,等等,生产例如2盎司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司金所费的劳动多。于是,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这时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他的劳动的货币价格这时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如果他的工资提高了,但与金的价值下降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供给和需求,还是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该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他必须满足于名称的报酬,而不是实物的报酬。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在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趁此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政治经济学家断定,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贵金属的价值又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并没有固定界限。资本的经常趋势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资本把工作日越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越多。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前三分之二这段期间,10小时的工作日是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在反雅各宾战争⁴⁴,其实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时期,资本庆祝自己的胜利,把

工作日从 10 小时延长到 12 小时, 14 小时, 18 小时。马尔萨斯这位决非多愁善感的人, 在 1815 年左右出版的一本小册子^①中宣称, 这种情形如果再继续下去, 必将摧毁民族的生命之本。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的前几年即 1765 年左右, 英国出现了一本小册子, 书名为《论手工业》¹⁶⁶。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他竭力主张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提议, 除了采取其他手段, 还要建立习艺所¹⁶⁷, 用他的话来说, 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 12 小时, ——这恰好是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在 1832 年宣布的对 12 岁以下儿童不仅是已在实行, 而且是必要的工作时间。¹⁶⁸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在现代制度下他不得不这样做——就是把把这个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 不过是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他的劳动力, 是为了保持它, ——且不谈它的自然损耗, ——而不是为了毁灭它。工人按照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他的劳动力, 不用说, 决不会允许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受到两天或两周的损耗或损失。现在举一架价值 1 000 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 10 年, 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就要增添 100 英镑。如果它能用 5 年, 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就要增添 200 英镑。换句话说, 它每年损耗的价值和它被磨损的速度成反比。但这正是工人和机器的不同之处。机器恰恰不是和它的使用期限按同样的比率磨损。相反地, 人的衰老程度, 和他工作的单纯数值的增加, 在比例上显然大得多。

① 即《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 年伦敦版。——编者注

当工人们争取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范围时,或者,当他们不能强迫法律规定正常的工作日,而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被勒索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比例,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只是在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种族履行义务。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设置一些限制而已。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狂野了。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其实仍低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不符合被榨取的更大的劳动量,不符合劳动力的更快的衰竭,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种事,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做到。你们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们会告诉你们,例如,兰开夏郡的职工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除了家长那个成年男子的劳动,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现在都被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¹⁶⁹车轮下了,而工资总额的增加并不符合从这个家庭榨取的全部剩余劳动。

即使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例如,现在一切服从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都有这种限制,要想保持劳动价值的原有水平,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一些服从工厂法的行业中,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一个人要管理的工作机器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劳动者还能占到便宜。如果超

过这个限度,他在一种形式下所得到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于是10小时劳动就可能与以前12小时劳动同样有害。工人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这不过是抑制他的劳动的跌价,防止他的种族的退化罢了。

(4)你们都知道,由于我现在没有必要说明的某些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正的,在整个周期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调节的。再说,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致完全失业,他的工资也一定会降低。为了不受骗,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时,也应当同资本家争论工资究竟该降到什么程度。在产生额外利润的繁荣阶段,他如果不争取提高工资,按整个工业周期平均计算,他就会甚至得不到他的平均工资或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工资,在这个周期的不顺利阶段,必然要受影响,如果在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还要求他不去争取补偿,那就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相互补偿才能实现,而这种相互补偿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所以,劳动也必须经历同样的变动,才能够获得与它的价值相符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又让它免受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规律的约束,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能。雇佣工人要想补偿一个时期的工资的降低,必须在另一个时期努力争取工资的提高,

如果他甘心接受资本家的愿望，接受资本家的命令，把它当作永久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受到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从我以上讨论的各场合——它们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你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先前的各种变化之后发生的，是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市场价格的波动——它的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与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相适应——这些先前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是劳动对资本的先前行动的反行动。你们讨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如果不顾这些情况，如果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引起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你们就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想要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了。

14. 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因为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劳动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

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最后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孱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①,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① 即《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编者注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界限。在反雅各宾战争⁴⁴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¹⁷⁰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

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英国的工作日的限制，像其他各国一样，它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决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文明古国。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我们的朋友韦斯顿也许劝告过他们——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11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村人口又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古老国家迟早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

法。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①;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

这同一规律还有另一种形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快。因此,可以推论,像亚·斯密——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代工业还很幼稚——那样推论,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能保证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所以必然会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对最近20年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资却没有很大的提高,感到诧异。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递增的变化。资本中包含固定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比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总是逐渐递增的。这一规律已经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了。

如果资本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原来是一比一,这个比例就会因工业的发展而变成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用于工具和原料等,其余300用于支付工资,那么总资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500用于机器和原料等,只有100用于支付工资,为了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

①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79页。——编者注

本的积累。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与资本的增加相比,不过是在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是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争取工资水平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与资本家争论劳动价格,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

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卡·马克思

* 关于在 1866 年召开
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¹⁴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同意向代表会议¹⁷¹提出如下建议：

中央委员会将在 1866 年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除非发生使代表大会必须继续推迟的意外情况。

卡·马克思于 1865 年 9 月 19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
—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伦敦代表会议(1865年)通过的
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¹⁷²

议题如下:

一 协 会 问 题

1. 关于协会的组织问题。
2. 为协会会员建立互助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遗孤。

二 社 会 问 题

1. 合作劳动。
2. 缩短劳动时间。
3.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
4. 工联, 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 通过国际协会实现劳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

6. 国际信贷:国际信贷机构的建立,它们的形式和运行方式。
7. 直接税和间接税。
8. 常备军与生产的关系。

三 国 际 政 策

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和在民主与社会基础上恢复波兰,消除莫斯科在欧洲影响的必要性。

四 哲 学 问 题

宗教观念与社会、政治和思想发展的关系。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65 年
11 月 20 日

载于 1865 年 10 月 8 日《民论
报》第 277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1866年1月16日中央委员会
会议记录¹⁷³

埃卡留斯主持会议。

宣读并批准了记录。

龙格和克雷斯佩耳两位公民被提名为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通知委员会，福克斯收到奥顿诺凡夫人的一封信，对他登在《工人辩护士报》上的关于芬尼运动¹⁷⁴的文章^①，以及该报转载关于援助被判罪的芬尼社社员的呼吁书^②表示感谢。

马克思提议任命公民龙格接替他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荣克附议。通过。

荣克宣读了杜戎库(纽约饭店)的一封信，要求偿付代表会议¹⁷¹期间欠他的7英镑17先令。

① 指彼·福克斯《不列颠在爱尔兰的政变》、《爱尔兰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和《爱尔兰步履艰难》，载于1865年10月14、21、28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6—138号。——编者注

② 《政治犯。致爱尔兰妇女呼吁书》载于1866年1月6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48号。——编者注

接着进行了讨论。勒吕贝、荣克、杜邦、惠勒、列斯纳等人参加了讨论。

克里默:委员会委员和协会会员应马上交付会员证费。

荣克提议:应委托杜邦转告杜戎库,由于委员会委员到会人数不多,下周三将偿付部分欠款,并作出肯定答复。列斯纳附议。

荣克宣读:卡昂的塔尔博的一封信,以及1英镑(20个会员证费)(给杜邦)。

在卡尔瓦多斯省、奥恩省和拉芒什省的城市中进行的宣传。

惠勒先生动议:发出通告,凡在2月15日前不(补)交会员证费的,将停止会籍。(在《辩护士报》上刊登广告。)公民荣克附议。通过。

韦雷茨基(波兰代表):解释他们没有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原因。他们在星期一开了会,并筹集了一笔应急的钱。经过一番讨论,关于开会地点,圣马丁堂,下周一(1月22日)晚上8点钟。¹⁷⁵

克里默宣读了致不列颠会员的呼吁书。通过此呼吁书。签名问题出现困难。提议印刷签名单。通过惠勒的建议。

卡·马克思记录于1866年1月1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关于讨论代表大会
议程的程序的决议¹⁷⁶

在开始讨论代表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之前,应首先明确宣言和章程所规定的协会的总目标和主要原则。

卡·马克思于 1866 年 1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
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
—1866》1961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THE COMMONWEALTH

Published for the Proprietors

No. 148.

ATURDAY, MARCH 24, 1888.

Price One Penny.

弗·恩格斯

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¹⁷⁷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阁下：

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表述为几个字——恢复波兰。整个宪章运动⁷时期是如此。法国工人在1848年以前很久，以及在那个值得缅怀的年头里都是如此，1848年5月15日他们曾喊着“Vive la Pologne！”——波兰万岁！——的口号向国民议会^①挺进。¹⁷⁸德国是如此，1848年和1849

① 即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制宪议会。——编者注

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好几家机关报¹⁷⁹都要求对俄作战以恢复波兰。就是现在，情况也是如此——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我们后面再谈——欧洲工人一致宣称恢复波兰是自己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的对外政策的最全面的表达。中间阶级也曾“同情过”，而且现在也还“同情”波兰人，但是，这种同情并没有妨碍他们在1831年¹⁸⁰、1846年¹⁸¹和1863年¹⁴⁷对陷于危难的波兰人袖手旁观，甚至也没有妨碍他们纵容像帕麦斯顿勋爵这种波兰最凶恶的敌人一面在口头上维护波兰，一面干实际上给俄国帮忙的勾当。但是工人阶级就不同了。他们要干涉，而不是不干涉；只要俄国干涉波兰的事务，他们就主张同俄国打仗，而且每次波兰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时候，他们都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更充分地表达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这种普遍的天然的感情，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抵抗俄国对欧洲的侵犯——恢复波兰！”^①

西欧和中欧工人的这个对外政策纲领提交给工人阶级以后得到了一致同意，不过，如前所述，有一个例外。在法国工人中间，有一小部分属于已故比·约·蒲鲁东的那个学派。这一学派与大多数先进的有思想的工人完全不同；它把他们叫作无知蠢人，在大多数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上都与他们背道而驰。在对待他们的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蒲鲁东主义者充当被压迫的波兰的审判官，像斯泰利布里奇的陪审团一样，宣判波兰是“罪有应得”。他们称赞俄国是未来的伟大国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民族，像美国那样无足轻重的国家与之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他们指责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说它推崇波拿巴主义的民族原则¹⁸²，说它公然把高尚的俄罗斯人算在文明欧洲范

① 参看本卷第507页。——编者注

围以外,而这是违反世界民主和各国友好原则的严重恶行。这就是他们的责难。¹⁸³丢开民主的词句,立刻就可以看出,这同各国极端保守派关于波兰和俄国的言论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此类责难是不值一驳的;但是,由于这些话出自工人阶级一部分人——尽管是很小一部分人——之口,所以有必要再来把波兰和俄国的问题提出来,论证一下我们今后可以称之为联合起来的欧洲工人的对外政策是什么。

可是,为什么在谈到波兰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提一个俄国呢?难道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强国没有参加对波兰的掠夺吗?难道它们不也是奴役着波兰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并同俄国一起镇压波兰的任何民族运动吗?

大家很清楚,奥地利曾经怎样拼命地避免参与波兰的事情,曾经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瓜分计划抑制了多么久。²⁸波兰曾是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天然同盟者。从俄国成为威胁的力量的那一刻起,最符合奥地利利益的,莫过于在奥地利和那个新兴帝国之间保持着波兰的存在。奥地利只是在看到波兰的命运已经决定,不管有没有它参加,另外两个强国都决心要消灭波兰的时候,才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参与了瓜分一份领土。其实早在1815年它就主张恢复独立的波兰;1831年和1863年,它曾经准备为此目的而打仗,并放弃自己那一份波兰领土,只要英国和法国支持它。在克里木战争⁹³时期也是如此。这样说,并不是为奥地利政府的总的政策进行辩护。奥地利经常都在证明,压迫弱小民族是奥地利统治者乐于干的事情。不过,在波兰问题上,自我保护的本能超越了对新领土的贪欲和政府惯用的政策罢了。因此,目前不必去谈奥地利。

至于谈到普鲁士,它占据的那一份波兰领土很小,没有多大意义。它的朋友和盟国俄国施展本领,把它在三次瓜分中所得到的竟

然弄走了十分之九。而留在它手上的这一点点波兰领土，却像梦魇一样压得它透不过气来。这一点点波兰领土把它拴在了俄国的凯旋车上，使得它的政府甚至在 1863 年和 1864 年能够毫无阻碍地在普属波兰，以后更进而在全国所有其他地方，破坏法律，侵犯人身自由、集会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这就完全败坏了中间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中间阶级曾因害怕在东部边界上失去几平方英里的土地，竟听任政府无法无天地迫害波兰人。不仅是普鲁士的工人，而且全德意志的工人在恢复波兰这个问题上，都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有着更大的利害关系，而且每次革命运动都证明他们明白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恢复波兰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摆脱对俄国的臣服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普鲁士也不必去谈了。什么时候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到那个时候，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也不必去谈了，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二

致《共和国》周报编辑

阁下：

有人说，要求波兰独立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则”¹⁸²，而这个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而炮制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东西。这个“民族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 1815 年的条约¹⁸⁴划定的欧洲各国疆界，只是方便了外交界，特别是方便了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无论是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于是，波兰分裂了，德意志分裂了，意大利分裂了，更不用说居住在东南欧的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的许多小民族了。因此，对于波兰、德意志和意大利来说，争取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在 1821—1823 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尝试¹⁸⁵被镇压下去以后，并且在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⁸⁶以后，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出某种共同的纲领，被压迫被分割民族的解放和统一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¹⁸⁶ 1848 年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民族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¹⁸⁷。关于欧洲每一个大民族在一切内部事务上都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受邻邦的干预这一点，的确不会有两种意见，只要这种权利不侵犯别国自由。事实上，这种权利是所有民族内

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德意志在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帮助奥地利奴役意大利的同时，还怎么能够追求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帝国的彻底解体正是德意志统一的首要的条件！

欧洲各个大民族所享有的这种政治独立的权利，已经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那么工人阶级就尤其不能不同样予以承认。实际上，这只不过就是：承认各个国家的工人为自己要求享有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也承认其他无疑具有生命力的大民族同样享有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但是，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同情，仅仅针对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已清楚确定的民族，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它们既没有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此事有关；至于俄国，只能说它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路易-拿破仑，这位“承天命和顺民意”的皇帝，于1851年政变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找一个民主化了的、听起来很得人心的名称。有什么能比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分离出去的每一小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自由主义呢？只是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 *Nations* [民族]，而是 *Nationalities* [民族]了。^①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来说，无疑有别于英格兰

^① “民族原则”原文是“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而不是“principle of nations”。——编者注

人,然而,谁也不会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的残余叫做民族,就如同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一样。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的母语是法语,同德意志境外有许多人说德语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情况看来肯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它的本身的某些处于边远位置的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在多数情况下参加了某一其他民族的民族生活,以至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阿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意志,就像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不愿在政治上再归附于法国一样。于是,政治上形成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大都在其内部有了一些外来成分,这些外来成分构成了同邻邦的联系环节,从而使本来过于单一呆板的民族性格丰富多彩起来,这毕竟是一件大好事。

在这里我们就看出了,在“民族原则”与民主派和工人阶级关于欧洲各个大民族[nations]享有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利的老观点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原则”完全不触及欧洲那些有历史地位的民族的民族生存权利这个大问题,如果说它触及的话,那也只是要把水搅浑而已。民族原则提出了两类问题:首先是这些有历史地位的大民族之间的分界线问题;其次是关于那些民族的许多小残余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过去都曾或长或短地活跃于历史舞台,后来终于被融入某个更有生命力因而更能克服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之中而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民族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以民族原则的眼光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面前,根本没有历史可言、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活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

年历史、民族生命力丝毫未减的意大利人是差不多的；威尔士人和马恩人，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尽管这是荒谬的——像英格兰人一样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¹⁸⁸。整个是谬论。这一谬论披着讨人喜欢的外衣以便迷惑浅薄者的眼睛，它可以作为便当的漂亮话来使用，也可以搁置一边，看情况的需要而定。

此谬论虽浅薄，却需要比路易-拿破仑更聪明的头脑才能发明得出来。民族原则远非波拿巴为了支持波兰复兴而发明的，它不过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而发明的。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就是以民族原则为借口吞并了古老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一百多年了，俄国现在每天都在使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①、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意志境内的昔日斯拉夫民族的残余吗？甚至此时此刻，俄国政府还在让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普兰人中间，试图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的思想，即在欧洲的极北地区把“大芬兰民族”恢复起来——当然是在俄国的保护之下。被压迫的拉普兰人的“痛苦的呼号”在俄国报刊上响得很厉害——并非来自那些被压迫的游牧人自己，而是来自俄国的代理人，——是啊，让这些可怜的拉普兰人去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而不是只限于讲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压迫！说真的，民族原则只有在东欧才能够发明出来。在那里，一千年来亚洲人一次接一次的入侵有如潮涌，把大批大批的混杂的民族残余遗留在岸边，这些混杂的民族残余现在连民族学家也难以分辨清楚。在那里，杂居着土耳

① 卢西人是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旧称)的一支。——编者注

其人、讲芬兰语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还有约十多个斯拉夫部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纷繁紊乱，无以复加。这就是制造民族原则的基础，而俄国是怎样在那里把民族原则制造出来的，我们以后将以波兰为例加以研究。

三

民族理论用于波兰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的人。波兰的多数居民即它的核心力量,无疑是讲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1390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¹⁸⁹,后者迄至1794年最后一次瓜分波兰⁴⁸时,一直是波兰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立陶宛大公国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族。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掌握在本地的立陶宛人手里。立陶宛人所讲的语言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迥然不同。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征服,而日耳曼移民却发现立陶宛的大公并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其次,在现今的波兰王国的南部和东部,居住着白俄罗斯人,他们所讲的语言介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之间,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语。最后,在南部省份居住着所谓的小俄罗斯人^①,现在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大俄罗斯语(我们通常称之为俄语)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是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意味着恢复一个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

当旧的波兰国家由于同立陶宛合并而组成时,俄国的情形是怎

① 小俄罗斯人是乌克兰人的旧称。——编者注

样的呢？那时，它还处于150年前就被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携手赶回第聂伯河以东的蒙古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只是经过长期的斗争，莫斯科的大公们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枷锁，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①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加在了自己的盾形徽章上，以此表明他要当他们的继承人和未来的复仇者。众所周知，从那时起俄国人努力的目标就是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这是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对君士坦丁堡的称谓。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的吞并欲望。可是，波兰人当时是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勇敢的民族，他们不仅知道怎样为自身而战，而且还知道怎样以牙还牙：17世纪初，他们甚至把莫斯科占领了好几年¹⁹⁰。

当政贵族逐渐腐化，中间阶级赖以发展的力量不足，连年战争把国家弄得一片荒芜，这一切终于摧毁了波兰的威力。一个顽固地保持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当它的所有邻邦都在进步，形成了中间阶级，发展了贸易和工业，建立了大城市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就注定要灭亡。毫无疑问，是贵族毁灭了波兰，而且是彻底地毁灭了它。贵族在毁灭了波兰以后，又就此事互相责骂，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外国人。1700—1772年的波兰历史，不过是俄国篡夺波兰统治权的记录，而俄国之所以能够篡夺，就在于波兰贵族的腐败。俄国兵几乎总是占领着这个国家，波兰国王即使自己并不想做卖国贼，但也越来越被置于俄国大使的手心里。这种把戏耍得那样成功、那样长久，以致当波兰最后被灭亡的时候，整个欧洲都没有提出一声抗议，而人

① 伊万三世。——编者注

们感到惊奇的只是，俄国怎么这样大方，把那么大一块地方割给了奥地利和普鲁士。

特别有趣的是实现这次瓜分的方式。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开明的“舆论”。虽然《泰晤士报》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个东西，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18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而且它也是用心去争取这种舆论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开明人士、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标榜最开明的原则，她竟然能够如此成功地欺骗他们，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斯^①”，宣称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是信教自由的捍卫者。

信教自由——这就是为了消灭波兰所需要的字眼。波兰在宗教问题上从来就是极其自由的，有事实为证：当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其他地方都遭到迫害时，他们在这里却找到了避难所。东部各省的大部分居民信奉希腊正教，而波兰本地人则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些希腊正教徒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在16世纪时受劝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被叫做合并派希腊正教徒¹⁹¹，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所有各方面仍然保持原先的希腊正教信仰。他们主要是农奴，而他们的高贵主人差不多全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按民族来说是小俄罗斯人。俄国政府在本国除希腊正教外不容忍其他任何宗教，把叛教当作罪行加以惩罚；它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人的地盘，与此同时，它把俄国农奴身上的镣铐钉得更加牢固——就是这个俄国政府，很快就

①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编者注

对波兰下手了,它以信教自由的名义,因为据说波兰压迫希腊正教徒;它以民族原则的名义,因为东部这些省份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因此他们应当并入大俄罗斯;它以革命权利的名义,把农奴武装起来去反对他们的主人。俄国是完全不择手段的。有人说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是极端的革命,可是,将近一百年以前俄国在波兰就发动了这样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阶级战争。当时,俄国的士兵和小俄罗斯的农奴并肩去焚烧波兰领主的城堡,这只是为了给俄国的吞并作准备;吞并一实现,还是那些俄国士兵就又把农奴拖回他们领主的枷锁之下。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信教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因为民族原则当时在西欧还未成时尚。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小俄罗斯农民的眼前摆弄这一原则了,而且从那时起,它在波兰事务中就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俄国最大最主要的野心,就是把所有的俄罗斯部落都统一到那位自称所有俄罗斯人的专制君主(Samodergetz vseckh Rossyiskikh)^①的沙皇统治之下,它把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都包括在这所有俄罗斯人之中。为了证明它的野心仅止于此,在三次瓜分中它都十分谨慎,只兼并白俄罗斯省份和小俄罗斯省份,而把波兰人居住的地区,甚至把小俄罗斯的一部分(东加利西亚)留给自己的同谋者。可是,现在的情况怎样呢? 1793年和1794年被奥地利和普鲁士兼并的省份,现在却大部分以波兰王国的名称处于俄国统治之下,并且不时在波兰人中间唤起一种希望:只要他们服从俄国的最高权威,放弃对昔日立陶宛省份的一切要求,他们就可以期望把所有其他波兰省份统一起来,恢复波兰,以俄国皇帝为国王。如果在目前这个

^① 这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

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打起来,那就非常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这场战争,最终将不是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归并于普鲁士或威尼斯归并于意大利,而是使奥属波兰,和至少是一部分普属波兰归并于俄国。¹⁹²

关于民族原则用于波兰事务就谈到这里。

弗·恩格斯写于 1866 年 1 月
底—4 月 6 日

载于 1866 年 3 月 24、31 日和 5
月 5 日《共和国》周报第 159、
160 和 165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警 告¹⁹³

不久以前，伦敦的裁缝帮工们为了对抗大部分是大资本家的伦敦裁缝师傅们，实现自己的要求，成立了一个全行业的联合会¹⁹⁴。这样做不仅是要使工资同生活用品上涨的价格相适应，而且是要结束这个行业中工人们受到的极其恶劣的待遇。师傅们企图通过主要从比利时、法国和瑞士招募裁缝帮工来挫败这个计划。针对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报纸上发出了警告，收到了圆满的效果。¹⁹⁵伦敦裁缝师傅们的诡计破产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满足工人们的合理要求。

师傅们在英格兰遭到失败后，现在又企图从苏格兰开始进行反击。鉴于伦敦事件，他们在爱丁堡也不得不先同意将工资提高15%。但是背地里他们却派代理人到德国，主要是汉诺威和梅克伦堡，去招募裁缝帮工，输入爱丁堡。第一批裁缝帮工已经取道水路动身了。同把印度的苦力输入牙买加一样，这种输入的目的就是要使奴隶制度永远存在下去。如果爱丁堡的师傅们得以利用从德国输入劳动力的办法收回他们已经作出的让步，那么这必然反过来影响到英国。结果没有人会比德国工人自己更遭殃，他们在大不列颠的人数比所有其他大陆国家的工人都要多。而新输入的工人在异邦又将

完全孤立无援,很快就会沦落到类似贱民的地位。

此外,向国外证明德国工人也像自己的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兄弟们一样,能够维护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不会在资本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充当资本的顺从的雇佣兵,对于德国工人来说,是关乎荣誉的事情。

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卡尔·马克思

1866年5月4日于伦敦

德国裁缝帮工如果想更详细地了解英国的情况,请按以下地址寄信给伦敦裁缝联合会德国分会:伦敦瑞琴特街海登巷王冠饭店,阿尔伯特·弗·豪弗。

卡·马克思写于 1866 年 5 月
4 日

载于 1866 年 5 月 13 日《德意志
工人总汇报》第 176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德国战争短评¹⁹⁶

弗·恩格斯写于 1866 年 6 月
18 日—7 月 5 日

载于 1866 年 6 月 20、25 和 28
日,7 月 3 日和 6 日《曼彻斯特
卫报》第 6190、6194、6197、6201
和 620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以下几篇短评的目的在于纯粹从军事观点对当前的战事进行公正的评述,并尽可能地指出这些事件对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最先实施决定性打击的地区必将是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边境。意大利的战争在四边形要塞区¹⁹⁷被攻占以前恐怕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而攻占四边形要塞区则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战斗。在西德意志可能会有不少军事行动,但是从投入的兵力来看,所有这些行动的结局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战事相比较,仅具有次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将暂时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放在波希米亚地区。

想要判断交战双方军队的力量,实际上只计算步兵就够了,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普两军骑兵力量之比是3比2。两军炮兵与步兵的比例大致相同,每1000人约有3门炮。

普鲁士步兵包括253个基干营⁹¹、 $83\frac{1}{2}$ 个后备营和后备军(年龄为27—32岁的第一类后备军⁸⁷)的116个营。在此情形下,后备营和后备军组成要塞的警备部队,此外还要用来对付德意志诸小邦,而基干部队则集中于萨克森及其周围以对付奥地利的北方军队。除了占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约15个营以及原先担任拉施塔特、美因茨和法兰克福警备部队而现在集中在韦茨拉尔的另15个营以外,留做主力军的约有220个步兵营。连同骑兵、炮兵以及可以由

邻近要塞抽调的后备军部队，这支军队约有 30 万人，编成 9 个军。

奥地利的北方军队有 7 个军，每一个军的兵力都要比普鲁士的军强得多。目前，关于它们的人员和编制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一支约有 32—35 万人的军队。因此，看来奥军肯定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普鲁士军队的总指挥将是普鲁士国王^①，也就是说，一位阅兵场上的士兵，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平庸的人，性格软弱，但又十分顽固。在他周围的首先将是毛奇将军——一位优秀的军官——为首的军队总参谋部，其次是由私人亲信组成的他的“军事枢密室”，再次则是其他可能被他召来做侍从而待任用的将官们。难以想像，有哪种制度能够比由总司令部本身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制度更有效。在这里，在军队参谋部和国王枢密室之间从一开始便自然会产生钩心斗角，双方都要争夺最高的权力，都要制订并坚持自己得意的作战计划。单由于这一点，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统一的目的和前后一致的行动。这以后就是召开无休无止的军事会议，这样的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十次有九次是以采取某种折中办法而结束，而这在作战当中是最坏不过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命令常常同昨天的相矛盾，而当情况复杂或变得危急时，却又不发出任何命令，而让一切听天由命。正像拿破仑常说的：“命令，反命令，混乱”。没有一个人负责，因为不负责任的国王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没有明确的命令，就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当今国王的父亲^②在 1806 年的战役中便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指挥的；结果是耶拿和奥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尔施泰特的失败以及普鲁士军队在三个星期之内全军覆没⁹⁵。没有理由认为当今国王比他的父亲更有魄力；同时，如果说他已找到俾斯麦伯爵这样一个在政治方面可以绝对信赖的人，那么在军队里则没有一位有足够声望的人能够作为可以绝对信赖的人在军事方面担当全部责任。

奥地利军队由贝奈德克将军全权指挥，他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至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最高指挥方面的优势无疑是在奥军方面。

普鲁士军队划分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在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之下，由第一、二、三、四、七、八军组成；第二军团，在王储^①指挥之下，由第五、六两军组成。作为总预备队的近卫军大概将合并于第一军团内。这种划分法不仅破坏指挥的统一，而且常常会使这两个军团沿不同的作战线运动，需要彼此协调地行军，并把它们的会合地点放在敌人行动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当它们应当尽可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划分法却把它们分开。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⁹⁵和奥地利军队在1859年¹⁹⁶都是在极相似的情况之下由于采取同样的做法而被击败的。至于这两位指挥官，王储作为军人还是个未知数，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丹麦战争⁸⁸中则确实没有能表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统帅。

奥地利军队没有采取这样的划分法；各军团指挥官直接隶属于贝奈德克将军。因此，在军队的组织方面，奥军也优于自己的敌人。

普鲁士士兵，特别是预备兵以及用来补充基干部队的缺额的后备军士兵（他们的数目相当大），是被迫来作战的；奥军则相反，他们早已希望与普鲁士一战，并且焦急地等待着出征的命令。因此，他们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在士气方面也同样占着优势。

普鲁士已有 50 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它的军队整个说来是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具有一切和平时期的军队所特有的那种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规的缺点。毫无疑问，在最近时期，特别是自 1859 年以来，他们曾经多方努力摆脱这些缺点；但是 40 年来所养成的习惯并不是那样容易根绝的，特别是在最重要的职位上，也就是在校级军官当中，仍然有大量迂腐的庸才。而奥军在经历了 1859 年的战争后，现在已经从根本上克服了这个缺陷，而且最充分地利用了自己以很高的代价所换取的经验。毫无疑问，在具体的组织方面、对战争的适应性和经验方面，奥军也同样优于普军。

除了俄国军队以外，现在只有普鲁士军队才把密集的纵队作为自己的正规战斗队形。设想一下，如果把 1 个英国步兵营的 8 个连排成四分之一间隔的纵队，正面不是 1 个连，而是 2 个连，那么，这样的一列 2 个连组成的四列纵队，就是“普鲁士式的攻击纵队”。对线膛武器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由于线膛炮可以从 2 000 码的距离对它发射炮弹，所以这样的队形几乎不可能接触到敌人。只要有一发炮弹在这一大群人中间爆炸，这个营在这一天当中恐怕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

奥地利军队采用了法国式的松疏的纵队，它几乎不能叫做纵队；它更像互相前后间隔 20—30 码的两列或三列横队。这样的队形是不会比展开的横队遭受更大的炮火杀伤的。因此，战术队形方面的优势也在奥军方面。

普军只有两个因素能与奥军的所有这些优势相抗衡。他们的军需机构无疑是比较好的，因此他们军队的给养会比较好些。奥军的军需机构也和奥地利一切行政机构一样，是行贿受贿和营私舞弊的

巢穴，它未必比俄国的好些。甚至现在我们就听说，军队的给养很坏并且不正常，而在战场上和在要塞里就更糟了，因此对于四边形的要塞区的要塞来说，奥地利行政机构可能是比意大利炮兵更为危险的敌人。

普军的第二个优势是他们的武器比较好。虽然他们的线膛炮无疑比奥军的好，但是这在开阔地上起不了很大的作用。普军和奥军线膛枪的射程、弹道和射击准确性几乎是相等的；但是普军有后装枪，他们能在队列里以每分钟至少四发的速度进行不间断的准确的射击。这种武器的巨大优越性已在丹麦战争中得到证明，而奥军对这一点无疑会体验得更深刻。如果奥军不用很长时间进行射击，而是立刻进行刺刀冲锋（据说贝奈德克曾指示他们这样做），那么他们便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在丹麦战争中，普军的损失从未超过丹麦军队的损失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只有十分之一；就像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的一位军事记者所完全正确指出的那样，丹麦军队几乎到处都被敌军实际参战的少数兵力所击败^①。

然而，尽管普军有撞针枪，形势仍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希望不致因为奥军在指挥、组织、战术队形和士气方面的优势，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不致因为普军自己的指挥官而在第一次大的会战中就被击败，那么他们就必须表现出一种为了一支处于和平状态达 50 年之久的军队所不大可能有的英勇精神。

^① 见《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事力量》，载于 1866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5507 号。——编者注

二

人们开始对波希米亚边境上的两大军队显然的无所作为表示焦急。但是这种迟滞是有许多原因的。奥军和普军都很清楚地认识到当前这一场可能决定整个战役胜负的冲突的重要性。双方都匆匆地向前线增调所能动用的一切兵力；奥军派出它的一些新编部队（各步兵团的第四和第五营），普军则派出最初仅准备担任警备勤务的一部分后备军部队。

同时，无论哪一方似乎都在千方百计地算计敌军，使自己能在最有利的战略条件下开战。为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必须翻阅一下地图，仔细研究一下两军配置的地区。

假定柏林和维也纳是两军正常的退却点，因而奥军将力图占领柏林，普军则力图占领维也纳；这时就有三条路线可供双方行动。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以便在行军中能利用这个地区的资源维持生存，同时为了迅速前进，它不得分成几个纵队沿几条平行的道路行军；因此军队的正面的宽度根据敌人的远近和道路间的距离的大小可能会有 16—60 英里。这一点应当记住。

第一条路线是沿易北河和莫尔多瓦河左岸，经过莱比锡和布拉格。很显然，在这一条路线上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必须两次渡河，并且第二次是在敌军面前渡河。假使某一方军队沿这条路线前进，企图迂回对方的翼侧，那么后者走比较直因而比较短的道路，仍然能

比敌人的迂回部队先期到达河线,同时如果能成功地将迂回的部队击退,便可以直驱敌人的首都。既然这条路线对于双方同样不利,因此可以不去考虑它。

第二条路线是在易北河与苏台德山脉(西里西亚同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分界的山脉)之间沿着易北河右岸行进。它几乎是由柏林到维也纳的直线。在目前位于两军之间的那一段路线上,有一条由勒包到帕尔杜比茨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横贯在南、西两面以易北河为界而东北面以山为界的那一部分波希米亚地区。在这个地区有许多良好的道路,如果两军彼此相向运动,那么冲突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第三条路线是经过布雷斯劳,再穿过苏台德山脉。这个山脉在摩拉维亚边境一带并不很高,有几条很好的道路可以通过,但在波希米亚边境的理森山则变得高耸而又险峻了。这里道路很少;实际上,在特劳特瑙与赖兴贝格之间 40 英里内,山脉的整个东北部没有一条可作军用的道路穿过。在那里仅有的一条道路,由希尔施贝格通向伊泽尔河谷,在奥地利边境突然中断。由此可见,长 40 英里的这一道障碍至少对携带无数辎重的大军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必须在理森山西南翻越山岭,才能向布雷斯劳或经由布雷斯劳进军。

两军如果在这条路线上展开战斗,那么他们各自的交通线将是怎样的呢?

普军如由布雷斯劳向正南方向进攻,便会暴露他们通往柏林的交通线。如果奥军强大到对胜利几乎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就可以让普军前进到奥尔米茨营垒,在那里挡住普军,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可以向柏林挺进,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来恢复暂时被破坏的交通线;或者他们可以在普军各纵队下山的时候去迎击他们,如果得胜,就把他们击退到格洛高和波森,这样一来柏林和普鲁士领土的大部分地区就

会任他们摆布了。因此，普军只有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时，取道布雷斯劳进军才是适当的。

奥军的地位则大不相同。他们有优势，那就是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领土位于布雷斯劳东南，也就是在由柏林到布雷斯劳这条线的**直接延长线上**。他们只要在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北岸构筑工事以保证首都不致遭到突袭，他们便可以暂时甚至较长期地放弃他们与维也纳之间的直接交通线而从匈牙利得到人员和物资的补充。这样一来，他们经由勒包和布雷斯劳向山北或者山南行进都同样安全；他们具有比他们的敌人远为广泛的机动自由。

而且，还有更多的原因使得普军不得不慎重从事。由波希米亚北部边境到柏林的距离大约不及到维也纳距离的一半；柏林要暴露得多。维也纳有多瑙河作为屏障，被击败的军队可以得到河的掩护，还有该河北岸的工事以及奥尔米茨营垒的护卫，如果奥军主力在战败后退守奥尔米茨，普军想要不被注意地安然通过是不可能的。但柏林除了野战军以外却没有任何的屏障。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我们第一篇文章所详述的那些条件之下，普军所应当做的，显然是只能采取守势。

同样的一系列情况以及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几乎使奥地利不能不采取攻势。只要一次胜利就可以使它获得很大的战果，而失败却不会粉碎它的抵抗力量。

这次战役的战略计划从基本的特点来看必然是极其简单的。无论哪一方首先发起进攻，它都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或者从理森山向**西北**进行佯攻而从理森山向东南进行真正的进攻，或者相反。长达 40 英里的屏障是战场上的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双方军队的行动都必然要在它的周围展开。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在这个屏障的两端进行

战斗的消息,而在此后数日内便可以看出真正的进攻方向,还可能看出第一个战役的命运。但我们仍然认为,对于这样两支彼此对峙而行动笨拙的军队来说,最直接的路线就是最安全的路线;如此庞大的军队分成独立纵队沿不同的道路通过难行的山地,这是困难的和危险的,因此这两支交战的军队大概一定会沿勒包-帕尔杜比茨的路线行动。

到目前为止,军队的实际调动情况如下: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内,普军在蔡茨到格尔利茨的这一段萨克森边境上集中了萨克森军团,在希尔施贝格到尼斯河之间集中了西里西亚军团。到6月10日前,这两个军团彼此靠近,其右翼在托尔高附近的易北河上,极左翼则在瓦尔登堡附近。从12日到16日,由第一、五、六军及近卫军编成的西里西亚军团重新向东扩展,这次扩展到拉蒂博尔,也就是到了西里西亚的最东南角上。这好像是佯动,特别是应该经常与主力共同行动的近卫军突出到前面更像是佯动。如果这不仅仅是佯动,如果不设法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地把4个军调回格尔利茨的话,那么把这12万多人集结在辽远的角落里显然是一个错误;他们的一切退路会被切断,并且无疑地会失去与其余军队的一切联系。

关于奥军,除了知道他们已集中在奥尔米茨周围这一事实以外,我们便知道得很少了。在奥军兵营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有40 000人的第六军在19日由魏斯基兴到达奥尔米茨,这证明他们在向西运动。他又补充说:21日,司令部将转移到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边境上的特吕包。^①如果这一报道不太像是故意传至伦敦以便

^① 见《奥地利军队》,载于1866年6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5532号。——编者注

再用电报转至普鲁士司令部而使其陷入迷惑的一种谣言的话,那就证明是朝这个方向转移。但是像贝奈德克那样严守军事秘密而且对新闻记者又是那样反感的一位将军,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恐怕是不会在19日便告诉记者说21日他的司令部将在什么地方的。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们再简单地谈谈在西北德意志的军事行动。普军在那里的部队比我们原来知道的还要多。他们把15个营配置在荷尔斯泰因,12个营配置在明登,18个营配置在韦茨拉尔。由于他们的迅速的集结行动,并且在这一行动中部队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他们坚持强行军的能力,他们在两日内便占领了科布伦茨到爱森纳赫一线以北的全部地区和王国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全部交通线。约7000人的黑森部队逃脱了,但10000或12000人的汉诺威军沿直线向法兰克福退却的道路已被切断,并且早在17日,普鲁士第七军的余部计12个营连同2个科堡营就已由易北河到达了爱森纳赫。因此,汉诺威军几乎已被团团围住了,只有在普军蠢笨得出奇的情况下,他们才能逃脱。等他们的命运决定以后,50个普鲁士营的兵力便马上可以用来对付达姆施塔特亲王亚历山大正在法兰克福组编的盟军,这支盟军将包括约23000名符腾堡人、10000名达姆施塔特人、6000名拿骚人、13000名巴登人(现在刚刚开始动员)、7000名黑森人和12000名奥地利人(已从萨尔茨堡出发),总共约65000人,他们还可能得到10000到20000名巴伐利亚人的增援。据报道,这些军队约有60000人已在法兰克福集结,亚历山大亲王在22日重新占领吉森,决心向前推进。但是这没有多大意义。普军在没有集中好足够的兵力以前是不会向他进攻的,但在集中好兵力以后,拥有各兵种70000人同时又占有武器上的优势的普军,一定会把这支杂牌军队迅速收拾掉。

三

第一次大会战不是发生在波希米亚,而是发生在意大利。四边要塞区¹⁹⁷又给了意大利人一个战略教训。这个著名阵地的威力,和一切比较重要的筑垒阵地的威力一样,与其说在于它的四个要塞的高度防御能力,不如说在于这些要塞位于在军事上有其突出特点的地带,它们几乎总是引诱、有时则是迫使进攻的军队分兵进攻两个不同的地点,而防守的军队却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去对付其中一路进攻军队,以优势的兵力消灭它,然后转过来对付另一路进攻的军队。意大利军队就是被引诱,犯了这种错误。国王^①率 11 个师驻扎在明乔河附近,而查耳迪尼则率 5 个师进驻波河下游蓬泰拉戈斯库罗和波莱塞拉附近。一个意大利师有 17 个营,每营 700 人。因此,维克多-艾曼努埃尔的兵力,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至少有 120 000—125 000 人,而查耳迪尼约有这个数目的一半。当国王于 6 月 23 日渡过明乔河时,查耳迪尼则应在下游渡过波河而插入奥军后方行动。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关于采取后一个行动的任何可靠的消息。查耳迪尼率领的这 60 000 人的出现可能、也许已经在上星期日扭转了库斯托扎会战¹⁹⁹的局势,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足以弥补大会战中所受的损失的任何优势。

①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加尔达湖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两条支脉之间,这两条支脉在湖的南面形成两片丘陵地,明乔河即取道其间流入曼图亚的咸水湖。这两片丘陵地构成坚固的军事阵地;丘陵地的南坡俯视着伦巴第平原,而且在火炮射程内控制着这一平原。它们在战史上是很出名的。佩斯基耶拉和洛纳托之间的西面的丘陵地曾经是1797年斯蒂维耶雷堡会战和洛纳托会战²⁰⁰以及1859年索尔费里诺会战²⁰¹的战场。在佩斯基耶拉和维罗纳之间的东面的丘陵地,是1848年三天的会战²⁰²的争夺目标,也是上星期日的会战争夺的目标。

东面这片丘陵地的一面朝明乔河方向逐渐向下倾斜,直到瓦莱焦附近形成平原;另一面向东南成长弧形朝阿迪杰河方向逐渐向下倾斜,直到布索伦戈附近的河岸。它由北向南被一个深谷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有一条小河蒂奥内河由这个深谷中流过;因此,由明乔河前进的军队首先要强行渡河,并且紧接着就又要碰到这个深谷的阻碍。在走向平原的坡地边缘,在深谷以东,有下列村庄:库斯托扎在最南端,往北,依次为索马坎帕尼亚,索纳和圣朱斯蒂纳。由佩斯基耶拉到维罗纳的铁路在索马坎帕尼亚附近穿过丘陵地,而公路则在索纳附近穿过丘陵地。

1848年,皮埃蒙特军队在夺取佩斯基耶拉后,便封锁了曼图亚并把军队由曼图亚推进到加尔达湖畔的里沃利,其中路军占领了东面这片丘陵地。7月23日,拉德茨基由维罗纳率7个旅向前运动,在中央突破了敌人拉得过长的防线后,占领了这片丘陵地。7月24日和25日,皮埃蒙特军队企图夺回这个阵地,但在7月25日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他们立刻经过米兰退到了提契诺河西岸。这第一次库斯托扎会战便决定了1848年的战局。

意大利军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上星期日所发生的会战的电讯颇

为矛盾,但是我们参照了另一方面的电讯后,我们对于会战当时的情况就相当明了了。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打算让他的第一军(杜兰多将军率领,有4个师,共68个营)在佩斯基耶拉与维罗纳之间占领阵地,以便掩护对佩斯基耶拉可能发动的围攻。这个阵地无疑地应当是索纳和索马坎帕尼亚。第二军(库克基亚里将军率领,有3个师,共51个营)和第三军(德拉罗卡将军率领,兵力与第二军相同)应同时渡过明乔河以掩护第一军作战。第一军一定是在萨利翁泽附近或以南渡河并立刻朝丘陵地方向运动;第二军似乎是在瓦莱焦附近而第三军则似乎是在戈伊托附近渡河并向平原前进。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星期六即6月23日。奥军在明乔河附近执行警戒勤务的由普尔茨指挥的旅,缓慢地向维罗纳退却。在星期日,也就是索尔费里诺会战周年纪念日^①,全部奥军由维罗纳出发迎击敌人。他们似乎在意军未到达前便及时占领了索纳和索马坎帕尼亚的丘陵地以及蒂奥内深谷的东缘。后来战斗主要是抢占通过深谷的隘路。在最南端平原上的意大利的两个军能够同丘陵地上的意大利第一军配合行动,因此库斯托扎便落入他们手中,平原上的意军渐渐地朝维罗纳方向逼进,企图攻击奥军的翼侧和后方;奥军将派出部队迎击他们。因此两军的战线最初是东西相对峙,而现在则转了90度,奥军面向南,意军面向北。但是因为丘陵地从库斯托扎起向东北倾斜,所以意大利第二军和第三军的这种翼侧运动不能对这片丘陵地上的第一军阵地发生直接的影响,因为他们如果要前进到足够远的距离,他们这些侧击部队本身就会遭到危险。因此,奥军似乎仅仅用了足以击退第一次攻击的兵力来牵制意大利第二军和第三军,而以他们所能够出动的

^① 1866年6月24日。——编者注

全部兵力向第一军攻击并借数量上的优势击溃了它。他们取得了全胜。第一军经过激战后被击退了,最后奥军攻占了库斯托扎。这样一来,越过库斯托扎向东和向东北前进的意军右翼看来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又发生了争夺这个村庄的新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意军的被截断的联络一定又恢复了,同时奥军停止了从库斯托扎向前推进,但是,村庄仍在他们手中,当夜意军便不得不渡过明乔河回撤。

我们对会战所作的这个概述,不能看做是一种历史的记述(因为作为历史的记述来说还缺少很多的必要细节),而只能看做是根据手中的地图和根据军事常识使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不同的电讯彼此一致的一种尝试而已。同时我们相信:如果这些电讯大致正确和全面的话,那么我们的叙述就不会与会战的总的情景有太大的出入。

奥军被俘约 600 人,意军被俘约 2 000 人,并损失了几门火炮。这说明会战并不是什么灾难,而只是一种败北而已。双方兵力应该说是大约相等的,虽然很可能奥军投入战斗的部队要比他们的敌人少。意军有充分理由为自己庆幸,因为他们还没有被赶到明乔河以西;但是配置在明乔河与深谷之间宽 2—4 英里狭长地带上的第一军,面对着敌人的优势兵力,其处境是十分危险的。忽视有决定意义的制高点而把主力部队派往平原,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正像我们在上面指出的,把军队分散开,让查耳迪尼率领 60 000 人留在波河下游,而仅以其余的兵力进攻,这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意军能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互相配合进行机动,那么查耳迪尼就能协助其他部队在维罗纳获得胜利,然后再回师波河下游并且可以更加容易地渡河。事实上,看来他却留在头一天他所在的地点,而现在则不得不去迎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敌人。这时意大利人应当懂得,跟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贝奈德克

率领 26 000 名奥军曾在整整一日内抵挡住了人数比他多一倍的全部皮埃蒙特军队，直到他由于另一个军被法军击败才奉命退却。当时的皮埃蒙特军队比现在的意大利军队强得多，他们受过较好的训练，比较整齐，而且有比较优秀的军官。目前的意大利军队是不久以前才编成的，自然存在这类新编军队所特有的一切缺点。然而现在的奥地利军队却比 1859 年时强得多。民族热忱是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这种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甚至加里波第的“千人团”²⁰³也不仅仅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在 1859 年学会了服从命令和沉着应战的人。希望意大利军队的参谋部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轻率地对待奥地利的这支军队，这支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在实质上却比意军占优势，况且他们还占领着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

四

假设有一位年轻的普鲁士步兵候补军官或骑兵队旗手在应尉官考试时被问道：什么是普鲁士军队侵入波希米亚的最安全的计划？假定我们年轻的军官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部队分为大致相等的两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东迂回，而另外一路向西迂回，让它们在吉钦会合。”那么主考官对于这一答案会说些什么呢？他会告诉这位年轻的先生说，这个计划违反了战略上的两个首要原则：第一，绝不能把自己的部队分隔开，使得它们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应当让它们互相靠近；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进时，各纵队应在敌军活动范围以外的地点会合；因此上述的计划是一切计划中最坏的；这样的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完全没有敌军占领的场合下才能加以考虑，因此提出这种作战计划的人甚至不配晋升为尉官。

但是聪明而有学识的普军参谋部采用的正是这样的计划。这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意军在库斯托扎曾为之付出代价的那种错误，普军又重复了，并且当时的条件使得这种错误要糟糕十倍。意军至少知道，他们有 10 个师，在数量上超过了敌人。普军一定知道，如果他们将全部 9 个军加在一起，至多也只是在数量上与贝奈德克的 8 个军相等，而分兵两路后，就使这两路部队注定要被敌军优势兵力相继粉碎。要不是国王威廉做统帅，那么像这样的计划居然被组成普军参谋部的一批无疑很有才干的军官们加以讨论甚至

加以采纳,这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谁都没有料到,最高指挥权落到国王和亲王们手中所造成的恶果来得这样快和这样猛。普军目前在波希米亚进行着决死的战斗。如果两路普军在吉钦或者在其附近的会合受阻,如果其中每一路遭受失败被迫撤出波希米亚,而在退却中两军相距更远,那就可以说这一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那时,贝奈德克对于王储率领的军团向布雷斯劳的退却可置之不顾,而以他所有的兵力追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的军团,后者难免要全军覆没。

问题在于,奥军是否能够阻止这个会合。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在星期五即6月29日傍晚以后战事进展的消息。6月28日被埃德尔斯海姆将军赶出吉钦(这个地名波希米亚人叫做伊钦)的普军声称,他们在29日重新攻击了该城,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后消息。会合在那时还没有成功;当时有至少4个奥地利军和萨克森军的一部分兵力在与5个或6个普鲁士军进行战斗。

当王储军团的各个纵队下山进入波希米亚这边的谷地时,便遭到了奥军的迎击,奥军在谷地中比较开阔的地方占领了有利的阵地,因而能在比较宽的正面上抗击普军纵队,试图阻止普军展开;而普军则派出部队穿过两侧可以通行的谷地,袭击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这种情形在山地战中是常常发生的,而且这也是在山地战中常常能够捕获大量俘虏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和黑尔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将军的军团好像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通过了山口;最初的战斗发生在伊泽尔河一线,也就是几乎发生在两军出发地之间的中途。企图把最近三四天内接到的极端矛盾而又常常完全不可靠的电讯整理出一个头绪,使它们一致起来,那只能是白费力气。

战斗的结果必然是变化不定的；随着生力军的补充，胜利有时倾向这一方，有时倾向另一方。但是，直到星期五为止，总的结果似乎是有利于普军的。如果他们能坚守住吉钦，那么无疑地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就能会合，那时，他们就度过了最大的危险。在普军争取会合的决战中，双方大概都要集中大量的兵力，这一决战至少能够决定最近一段时间内的战役的进程。如果普军成了胜利者，那么他们便立刻解脱了自身造成的一切困难，但是他们本来可以不遭受这种不必要的危险而取得同样的、甚至更大的优势。

战斗似乎很激烈。最先同普军交锋的是奥地利“黑黄”旅，该旅在石勒苏益格曾在从丹讷韦克撤退的前一天攻击了上塞尔克附近的柯尼斯堡。“黑黄”旅是根据编成该旅的两团士兵的领章、袖章等的颜色而得名的，这个旅始终被认为是军队中最精锐的旅之一。但是它被针发枪击败了，并且其中一个团（由马尔提尼指挥）在连续五次攻击普军战线失利后已有 500 多人被俘。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德国骑士团第三营的军旗被夺走了。该团士兵完全是在维也纳招募的，它被认为是全军中最精锐的一个团。这样看来，最精锐的部队都已加入战斗了。对于普军这样一支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军队来说，这一次的确打得很漂亮。当实际宣战后，普军士气大不一样了，这主要是因为西北部的一小撮君主都被驱逐出去了²⁰⁴。这使部队产生了这样的思想，——无论这是否正确，我们只指出这个事实——即他们这一次应召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而战，先前忧郁不乐的预备兵和后备军士兵这时高声欢呼着越过了奥地利边境。这是他们所以能打得这样好的主要原因。但同时我们应当把他们取得的胜利多半归功于他们的后装枪；如果说他们终于摆脱了他们的将军十分荒唐地给他们造成的困难，那么他们就不能不感谢这种针发枪。关于这种枪

大大优越于前装枪的报道，这一次又是异口同声的。一个被俘的马尔提尼团的中士向《科隆日报》记者说道：

“我们确实做到了勇敢的士兵所能做的一切，但谁都经受不住这样急速的火力。”

如果奥军被打败了，那么与其归罪于贝奈德克将军或朗敏将军，还不如归罪于“通条”将军^①。

在西北部，曼托伊费尔将军的前卫在弗利斯将军指挥下向汉诺威军队发起了激烈的进攻，汉诺威军队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后，便投降了。因此，普军的59个营便可以用来对盟军作战。现在正是时候，普鲁士应当趁巴伐利亚尚未完全做好战争准备的时机做到这一点，否则，为了征服西南德意志，就需要动用更多的兵力。大家都知道，巴伐利亚一向行动迟缓并且不能及时做好战争准备，但是一旦完成了这些准备，它便可以出动60 000到80 000精锐部队参战。也许不久我们将会听到普军迅速集中在美因河并积极进攻黑森-达姆施塔特亲王亚历山大及其军队的消息。

^① 前装枪装弹用的通条。——编者注

五

普军一开始打这次战役便犯了极大的战略错误,但后来它在战术上作了惊人的努力,结果在整整 8 天之内便把这个战役胜利地结束了。

在前一篇短评里我们曾经说过:普军以理森山为界分兵两路侵入波希米亚的这种计划,只有在波希米亚境内没有被敌军占领的场合下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贝奈德克将军那种不可思议的计划似乎主要是在于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波希米亚西北角,也就是我们一开始预料会展开决战的地方,似乎只有两个奥地利军——第一军(克拉姆-加拉斯指挥)和第六军(朗敏指挥)。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引诱普军陷入圈套的话,那么贝奈德克竟做得这样好,以致自己反而陷入圈套了。普军分兵两路前进,两路之间有宽达 40—50 英里的难以通行的地区,会合点距离出发点又有整整两日行程,而且还位于敌人战线内,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动,如果不是贝奈德克的行动迟缓得出奇而且普军进行了奇袭和使用了后装枪,那么这样一种机动会导致惨败。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 3 个军(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二军,第二军为预备队)在难以通行的山脉以北,经过赖兴贝格向前推进,黑尔瓦尔特将军则在山脉以南率领一个半军(第八军和第七军的 1 个师)向前推进。同时,王储率领第一军、第五军和第六军以及近卫

军在格拉茨附近的山中。这样，军队分成了三路纵队——右路45 000人，中路9万人，左路12万人，而且至少在几天以内这三路纵队都不能相互支援。这时，对于一个统率着至少与普军兵力相等的军队的将军来说，简直是一个各个击破敌人的最好时机。但是看来并没有这样做。6月26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图尔瑙附近与奥地利第一军的一个旅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战斗，通过这次战斗他便和黑尔瓦尔特取得了联络；27日，后者占领了明兴格雷茨，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个纵队——第五军——越过纳霍德向前挺进，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朗敏指挥）；6月28日是对普军稍为不吉利的惟一的一天，在这一天，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前卫占领了吉钦，但是又被埃德尔斯海姆将军的骑兵赶了出来；同时，王储军团的第一军被加布伦茨指挥的奥地利第十军阻止在特劳特瑙附近，受到一些损失，只是由于近卫军笔直沿普鲁士第一军和第五军中间的道路向艾佩尔挺进，它才得以摆脱敌人。6月29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强攻吉钦，王储军团则彻底击溃了奥地利第六军、第八军和第十军。6月30日，贝奈德克再次企图以第一军和萨克森军队的兵力夺回吉钦，但是完全失败了，此后，普鲁士两个军团便会合了。奥军至少损失一个半军的兵力，而普军的损失还不到这个数量的四分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6月27日，在战场上奥军只投入2个军，每个军约有33 000人；28日投入3个军，29日投入4个军，如果普军一则电讯确实，则还有另一个军（第四军）的一部分；萨克森军只是在30日才能赶来增援。由此看来，在整个这个期间内，奥军有2个或3个军未上战场，而普军则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波希米亚了。事实上，到6月29日傍晚以前，奥军在战场上的总数也许没有超过普鲁士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同时奥军部队是分批加入战斗的，而

援军又是在第一批投入战斗的部队失败以后才来到的,所以结果遭到了惨败。

据称,曾在库斯托扎地区作战的第三军(恩斯特大公指挥),在那次战斗后不久,便已经由铁路调往北部;在某些报道中称,它已编入了贝奈德克指挥的作战部队。这个军编入后,全部奥军连萨克森军队在内已有9个军,不过它未能及时开来参加6月最后几天的战斗。

无论普军作战计划有的一些什么样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已经被普军迅速而有力的行动所弥补了。他们两个军团中的任何一个在作战上都挑不出什么错误。它们的所有突击都敏捷、有力而且坚决,因而得到了全胜。在这两个军团会合后,他们的这种奋战精神并未衰减;他们继续向前运动,7月3日,全部普军就已经和贝奈德克的联合部队遭遇,给了他们以最后的致命打击²⁰⁵。

很难设想,贝奈德克这一次是自愿应战的。无疑地,普军迅速的追击使他不得不率领全部军队坚守阵地,以便重新部署兵力,并把退却部队的辎重提前一天撤走;他希望在白天不遭到大规模的攻击,并且能够在夜间撤退。如果有可能安全退却的话,任何人处于他这样的地位——有4个军完全被击溃,而且在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之后——在当时当地是不可能下决心进行决战的。看来是普军迫使他应战,结果便造成了奥军的完全失败,如果不缔结停战协定的话,奥军现在将会企图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退到奥尔米茨或维也纳,因为普军稍许运动以迂回包抄他们的右翼,便会切断大量部队的直接的退路而把他们赶到格拉茨丘陵地,在那里将他们俘虏。“北方军团”在10天以前还是欧洲的一支声名赫赫的军队,现在已不复存在了。

无疑地,速射的针发枪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武器,普鲁士两个军团的会合就未必能成功,并且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

样的火力优势,普军不可能取得这样巨大而又迅速的胜利,因为奥军通常不像大部分欧洲军队那样容易陷入惊慌失措。但是还有其他的情况也起了作用。我们已经指出普鲁士两个军团进入波希米亚后的那种高昂的士气和果断的行动。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明,在这次战役中,普军还放弃了纵队战法,而主要是将部队展开成横队向前推进,因此可以发挥每一支枪的作用,并且使士兵避免敌人炮火的杀伤。我们应当承认,一支被50年的和平生活锈蚀了的军队及其指挥机构,在行军和迎敌时行动竟然那样有秩序和准确,这是谁都不能意料到的。最后,全世界对于这些没有经验的军队毫无例外地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勇猛精神,都一定感到惊奇。虽然可以说这是后装枪造成的,但是这些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普军常常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并且几乎每次都是进攻者,因此奥军有选择阵地的机会。而在对坚固的阵地和对设有街垒的城市进攻时,后装枪的优点便几乎消失了,这时就必须使用刺刀,大量的战斗都是用刺刀进行的。此外,骑兵也是以同样勇猛的精神作战的;骑兵冲锋只能依靠冷兵器和战马的速度。一些法国小报说普军骑兵队列首先用短筒马枪(后装枪或是别的什么枪)的火力乱射敌人,然后才手持马刀冲向敌人;这一派胡言只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民族之中:它自己的骑兵常常要这样的诡计并且常常因此而受到惩罚,被勇猛冲锋的敌人所粉碎。确确实实,普军仅仅在这一个星期内赢得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崇高威望,并且现在充满了信心,可以和任何对手较量。除开耶拿战役(在这一战役中,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覆没)和滑铁卢战役(如果不算利尼会战²⁰⁶的失败)以外,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次战役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在未遭到任何大的挫折的情况下,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

卡·马克思

*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议程²⁰⁷

国际工人协会

下列议题将在下届代表大会上讨论：

1. 国际协会的组织；
2. 通过协会实现劳动反对资本斗争力量的联合；
3. 缩短劳动时间；
4.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
5. 工人协会(工联), 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6. 合作劳动；
7. 直接税和间接税；
8. 建立国际信贷机构；
9. 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和在民主与社会基础上恢复波兰, 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
10. 常备军与生产的关系；
11. 宗教观念对社会、政治和思想运动的影响；
12. 建立互助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遗孤。

卡·马克思写于 1866 年 6 月
底

载于 1866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宣言。
附临时章程》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争取意大利工人团体
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²⁰⁸

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应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一切步骤,争取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于1866年7月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常务委员会关于日内瓦 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²⁰⁹

1. 常务委员会建议采取用法文公布的议程的顺序, 只做一处修改: 将最后一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合并。²¹⁰

2. 责成书记提出关于会员人数的报告和关于收支情况的综合报告。

3. 常务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²¹¹:

(1) 行业名称。

(2) 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 从业工人的人数。

(4) 雇用条件和工资: (a) 学徒工资; (b) 工资是计日还是计件。支付是否经过中间人之类的人。周平均工资、年平均工资。

(5) 工厂中的工作时数。如存在着小作坊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 亦调查其工作时数。夜工。日工。

(6) 吃饭的时间和工人受到的待遇。

(7) 车间的状况和劳动条件: 拥挤、通风不良、阳光不足、瓦斯照

明等等。清洁程度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身体状况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还是全年开工比较均衡,是否有很大的波动,是否受到外国竞争,主要是为国内市场生产还是为国外市场生产,等等。

[4.]加入协会的团体按每个会员半便士缴纳年度会费,会员卡或会员证的费用另付。书记有权同财力不足的团体协商减收会费条件。

[5.]常务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号召会员建立互助会,并组织各互助会间的国际交流。

[6.]各地方委员会应经常提供有关本地区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并成为工人的情报来源。

卡·马克思于1866年7月3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翻译

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

ENGLISH PART

Published every Wednesday.

Found. & Vol. IV. Registered for transmission abroad.

LONDON, FEBRUARY 22, 1967

ONE PENNY

卡·马克思

给临时中央委员会 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²¹²

1. 国际协会的组织

临时中央委员会建议大体上采纳临时章程中所阐述的组织计划。两年来的经验证明了这一计划的正确性,并证明易于把它应用于不同国家而不致使行动的统一受到损害。我们建议下一年中央委员会仍设在伦敦,因为大陆的情况看来不利于改变会址。

中央委员会委员自然应由代表大会选出(临时章程第5条),代表大会有权增加委员的名额。

总书记应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任期一年,是协会中惟一领取薪金的工作人员。我们建议他的薪金每周两英镑。^①

① 法文本中后面还有一段话：“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应由代表大会选出；各个委员的职责由中央委员会确定。”——编者注

协会个人会员每人的年度会费统一规定为半便士(或一便士)。会员卡(证)另收工本费。

我们号召协会会员组织互助会,并在各个互助会间建立国际联系,但关于这一问题(成立互助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帮助协会会员的遗孤),我们把倡议权留给瑞士人,因为这一问题本来是他们在去年9月的代表会议^①上提出的。

2. 在协会帮助下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

(a)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各国工人阶级分散进行的求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普遍地开展起来。^②

(b)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一项特殊职能,这就是反击资本家在罢工和同盟歇业时一贯采用的以外国工人作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各国工人在求解放的大军中,不仅在感情上是,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兄弟和同志。

(c)我们建议的一项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对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为了行动有所成就,必须掌握资料作为行动的依据。通过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工人将证明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我们建议:

① 指 1865 年 9 月 25—29 日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② 法文本中后面还有一句话:“并使之协调一致”。——编者注

在设有本协会支部的每个地区立即开始工作, 按附在后面的调查大纲所列出的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所有工人共同合作, 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 报告和实际资料寄交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材料综合成一个总报告, 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

这个报告连同附录一起提交下一届年度代表大会, 经代表大会批准后, 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修改)

1. 行业名称。
2. 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 从业工人的人数。
4. 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每周平均工资、每年平均工资。
5. (a)工厂中的工作时数。(b)如存在着小作坊和家庭生产等不同的生产形式, 亦调查那里的工作时数。(c)夜工和日工。
6. 吃饭的时间和工人受到的待遇。
7. 车间的状况和劳动条件:过分拥挤、通风不良、阳光不足、瓦斯照明、清洁程度等等。
8. 工种。
9. 劳动对身体状况的影响。
10. 道德状况。教育。
11. 生产情况:是季节性的还是全年相对均衡, 是否波动性很大, 是否受到外国竞争, 主要是为本国消费而生产还是为外国消费而生产, 等等。²¹³

3. 工作日的限制

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能够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

我们建议把工作日在法律上限制为 8 小时。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普遍要求²¹⁴;代表大会的表决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对于大陆上不太懂得工厂法的会员们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如果不明确规定这 8 小时工作应安排在一天中哪一段时间,则一切法定限制都将不起作用或被资方所破坏。这一段时间的长短应该按照工作的 8 小时再加上吃饭的时间来规定。例如,若几次吃饭时间共占 1 小时,则法定的一天时间就应该是 9 小时,比如说,从上午 7 时到下午 4 时或从上午 8 时到下午 5 时,等等。夜工只是作为例外被允许存在于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某些行业或行业部门中。总的趋势必须是完全禁止夜工。

这一节只涉及成年人,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内,可是绝对不允许让女工从事任何夜工,也不允许让她们从事任何不利于女性特点的或接触有毒和有其他危害作用的物质的工作。我们所说的成年人是指所有满 18 岁或超过 18 岁的人。

4. 男女少年和儿童的劳动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劳动者,^①就像任何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一样,必须无例外地服从那普遍的自然规律,即:为了吃饭,必须劳动,不仅要用脑劳动,而且也要用双手劳动。

但目前我们需要谈的只是工人阶级的男女儿童和少年。应该把他们分为三类,区别对待:第一类9—12岁,第二类13—15岁,第三类16—17岁。我们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厂或家庭里的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2小时,第二类4小时,第三类6小时。第三类至少必须有1小时吃饭或休息的间歇时间。

可能应该在9岁以前就开始小学教育;但我们这里只是针对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各种趋势提出最必要的抵御之策,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为贫困所迫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必须加以维护。他们自

① 自此以下至“把他们分为三类”,在法文本中是:“就像成年人一样,必须无例外地服从那普遍的自然规律:‘不劳动者不得食。’而说到劳动,我们指的尤其是体力劳动。但目前我们需要谈的只是工人阶级的儿童和少年。”

基于生理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应该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编者注

己没有能力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代他们采取行动。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它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分享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注定要受他们的偏见的毒害。

工人阶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不是能自由行动的人。极其常见的情况是,他们甚至十分无知,以致不懂得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是工人阶级中比较先进的那部分人则完全懂得,他们阶级的未来,因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新一代工人的成长。他们知道,首先必须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免受现存制度之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理性为社会力量**才能做到,而在目前条件下,除通过由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外没有其他办法。工人阶级并不是通过这种法律的施行来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他们是把目前被用来压迫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是通过共同的行动做到靠众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父母或雇主令未成年人劳动而不同时使其受教育,是决不能允许的。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的内容。

第三:**技术培训**,这种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对未成年劳动者应按不同类别循序渐进地施以智力、体育和技术方面的培训。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雇用 9—17 岁(包括 17 岁在内)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行业里劳动。

5. 合 作 劳 动

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普遍地开展起来,而不是以任何教条式的制度强加于人。因此代表大会不应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应阐明一些总的原则。

(a)我们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能实际证明:现在这种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制造贫困的残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

(b)但是,合作制度在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靠个人的努力所能为它创造的狭小形式局限之下,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实现。

(c)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办合作商店,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则动摇它的基础。

(d)我们建议所有的合作社用它们的共同收入的一部分建立一项基金,以便能够不仅通过讲道理而且还通过实例,也就是说不仅通

过宣传教育,而且还通过多建立新的合作组织,来传播它们的原则。

(e)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所有从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应该一律平等地分享收益。作为一种临时权宜措施,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

6. 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它们的过去。

资本是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能支配的力量只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资方和劳方之间的**契约永远不可能订得公平合理**,甚至从一个把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置于相互对立地位的社会的目光看来订得公平合理,也是不可能的。工人的社会力量仅在于他们的数量。然而,数量上的优势被他们的分散状态所破坏。工人的分散状态之所以造成并长期存在,是由于**他们自己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竞争**。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契约中有可能争取到起码高于纯粹奴隶的地位。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限于日常的需要,设法阻止资本的不断侵权,一句话,仅限于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工会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现在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恰恰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

么它们作为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

(b)它们的现在。

工会过多地局限于与资本进行地方性的直接斗争,它们对自己所具有的与雇佣奴隶制本身作斗争的力量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它们总是过分地脱离一般的社会政治运动。然而最近看来它们似乎有些认识到它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了,例如,在英国,工会参加了最近的政治运动²¹⁵,在美国,它们认识到了自己应该起更大的作用²¹⁶,还有,不久以前在设菲尔德举行的盛大的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本次代表会议非常赞赏国际协会为把各国工人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兄弟联盟所作的努力,因此郑重建议与会各团体参加该协会,深信这对全体劳动者的进步和昌盛至关重要。”²¹⁷

(c)它们的未来。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自觉地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它们对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必须给予支援。它们既然把自己看做是并且以行动表明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斗士和代表,因而就不可不把工会以外的工人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必须特别关心那些报酬最少的行业中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劳动者,特殊的处境使得他们软弱无力^①。工会必须让全世界^②都相信,它们的

① 法文本中不是“特殊的处境使得他们软弱无力”,而是“特别不利的处境使他们不能进行有组织的反抗”。——编者注

② 法文本中不是“全世界”,而是“广大工人群众”。——编者注

奋斗决不是出于狭隘的私利,而是为了使千百万被压迫者获得解放。

7. 直接税和间接税

(a)无论怎样改变征税的形式,都不能使劳资关系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

(b)但是,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则我们主张**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

因为征收直接税比较便宜而且不干扰生产;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数额,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在商品价格上了;

因为间接税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交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毫无掩饰、简单明了,连最笨的人也不会弄错。所以,直接税使每一个人都能制约政府权力,而间接税则使任何自治的希望都归于破灭。

8. 国际信贷

倡议权留给法国人。①

9. 波兰问题②

(a)为什么欧洲工人要提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作家和鼓动家们共谋掩盖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在大陆上，甚至在爱尔兰，

-
- ① 法文本中是：“倡议权留给法国人，因为这一问题是他们在九月代表会议上提出的。”

这一问题最初是巴黎的协会组织提出的，在1865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上被列入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提议者的思想基础是蒲鲁东关于靠“人民银行”和“无息信贷”就可以实现社会变革的主张。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已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批判（参看本卷第60—61页）。——编者注

- ② 法文本中标题是：“必须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以实现各民族的自决权，必须在民主与社会的基础上重建波兰。”

在其他文献材料中所记载的关于波兰问题的提法略有不同。例如，马克思用法文书写的《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议程》中的第9点是：“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和在民主与社会基础上恢复波兰，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参看本卷第215、260页）又如，伦敦代表会议1865年9月27日晚间会议的记录（英文）中是这样写的：“通过在波兰实现‘每一民族都应享有的自决权’和在民主与社会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来消除侵入欧洲的俄国影响，刻不容缓。”——编者注

充当一切民族的保护人。他们为什么绝口不谈这个问题呢？因为无论贵族或资产者都把那个居于幕后的阴暗的亚洲强国看做是抵挡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地位的汹涌浪潮的最后一个救星。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才能真正把这个强国打倒。

(b)目前在欧洲中部特别是德国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波兰。没有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会成为神圣同盟²¹⁸的前哨，有了民主的波兰，德国就会成为共和制法国的合作者。在欧洲这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阶级的运动总是要遭到打断、遏止或阻碍。

(c)德国工人阶级特别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倡议，因为德国是瓜分波兰的参加者之一。

10. 军队^①

(a)各种名目的，如和平的、经济的、统计学的、慈善事业的社会学的代表大会，都充分揭露了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有害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详细论述这一点是完全多余的。

(b)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普遍训练人民使用武器。

(c)作为暂时的必要措施，我们允许保存小规模常备军，用以充当为民兵培养军官的学校；每一个男性公民都应当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这种常备军中服役。

① 法文本中的标题是：“常备军及其与生产的关系”。——编者注

11. 宗 教 问 题^①

创议权留给法国人。^②

卡·马克思写于 1866 年 8 月
底

载于 1866 年 10 月和 11 月《先
驱》杂志第 10 期和第 1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① 法文本中的标题是：“各种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影响”。——编者注

② 法文本中是：“创议权留给法国人，因为这一问题是在他们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提出的。”

这一问题是由巴黎的协会组织提出的，在 1865 年 9 月伦敦代表会议上以微弱多数票被列入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马克思后来在驳斥乔·豪威耳对协会历史的歪曲时写道，总委员会提出的议程“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在巴黎代表的要求下，这道禁菜被列入了为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准备的菜单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5 卷第 321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关于向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中央(总)
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感谢的决议²¹⁹

公民马克思提议,德尔附议:向在日内瓦代表中央委员会进行出色工作的代表们表示感谢。

卡·马克思于 1866 年 9 月 1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 1866 年 9 月 22 日《共和
国》第 18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一]

马克思提议奥哲尔为[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马克思认为自己不适于担任此项职务,因为他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²²⁰

马克思建议这个委员会¹¹⁹目前只是作为临时机构而设立。委员会由已经委任的总委员会负责人员和各国通讯书记组成。

[二]

1. 中央委员会委员凡无充分理由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四次以

上者应从中央委员会除名。

2. 此项决议应立即通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三]

一致决定不委任常务主席²²¹；财务书记迄今所履行的职责移交给总书记，取消财务书记一职。

卡·马克思于 1866 年 9 月 25 日, 11 月 6 日和 1867 年 9 月 24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3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召开的
波兰会议的决议草案²²²

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66 年
12 月 29 日—1867 年 1 月 12 日
之间

1867 年 1 月 22 日以传单形式
印发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 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²²³

女士们! 先生们!

三十多年前在法国爆发了一场革命⁸⁶。这是刚刚同查理十世签订了一项改进欧洲行政管理和地理划分的密约的圣彼得堡先见所未及之事。接到这个破坏了全部计划的消息之后,沙皇尼古拉召集了近卫骑兵军官,对他们作了简短的杀气腾腾的演说,最后一句话是:“先生们,上马!”^①这并不是空洞的威吓。帕斯凯维奇被派到柏林去准备入侵法国的计划。几个月工夫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计划是:普鲁士人在莱茵河集结,波兰军队开进普鲁士,俄国佬则跟在他们后面。然而那时,如拉斐德在法国众议院所说,“前卫军转身攻击起主力部队来了”^②。华沙的起义¹⁸⁰使欧洲免于再遭反雅各宾战争⁴⁴之祸。

过了18年,革命火山再次爆发,这次爆发毋宁说是一次震撼整

① 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消息后说的话。——编者注

② 这句话可能引自贝·萨朗的《拉斐德和1830年革命》1832年巴黎版第2卷第160—161页。——编者注

个大陆的地震。甚至连德意志也躁动不安了,虽然自从所谓的独立战争^①以来俄国就一直把它当做幼儿一样看管着。但更令人惊奇的是:维也纳在所有的德意志城市中第一个尝试构筑街垒,而且还成功了。这一次,而且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俄国失去了自制。沙皇尼古拉不再向近卫军发表演说,而是向他的人民颁布诏书,对他们说,法国的瘟疫甚至传染上了德国,它已逼近了帝国的边界,疯狂的革命把它的狂热的目光转向了神圣的罗斯^②。没什么奇怪!——他这样叫嚷。要知道就是这个德国许多年来都是无神论的温床。褻渎神明的哲学的癌瘤已经使这个貌似坚实的民族病入膏肓。然后他在诏书的末尾对德意志人发出了如下的召唤:

“上帝在我们这边! 放明白些,异教徒,归顺吧,因为上帝在我们这边!”^③

在这以后,很快他就通过自己的忠实奴仆涅谢尔罗德交给德国人另外一道通告²²⁴,但是这一回却洋溢着对这个异教民族的一片温情。怎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事情是这样的:柏林人不仅闹起了革命,而且宣布要恢复波兰,而普属波兰人则为人民的热情所迷惑,开始在波森修建兵营。因此沙皇才摆出了这副殷勤的姿态。又是波兰民族,这个欧洲的不死勇士,迫使蒙古人^④退却了。只是当波兰人被德意志人、尤其是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²²⁵出卖之后,俄国才缓过劲

① 指1813—1814年德国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编者注

② 罗斯为俄罗斯的古称。——编者注

③ 这句话可能引自亨·冯·布兰特的《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1852年柏林版第24页。——编者注

④ 这里喻指沙皇。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同当时在西方人心目中的蒙古一样,是东方一个野蛮而富侵略性的民族。——编者注

来,有了足够的力量到1848年革命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匈牙利——去打击它。就是在这里,抵抗俄国的最后一个勇士仍然是波兰人——贝姆将军。

现在还有一些十分天真的人,他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波兰不再是——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说——“一个必要的民族”,它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回忆了。但你们知道,无论是感情还是回忆,在交易所里都是没有行情的。当俄国最近那几道关于取消波兰王国的命令²²⁶在英国传开的时候,大财主们的机关报^①就奉劝波兰人改当俄国佬。即使是只为了保证英国资本家刚刚借给沙皇^②的600万英镑²²⁷的利息能够付得出,他们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③《泰晤士报》写道:在最坏的情况下,让俄国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好了,只要它允许英国占领埃及以保证通向自己的印度大市场的道路安全可靠就行!换句话说,只要俄国允许英国去同法国争夺埃及,英国就尽可以把君士坦丁堡让给俄国。《泰晤士报》说,俄国佬喜欢向英国借钱,同时也很好地偿还。他喜欢英国钱。实实在在喜欢。但对于英国人他究竟喜欢到什么程度,1851年12月的《莫斯科消息报》对你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不,应该轮到不讲信义的英国了,不久以后,我们再同这个民族签订条约,只能在加尔各答。”^④

① 指《泰晤士报》。——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③ “当俄国……他们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这段话在马克思的草稿中是全文第1段。——编者注

④ 从“《泰晤士报》写道……”至引文结束,这段话在马克思的草稿中是全文倒数第2段。——编者注

我问你们，究竟什么变了呢？来自俄国的危险减少了吗？没有。只是欧洲统治阶级的昏聩达到了极点。首先，如俄国官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所承认，俄国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灯塔——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在今天只有一个狡猾的同时又统治着众多野蛮人的政府才能想出这样一个计划来。正如近代最大的俄国外交家波措-迪-博尔哥在维也纳会议时期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奏疏中关于这一点所说的那样，波兰是俄国谋取世界霸权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在波兰人因吃尽欧洲背信弃义之亏而变成俄国佬手中一条可怕的鞭子之前，波兰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撇开波兰人民的情绪不谈，请问有没有出现什么足以使俄国计划受挫、行动受阻的情况呢？

无须我来告诉你们，俄国在亚洲的侵略不断得逞。无须我来告诉你们，所谓的英法对俄战争把高加索的山地要塞、黑海的统治权，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保罗和亚历山大一世妄想从英国手里夺取的海上权利交给了俄国。铁路正在把俄国分布于广大地区的兵力联合并集中起来。俄国在会议波兰²²⁸——它在欧洲的牢固的营垒——所掌握的物质手段大大地增加了。华沙、莫德林、伊万城这些曾被拿破仑第一所选定的据点的工事控制着整个维斯图拉河，并且构成向北、向西和向南进攻的一个强大基地。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与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衰落同步。而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意味着什么，你们从1848—1849年的经验中可以看出，那时在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和拉德茨基麾下作战的斯拉夫人，蹂躏了匈牙利，洗劫了维也纳，镇压了意大利。除了这一切以外，英国对爱尔兰所犯下的罪行也给俄国在大西洋彼岸增添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同盟者。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要征服世界，俄国佬什么也不缺，只

缺士气。而俄国只要把波兰人吞噬掉,它所需要的这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就能够进入它的躯体。到那时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投到天平的另一端呢?

人们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奴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集中于普鲁士人之手的德意志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进攻。而某些更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

先谈第一点,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农奴的解放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能够对它的集权行动设置的障碍。农奴的解放为它的军队开辟了广大的兵源,打破了俄国农民的公共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农民对沙皇神父老爹的信仰。农奴的解放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经过好些世纪才能建立起来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加以惩罚。我只要提醒你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追查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引为己任的就是让俄国佬戒掉那被费尔巴哈称做俄国佬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烧酒。不论农奴的解放将来会起到什么作用,目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它使沙皇手中的兵力增加了。

现在来谈普鲁士。这个从前的波兰附庸²²⁹只是在俄国的卵翼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它明天失去了掠夺来的波兰领土,它就会淹没于德意志之中,而不是把德意志吞下。它要在德意志保持它的特殊的强国地位,就一定要投靠俄国佬。不久前它领土的扩大并没有削弱它同俄国的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变得牢不可破,并加剧了它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俄国同时还是霍亨索伦王朝及其封建臣仆的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他们用来对付人民不满的盾牌。因此,普鲁士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

法国和征服德意志的工具。

至于说社会革命,它不意味着阶级斗争又意味着什么呢?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不会像过去英国和法国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那样残酷而血腥。但愿如此。可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虽然能加强西方各国人民的力量,但还是会和任何内部冲突一样,招致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⁴⁴期间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扮演过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阶级招募到它的队伍里。早在二月革命⁷³时期,就已经不仅仅是蒙塔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是否有哥萨克的马蹄声临近²³⁰;也不仅仅是普鲁士的乡绅在德意志的代表机构里对沙皇称“父”称“主”;而是全欧洲交易所的行情都随着俄国人的每一次胜利而上涨,随着俄国人的每一次失败而下跌。

这样,对欧洲来说就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必须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月
7日—22日之间

载于1867年2月10日《自由
之声》报第13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辟 谣²³¹

致《北德报》编辑部

贵报想必是由于疏忽,在第 5522 号上刊载了如下一则简讯:

“寓居伦敦的马克思博士……闻将周游大陆,为此事(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进行宣传。”

我认为,这显然是警察当局不知为何“缘故”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卡尔·马克思

1867 年 2 月 18 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 1867 年 2 月
18 日

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第 20
年卷(1901—1902 年)第 3 期
(第 2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瑞典和丹麦旅行札记²³²

7月6日。9时。英雄号停泊洪伯。11时出海。凉爽的微微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风力渐增，午后起巨浪，风向渐转南，晚上风力五级，长型船身剧烈摇摆，索尔斯比船长跌倒并折断一条肋骨，一位英国乘客也摔得鼻青脸肿，主帆脱离下部滑轮。

7月7日。不能上甲板，船身剧烈摇摆；傍晚风终于减弱，当看到霍尔门灯塔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上甲板了。海浪逐渐平静。但仍时起时伏。

7月8日早晨7时到达文加，然后进入约塔河的岩岛群，四周是光秃的岩礁，一千步远处可看到冰川的影响。没有多远河流就变窄了，花岗山岩之间是绿色的河谷，然后又出现零星的树木，终于哥德堡在望。这个地方很美，低矮而宽敞的房屋使它显得很奇特。

哥德堡本身是一座四周富于古瑞典风貌的现代城市；城内的建筑都是石砌结构，城外是木结构。街上是散发着荷兰臭气的荷兰式水道。瑞典人给人的印象很像德国人，而不太像英国人，他们中间有外来的芬兰成分。一般妇女面色不好，皮肤粗糙，但容貌并不令人讨厌；男人则比较漂亮，但更像德国内地的小市民。所有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都像巴登的小市民。

英语还通行,德语占优势。到处都显露出贸易上和文化上对德国的依赖。火车站、公共建筑、私人住宅、别墅,全是德国式的,为了适应当地气候,样式稍有不同。只有公园是英国式的,也是那样清洁,还有一座英国新哥特式的教堂。人们在所有商店里都可以放心地讲德语,甚至在旅馆里也请求讲英语的人尽可能讲德语。

石竹花和山楂花盛开,一派5月8日^①的景象。到处是一种很漂亮的榆树小林,中间夹杂着白蜡树。一片翠绿,就像英国的春天一样。树木之间光秃秃的花岗岩石到处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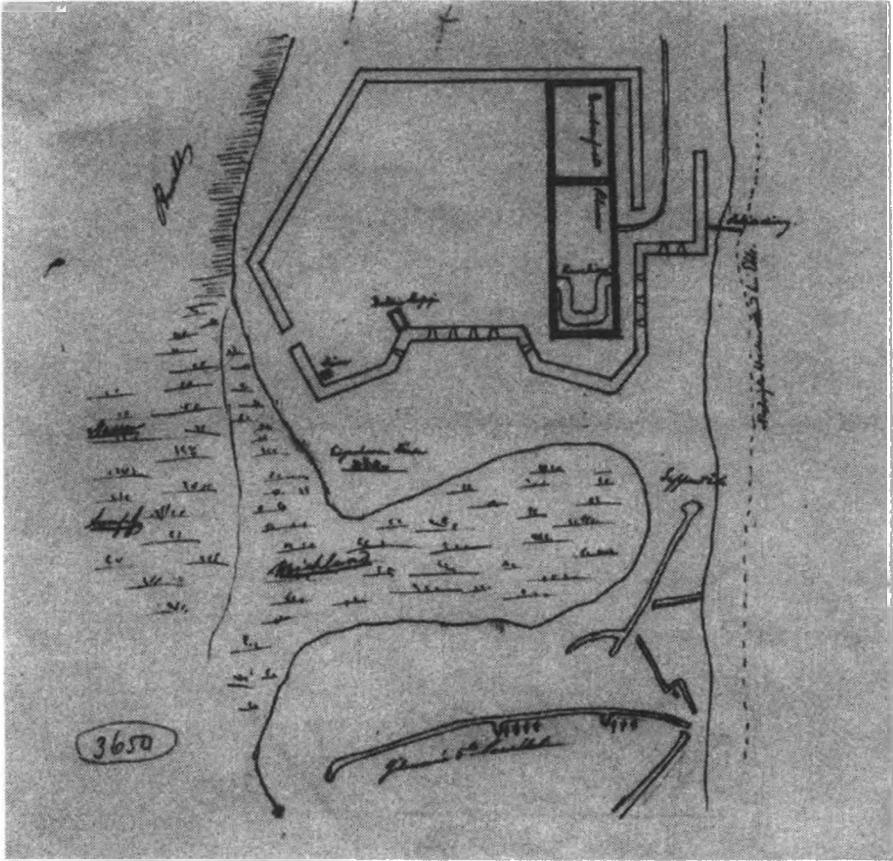
虽然人们喝仿造的波尔图酒和雪莉酒,但是生活方式完全和大陆一样,而与英国不同。旅馆提供的一切:房间、早点、饭菜,全都是大陆式的。公共场所也同样不分等级。夹肉面包(Smörbrödsborden)(25欧耳)。

这里的人中等身材,粗壮,有五英尺六英寸。骑炮兵(värfvade)的士兵身材较高。士兵和军官有点像瑞士的民兵。赫尔的水手更像荷尔斯泰因人、下萨克森人、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丹麦人,而不像瑞典人。当地的瑞典人脸上缺少阳刚气,大多数人皮肤松弛、轮廓不清、肥胖臃肿,只有一些水手有一副弗里西安人的面孔和健壮的体格。士兵看起来像威斯特伐利亚人,军官也不像人们一般印象中的军官。

人们照例必然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大陆上处处多么重视国民的保健和娱乐,与贵族制的英国迥然不同。

有两个衣着讲究的英国女士使人感到可笑,惹得所有的瑞典女

① 估计这里指的是欧洲人庆祝春天到来,万物复苏的传统节日五朔节。——编者注



弗·恩格斯画的瑞典卡尔斯堡要塞平面图

人都看她们。

斯德哥尔摩之行。轮船的设备：尾船是铺位，前舱是餐厅。伙食很好。冷盘加鲜奶油。甜食。内地人的面容特征更为明显，男人比较漂亮、结实、高大。妇女并不美，但和蔼可亲，身材高大丰满。性格和土容克相似，越看越像黑林山的挤奶工和蒂罗尔人（施托伊布描写的蒂罗尔哥特人？）。同时，语音也非常像上德意志的，但没有喉音。

约塔河一带地方，一直到特罗尔海坦，美丽，但朴实无华。四股瀑布层层叠起。山不高于 600—800 英尺，但是很雄伟。接下来是维纳恩湖和钦讷库勒山，平淡无奇。韦特恩湖也是同样。卡尔斯堡的工事修建得不坏，是一条很长的多边形防线，但后面那座山是不是会起控制作用？湖是很美丽的，但是所有的湖都一个样。无边无际的针叶林，而且已遭受损害。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瑞士的美丽的繁茂的针叶林。银松。

穆塔拉河谷又有一部分被开垦了，有些地方很美，如这条运河两岸栽着榆树和桦树的那些地方。

岩岛湖越接近斯德哥尔摩越是美丽。地质层系构造有所变化——有的地方是石灰石，岩层风化得比较厉害，因此直接从大海升起的缓坡和高山草地较多。两个岛上有大理石岩。越接近斯德哥尔摩，岩岛就越高耸而美丽。马伦湖沿岸非常漂亮，树林、田野和别墅错落其间。

斯德哥尔摩的诺尔布罗桥像日内瓦的贝尔格桥。莫塞巴肯非常壮观。从瞭望台放眼望去，景色优美。小汽艇可以开进动物园。美丽的公园。饭馆和咖啡馆很多。采用法国的经营方式：小吃，点菜，而不是份餐。斯德哥尔摩的居民习惯在饭馆里就餐。到处都有烈性酒。啤酒比德国的好。酒类和食品（Kårger）都太甜。瑞典的啤酒不

错。不过，不是太甜就是太酸。葡萄酒、波尔多酒、烈性埃尔米塔日酒、掺了南法兰西葡萄酒的勃艮第酒是就餐的主要饮料。其他家常饭菜同德国的差不多，而与法国的不同。

斯德哥尔摩有比较明显的首都特点，很少听到讲外国话，然而在所有商店里都讲德语。哥德堡的男性装束显然是英国式的，而这里法国装束占优势。有妇女在场在饮酒时装出的假正经，儿童娱乐场、旋转木马游艺场、木偶戏院、走绳索和低劣的音乐。水上花园更是一种妙极了的“机关”。同时，也可以看到严肃的或者说假正经的路德派的民族特点：大批人对公共娱乐场所不能容忍。

士兵，甚至近卫军，都像民兵一样散漫，军官也是如此。他们缺乏朝气。个子也不太高，根本不能与第 69 部队^①的士兵相比。军服样式毫无创意，皮革装束落后。哨兵闲聊。大胡子。马尔默的骠骑兵与战斗骑兵一样是重装的——最漂亮的人。

铁路糟透了！打三次钟，鸣一次笛。五分钟等于十五至二十分钟。小饭馆是简易的，但很不错，所有食物全都卖一个里克斯达勒。景色很美，但经过头两个小时，由于总是单调的重复，最后就感到乏味了。湖泊很多，显然是冰川影响造成的。河谷的土地多半是过去的海底或过去泥炭沼泽的底部。

为了完成外交的谈判²³³而派人去马尔默是个高明的手腕。

哥本哈根。从规模和生活方式来说确实比斯德哥尔摩更像个首都，但毕竟还是一个朴素的小城市。德意志人甚至在大街上也占绝对优势。生气勃勃的孩子们，各种娱乐场所主要是为孩子们设置的。至少有上百个旋转木马。连老人也变成了儿童。芭蕾舞、马戏等等。

① 指普鲁士军队。——编者注

甚至可以看到拿折磨儿童来取乐的残忍表演。游艺场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哥本哈根到处都是美丽的树木。港湾入口很美。老式的战船——这一切给人留下如画般的印象。另外,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座剥削着 150 万农民的农民首都,到处都不难看到这一特点。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7 月

6--18 日

载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旅行记》1966 年柏林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有关洛桑代表大会
议事日程的决议²³⁴

[一]

代表大会的第一项决议应该是：关于使国际工人协会能在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彻底摆脱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他们的共同行动中心的作用的实际办法。

[二]

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我们提出的代表大会议程；任何支部无权提出自己的议程；只有总委员会有权拟定代表大会议程；责成总书记将总委员会拟定的议程送交《法兰西信使报》，并将前述决议通知巴黎委员会。

卡·马克思于1867年7月9日和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3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²³⁵

致会员、各所属团体和全体工人

无产者们!

从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可以看出,协会的会员仍在继续宣传国际协会的原则并成立新的支部。这项活动在瑞士进行得特别出色,在那里,我们的大多数支部都积极地建立各种工人团体,并使这些团体靠拢我们。

在比利时,自从马谢讷大屠杀²³⁶以后,正在进行值得赞扬的努力来团结比利时全体无产阶级,使它受到我们的保护。

但是在其他国家里,却有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德国,1848年以前是那样有兴趣研究社会问题,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积极力量都被国内展开的统一运动吸引住了。

在法国,由于工人阶级享有的自由有限,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协会都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得到传播和发展;因为我们本来以为,英国工人团体由于我们的关系而在法国工人最近几次罢工期间给予法国工人团体的帮助²³⁷,会保证我们得到全体法国工人的支持。现在,当法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重新进入我们称之

为英国式的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说斗争具有了非常明显的性质的时候,工人们应当懂得,要成功地与资本家的力量相对抗,就必须有一个把工人团体的各种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巩固联盟。

在英国,选举改革运动²¹⁵曾经席卷全国,经济运动暂时被搁置一边。但是现在,当改革运动已经停止,通过对工联的调查²³⁸已经查明工人阶级的人数并证实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工人团体都会懂得我们这个组织的益处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协会的作用已经不止一次地在工人阶级代表的会议上得到了应有的估价,许多团体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英国拥有组织强大的无产阶级,因而有义务成为我们最可靠的支柱之一。

美国看来在它刚刚经过的流血战争中恢复了青春: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对统治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几个州的立法议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日法案。由于应届总统选举,各个政党不得不公开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激进党借参议院主席威德的口承认必须首先专门研究劳动和资本的问题;它公开主张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土地所有制。由于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相当高的组织性,它一定能够使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

目前,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工人阶级都动起来了;在那些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更加团结一致的组织,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带有最尖锐的性质。

在资本的权力面前,人失去了他个人的力量;工厂中的工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为了恢复自己的个性,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协会以保障自己的工资和生活。到目前为止这些协会还带有地方性质;但是资本却由于新的工业发明而日益强大起来;国家范围内的协会在许多场合都暴露出自己软弱无力。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斗争的

时候可以看到,厂主为了对抗自己的工人,不是把外国工人运进来,就是把活儿交到劳力最便宜的国家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要想比较顺利地继续自己的斗争,就必须把全国性的协会变为国际性的协会。

希望全体工人注意研究对于问题的这种新的观点,希望他们相信,只有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包和自己孩子们的面包。

我们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大家促使将于1867年9月2日在洛桑召开的应届代表大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

“按照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条例,每个支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拥有500名会员以上的支部,每超出500名会员可增派代表一名。没有足够资金派遣代表的支部,可以和其他支部共同负担一名受权代表它们的代表的费用。”^①

代表大会将讨论以下的问题:

(1)用什么实际手段把国际协会变成支持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的共同行动中心?

(2)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利用本是他们提供给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贷款来为自己的解放服务?

敬礼和兄弟情谊

通讯书记:

欧·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松——比利时

^① 指《条例》第9、10、12条,见本卷第537—538页。——编者注

卡特——意大利
汉森——荷兰和丹麦

保·拉法格——西班牙

主席 乔·奥哲尔
副主席 格·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总书记 彼得·福克斯

于牛津街,城堡街16号

卡·马克思校订于1867年7月
10—13日
1867年7月以传单形式在伦敦
印发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
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
决议草案²³⁹

指示总委员会的代表不要正式参加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并在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上反对任何主张正式参加的动议。

卡·马克思于 1867 年 8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 1867 年 8 月 17 日《蜂房
报》第 30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统计学家奥托·许布纳尔关于 德国民众贫困的论述²⁴⁰

柏林中央统计档案馆馆长奥托·许布纳尔在致他的帝国国会选民书中写道：

人民已不堪重负。除了兵工厂，几乎所有的工业都陷于瘫痪。连最卑微的公职都有成百的饥饿的应征者渴求获得，城市里无人居住的房子和无力支付房租的居民的数目在增加，大量的土地和房屋被强制拍卖，慈善机关被获胜归来的残废军人和失业工人所包围，到处都缺乏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一贫如洗的穷人的收支状况本身使他明白：他为国家服务所付出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服务本身的价值。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67 年
9 月 4 日

载于 1867 年 9 月 6 日《法兰
西信使报》第 81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未来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⁴¹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共784页,8开本

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迄今为止成就如此之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在这一学科里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如果人们也会读到一些有独创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保护关税论者(其实,听说他是从一个法国人^①那里抄袭来的),或者是像洛贝尔图斯和马克思那样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事实上我们的官方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把每一个认真研究经济科学的人,都推到社会主义的怀抱里去。我们大家的确都经历了这样的事实:整个官方经济学敢于在拉萨尔面前否认久已闻名的和公认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弗·路·奥·费里埃及其著作《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编者注

的确定工资的规律；让拉萨尔为像李嘉图这样的人辩护，使之不受舒尔采-德里奇等的攻击。^①遗憾的是，事实上他们在科学上甚至不能对付拉萨尔，并且不管他们的实际努力如何值得承认，他们都应遭到如下的责难：他们的全部科学都在于冲淡巴师夏的掩饰一切矛盾和困难的调和论。承认巴师夏为权威，否定李嘉图——这就是现今我们德国官方经济学！当然，它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很遗憾，经济学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在科学上谁也不感兴趣的领域：它或者是为谋生而通过财政管理学考试所必修的科目之一，或者是为进行政治鼓动而必须极其肤浅地掌握的辅助工具。这是我们国家四分五裂状态的过错，是我们可惜还很不发达的工业的过错，还是我们在这门科学上习惯性地依赖于外国的过错？

在这种情况下，有上面提到的这本书在手上，那总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乏味的经济学，或者他极其恰当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对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也采取批判的态度，虽然如此，他仍然始终力求坚持采取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方法。马克思先前的著作，特别是1859年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货币的著作^②，就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著称，而且就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官方经济学还拿不出什么东西与之相对抗。既然它不能反驳那部著作，那么它现在对这部

① 指斐·拉萨尔的著作《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编者注

② 指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编者注

有 49 印张的论资本的著作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希望人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推论不能反驳，不是说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我们只是说：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全体经济学家中间有哪一个人能把这些推论驳倒。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在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可以举出全书巧妙的辩证的总体结构，举出在商品的概念中货币如何已经作为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被表述出来，货币如何转化成资本。我们承认：我们认为新提出的**剩余价值**的范畴是一个进步；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驳下面这个论断：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现；我们认为修改李嘉图的利润率规律（即应该提出剩余价值代替利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承认，贯穿于全书的历史观念不允许作者把经济规律看做是永恒的真理，而把它仅仅看做是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对这种历史观念我们是很满意的；而遗憾的是，要在我们的官方经济学家那里找寻这本书里用来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态及其存在条件的那种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将是徒劳的。像关于奴隶制的经济条件和规律、农奴制和依附农制的各种不同形态、自由工人的产生之类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的经济学专家来说，到现在为止还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同样也很想听听这些先生们对本书中关于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阐述的意见；他们肯定能从这里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这些与自由竞争的一切传统理论完全相抵触的、而在这本书里根据官方的材料仍然得到了证明的事实；在自由竞争的祖国——英国，现在几乎每一个劳动部门都是通过国家干涉对日劳动时间进行严格的规定，并由工厂视察员进行监督；可是在劳动时间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不仅各个工业部门提高了生

产,而且各个工人在缩短的时间内比原来较长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他们将会说些什么呢?

遗憾的是,不能否认,作者谈到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时采用那种声色俱厉的语调不是没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出卖了自己的科学,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们高谈“和谐”,却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给予他们的严厉教训把他们从昏睡中唤醒,提醒他们,经济学不是一头供给我们黄油的奶牛,而是一门需要人们认真地热心地投入其中的科学。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0 月
12 日

载于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来
报》第 254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莱茵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⁴²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1867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

普选权给我们的迄今存在的议会政党,增添了一个新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最近一次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大多数大城市和所有工厂区里,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并且选出了6个或8个代表。与上次选举相比较,它的力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它至少现在还处在壮大的过程中。在一个国家里,普选权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人数最多、最贫穷的阶级,而人们还继续用高傲的沉默来对待这样一个政党的存在、活动和学说,那就是愚蠢的行为。

无论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和多么不团结,我们还是可以确信:这个政党的所有派别,都将欢迎这部书,把它看做自己的理论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最重要的论据。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本书就值得予以特别的重视。而它的内容本身也引人注目。拉萨尔的主要论据——拉萨尔在

政治经济学方面曾经不过是马克思的学生——限于不断重复所谓李嘉图的工资规律,而这里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却以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论述了资本与劳动的全部关系,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并且根据以无可怀疑的专门知识所作的显然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此外,我们还想使人们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部著作的结论,作者在其整个篇幅中以全新的观点陈述了许多经济学的要点,并在纯学术的问题上得出了一些结果,这些结果大大不同于以往流行的经济学;而且,如果学院经济学家不想看到自己迄今为止所坚持的学说遭到覆没,他们就必定会对这些结果在学术上予以严厉的驳斥。为了学术的利益,我们希望尽快地在专业书刊上围绕这些要点展开论战。

马克思从阐述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入手;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早已在一部单独的著作^①中发表过了。然后他转到资本上,而这里我们随即就接触到整部书的中心论点了。资本是什么?是一宗货币,这宗货币把自己变成商品,再从商品变成比原先数量更多的货币。我用100塔勒买棉花,以110塔勒把它卖出,这样我就证实了我的100塔勒是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赚的10塔勒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两次简单的交换,100塔勒就变成了110塔勒,这是怎样发生的呢?要知道经济学的前提就是:任何交换都是等价交换。于是马克思分析了一切可能的情形(商品价格的波动等等),证明在经济学自身的这种前提下,从原来的

^① 指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编者注

100 塔勒中产生 10 塔勒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过程每天都在发生,对此经济学家们却始终没有为我们作出解释。马克思对此作了如下解释:这个谜只有这样才能解开,即我们在市场上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于创造交换价值。这种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劳动力**。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且让这种劳动力为自己工作,再把它的产品卖出去。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劳动力。

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工人以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历史上形成的方式维持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假定工人得到了自己劳动力的全部价值。我们再假定,这个价值体现在每天 6 小时的劳动上,或半个工作日上。可是资本家硬说他购买了**整个工作日的劳动力**,他迫使工人工作 12 小时或更长时间。因此,在 12 小时的劳动中,他无偿地获得了工人 6 小时劳动的产品。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任何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的利润、作为地租或赋税等等,无论它如何分摊——**都是无酬劳动**。

工厂主的利益在于每天尽可能榨取更多的无酬劳动,而工人的利益则相反,这样就发生了关于工作日长短的斗争。在特别值得一读的将近 100 页的例解部分中,马克思描述了英国大工业中这个斗争的历程;这个斗争不顾主张自由贸易的工厂主的反对,在刚刚过去的春天以下述结果而告结束:不仅全部工厂工业,而且全部小工场,甚至全部家庭工业,都纳入了工厂法的范围;这个工厂法规定,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内,妇女和 18 岁以下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从而也间接地规定了男工的劳动时间)每天最高限度为十个半小时²⁴³。马克思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英国工业没有因此受到损失,反而得到了好

处,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劳动,都因强度的提高超过时间的缩短而增加了。

可是除了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剩余价值还可通过别的方法来增加。在一定的比如说 12 小时的工作日中,按照我们先前的假定,包含 6 小时必要劳动和 6 小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如果能用某种方法把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为 5 小时,那么就会余下 7 小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这可以通过缩短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达到,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用降低生活资料价值的方法来达到,而这一点又只能用改进生产的方法来达到。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又作了详细的说明,他研究并描述了三个可以实现这种改进的主要方法:(一)协作,或由于许多人同时有计划地合作而使力量成倍增加;(二)分工,即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大约在 1770 年以前)发展起来的那种分工;最后,(三)机器,大工业从那时起就借助于机器发展起来。这些描述也很令人感兴趣,并且显示出惊人的专门知识,一直到工艺学上的细节[……]①

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论述关于剩余价值和工资的研究的细节,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只说明一点:正如马克思用许多引证所指出的那样,工资少于全部劳动产品,即使学院经济学也并非不知道这个事实。我们应该希望这部书将给那些教授先生们机会向我们更详细地说明这个的确令人惊异的问题。应该特别予以赞扬的是:马克思所引证的一切实际材料,都有最可靠的来源,大部分取自正式的议会报

① 手稿的这一页到此结束,下面缺一页,所缺的这一页大概是分析剩余价值和工资的问题的。——编者注

告。说到这里,我们支持作者在他的序言里间接提出的建议:在德国也通过政府专员,——但这些专员不应是怀有成见的官僚,——对各种不同工业部门内工人的状况进行彻底的调查,并向议会和公众提交报告。

第一卷以论述资本的积累结束。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里也提供了很多新的东西,并且从新的方面阐明了旧的东西。这里最独特的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与资本的积聚和积累同时并进的是工人过剩人口的积累,而这两个积累过程归根到底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使社会变革成为可能。

无论读者对于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抱什么态度,我们相信上述一切还是可以向读者表明:他这次所面对的是一部高出于现今一般社会民主主义书刊的著作。我们还要补充一点:除了开头 40 页有些难度较大的辩证法的东西外,这部书尽管具有极严格的科学性,但还是十分浅显易懂,而且作者对任何人都毫不留情的讽刺文笔,甚至使这部书妙趣横生。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0 月
12 日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7 年莫斯科版
第 2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⁴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1867年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第一卷)

这部 50 印张的学术著作是要向我们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过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酬劳动！我们还记得，1849 年《新莱茵报》以西里西亚农民的名义，提出了《西里西亚的十亿》²⁴⁵ 的要求。该报声称，在废除农奴制和封建赋税时，单是从西里西亚农民那里就非法地夺去了 10 亿塔勒，这些钱流入了大土地占有者的腰包，该报要求归还这笔款额。可是前《新莱茵报》的先生们，正如圣西维拉及其占语集一样：给他们的越少，他们要求得就越多。10 亿塔勒与现在以全体工人阶级的名义所要求返还的那大宗款额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件事啊！既然有产阶级全部积累起来的资本不过是“无酬劳动”，那么显然可以由此直接得出结论：这种劳动应该在事后得到偿付，这就是说，这里所指的全部资本应该交给劳动。也许那时首

先应该商量一下,到底是谁有权获得这种资本。可是别开玩笑了吧!尽管现在所谈到的这本书持有这样的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尽管它在各方面以极其率直无情的态度反对通常被认为有权威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报刊上经常谈到,马克思打算在对迄今存在过的全部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直到现在为止无论傅立叶还是蒲鲁东,也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报刊上早就多次报道过这部著作。1859年柏林敦克尔出版社曾出版“第一分册”^①,可是它仅仅详尽论述了没有直接的实际意义的内容,因此很少引人注目。以后几分册没有问世,新的社会主义科学似乎忍受不了产前的阵痛。这个经常见诸于报端的新的启示遭到多少嘲讽而它却似乎永远不愿问世!现在好了,“第一卷”终于问世了,如上所述,有50印张,并且没人能够对它说三道四,指责它没有包含太多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指责它没有将所有这一切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这一次马克思用他的不寻常的原理向科学界人士挑战,而不是向大众挑战。科学界人士应该捍卫他们那些在这里从根本上受到驳斥的经济理论规律,他们应该提出论据,论证资本固然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但并不是积累起来的无酬劳动。拉萨尔是实际鼓动家,因此,在实际鼓动中、在日报上、在集会上来反对他可能就足够了。而这里涉及的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这里日报就解决不了问题了,这里只有科学可以做出决断。希望罗雪尔、劳、麦克斯·维尔特等人抓住这个机会,捍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

① 指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编者注

正确性,来抵御这个新的并且无疑不可轻视的进攻。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在一些地方的青年一代和工人居民中间已经发芽生长,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充足的新的养料。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0 月
22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7 年 11 月 2 日《埃尔伯
费尔德日报》第 302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杜塞尔多夫日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⁴⁶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这本书会使某些读者很失望。在某些圈子内谈到它的出版已经好几年了。一些人说，书里应该最终揭示出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和万应药方，一些读者在终于看到它的出版消息后，可能会以为他将从这本书里得知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指望得到这种乐趣，谁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他会从书里知道，事情不应该是那个样子，而且这一点在784页的篇幅上向他说得非常清楚明白，谁有眼睛，谁就会看到：书中足够清楚地提出了社会革命的要求。这里讲的不是像已故的拉萨尔所说的拥有国家资本的工人合作社，这里讲的是根本消灭资本。

马克思现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或许没有人像他那样在一部科学著作中毫不掩盖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对我们进行了非常含糊的暗

示。我们将了解到,大工业“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消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①

我们对此应该感到满足,并且照已出版的这一卷就会推断出,预期的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这个有意义的问题也将给我们提供很少的东西。可是这一回我们应该满足于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在其中进入一个真正的非常广阔的领域。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对这部卷帙浩繁的书中所做的详细推论作出科学的评价,我们甚至不能简略地转述那里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原理。大家多少知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学说可以归结为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这个原理也构成了贯穿这部著作的红线,只是它比从前表述得远为明确,更彻底地贯彻到它的一切结论中,更紧密地与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或者更直接地同它们处于对立地位。著作的这一部分由于力图达到严格的科学性而比我们知道的所有先前的类似著作出色得多,我们将看到,作者不仅仅对自己的理论,而且对整个科学都抱着认真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这一点:作者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国民经济学的原理理解为永远有效的真理,而是理解为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就连自然科学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科学的

^① 见卡·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1卷德文第1版翻译)198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480和731页。——编者注

时候(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拉普拉斯的天文学理论,整个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到现在为止像数学一样仍旧是一种抽象的和普遍有效的科学。无论这本书的其他论断可能遭到怎样的命运,我们认为,使这种狭隘的观念就此终结是马克思不可抹杀的功绩。例如,在这本著作出现以后,不可能再把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自由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上等量齐观了;或者,不可能再把对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大工业有效的规律,直截了当地搬到古代社会或中世纪的行会上去,或者当这些现代的规律不适合于先前的状况时,就简单地宣布先前的状况为异端。在所有民族中,德国人是最具有,而且几乎是惟一具有历史观念的,因此,又是一个德国人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中也发现了历史的联系,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1 月
3 日—8 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7 年 11 月 16 日《杜塞
尔多夫日报》第 316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在曼彻斯特被囚禁的芬尼社 社员与国际工人协会²⁴⁷

星期三晚间^①在西区东城堡街 16 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址举行的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如下的请愿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请愿书。

谨呈御前国务大臣格桑-哈第阁下。

在本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欧洲各国工人协会的代表声明:

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死刑的爱尔兰犯人,将会严重损害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道义影响。赦免了马圭尔就等于正式宣布证据是假的、判决是错的,而依据这同样的证据、同样的判决来处决那四名犯人,将不能算是司法行为而只能算是政治报复。从另一方面说,即使曼彻斯特陪审法庭的判决和所依据的证据不是出自英国政府本身的授意,那么,英国政府现在也必须在旧欧洲的血腥手段和大西洋彼岸年轻共和国的宽大仁慈²⁴⁸之间作出抉择。

我们要求对犯人减刑。减刑将不仅是公正之举,而且也是政治

^① 1867 年 11 月 20 日。——编者注

上的明智。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

执行主席 约翰·韦斯顿
 美国书记 罗·肖
 法国书记 欧仁·杜邦
 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
 瑞士书记 海尔曼·荣克
 西班牙书记 保·拉法格
 波兰书记 扎比茨基
 荷兰书记 德金德伦
 比利时书记 贝松
 总书记 格·埃卡留斯^①”

1867年11月20日

卡·马克思于1867年11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6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① 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删去了海·荣克和安·扎比茨基的名字。——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发言提纲²⁴⁹

一、引言。处决

自从我们上次的会议^①以来,我们所讨论的对象芬尼运动¹⁷⁴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运动接受了英国政府所给予的血的洗礼。曼彻斯特的政治处决使我们想起约翰·布朗在哈珀斯费里的遭遇。^②它们揭开了爱尔兰同英国之间的斗争的一个新时期。整个议会和自由派的报刊要对此负责。格莱斯顿。

原因:要保持伪善的外表,似乎这不是政治性的,而只是一种普通的刑事案件。在欧洲产生了恰好相反的印象。英国人似乎很想保持长期国会²⁵⁰所通过的法令。英国人要求享有一种神圣的权利,可以在爱尔兰本土上反对爱尔兰人,而任何一个爱尔兰人,在英国反对不列颠政府,就会被视为非法。人身保护法²⁵¹暂时停止生效。戒严

① 1867年11月19日国际总委员会会议。——编者注

② 原稿中后面删去了一句话:“不过,奴隶主们至少还把约翰·布朗当做一个叛乱者,而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编者注

状态。《纪事》周刊列举的事实。由政府组织的“暗杀和暴行”。²⁵²波拿巴事件。²⁵³

二、问 题

什么是芬尼运动？

三、土 地 问 题

人 口 的 减 少

1846 年	}	25 年中共减少	1801 年人口为
1841 年——8 222 664			
1866 年—— <u>5 571 971</u>			
2 650 693		2 650 693 人	5 319 867 人
1855 年——6 604 665	}	11 年中共减少	1 032 694 人
1866 年—— <u>5 571 971</u>			
1 032 694			

不仅人口减少了，而且同人口总数相比，聋哑人、盲人、老弱病残者、疯子和白痴的数量增加了。

1855 年到 1866 年牲畜总数的增长

在 1855 年到 1866 年这一时期,牲畜总数增长的情况如下:牛增加 178 532 头,羊增加 667 675 只,猪增加 315 918 头。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同时期中马减少 20 656 匹,并且 1 匹马折合 8 只羊计算,那么牲畜增长的总数应为 996 877 头,即接近 100 万头。

这就是说,1 032 694 个爱尔兰人为大约 100 万头牛、猪、羊所取代了。这些爱尔兰人的情况如何呢?移民名册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

移 民

从 1851 年 5 月 1 日到 1866 年 12 月 31 日移民 1 730 189 人。这种移民的性质。

由于农场的匆忙合并或联合(逐出土地)以及同时变耕地为牧场,移民过程已经开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从 1851 年到 1861 年农场总数减少了 12 万个,与此同时面积为 15 英亩到 30 英亩的农场却增加了 61 000 个,面积为 30 英亩的农场则增加了 109 000 个(共计增加 17 万个)。农场总数的减少几乎完全是由于 1 英亩以下到 15 英亩以下的农场消失而造成的。达弗林勋爵。大农场数目的增长只是表明,所减少的农场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成为规模较大的农场。

这一过程是怎样起作用的

(a)对人民所起的作用

人民群众的处境恶化了,他们的状况正接近像 1846 年那样的危机^①。当前相对过剩的人口已经像饥荒前一样多。

从马铃薯歉收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超过 20%。而马铃薯的价格几乎上涨了 2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平均上涨了 100%。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 1867 年 2 月 9 日的伦敦《经济学家》上写道:

“在 21 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二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 1 先令;而目前的 1 先令只相当于 21 年前的 6 便士。由于一般食品价格上涨,工人的生活比 10 年前更坏了。”

(b)对土地所起的作用

(1)耕地面积减少

粮食作物面积减少:

1861—1866 年——470 917 英亩

青饲料作物面积减少:

1861—1866 年——128 061 英亩

(2)各种作物每一法定英亩^②的产量减少。小麦的产量减少了,而在 1847—1865 年这一段时期中其确切的百分比减少得更多的是:燕麦 16.3%,亚麻 47.9%,芜菁 36.1%,马铃薯 50%。有几年产量减少得更多,但总的来说,从 1847 年起,产量是逐渐减少的。

自从大规模移民以来,土地施肥不足,使用过度,这部分地是由

① 参看本卷第 356 页。——编者注

② 法定英亩是王国法律所规定的英亩,合 4 047 平方米。——编者注

于农场疯狂地合并,部分地是由于在“谷地制”²⁵⁴条件下,租佃者多半让他的雇工去为他施肥。尽管产量减少了,地租和利润却可能增加。总产量可能减少,但是落入地主和大农场主手中而不归雇工所有的、转变为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产品却增加了,而剩余产品的价格也上涨了。

因此,结果是:本地居民逐步被驱逐出去,民族生活的源泉——土地逐步贫瘠和枯竭。

合并的过程

这一过程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进行得颇为迅速。合并首先从1英亩以下到15英亩以下的那些农场着手。即使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全部消失,合并也还远远未达到英国那样的程度。1864年的情况是这样:

全爱尔兰的面积,包括沼泽和荒地,共计20 319 924英亩。其中的 $\frac{3}{5}$,即12 092 117英亩,仍为1英亩以下到100英亩以下的农场所占据,掌握在569 844个租佃者手中; $\frac{2}{5}$,即8 227 807英亩,则为从100英亩到500英亩以上的农场所占据,掌握在31 927人手中。这样,如果我们只算租佃者和他们的家属的话,要被驱逐的有2 847 220人。

这种制度是1846年饥荒的自然后果,因谷物法的废除以及目前肉类和羊毛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加速了它的形成。²⁵⁵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使爱尔兰成了英国的一个隔了一条宽阔的海峡的农业区,这个地区没有常住地主,这些地主和他们的家奴一起住在英国。

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性质的改变

国家只是地主的工具。逐出土地也被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惩罚手段。(阿伯康勋爵。英国。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²⁵⁶。)英国原来的政策:以英国人(伊丽莎白时代)和圆颅党人²⁵⁷(克伦威尔时代)取代爱尔兰人。女王安即位以来的18世纪的政治经济的性质只须用英国对它自己的殖民地爱尔兰采取的保护关税的措施就可以说明;在这个殖民地的内部,则把宗教信仰变成为财产的合法凭证。在实行合并²⁵⁸以后是盘剥性地租和土地中间人的制度,但是爱尔兰人尽管受尽压迫,却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土地的占有者。目前这种制度则是无声无息地、正当地进行着的一种歼灭;政府只是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工具。

从这一改变了的情况产生了:

1. 芬尼运动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下层阶级的运动。
2. 非天主教性质的运动。

到天主教徒解放运动²⁵⁹及其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为止,教士领导人一直在爱尔兰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英国人嘲笑教皇制度。天主教上层教士们反对芬尼运动。

3. 没有一个领导人作为代表选入英国议会。奥康奈尔暴力运动的性质。议会中的爱尔兰党的消亡。

4. 民族性质。欧洲运动的影响和英国的表达方式。
5. 美国、爱尔兰、英国——三个活动场所;美国的领导作用。
6. 共和运动,因为美国是共和国。

我在这里已说明了芬尼运动的特征。

四、英 国 人 民

人道和正义的事业,但首先是独特的英国问题。

(a)贵族、教会和军队。(法国,阿尔及尔。)

(b)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对工资的影响等。磨灭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性格差异。爱尔兰人的性格。爱尔兰人的纯洁。在爱尔兰进行教育的尝试。犯罪数字的缩减。

爱尔兰的判罪

受审讯者	被判罪者
1852 年——17 678	10 454
1866 年—— 4 326	2 418

1855 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审讯人数所以减少,部分地是由于 1855 年的刑事法;这一法律使法官有权在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判处短期徒刑,而不必将案件移交法庭开庭审判。

伯明翰。英国人民的进步。英国报刊的卑鄙无耻。

(c)对外政策。波兰等。卡斯尔雷。帕麦斯顿。

五、挽救的办法

议会的无足轻重的提案的荒唐。

改革同盟的错误。²⁶⁰

取消合并是英国民主党派的一个要求。

卡·马克思写于 1867 年 11 月
19 日—26 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60 年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剽 窃²⁶¹

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
济学批判》1867年版。《工作日》
一章

关于工作日的讨论

冯·霍夫施泰滕(《社会民主
党人报》的所有人)说:

(1)“劳动力在目前是一种商品……一个物品的(应当说:商品的)购买价格(应当说:价值)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工人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数,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的价值;这是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但决不是工作日本身。为了确定工作日,必须(为什么?)加上一个不定部分;虽然这个部分是不定的,但它终究有自己的必要界限。”

(1)“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生产工人一天生活资料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那么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劳动6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而,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一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它的一部分固然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变化……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第198、199页,[第204—206页])^①

(2)“一个〈界限〉,即最高界限以体力的可能性为依据〈界限怎么能以一种可能性为依据!〉,也就是以人究竟能工作多长时间为依据,因为他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还要睡觉、休息、穿衣、盥洗。最低界限取决于一个时代当时的文化状况所提出的要求。依照这种文化状况和现行法律,工作日和剩余劳动持续的时间也就不同。因此,就有8小时、10小时、16小时,甚至18小时工作日。”

(2)“不过它(工作日)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剩余劳动=0,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

^① 本文中圆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1版的页码,方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根据第1卷德文第1版翻译)198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的页码。——编者注

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人在一个 24 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而这种力的支出的限度就是他的身体所能及的劳动时间的限度。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 8 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定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定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但是这两个界限（即身体的和道德的最高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 8 小时、10 小时、12 小时、14 小时、16 小时、18 小时的工作日。”（第 199 页[第 206 页]）

冯·霍夫施泰滕先生把他所抄袭的段落变成无稽之谈。例如，他把工作日的**最高界限**说成是由**纯粹体力的界限**决定的，把它的**最低界限**说成是由**道德界限**决定的，而在此之前他本人已经鸚鵡学舌般

地说了下面这句话：工作日的必要部分，也就是它的绝对最低界限，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3)“英国的经验表明，通过大大强化劳动，在较短的工作日中可以获得同样多的剩余劳动。”

(4)“可见，资本家追求尽量延长工作日的目标。〈何等荒唐！追求目标！〉但是工人只有一种商品，即他的劳动力，如果超过了劳动力的某个点〈什么叫超过劳动力的某个点？〉，那么也就应当说：我被耗尽了(!)我被杀害了。〈妙极了！他已经被杀害了，还应当这么说！〉因此〈因为他应当这么说！〉劳动的限度应当按照工人的利益来确定，以便使劳动力这一商品能够尽可能久地保存下来并得到充分利用。他这样做所要求的只是他的正当权利。〈他刚刚抱怨自己被耗尽了，现在又要求得到充分利用，把得到充分利用看做是他的正当权利！〉”

(3)关于英国用法律强制缩短工作日强化劳动和获得同样多的或更多的“剩余劳动”。见第401—409页[第393—401页]。

(4)“资本家坚持的只是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因而工人坚持的也只是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我愿意(他说)爱惜我惟一的财产——劳动力……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等等)”(第202、201页[第209、208页])

(5)“在英国,这个限度(工作日的限度)法律上规定为10小时(!),那里有工厂视察员向内閣报告这一法律的遵守情况。在许多国家也有限制童工劳动的法律:在奥地利、瑞士、美国和比利时(!)正准备拟定类似的法律(!)。在普鲁士也有类似的法律,但它们不过是一纸空文,从来没有付诸实施。在美国,在使奴隶获得解放的战争结束以后,甚至提出过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1866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也建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

(5)“1850年制定的现行工厂法(不是在英国,而是在马克思所举出的联合王国的个别工业部门中)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10小时……为了监督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第207页[第214—215页])

……在北美合众国的一些州不是准备而是实行限制幼年工的工作日(第244页[第248页]),在法国全面限制工作日(第251页[第254页]),在瑞士的一些州(第251页[第254页])、在奥地利(第252页[第254页])对儿童全面限制工作日,而在比利时并没有类似的法律。(同上[第254页])如果冯·海特、曼托伊费尔等人的指令得到执行,那么它们是值得称道的。(同上[第254页])“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

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与此同时……‘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²⁶²（第279—280页[第279—280页]）

同冯·霍夫施泰滕先生一样，那位追随他的演说家，汉堡的盖布先生也歪曲了马克思所叙述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他们两人都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的智慧的来源。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2月
6日

载于1867年12月12日《未来报》第291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观察家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⁶³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无论人们对本书的倾向持什么看法,我们还是认为可以这样说:它是给德国精神带来荣誉的成果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是普鲁士人,但是他是莱茵普鲁士人,而莱茵普鲁士人直到不久前还爱把自己叫做“迫不得已的普鲁士人”;此外作者还是一个在远离普鲁士的流亡中度过近几十年的普鲁士人。普鲁士本身早已不再是具备任何科学首创精神的国家,特别是在历史、政治或社会学科中,似乎更不具备首创精神。与其说它是德国精神的代表,不如说它是俄国精神的代表。

至于这本书本身,我们应该对其中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加以明确区分:一部分是书中纯粹的正面的阐述;另一部分是作者从中得出的带有倾向性的结论。前者大部分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此用崭

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述了经济关系。例如,对货币问题的表述,以及对下面的问题的详细的、非常内行的论证:各个不同的相互接续的工业生产形式——在这里是协作、分工以及与之并存的狭义工场手工业,及至机器、大工业和与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关系——如何自然而然地一个接着一个发展出来。

至于作者的倾向,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区分出双重趋向。因为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只是力图将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证明的那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在社会领域中作为规律确立起来。实际上,迄今为止,在从古代经过中世纪直到现在的社会关系中都已发生过这种逐渐的变化;而据我们所知,在科学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认真地断定,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已经对现代社会的未来发展说出了定论。相反,关于进步的自由主义学说也包括了社会领域的进步,而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狂妄怪论把事情说成似乎他们单独包办了社会的进步。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指出,甚至在目前状况极端片面发展伴随着直接的可怕后果的地方也存在着进步。这一点在描写从整个工厂制度中产生的极端贫富等等时随处可见。正是通过对论题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作者——无疑是违反自己的意志的——提供了反对所有专业的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据。

谈到作者的倾向、主观结论和他怎样向自己和其他人表述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这些与我们称之为本书的正面部分没有共同之处。如果篇幅许可对此加以探讨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明,他的这些主观狂想,被他自己的客观叙述本身驳倒了。

如果说,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向普鲁士土容

克献媚,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马克思先生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对现在社会阶段就是这样称呼的)的历史必然性,也同样明确地指出了那些只会消费的占有土地的容克阶级的多余性。如果说,拉萨尔头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建立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使命,那么马克思先生则足够响亮地否定了自己的不肖学生。他不仅明确地声明,他与一切“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①没有共同之处,而且还在 762 页及下面一页上^②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在法国和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很快就会导致俄国的鞭子对欧洲的统治。

最后我们要指出:我们在上文中只能关注这部庞大卷帙的一些基本特征;在详细地分析时,还可以指出许多我们在这里必须省略的东西。有足够的专业杂志正是为此而存在的,它们无疑会对这部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出色的著作加以探讨。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2 月
12—13 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观察
家报》第 303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116 页。——编者注

② 见卡·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翻译)1987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 750—751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 为《符腾堡工商业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⁶⁴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我们关注这本书，这当然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经公开表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人注意的科学阐述和真实材料。我们也不在这里探讨科学部分，因为这离我们的目的较远，我们因此仅仅限于事实方面。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著作，无论是德文的还是外文的，能够像本书第302—495页^①上的三章——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那样，如此清晰完整地概括分析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1卷德文第1版翻译)198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302—483页。——编者注

的基本特征。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贡献给予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地方透露出特殊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使作者得到公平的对待。他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事实的结果加以阐述。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最新形势时,则取自目前德国还不知道的真实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德国的生意人不仅从日常赢利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工业,而且把它看做各国整个庞大的现代工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因此也关心同自己的部门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他们在这里会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源泉,并将感谢我们促使他们注意这一点。要知道每一个经济部门个别地、安静地独自存在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它们全都互相依赖,既依赖遥远的国家的进步,也依赖紧邻的国家的进步以及世界市场变化无常的行情。如果新的关税同盟条约²⁶⁵很快就会造成迄今为止的保护关税的减低(这大概是可能的),那么大体上熟悉一下现代工业史,以便从中预先学会在这样的变动中如何采取最适宜的行动,对于我们所有的工厂主就成为必要的了。迄今为止,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却一再拯救了我们德国人的高度素养,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成为用来反对粗俗的实利主义的英国人的最好的武器。

这把我们引到另一个问题上。如果制定了新的法律,工厂主自己要求在同盟国家的工厂中对劳动时间作出相同的规定这一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劳动时间,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时间,完全由工厂主随意决定,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则大大受到限制,那么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个方面难免要就作出共同规定达成谅解,在保护关税确实必须降低时,更是如此。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德国非常缺乏经验,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经验,我们完全依靠从其

他国家的立法特别是英国的立法及其成果中可以吸取的那些教训。在这里作者对德国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他根据官方的文件,极其详细地论述了英国工厂立法及其结果的历史(参看第 207—281、399—496 页^①及后面某些地方)。英国工业史的这一整个方面,德国几乎一无所知,而读者将惊奇地了解到:在今年的议会法令把不下于 150 万工人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以后,现在不仅差不多全部工业劳动,而且大部分家庭工业劳动,以及一部分农业劳动,在英国都置于官吏的监视下了,而且劳动时间受到直接或间接的限制。我们请求我们的工厂主们,不要因为本书的倾向而不去阅读这本书,特别是要认真研究本书的这一部分;你们肯定迟早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 1867 年 12 月
12—13 日

载于 1867 年 12 月 27 日《符腾堡工商业报》第 306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 1 卷德文第 1 版翻译)1987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 214—281、392—483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 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²⁶⁶

一

芬尼运动¹⁷⁴的特征是什么？它实际上是在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即住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产生的。他们是发起人和领导者。但是在爱尔兰本土，这个运动只是扎根于（并且至今仍然真正扎根于）人民群众即下层阶级中。这就是芬尼运动的特点。在以前所有的爱尔兰运动中，人民只是跟着贵族或者中间阶级人士跑，而且向来是跟着天主教教士跑。在起义反对克伦威尔的时候，领导者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氏族领袖和教士²⁶⁷，在对威廉三世作战的时候，领导者甚至是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²⁶⁸，在1798年革命中，领导者是阿尔斯特的共和派新教徒（沃尔夫·汤恩、菲茨杰拉德勋爵）²⁶⁹，最后，在本世纪，领导者是资产者奥康奈尔，他得到天主教教士的支持，而天主教教士在过去除1798年以外的历次运动中也都起过领导作用。

芬尼运动被天主教教士革出教门。后者直到害怕因此而完全失去在爱尔兰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时,才停止与芬尼运动为敌。

二

英国人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发现,和过去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相比较,目前的制度已经是温和的了。那么,目前怎么会这样特别坚决而不可调和的对抗方式呢?我要指出(甚至支持爱尔兰人并承认爱尔兰人有与英国分离的权力的那些英国人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1846年以来,压迫虽然形式上不那么野蛮了,但实质上却是毁灭性的,除了或者英国自愿解放爱尔兰,或者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三

至于过去的历史,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种种事实。因此,我应当只指出其中几件事实,以便首先说明目前和过去时代的区别,其次阐明目前称之为爱尔兰人民的那些人的某些特点。

(a)新教改革运动以前英国人在爱尔兰

1172年。亨利二世。连爱尔兰的三分之一也未征服。名义上的征服。教皇阿德里安四世(英国人)的礼物²⁷⁰。大约经过了400

年(伊丽莎白时代)(1576年),另一个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又从英国人(伊丽莎白)手里夺回了这个礼物。“英国的佩耳”²⁷¹。首都——都柏林。一般的英国移民和爱尔兰人的混合,盎格鲁诺曼贵族和爱尔兰的首领们的混合。总的来说,征服战争(最初)就像征服红种印第安人的战争一样。1565年(伊丽莎白)以前,英国没有派援军去爱尔兰。

(b)新教时代。伊丽莎白。詹姆斯
一世。查理一世。克伦威尔。
殖民计划(16—17世纪)

伊丽莎白。计划是在至少到香农河为止的地区内消灭爱尔兰人,夺得他们的土地,让英国移民住进他们的地区等等。在反对伊丽莎白的斗争中,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和本地居民一起同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公然承认的计划。清扫岛上的本地居民,把忠君的英国人安置到该岛。他们只做到了安置土地贵族。从英国国王手中取得没收来的土地的英国新教徒“冒险家们”²⁷²(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应把本地英国人家庭安置到让出的地产上的“经营贵族”。

詹姆斯一世。阿尔斯特^①。(詹姆斯时代的殖民,1609—1612年)。英国的经营者必须“把爱尔兰人安置在没收和窃取的土地上”。

① 原为爱尔兰最北端的一个省,按照1921年英爱条约的规定,爱尔兰南部组成自由邦以后,仍归英国统治的北爱尔兰通称阿尔斯特。——编者注

直到1613年,爱尔兰人才被认为是英国的臣民,在这以前,他们被视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和“敌人”,而爱尔兰议会²⁷³只管辖佩耳。对天主教徒的迫害。

伊丽莎白向芒斯特殖民,詹姆斯一世向阿尔斯特殖民,但是伦斯特和康诺特尚未被清扫。查理一世企图清扫康诺特。

克伦威尔:爱尔兰的首次民族起义,它再度被完全征服,部分地再度殖民地化(1641—1660年)。

1641年的爱尔兰革命。1649年8月,克伦威尔在都柏林登陆。(在他之后还有艾尔顿、兰伯特、弗利特伍德、亨利·克伦威尔)。1652年,爱尔兰第二次被完全征服。根据1652年8月12日和1653年9月26日的英国议会法令²⁵⁰瓜分战利品。政府本身、为11年战争贷款36万英镑的“冒险家”、军官和士兵。将爱尔兰民族斩尽杀绝的亚玛力人²⁷⁴,在这些再次荒芜了的土地上重新建立完全是外来的英国清教徒的新殖民地。流血,破坏,使整个整个的郡人口减少,将它们的居民移居别处,把许多爱尔兰人卖到西印度群岛做奴隶。

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

从此以后,爱尔兰人对英国人民政党就失去了信任。

(c)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威廉三世。第二次爱尔兰起义和有条件投降²⁷⁵。1660—1692年^①

那时,在爱尔兰的英国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在爱尔兰人口

① 在手稿上下面还有:“(1701)(安)”等字。——编者注

中所占的比例不多于十一分之三,也不少于十一分之二。

1684年。查理二世开始庇护爱尔兰天主教的利益并征募天主教军。

1685年。詹姆斯二世给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完全自由。天主教军扩大并受到庇护。天主教徒不久就声明必须废除整顿法令²⁵⁰,并恢复1641年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詹姆斯征集几个爱尔兰团前往英格兰。

1689年。英国的威廉三世。1689年3月12日。詹姆斯率领爱尔兰士兵在金塞尔登陆。利默里克向威廉三世投降,1691年。无耻地破坏协定的行为在威廉三世时即已发生,而到安时更是变本加厉。

(d)爱尔兰被愚弄并受尽屈辱。

1692年—1776年7月4日

(a)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自耕农或租佃农场主“殖民”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打算都放弃了。企图使德国和法国的新教徒移居。城镇中的法国新教徒(毛织手工业厂主)逃避英国的保护关税和重商主义的制度。

1698年。英爱议会²⁷³(就像顺从的移民那样)根据宗主国的命令,对爱尔兰毛织品输出到别的国家实施禁止性关税。

1698年。就在同一年英国议会决定对爱尔兰产品输入英格兰和威尔士课以重税,并完全禁止爱尔兰产品向其他国家输出。英国摧毁了爱尔兰工场手工业,使爱尔兰城市人口减少,迫使居民回到土地上去。

威廉时代的(外来地主中的)在外地主²⁷⁶。自1692年开始出现

对在外地主的怨言。

类似的抵制爱尔兰畜牧业的英国法律。

1698年：莫利纽的小册子^①拥护爱尔兰议会（即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脱离英国人而独立。这样就开始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地和英格兰民族的斗争。同时，英国的爱尔兰殖民地和爱尔兰民族之间的斗争。威廉三世反对英国议会和英爱议会破坏利默里克协定和戈尔韦协定的无耻的企图。

(β)女王安(1701—1713年；乔治，1776年以前)。

惩治法典²⁷⁷由英爱议会拟就并经英国议会批准。通过调整“财产”使爱尔兰天主教徒改信新教这种极可耻的手段。惩治法典的目的：使“财产”从天主教徒手中转入新教徒手中，或者使“英国国教”成为财产的合法凭证。（教育。个人权利的丧失。）（天主教徒都不得当兵。）宣讲天主教是应处以流放的重罪，使新教徒改信天主教是叛国行为。担任天主教大主教要被放逐；如果他从放逐地返回便是叛国，处以绞刑，活活地开膛剖肚，然后被肢解。企图强迫爱尔兰人民大众改信英国国教。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议员的权利。

这一惩治法典加强了天主教教士对爱尔兰人民的控制。

穷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

在新教统治极盛和天主教衰落时期，新教徒在数量上并没有超过天主教徒。

① 威·莫利纽《英国议会法令束缚下的爱尔兰的状况》1698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e)1776—1801年。过渡时期

(α)在谈到这一过渡时期以前,让我们先看一看,英国恐怖统治的结果是什么?

英国移民溶入爱尔兰人民中并改信天主教。

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建立起城市。

不存在英国人移民区(除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移居区以外),但是存在着英国的土地占有者。

北美的革命乃是爱尔兰历史中第一个转折点。

(β)1777年英国军队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向美国“反叛者”投降。英国内阁被迫对在爱尔兰的(英国)民族主义政党作出让步。

1778年。罗马天主教徒补偿法案^①(由英爱议会通过)²⁷⁸。(天主教徒仍然没有权利通过购买或租赁获得自由地产²⁷⁹。)

1779年。和大不列颠实行自由贸易。几乎所有加于爱尔兰工业的限制都废除了。

1782年。惩治法典中的一部分条款失效。准许罗马天主教徒获得自由地产,终身或世袭占有,并准许开办学校。

1783年。英爱议会获得平等权力。

1792—1793年冬季。法国政府并吞比利时,英国决定对法国开战,此后,惩治法典又有一部分条款失效。爱尔兰人可以担任军队中的上校,获得了选举爱尔兰议会的权利,等等。

1798年的起义。贝尔法斯特的共和派(沃尔夫·汤恩、菲茨杰

① 《罗马天主教徒补偿法案。[1704年]》。——编者注

拉德勋爵)。爱尔兰农民尚未成熟。

英爱议会下院投票赞成1800年通过的合并法令²⁵⁸。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同英国人的斗争由于英国和爱尔兰的立法机构以及关税制度的统一而告结束。殖民地反对非法的合并法令。

1801—1846年

(a)1801—1831年。在这段时期中(在战争结束^①以后),在爱尔兰人和英国人中兴起了解放天主教徒的运动(1829年)。

从1783年起,爱尔兰在立法方面独立,此后立即对非爱尔兰生产的各种商品征收税款,其公开的目的是让部分爱尔兰人可能利用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等。自从合并法令生效之后,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爱尔兰工业逐渐消失。

都柏林

毛纺织厂厂主	1800年——	91;	1840年——	12
毛纺织厂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	4 918;	1840年——	602
梳毛厂厂主	1800年——	30;	1834年——	5
梳毛厂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	230;	1834年——	66
地毯工厂厂主	1800年——	13;	1841年——	1
地毯厂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	720;	1841年——	0
丝织机织工	1800年——	2 500;	1840年——	250

基尔肯尼

毛毯厂厂主	1800年——	56;	1822年——	42
毛毯厂中的雇佣工人	1800年——	3 000;	1822年——	925

① 指1815年英国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结束。——编者注

巴尔布里根		
开工的细棉布织机	1799年——2 500;	1841年——226
威克洛		
开工的手织机	1800年——1 000;	1841年—— 0
科 克		
织带工	1800年——1 000;	1834年—— 40
精纺毛织品织工	1800年——2 000;	1834年—— 90
针织工	1800年—— 300;	1834年—— 28
梳毛工	1800年—— 700;	1834年——110
棉织品织工	1800年——2 000;	1834年——220

如此等等。亚麻工业(阿尔斯特)不能补偿。

“有14 000个工人工作的都柏林棉织工业被消灭了;3 400台丝织机被消灭了;有1 491个工人工作的斜纹布生产被消灭了;拉斯德拉姆的法兰绒生产、基尔肯尼的毛毯生产、班登的羽纱行业、沃特福德的精纺毛织品生产、舒尔河畔卡里克的平纹结子花呢和起绒粗呢的生产——全都被消灭了。剩下的只有一个行业!……这一没有被合并法令摧毁的幸运的行业,这一享受优惠、特权和保护的行业就是爱尔兰的生产棺材的行业。”(托·弗·马尔的发言,1847年)

每一次爱尔兰准备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会被压倒而重新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

根据1861年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

爱尔兰的农业人口

(包括所有茅舍贫农²⁸⁰和雇农以及他们的家属)…………… 4 286 019

在798个城镇中(其中有许多实际上

只是小市镇)…………… 1 512 948

5 798 967

因而,(在1861年)将近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纯粹的农业人口,如果加上市镇,实际上可能有七分之六。

因此,爱尔兰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土地就是生命”(布莱克本法官)。土地成了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现在人民只有一种选择:或是不惜任何租金租得土地,或是饿死。盘剥性的地租制度。

“因此,地主能够强使别人接受他规定的条件,于是我们听说每英亩的租金就达到5英镑,6英镑,8英镑甚至10英镑。高得出奇的租金,低工资,贪婪而游手好闲的地主将大规模的农场租给垄断的土地投机者,再由这些充当中间人的压迫者以五倍的高价分块租给只以马铃薯和白水充饥的、饿得半死的不幸者。”

全民性的饥饿状态。

英国的谷物法²⁸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爱尔兰谷物向英格兰输出的垄断。在合并法令通过的头三年中,平均每年输出谷物约30万夸特。

1820年输出100万夸特以上。

1834年年平均输出250万夸特。

付给在外地主的地租和抵押利息的总额(1834年)超过3000万美元(约合700万英镑)。土地中间人积累了财产,他们不愿意把这些财产投资于改良土壤;而在压抑工业的制度下,也不可能用来投资于机器等。因此,他们的全部积累都拿到英格兰去投资了。英国政府所公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证明,英国的有价证券从英国转到爱尔兰,也就是说,爱尔兰资本在英国的投资,在1821年实施自由贸易以后的13年中,已达数百万英镑;因此,为了建立“英国的宏伟的企业”,爱尔兰被迫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本。

大量的猪及其输出。

1831—1841年。爱尔兰人口从7 767 401人增加到8 175 238人

10年中共增加	407 837
同时期中移民(每年略多于40 000人)	<u>450 873</u>
共计	858 710

奥康奈尔。取消合并运动²⁸²。同辉格党人的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部分地区的饥荒。起义法,武器法,高压法。

四

最近20年间(从1846年起)。

爱尔兰的清扫领地

以前常常在部分地区发生饥荒。目前是普遍的饥荒。

这一新的阶段是由马铃薯病害(1846—1847年)、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大批移民开始的。

有100万人以上死亡,其中一部分直接死于饥饿,一部分死于(饥饿所引起的)疾病等。从1847年到1855年的9年中,有**1 656 044人**移居国外。

旧的农业制度的变革最初是土地荒芜的自然结果。人们纷纷逃亡。(一些家庭合资把最年轻有为的青年送往国外)。因此,小块租佃的土地合并起来,种植业为畜牧业所代替。

但是,很快又出现了另一些情况,由于这些情况,上述这一切就变成了**一种有意识、有计划地实行的制度**。

第一,主要的因素:爱尔兰灾难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谷物法的废除。结果,爱尔兰的谷物就丧失了平常年份它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

地位。谷物的价格下跌了。支付地租已不可能。同时,在最近20年中,肉类、羊毛和其他畜产品的价格却稳步上涨。英国毛纺织工业的空前高涨。养猪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旧的制度相联系的。目前,主要是养羊和牛。爱尔兰现在失去了英国市场,就像过去由于合并法令使它失去自己本土的市场一样。

在这方面有秩序地起作用的还有以下一些连带因素:

第二,英国农业的改造;在爱尔兰则是对这种改造的拙劣的模仿。

第三,饥饿的爱尔兰人绝望地逃亡到英格兰,因此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的所有地窖、陋屋和习艺所¹⁶⁷都挤满了饿得奄奄一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1847—1848年),规定爱尔兰地主必须救济住在他们的领地上的贫民(英国的济贫法¹⁷⁰推广到了爱尔兰)。因此,大半都负债累累的爱尔兰的(特别是英国的)地主,企图摆脱这些人,清扫自己的领地。

第四,负债地产法令(1853年?):

“地主破产了,因为他无法收得地租,但同时却必须为维持穷邻居的生活而付出大量税款。他的土地由于抵押和债务而负担沉重,因为举债时食物价格昂贵,他已无力偿付利息;现在又通过了一项法律,它规定财产可以立即拍卖,拍卖所得分给合法的债权人。”

由于这种情况,在外地主(英国的资本家,保险公司等)的数目增加了,那些希望按现代经济方式来经营农场的以前的土地中间人等的数目也增加了。

驱逐租佃者部分是采取双方就废除租约达成友好的协议的方式。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却是采取大规模驱逐的方式(由撬棍队强制

执行,他们的做法是先把屋顶掀掉),强制性驱逐。(这也是一种政治惩罚手段。)这从1847年起一直继续到现在(阿伯康,爱尔兰总督)。非洲式的袭击(非洲小酋长那种袭击)。(人民被逐出土地。城镇中挨饿的人口大大增加。)

“租佃者成批地同时被从茅舍中赶走……这一行动是由地产代理人来指挥的。大批的警察和士兵被调来完成这一行动。在警察和士兵的保护之下‘棍队’开进要毁灭的村庄,占领住房……早上,太阳升起时还是好好的一座村庄,傍晚,太阳落山时已是一片荒凉了。”(《戈尔韦报》,1852年)(阿伯康)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种制度对同英格兰的条件完全不同的爱尔兰的土地起什么作用。

1861—1866年耕地面积的缩减

粮食作物面积的缩减	青饲料作物面积的缩减
1861—1865年——428 041 英亩	1861—1865年——107 984 英亩
1866年——42 876 英亩	1866年——20 077 英亩
共计……… 470 917 英亩	共计……… 128 061 英亩

各种作物每一法定英亩^①的产量的减少

1847—1865年间,确切的百分比分别是:燕麦——16.3%;亚麻——47.9%;芜菁——36.1%;马铃薯——50%。有几年产量减少得更多,但总的来说,从1847年起,产量是逐渐减少的。

① 法定英亩是王国法律所规定的英亩,合4 047平方米。——编者注

估计每一法定英亩的平均产量

	小麦 (单位:夸特)	马铃薯 (单位:吨)	亚麻 (单位:英石,每英石为14磅)
1851年——	12.5	5.1	38.6
1866年——	11.3	2.9	24.9

尽管爱尔兰过去输出过大量小麦,而现在据说只适宜于种植燕麦了(每一英亩的燕麦产量也在不断减少)。

事实上:1866年爱尔兰只输出了13 250夸特小麦,而输入的却有48 589夸特(即几乎达四倍之多)。同时,爱尔兰输出的燕麦约100万夸特(值1 201 737英镑)。

自从大规模移民以来,土地施肥不足,使用过度,这部分是由于农场疯狂地合并,部分是因为在“谷地制”²⁵⁴条件下,租佃者多半让他的雇工去为他施肥。尽管产量减少了,地租和利润(在租佃者不是自耕农的地方)却可能增加。总产量可能减少,但是其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转变为剩余产品,落入地主和(大)农场主手中。而剩余产品的价格也上涨了。

因此,地力(逐渐)耗竭,就像古罗马人在西西里岛所做的那样(在埃及也如此)。

我们就要谈到牲畜,但是首先来谈谈人口。

人 口 的 减 少

1801年——5 319 867人;1841年——8 222 664人;1851年——6 515 794人;1861年——5 764 543人。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到1871年就会是5 300 000人,也就是比1801年时还少。但是我在下面就要指出,即使移居国外者所占的百分比不变,1871年的人口数也还要更少一些。

移 民

当然,移民是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在1845年到1866年间,爱尔兰人移居国外的有1 990 244人,即将近200万人。(真是闻所未闻!)(约占1845—1866年间联合王国移民总数4 657 588人的五分之一。)(1831年到1841年间,移民几乎等于这10年间人口增长数的一半。1847年以后,移民又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增长数。

但是,单用移民还不足以说明从1847年以来人口减少的原因。

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的减少

在1831—1841年间,(每年的)增长为1.1%或大约 $1\frac{1}{10}\%$ 。如果1841—1851年间人口也按这一比例增长的话,那么到1851年,就应该是9 074 514人了。但是实际上却只有6 515 794人。这就是说,差额为2 558 720人。其中移居国外的有1 274 213人。还剩1 284 507人。不能得到解释。有100多万人死于饥饿,但这还不能填补1 284 507人这一全部差额。因此,1841—1851年间人口的自然增长显然降低了。

对于1851年到1861年10年间情况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没有发生饥荒。人口总数从6 515 794人减少到5 764 543人。减少的

绝对数字为751 251人。但是在这一时期中，移居国外的有1 210 000人以上。也就是说，10年间人口的增长约为460 000人，因为751 251人+460 000人等于1 211 251人，即移居国外的人数。移居国外的人数几乎达到人口增长数的三倍。每年人口增长率为0.7%，比1831—1841年间的1.1%要低得多。

理由很简单。由出生形成的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20岁至35岁这一部分人和其他年龄的人的比例。现在20岁至35岁这一部分人在联合王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3.98或25.06%，而在移居国外的人们中，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即使在现在也约为1:1.89或52.76%。在爱尔兰，这种百分比大概还更高些。

居民体质的恶化

在1806年，人口总数为5 574 107人，男子比妇女多50 469人；而在1867年，人口总数为5 557 196人，妇女比男子多。同时，居民中的聋哑人、盲人、疯子、白痴和老弱病残者的数量，不仅相对地而且绝对地增加了。以1851年和1861年相比，可以看出，人口虽然大大减少，聋哑人的数字比原来的总数5 180人增加473人；老弱病残者比原来的总数4 375人增加225人；盲人比原来的总数5 767人增加1 092人；疯子和白痴比原来的总数9 980人增加4 118人这样一个极大的数字——也就是说，到1861年，虽然人口减少，疯子和白痴却达14 098人。

工 资

从马铃薯歉收引起饥荒以来，工资提高不超过20%。而马铃薯

的价格却几乎上涨了200%，生活必需的食品的价格则平均上涨了100%。

克利夫·莱斯利教授在1867年2月9日的《经济学家》上写道：

“在21年中人口减少 $\frac{2}{5}$ 以后，目前几乎全岛的常规工资每天只有1先令；而目前1先令的购买力只相当于21年前的6便士。由于一般食品价格的上涨，工人的生活比10年前更坏了。”

部分地区发生饥荒，特别是在芒斯特和康诺特。

小店主不断破产。小城镇衰落等。

过程的结果

在1855—1866年间，有1 032 694个爱尔兰人被996 859头牲畜（牛、羊、猪）所取代。这实际上是这一时期中牲畜增加的数字。这一时期马的数量的减少（20 656匹，8只羊折合一匹马），由羊的数量来抵补，因此这一数字已从增长的数字中扣除。

农场的合并

从1851年—1861年：农场总数减少了12万。（虽然从15英亩到30英亩的农场以及30英亩和30英亩以上的农场的数目增加了。）因此，减少的主要是1英亩到15英亩以下的农场。

在1861年，将近 $\frac{3}{5}$ 的土地面积（爱尔兰的总面积为20 319 924英亩），即1 200万英亩，掌握在耕种1英亩到100英亩以下小块土地的569 844个租佃者手中。约有 $\frac{2}{5}$ 的土地（800万

英亩)掌握在有100英亩以上到500英亩和500英亩以上的地块的租佃者手中(租佃者31 927人)。

农场合并的过程正在以全速进行着:阿尔斯特。(种植亚麻,租佃者为苏格兰新教徒。)

《泰晤士报》等为这种制度正式向阿伯康总督祝贺。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毁灭者。达弗林勋爵:人口过剩等。

总之,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马尔、亨尼西、《爱尔兰人报》。

爱尔兰犯罪数字的缩减

受审讯者	被叛罪者
1852年——17 678	10 454
1866年——4 326	2 418

五

合众国和芬尼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1867年12月
16日以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60年俄文第2
版第16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1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新巴登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⁸³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
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我们理应让别人去研究这部著作的理论部分和严谨的科学部分,批评作者关于资本起源的新看法。可是我们不能不提请大家注意,他在书中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来源于各种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提交的正式报告。他不失公正地着重指出这些调查委员会对于研究一个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重要性。它们如果由合适的人组成,则是一个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好手段;而马克思先生说,在德国进行类似的调查,必将得出令我们自己大吃一惊的结果,他这样说也许是对的。要知道,在进行这类调查之前,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自己国家较贫穷的阶级的状况如何!

此外,不言而喻,如果没有这一类调查,那么任何社会立法,就像人们现在在巴伐利亚所谈论的那样,都将在一知半解并且常常是完

全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完成。德国政府机关的所谓“检查”和“调查”，并没有消除这类调查的价值。官僚主义的老一套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分发一些表格，随便怎样填写，能返回来就很令人高兴了；而通过填表了解到的情况又往往恰恰来自那些乐于掩蔽真相的人。而英国的委员会的调查，例如关于各工业部门劳动条件的调查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受到调查的不仅仅有工厂主和工头，而且还有工人，连小姑娘都包括在内；此外还有医生、治安法官、教士、教师以及每个能够以任何方式就这个问题提供情况的人。这里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回答都用速记记录下来，逐字地刊印出来，全部材料附以委员会据此而写的带有结论和建议的报告。这样，报告及其材料一起具体地表明了委员会成员是否履行了和怎样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且任何个人的偏颇态度都很难得逞。读者自己可以从上述这本书里读到更详细的情况以及无数的例子。这里我们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在英国，对儿童和妇女的劳动时间的法律限制的扩展是与工商业自由的扩展同步进行的，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状况都在政府的监督之下。马克思先生向我们详细地历史地叙述了这种发展。从1833年起首先如何在纺纱业和织布业中以这种方式将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经过工厂主和工人之间长期的斗争，劳动时间终于被规定为10小时半，儿童为6小时半，并且各工业部门从1850年起相继服从于这个工厂法。最初是印花工厂（1845年就已如此），然后从1860年起是染房和漂白坊，从1861年起是花边工厂和织袜工厂，从1863年起是陶器工厂、壁纸工厂等等，最后到了1867年，几乎其余所有稍具规模的工业部门。如果人们得知1867年的最后一项法令把不下于150万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置于法律的保护和监督之下，那么也就可以想见这项法令的意义。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

题,是因为我们德国在这一方面从整体上来看情况是相当糟糕的,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如此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并且第一次使德国公众能够了解这个问题。每一个仁义的人,无论他对马克思先生的理论原理持何种态度,都会有这样的看法。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再谈及工农业史的其余珍贵材料。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对国民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应不读这本书。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1 月
上半月

载于 1868 年 1 月 21 日《新巴登
报》第 2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Organ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No. 12.

Leipzig, den 21. März.

1868.

弗·恩格斯

为《民主周报》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⁸⁴

马克思《资本论》^①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们，有一种积累的劳动存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由于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累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么，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么可能呢？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家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

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 000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 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塔勒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抽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也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把它卖出去,是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30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诈而产生,因为互相欺诈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计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

致的。

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个工作日,那么,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的、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大的泉源。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3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3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恰好用3天时间,还是用2天或者4天时间来补偿工资,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而变化的。但主要的是,资本家在他支付报酬的劳动以外,还榨取了他**不支付报酬的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就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那时他的全部利润便落空了。

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的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无酬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因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时,仍然要由无酬劳动构成。商人把棉花卖给一个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会在上述100塔勒之外,从他的产品中为自己抽取出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酬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

员,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状况都是建立在这种无酬劳动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酬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另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占支配的形式,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要“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他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第202页^①)。

二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每一个被资本家雇用的工人都在做双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劳动,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做剩余劳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劳动3天来偿还他的工资,再劳动3天,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劳动6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再劳动6小时,生产剩余价值。在一星期中,人们只能劳动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劳动7天。可是在每一天中,可以劳动6小时,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家了。然而,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是8小时呢?还是18小时呢?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会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作为一个人从事其他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同他们一样长。

为规定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很少得到遵守。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正常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为一切妇女和13岁至18岁的儿童规定了10小时工作日(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时半,星期六做工7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工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

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所有行业,至少推广到了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本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²⁸⁵国会”也将讨论工厂管理法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法的问题。我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对于劳动者说来,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为有利,因为普选权会迫使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争论问题所在的话。而在这方面,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他们。

我们绕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非常精彩的研究,只来谈一谈讨论资本积累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家为一方,雇佣工人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因此,人们关心地看到: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育出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

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第600页^①)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不佳或平常的时候,是在他们劳动的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经常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其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第631页^②)

这就是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官方的经济学家甚至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但是,难道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08—709页。——编者注

② 参看同上,第742页。——编者注

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么？决不是的。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制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3 月

2 日—13 日之间

载于 1868 年 3 月 21 和 28 日

《民主周报》第 12 和 13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卡·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提要²⁸⁶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²⁸⁷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春夏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1929年版第4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

一、商品本身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财富是由商品构成的。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使用价值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必须先有一个用以衡量它的尺度:劳动这种交换价值的共同社会实体,亦即对象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正如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一定的生产活动,如织工的劳动、裁缝的劳动等等,是“有用劳动”;另一方面,它作为人类劳动力的单纯消耗,是凝结的抽象劳动。前者生产使用价值,后者生产交换价值,只有后者才能在量上作比较(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差别,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差别,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交换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交换价值的量是抽象劳动的时间尺度。现在让我们再来考察交换价值的形式。

(1)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是它的相对价值。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是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在上述等式中, y 量商品 b 是等价物。在它身上, x 量

商品 a 获得了与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对立的自己的价值形式,而 y 量商品 b 即使处在自己的自然形式中,却也获得了可以直接交换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因此,商品不能用自己的使用价值,而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交换价值。只有在两个具体的劳动产品彼此相等时,包含在两者之中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属性才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说,一个商品不能把它本身包含的具体劳动,但却能把别个商品包含的具体劳动,当作单纯的抽象劳动的实现形式。

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这一等式必然意味着 x 量商品 a 也能用其他商品来表现;因此:

(2)x 量商品 a = y 量商品 b = z 量商品 c = v 量商品 d = u 量商品 e = 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里, x 量商品 a 已经不再是把一个商品,而是把一切商品,当作体现在它本身中的劳动的单纯表现形式。但是只要颠倒一下,这种形式就成为:

(3)倒转过来的第二种相对价值形式:

y 量商品 b = x 量商品 a

v 量商品 c = x 量商品 a

u 量商品 d = x 量商品 a

t 量商品 e = x 量商品 a

等等。

在这里,这些商品获得了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些商品都被抽去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并作为抽象劳动的化身与 x 量商品 a 相等。x 量商品 a 是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的种属形式;这一形式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物化在其中的劳动直接被看做是抽象劳动的实现,是一般劳动。那么,这时

(4)这个系列中的每一个商品都能担任一般等价物的角色,但在同一时候,始终只能由其中的一个商品担任这种角色,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那么,每一个商品又都会排斥其余的商品去担任这一角色。第三种形式并不是由 x 量商品 a 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他商品客观地建立起来的。因此,某一商品必须担任这种角色,——到某个时候,这一商品可能变换,——而且只有这样,商品才完全变成商品。这个特殊的商品,即一般等价形式与其自然形式融为一体,就是货币。

理解商品的困难在于:商品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范畴一样,是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的关系。生产者使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从而使他们的不同种类的劳动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互相发生关系,没有物这种中介,他们就办不成这种事。这样一来,人的关系便表现为物的关系了。

对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乃是合适的宗教。

二、商品的交换过程

商品在交换中才证明它是商品。两个商品的所有者必须愿意互相交换他们各自的商品,这样一来,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法的关系,只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第 45 页)

商品对它的非占有者来说是使用价值,对它的占有者来说是非使用价值。因此产生交换的需要。但是,每一个商品所有者要交换

的,是他需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说,通过任何一个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的商品对于其他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来说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程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不可能同时是个人的过程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他的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而一切其他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许多特殊等价物。因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也就没有一种商品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彼此对立着。(第 47 页)

商品只有同任何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但是,只有**社会行为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货币。**

商品的内在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作为有用的私人劳动的产品……和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化身,始终存在,直到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为止。(第 48 页)

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与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发生关系。(第 51 页)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形式**。(第 51 页)拜物教就是:好像某一商品不是因为其他商品全面地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才成为货币,相反,好像其他商品因为它是**货币**才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

三、货币或商品流通

A. 价值尺度(假定金为货币)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商品在货币上的简单相对价值表现, x 量商品 $a=y$ 量货币,就是商品的价格。(第55页)

商品的价格,商品的货币形式,是用想像的货币来表现的;因此,价值尺度只是作为观念货币的货币。(第57页)

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一旦完成,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价值尺度进一步发展成为价格标准;就是说,确定一个金量,用来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这与价值尺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价值尺度本身取决于金的价值,而金的价值对价格标准是无关紧要的。(第59页)

当价格以金的计算名称表现出来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

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也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就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假定环境许可或者强迫一种商品以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来出售,那么,这些出售价格就同它的价值不相符,但它们仍然是商品的价格,因为:(1)它们是商品的价值形式即货币;(2)它们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

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倒是使这种形式成为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价格形式

……还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
……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
(第 61 页)

用货币计量价值,即价格形式,包含着让渡的必要性,观念上的
定价,包含着实际上的定价。由此就产生了流通。

B. 流 通 手 段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简单的形式是: $W - G - W$, 其物质内容 = $W - W$ 。让出交换
价值而占有使用价值。

(α) 第一阶段: $W - G$, 即卖, 其中有两个人参加, 因此, 有可能失
败, 也就是说, 如果商品的社会价值发生变动, 商品就有可能低于其
价值出卖, 或者甚至低于生产费用出卖。“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
品, 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同时, 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
成为偶然。”(第 67 页) 但是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 $W - G$ 的
前提是, G 的所有者(除非他是金的生产者)事先已经用别的 W 换得
了 G , 也就是说, 这一交易对买者来说不仅是相反的行为, 即 $G - W$,
而且这首先需要他事先进行了卖, 如此等等, 这样一来, 便有了一系
列无穷尽的买和卖。

(β) 在第二阶段 $G - W$ 即买时, 情形相同, 买对于另一个参加者
来说同时就是卖。

(γ) 因此, 整个过程就是买和卖的循环。商品流通。它与直接的
产品交换是截然不同的: 一方面, 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

地方的限制,促进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这表明整个过程是由不以当事人为转移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决定的。(第72页)简单交换经过一个交换行为后便告结束,每个人都把非使用价值交换成使用价值;而流通则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73页)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经济学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买也都是卖,反过来也是一样,这就是说,每一个卖者也把他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1.买和卖一方面是两极对立的两个人的同一个行为;另一方面,是同一个人的两极对立的行为。因此,买和卖的同一性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没有被卖掉,它就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同一性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2. $W-G$ 作为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并且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获得了 G 的人,可以选择再把 G 换成 W 的时机。他可以等待。 $W-G$ 和 $G-W$ 这两个独立过程的内部统一正是因为这两个过程的独立性而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这两个互相依赖的过程的独立化达到一定限度时,它们的统一就要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因此,在这里危机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是流通手段。

(b) 货币的流通

货币是每个个别商品进入和退出流通的中介;它本身总是留在流通中。因此,虽然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却是货币流通的结果。货币既然总是留在流通领域中,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流通领域中究竟有多少货币呢?

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总额(假定货币价值保持不

变),而商品价格总额则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假定这一商品量已定,那么,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但因为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总是相继充当好几次交易的中介,所以对一定时间来说, $\frac{\text{商品价格总额}}{\text{货币的流通次数}} = \text{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第 80 页)

因此,如果把纸币投入已经饱和的流通中,它就可以把金币排挤出来。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那么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货币流通的停滞也就表现买和卖的分离,表现社会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当然看不出来。流通所显示的只是现象本身。庸人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第 81 页)

因此:1.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如果流通的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增加;反之,它就会减少。

2.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商品量以同一比例减少,或者流通速度以同一比例加快,流通的货币量依然不变。

3.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情况和第 2 项相反。

一般说来,总是可以保持相当稳定的平均水平,几乎只是由于危机才会发生显著的偏离。

(c)铸币——价值符号

价格标准由国家规定,金块即铸币的命名和铸造,也由国家承担。在世界市场上各自的国家制服就又脱下来了(在这里且不谈铸币税),因此,铸币和金银条块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但是铸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作为流通手段的金与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就不同了,铸币

越来越变成自己法定含量的象征。

由此就隐藏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金属货币可以由符号或象征来代替。因此:1.由铜符号和银符号充当的辅币,由于它们成为法定支付手段的数量受到限制,难以固定下来代替真正的金币。它们的金属含量完全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同它们的价值完全无关。所以,就有可能进一步采用完全没有价值的符号;2.纸币,即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信用货币暂不在此考察)。既然纸币在实际上是代替金币流通的,它就受金流通规律的支配。只有纸币代替金的那个比例,才受一个特殊规律支配,这个规律就是:纸币的发行应当限于它所代表的金的实际应该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的饱和程度是不断变动的,但是到处都存在着一个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它决不会降到这个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是可以发行的量。如果发行量超过这个限量,那么,当饱和程度降到这个限量时,一部分纸币马上就变得多余了。在这种情形下,纸币总量在商品世界中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只是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所以,如果纸币的量是它所替代的金量的一倍,那么,每一张纸币就贬值到它的名义价值的一半。这正像金在执行价格尺度的职能时,它的价值发生变动一样。(第89页)

C. 货 币

(a) 货 币 贮 藏

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 $W - G$ 的产物即 G 保留下来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

成了目的本身。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第 91 页)

这种形式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占优势。如在亚洲。随着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物的神经,即社会公认的抵押品——货币。因此,到处都有货币贮藏。商品流通的发展扩大了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第 92 页)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说是无限的。货币从质的方面说,或者按其形式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从量的方面说,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这种矛盾迫使货币贮藏总是一再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

此外,金和银还可以用制品的形式积累起来,这样,就形成了这些金属的新市场,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源泉。

在流通的饱和程度不断变动的情况下,货币贮藏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第 95 页)

(b) 支 付 手 段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关系: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可以分离。各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时间不同,生产季节不同,有一些商品必须送到远方的市场上去,等等。所以,A能够在买者 B 有支付能力之前成为卖者。实践就是这样调节支付条件:A 成为债权人,B 成为债务人,货币则成为支付手段。这样一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就更加对抗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如在古代和中世纪)。(第 97 页)

在这种关系中,货币 1. 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充当价值尺度, 2. 充当观念的购买手段。在作为贮藏货币时, G 退出流通, 而在这里作为支付手段时, G 则进入流通, 但这只是在 W 退出流通之后。欠债的买者现在售卖, 是为了能够支付, 否则他的财产就会被拍卖。因此, 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 G 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第 97—98 页)

使得货币具有支付手段职能的买和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 同时也节省了流通手段, 使支付集中于一定的地点。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某种票据交换所, 在那里, 要支付的只是债务互相抵消后的余额。(第 98 页)

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 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 货币不是充当流通手段, 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 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 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 充当绝对商品。这个直接的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的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 不问其原因如何, 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硬货币; 这时, 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第 99 页)

信用货币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 债券本身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 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 而铸币则主要被排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第 101 页)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参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的情况(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①)。在亚洲、土耳其、日本等地,情况则相反。(第102页)

由于货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支付。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独立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货币贮藏出现了。(第103页)

(c) 世界 货 币

在世界交往中,铸币、辅币、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均被淘汰,只有金银条块形式的货币才能是世界货币。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执行这样一种商品的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才和它的概念相符合。(第104页;详见第105页)

^① 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和塞·沃邦《王室什一税草案》。——编者注

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因此,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及其发展,即贸易,总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第106页)

如果只考察商品流通所造成的经济形式,那么,它的最后产物是货币,而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总是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就是现在,每一个新资本也仍然是以货币形态出现在舞台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除 $W-G-W$ 之外,还有 $G-W-G$ 的形式,即为卖而买。在运动中按照后一种流通形式运行的货币就成为资本,而且本身(即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了。

$G-W-G$ 的结果是 $G-G$,即货币和货币间接交换。我用100镑买进棉花,然后以110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100镑换110镑,用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得到的货币价值和原来投入的相等,即

100 镑换 100 镑,那么,这个过程是荒谬的。但是,不论商人用他的 100 镑换回 100 镑,110 镑,或者只是 50 镑,他的货币的运行还是一种独特的、根本不同于商品流通 $W-G-W$ 的运动。考察一下这个运动和 $W-G-W$ 之间的形式上的区别,也就可以发现它们内容上的区别。

这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分别和 $W-G-W$ 中的每个阶段相同。但是,总过程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 $W-G-W$ 中,货币是中介,商品是起点和终点;而在 $G-W-G$ 中,商品是中介,货币是起点和终点。在 $W-G-W$ 中,货币最终花掉了;而在 $G-W-G$ 中,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最后还要收回来。货币又流回到它的起点,——可见,在这里,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已经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在 $W-G-W$ 中,货币只是由于**整个过程的重复**,由于新的商品的卖出,才能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的流回是同过程本身无关的。相反,在 $G-W-G$ 中,货币的流回一开始就是由过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如果货币流不回来,过程就是不完全的。(第 110 页)

$W-G-W$ 的最终目的是使用价值,而 $G-W-G$ 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 $W-G-W$ 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规定性。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们同时又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这个过程的内容是社会的物质变换。在 $G-W-G$ 中,乍一看来,这个运行似乎是同义反复的,是无内容的。用 100 镑交换 100 镑,还要兜一个圈子,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 $G-W-G$ 只是由于两极**有量**的不同才有内容。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投入其中的货币。例如,用 100 镑买

的棉花卖 100 镑 + 10 镑, 因此, 这个过程就得出下列公式: $G - W - G'$, 其中的 $G' = G + \Delta G$ 。这个 ΔG , 这个增殖额就是剩余价值。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 而且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 它增殖了, 正是这种运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诚然, 在 $W - G - W$ 中, 两极也会有价值上的差异, 但是这对这种流通形式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如果两极价值相等, $W - G - W$ 也不是荒谬的, 相反, 这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

$W - G - W$ 的重复, 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 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 在 $G - W - G$ 中, 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 都是货币, 单是由于这一点, 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诚然, $G + \Delta G$ 在量上不同于 G , 但是, 它也只是是一个有限的货币额; 如果把它用掉, 它就不再成为资本; 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 它就固定为贮藏货币。如果需要的是价值增殖, 那么 G' 同 G 一样, 也需要增殖, 资本的运动是有限度的, 因为它的目的在过程结束时就像在过程开始时一样还没有达到。(第 111—113 页) 作为这一过程的承担者, 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在商品流通中交换价值至多发展成为同商品使用价值相对立的独立形式, 那么在这里, 它就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 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形式。而且, 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它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 而且它本身也就成了资本。(第 116 页)

诚然, $G - W - G'$ 似乎只是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 它转化为商品, 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 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 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点。最后,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 这个过程直接表现为

$G-G'$, 表现为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第 117 页)

二、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借以变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同以前所说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次序相反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能导致这一结果吗?

不仅如此。在进行交易的三个人中间,只是对其中一个人来说,次序才是颠倒过来了。作为资本家,我从 A 手里购买商品,再把商品卖给 B。A 和 B 只是作为商品的单纯的买者和卖者出现。在这两种场合,我对于他们只是作为简单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对于前者,我是买者或货币,对于后者,则是卖者或商品。不论对于哪一个,我都不是资本家,不是比货币或商品更多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对于 A,交易是以卖开始的,对于 B,交易是以买结束的,因此,这完全像在商品流通中一样。如果我把次序颠倒就有权取得剩余价值,那么 A 也可以直接卖给 B,这样,获取剩余价值的机会也就消失了。

假定 A 和 B 相互直接购买商品。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在同样的时间内,A 甚至会比 B 生产出更多的自己的商品,反之亦然,双方又都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即使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介入,双方交换的也是等量的价值。(第 119 页)

如果抽象地来考察,那么,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简单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

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就违反了商品交换规律。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致富的手段。(第120页)

因此,一切想从商品流通中得出剩余价值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孔狄亚克,(第121页)纽曼。(第122页)

不过,我们假定,交换不是纯粹地进行的,而是非等价物交换。我们假定,每个卖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出卖商品。如果一切照旧,那么,每个人作为卖者时所获得的,作为买者时又会失去。这同货币的价值发生了10%的变化完全一样。如果买者都低于价值10%购买一切,情况也是一样。(第123页)(托伦斯)

有人假定剩余价值是由提高价格产生的,这就先要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就是说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存在,货币不断地白白地流到这个阶级手里。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骗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货币罢了(如小亚细亚和罗马)。可是,吃亏的还是卖者,他不会因此而变富,不会创造剩余价值。

我们假定发生了欺骗行为。A把价值40镑的酒卖给B,换回价值50镑的谷物。A赚了10镑。但是A+B仍然只有90镑。A有50镑,B就只有40镑;价值被转移了,但是没有被创造出来。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可能自己占自己的便宜。(第126页)

可见,如果是等价物交换,就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那也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

因此,在这里不必谈最古老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如果不应单纯用欺骗来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许多在这里还不存在的中间环节。对于高利贷资本和生息资本

来说更是这样。以后将说明,这两种都是派生的形式,以及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现代资本。

因此,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那么从流通以外呢?在流通以外,商品占有者只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者,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按一定社会规律计量的在商品中包含的他自己的劳动量;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例如表现为一个价格 10 镑。但是,这个价值不能同时是 11 镑的价值;他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自行增殖的价值。它能给原有价值添加更多的价值,不过这只有通过添加更多的劳动才能做到。可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以外,不同其他商品占有者接触,就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因此,资本必须既在商品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第 128 页)

由此可见: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²⁸⁸(第 129 页)

三、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在购买时,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只要它仍然是货币,它的价值量就不变;在售卖时,它也只是使商品从它的自

然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 $G-W-G$ 中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为此就需要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交换价值源泉的属性——这种商品是有的,这就是劳动力。(第 130 页)

但是,要使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劳动力就必须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出卖,也就是说,必须是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买者和卖者作为缔约的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所以劳动力必须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要是一下子全部卖光,卖者就不再是卖者,而本身成为商品了。另一方面,劳动力占有者必须已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他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第 131 页)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第 132 页)

附带说说,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的关系,并不是自然关系,也不是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历史的关系,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印记。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再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大量的产品才会采取商品的形式,虽然在大量产品还从来不是商品的地方,商品生产和流通也会产生。货币也同样能够存在于商品流通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一

切时期中；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从单纯的等价物到世界货币，以不同的发展阶段为前提；不过，很不发达的商品流通也能产生所有这些形式。相反，资本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产生，而这一条件包含着—部世界史。（第 133 页）

劳动力具有交换价值，它的交换价值和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的生活即维持他的正常的劳动能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取决于气候、自然条件等等，取决于每一个国家历史上形成的一定的生活水平。它们是变动的，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它们是一定的。其次，它们还包括顶替者即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永远延续下去；再次，对于熟练劳动来说，它们还包括教育费。（第 135 页）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后者是以劳动力的标准质量为前提，而不是以萎缩的质量为前提的。（第 136 页）

劳动的性质意味着，劳动力只有在缔结契约以后才被使用。由于货币对于这种商品来说通常是充当支付手段，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只有在劳动力发挥效能以后，才付给报酬。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第 137、138 页）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种消费是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第 140 页）

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这种劳动要表现在商品中,首先就必须表现在使用价值中。从这种性质说来,它同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无关……对劳动过程本身的叙述。(第 141—149 页)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1.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2.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因为劳动过程现在只是资本家购买的两个物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的过程。(第 150 页)

但是,资本家并不要求生产使用价值本身,而只是要求把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特别是作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来生产。劳动在这种条件——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下成了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第 151 页)

这样,就必须研究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

以棉纱为例。假定生产棉纱需 10 磅棉花,比如说值 10 先令;劳动资料在纺纱过程中必要的损耗(为简单起见,在此以纱锭这一部分的损耗来表示)为 2 先令。这样,在产品中就含有价值 12 先令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前提条件是:1.产品已成为实际的使用价值,在这

里是棉纱；2. 在这些劳动资料中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纺纱劳动在商品中加进了多少呢？

因此，在这里是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劳动过程。在产品的价值中，植棉者、纱锭制造者和纺纱者等人的劳动都是可通约的部分——都是作为一般的、人类必要的、形成价值的劳动而在质上相等，——因此只能在量上加以区别，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能用时间的长短在量上加以比较。假定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只有这种时间才形成价值。

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 = 3 先令，代表 6 个劳动小时，每小时生产 $1\frac{2}{3}$ 磅的棉纱，那么，在 6 小时中，用 10 磅棉花生产了 10 磅棉纱（如上面所说），这样，在 6 小时内，就加进了 3 先令的价值，产品值 15 先令（10 先令 + 2 先令 + 3 先令），或者说，每磅棉纱值 1 先令 6 便士。

但是，在这里没有剩余价值。这对资本家毫无用处。（庸俗经济学的遁词。第 157 页）

我们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因为对象化在其中的是半个工作日或 6 小时。但是，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劳动力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力的独特的使用价值，它是比它自身原有的交换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的源泉。（第 159 页）

工人劳动 12 小时，纺了 20 磅棉花 = 20 先令，加上 4 先令的纱锭和 3 先令的劳动 = 27 先令。但对象化于产品中的有纱锭和棉花的 4 个工作日和纺纱工人的 1 个工作日 = 5 日，每日以 6 先令计 = 产品价值 30 先令。这里就有了 3 先令的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了。（第 160 页）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详细说明见第 160 页）

作为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过程,当它延长到**超过**为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提供单纯等价物的限度时,就是**价值增殖过程**。

价值形成过程和单纯劳动过程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而前者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而且只是就它所包含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言的。(第 161 页。详细说明见第 162 页)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第 163 页)

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第 163—165 页)

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而同时就把劳动对象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从而通过单纯的加进新价值而把价值保存下来。这个双重结果是这样获得的:劳动的**特殊的、有用的、质的性质**,把一种使用价值变成另一种使用价值,从而**保存了价值**;而劳动的**形成价值的、抽象一般的、量的性质**,则加进价值。(第 166 页)

例如,纺纱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为 6 倍。作为**有用的(质的)劳动**,它在同一时间内,保存了等于过去 6 倍的劳动资料。但是,它只加进和过去一样多的新价值,也就是说,在每磅棉纱中,只含有过去加进的新价值的 $\frac{1}{6}$ 。作为**形成价值的劳动**,它也没有创造比以前更多的东西。(第 167 页)如果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而劳动资料的价值提高了,结果就相反。(第 168 页)

劳动资料转给产品的那个价值只是它**本身丧失的价值**(第 169

页)。转移的程度各不相同。煤、润滑油等完全消耗掉了。原料取得了新的形式。工具、机器等只是慢慢地、部分地转移价值,损耗是根据经验来计算的。(第 169—170 页)在这种情况下,工具在劳动过程中始终是完整的。由此可见,同一个工具是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只是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这样,这两个过程的区别,在这里就反映在物质因素上。(第 171 页)相反,产生废料的原料是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因为它出现在产品中时减掉了废料。(第 171 页)

但是,劳动资料决不可能转移比它本身所具有的更多的交换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只是作为使用价值起作用,因此只能转移它原有的交换价值。(第 172 页)

这种价值保存,对资本家很有价值,而且不费他分文。(第 173、174 页)

然而,被保存的价值只不过是再现而已,它过去就存在。只有劳动过程才加进新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这就是剩余价值,即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第 175、176 页)

这也就说明了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时采取的存在形式:1. 购买的劳动资料,2. 购买的劳动力。

可见,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我们把它称为不变资本。

投在劳动力上的部分资本改变自己的价值,它生产:1. 它自身的价值,2. 剩余价值。——这是可变资本。(第 176 页)

(资本不变,只是就某一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言的,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它不发生变化。它包括的劳动资料可能时多时少,所购买的劳

动资料的价值可能或涨或落。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们同生产过程的
关系(第 177 页)。同样,一定的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百
分比是会变的,但在每个一定场合,c 仍然是不变资本,v 仍然是可变
资本。(第 178 页))

三、剩 余 价 值 率

$C = 500 \text{ 镑} = \overset{c}{410} + \overset{v}{90}$ 。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v 转化为劳
动力——结束时,得到 $\overset{c}{410} + \overset{v}{90} + \overset{M}{90} = 590$ 镑。我们假定 c 中有原料
312 镑、辅助材料 44 镑和机器损耗 54 镑 = 410 镑。假定所有机器的
价值是 1 054 镑。如果把这些全部计算进去,那么,两边的 c 都是
1 410 镑,而剩余价值仍和以前一样,是 90 镑。(第 179 页)

因为 c 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所以我们得到的产品价值和
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产品是不同的,后者不是 = c + v + m, 而是 =
v + m。因此,c 的量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c =
0(第 180 页)。在实际中也是如此,把商业计算方法撇开不用,例如,
在计算一个国家从工业中得到的利润时,就是把进口的原料扣除了。
(第 181 页)关于剩余价值同总资本的比率,将在第三册作必要的说明²⁸⁹。

因此,剩余价值率 = m:v, 在上述例子中,就是 90:90 = 100%。

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不论是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或是在其他条件下——是必要劳动,超过了这个界限而为资
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剩余劳动(第 183、184 页)。剩余价值

是凝结了的剩余劳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的,只是剩余劳动的榨取形式。

错误地把 c 也计算在内的例子。(见第 185—196 页,西尼耳)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 = 工作日。

四、工 作 日

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剩余劳动是可变的,但有一定的限度。它从来不会 = 0, 否则,那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停止。由于生理的原因,它也从来不会达到 24 小时;此外,最高界限还始终要受道德原因的影响。但是,这些界限具有极大的弹性。经济上的要求是:工作日的长度不能超过工人的正常体力消耗,那么,什么是正常的呢? 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只有靠力量来决定。由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就开展了有关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第 198—202 页)

以前的社会时代的剩余劳动。在交换价值的重要性还没有超过使用价值时,剩余劳动是较少的,如在古代。只有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即金银的地方,剩余劳动才是残忍的。(第 203 页)美国各蓄奴州在大量生产棉花供出口之前,就是如此。徭役劳动,例如在罗马尼亚,也是如此。

徭役劳动是可以同资本主义剥削相比较的最好的例子,因为它确定并表明剩余劳动是必须专门提供的劳动时间。瓦拉几亚的组织规程²⁹⁰。(第 204—206 页)

如果说这是对剩余劳动的贪欲的积极表现,那么,英国的工厂法则是一种贪欲的消极表现。

工厂法。1850年的工厂法。(第207页)每周平日是 $10\frac{1}{2}$ 小时,星期六是 $7\frac{1}{2}$ 小时,总计60小时。工厂主由规避工厂法而取得的利润。(第208—211页)

不受法律限制的或直到后来才受限制的部门中的剥削:花边业(第212页);陶器业(第213页);火柴业(第215页);壁纸业(第215—217页);面包业(第217—222页);铁路员工(第223页);缝纫女工(第223—225页);铁匠(第226页)。换班制的日工和夜工:(a)冶金业和金属加工业(第227—236页)。

这些事实证明,资本把工人只是看做劳动力。他们的全部时间,哪怕只是可能有的片刻时间,都是劳动时间,至于劳动力的寿命长短,资本家是不关心的。(第236—238页)难道这本身不也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吗?迅速消耗的劳动力如何来补偿呢?美国国内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已使奴隶的迅速消耗成为经济原则,在欧洲,由农业区等地供给工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第239页)由贫民院供给劳动力。(第240页)资本家只看到随时可用的过剩人口,并加以使用。至于种族是否会灭绝,他死后哪怕洪水滔天!¹⁰⁶资本是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各个资本家起作用。(第243页)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

起初,制定法律是为了增加劳动时间,现在却是为了减少劳动时间。(第244页)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颁布,借口是鼠疫使人口大批死亡,每个人必须更多地工作。因此,在法律上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额和工作日的界限。1496年,在亨利七世统治

时期,规定了农业工人和所有手艺人(artificers)的工作日,在夏季,自3月至9月,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休息时间为1小时、 $1\frac{1}{2}$ 小时和 $\frac{1}{2}$ 小时=3小时。在冬季,是从早晨5点到天黑为止。这个劳工法从未严格地实行过。在18世纪,资本还不能支配工人整个星期的劳动(农业工人除外)。见当时的争论。(第248—251页)直到大工业出现后,资本才做到这点;而且变本加厉,大工业摧毁了一切界限,极端无耻地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一觉醒来,就进行反抗。1802—1833年间的5个法令是纸上空文,因为没有视察员。只有1833年的法令,在4种纺织业中建立了正常工作日: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在这个时间内,13岁到18岁的少年只准劳动12小时,其中有 $1\frac{1}{2}$ 小时的休息,9岁到13岁的儿童只准劳动8小时,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第253—255页)

换班制度以及为了规避法令而滥用这种制度。(第256页)最后,1844年的法令将各种年龄的妇女与少年同等对待,儿童劳动规定为 $6\frac{1}{2}$ 小时,换班制度受到约束。但另一方面,却允许8岁以上的儿童做工。在1847年,终于制定了妇女和少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259页)。资本家们力图反对。(第260—268页)1847年法令中的一个缺点,导致了1850年的妥协法令。(第269页)这个法令规定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为每周有5天各为 $10\frac{1}{2}$ 小时,有一天为 $7\frac{1}{2}$ 小时=每周60小时,并且规定劳动时间在早上6点至晚上6点之间。此外,1847年的法令对儿童仍然有效。丝业例外。(第270页)1853年,儿童的劳动时间,也限制在早上6点到晚上6点之间。(第272页)

1845年的印染工厂法几乎没有什么限制,妇女和儿童可以工作16小时!

漂白厂和染厂在 1860 年,花边厂在 1861 年,陶器业和许多其他部门在 1863 年(受工厂法的约束,同年,针对露天漂白厂和面包房,颁布了特别法)。(第 274 页)

这样,在大工业中首先有了限制劳动时间的必要,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过度劳动也逐渐侵入了其他一切部门。(第 277 页)

其次,历史表明,特别是在实行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后,单个的“自由”工人对资本家是无抵抗的,他只有屈服。由此也就展开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第 277 页)

在法国 1848 年才在一切劳动部门实施了适用于一切年龄的工人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见第 253 页关于 1841 年法国儿童劳动法的脚注。这项法律直到 1853 年才实际施行,而且只是在北部省真正实施。)在比利时的完全的“劳动自由”!美国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第 279 页)

这样,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来时,已和他进入时完全不一样了。劳动契约并不是自由的当事人的行为。他自由出卖劳动的时间,也就是他被迫出卖劳动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到一项国家法律,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工厂法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第 280—281 页)

五、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剩余价值量。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剩余价值率 = 100%,那么每日的剩余价值量 =

每个工人 3 先令。

1. 因为**可变资本**是一个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 可变资本乘以剩余价值率。这两个因素都会变动,因此会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也就是**工作日延长**,那么,即使可变资本减少,剩余价值量也能增加。(第 282 页)

2. 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有它的**绝对界限**,就是工作日决不能延长到整整 24 小时,所以,一个工人每天的产品的总价值决不能等于 24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因此,只有**在这个界限内**,才可以由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来补偿可变资本,以取得等量的剩余价值。这对于解释从资本的矛盾趋势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是重要的。这种矛盾的趋势是:(1)要**减少**可变资本和所雇用的工人人数;(2)可是又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第 283、284 页)

3. 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同样大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量成正比**。(第 285 页)这同一切事实相矛盾。

就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工作日来说,要增加剩余价值,只有增加工人人数,即增加人口;如果工人人数已定时,则只有延长工作日。但这只是对于**绝对剩余价值**是重要的。

现在可以看出,并不是**每一个**货币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必须有一个最低额:即一个劳动力和必要的劳动资料的成本价格。资本家为了自身能够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在剩余价值率为 50% 时,他必须有两个工人,而且还没有储蓄。甚至在他有 8 个工人时,也始终不过是一个小业主。因此,中世纪是靠限制每个师傅雇用的帮工人数来强制地防止手工业者转化为资本家。成为一个真正资本家所必需的

财富最低限额,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生产部门是不同的。(第288页)

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的指挥权**,监督工人守规矩地紧张工作。其次,它迫使工人从事超出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的劳动,并且在榨取剩余价值方面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是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支配劳动的,最初它并未改变这些条件。因此,如果把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来考察,那么工人并不是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而是把它当作自己有目的的活动的**手段**。但是,如果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来考察,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成了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第289页)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在工作日已定时,要增加剩余劳动,只有减少必要劳动,而必要劳动的减少——撇开把工资压低到价值以下不谈——又只有靠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说,靠降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第 291—293 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又只有靠提高劳动生产力,靠变革生产方式本身。

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第 295 页)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这就是生产日常生活资料、它们的代用品和它们的原料等等的部门。证明竞争如何使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商品价格的降低。(第 296—299 页)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如此,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第 299 页)

资本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商品的绝对价值,而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根据第

299 页所说,同一个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使商品的价值降低,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参看魁奈的话,第 300 页)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工作日甚至还会延长。因此,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之类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 15 小时,以代替原来的 10 小时。这种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必要劳动,并延长为资本家的劳动。(第 301 页)

二、协 作

第 288 页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必须有一个足以同时雇用相当数量工人的个人资本。只有在雇主完全不必劳动时,他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家。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一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 302 页)

因此,起初,同以前一个雇主雇用少数工人的情况比较起来,只有量的差别。但是,马上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大量的工人本身就能保证雇主真正获得平均劳动。而小业主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可是他仍必须支付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小生产条件下,这些差别就社会来说会互相抵消,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会抵消。因此对单个

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第 303—304 页)

其次,生产资料单单由于大生产而得到节省,转移到产品上的不变资本部分较少,这只是来源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生产资料。因此,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社会性质之前(到此为止,只是同种过程的并存)就已经取得了社会性质。(第 305 页)

在这里,生产资料的节约只能从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这方面来考察。关于它改变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c+v)之间的比例,要在第三册中才加以考察²⁹¹。这样割裂开来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表现为一种与工人无关、因而与提高资本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的方法相脱离的特殊操作。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第 306 页)(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语)

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抬重物等等)所发挥的机械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协作一开始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是**集体力**。

其次,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 个劳动者在一个 144 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产品,比 12 个劳动者分别在 12 个工作日中,或一个劳动者在连续 12 个工作日中所提供的产品要多。(第 307 页)

尽管许多人做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仍可以

代表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一队人传递东西),在这里,协作又能节省劳动。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方面开始兴建,也是一样。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手有眼睛,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第308页)

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协作可以把各个过程加以分配,使之同时进行,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的劳动时间。(第308页)

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需要许多工人(如收割,捕鲑鱼等),这时只有靠协作。(第309页)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生产场地,因此对那些工作场地空间跨度大的工作来说(排水、修筑道路、修堤等),协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协作可以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点,缩小生产场地,从而节省费用。(第310页)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协作是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然而,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支付给他们工资,供给他们劳动资料,他们就不能够共同工作。因此,协作的规模取决于一个资本家拥有多少资本。一个所有者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才能成为资本家,这个条件,现在成为使许多分散的独立的个人劳动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资本对劳动的指挥,以前只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的结果,现在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正是资本家代表着劳动过程中的结合。在协作中,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作为这种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第312页)

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这种管

理同时也是尽可能多地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它是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其次,是监督劳动资料的正当使用。最后,各个工人的职能上的联系,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资本中,所以,他们自身的统一,是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而同他们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二重的(1. 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 2.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 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这种专制现在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 资本家自己刚刚摆脱了劳动, 现在又把监督的职能交给了一群有组织的军官和军士, 而这些人本身也是资本的雇佣工人。经济学家在考察奴隶制度时把这种监督费用算做非生产费用, 但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 他们却把由剥削所决定的管理和从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第 313、314 页)

工业中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 正像在封建时代, 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一样。(第 314 页)

资本家购买 100 个单个劳动力, 这样他就得到了 100 个工人的结合劳动力。他并不给 100 个工人的结合劳动力支付报酬。工人一进入结合的劳动过程, 就不再属于自己, 他们已经并入资本中了。这样,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就表现为资本内在的生产力。(第 315 页)

古代埃及人等等场合的协作的例子。(第 316 页)

在文化初期, 狩猎民族、游牧民族或印度公社的原始协作, 是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 1. 生产条件的公有制, 2. 个人天然地同氏族和原始公社紧密联结在一起。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协作, 是建立在直接统治和暴力, 大多是奴隶制的基础上。相反, 资本主义的协作是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在历史上, 它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直接对立的,

就这方面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它表现为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因此,在这里立即看出: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2.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从劳动过程中榨取更大利润的一种方法。(第 317 页)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式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相伴随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殊时代的固定的特有的形式。这种协作现在仍然存在于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协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但它的简单形式本身,或者说它作为特殊形式,却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第 318 页)

三、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典型形式。它大约从 1550 年到 1770 年占统治地位。

它是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的:

1.或者是把各种不同的手工业联合在一起,其中每一种手工业进行一种局部操作(例如马车工场手工业),这样,每个单个手工业者很快就失去了从事他的全部手艺的能力,而他的局部手艺则更熟练了;这样,整个过程就变成把全部操作分为它的各个部分。(第 318、319 页)

2.或者是把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联合在同

一个工场中,各项操作逐渐地不再由一个工人依次做下去,而是分开来,由不同的工人同时去做(制针等)。产品现在不再是一个手工业者的产物,而是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产物,其中每个人只完成一种局部操作。(第 319、320 页)

在这两种情况下,工场手工业的结果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操作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产品所经过的每一局部过程都必须是可用手工劳动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对生产过程作任何真正科学的分解。正因为劳动的手工业性质,每个单个工人都被完全束缚在一个局部职能上。(第 321 页)

由于这种情形,同手工业者相比,劳动节省了,并且由于技艺世代相传,劳动就更节省了。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一种姓,行会。(第 322 页)

工具由于要适用于各种局部劳动而分细了,伯明翰有 500 种锤子。(第 323 --324 页)

从工场手工业的总机构来考察,它有两个方面:或者是把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起来(钟表),或者是把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制针)。

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一组工人给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因此,基本条件是:每一组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一定的量;这样,就形成了和在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规则性、划一性和劳动强度。因此,在这里,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一点,已经成了生产过程的工艺规律。(第 329 页)

各种操作所需的时间不等,这就要求不同的工人小组具有不同的成员和数目(在铸字业中:1 个磨字工需要配有 4 个铸工和 2 个分切工)。这样,工场手工业就为总体工人的各个器官的数量大小创立

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只有按倍数雇用整组的新工人,才能扩大生产。此外,要使某些职能——如监督、运送产品等等——独立,只有在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是有利的。(第 329、330 页)

还有一种情形是把各种工场手工业联合为一个总工场手工业,但是,这种联合始终缺乏真正的工艺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采用机器时才能产生。(第 331 页)

工场手工业中早就有了机器——间或的——如面粉磨、捣碎磨等,但只是当作辅助的东西。工场手工业的主要机器是结合的总体工人,这种工人比旧时的单个手工业工人完善得多,在结合的总体工人中,局部工人那里往往必然发展起来的一切不完善的东西都表现为完善的东西。(第 333 页)工场手工业发展了这些局部工人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发展了工人的完善的等级制度。(第 334 页)

分工:1.一般的分工(农业、工业、航运业等等);2.特殊的分工(种和亚种);3.个别的分工(在工场内)。社会分工也是从不同的起点发展起来的:1.在家庭和氏族内部,存在着按照性别和年龄的自然分工,加上对邻近部落使用暴力而造成的奴役,更把这种分工扩大了(第 335 页);2.不同的共同体因地域、气候、文明程度不同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在这些共同体相互接触的地方,这些产品相互进行交换。(第 49 页)同别的共同体进行的交换,由于自然分工进一步发展,就成为破坏本共同体内部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第 336 页)

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以社会分工的一定的发展程度为前提,另一方面,前者又使后者进一步发展。——地域分工也是如此。(第 337、338 页)

不过,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之间总是存在这样的差别:前

者必然生产商品,而后者的局部工人并不生产商品。因此,后者是集中的和有组织的,前者是分散的和无序的竞争。(第339—341页)

关于早期的印度公社的组织。(第341、342页)行会。(第343、344页)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存在着社会内部的分工,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发生了革命,使工人畸形发展;工人不能生产独立的产品,他只是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劳动的智力在许多方面消失了,而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第346页)

引语①。(第347页)

工场手工业一方面是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另一方面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方法。(第350页)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甚至在它的典型时期都遇到障碍:熟练工人占优势限制了非熟练工人人数,男子的反抗限制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人们始终坚持学徒法,甚至在学徒法已成为不必要的地方;工人经常不服从,因为总体工人还没有不依赖工人而独立的骨骼;工人

① 指亚·弗格森、约·塔克特、亚·斯密的著作引文。——编者注

迁往国外。(第 353、354 页)

此外,工场手工业本身不能改造全部社会生产,或者甚至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工场手工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相矛盾。机器成为必要的了,工场手工业也已经学会制造机器了。(第 355 页)

四、机器和大工业

(a) 机器本身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这里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部分组成:(1)发动机,(2)传动装置,(3)工具机。(第 357 页)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它的特点是:工具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形式,从人转移到机器上,由机器通过人的作用来推动。至于动力是人力还是自然力,暂时是无关紧要的。其特殊的区别在于,人只能使用他自己的器官,而机器在自身的一定限度内可以需要多少工具就使用多少工具(纺车是 1 个纱锭;珍妮机^①是 12—18 个纱锭)。

在纺车上,工业革命涉及的不是踏板、动力,而是纱锭——最初,人到处还同时是动力和看管者。相反地,工具机的革命,才产生出改善蒸汽机的要求,而且后来也实现了这个要求。(第 359—360 页以及第 361—362 页)

^① 一种纺机。——编者注

大工业中的机器有两类：或者是 1. 同种机器的协作（蒸汽织机，信封制造机，这种机器把各种工具结合起来，使一系列局部工人的工作合在一起），由于传动装置和动力的推动，这里已经存在着工艺上的统一；或者是 2. 机器体系，即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纺纱）。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是机器体系的自然基础。但是这里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每一个局部过程必须适应工人；而在大工业中，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劳动过程能够**客观地**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是由科学或是由基于科学的经验借助机器来完成的。在这里，各组工人之间的数量上的比例作为各组机器之间的比例重现出来。（第 363—366 页）

在这两种场合，工厂形成了一个大自动机（而且只是到了最近，才完善到这个程度），而这就是它的适当的形式（第 367 页），它的最完善的形式就是**能制造机器的自动机**，这种自动机消灭了大工业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从而使机器生产第一次具备了完善的形式。（第 369—372 页）

各个部门直到各个交通工具的变革之间的联系。（第 370 页）

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的结合是主观的，而在这里，却有一个客观的**机械**的生产机体，它现成地出现在工人面前，它只有在共同劳动的工人的手里才发生作用。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工艺上的必要**了。（第 372 页）

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自然力，如蒸汽、水，也不费资本分文。科学所发现的力，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力只有借助花费许多钱制造的相应设备，才能加以利用。同样，工作机要比从前的工具贵得多。但是，这种机器的寿命比工具长得多，生产范围也比工具大得多，因此相应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比工具

小得多。因此,机器提供的**无偿服务**(这种服务并不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要比工具大得多。(第374、375—376页)

大工业由于生产集中而使产品便宜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第375页)

制成的商品的价格表明,机器使产品便宜了许多,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例证。(第377—379页)

假设一个蒸汽犁代替了150个工人,这些工人一年的工资是3000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全年工资**并不代表他们所做的全部劳动**,而只代表**必要劳动**;可是,除此而外,他们还提供了**剩余劳动**。可是,如果蒸汽犁值3000镑,那么,这就是蒸汽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的货币表现**。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体现在机器中的人类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劳动少得多。(第380页)

机器作为使产品便宜的手段,它所费的劳动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但是对于资本来说,它的价值必须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在英国无利可图的机器,在美国可能有利可图(如碎石机)。因此,由于某些法律限制的结果,那些原来对资本无利可图的机器,也会突然被起用。(第380—381页)

(b)借助机器占有劳动力

因为机器本身包含了推动自己的力量,所以肌肉力的价值跌落了。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雇佣工人的数目由于吸收以前不从事雇

佣劳动的家庭成员而迅速增加。这样，男劳动[力]的价值就分到全家劳动力上了，也就是说，贬值了。一家人要生活下去，全家4口人现在不仅要为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还要提供剩余劳动，而从前只需要1个人这样做。可见，在增加剥削材料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第383页）

从前，劳动力的买卖是自由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是购买未成年人和半成年人；工人现在是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例证。（第384—385页）

身体摧残。工人子女的死亡率。（第386页）在农业的工业化经营中也是这样（帮伙制度）。（第387页）

精神摧残。（第388页）教育条款以及工厂主的反对。（第390页）

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终于瓦解了男工对资本专制的反抗。（第391页）

如果说机器缩短了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它在资本手中就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远远超过它的正常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机器一方面创造了使资本能够这样做的新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这样做的新动机。

机器能够不停地运动，它只受协助它的人类劳动力的虚弱和局限性的限制。一架每日工作20小时、7 $\frac{1}{2}$ 年报废的机器替资本家取得的剩余劳动，正好和另一架每日工作10小时、15年报废的机器是一样多的。不过前者只需要后者一半的时间。（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无形损耗——由以新换旧造成——的危险更少。（第394页）

此外，不必增加厂房和机器上的投资，就可以吸收更大量的劳

动,因此,延长工作日,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相对地减少了获得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在大工业中,固定资本部分越是占优势,这个办法也就越是重要。(第 395 页)

在采用机器的初期,机器具有**垄断性**,利润极大,因此渴望更多地、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这项垄断性利润就不存在了,而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来源于它所使用的劳动,也就是来源于可变资本。但在机器生产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必然会因投资庞大而减少。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存在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资本量不变时,机器要提高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就要减少剩余价值的另一个因素,即工人数目。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成为这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个矛盾就会表现出来,又重新推动资本延长工作日。(第 397 页)

同时,机器由于使被排挤的工人游离,并由于吸收妇女和儿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因此,它打破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第 398 页)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的反应怎样表现为要求确立正常工作日;而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劳动的强化**又发展起来了。(第 399 页)

在开始时,随着机器运转的加快,劳动强度的增加是和劳动时间的延长同时并进的。但不久,就达到二者相互排斥的地步。在限制工作日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强度可以增加了;在 10 小时内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于过去在 12 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所提供的劳动,现

在强度较高的工作日可以当作自乘的工作日。劳动不单以时间长短来计量,还以它的强度来计量。(第 400 页)这样,5 小时必要劳动和 5 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就可以和强度较低的 6 小时必要劳动和 6 小时剩余劳动所取得的一样多。(第 400 页)

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在工场手工业中已经证明(见脚注 159),例如在陶器业等行业中,单单缩短工作日,就足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在机器劳动的情况下,这就大可怀疑了。但可参看罗·加德纳的例证。(第 401—402 页)

一旦缩短工作日成了法律,机器就成了从工人身上榨取强度较高的劳动的手段,其方法或者是加快速度,或者是与机器相对而言减少人手。例证。(第 403—407 页)与此同时,工厂日益致富和扩大可以证明。(第 407—409 页)

(c)工厂整体的典型形态

在工厂中,机器负责合理地操作工具;因此,在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的质的差别,在这里消失了。劳动越来越均等,充其量只有年龄和性别的差别。分工在这里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机器上去。这里只划分为真正在工具机旁操作的主要工人和给机器供劳动材料的工人(这适用于自动走锭纺纱机,几乎不适用于翼锭精纺机,更不适用于改良蒸汽织机),此外,还有监工、工程师、司炉、机械工、细木工等等,这是一个只是表面上聚集在工厂里的阶层。(第 411—412 页)

工人必须适应自动机的连续的运动,这就要求工人从小受训练。但这并不像工场手工业那样,要求工人一生束缚在某一局部职能上。

同一架机器上可以更换人员(换班制度),由于学习起来容易,工人可以从一种机器调到另一种机器上去。下手的工作,或者是很简单,或者是越来越由机器承担。尽管如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最初由于习惯而仍然延续着,它成了资本的更重要的剥削手段。工人终生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第 413 页)

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由于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工艺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同样,生产过程的智力成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第 414、415 页)

工厂中兵营式的纪律,工厂法典。(第 416 页)

工厂的物质条件。(第 417—418 页)

(c')或(d)工人反对工厂制度及机器的斗争

这个斗争从资本主义关系建立时起,就已开始,在这里首先是反抗机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暴动。织带机。(第 419 页)鲁德分子²⁹²。(第 420 页)直到后来,工人才把物质生产资料 and 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中,改善了的分工不过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一种

手段。(第 421 页)(顺便提到农业方面。排挤。第 422 页)而在机器生产中,工人是现实地被排挤,机器直接和工人竞争。手工织工。(第 423 页)印度的情形也是一样。(第 424 页)这种作用是长期的,因为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资料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工人现在首先起来反抗劳动工具。(第 424 页)

机器排挤工人的详细情形。(第 425、426 页)机器排挤工人,成为压制工人反抗资本的工具。(第 427、428 页)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断言,排挤工人的机器,同时会游离出资本,再去雇用这些工人。但事实正相反:每次采用机器,都束缚资本,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因此,只会限制资本雇用工人的能力。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是这样认为——用这种方式游离出来的并不是资本,而是被解雇的工人的生活资料,是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可是辩护士却说成: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第 429、430 页)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的阐述(这对《双周评论》是很好的^①)(第 431—432 页)。对那些辩护士来说,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那种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第 432 页)

机器直接和间接地扩大了生产,从而有可能增加原来的工人人数:矿工、植棉各州的奴隶等等。与此相反,由于毛纺织厂的建立,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被羊排挤了。(第 433—434 页)

^① 指恩格斯(为《双周评论》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见本卷第 426—450 页。——编者注

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大大地加强了社会分工。(第435页)

(c'')或(e)机器和剩余价值

采用机器的第一个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剩余价值并养活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的产品量,因而也就增加了资本家的人数;产生新的奢侈需求,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些需求的新的手段。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交通工具也发展起来(但在发达国家中,它只吸收很少的劳动力;例证见第436页)。最后,仆役阶级,即现代家庭奴隶,也发展起来。现代家庭奴隶的材料是靠被游离出来的工人提供的。(第437页)统计表。

经济学上的矛盾。(第437页)

一个生产部门里劳动由于采用机器而有可能绝对增加和这个过程的形式。(第439—440页)

大工业有巨大的弹性,它能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到高度发展阶段。(第441页)对原料生产国的反作用。由于工人被游离出来而造成的移民。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危机和繁荣的周期性。(第442页)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工人被赶来赶去。(第444页)

关于这点的历史资料。(第445—449页)

关于机器排挤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和各中间阶段,第450—451页)。还有,关于未采用工厂经营方式但具有大工业精神的工业部门的变更。家庭劳动成为工厂外的分支机构。(第452页)在家庭劳动和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第453页)例证:伦敦的印刷厂。(第453页)装订业,清理破布。(第454

页)砖窑厂。(第 455 页)现代工场手工业总的情况。(第 456 页)家庭劳动:手织花边业。(第 457—459 页)草编业。(第 460 页)剥削达到极限后,即转变为工厂生产:采用缝纫机制造服饰。(第 462—466 页)这个转变的加速,是由于推行强制的工厂法,废除了以无限制的剥削为基础的陈规。(第 466 页)例证:陶器业。(第 467 页)火柴业。(第 468 页)其次,工厂法对于因工人懒散以及旺季和赶时髦而造成的不规则工作的影响。(第 470 页)在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中,由旺季引起的过度劳动与无事可做并存。(第 471 页)

工厂法的卫生条款。(第 473 页)教育条款。(第 476 页)

工人被游离出来只是由于年龄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们长大了,不再适合原来的工作,不能再靠童工的工资生活,同时又没有学会新的手艺。(第 477 页)

大工业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的秘诀和传统的固定化,它把生产过程变为对自然力的有意识的应用。因此,和所有以往的形式相比,只有大工业是革命的。(第 479 页)但是,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形式,仍然使工人保持固定化的分工。因为它每天变革着分工的基础,所以工人因此而毁灭。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同一个工人有更换职业的必要,所以就要求他尽可能多方面发展,并且有了社会革命的可能。(第 480、481 页)

把工厂立法扩展到一切非工厂方式经营的部门的必要性。(第 482 页及以下几页)1867 年的法令。(第 485 页)矿山。(脚注,第 486 页及以下几页)

工厂法的积聚作用,工厂经营的普遍化,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态的普遍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的尖锐化,旧社会的变革要素和新社会的形成要素的成熟。(第 488—493 页)

农业。在这里机器排挤人力的情形更为剧烈。雇佣工人代替农民。农村家庭制造业的消灭。城乡对立的尖锐化。农业工人分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同时掠夺土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峰,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第 493—496 页)

五、剩余价值生产的 进一步研究^①

^①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 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²⁹³

由国际工人协会倡议和支持而在德国成立的工会,给莱茵省制铁业领导人提供了反对普鲁士政府企图降低生铁进口税的论据。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商会认为,降低生铁进口税会使普鲁士矿业资本家完全破产。英国资本家主张,为了经得住国外的竞争,不得不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德国矿业资本家要求维持保护关税措施以免遭英国人的竞争所带来的破产;然而普鲁士工人的工资比英国工人的工资少一半还多,而劳动时间却更长。

商会在4月14日给政府的报告中说:

“德国制铁业一旦破产,那将无法挽救。大资本将完蛋,成千上万工人将无以糊口。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工人问题越来越重要,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危险。”

这一自白证明,协会的工作不是徒劳的。资本家要求官方调查普鲁士制铁业的现状。工人们坚决主张,调查也要包括对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状况的研究。

卡·马克思写于 1868 年 5 月

5—12 日

载于 1868 年 5 月 16 日《蜂房
报》第 34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7 年俄文版第 4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为《双周评论》写的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²⁹⁴

卡尔·马克思论资本^①

托马斯·图克先生在研究通货时，指出这一事实：货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时要流回它的起点，但是货币只是作为通货发挥职能时就不是这样^②。这种区别（其实，这一点早就由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③确认了）只是被图克先生用来反对“通货论者”²⁹⁵及其关于纸币发行额影响商品价格的论断的论据中的一个环节。反之，我们的作者把这一区别当作研究资本本身的性质的出发点，特别是当作货币这种价值存在的独立形式怎样转化为资本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

② 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版第69—70页。——编者注

③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编者注

杜尔哥说,所有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为卖而买**;他们的购买只是一种预付,这笔预付以后又会回到他们手中^①。

为卖而买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货币作为资本发挥职能,并且这种交易必定会使货币返回它原来的起点,**为买而卖**则不同,在这种过程中货币只能够作为通货发挥职能。由此可见,卖和买这两种行为的不同的先后次序,赋予货币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为了说明这两种过程,我们的作者提出下面的公式:

为买而卖:商品 W 换成货币 G,货币 G 再换成另外一种商品 W;即 $W - G - W$ 。

为卖而买:货币换成商品,商品再换成货币,即 $G - W - G$ 。

$W - G - W$ 的公式代表简单的商品流通,在这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作为通货发挥职能。在这本书第一章²⁹⁶中对这一公式作了分析,这一章提出了一种新颖而又十分明白的价值和货币理论,在科学方面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但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它,因为整个说来,它和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先生关于资本的见解的基本点关系不大。

另一方面, $G - W - G$ 的公式则代表那种使货币本身已转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

为卖而买的过程 $G - W - G$,显然可以简化为 $G - G$;这是货币间接地交换货币。假定我以 1 000 镑购买棉花,再以 1 100 镑卖出——;那么结果我是以 1 000 镑换 1 100 镑,是货币换货币。

如果这种过程的结局是,返回来的货币额总是和我预付的货币

① 安·罗·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杜尔哥全集》1844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43 页。——编者注

额相等,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预付了1 000镑的商人,不管换得1 100镑,1 000镑,甚至只换得900镑,他的货币经过了一个完全不同于 $W-G-W$ 公式的阶段;这个公式表示为买而卖,卖出你所不需要的,以便能够买进你所需要的。现在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公式。

每一过程都由两个阶段或行为构成,并且这两种行为在这两个公式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这两种过程本身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差别。在 $W-G-W$ 中,货币只是中介;商品,使用价值,构成起点和终点。在 $G-W-G$ 中,商品是中间环节,而货币构成起点和终点。在 $W-G-W$ 中,货币是永远花掉了;在 $G-W-G$ 中,货币只是预付了,目的是要把它收回来;它要回到它的起点,而这正是货币作为**通货**的流通同货币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第一个明显的区别。

在为买而卖的过程 $W-G-W$ 中,货币只有在全部过程被重复,新的商品被售出的条件下,才能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的流回同过程本身无关。但是在 $G-W-G$ 中,这种流回是必然的、在开始时就谋划好的事情;如果没有流回,那一定是在某个地方遇到了障碍,而过程就没有完成。

为买而卖,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为卖而买,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交换价值**。

在公式 $W-G-W$ 中,按经济学的说法,两端是相同的。它们两者都是商品;而且,它们具有等量的价值,因为全部价值学说的前提是:通常只有等价物才能相交换。同时, $W-W$ 这两端是两种在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正因为如此,它们才相交换。在 $G-W-G$ 的过程中,乍看起来整个运作是毫无意义的。用100镑交换100镑,而且还要兜一个圈子,这好像是荒谬的。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用量的多少来区别。因此, $G-W-G$ 只有当它的两端具有

量的差别时才有意义。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必须多于先前投入的货币。用1 000 镑购买的棉花卖1 100 镑 = 1 000 镑 + 100 镑;表现这一过程的公式,这样一来就变成 $G-W-G'$ 了;在这里, $G' = G + \Delta G$, 即 G 加上一个增殖额。这个 ΔG , 这个增殖额, 马克思先生称之为**剩余价值**①。原来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下来, 而且在自身上还增加了一个增殖额, 它产生了价值, 正是这个过程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 $W-G-W$ 这一流通形式中, 两端当然也可能在价值上发生差异, 不过这种情形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即使两端是等价物, 公式也不会是错误的。相反, 这种情况倒是这一公式的正常性质所决定的。

$W-G-W$ 能否反复进行, 要受交换过程本身以外的情况限制, 即受消费需求的限制。但是在 $G-W-G$ 中, 起点和终点在质上是相同的, 正是由于这一事实, 这一运动才是或者才可以是永不停息的。毫无疑问, $G + \Delta G$ 在量上不同于 G ; 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有限的货币额。如果把它花掉, 它就不再成为资本; 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 它就固定为储藏货币。既然承认驱动力存在于价值产生价值的过程中, 那么这种驱动力对 G' 和 G 都是存在的; 资本的运动变成永不停息、永无止境的了, 因为每一次交易结束时同开始时一样, 并没有达到目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过程的运作便把货币所有者变成资本家。

表面上看, $G-W-G$ 公式似乎只适用于商业资本。可是产业资本也是以货币换商品, 然后再换更多的货币。毫无疑问, 在这种情

① 本文中凡是提到“价值”而不加定语时, 都是指交换价值。

况下在买与卖之间有一些在纯粹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交易；但是它们丝毫不会改变这一过程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同样的过程以简略的形式出现在借贷资本中。在这里，公式缩减成 $G-G'$ ，可以说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

那么， G 的这一增殖额，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前面对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研究，不仅对此没有说明，甚至看来排除了任何产生剩余价值之类东西的流通形式。商品流通 ($W-G-W$) 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 ($G-W-G$) 之间的全部差别，好像只在于过程的颠倒；但这种颠倒怎么竟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结果呢？

此外，这种颠倒只是对参加这一过程的三者中的一方来说的。我作为资本家，从 A 手里购买商品，然后把它卖给 B。A 和 B 只不过是商品的卖者和买者。我在从 A 的手里购买商品时，我只是货币所有者，我在卖给 B 时，我只是商品所有者；但是，不管在哪一次交易中，我都不是资本家，都不是超出货币或商品的什么东西的代表。在 A 看来交易是以卖开始，在 B 看来是以买开始。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W-G-W$ 公式颠倒了，但从他们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另外，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 A 不经我的手把商品卖给 B，那样的话，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价值了。

假定 A 和 B 彼此直接从对方手里购买他们所必需的东西。就使用价值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A 生产他那种专门生产的商品可能比 B 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多些，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就交换价值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后一场合，不管有没有货币作为媒介，相交换的都是等量的价值。

抽象地考察起来，就是说，把一切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

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不谈,那么,在这种简单的流通中,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而外,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式变换。商品所有者手中所有的,始终是同一的交换价值,是客体化的等量社会劳动,而不管它采取的是这种商品本身的形式,或者是出卖这一商品而取得的货币的形式,或者是用这一货币所购得的另一种商品的形式。这种形式变换决不会在价值量上引起什么变化,正像用一张5镑的钞票去换5个1镑硬币一样。既然这里发生的只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那就必须是等价物的交换,至少,当这一过程在纯粹的和正常的状态下运行的时候,应当是这样。商品也可能按高于或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卖出,但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商品交换的规律。因此,纯粹的和正常的状态下的商品交换,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所有企图从商品交换中得出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家,便都犯了错误。孔狄亚克^①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假定,这个过程不是在正常的状态下运行的,相交换的不是等价物。比如,每个卖者出卖自己的商品都高于其价值1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个人作为卖者赚得的东西,作为买者又失掉了。这就像货币的价值跌落了10%一样。如果一切买者购买商品都低于其价值10%,情形则刚好相反,可是结果仍然一样。我们假定每个商品所有者作为生产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作为消费者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购买商品,这丝毫接近不了答案。

有一种错觉,认为剩余价值是来源于商品名义上的加价,一贯坚

① 埃·博·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文选》1847年巴黎版。——编者注

持这种错觉的人,总是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只买不卖,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阶级。就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吧。这个阶级从哪里获得它用以购买的货币呢?显然是从商品生产者那里——不管是依靠合法的还是强制的手段,反正不是通过交换。把商品高于其价值卖给这样一个阶级,不过是等于收回一部分曾白白交出的货币罢了。例如,小亚细亚诸城市向罗马人缴纳贡款,却用在贸易中欺骗罗马人的办法捞回一部分;但是最终在两者中损失最大的还是这些城市。可见,这不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办法。

我们假定发生了这种欺骗行为。A把价值40镑的酒卖给B,换得价值50镑的谷物。A赚了10镑,B损失了10镑,可是两者加在一起仍旧是90镑。价值转移了,但是并没有被创造出来。一国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互相欺骗来增加他们的总财富。

所以,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商品流通不创造新价值。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根本不去考察两个最古老的最常见的资本形式,即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原因。要说明这两种资本形式攫取的剩余价值不是单纯欺骗的结果,就要列举一系列中间环节,但这些环节在我们研究的现阶段上还不存在。以后我们会看到,它们两者不过是派生的形式,并且会弄明白,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出现比现代资本早得多。

可见,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但是,它能不能在商品流通之外产生呢?在商品流通之外,一种商品的所有者只是该商品的生产者,该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并按一定社会规律衡量的他自己的劳动的量决定的。这个价值表现为计算货币,假定,表现为10镑的价格。但这10镑的价格,不能同时又是11镑的价格;

包含在商品中的这种劳动创造价值,但没有创造增殖新价值的价值;劳动可以给现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但这只能通过追加新劳动的办法。既然如此,商品所有者处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触,怎能生产出剩余价值呢?换句话说,怎能将商品或货币变成资本呢?

“因此,资本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当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必须从这个过程中取得比他投入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他变为资本家蝴蝶,必须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²⁸⁸[第144—145页]

现在看一下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的货币形式上,而不进行交换,就决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价值。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再度转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交换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

有成为交换价值泉源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使用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独特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存在种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自由的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在法律面前必须保持这种平等关系;因此,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总是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一个生产者要想出卖不同于他的劳动力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生活资料。任何人也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不能靠尚未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过活;因为人自从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是在进行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

一样的。如果他的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市场上同货币所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所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做是总的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所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一系列陈旧层次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部分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 如果考察一下

货币, 我们就会看到, 货币是以商品流通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前提的。货币存在的各种特殊形式, 如单纯的等价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货币或世界货币, 按其中这种或那种形式可能起主导作用的情况, 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 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对于资本存在的必要历史条件来说, 单有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根本不够的。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 资本才产生, 而单是这一条件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若干时代。因此, 资本一出现, 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时代。”^①[145—149]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 劳动力也有交换价值; 这种价值也同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 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 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的正常工作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由气候和其他自然条件以及各国历史地形成的生活水平调节着。它们是变动的, 但是在一定的国家, 在一定的时期, 又是一定的。此外, 它们要包括已消耗的工人的替身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 只有这样, 这种特殊商品所有者才能延续下去。最后, 它们还要包括培养熟练劳动的教育费。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 是肉体上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跌到这个最低限度, 那就跌到它的价值以下了, 因为后者代表的是正常质量的劳动力, 而不是低劣质量的劳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4—198页。——编者注

动力。

劳动的性质表明,劳动力只有在它出卖以后才被使用,而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国家里,劳动只是在它实现以后才被支付。因此,在任何地方,工人都是借贷给资本家。关于工人提供这种借贷的实际结果,马克思先生从议会文件中摘引了一些有趣例子;不过这些例子还是让读者到原书中去读好了。

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时,同时生产出商品和剩余价值;为了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必须离开流通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

在这里,我们首先发现劳动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单纯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作为这样一种过程,它在社会存在的一切历史形式下都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另一方面,像前面所说的,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些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过程有两个特点。首先,工人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做工,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不要发生任何浪费,在每一个别产品上所消耗的劳动都不超过社会必要的劳动量。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财产,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力和劳动资料这两种都归资本家所有的东西之间进行的。

资本家只是在使用价值体现交换价值特别是剩余价值时才关心使用价值。他的目的就是要生产这样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价值的总和。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随便拿一种商品例如棉纱来看,并分析一下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假定生产10磅棉纱需要价值10先令的10磅棉花(损耗不计在内)。此外,还需要一定的劳动资料:蒸汽机、梳棉机和其他机器、煤、润滑油等等。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纱锭”来代表这一切并且假

定生产 10 磅棉纱所必需的机器磨损和煤炭等为 2 先令。这样,棉花 10 先令 + 纱锭 2 先令 = 12 先令。如果 12 先令代表 24 个工作小时即两个工作日的产品,那么棉花和纱锭就在棉纱中体现了两个工作日。但在纺的过程中加进了多少价值呢?

假定劳动力每日的价值是 3 先令,而这 3 先令体现 6 小时的劳动。其次,假定一个工人纺 10 磅棉纱需要 6 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在产品上加进 3 先令,10 磅棉纱价值是 15 先令,或者说,每磅值 1 先令 6 便士。

这个过程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任何剩余价值。而且它也不可能带来剩余价值,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地进行的。

我们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 3 先令,这个数目体现 6 小时的劳动。如果维持一个工人 24 小时的生活,需要半个工作日,那么这种情况丝毫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它可以生产的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资本家把自己的货币投入这种商品,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具有生产使用价值的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消耗,才能形成价值。但是,我们的资本家看得比这更远;吸引他的东西是一种特殊情况:劳动力是交换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交换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期望这个商品提供的特殊“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劳动力的卖者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

只费半个工作日,而这个劳动力却可以工作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

于是,工人劳动12小时,纺出20磅棉纱,其中体现着20先令棉花,4先令纱锭等等,而他的劳动值3先令,总计是27先令。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工作小时,那么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工作小时,值6先令。现在,这20磅棉纱代表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体现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个工作日体现在纺纱劳动中;5个工作日的货币表现是3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这一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 $\frac{1}{9}$ 。这样,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我们的资本家又回到市场上来,他卖棉纱是1先令6便士1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来投入流通的货币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一整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它是以流通为中介,因为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是它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增殖过程作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²⁹⁷。[第

174—176页]

马克思先生说明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后,就来分析剩余价值。从以上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在投入任何生产企业的资本中,只有一部分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为购买劳动力而预付的那部分资本。只有这部分资本产生新的价值;投在机器、原料、煤等等上面的资本,固然在产品的价值上相应地再现出来,被保存和再生产出来,但是并不能从中产生剩余价值。这一事实使马克思先生提出新的资本分类法,即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是投在机器、原料以及劳动过程所必需的一切其他要素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后者是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它不仅被再生产出来,同时还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由此可见,不变资本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不管多么必要,但是它并不直接参与这种生产,而且,投入任何行业的不变资本量丝毫不会影响该行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①。因此,在确定剩余价值率时,无须考虑不变资本。只有把剩余价值量同直接参与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量即可变资本量加以比较,才能确定剩余价值率。因此,马克思先生认为,剩余价值率只是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假定劳动的日价格是3先令,每日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则剩余价值率为100%。如果像通常那样,认为不变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积极因素,那会落到多么可笑的地步。这一点我们从纳·威·西尼耳先生的例子^②就可以看到,这位“以科学造诣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

① 这里应当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决不是同一个东西。

② 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编者注

1836年从他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牛津大学被召往曼彻斯特去学习政治经济学(向纺纱厂主学习)。”^①

马克思先生把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叫做“必要劳动”；他把超过这一时间而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叫做“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构成“工作日”。

在一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但是从事剩余劳动的时间并不为任何经济规律所规定；它在一定的界限内可能长些或短些。它永远不能等于零，因为那时资本家雇用劳动的动因也就消失了；同时，工作日的总长度由于生理原因决不能达到24小时。但是在比如说6小时的工作日和24小时的工作日之间，会有很多中间的梯级。商品交换的规律，要求工作日的长度不致超过与工人的正常消耗相适合的程度。然而什么是正常消耗呢？每天劳动几小时才符合正常的消耗呢？在这里，资本家的见解同工人的见解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因为这方面没有更高的权威，所以问题是靠力量来解决的。规定工作日长度的历史，就是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工作日的界限而斗争的历史。

“前面已经说过，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奴隶，农奴或自由人，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以外，追加一部分劳动，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无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儿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本家。”①[第 218 页]

但是很明显,在产品的使用价值比产品的交换价值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任何社会形式中,剩余劳动受到或大或小的社会需求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存在着为剩余劳动而追求剩余劳动的欲望。例如,在古典古代,极度的、累死人的剩余劳动几乎只发生在金矿银矿中,在那里,交换价值是以其独立的形式即作为货币来生产的。

“不过,那些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使它们的产品的的外销成为主要目的时,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外,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奴隶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成为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 7 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多瑙河两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②[第 219 页]

在这里,把徭役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因为在徭役劳动下,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明显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 6 小时必要劳动和 6 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 36 小时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 3 天,又为资本家劳动 3 天,完全一样。但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立即觉察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2 页。——编者注

② 参看同上,第 273 页。——编者注

也可以这样来表示同样的关系,即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 30 秒,为资本家劳动 30 秒。而徭役劳动则不同。两种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存的劳动在自己的地里进行,为领主的剩余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进行。他的这两部分劳动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①[第 219—220 页]

马克思先生还从多瑙河两公国的现代社会史中举出其他一些有趣的例子,说明那里的领主在俄国干涉的帮助下善于像任何资本主义雇主那样巧妙地榨取剩余劳动。不过这些例子我们不再往下引述了。如果说俄国基谢廖夫将军为了授予领主对农民劳动的几乎无限的权力而制定的组织规程²⁹⁰,是一种积极表现,那么英国的工厂法则消极表现。

“这些法律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地主和资本家所统治的国家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制地 exploitation^②(请原谅我用这个法文词,因为没有相应的英文词)劳动力的渴望。撇开威胁性一天比一天大的工人运动浪潮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③[第 229 页]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3—274 页。——编者注

② 剥削。——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276—277 页。——编者注

为了证明资本力求把工作日延长到超出一切合理限度的趋向,马克思先生广泛地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以及议会的其他文件,并且归纳出下面的结论: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用于为资本增殖价值……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使劳动力本身过早地衰竭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寿命的办法来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劳动时间。”①[第249—251页]

但是,这不是在反对资本本身的利益吗?资本最终不是还要补偿这种过度消耗的代价吗?从理论上说可能是这样。实际上,由于美国南部各州内的有组织的奴隶贸易,在7年内就耗尽奴隶劳动力已经成了那里公认的经济原则;实际上,英国的资本家是指望农业区供给工人。

“资本家看到,过剩人口,即同资本吸收活劳动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过剩人口代代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尚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经验向冷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05—307页。——编者注

静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摧毁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吸收农村人口，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的工人阶级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睬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不理睬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¹⁰⁶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对工人的不关心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①[第 254—255 页]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考察一下这种斗争中的两个对立的倾向，是很有意思的。起初，立法的目的是要强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1349 年）颁布第一批劳工法直到 18 世纪，统治阶级始终未能从工人身上把可能的劳动量全部榨取出来。但是随着蒸汽和新式机器的应用，情况就改变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迅速打破了劳动时间的一切传统的界限，以致在 19 世纪一开始，过度劳动制度就盛行起来并达到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结果迫使立法机关不得不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4 卷第 310—312 页。——编者注

1803年做出限制工时的规定。马克思先生对直到1867年工厂法为止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得出以下结论:

(1)机器和蒸汽首先在使用它们的工业部门中引起过度劳动,因此,法律上的限制首先在这些部门中施行;但后来,我们看到,这种过度劳动制度蔓延到几乎一切行业,甚至包括根本不使用机器或仍然保持最原始的生产方式的行业(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2)随着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使用,单个的“自由”工人失去了反抗资本进攻的能力,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于是工人只好进行集体的反抗,开始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全体工人对全体资本家的斗争。

现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假定“自由的”和“平等的”工人同资本家订立契约的那一时刻,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大不相同了。从工人方面来看,这种契约并不是自由的。他每天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实施一种国家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自由”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工厂法的朴素的大宪章²⁹⁸,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①[第288页]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剩余价值率和它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的关系。我们在这种研究中像以前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一定的不变量。

在这种假定下,剩余价值率同时又决定着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代表6小时劳动,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3先令的可变资本每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49页。——编者注

天就产生3先令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

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货币表现,因此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等于可变资本乘以剩余价值率;换句话说,它是由同时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和剥削程度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所以一个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个因素的增加来抵消。雇用100个工人所需要的可变资本,以50%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3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比这笔可变资本的一半雇用50个工人以100%的剩余价值率(比如说,每天6小时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多些。所以,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限度内,受资本支配的劳动的供给,可以不取决于工人的实际供给。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有一个绝对界限。不管劳动力的价值是多少,不管必要劳动是2小时还是10小时,一个工人每天生产的总价值始终不会达到24小时劳动所体现的价值。只有在这个界限以内,才可以由工作日的延长来补偿可变资本,以便取得同量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对于说明资本的下述两种对立的趋势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将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趋势是:(1)减少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可变资本量;(2)仍要生产尽量多的剩余劳动量。

其次:“在劳动的价值已定和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情况下,由两种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

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 $\frac{0}{0}$ 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①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要增加剩余价值就只能靠增加工人人数即增加人口;这种人口的增加是一国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人数已定,这个界限就由工作日可能延长的程度来决定。往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剩余价值形式。

在研究的现阶段上,我们看到,并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为此需要有一个最低额,这就是购买一个劳动力和为了使之运作起来而必需的劳动资料的费用。假定剩余价值率是50%,这样,我们的初生的资本家必须雇用两个工人,他自己才能维持像工人一样的生活。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有什么积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存财富,而主要是增加财富。

“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雇用8个工人。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但这时他仍然是一个小业主,一个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办法防止小业主变为资本家,限定每个小业主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5页。——编者注

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①。”^②[第295—296页]

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要变为资本家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又因生产部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前面已经详细考察过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大大改变了。首先,资本已经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工人本身的指挥权。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所关心的是,要让工人有规则地、尽力地、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不必马上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织业中同样有效。

如果我们仅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那么工人同他的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劳动同资本的关系,而只是劳动同生产活动的手段和原材料的关系。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

①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7—358页。——编者注

作自己的劳动对象。他不是鞣资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们从创造剩余价值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1865年第4号报告》第79—85页)。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变成了榨取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①[第296—297页]

但是剩余价值还有另一种形式。工作日的长度一旦达到极限,资本家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增加剩余劳动:这就是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降低劳动价值,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的这种形式,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考察。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68年
5月22日—6月2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26年
《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1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0卷翻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9—360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代表
大会地点的决议²⁹⁹

鉴于：

(1) 比利时议会刚刚把一项法律的有效期延长三年³⁰⁰，根据该项法律，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被比利时行政当局驱逐出境；

(2) 在代表们将处于当地警方任意摆布之下的地方举行代表大会，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尊严不相容；

(3)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三条^①规定，总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改变代表大会的集会地点；

总委员会决定，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于 1868 年 9 月 5 日在伦敦召开。

卡·马克思提出并在 1868 年
6 月 2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
载于 1868 年 6 月 6 日《蜂房报》
第 34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① 这里援引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7 年英文版。——编者注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关于费·皮阿演说的决议³⁰¹

决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对费利克斯·皮阿在克利夫兰大厅的公众集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不负任何责任。此人与本协会没有任何关系。

卡·马克思于 1868 年 7 月 7 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 1868 年 7 月 12 日《自由
报》第 5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³⁰²

在……^①上,一位巴师夏分子说他发现,用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的价值量,是我从弗·巴师夏那儿偷来的,而且还弄巧成拙。本来,我或许能够容忍这个误解。可是,就在这位第一号巴师夏分子发现我的价值定义实质上 and 巴师夏的定义相同的时候,又有一位第二号巴师夏分子在……^②的莱比锡《中央文学报》上宣称……^③

由此可见,把第一号巴师夏分子与第二号巴师夏分子相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整个巴师夏分子的大军现在都得投奔到我的阵营中来,并且接受我对资本的全部阐述。可想而知,我经过了激烈的内心斗争,才放弃了这种兼并所带来的喜悦。

我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版)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20年

①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刊物的名称:《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编者注

②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日期:1868年7月4日。——编者注

③ 手稿上留出空白以备填写以下的引文:“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惟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公理,那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以最严密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的结论。”——编者注

前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中就已经有了(第49页及以下各页)。^①而巴师夏的关于价值的高见,是在几年之后才问世的。^②因此,我不可能抄袭巴师夏,而巴师夏倒有可能抄袭我。

然而,巴师夏实际上并没有对价值进行任何分析。他只是赘述一些空洞的概念,借以宽慰地证明“世界充满了伟大的、杰出的、日常的服务”^③。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巴师夏分子全都是民族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也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伟大的、杰出的服务”,指出巴师夏的种种聪明的发现的**独特的普鲁士的来源**。老施马尔茨曾做过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而且还是普鲁士的政府枢密顾问。除此以外,他对蛊惑者³⁰³有敏锐的感觉。就是这个老施马尔茨于1818年在柏林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手册》。他的手册的法译本于1826年在巴黎出版,书名叫《政治经济学》。在扉页上,这本书的译者昂利·茹弗鲁瓦也被冠以“普鲁士政府顾问”的头衔。在下面这段引文中,我们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字句上都可以看到巴师夏的价值观念的精髓:

“一般地说,他人的劳动只为我们节约了时间;而这时间的节约就是构成它的价值和它的价格的全部东西。木匠为我做桌子,仆役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把我的衣服洗干净并为我取来我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两个人为我提供的是完全相同的服务;他们都替我节约了时间,而且节约了双份的时间:一份是我现在亲自做这些事所不得不花费的时间,第二份是我学会做这些事的技能所不得不花

①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编者注

② 弗·巴师夏的著作《经济的和谐》于1850年出版。——编者注

③ 见马·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第9页。——编者注

费的时间。”(引自《施马尔茨文集》第1卷第304页)

现在我们知道,巴师夏是从哪儿弄到他的脂油的,我不妨说,是从哪儿弄到他的施马尔茨的^①。

卡·马克思写于 1868 年 7 月
11 日前后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第 1
版第 13 卷第 1 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① 施马尔茨的德文 Schmalz 意为“炼成的脂油”。——编者注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政府对沙皇
俄国态度的声明³⁰⁴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谴责最近英国政府对俄国奴颜婢膝的表现——在俄国政府颁布命令^①废除波兰这一名称一个月之后,英国政府就在预算案中取消了“流亡者”一词前面的“波兰的”字样。

卡·马克思于 1868 年 7 月 14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 1868 年 7 月 18 日《蜂房
报》第 35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① 指 1868 年 2 月 29 日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的撤销波兰王国国家内政委员会的命令和对 1866 年 12 月 19 日(俄历 31 日)经皇帝陛下批准的波兰王国省县行政管理条例的补充条款。——编者注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
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³⁰⁵

决议。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机器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用以实行专制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

另一方面,机器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着必要的物质条件。

卡·马克思于 1868 年 8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 1868 年 9 月 11 日《比利时
人民报》第 38 号附刊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³⁰⁶

1868年8月18日于伦敦

为了结束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定于8月22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执行委员会^①会议,8月25日召开总委员会全体会议。我受委托在这两次会议上作报告,因此我无法接受这次令人十分荣幸的邀请,前去参加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

我高兴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已确定了一些实际上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为完全的政治自由作宣传鼓动;规定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它应当为整个社会完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祝工作顺利!

致民主派的问候

卡尔·马克思

^① 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68 年 8 月
18 日

载于 1868 年 8 月 28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 10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
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草案³⁰⁷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曾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如下：“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以后的社会改革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初步条件”；总委员会认为，现在已经是将该项决议付诸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在有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各个国家，所有支部都有责任就这个问题展开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

卡·马克思于1868年8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通过

载于1868年8月29日《蜂房报》第35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1卷翻译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第四年度报告³⁰⁸

1867—1868 年对国际工人协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平稳发展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激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①。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

法国政府在反对工人阶级的活动中自然是一马当先。我们在去年就不得不揭露它的某些敌对手法——扣留信件、没收我们的章程、在法国边境截取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文件^②。我们在巴黎为要求归还这些文件交涉了很久,但毫无结果,最后只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从官方施加压力,这些文件才交还给我们。

可是今年,帝国完全抛弃了假面具。它公然企图借助它的警察^③和法庭来消灭国际工人协会。十二月二日王朝³⁰⁹的诞生应当归功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表现就是 1848 年的六月

①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此处不是“迫害”,而是“敌对措施”。——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555 页。——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此处不是“它的警察”,而是“警察袭击”。——编者注

起义⁷⁵，因此这个王朝就不得不轮流扮演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无产阶级的家长式的保护人。当国际工人协会日益增长的威力在亚眠、鲁贝、巴黎、日内瓦等地的罢工³¹⁰中刚刚清楚地显示出来，自封的工人保护人就只好要么把我们的协会抓在自己手里，要么就把它消灭。最初的要求并不高。巴黎代表向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宣读的并于次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宣言³¹¹在法国边境被没收了。为了回答我们的巴黎委员会对采取这种暴力措施的原因提出的质问，鲁埃大臣邀请了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进行私人谈话。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中，他先是要求缓和并修改宣言中的某些地方。遭到拒绝以后，他就提出：

“如果你们能加进哪怕是几个感恩皇上的字眼，那就还有可能达成协议。要知道，皇上曾经为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情。”^①

皇上的亲信鲁埃的这种微妙的暗示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理解。从此以后，十二月二日政府³⁰⁹就只有等待某种借口，以使用暴力来除掉协会。我们的法国会员们在普奥战争¹⁹⁶以后进行的反沙文主义鼓动，使它更为恼怒。不久，芬尼社社员¹⁷⁴在英国引起的慌乱达到了顶点，这时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指出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即将执行的处决是利用法律进行的一种谋杀^②。同时，我们在伦敦举行了维护爱尔兰权利的群众大会。一向谨小慎微地百般巴结英国的法国政府这时认为从拉芒什海峡两岸夹

① 见1868年5月1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12号。——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这句话的后一部分是这样的：“要求减轻对三位曼彻斯特蒙难者的判决，并指出对他们判处绞刑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请愿书全文见本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攻国际工人协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它的警察在深夜闯进了我们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宅,搜查他们的私人信件,并在英国报刊上大肆叫嚣,说什么芬尼社密谋的中心终于被破获了,其主要机关之一就是国际工人协会。³¹²许多叫嚣都是无中生有!法院尽心尽力地进行了调查,但是根本找不到一点犯罪构成的影子^①。在把国际工人协会诬陷为密谋家的秘密团体的企图遭到了这样可耻的失败之后,又找到另一个绝妙的借口。巴黎委员会被当作一个超过20人的未经批准的团体³¹³而遭到迫害。受过帝国纪律训练的法国法官当然不加考虑就宣布解散协会,并对委员会委员处以罚金和监禁^②。不过法院在判决书的陈述理由部分有两个地方谈得坦率:一方面谈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力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宣称十二月二日帝国³⁰⁹同真诚地把真理、正义和道德作为自己指导原则的工人团体的存在是不相容的。这些事件的结果很快就在省里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自从巴黎判决之后省长们就开始经常为一些小事进行无端指摘。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在政府的刁难中灭亡,而是从中汲取了新的生命力^③。协会终于迫使十二月二日政府公开同工人阶级决裂,惟独这一情况加强了协会在法国的影响。

①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这句话是这样的:“他们费尽周折进行的一切调查都毫无结果,连检察官本人也非常反感地放弃了起诉”。——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这句话是这样的:“受过帝国纪律训练的法国法官当然赶紧宣布解散协会……”“和作出逮捕巴黎委员会委员的判决”。——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本段“生命力”后的一句话是“迫使帝国放弃其工人阶级保护人的姿态”。——编者注

在比利时,我们的协会为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而自豪。沙勒罗瓦矿区的矿主经常迫害矿工,引起他们暴动,接着就用武力去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在这样造成的慌乱情况下,国际工人协会的比利时支部把矿工的事情承担起来了,通过报刊和群众大会揭露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处境,帮助伤亡者家属,并为被捕者提供法律援助。陪审团终于宣告所有被捕者无罪。在沙勒罗瓦事件³¹⁴后,我们在比利时的成就就得到了保证。当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在比利时下院谴责国际工人协会,以它的存在作为修订外侨法³⁰⁰的主要借口。他甚至威胁要禁止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召开。比利时政府终究应当认识到,小国在欧洲存在的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自由的避难所。

在意大利,协会自门塔纳大屠杀³¹⁵以后被反动势力削弱了。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警察当局限制了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但是我们广泛的通信表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摆脱一切旧政党的影响而取得完全的独立。

在普鲁士,由于法律³¹⁶禁止普鲁士的工人协会同外国团体有任何接触,国际工人协会不能合法存在。而且,普鲁士政府还可怜地重复波拿巴的政策,例如对**全德工人联合会**⁶⁷进行无端的指摘。各个穷兵黩武的政府尽管总是准备着彼此厮杀一场,但在对自己的共同敌人——工人阶级进行十字军征讨时,却总是一致的。

不过,尽管有种种法律上的障碍,在我们的日内瓦委员会³¹⁷的周围却早已团结了一批规模不大的、遍布德国各地的支部。

主要分布在德国北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最近在汉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³¹⁸,不过根据法律它还不能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即将召开的纽伦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有主要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约100个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

加)把关于直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列入了议程。根据它的领导委员会的愿望,我们已派出一名代表前往纽伦堡。³¹⁹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明确的性质^①。已经决定9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目的是使帝国境内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般地联合起来。同时还发表了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邀请书,在邀请书中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你们的总委员会已经指定了一位代表前往维也纳³²⁰;但是屈从于封建反动势力的奥地利本届自由派内阁如此有远见,居然禁止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而使工人也成为它的敌人。

日内瓦建筑工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的生存。建筑业主把工人退出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但是工人坚决拒绝这种狂妄要求。他们由于在瑞士本土以及通过国际工人协会从法国、英国、德国和比利时得到了支援,终于争取到了缩短工作日^②和提高工资^③。在这以后,早已在瑞士深深地扎下根的国际工人协会,开始迅速而广泛地发展起来。比如,有50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可能是欧洲最早的协会)去年秋天在诺因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一致决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³²¹

在英国,政治运动^④、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工作占用了我们许多优秀力量,因而延缓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这些工联

①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明确的性质”为“革命的性质”。——编者注

②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在“工作日”后面添上“1小时”。——编者注

③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在“工资”后面添上“10%”。——编者注

④ 在马克思的英文稿中,“政治运动”为“动荡的政治形势”。——编者注

中有一部分已经宣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工联组织中,会员人数占第一位的是皮匠和西蒂区鞋匠工联。

你们的总委员会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³²²保持着经常的联系。美国同盟在1867年8月举行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派一名代表出席今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采取必要措施来实现这一决定。

北美工人阶级的潜在威力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法律已规定在联邦政府的公营工场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在联邦的八九个州内已颁布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通用法律³²³。但是目前美国工人阶级,例如在纽约,正在同顽抗的资本作殊死的斗争,因为资本正利用它所有的一切强有力的手段来极力阻挠八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实行。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最有利的政治形势下,工人阶级要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都有赖于培养和集中工人阶级力量的组织的成熟程度。

一国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甚至也容易由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缺乏组织而遭到失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彼此互相影响。只有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盟才能保证工人阶级获得最终胜利。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并不是某一个宗派或某一种理论的温室中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无产阶级运动又是由现代社会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趋势所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深知自己所负使命的伟大意义,它既不容许别人恫吓自己,也不容许别人把自己引入歧途。今后,它的命运将同孕育着人类新生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主 席 罗伯特·肖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68年9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9月
1日

载于1868年9月8日《比利时
人民报》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弗·恩格斯

致席勒协会理事会³²⁴

1868年9月16日于曼彻斯特

戴维森先生通知我说,理事会在9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定,要邀请卡尔·福格特先生在协会作演讲。

我深感遗憾的是,这项决定使我必须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

这里无须去谈事务本身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是会投票反对这项决定的。迫使我作出决定的不是这些原因。

我要辞职仅仅是由于一些同协会毫无关系的原因。在1859年和1860年,我的政治上的朋友们和我本人曾以真凭实据对福格特先生提出过严厉的政治性的指责(见卡尔·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对于从那时以来其他人又一再提出的这种指责,福格特先生至今仍保持沉默。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当时为此所展开的论战,理事会的其他理事想必全然不知,或者已经忘却了。他们完全有权忽视福格特先生的政治面目,而把他看做是一个把自然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加以

通俗解释而比较受人欢迎的人。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我在上述决定作出以后仍然留在理事会里,那我就是背弃了自己的全部政治历史,背弃了自己政治上的朋友。那我就是对一个我认为已经有证据证实 1859 年当过领取津贴的波拿巴的密探的人投信任票。

只有这种绝对的必要性能够促使我辞去职务,而在过去存在种种困难^①(现在这些困难已经顺利克服了)的情况下,我一直认为坚守这个职位是我的责任。

衷心感谢理事会各位理事先生曾经如此慷慨地对我表示信任,在与他们分手之际,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能永远保持友好的感情。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9 月
16 日

第一次发表于 1950 年《阿姆斯特丹国际
社会史研究所公报》
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① 指兴建席勒协会新会址的种种困难。——编者注

弗·恩格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³²⁵

“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可以容忍的,它只是在政府还中意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造就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种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宣传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规定和措施,随时都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宣传鼓动;一旦这种宣传鼓动有危险,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最重要的是,工人要看清楚这个问题,不要像资产阶级在‘新纪元’¹⁰⁰时期那样沉迷在错觉里,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可以容忍的,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以为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新闻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这段话见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汉堡版第50—51页^①。当时有人向工人许

^① 见本卷第111—112页。——编者注

诺，政府会同意给予普选权，企图以此把全德工人联合会⁶⁷——当时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的惟一有组织的联合——置于俾斯麦内阁的监护之下。拉萨尔的确曾经鼓吹说“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惟一的和绝对正确的手段；如果说当时人们对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这些本来也是资产阶级所赞成或者至少说过赞成的如此次要的东西采取藐视态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如果资产阶级对此感兴趣，那么，这不正是工人不介入宣传这些东西的理由吗？上面所说的那本小册子反对这样的观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懂得多，而小册子的作者不能不感到满意的是他的故乡城市巴门的拉萨尔分子同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断绝了关系。

而现在情况怎样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在了两年。国会选举已经进行了两次。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强强地把半打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普选权没有给工人带来许诺过的千年王国，——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向恩格斯请教。上述小册子第 48 页上^①写道：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么只要到法国去看一看就可以确信，在存在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到严格管制的报刊、完全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进行的选举只能是非常温顺的选举。究竟

^① 见本卷第 109—111 页。——编者注

有多少工人代表通过普选权进入法国议会？要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由此我们就要谈到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靠农业为生，三分之一的人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毫无怨言的人能够牢记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农村短工或农村雇工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再者，神父、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在这方面也起了阻碍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最困难的，而且是最迟的；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个特权阶级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它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治势力——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几乎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外。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在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村短工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因为这二者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分不开的——的斗争就等于是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也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

级来说就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非常坦率而必要的论述会鼓励封建主出面支持直接的普选权。那就再好不过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被解散了,而且也正是因为普选权普遍实行而被解散。恩格斯早就对联合会预言:一旦它具有危险性,它就会遭到镇压。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全体大会³¹⁸上决定:(1)赞成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2)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放弃了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跨入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领域。但是在上层当中也许有人认为这几乎违反了协议。这一点在其他时候也许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但是自从有了普选权,人们就不得不小心谨慎地防备农村的和小城市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类叛乱图谋的影响!普选权是钉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联合会正是由于同目光短浅的拉萨尔主义决裂而灭亡,这是联合会的光荣。因此,代替它的不论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建立在比那些翻来覆去的拉萨尔主义关于国家帮助的空话更具有普遍意义和原则性的基础之上。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以思考代替盲从,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9月底

载于1868年10月3日《民主周报》第40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弗·恩格斯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³²⁶

(补 充)

在用上面这一标题发表的文章中(见前一号报纸)曾引用了恩格斯的小册子中关于普选权的一段话^①,在这段引文的末尾,应当补充上这样的注解:

拉萨尔遗留给联合会³²⁷的那个“人类的主席”伯恩哈德·贝克尔,曾经对“马克思派”,也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进行最卑鄙的辱骂。^②现在这个贝克尔在其卑劣的文章《斐迪南·拉萨尔悲惨离世内情》中(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本人的卑鄙的灵魂,而且只是由于其中发表了一些盗窃来的文献才使人感兴趣)又这样弄巧成拙地来修正恩格斯了:

“但是为什么不进行争取结社、集会和新闻出版的绝对自由的鼓动呢?为

① 见本卷第470—473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脚注:“现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全德工人联合会⁶⁷的弗尔斯特林——门德的滑稽复制品³²⁸的‘母亲’——在继续从事这种可恶的勾当”。——编者注

什么工人不设法摆脱反动时期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呢?”(第 133 页)“……只有进一步发展民主主义基础才能重振拉萨尔主义,并使它变成纯粹的社会主义。为此尤其需要做到不再顾惜容克或富足地主的利益,把社会主义理论运用于在普鲁士人数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的广大农村工人,以此来补充和完善社会主义理论。”(第 134 页)

读者可以看出,那部小册子的作者(弗·恩格斯)可以对自己给予对手的影响感到满意。

弗·恩格斯写于 1868 年 10 月
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68 年 10 月 10 日《民主
周报》第 41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和英国工人 组织的关系³²⁹

英国的报刊、尤其是伦敦的报刊以异常认真的态度谈论国际工人协会和它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单是《泰晤士报》就为此刊登了4篇社论),这种态度在德国资产阶级报刊中引起了真正的疯狂叫器。德国报刊教训英国报刊,说后者的错误在于相信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的作用!它们发现英国工联同国际工人协会完全无关!尽管英国工联曾经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对进行反对资本斗争的巴黎工人、日内瓦工人和比利时工人进行了大量经济援助³³⁰。

有人从伦敦给我们写信说:“所有这一切,据称都是依据某个麦·希尔施^①的论断,他是舒尔采-德里奇特意派到英国去的,目的是要掀起这场喧嚣。要知道这是麦·希尔施说的,而麦·希尔施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可尊敬的希尔施在伦敦的工联主义者(各工联的成员)看来却是形迹可疑的人,因为他没有国际工人协会开的任何介

①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脚注:“指麦克斯·希尔施博士,敦克尔的《人民报》的‘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在他未到他不熟悉的英国地区去考察以前,伦敦对这位现代的社会救主的存在似乎毫无所闻。”——编者注

绍信！人们干脆把他愚弄了一番。因此希尔施做了傻事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人们认真地对待他的话，那是用不着抱有什么特殊愿望就可以坦诚告诉他全伦敦都知道的事，这就是设在伦敦的工联全国理事会³³¹由6人或7人组成，其中3人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这3人是奥哲尔（全国理事会书记兼鞋匠代表）、罗·阿普尔加思（联合起来的粗细木工的代表）、豪威耳（泥水匠代表兼改革同盟²¹⁵书记）。其次，他会知道，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还有5位委员代表其余的加入协会的工联（不算外地的工联，单在伦敦一个地方就大约有50个），这5位委员是罗·肖、巴克利、科恩、黑尔斯和莫里斯，此外，每个工联有权而且照例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再次，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代表英国人的还有：

各合作团体，以威廉·韦斯顿^①和威廉斯为代表，它们派了3个代表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改革同盟²¹⁵，以德尔、考埃尔·斯特普尼和鲁克拉夫特为代表；3人都是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国改革联合会³³²，以自己的主席阿·阿·沃尔顿和米尔纳为代表，它是已故鼓动家布朗特尔·奥勃莱恩创建的；

最后，无神论的民间鼓动运动，以著名演说家哈丽雅特·罗女士和柯普兰先生为代表。

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稍具规模的不列颠无产阶级运动派别不是直接由它们自己的领袖作为代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乔治·波特尔主持的英国工联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终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它每周都报道总委员会会议的

① 看来是指约翰·韦斯顿。——编者注

情况。

可尊敬的希尔施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欢呼,又给《威悉报》和以△为代号的《奥格斯堡女人》^①的伦敦通讯员提供了所希求的食料。这个人——因为两家报纸都是一个人在搞鬼——出于他自己最清楚不过的原因,住在距伦敦有好几个钟头路程的偏僻角落。在那里,他从《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星期六评论》中摘出一些叫人害臊的东西,再根据自己读者的口味加点美学鱼汁。有时,比如说这一次吧,这个人又拾起德国报纸上的谣言,以假造的日期登在《威悉报》和《奥格斯堡女人》上。这里所说的《威悉报》和《奥格斯堡女人》的记者不是别人,正是臭名远扬的摇笔杆的流氓无产者埃拉尔德·比斯康普。这个倒霉的人早就被一切像样的团体拒之门外,试图借酒来抚慰普鲁士吞并他的祖国黑森选帝侯国和他的朋友埃德加·鲍威尔³³³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

卡·马克思写于 1868 年 10 月
4 日

载于 1868 年 10 月 17 日《民主
周报》第 42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 年德文版第 16 卷翻译

① 指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

1866 年格莱斯顿先生给 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 六百万英镑的公债³³⁴

1866 年 5 月 11 日格莱斯顿先生的信^①在下述条件下使 1844 年银行法令³³⁵暂停生效：

(1)最低贴现率应当提高到 10%。

(2)如果英格兰银行超过银行券发行的法定限额，则这种超额发行的利润应当由该银行转归政府。

结果，英格兰银行把最低贴现率提高到了 10%（对于普通工商业者来说，这就意味着提高到 15% 至 20%），而并不违背 1844 年法令有关**发行银行券的条文**。每天晚上，他们从他们在西蒂区的友行户和其他主顾那里把银行券收集到一起，然后在第二天早晨又把这些银行券发放出去。然而，他们按照政府的那封信让银行的**准备金**

① 威·尤·格莱斯顿和约·罗素（1866 年 5 月 11 日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的信），载于 1866 年 5 月 14 日《泰晤士报》第 25497 号。——编者注

降到零,这是违背法令的精神的,按1844年法令的原意,这笔准备金是银行用来应付其银行部债务的惟一可利用的资产。

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信是通过保持、甚至人为地扩大皮尔法令的最糟糕的后果的办法使皮尔法令暂停生效的。无论是1857年乔·康·刘易斯爵士的信,还是1847年约翰·罗素勋爵的信,都不可能受到类似的责难。

银行保持10%的最低贴现率达3个月之久。在欧洲,这样的贴现率被看做危险的征兆。

在格莱斯顿先生这一着造成了对英国支付能力不信任的极不正常的气氛之后,克拉伦登勋爵,这位巴黎会议上的英雄³³⁶出场了,并且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封给英国驻大陆各国使馆的解释信^①。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大陆说,英格兰银行没有破产(尽管按照1844年法令来说,情况是这样),但是英国的工商业却在相当程度上破产了。他的信的直接影响不是伦敦人向银行“挤兑”,而是欧洲向英国“挤兑”(要求兑现)。(当时华金先生在下院正是用了这一说法)^②。在英国贸易史上这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事。当官方最低贴现率在伦敦是10%,而在巴黎是 $3\frac{1}{2}\%$ 到3%的时候,黄金却由伦敦流向法国。这证明黄金外流不是正常的商业交易。它仅仅是克拉伦登勋爵的信的结果。

当10%的最低贴现率这样维持了3个多月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必然的反作用。最低贴现率由10%飞速地猛跌到2%,并且这个

① 乔·威·克拉伦登《外交部。5月12日》,载于1866年5月22日《泰晤士报》第25504号。——编者注

② 见华金《1866年7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6年8月1日《泰晤士报》第25565号。——编者注

2%直到几天前还仍然是官方的银行贴现率。与此同时,所有的英国
有价证券、铁路股票、银行股票、采矿工业股票和各种国内投资已经
完全贬值,人人都急于把它们脱手。甚至统一公债也下跌了(在恐慌
期间,有一回银行曾拒绝给统一公债抵押贷款)。随后就敲响了国外
投资的钟声。外国政府的公债在伦敦市场上十分畅销。最先销售
的是**600万英镑的俄国公债**。这笔俄国公债几个月前在巴黎交易所还
无人问津,而今在伦敦交易所却被当成天赐之物。就在上星期,俄国
又发行了**400万英镑的新公债**。俄国在1866年也曾经和现在(1868
年11月9日)一样,在财政困难的重压下几乎崩溃,因为这种财政困
难是由正在进行的农业改革引起的,很难克服。

但是,使英国金融市场对俄国开放,这还只是皮尔法令对俄国的一
点点小意思。这个法令使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完全仰仗于
俄国佬的政府,欧洲这个最无支付能力的政府的恩惠。

我们假定,俄国政府在1866年5月初以德国的或希腊的某个私
人商号的名义把100万到150万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尽
管发行部拥有1300万英镑以上的黄金,如果俄国政府突如其来地
提取这笔款子,也能迫使银行部立即停止支付。那时,从圣彼得堡拍
来的一封电报就可能迫使英格兰银行破产。

如果皮尔法令不废除的话,俄国在1866年没有准备做的事,它
在1876年就可能去做。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1月
9日

载于1868年12月2日《外交评
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1卷翻译

卡·马克思

*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
1868 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
出版说明³³⁷

鉴于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些决议可以被看做是国际工人协会原则性纲领的一部分,而关于那次大会的报道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总委员会认为,宜将那些决议随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重新发表。

第一次即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的各类问题中,最重要的有下列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 1868 年 10 月
底—11 月 3 日之间

载于 1868 年 11 月 21 日《蜂房
报》第 37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的声明³³⁸

1868年11月2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致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秘书卡·施派尔先生

尊敬的朋友：

我得到通知说，协会决定向德国工人发出一封公开信，这样做的动机，据说是“在9月26日的柏林代表大会³³⁹以后，南部和北部的德国工人已经大规模地联合起来”。

鉴于这种情况，我不得不声明退出工人协会。

发出这样的公开信显然旨在表明，或者等于表明，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公开站在施韦泽和他的组织一边，反对遍及南德意志大部地区以及北德意志一些地区的纽伦堡代表大会的组织。³¹⁹在德国，大家都知道我是协会的会员，而且实际上是它最早的会员，因此，无论如何辩解，人们还是会认为我对采取这一步骤负有责任。

不过，你们应当明白，我不能承担这种责任。

第一,当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为代表的纽伦堡组织和以施韦泽为代表的柏林组织之间发生争论的时候,他们双方都以书面的形式求助于我。我当时回答道,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德国书记,我必须采取中立态度。我对他们双方都劝告说,如果他们不能也不愿融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就寻求某种途径和方式,为共同的目标和睦地并肩工作。

第二,我在给冯·施韦泽先生的回信^①中,详尽地向他说明了,为什么我对召集柏林代表大会的方式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都不能表示赞同。

第三,纽伦堡代表大会直接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汉堡代表大会(柏林代表大会是它的继续)由于普鲁士法律所造成的障碍,只是以表示赞同的方式间接地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而不久以前成立的属于纽伦堡组织的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³⁴⁰,却不顾这些障碍,公开和正式地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我重复一遍,在这种情况下,协会的决定使我除了声明退出协会之外,别无选择。烦劳你们将此信内容告知协会。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1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
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
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
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① 马克思1868年10月13日给约·巴·施韦泽的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纲领和章程的评语³⁴¹

[同盟的
纲领和章程]^①

[卡·马克思
的评语]

和平和自由同盟²³⁹的社会主义少数派,因为伯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阶级和个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所以脱离了同盟,从而也就坚持了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各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的几个属于不同国家的成员提议:我们组织一个完全融合于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之中、但其特殊使命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阶级平等!

融合于其中同时又自行
搭台唱对台戏!

①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我们自己深信这一创举是有益的，因为它将给欧洲和美国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取得别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手段，使他们免受近来资产阶级民主派出于自己的需要而施加的一切伪社会主义干扰，我们把和我们的朋友们共同发起建立这个新组织看做自己的责任。

因此，我们组成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现在把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纲领

(1)同盟宣布奉行无神论；它所追求的是废除宗教崇拜，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2)同盟追求的首先是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从废除继承权入手，期望将来每个人所享受的与他所生产的相等，期望按照最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土地、劳动工具，像所有其他资本一样，在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之后，只由工人使用，即只由农业合作社和工业合作社使用。

(3)同盟希望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即在生活、教育以及

这样说来，社会主义民主派通过国际还不能取得别人对他们的理解。

何等谦逊！他们组成了中央权力机构，真是一帮聪明人！

好像可以下命令废除信仰！

两性人！

就像俄国公社一样！陈旧的圣西门万应灵药！

各个不同阶段的科学技术人文知识等方面学习的同等条件。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逐渐导致人与人之间更伟大的自然平等,消除各种人为的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现象都是一个既荒谬又邪恶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产物。

(4)同盟是一切专制制度之敌,不承认除共和制以外的任何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立即和直接的目的,同盟也一概反对。

(5)同盟认为,所有现存的政治性的靠权力维持的国家机器正在各自国内把本身的运作越来越缩减为管理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职能,这些国家机器都必将简化为一个由众多自由协作社——其中既有农业的也有工业的——组成的大联盟。

(6)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或者说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任何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民族之间竞争为基础的政策。

(7)同盟要的是所有的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大联合。

章 程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构成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并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章程。

(2)同盟的创建盟员暂时在日内瓦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

空话!

如果它们是缩减其自身,那它们就不是必将简化,而是将自行消失。

竞争与竞争不一样,我亲爱的俄国人!

国际协会不容许有“国际支部。”

新的中央委员会!

(3)属于同一国家的创建盟员组成一个本国的全国委员会。

(4)各国的全国委员会负责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地方组织,各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全国委员会请求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接纳它们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5)所有地方组织均按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支部的惯例,成立自己的委员会。

(6)凡同盟盟员均应缴纳每月 10 生丁的会费,其中一半由各国全国性组织自行留用,另一半上交中央委员会用于全同盟之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全国委员会取得中央委员会同意后有权予以降低。

(7)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一个支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另外的地点举行公开会议。

国际的章程不承认这种“中介权力”。

侵吞我们自己会费的新的苛捐杂税!

他们想在我们的庇护下损害我们的声誉!

日内瓦

发起委员会成员

约·菲利浦·贝克尔。——米·巴枯宁。——泰·雷米。——安东·林德格尔。——路易·尼德格尔。——瓦列里扬·姆罗奇科夫斯基。——扬·扎哥尔斯基。——菲·策勒。——安·阿尔丹。——沙·佩龙。——茹·盖。——J. 弗里斯。——弗·罗沙。——尼古拉·茹柯夫斯基。——米·艾尔皮金。——赞佩里尼。——恩·贝克尔。——路易·魏斯。——培列。——马劳达。——爱德

蠢驴中的蠢驴! 还有巴枯宁娜女士!

华·克罗塞。——A. 布朗沙尔。——A. 马蒂斯。——沙·雷蒙。——阿列克谢耶娃女士①。——巴枯宁娜女士。——叙泽特·克罗泽女士。——罗莎莉·桑吉内德女士。——德西雷·盖女士。——珍妮·吉奈女士。——安东·杜诺。——J. 莫莱。——盖里。——雅克·库尔图瓦。——让·波托。——安德烈·贝尔。——弗·博费蒂。——Ch. 居约。——Ch. 波斯特莱布。——Ch. 戴特拉。——J. 克罗泽。——J. 桑吉内德。——沙·雅克拉尔。——L. 库兰。——弗·盖。——布莱兹·罗塞蒂。——约·马里伊。——C. 布雷希特尔。——L. 莫纳雄。——弗·梅米约。——多纳。——L. J. 谢纳瓦尔。——J. 贝多。——L. H. 福尔纳雄。——皮尼埃。——沙·格朗热。——雅克·拉普拉斯。——S. 佩拉顿。——威·劳。——瓦尔特·哥特洛布。——阿道夫·海伯林。——佩里埃。——阿道夫·卡塔兰。——马尔克·埃里迪埃。——路易·阿尔芒。——A. 佩莱格林-德鲁瓦。——路易·德·科佩。——路易·杜普拉。——吉尔莫。——约瑟夫·巴凯。——弗·皮斯特尔。——Ch. 吕谢。——玛格丽特·普莱西德。——保尔·加尔巴尼。——埃蒂耶纳·博雷。——J. J. 斯科皮尼。——弗·克罗谢。——让·若斯特。——莱奥波德·武赫尔。——G. 菲耶塔。——路易·菲利凯。——茹尔·若昂纳尔②。——阿米·冈迪永。——维·

① 巴尔田涅娃。——编者注

② 这个姓名是荣克写的。——编者注

阿列克谢耶夫①。——欧仁·杜邦②。——弗朗索瓦·舍伐利埃。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创建盟员决定办一家报纸作为这个新创建的同盟的机关刊物,名称定为《革命报》。临时中央委员会一俟募集到 300 股份(每股 10 法郎,股金从 1869 年 1 月 1 日起分 4 个季度交纳),即着手出版报纸。因此,临时中央委员会吁请同盟在各地的全国委员会在各自国内开始募集股份。鉴于这些股份被视为自愿捐款而不意味着享有收受报纸的权利,请各地的全国委员会同时还编制一份认股者的名单。

报纸每周出版一次。

订 费

一年 6 法郎
六个月 3 法郎 50 生丁

受临时中央委员会委托:

书记 扬·扎哥尔斯基

蒙布里昂街 8 号

注意:请各地的全国委员会在 1 月 1 日以前将所收到的认股和订报的钱款送交中央委员会。

他们竟然不通知我本人,就在瑞士宣布说我将为《革命报》³⁴²撰写文章!

① 巴尔田涅夫。——编者注

② 这个姓名是荣克写的。——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68 年 12 月

原文是法文

15 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1870)1964 年莫斯科版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³⁴³

就在大约一个月以前，一批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中央发起委员会**，宣布他们的“特殊使命是根据平等的伟大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云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它12月15日的会议上才见到由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①。根据此文件，上述的“**国际同盟完全融合于国际工人协会之中**”，而与此同时它却完全是在本协会之外成立的。

根据发起委员会的章程，除了经过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举的**国际协会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有另外一个自我任命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国际协会**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有**国际同盟**的地方组织存在，国际同盟的这些地方组织“将通过本国的全国委员会”——国际同盟在各国的全国委员会是在国

^①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年]日内瓦版（见本卷第485—491页）。马克思在本文中的引文均引自这个文件。——编者注

际协会在各国的全国委员会之外运作的——“请求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接纳它们加入国际工人协会。”这样一来，同盟中央委员会就自己给自己赋予了接纳申请者加入国际协会的权力。最后，国际协会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也将有一个国际同盟的全同盟代表大会与之并行，因为如发起委员会的章程所载，

“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将在另外的地点举行公开会议。”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委员会的做法，以或多或少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种族和民族的阴谋家^①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自行规定同国际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②第十二条）；

国际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在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投票赞成的情况下进行修改（见组织条例第十

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2 年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是“任何民族或党派任何捣乱者”。——编者注

② 引自 1867 年在伦敦出版的章程和条例的英文本。——编者注

三条)①；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

(1)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无效；

(2) 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3) 本决议在有国际工人协会组织存在的所有国家里公布。②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1868年12月2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8年12月22日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
载于187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1卷翻译

① 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讨论此文件时，经杜邦提议，后面又作了一些补充，会议记录本上未作完整记录。文件的最后定本是包含这些补充在内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72年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文的第二部分），显然经马克思在文字上审订过的补充内容如下：

“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已经包含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和平同盟的决议³⁴⁴之中；

在这项决议中宣布，和平同盟没有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

同盟发起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编者注

② 第3点没有写入决议的最后定本。——编者注

附 录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 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

摘自关于 1865 年 1 月 31 日
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马克思博士还宣读了《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美国)的摘录。该报同意国际的宣言和章程^①，并对因篇幅有限不能全文刊登宣言一事表示遗憾，不过毕竟部分地发表了宣言。证明协会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应当指出，巴黎、比利时等地有成百上千人要求得到会员卡；虽然在大陆某些地方禁止劳动人民公开联合起来捍卫作为国际宗旨的那些原则，但就是在这些地方，劳动人民也还是在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参加协会而又不致受到法律干涉的方案。

载于 1865 年 2 月 4 日《蜂房报》
第 17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5—15、16—19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
参加国际的手续的决议³⁴⁵

小委员会¹¹⁹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

1. 发给加入协会的每个团体一张证件^①。这种证件是一般性的，上面写明所开列的团体已经加入国际协会。

2. 在英国为领取个人会员卡所交纳的钱款，应全部送交中央委员会，但是，协会的任何支部遇有合理开支时，中央委员会如认为开支得当，可以拨给一笔钱款，以偿付该项开支。

3. 向大陆的兄弟们发会员卡，每张收费一先令，此项钱款送交中央委员会。

1865年2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501—502页。——编者注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 卡·马克思在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成立 25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³⁴⁶

我打算从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一些讲话中只引用卡尔·马克思的一段讲话。他说，关于自助和国家帮助的争论双方都是错误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活资料 and 一切劳动资料都属于资本家，因此自助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在俾斯麦政府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帮助。——工人不能把自己出卖给俾斯麦政府。国家帮助只能来自无产阶级行使最高统治权的国家。在普鲁士君主国内鼓吹劳动解放等于在水杯中掀起风浪。劳动解放意味着德国自由，而这就需要恢复波兰和推翻普鲁士君主制。针对进步党¹⁰⁵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的责难，马克思说，当他指出工人们应当联合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时，人们满以为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能够像英国资产阶级当时那样行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存在着允许社会上层人物对下层人随便进行辱骂和诽谤的新闻出版法。他补充说，工人报纸和工人运动本身只有得到警察的准许才能存在，对政府只能进行不痛不痒的批评。在这

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动，特别是因为资产阶级太怯懦，不敢实行自己的纲领。

约·格·埃卡留斯写于 1865
年 2 月 16 日

载于 1865 年 2 月 19 日《社会
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 入会团体的证件³⁴⁷

国际工人协会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中央委员会

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①已充分说明协会的目的和意图，然而，在这里可以用几句话加以概括。协会的目的在于保护、发展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彻底解放工人阶级。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的，协会将促进每个国家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的团结和不同国家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

协会的组织——以伦敦为中心，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支部——将协助各国工人阶级联合成为兄弟般合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入会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每年召开的代表大会将为工人阶级创造一个公开的强大的欧洲代表机构。

泥水匠协会执行委员会在伦敦黑袍僧区哈特菲尔德街25号^②

① 见本卷第5—15、16—19页。——编者注

② 这一段中的黑体字是手写的。——编者注

举行会议，表示赞成这些原则，并申请加入兄弟联盟，在此接纳泥水匠协会为协会的支部。

1865年2月21日^①

中央委员会主席	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委员	乔·威·惠勒
法国通讯书记	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	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	埃·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	莱·路易斯
名誉总书记	威·兰·克里默

1865年夏以传单形式在伦敦
印发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0卷翻译

^① 这个日期是手写的。——编者注

* 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³⁴⁸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伦敦西区希腊街 18 号

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以集体方式加入协会；入会的惟一条件就是承认协会的原则并缴纳入会申请书（涂上漆，并裱在带轴的麻布上）的费用 5 先令。加入协会的团体不一定要缴纳会费；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费和依据自己的估量缴纳会费或是在它们认为协会的活动应当得到支持的时候随时给协会以支持。

中央委员会愿意把详细阐述协会的原则和目标的信函和章程寄给任何一个表示了这种要求的团体；在伦敦地区内还准备派人对任何需要了解细节的人作出解答。加入协会的团体有权派遣代表 1 名参加中央委员会。个人会员除为会员证缴纳 1 便士以外，规定每年缴纳会费 1 先令；会员证同一切问题的解答，都可以从名誉书记或每星期二晚上 8 点至 10 点在希腊街 18 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

法国通讯书记 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 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 埃·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 莱·路易斯
 中央委员会主席 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委员 乔·威·惠勒
 名誉总书记 威·兰·克里默

愿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 团体的申请书格式

我们，在.....集会的.....成员们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和目标，并保证传播和贯彻这些原则和目标；为了证实我们的诚意，我们现在特请求中央委员会接受我们加入兄弟般的同盟，作为协会的附属支部。

受.....名会员的委托签字
 书记.....
 主席.....
 186 年.....

写于 1865 年 6 月 6 日以后

原文是英文

1865 年夏以传单形式在伦敦
 印发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中央委员会 1865 年 7 月 25 日 全体会议修改和通过的 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和 代表会议的报告³⁴⁹

鉴于我们的法国和瑞士通讯员们迫切要求中央委员会采取步骤，履行在协会成立时交给它的任务——今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以便讨论欧洲无产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你们委员会全面地研究了这一问题，现在向你们提交下列建议：

1. 由于目前不可能在布鲁塞尔或伦敦召开代表大会，我们建议不召开代表大会而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召开日期定于 9 月 25 日，星期一。

2. 在大陆和英国的同情我们事业的报纸上发表如下声明：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下列三个原因，决定把在布鲁塞尔或其他任何地方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延期：

第一，因为中央委员会认为召开一个人数不多的、由大陆上协会的几个主要支部的代表参加的预备性的代表会议来讨论应向将要举行的代表大会提出的议程是适宜的；

第二，因为工人阶级的精力和注意力在英国已完全被选举改革

运动、大选和工业展览所吸引，而在法国又被罢工所吸引，以致大大妨碍了协会的发展；

第三，因为比利时议会今年通过了外侨法³⁰⁰，这个法律阻碍协会在比利时首都召开代表大会并且排除了协会在那里召开代表会议的任何可能性。”

3. 代表会议应按如下方式组成：邀请每个中央理事会派代表 2 人，另外，再由里昂派代表 2 人。代表的旅费由代表所属的支部负担，在伦敦的费用则由中央委员会支付。

4. 至于如何支付这些费用的问题，公民荣克已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慷慨的建议，他准备负担瑞士代表的伙食和住宿费用。如何支付其他费用，常务委员会建议：

第一，中央委员会委员于 9 月代表会议开幕前交上下一年度的会费；

第二，委托总书记^①号召已经加入协会的团体的书记们加紧向个人销售会员证以弥补代表会议的费用；

第三，建议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取一些会员证去销售，先以现金向委员会交付会员证的钱，以后从销售款中扣还自己的垫付款。

5.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通过如下议程，并将它提交代表会议讨论。

需要中央委员会修改和通过的议程如下：

(1) 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

(2) 有关协会组织的问题。

(3) 在协会帮助下在各个国家资本和劳动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

^① 威·兰·克里默。——编者注

动的问题。

- (4) 工会——工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 (5) 合作劳动。
- (6) 直接税和间接税。
- (7) 缩短工作日。
- (8) 女工和童工。
- (9) 俄国佬入侵欧洲以及恢复独立和统一的波兰。
- (10) 常备军；它对生产者阶级的利益的影响。

6. 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的预备会议将同常务委员会联合举行，而决定性会议则同中央委员会联合举行。

7. 9 月 28 日为下列三件事举行晚会：第一，纪念协会成立一周年；第二，欢迎大陆代表；第三，庆祝美国联邦制和自由劳动的胜利。联谊晚会节目：茶话会、祝词和舞会……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0 卷翻译

海尔曼·荣克

* 给皮埃尔·韦济尼埃的公开信³⁵⁰

于伦敦弗利特街包佛里街 18 号

韦济尼埃先生：

在 1865 年 12 月 16 日《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其目的显然是要向劳动者解释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所遵循的原则；公民勒吕贝向委员会介绍了这篇文章（这是根据给他的委托），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是匿名发表的，然而却是出于您的手笔。在讨论了这篇文章之后，中央委员会在 1866 年 1 月 9 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要求公民韦济尼埃证实他所提出的事实，如果拒绝证实或者不能证实这些事实，就把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由于您的文章同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恢复事实的全部真相；中央委员会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托付给自己的权责，不打算以诬蔑还击诬蔑，以谎言对付谎言，不愿意堕落到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它让被指控者本人来为自己辩护，它不会在任何阻碍面前止步不前，同时不管虚伪的朋友怎样说，它决不给自己留下污点和耻辱。

该文中以下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

一

“不久，全体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都辞职了，理由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

中央委员会的九个法国委员中只有两人退出，即德努阿尔先生和勒吕贝先生，而且后者很快又回来了；至于意大利委员，其中有一人（公民沃尔弗）说明了自己退出的理由并不是“托伦先生和弗里布尔先生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且进行阴谋活动”，而是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由小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公民勒福尔的决议^①，可是这个决议在几小时以前他本人还以小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投票赞成过。

二

“委员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一直进行工作到今天。”（《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

退出委员会的两个法国委员之一，前法国书记公民勒吕贝不久就作为德特福德支部的代表回来了；因此，委员会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为时不久。

^① 参看本卷第 121—124 页。——编者注

三

“它(委员会)公布了宣言和临时章程;前者出自一位杰出的拉丁族政论家①之手,等等。”(《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

宣言和章程是在意大利委员和两名法国委员退出委员会以前发表的;宣言并不是出自拉丁族的杰出政论家之手,而是出自条顿族的作家②之手;还在拉丁族杰出的政论家看到宣言以前,宣言就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其中包括法国委员和意大利委员一致通过了;拉丁族杰出的政论家不仅不是宣言的作者,而且如果他事先看到这个文件,他就会因为宣言的反资产阶级倾向而号召意大利委员起来反对它;但是他晚了,只能阻止意大利委员把宣言译成意大利文。正因为我们的宣言具有如此鲜明的特点,意大利委员才退出了委员会;显然,您从来没有读过这个宣言,而拉丁族杰出的政论家也不会因为您把他当作这个作品的作者而感激您。

四

“它(委员会)是否力争达到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即劳动者的彻底社会解放呢?没有!它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一年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召开代表会议和制定应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上面,等等。”(《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

① 指朱·马志尼。——编者注

② 指卡·马克思。——编者注

中央委员会只是到 1865 年初才开始工作；“因此，在代表会议以前是有 9 个月的时间”；它把这 9 个月的“宝贵时间”用于建立国际联系和扩大英国国内的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代表团每周都被派往各种不同的工人团体，以动员它们加入协会。这项工作的成果如下：到代表会议召开时，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拥有 14 000 名会员；加入协会的包括鞋匠协会和泥水匠协会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工人组织（工联）的最有影响和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创办了报纸，其名称（《工人辩护士报》）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任务，它随时随地都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英国成立了争取普选权的团体（改革同盟）——这个团体有数千成员；其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和大部分委员都是从我们的人中间选举出来的。

在法国有数千名会员。

在巴黎有一个强有力的、活动积极而又无可非议的理事会领导着一个拥有 2 000 多名会员的组织；在里昂、鲁昂、南特、卡昂、讷沙托、蓬莱韦克、庞坦、圣但尼、利雪、皮托、贝尔维尔以及其他地方都有支部。

在瑞士，在日内瓦有一个由优秀人物组成的领导机构，领导着一个拥有 500 名会员的组织；在洛桑、沃韦、蒙特勒和纳沙泰尔州都有支部。

在比利时，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最好的征兆；中央委员会有理由认为，西班牙很快也会学比利时的榜样。

五

“不,它(委员会)甚至既没有邀请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或许许多的英国团体派一名代表,也没有邀请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或法国现存的这些团体派一名代表来参加它于1865年9月举行的代表会议,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提不出什么证据来说明他们负有全权代表的责任。他们不仅不是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且他们参加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成了妨碍这些团体派出代表的惟一原因。我们可以举出一些这样的团体,它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参加代表会议,等等。”(《韦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原则上只有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和赞同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团体才能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我们的财政状况使我们不得不把代表的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

在拥有如此多的工人团体的德国,能够派遣代表的只有舒尔采-德里奇组织的各消费合作社和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即全德工人联合会⁶⁷。前者只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具(这一点它的成员是不知道的),舒尔采-德里奇就是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之一;至于拉萨尔派的各个团体,它们过去而且直到现在都是处于完全瓦解的状态,其中有一部分同俾斯麦结成了联盟,而另一部分,即当时尚未改组的那一部分则承认曾作为瑞士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约·菲·贝克尔的领导。在代表会议期间,贝克尔接到了索林根工厂工人的委托,于是他也成了日内瓦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而伦敦的德国人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则由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会议³⁵¹。除了工人们在德国建立团体时所

遇到的阻碍外，法律也禁止他们加入外国团体；然而仍然有几个协会的支部在德国的北部和南部建立起来了。鉴于所有这些困难，德国并没有像中央委员会所期望的派出那么多的代表，这又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呢？

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很好地代表了英国人的团体。主席奥哲尔是工联理事会（英国所有工联的最高理事会）的书记；总书记克里默是粗木工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改革同盟的书记豪威耳同时又是泥水匠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和泥水匠协会书记科尔森都是这个协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代表；一个人寿保险互助会的理事会的成员惠勒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代表鞋匠（有 5 500 名会员）的是奥哲尔、摩尔根和柯普，而肖则代表了彩画匠，等等。

出席 1864 年意大利工人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公民沃尔弗，以及委员会的其他意大利委员，虽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意大利却连一个会员也没有能够吸收；中央委员会感到十分遗憾，意大利委员甚至到退出委员会时都没有得到“组织得非常好的意大利团体”的充分信任，没有能说服哪怕是一个这样的团体加入国际协会。

“也没有哪怕是一个法国现存的团体，因为托伦、弗里布尔之流并不是某个法国工人团体的代表，而只是代表他们自己”。

里昂支部的成员由于经费不足不能派出代表而表示遗憾，但是他们也像卡昂支部和讷沙托支部的成员所做的那样，寄来了声明，因而也就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

托伦、弗里布尔、利穆赞和瓦尔兰是由巴黎支部普遍投票选出的；这个支部是由各种专业的工人和“劳动信贷”协会的几百个会员

组成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贝律兹也是支部的成员；他们全都参加了或者可以参加代表的选举。4个巴黎代表之一的利穆赞是各合作团体的国际性机关报《联合》报理事会秘书。克拉里奥尔先生是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席利先生、杜美尼尔-马里尼先生等人应中央委员会的邀请从巴黎来出席了代表会议，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

您所说的由于托伦、弗里布尔之流的参加而妨碍它们派遣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其他团体是哪些呢？您是否指在法国目前制度下容许存在的惟一团体十二月十日会³⁵²呢？

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在巴黎的所有自由派报纸上都发表了，既没有引起国际协会会员或法国合作团体成员的任何怨言，也没有引起他们的任何异议；代表们的代表资格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小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

代表会议一开始，巴黎代表就提出了关于他们理事会的活动和关于财政管理的详尽而准确的报告，为了证实这个报告，他们还把他们的账簿和全部往来信件交给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对于巴黎理事会为在法国创建和宣传国际协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只有表示赞赏。

六

“比利时派遣了一位非常干练的代表——公民德巴普，但他是这个拥有很多团体的国家的惟一代表。”（《韦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比利时只派遣一名代表，而这名代表又恰好代表着最少数的选

民,这是极可惋惜的。可是塞扎尔·德巴普这个人毕竟还是称职地代表了比利时。

七

“从瑞士,或者更确切些说,从日内瓦来了两名代表,两人都不是瑞士人,一位是法国流亡者,一位是巴登流亡者,他们同上述两名所谓法国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代表会议;总共有五名或者六名同一种类的人,而只有一名真正认真选出的代表——比利时的代表。”(《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号)

瑞士代表是由国际协会瑞士各支部全体成员普遍投票选出的。成员全是瑞士人的格吕特利联盟³⁵³以及德国人的团体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也通过它们在瑞士的国际协会组织中的代表参加了选举。瑞士的协会会员由于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而在国际协会史中占据了光荣的地位。

瑞士代表不是同“两名所谓法国的代表”,而是同四名巴黎代表一起来参加代表会议的。

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公民贝克尔在 20 多年以前就是瑞士人;比安市的公民称号是为了感谢他对国际民主事业的效劳而授予他的;他既是工人,同时又是出色的鼓动家、战士、组织家和作家;他一直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贡献给劳动者的事业;像这样的巨人居然遭到小人们的攻击,这是可笑的。显然,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正直和无私见称的人才能评论他们的功绩。

八

“我们要问：能不能认为这种成果是令人满意的呢？”（《韦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号）

中央委员会几乎全是由一些拿惯了锤子和锉刀的工人组成的，他们只是牺牲了个人的利益才把锤子和锉刀换成笔杆；他们拿起笔杆，始终是为了维护或宣传某种崇高的事业，而决不是为了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主义。如果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如工人们一般所期望的那样令人满意，那么我们深信，他们会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令人疲惫的劳动日之后还必须进行夜间劳动，考虑到他们的弟兄们在经受了怎样的不安之后才使事情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

九

“委员会对有害的影响作出让步，把类似关于必须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这样的与协会宗旨无关的问题列入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议程。”（《韦尔维耶回声报》第294号）

中央委员会把关于消除莫斯科佬在欧洲的影响，而不是“俄国的影响”（这完全是两回事）的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程，这是对什么有害的影响作出让步呢？“消除莫斯科佬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在我们的宣言中已经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这个宣言决不是在什么人的有害的影响下发表的。还有什么问题是在这种有害的影响下列

入议程的呢？

十

“这个重大错误已经招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群波兰人要求让他们参加委员会，并且他们很快就在委员会中占绝大多数。”（《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4 号）

一群波兰人根本没有要求让他们参加中央委员会，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也决不是占绝大多数，而是不到二十分之一。

作者声称：“委员会拟定了一个列有十二个问题的议程，并把它付诸表决，这十二个问题几乎包括所有最一般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没有提出任何科学问题。”可是过了几行，他连一口气也没有喘就又承认还是这些问题具有“科学的意义”；怎样同这样的作者说理呢？

中央委员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偏执，它一向力求采纳劳动人民事业的一切真诚朋友的高见；它极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伟大原则和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抱着这种目的在瑞士创办了三家报纸：法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未来呼声报》和德文的《先驱》；在英国创办了惟一的以实行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认为爱尔兰人有权摆脱英国的枷锁的英国报纸《工人辩护士报》。

中央委员会不能做自己本身行动的评判人。日内瓦代表大会将要决定：委员会是无愧于它所受到的信任，还是轻率地背弃了它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海·荣克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

1866年2月15日

海·荣克写于1866年1月中
—2月15日之间

载于1866年2月20日《韦尔维
耶回声报》第43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 卡·马克思关于马志尼对 国际工人协会的态度 的发言记录³⁵⁴

摘自 1866 年 3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就上次会议的问题发言。他说,沃尔弗少校说什么我们的章程是马志尼写的,这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章程是他(马克思)本人在委员会讨论了几个方案之后写的,其中也有沃尔弗的方案³⁵⁵。这几个方案在两个问题上彼此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讲的是资本压迫劳动。沃尔弗赞成集中,但把工人团体仅仅理解为互助会。马志尼起草的章程是在那不勒斯代表会议时发表的。在马克思写的宣言发表以前,马志尼未必能看到它,因为它一直在马克思的口袋里;除非是马志尼在它到了勒吕贝手里以后,而还没有交给《蜂房报》时看到了这个宣言。其次,马志尼给布鲁塞尔的封丹寄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比利时各团体的,信中告诫它们不要接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关于这一点,德巴普曾经在代表会议上声明过。³⁵⁶

沃尔弗少校不是委员会委员;他应当把他打算申诉自己的不满这件事书面通知委员会。他(马克思)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其他大陆国家的书记对上次会议的问题提出异议,并要求把这一点记录在案,

因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可能还会提出这个问题。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60年俄文第2
版第16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³⁵⁷

1866年3月19日于

库柏街卡尔顿大厦

“席勒协会”现在成立已有六年，这充分证明，它是一个符合实际需要的组织；由于和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将在明年6月期满，而房东又坚决拒绝延长合同期限，所以本会不得不从明年6月起迁离现在的会址。

因此，理事会需要解决的任务是：为协会找到一个符合其目的的场所。

所有找寻合适房屋的行动均告失败，而且也无法找到一个承包人愿意建造这样一所房屋，然后把它租给协会，因此除了设法筹措必要的资金来自行建造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为此我们应当考虑的主要几点是：

协会应当位于市中心地区。

来访者在一楼就可以得到协会的接待。

各个房间至少应当和现在的一般大。

为了协会今后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实现这些条件。但是，除此以外，最好是所设计的新建筑物能容纳曼彻斯特现有的各个团体。如果把最上面一层用来修一个能容纳250人到300人的大厅，这个目

的就能达到。修建这样一个大厅只需略微提高建筑造价,不过,出租大厅倒可以增加协会的收入。

因此,我们尽力来寻找合适的地皮,并算出整个计划的费用。

下面就是我们得出的结论:

建筑面积大约为 350—400 平方米

的地皮价格 6 000—7 000 英镑

建筑造价 3 500—4 000 英镑

添置家具 500—500 英镑

总计:10 000—11 500 英镑

我们相信可以有把握地预测,用这样的地皮和房产作抵押,可以借到 5 000—6 000 英镑,而考虑到协会以往的财务领导经验和今后收支有可能增加,我们完全确信,支付这一笔借款的利息是完全有保证的。

由此看来,要实现我们的计划,需要一笔 5 000—5 500 英镑的自有资金。

尽管席勒协会接收各民族会员,经常有非德意志人参加它的活动,但是它实质上毕竟是一个德国人的组织。

协会现有会员 300 多人,协会向他们提供:

图书馆,目前藏书 4 000 多册;

阅览室,陈列 55 种杂志,大部分是德文杂志;

科学和文学报告会,首先在协会内部为此目的组织的专门小组

中进行。

所以，协会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了德国的思想文化，此外，它的会址为人们提供了交往的机会，这种交往对于那些刚从祖国来这里不久、在曼彻斯特没有其他落脚处的人特别有益。

我们深信，如果实现我们的计划，使得协会会址在条件上有所改善，而由于这又会引起财政状况的改善，协会今后就能更好地实现它的这些目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首先向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呼吁；我们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参与筹措必要的资金。

为了不使协会一下子负担过重的利息，理事会决定尝试用募捐的办法来筹集上述这笔资金；但是考虑到将要建造的建筑物只是用于实现协会的目的，理事会还同时决定，一旦席勒协会停止活动，捐款人将因其所捐款项而成为协会的债权人，这一点将在收据上特别注明。

当要为协会兴建自己的楼房，借以保证其存在的意图一传出，在会员中就掀起了参与的热潮，在几天之内就收到了将近 1 200 英镑供理事会支配，每份金额 25 英镑以及此数目以下不等。

这笔无疑十分可观的款项主要是刚到这里不久的德国人无私努力的结果，而他们同时也代表那些直接受益于协会的人。

这一结果证明，协会现在已经成为这里为数不少的德国人的一种需要；我们受到这一结果的鼓舞，现在向那些即使对协会疏远的人呼吁；协会追求上述目标，它一旦站稳脚跟，一定会成为曼彻斯特所有德国人活动的中心。

我们请求您们解囊相助以促使我们的计划的实现。

理事会相信，曼彻斯特的所有德国人会协助实现这个对大家有

好处的目标。只有通过这种办法,这个计划才可望付诸实施。所以理事会认为自己有理由满腔热情地推荐这种办法。

受理事会委托:

主 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J.G.韦纳

秘 书 A.布克哈德

写于 1866 年 3 月 19 日

原文是德文

1866 年 3 月以传单形式印发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保尔·拉法格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先驱³⁵⁸

我们非常感谢塔朗迪埃公民的信，怀着衷心的喜悦把它刊登出来。因为我们想要人们从拉尔多鲜明的个性中看到促使他同 1855 年和 1864 年的国际协会³⁵⁹进行积极合作的对于人类的巨大的爱。

但我们要使塔朗迪埃公民认识到，1855 年的国际协会不是第一个这样的组织。早在 1846 年，一些预感到运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就想在世界各国建立一些组织，以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国际民主协会³⁶⁰中央委员会设在布鲁塞尔。公民梅利奈(他是一位波拿巴派将军的儿子)为名誉主席。在其他委员中(所列举的仅是已去世者)，有列列韦尔(波兰人)、安贝尔(法国人)等，……这个委员会在欧洲各国(除意大利外)都有它的代表。

在伦敦，它同最狂热的宪章派运动⁷领袖们领导的民主派兄弟协会³⁶¹建立了一些联系，这个协会在伦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英国人在 1848 年向巴黎派遣了一个包括厄内斯特·琼斯、朱利安·哈尼等人在内的代表团，以作为他们在临时政府中的代表。

在法国，它同蒲鲁东以及包括弗洛孔在内的《改革报》的编辑们建立了联系。

中央委员会在科隆、柏林和其他德国运动中心也建立了一些

组织。

在国际民主协会建立很久以前,马志尼建立了一个国际协会:青年欧洲¹⁸⁶;但这一协会创建的基础和观点不同于上述三组织。

保·拉

保·拉法格写于 1866 年 5 月
29 日—6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66 年 6 月 3 日《左岸》第
22 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海尔曼·荣克和保尔·拉法格

国际工人协会发展概述³⁶²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欧洲主要国家(德国、波兰、瑞士、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大会选出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起草协会宣言,制定章程和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些组织。

今天我们想在大会召开之前,对协会已经取得的发展作一概述,使协会所有成员和所有那些尚未参加协会者对此有所了解。

英 国

大批英国工人协会^①(泥水匠协会、鞋匠协会、木器工人协会、裁缝协会等……)赞同国际工人协会原则,并加入这一协会。

与此同时,粗木工协会、箍桶匠协会、细木工协会等也准备加入

① 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读者不应忘记,英国工人阶级已部分组织起来。实际上,协会(工联)内部包括同一行业所有成员。其中某些协会拥有数量可观的会员,如:鞋匠协会约有会员5 000人。”——编者注

这一协会。

改良主义运动曾一度吸引了英国工人阶级全部注意力并占据了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活动内容。但某个时期以来,一些由中央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各个工人协会中去,使它们了解国际工人协会原则并邀请它们加入协会。代表团在各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在伦敦,中央委员会创办了一份报纸:《共和国》报,该报成为它的机关报。

国际协会德国支部和法国支部建立起来了。

而国际协会引起公众注意的最重要的原因——正如宣言所指出的,是它唤起并保持了英国工人阶级对其自身政治力量的觉悟,即自1848年反动时期以来失去的感情。国际协会在这方面给英国工人阶级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以致鞋匠协会在其章程中删去了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条款。泥水匠协会也正在这样做。

正是**国际协会**使工人在美国国内战争⁵中坚持他们的反奴隶制政策。并且协会是最早向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林肯发出贺信者之一。林肯在给协会的复信中积极鼓励协会成员坚持其团结统一的运动。——**协会**创立了“改革同盟”运动²¹⁵。第一次改革派会议任命了一个组织和鼓动委员会,委员会共有27名委员,其中24人属于中央委员会,正是他们提出了普选权的要求。当英国整个报界鼓掌欢迎政府反对芬尼社社员¹⁷⁴的行为时,只有《共和国》报敢于大声为芬尼社社员辩护。中央委员会甚至给内务大臣寄去一份书面申请,请求会见大臣,以争取改善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的命运。但请求遭到拒绝。

国际协会最近取得了成功,改变了报界对它的看法。厂主把缝

纫工人逐出工厂(同盟歇业)^①,并立即派其代理人去欧洲大陆招募缝纫工人。中央委员会将此事告知其通讯员,各国通讯员通过一些通讯手段(口头上或通过报纸),使厂主的计划落空。但是,一些没有国际协会成员的德国城市的缝纫工人已到达爱丁堡,他们的两位同胞从伦敦被派到他们那里去,回来后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汇报,说工人们已经出发,这实际上是几天以后发生的。^②

瑞 士

在瑞士,国际协会发展最迅速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它几乎在瑞士的所有城市,日内瓦、洛桑、沃韦、蒙特勒、拉绍德封、圣伊米耶、松维利耶、波郎特吕、比安、巴勒、苏黎世、欧博讷、韦齐孔等,创建了一些组织。

国际协会拥有三份报纸:其中两份用法文出版:《未来呼声报》和《国际协会报》,一份用德文出版:《先驱》报。所有瑞士报纸都为协会做过宣传。

在洛桑,协会成员去年冬天承揽了一项金额约为24 000法郎的国家工程,目的是在天气恶劣季节为工人提供工作。没有任何厂主

① 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英国,厂主和工人一样,也进行罢工。他们关闭工厂,将可怜的雇工抛置街头。这正是目前在设菲尔德发生的情况:制鞋工人失去了工作,其他协会工人赶来援助。”——编者注

② 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根据主席奥哲尔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将对战争问题进行讨论,并将召开一次大规模工人集会,以征询民众意见。”——编者注

的干预、专门由工人管理的工地，使参加者和市政当局感到惊异。工人们建立了一个**互助信贷**银行，它拥有 20 000 法郎资本，分成若干股份，每股 5 法郎。一个工人俱乐部建立了。

在拉绍德封，建立了一家合作制面包店，一家合作制肉店即将建立。这家面包店刚一开业，面包商们就把每斤面包价格降低 0.16 生丁。合作制肉店的计划不再对肉价毫无影响，因为肉店老板们已把每斤肉价降低了 0.09 生丁。

在日内瓦，消费协会正在建立。在洛桑，人们已决定建立类似巴黎附近的吉斯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工人住宅建筑基金。

德 国

由于缺少自由，国际协会在德国同在法国一样，未能有很大发展。但它在莱比锡、马格德堡、汉诺威、美因茨、柏林、佩特斯瓦尔道、索林根、朗根比劳、平讷贝格、乌斯特—吉尔斯多夫、恩斯多夫等地建立了一些组织。

自战争临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协会开始兴盛起来。（在萨克森）所有德国工人运动主要领导人都赞同协会原则，并积极进行宣传。

法 国

国际协会在巴黎、里昂、波尔多、卡昂、讷沙托、阿让唐、雷恩、鲁

昂、格朗维尔等城市拥有一些组织。

尽管协会没有很大发展,但它曾给予里昂工人阶级很大帮助。当时里昂织罗纱工人正在进行罢工,但他们准备作出让步,因为厂主威胁要以比他们更低的工资招募一些英国工人。工人们向协会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给他们的答复是,一切完全相反。这样,工人们便坚持下去,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

比 利 时

在布鲁塞尔、昂韦尔、列日、韦尔维耶、根特、那慕尔、帕蒂尼等城市,建立了很多组织。人民协会同国际协会建立了联盟,人民协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目前属国际协会。

协会在比利时改革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并通过众多集会明确提出普选权领域中的改革问题。

意 大 利

直至目前,意大利一直关注统一问题,未能充分思考社会问题。但意大利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赞同国际协会原则,并负责阐述国际协会的思想。在热那亚、米兰等地已出现一些组织。

美 国

国际协会同纽约及马萨诸塞州各城市建立了联系。

保尔·拉法格

海·荣克和保·拉法格写于
1866年5月30日—6月13日
载于1866年6月17日《左岸》
第24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 1866 年普奥战争的态度³⁶³的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目前所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

1866 年 7 月 17 日中央委员会
会议通过

载于 1866 年 7 月 21 日《共和
国》报第 176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³⁶⁴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

鉴于：

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工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不是要建立新的特权，而是要为一切人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堕落和政治依附的首要原因；

因而工人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职业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彼此间缺乏兄弟般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具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

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一切仍然分散的斗争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对一切人的态度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代表大会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一切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根据这一精神,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创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互相保护、进步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的代表组成。总委员会根据管理各种事务的需要从其委员中选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员,即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各国书记。

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确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和时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任命总委员会委员,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

代表按代表大会确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可以改变集会地点,但不能推迟集会时间。

第四条 总委员会在每年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协会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提前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同各种工人团体建立联系,它应该使每个国

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所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精神指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在所有的团体中加以讨论，并使协会在某种实际建议或国际纠纷需要它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在必要时，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个地方性团体或全国性团体提出建议。

为了加强同各个支部的联系，总委员会应发表定期报告。

第六条 由于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行动越少分散，它的活动才能越有成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每一个国家中的地方支部联合成一个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在运用这一条时，要考虑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但是，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条 例^①

1. 总委员会受权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a) 为此，它收集各国中央委员会送交给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能够通过这些途径获得的一切材料。

(b) 它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在各中央委员会的协助下把代表大会的议程通知每个支部。

2. 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通报，详细报道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这种通报主要应该涉及以下问题：

^① 原文为 Règlements spéciaux。——编者注

工作的供求状况,合作团体,所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状况,等等。

3. 上述通报以各种文字出版,并分发给所有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委员会,然后由各委员会负责发给每个支部一份。

4. 为了使总委员会能够执行这些决议,在 1866—1867 年度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征收 30 生丁(3 便士)会费。

这些会费主要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多种费用,如总书记薪金,发表文件及通讯的费用,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其他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5. 在一切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中央委员会,其负责人员由该国的各个支部任命,并可以随时由各个支部加以撤换。各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在必要时则应不止一次。

6. 各中央委员会的开支由同它们联系的各个支部负担。

7. 同总委员会联系各中央委员会,也像总委员会一样,有责任为协会支部给予协会会员的贷款作担保,但申请人的会员证上必须有申请人所属支部书记的签名。

如果申请人向支部提出贷款申请,而该支部缺乏经费,它有权向发放贷款的管理机构或支部开出期票。

8. 各中央委员会和支部在每个协会会员要求阅读总委员会报告时,应该无偿地向他们提供这些报告。

9. 每个支部,不论大小,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如果某一支部没有经费派遣代表,它可以同其他支部合派一名代表。

10. 代表的费用由派遣该代表的支部或合派该代表的几个支部负担。

11.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2. 会员在500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 每500人可以增派一名代表。
13. 在代表大会上每个代表只有一票表决权。
14. 每个支部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宪法的特点拟定自己的条例和章程, 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15. 本章程和条例可以由每次代表大会进行修改, 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卡·马克思和保·拉法格审校
于1866年10月下半月
1866年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
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³⁵⁷

1867年2月8日于曼彻斯特

先生：

“曼彻斯特纳费图书馆”的股东们通过一项即将解散他们的公司的决定，已刊登广告出售库存的书籍。与此同时，大部分股东似乎有这样一种愿望，那就是阻止撤销他们的建立已久的、很有价值的图书馆。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的理事们表示了想获得这批图书的愿望，以便补充他们自己的拥有精心挑选的、包括各种(主要是外文)文献的大约6 000册最新图书的图书馆。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那么，它不仅会阻止曼彻斯特纳费图书馆的撤销，而且，通过二者的合并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甚至更有价值的图书馆，这既有利于席勒协会，也有利于一般公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曼彻斯特纳费图书馆委员会应席勒协会理事们的请求，以1 250英镑的价格把他们的藏书转让给后者，此报价至本月18日有效。席勒协会理事们的小委员会正在努力筹集他们所需要的这笔钱，同时向曼彻斯特纳费图书馆的股东们发出呼吁，旨在得到他们的合作。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的章程(你们会发现内附一个翻译的副本)会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加入这个协会并因此而利用它的藏书，您只需

支付每年 30 先令的订阅费。考虑到还会提供其他优惠,在每年的订阅费中再增加 5 先令并不会妨碍纳费图书馆的股东们成为席勒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建立于 1859 年)目前设在库柏街卡尔顿大厦里(以前的机械学会会址),但是,它很有希望不久就迁移到比较大的和更为方便的会址。大约已集资 3 000 英镑用于修建一所合适的会址,自然,对于扩大的图书馆的需求会给予认真的考虑。

图书馆的许多股东所表达的感情证明前景是令人鼓舞的,他们认为他们拥有的股份的惟一价值就是使他们有权利用他们的图书馆,因此,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料,由于保证给他们的这种优惠,他们将同意献出他们的股份的那部分货币价值,以便使他们的图书馆能得到充分利用,使之成为他们自己和别人都能进入的公共图书馆。

在下面签名的先生们中,有曼彻斯特纳费图书馆的委员会的委员和股东,有曼彻斯特席勒协会的理事和会员,他们都希望早日实现所提出的这个计划。他们相信,您会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来,而且,从已获得的捐款来看,从曼彻斯特纳费图书馆业主有望入股的情况来看,他们感到很有信心,他们的努力必将取得成功。

如果,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您同意这个建议,就请在随函附上的表格上签名,表示您将把您的股份赠送给曼彻斯特席勒协会。

由于事情需要及时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们恳请您尽早答复(如有可能,在本月 12 日之前),以便使我们能够估算一下我们可以从纳费图书馆的股东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

S.H. 布雷布鲁克。 普林瑟斯街 29 号

赛米尔·科塔姆。 埃塞克斯街 2 号

J. 克朗普顿医生。

弗·恩格斯。

奥利弗·海伍德。银行

B.St.J.B.焦耳。

H.J.莱波克。彼得斯广场

爱德华·内森。牛津路

保罗·内森。劳埃德街 47 号

R.尼科尔森。方廷街 62 号

S.诺德林格。

G.普吕斯曼

埃米尔·雷斯。 } 十字街 104 号
J.E.雷斯。 }

扎梅耳松医生。圣约翰街

亨利·萨姆森。

约瑟夫·肖洛克。方廷街 79 号

查理·苏歇。

托马斯·索莱尔。

S.J.施泰恩。萨克维尔街 12 号—乌普 1

G.韦纳。奥兰治街/波特兰街

写于 1867 年 2 月 8 日

以传单形式印发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 卡·马克思在伦敦

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
成立 27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³⁶⁵

卡尔·马克思谈到雇佣劳动和资本,并且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怎样创造资本,怎样由于自己的劳动的产品而沦为奴隶,以及资本怎样不断地被利用来给工人更紧地钉上镣铐。的确,所谓的自由工人有一种自己是自由工人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他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势力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为了可怜的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以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在多数情况下,自由工人的物质状况比奴隶和农奴还差。工人阶级无须消灭个人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应该消灭的却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全是靠欺骗得来的。

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根治措施的。第一,德国人在最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那样经历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第三,他们的地理位置迫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在那里即从亚洲来的。工

人政党将因此被推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在这条道路上有所作为。

弗·列斯纳写于 1867 年 3 月初

载于 1867 年 3 月《先驱》杂志第 3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0 卷翻译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³⁵⁷

致认捐席勒协会兴建新会址基金的先生们

理事会去年为前述目的发起的认捐工作,已认捐 2 875 英镑以后,由于战争^①和商业危机而停顿下来。从那时候起,协会的存在条件有了显著变化,这反映在兴建新会址的规划上。因此,理事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就此事向认捐的先生们作必要的解释。

由于所认捐的款项不足以支付 1866 年 3 月 19 日通告中谈到的建筑计划(总共需要 5 000—5 500 英镑),以及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按时募集到欠缺的款项,所以理事会只好物色临时的会址。

根据协会的基本原则,会址应设在市中心,——但是结果表明,在市中心不可能找到这样一块地方。因此理事会不得不把现在的会址保留到 1868 年 6 月,而这是在把租金增加了一倍(从 225 英镑增加到 450 英镑)以后才办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对以下的问题置之不理了:协会设在市中心,即商业区,是否真有必要;在地价和房租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是否不必为了这样的优势而花太大的代价;非常便宜的地段,严格地说不在市中心,例如在诸圣教堂附近,对于绝大多数来协会参加活动的

① 指 1866 年普奥战争。——编者注

会员来说实际上是更不适中、更不方便。

根据去年拟定的计划,即使通过募捐募集到 5 000 英镑,协会还得要负担 5 000—6 000 英镑的抵押债务,也就是说每年要负担 250—300 英镑的利息。可是由于市中心的地皮从去年 3 月起价格就上涨了很多,当时所预计的买价和为此而需要的抵押贷款,以及随之而来的协会年度开支现在也都要增加。最近这两年协会的结算只给房租留出 200 英镑。虽然较好的会址可望有更多的会员和一些额外的收入,但是实际上刚刚能够负担上述利息。而为房租支出的每一英镑,都会减少协会的思想教育经费。去年虽然协会的总收入有 500 英镑,但是我们能够用来订阅杂志的钱只有 80 英镑,用于图书馆的只有 20 英镑。

如果把会址迁移到诸圣教堂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除其他优点外,有一块完全符合我们目的、位置很好的地皮,用 1 700 英镑就可以买下,另外再缴纳 26 英镑的永佃租金。我们只是以这地皮为例来计算一下:

地皮买价	1 700 英镑
建筑造价	3 500 英镑
添置家具	500 英镑

总计:5 700 英镑

根据这个数字,完全可能借到 2 000 英镑的抵押贷款。这样一来,用认捐建筑基金的办法募集 3 500—4 000 英镑左右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比在市中心建会址少 1 000—1 500 英镑。在去年的认捐工作取得成功之后,在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肯定可以指望在短

期内筹措到欠缺的款项。

虽然所需捐款的数额减少了,但是协会的财政状况却会有很大的改善。除了 26 英镑的永佃租金以外,只需支付贷款的利息 100 英镑,因此我们只要支付 126 英镑,不像去年要支付房租 225 英镑,今年要支付房租 450 英镑,也不像去年的建筑计划所预计的那样要支付 250—300 英镑。所以,即使在上一会计年度的收入情况下,每年能够用于协会图书馆和阅览室的钱就不会是 100 英镑,而是 174 英镑,也就是说用在这方面的经费几乎多了一倍。其次,由于有了这个新会址,在多出租一些房屋和会员增加的情况下,协会肯定会获得新的财源,由此而得的收入也几乎可以全部用来充实协会用于思想文化发展方面的基金。

如果协会仍像以往这样位于市中心,那么即使募集到 5 000—5 500 英镑,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一出现不利情况,就不得不再向曼彻斯特的德国侨胞求援。

如果协会迁移到地皮比较便宜的地区,那么募集 3 500—4 000 英镑就不仅能一劳永逸地为协会创造稳固的存在条件,而且还能保障它每年的收入多于支出,多出的钱归根到底能使它全面地满足自己最重要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理事会对于应该做什么不可能再有怀疑了。它决定把协会会址迁到“诸圣教堂区”,并且对基本原则作相应的修改。6月6日,它召开了会员大会,出席的人很多,会上除一票反对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会员大会认为最好今后用以下形式来表述基本原则第一条:

‘我们认为在本市创办文学艺术俱乐部是适宜的,地址尽可能设在比较适中的地区,定名为“席勒协会”’。

并且,会员大会委托理事会根据基本原则第七条和章程第二十条进行表决。”

据此,理事会为进行最后的表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最后表决将在8月底举行。

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已经决定迁移协会会址之后,为什么不找一幢能够保证多年出租而租金又较便宜的房子。理事会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曾经找过这样的房子,但没有找到;这样的房子也只有比“诸圣教堂区”离市中心远得多的地区才能找到;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这样的房子,而且即使这样做了,至少也需要募集1500—2000英镑,以便进行总是有必要的改建和添置新设施,而这个会址到头来还是临时性的。由于这些原因,理事会放弃了这样的会址。

如果有必要的多数赞成修改基本原则——这一点没有理由怀疑——理事会打算:

如果募集到足够的款项,就在诸圣教堂附近购置一块合适的地皮,然后按去年计划的规模动工兴建,也就是:为体操团体修一个地下室,在三楼修一个能容纳合唱团体的大厅,以实现最初的愿望,即容纳曼彻斯特的所有德国人团体。

如果与此相反,募集不到必要的款项,那么就相应地削减修建新楼的费用,但是无论如何要兴建一幢比现在的会址更能满足协会要求的楼房。

理事会要求你们了解建筑计划的上述变动情况,同时通知你们:从理事会成员中选出的一个代表团将有幸拜访你们,恳求你们同意。

受理事会委托:

主 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J.G.韦纳

秘 书 A.戴维森

1867年6月28日于曼彻斯特

写于1867年6月28日

以传单形式印发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卡·马克思关于新蓝皮书的 统计数字的发言记录³⁶⁶

摘自 1867 年 7 月 23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提醒总委员会注意议会的蓝皮书——《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7 年》，并从蓝皮书中摘出如下几段：

“1864 年头 11 个月，比利时进口 7 200 吨未加工的生铁，其中 5 300 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1865 年同一时期，生铁进口增加到 18 800 吨，其中 17 000 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1866 年，生铁进口增加到 29 590 吨，其中 26 200 吨是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另一方面，1864 年头 11 个月，比利时出口的生铁达 24 400 吨，其中 17 200 吨输入法国，5 900 吨输入英国，而在 1866 年同一时期，生铁出口没有超过 14 000 吨，其中 9 600 吨输入法国，输入大不列颠的只有 241 吨。比利时出口的钢轨也从 1864 年头 11 个月的 75 353 吨减少到 1866 年的 62 734 吨。

现在以表格的形式列出 1866 年头 11 个月同 1864 年同一时期相比较的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的各个品种的铁和钢和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的铁和钢的材料。

	比利时从大不列颠进口	
	头 11 个月	
	1866 年	1864 年
	(单位:吨) (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	0	1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	26 211	5 296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	1 031	1 777
金属铸件	41	24
锻铁	255	203
扁钢、钢板和钢丝.....	3 219	1 227
锻钢	522	0
共计	31 289	8 528

	大不列颠从比利时进口	
	头 11 个月	
	1866 年	1864 年
	(单位:吨) (单位:吨)	
矿石和金属屑	1 768	5 555
未加工的铁、锭铁和废铁.....	241	5 920
加过工的铁(钉子、铁丝等).....	6 727	9 436
金属铸件	3	7
锻铁	12	0
扁钢、钢板和钢丝.....	50	56
锻钢	16	5
共计	8 817	20 979

简单总结是:1864年(头11个月)比利时向英国提供20979吨铁和钢,而1866年却只有8817吨,可是英国向比利时输出的铁和钢却从1864年的8528吨增加到1866年的31289吨。”

不妨回忆一下,某些中间阶级报纸去年大肆叫嚣说:工联起了极

有害的作用；它们断言什么由于工联的活动而使受到比利时制铁业排挤的英国的制铁业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所有这些大肆叫嚣的报纸，连提都不提上述蓝皮书的出版，更不用说报道其内容了。

载于 1867 年 7 月 27 日《工人
报》第 18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 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记录³⁶⁷

摘自 1867 年 8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提醒注意预定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他认为最好是让尽量多的代表以个人的身份出席这次大会；但作为国际协会的代表正式参加大会却不恰当。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本身就是和平代表大会，因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最终应该使各国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如果和平同盟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发起人真正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他们就应当加入国际协会。目前欧洲大国军队的扩充是由 1848 年革命所引起的。庞大的常备军是社会现状的必然结果。现在保持常备军不是用来进行国际战争，而是用来镇压工人阶级。³⁶⁸然而并不是随时都有供他们轰击的街垒和供他们枪杀的工人，这样，就可能挑起国际纠纷，以保持士兵的军事素养。在这次大会上，不惜以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人无疑将占多数。他们会乐于让俄国独掌对欧洲其余国家进行战争的手段。可是，有俄国这样的强国存在，就足以使其他一切国家有理由保持自己的军队。某些法国激进派完全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一些反对本国政府的过火

言论,不过,如果这样的言论是在巴黎发表,那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谁拒绝支持改变劳资关系,谁就是忽视了普遍和平的实际条件。

载于 1867 年 8 月 17 日《蜂房报》
第 30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向 1867 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³⁶⁹

一、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 9 月) 规定的任务

日内瓦代表大会责成总委员会完成以下任务^①：

(1)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委托英国代表对瑞士、法国和英国的邮政部门主管人采取必要步骤,争取降低信件和印刷品的邮费。

瑞士的部长同意代表团向他提出的各点,但他指出,法国政府反对在这方面进行任何改革。

在法国,代表们没有得到邮政部门主管人的接见。

在英国,政府只同意接受一份叙述事实的备忘录。这份报告是总委员会写的,它至今还在等待着答复。

(2)用几种文字出版代表大会文件,并附上信件和备忘录。

(3)用几种文字出版定期的通报,内容为所有能使国际协会感兴趣的问题;提供有关各国劳动问题的各种情报以及关于合作社和工人的社会状况的报告。

^①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刊登在 1867 年 3 月 27 日、4 月 17 日和 5 月 1 日《国际信使》第 12、15 和 17 期上。——编者注

(4)总委员会还受托对劳动进行统计调查,其中包括对每个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所作的详细的和专门的报告,并包括一切文明国家。

为了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完成这些任务,代表大会通过表决规定每个会员每年交纳会费30生丁,并规定每周付给总书记2英镑的报酬;总书记由总委员会任命。

代表们回国后,总委员会开始工作,它获悉,在法国边境警察从**茹尔·哥特罗**那里没收了一些重要文件。

总书记曾受托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这些文件。由于这封信没有得到答复,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请求。**斯坦利勋爵**向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发出有关此事的指示,要他尽力使这些文件归还原主。

几天以后,文件连同一捆《**人民论坛报**》归还了我们,显然这捆报纸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没收的。

这一事件使总委员会出版代表大会资料的事推迟了几个月。

这些文件已经转交给小委员会,由它准备正式报告。

但是,由于总委员会无钱支付总书记的报酬,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总委员会委员的肩上,虽然他们对事业忠心耿耿,可以在自己日常工作以外完成这项工作,可是为此需要更长时间。

在工作结束后发现,这个报告仅用一种文字印1000份至少也需要1000法郎。

为了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总委员会必须立刻付出3000法郎;而当时只有22法郎90生丁的存款。

总委员会向加入协会的英国团体发出了捐款的号召。

响应这一号召的只有**伦敦的雪茄烟工人**以及**考文垂和沃里克郡的织带工人**。

我们认为有义务指出织带工人执行委员会在完成自己的义务时所表现的巨大热忱,尽管它没有存款,尽管它的大多数会员失业,它仍然向有工作的人进行了专门的募捐。

鉴于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出版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接受了《国际信使》和《工人报》的编辑、公民科勒的建议,把报告用法文和英文刊登在这两份周报上;此外,科勒还答应制作铅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并且同总委员会分享全部盈利,虽然他已经预先承担了一切亏损。

当这些报纸刊出了关于出版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广告时,几年以来从未对这类小册子加以任何阻挠的英国政府,却要求公民科勒交两笔共计数千法郎的押金,来阻止这个报告的出版。这项手续使报告的出版拖延到 3 月 9 日。后来公民科勒从可靠消息来源得知,这一事件是由法国政府指使造成的。

把这一事件同没收巴黎代表的报告³¹¹联系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对国际协会抱什么样的态度。

刊登报告的那几期《国际信使》免费分送给协会的全体通讯员。总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把报告译成德文的工作,因为它没有任何可能去从事这一工作。

整篇报告的铅版虽然已经制好,但是由于资金不足,直到现在还未能把它印成小册子,而我们的全体通讯员都坚持要求把它印成小册子。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垫付 100 法郎印制了 1 000 份印有基本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寄出去的 800 份会员证被法国警察当局没收。这项损失使总委员会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各方面已经在要求它偿还 1865—1866 年欠下的 1 000 多法郎的债

务；尽管日内瓦代表大会承担了对这项债务的集体责任，但它并没有指出偿还债务的任何实际办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委员会就没有任何可能按照代表大会通过的决定出版什么报告或定期通报。因此不得不放弃 1867 年的统计调查工作，因为要使这项调查取得实际成果，就不能把调查局限于加入协会的团体，而应当包括各地的一切生产部门。总委员会在目前所处的财政状况下，不可能完成这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大量资金的工作。

二、国际工人协会在资本和劳动斗争中的作用

协会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各种斗争中所提供的多次帮助，完全可以证明这样一个组织是必要的。每当工人拒绝接受英国资本家恣意加给他们的条件时，资本家就威胁他们，要从大陆招募人手代替他们。输入人手的可能性曾不止一次地迫使工人让步。由于总委员会的活动，这样的威胁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公开地进行了。现在，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就足以使资本家的计谋落空。在加入协会的团体中不论发生罢工或是遇到同盟歇业^①，各国的工人能够立刻得到关于所发生的情况的通知，这样他们就能够预先提防资本家代理人的招募。这一活动并不限于在加入协会的团体内进行，因为协会对于一切请求帮助的团体都给予帮助。

^① 英国人这样称呼业主们关闭工厂的行动。

有时资本家也能诱骗某些不了解情况的工人；但是一旦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就立刻离资本家而去。

在资本看来，工人不过是能生产的机器，仅此而已；最近对伦敦编筐工人采取的同盟歇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情是这样的：伦敦的编筐业主向自己的工人宣布，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解散自己的团体，并且同意降低工资，否则，三天之后工厂的大门就要关闭。被这种蛮横行为激怒了的工人宣布他们拒绝这些条件。这一点业主们已经预料到了，因为他们的代理人已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并且从那里带来了工人……他们把这些工人圈禁在伦敦一个区（百蒙德西区）的铁道大桥的桥拱下面；这些工人必须在这里做工、吃饭和睡觉，为了避免同其他工人有任何接触，不许他们走开一步。但是总委员会终于冲破了业主们建立的警戒线，并且用谋略潜入比利时工人中。第二天，这些工人一认清自己的义务，他们从伦敦编筐工人协会那里领到对时间消耗的补偿之后，就返回比利时去了。正当他们动身走的时候，又来了一艘载满工人的轮船，但是这一次我们接待了他们，于是他们就乘下一班轮船回去了。在这以后业主们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其他工人，结果不得不一切照旧³⁷⁰。

由于总委员会向英国的团体发出呼吁，巴黎的铜匠在罢工的时候得到了这些团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另一方面，伦敦的裁缝也得到了大陆工人同样的支援。

总委员会也同样成功地参与了挖土工人、制筛工人、理发师、镀锌工人和木刻工人的罢工。

三、英国支部

(一)宣传

如果说在英国没有像去年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工作,这很容易用下面的情况来说明:政府从来没有主动采取某种开明的步骤;只有在长期的鼓动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它才会在他们的压力下让步。这一点可以从选举改革问题和在公园集会的权利问题³⁷¹得到证明。

英国工人有理由认为选举权问题有巨大的意义;他们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的道义力量对政府产生压力,迫使它满足人民的要求。

在工人全力要求获得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总委员会不可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只是模糊地看到在遥远的将来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上去。

在宣传工作方面本来应该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们,对于我们发起的而应当由他们来领导的这个运动不能袖手旁观。他们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结局,1867年将永远载入英国工人阶级的史册。

尽管由于上述原因而没有像预期那样积极地进行宣传,但是宣传工作一刻也没有中断。工人团体加入协会所必需的手续耗费很多时间。工联组织所固有的民主不允许执行委员会不经过所有支部的预先讨论就对任何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要使某一团体加入协会,必须遵循下面的手续。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委员会确定接见代表团的日期。如果问题需要考虑,委员会就把它转交给各个支部去研究,这样就不得不等待一个月、两个月,有时甚至三个月才有结果。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这个团体的委员会才能接受或者拒绝申请;支部往往是在没有委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加入国际协会的。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有 20 多个大的工人团体很好地接待了总委员会的代表团;总委员会天天期待着结果。其他一些团体把加入协会的事情推迟到更适当的时机,只有一个团体拒绝加入,其理由是国际工人协会致力于政治问题。

(二)会 费

这个问题总委员会研究了很久。当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协会,并决定每年交纳 1 英镑。

1865 年 3 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英国鞋匠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伯明翰和赫尔的代表提出的下述决议案:

“代表会议赞同国际协会的原则,宣布加入协会,并责成全体出席的会员用最大的努力宣传协会的原则。”

会费问题曾经提出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不久总委员会决定,每个加入协会的团体将发给一份入会证明书;入会的团体应交纳 5

先令^①的入会费；至于各个团体能给总委员会多少金钱上的帮助，则由这些团体自己酌情决定。

各个团体交纳的钱，则用于抵偿总委员会在派送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方面的开支。

鞋匠委员会为此交纳了5英镑。

为了把这个问题规范化，总委员会建议对每个会员交纳会费的数额作出统一的规定。

日内瓦代表大会规定每年会费的数额为30生丁。

这项高额的会费对于总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后派往英国工人团体去的那些代表团来说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

因此，总委员会在10月9日的会议上决定把每年的会费减少到5生丁。鞋匠协会(Amalgamated Cordwainers Association)通知我们，1867年的代表会议废除了1865年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每年交纳5英镑的决议。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在1867年也同在1866年一样，向我们交纳了1英镑，但是它还没有通知我们是否整个泥水匠协会都加入了。

鞋匠协会去年有5000名会员，泥水匠协会有3000—4000名会员。

总委员会曾两次向所有加入协会的团体发出关于1867年交纳会费的呼吁。有些团体交纳了，其他团体还没有交纳；但是，除了鞋匠协会以外，没有一个团体规避自己的义务。

粗细木工联合会不久前通过了每年向总委员会交纳2英镑会费的决定。目前这个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正在讨论是否整个联合会都加

^① 1先令等于1法郎25生丁；1英镑等于25法郎；1便士等于10生丁。

入国际协会的问题。这个联合会拥有 9 000 多名会员,它的分会遍布英国,在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它的分会。

现在我们把在英国加入协会的团体名单,以及它们在上次代表大会以后一年内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不列颠支部交款总额

	1866 年			1867 年		
	英镑	先令	便士	便士	英镑	先令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2	—	—	—	—	—
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	—	—	—	—	4	9
波兰流亡者的中央支部	—	—	—	—	4	10
泥水匠执行委员会	—	—	—	1	—	—
泥水匠第一分会	—	8	—	—	—	—
细木工(联合会)	10	—	—	1	13	4
细木工(伦敦西头)	5	—	—	1	7	—
装订工人	—	8	3	—	17	6
制桶工人	6	—	—	—	6	—
鞋匠执行委员会	5	—	—	—	—	—
鞋匠支部(达灵顿)	—	5	—	—	—	—
鞋匠支部(诺丁汉)	—	5	—	—	2	1
雪茄烟工人	5	—	—	1	9	—
考文垂的织带工人	—	5	—	1	9	—
制箱工人	1	5	4	—	—	—
肯德尔的鞋匠	—	5	—	—	1	8

	1866 年			1867 年		
	英镑	先令	便士	便士	英镑	先令
女鞋鞋匠(伦敦西头)	6	—	—	—	10	—
伦敦的缝纫工人	3	—	—	—	—	—
达灵顿的裁缝	—	5	—	—	1	8
代表大会后加入的团体	入 会 费					
伦敦编筐工人	—	5	—	—	—	—
兰开夏郡的印染工人	—	5	—	2	1	8
伦敦的马车制造工人	—	5	—	—	—	—
在“地球仪”饭店集会的马 车帷幔制造工人	—	5	—	—	1	10 $\frac{1}{2}$
在“王冠”饭店集会的 上述工人	—	5	—	—	5	—
织工(弹性织品)	—	5	—	—	5	—
联合起来的挖土工人	—	5	—	—	—	—
木器打磨工人	—	5	—	—	—	—
风琴工匠	—	5	—	—	2	1
画匠和木刻工人	—	5	—	—	—	—
粗木工执行委员会	—	—	—	2	—	—
联合起来的制革工人	—	—	—	—	—	—
白铁工人	—	—	—	—	—	—

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交款总额

	英 镑	先 令	便 士
女鞋鞋匠(伦敦西头)	4	10	—
伦敦雪茄烟工人	1	1	—
织工(弹性织品)	1	—	—

两年来在交款上的差别可由下面的情况来说明：1866 年交款用于代表们赴日内瓦的旅费，而今年交款只用于管理方面的开支。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去年我们欠下了债，总委员会尽其所能给予了偿还。

为什么有些加入协会的团体还没有交纳会费，而另外一些还没有决定为代表大会交款，原因是生产的停滞，频繁的罢工和同盟歇业，特别是选举运动；最后，是因为伦敦裁缝的罢工用尽了当时工联的资金。

总委员会从各团体那里收到的许多信件都证明了这种情况，它们由于没有能给予我们经济援助而表示歉意。

四、大陆上的和美国的支部

法 国

总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同例如像法国那样一些国家的独立支部通信，因为在那里限制性的法律不许可有保障地建立活动中心。

前面已经说过，总委员会想把印有国际协会章程和条例的会员证运进法国的一切尝试，都由于法国当局的行为而遭到失败；他们没

收了我们的东西,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犯法行为。但是,法国当局所制造的障碍决不止于此。我们的通讯员请求允许印发我们的章程和条例也毫无结果:他们惟一的答复总是最顽固地加以拒绝。

里昂委员会在1866年召开了数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00多名会员,而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它没有得到召开全体会议的许可。

结果是,里昂的会员在当权人物面前表现的英勇不屈精神,甚至使瞎子也能清楚地看出法国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工人得到解放。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这些障碍,这些无理取闹,一刻也没有阻挡住我们的协会的发展。

在维埃纳(伊泽尔省)本来只有80名会员,现在有500多名了。

在索恩河畔讷维尔,我们的一个支部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样便吸引了农业工人实际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而从前人们硬说农业工人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驻卡昂的通讯员报道说,这个城市里的工人联合会日益巩固。由于这种团结一致,马具匠、机械工人、制革工人、鞍匠、铁匠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人争取到了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

在菲沃(罗讷河口省),国际协会拥有大量的矿工会员,他们不久前的罢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今年8月5日总委员会获悉在菲沃也组织了委员会。我们把这一胜利归功于马赛委员会委员公民瓦瑟的勇敢的宣传,他在今年7月21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资本和劳动之间正在进行斗争,这是一场可悲而又可笑的斗争:一边是一帮官吏和职员到处进行宣传,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国际协会,另一边是几个精力

充沛和忠心耿耿的人坚持不懈地反击我们的敌人的逼攻,并在工人队伍中传播独立和正义的思想。”

他在结尾时补充道:

“任何人力都不能铲除我们在国内培植起来的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同两种难以克服的力量作斗争:同权利和意志作斗争。”

最后,工人懂得:有志者,事竟成,只有依靠自己本身,才能取得自己彻底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现在我们把在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有的支部,以及它们在 1866 年和 1867 年交款的总额列表如下。

	交款总额				交款总额		
	英镑	先令	便士		英镑	先令	便士
巴黎	4	—	—	格朗维尔	—	—	—
卡昂	1	—	—	阿让唐	—	—	—
里昂	11	12	—	代表大会后新 成立的支部			
波尔多	3	9	—				
鲁昂	—	4	5				
瓜德罗普岛	—	—	—	巴黎的装订工人	—	14	4
维埃纳	5	7	6	卡斯泰尔诺达里	—	—	—
索恩河畔讷维尔	1	5	3	欧什	—	—	—
庞坦	—	—	—	奥尔良	—	—	—
圣但尼	—	—	—	南特	—	—	—
皮托	—	—	—	维勒弗朗什	—	—	—
讷沙托	—	—	—	马赛	—	—	—

	交款总额				交款总额		
	英镑	先令	便士		英镑	先令	便士
利雪	—	—	—	菲沃	—	—	—
孔代叙努瓦罗	—	—	—	勒阿弗尔	—	—	—
蒂里阿库尔	—	—	—	阿尔及尔	—	—	—

瑞 士

我们从瑞士只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通讯。在那里也像在英国一样,国际协会的工作是吸收工人团体,也尽可能多吸收单个的人。不过应当看到,在瑞士每个工人团体的人数比英国的少。

成立支部的城市有:

日内瓦、卡鲁日、洛桑、沃韦、蒙特勒,纳沙泰尔、拉绍德封、勒洛克勒、圣克鲁瓦、圣伊米耶、松维利耶、比安、穆捷、博库尔、苏黎世、韦齐孔、巴塞尔、伯尔尼、特拉姆朗、莱布勒勒和勒布瓦。

1866年和1867年从这些支部收到的钱

	交 款 总 额		
	英 镑	先 令	便 士
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	4	—	—
日内瓦(德语区支部)	1	7	9
拉绍德封	2	4	—
洛克勒	—	17	10

比 利 时

比利时通讯书记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

公民们：

我和比利时的通信是从编筐工人罢工的时候开始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曾写给公民万丹胡亭一封信，一星期后这封信在《人民论坛报》上刊登出来^①。我以总委员会的名义通知他关于编筐业主的代理人从伦敦出发去招募比利时编筐工人的事；我在信中告诉他，必须用我们组织的力量去粉碎这个代理人的计划，而且为了表示团结一致，比利时工人必须拒绝任何招募，以便保证自己的英国弟兄获得胜利。

接着我又告诉公民万丹胡亭，有几个比利时编筐工人返回祖国了，他们是由于相信了业主们后来并未兑现的诺言而到伦敦来的；我还向他述说了英国编筐工人的兄弟情谊。在信中我着重指出，总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工人战胜业主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报告的出版问题我曾和公民布里斯梅通过信。这次通信没有任何结果，因为我按总委员会的指示向他请求贷款，而这是他所不可能提供的。我最近写的一封有关此事的信没有得到答复；显然，对公民布里斯梅（他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来说，正式拒绝我们是非常难堪的；我认为这就是他沉默的原因。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比利时雪茄烟工人的信寄给了公民万丹胡

^① 1866 年 11 月 4 日《人民论坛报》第 44 号。——编者注

亭,请他尽力加以宣传;对总委员会关于沙皇到巴黎访问的决议³⁷²我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把总委员会关于伦敦裁缝罢工的决议通知了布鲁塞尔局,决议中建议比利时的裁缝无论如何都不要到伦敦那些发生罢工的工厂中去工作,并希望全体比利时工人发挥团结精神,给予伦敦裁缝以物质支援。

我把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通告^①按照郊区圣吉耳6号这个地址寄给列日的公民德韦特,并寄给布鲁塞尔的公民万丹胡亭,请求他们对这个通告给予最大的关注并且尽量广泛地宣传它。

总而言之,我完成了总委员会指定我做的一切,而且敢于说我一次也没有收到来自比利时的任何责难。我把收到的几封信附在这个简短的报告后面。至于通信的费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我对协会的一点捐助。

敬礼和兄弟情谊

贝 松

德国和意大利

在德国,情况还不正常,而且不甚有利于我们协会的发展。但是,日内瓦的德国人支部的主席公民约·菲·贝克尔却在那里建立了几个支部,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这些支部的详细报道。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米兰和热那亚的工人团体已经办理过正常的成立手续;我们同这些团体有通信联系,但是还没有收到它们的任何捐款。

^① 参看本卷第298—301页。——编者注

美 国

在美国有两个新的支部加入了国际协会；我们同 *Labour National Union's Committee* (全国劳工同盟³²²的委员会) 通信，也同 *International Ironmoulder's Union* (国际铸工联合会³⁷³) 的主席通信。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美国通讯书记的年度报告 (1866 年 9 月—1867 年 8 月 27 日)

我担任美国通讯书记这个职务以来，我工作范围内的第一个事件是在英国收到了 1866 年 9 月份的一期《铸工国际报》，该报在费城出版，出版者 W. H. 西尔维斯同时也是国际铸工联合会的主席。

这一期刊载了上个月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摘要和决议刊登在 1866 年 10 月份的伦敦《共和国》周报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巴尔的摩代表大会在得知旧大陆的工人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类似的代表大会之后，便一致决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有全权派代表参加 1867 年的欧洲工人代表大会，即洛桑代表大会。

我从这份报上知道，担任全国劳工同盟的国际联系书记的是公民威廉·吉布森，据说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直到今年 8 月初我才知道，公民吉布森的住址被弄错了，他不是住在纽黑文，而是住在诺威奇(康涅狄格州)。代表大会报告编写者的这个错误在我的活动中几乎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此外,我没有想立刻同书记吉布森通信,因为我认为在开始同他通信时最好把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寄去。关于这个报告迟迟不能发表的原因,在总委员会的总的报告中已经说过了。

1866年12月初,公民奥尔西尼与总委员会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他把住在纽约的五个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姓名通知我们,并请求我们同他们通信。他还请求发给他们委托书,委托他们在美国进行有利于协会的活动。

已经把信连同相应的委托书寄给了奥尔西尼所说的那五个公民;但是不论我还是总委员会都没有收到对这些信的任何复信。

这样,我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可是奥尔西尼通知总委员会说:在纽约人们开始很关心我们的协会;有名的演说家,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浦斯曾建议举办一些收费的公开讲演来资助我们的协会,因为他深信,协会的宗旨及其领袖应当得到这样的援助。

奥尔西尼还说,爱尔兰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詹姆斯·斯蒂芬斯在纽约加入了我们的协会。

1867年3月,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开始用英文连载在伦敦的《国际信使》上。刊登这份报告的四期《国际信使》一出来,也就是在4月,我就把这四期寄给了下面四个人:一份按照推测的住址寄给了书记吉布森,另一份寄给W.H.西尔维斯,第三份寄给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出版的忠于工人利益的日报《呼声报》的编辑,第四份寄给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工人辩护士报》的编辑,该报是美利坚联邦西部各州工人的主要机关报。我在寄给书记吉布森的那几份报中附上一封信,信中指出总委员会非常重视同**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的密切接触和经常联系。

这封信没有回音,我也无法证实报纸是否收到了。这次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信和报纸没有寄到诺威奇,而是寄到了纽黑文。

寄出这些文件只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从 5 月起开始收到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这两家报纸之间建立起了互换报纸的关系。从此《国际信使》的编辑约瑟夫·科勒每周都从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摘录一些东西报道给自己的读者。

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已于 5 月 1 日全文刊登完毕;报告的后一部分我也按照上面所说的四个住址分发出去。

这个报告的摘要转载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我无法知道其他两家报纸中是否有一家刊登了报告的摘要以及它们是否对此表示过意见。

在春天这段时期内,总委员会根据里昂通讯局的请求研究了关于大批丝织工人可能从里昂迁到美国去的问题。里昂局告诉我们,许多纺织工人不满意自己在祖国的命运,他们希望迁到美国去,并且把自己的产业也搬到那里去。但是他们想知道,美国的资本家中有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垫付旅费和安置费。总委员会立刻委托我向几家美国报纸和几位政界人士写信谈谈这个问题。我执行了这一指示。信件是由一个去纽约的姓科谢克的波兰人捎到美国去的。这一次又没有任何回音!科谢克走后我从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6 月间总委员会托我写信给 W. H. 西尔维斯,请求他帮助正在罢工的伦敦裁缝。6 月 11 日我写了信。借此机会我向西尔维斯表示,我由于没有收到书记吉布森的任何复信而感到烦恼。我请他告诉我**全国劳工同盟**委员会的任何其他委员的姓名和住址。

6 月 25 日西尔维斯在复信中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五金工人不可

能帮助罢工的伦敦裁缝。他还把住在纽约的全国劳工同盟的积极活动家威廉·约·杰瑟普的姓名和住址告诉了我。

我一把这封信报告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就委托我赶紧把洛桑代表大会的开会日期通知威廉·杰瑟普，并且告诉他总委员会对将在洛桑见到美国代表而感到荣幸。我根据委托于7月19日写了信。信中讲述了我想和书记吉布森建立联系而毫无效果的情况，同时寄给杰瑟普一份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

我收到了这封信的复信，复信的日期是8月9日。从这封复信中可以看出，杰瑟普对于同大陆的和大大不列颠的工人建立联系的计划表示满意。他对于因弄错书记吉布森的住址而造成的耽搁感到遗憾。他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8月19日）同预定的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日期如此接近，以至于因时间不够而不可能派代表到欧洲来。然而我不久前在芝加哥报纸《工人辩护士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关于派代表到洛桑去的问题将是芝加哥代表大会关注的首要问题之一。

杰瑟普答应，“鉴于它的重要性”，他要向芝加哥代表大会宣读我7月19日的信，并且要把刊登关于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精彩报道的报纸寄给总委员会。他希望今后仍和总委员会通信，即使将来改选后他不再担任全国同盟副主席也是一样，因为除了这个职务他还担任纽约工人联合会³⁷⁴的通讯书记。他接受我关于与他互换工人阶级的机关报的建议。以上就是我对他那封有趣而又热情的信的不全面的简述。

本月初公民马克思把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交给我，信中说在新泽西州的霍博肯成立了我们协会的支部³⁷⁵。

大约与此同时，伦敦报纸《国际信使》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份以小

册子形式出版的**全国劳工同盟**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工人的号召书,号召书中邀请工人派代表参加芝加哥代表大会。在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上我发现了书记威廉·吉布森亲笔写的姓名和住址,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过去我所知道的他那个住址是错误的。我很惋惜由于这个错误而耗费的宝贵时间,只好用一句俗语来安慰自己:“晚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这就是我所作的各种尝试的经过,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成果。但是我仍然希望在将来事情会有良好的结果。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应当谈一谈。

美国工人为争取更多空闲时间所作的努力(即众所周知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吸引了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注意。因此我认为不妨非常简短地、概括地重复一下我所知道的去年一年在这方面获得的成果。鼓动工作开展得很快,而且立即在华盛顿国会上和某些州的立法会议上得到了反应。关于在联邦政府举办的工程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在联邦众议院仅仅遭到半数票的反对而被搁置了。

某些州的立法议会规定,如果没有特殊的合同,工作日不得超出八小时。在纽约州也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但是纽约的工人暂时还没有敢于要求它付诸实现。不久以前这个州的工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所应采取的行动。结果决定,各地将在今年 11 月 1 日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法律的要求,尽可能不降低工资,但是,如果有必要降低,就同意降低。若从辩论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代表同意降低工资。

在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但是在今年 7 月以前的 19 个月当中,实际上在那里占优势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根据最近来自这个州的消息,业主们宣布用同盟歇业来反对这个新

制度,这些反动企图的后果是许多企业停工。

很高兴告诉总委员会,从明年1月1日起,普通信件的邮资将降低一半,也就是从1先令降到6便士。我所说的仅仅是联合王国和合众国之间的通信。关于这一点两国政府刚刚签订了合同。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美国书记 彼得·福克斯

五、总 论

上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年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不断进行斗争的标志下度过的: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不断地发生罢工、同盟歇业和迫害工人的事情。

资本顽强而残暴地迫害工人,因为它本能地感觉到,劳动占据理当属于它的位置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美国有一个团体为了维护自己存在的权利不受资本的侵犯,曾花费了70 000美元³⁷⁶。

在英国 *Courts of Law* (法庭)曾通过一项决议:盗用 *Trade's Unions* (工联)的基金可以不受惩罚。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联调查委员会,目的是要消灭工联,或者至少是限制它们的活动。

最近伦敦裁缝业主对工人提起的诉讼案件³⁷⁷,在巴黎对缝纫工人的判决²³⁷,在马谢讷(比利时)对矿工的屠杀²³⁶——所有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只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阶级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只有全世界工人的团结才能使我们获得彻底的解放。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正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竭力追求的目的。

最后让我们高呼：“全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

代表总委员会：

主 席 奥哲尔
总 书 记 埃卡留斯
财务委员 威·德尔
财务书记 肖

通讯书记：

欧·杜邦(法国)
卡·马克思(德国)
扎比茨基(波兰)
海·荣克(瑞士)
彼·福克斯(美国)
贝松(比利时)
卡特(意大利)
保·拉法格(西班牙)
汉森(丹麦)

写于 1867 年 8 月 20 日—27 日
之间

载于 1867 年在拉绍德封出版
的小册子《向 1867 年 9 月 2—8
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
宣读的报告》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0 卷翻译

欧仁·杜邦

* 在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
(1867年)上的发言³⁷⁸

公民们：

劳动者是永久和平的最热烈的拥护者，这是无可争辩的；因为正是他们在战场上被大炮炸得粉碎，而以夜以继日的劳动维持战争预算的还是他们。因而从这一观点说，他们愿意和平，而和平不是原则，只能是结果。

公民们，你们相信能够通过有人过去曾经向你们建议的创立新的宗教这一手段达到和平的结果吗？不能，对吧？

不但远远谈不上创立一个新的宗教，而且理性应该摧毁现存的这些宗教。任何宗教都是一种专制，因为它同样拥有自己的常备军：教士。

难道这些军队给人民造成的创伤不比人民在战场上受到伤害更严重吗？是的！这些军队损害了权利，削弱了理性。

不能清除营房使之成为教堂。要把两者都彻底铲除。

现在让我们讨论另一个问题：取消常备军。公民们，你们相信，当这些军队被解散并改变成民兵以后，你们就会有永久的和平吗？

不,公民们,1848年六月革命⁷⁵已作出回答。战斗刚一结束,国民自卫军就把数以千计的工人枪杀了。

我们和你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取消常备军是向永久的和平目标迈进,但我们有义务告诉你们,这是不够的。

许多民主主义者向我们描绘的美国是劳动与自由的乐园,但是,在美国也未能建立永久的和平。最近在芝加哥发生的事件明确证明了这一点,即为了实施这个国家通过的八小时劳动法,工人们也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动起武来。

为了建立永久和平,应废除所有压迫劳动的法律和所有特权,使所有公民成为惟一的劳动者阶级。

总之,应接受社会革命及其一切后果。

欧仁·杜邦写于1867年8月
底—9月10日

载于1867年9月10日《日内瓦
和平代表大会简报》第4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0卷翻译

* 卡·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 报告的记录

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所作的报告³⁷⁹

12月16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就爱尔兰的情况作了发言,指出过去若干世纪中英国政府企图把爱尔兰居民英国化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在宗教改革³⁸⁰以前就移居爱尔兰的英国人,包括贵族在内,由于娶了爱尔兰妻子,也变成了爱尔兰人,而他们的后代则起来反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对爱尔兰人进行残酷的战争,毁坏庄稼,为了给英国殖民者腾出地方而迫使居民东移西迁,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那时,贵族和投机商在英国人开发土地的条件下,获得了大块大块的土地。在克伦威尔时代,这些殖民者的后代和爱尔兰人一起反对英国人。克伦威尔把他们许多人卖到西印度去做奴隶。在复辟王朝时期³⁸¹,爱尔兰受到许多优待。在威廉三世的时候,一个只想赚钱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压制爱尔兰的工业,以便迫使爱尔兰人无论如何都将原产品卖给英国。女王安在位时,新兴的贵族借助新教的惩治法²⁷⁷获得了行动的自由。爱尔兰议会²⁷³是一个镇压工具。凡是天主教徒,都不能担任公职,不能成为土地所

有者,不能立遗嘱,不能接受遗产;担任天主教主教就是叛国。这一切都是掠夺爱尔兰人土地的手段;尽管如此,阿尔斯特^①的英国人后裔仍然有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人民被赶入天主教教士的怀抱,天主教因此获得了力量。英国政府惟一做到的,是在爱尔兰培植了贵族。英国人建立的城市变成爱尔兰的了。因此,在芬尼社社员中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英国名字。

在美国独立战争²⁰的时候,对爱尔兰的控制略有放松。在法国革命的时候,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让步。爱尔兰很快就站立起来,以致爱尔兰居民恐怕就要超越英国人了。英国政府驱使爱尔兰人举行起义,并且通过收买达到了合并的目的。²⁵⁸合并给复苏的爱尔兰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马尔有一次曾经说:爱尔兰的所有工业部门都遭到毁灭,我们剩下的只有棺材的生产了。拥有土地成为生存的条件;大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给投机者;经过四五层租约,土地才到农民手里;由此造成土地价格大幅度上扬。农民靠马铃薯和水生活,小麦和肉类都运往英国去了;地租在伦敦、巴黎和佛罗伦萨被挥霍掉。1836年寄给居住国外的土地所有者的款项共达700万英镑。除了产品和地租,连肥料也输出国外;土地贫瘠了。局部的饥荒常常发生,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更引起了全面的饥荒。一百万人死于饥饿。马铃薯病害是地力耗竭的结果,是英国统治的产物。

由于谷物法的废除¹⁶⁴,爱尔兰丧失了在英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再也无法支付过去那样的地租了。高昂的肉价以及残存的小土

① 原为爱尔兰最北端的一个省,按照1921年英爱条约的规定,爱尔兰南部组成自由邦以后,仍归英国统治的北爱尔兰通称阿尔斯特。——编者注

地所有者的破产使小农被逐出土地,他们的土地变为放羊的牧场。1860年以来,有50多万英亩耕地停止耕种。每英亩土地的收获量减少了:燕麦减产16%;亚麻减产36%;马铃薯减产50%。目前,给英国市场种植的只有燕麦,而小麦则要输入。

随着地力的耗竭,居民的体质也恶化了。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跛子、盲人、聋哑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绝对数字却增加了。

110多万人为960万只羊所排挤。类似的情况在欧洲是闻所未闻的。俄国人是用俄国人而不是用羊来代替被迁走的波兰人。只有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曾经讨论过拆除城市以便腾出地方来放羊的问题。

因此,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土地问题和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所有爱尔兰人都深信,如果应该有所行动的话,那就得立即动手。英国人应该要求爱尔兰分离,让爱尔兰人自己去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别的一切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这不能很快实行,那么爱尔兰的移民会引起一场对美国的战争。目前对爱尔兰的统治就是替英国贵族榨取地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俄文第2版第16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 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 1868 年度 代表大会地点的发言记录³⁸²

摘自关于 1868 年 5 月 26 日和 6 月 16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1868 年 5 月 26 日]

兹通告,下星期二^①将提出建议,撤销上届代表大会关于规定布鲁塞尔为下届代表大会开会地点的决议而代之以伦敦^②。

委员会认为,在它看来会受到法国奸细包围的地方,在一个其政府能够采取对付沙勒罗瓦³¹⁴饥饿的矿工那样的专横暴行的国家里召开代表大会,是同协会的荣誉和尊严不相容的。

[1868 年 6 月 16 日]

决议的草拟者^③宣布,除了上述想法之外,还出现了迫使委员会不要撤销洛桑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³⁸³。比利时支部已经采取措施。据报道,司法大臣巴拉先生已在下院声明他不准许召开代表大

① 6 月 2 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451 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编者注

会^①；在布鲁塞尔委员会和“自由工作者”（参加协会的韦尔维耶政治团体）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的抗议书上，协会的当地成员表示，“不管司法大臣发表了什么狂言，国际的代表大会还是要在布鲁塞尔举行”^②。这样，整个问题就成为比利时工人对比利时政府的警察措施的反抗，而对此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因此它撤回自己的决议案。^③

载于 1868 年 5 月 30 日和 6 月
20 日《蜂房报》第 346 号和 34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
- ① 茹·巴拉（1868 年 5 月 16 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 1868 年 5 月 17 日《自由报》第 47 号。——编者注
- ② 见 1868 年 5 月 24 日《人民论坛报》（布鲁塞尔）第 5 号。——编者注
- ③ 该报进一步报道说：“这一建议得到一致同意，一些成员声明，只是情况已发生变化才使他们改变自己的观点”。——编者注

*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 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³⁸⁴

摘自关于 1868 年 7 月 21 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来信报告,南德意志各邦的工人团体联合会³⁸⁵决定于 9 月的第一周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赖德律-洛兰的朋友们在巴黎出版了一家新报纸《觉醒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这篇文章同意巴黎委员会委员的立场,并以欧洲工人阶级所表现的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高尚的道德同统治阶级的狡诈和愚蠢相对抗。其中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话:

“为了保持和平,我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各国工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致之上。过几天就要召开国际协会的代表大会。欧洲所有国家都将有代表出席,也许法国例外,说这次所有欧洲劳动代表的大会由于它的英明的决议而可能成为欧洲真正的主人的会议,这未必是夸张。是的;如果明天,这次代表大会在坚持法国革命的不朽原则,倡导维护包括秩序、安全和自由在内的劳动的神圣利益的同时,坚决拥护和平,那么,它的意见将会受到全欧洲的

热烈欢迎。”^①

载于 1868 年 7 月 25 日《蜂房
报》第 35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① 沙·德勒克吕兹《结社权。在正义面前》，载于 1868 年 7 月 9 日《觉醒报》第 2 号。——编者注

* 卡·马克思关于在 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 后果的发言记录³⁸⁶

摘自 1868 年 7 月 28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揭开了关于“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后果”问题的辩论。他说,使我们最为惊奇的是,使用机器的后果同人们原来认为必然会产生的一切结果截然相反。劳动时间没有缩短,工作日反而延长到 16—18 小时。从前,一个工作日通常是 10 小时;而近百年来,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大陆,劳动时间都通过立法手段而延长了。近百年来工厂立法的全部实质,就在于依靠法律强迫工人多工作几小时。

只是到 1833 年,儿童的工作日才被限制为 12 小时^①;由于过度的劳动,根本没有发展智力的时间。他们的身体也发育不良;流行病在他们中间逞凶肆虐,这迫使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也不得不来研究这个问题。老罗伯特·皮尔爵士就是最先呼吁重视这种严重的祸害的人中的一个,罗伯特·欧文则是第一个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限制

① 见《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 年 8 月 29 日)》。——编者注

劳动时间的厂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⁸是第一个把妇女和儿童一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 $10\frac{1}{2}$ 小时的法律,但是这一法案仅仅在某一类工厂里得到推行。

这算是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工人有了较多的空闲时间。至于说到产品的缩减,则这很快就得到了弥补:由于机器的改进和工人劳动强度的提高,现在在缩短了的一个工作日里干的活比以前很长的工作日里干的活还要多。人们重新担负着过度的劳动,于是,很快就产生了把工作日限制为 8 小时的必要性。

使用机器的另一后果,是把妇女和儿童骗入工厂。这样妇女就成了我们的社会生产的积极参加者。从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是在家庭范围内使用的。我不认为,妇女和儿童参加我们的社会生产是一种坏事。我以为,每个 9 岁以上的儿童应当有一部分时间来从事生产劳动;但是,走迫使儿童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这条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使用机器的又一后果,是完全改变了国内的资本的关系。从前,存在着富裕的雇主和使用自己的劳动工具的贫穷的工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他们还有可能对自己的雇主实行反抗。对于现代的工厂工人来说,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这种自由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成了资本的奴隶。

从资本家那里曾经不断发出呼声,号召发明一种东西,使他们能够不依赖工人而独立。纺纱机和动力织机给了资本家这种独立,因为生产的驱动力握在他们手中了。因此,资本家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厂主成了在自己企业范围内拥有惩罚权的立法者,他往往为了自己发财而任意罚款。封建贵族在对待农奴方面还要受到传统的约束并服从于一定的法规,厂主却不受任何监督。

有组织的劳动是使用机器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而这迟早又会产生自己的各种后果。对那些用自己的劳动同机器竞争的工人,机器的影响简直是毁灭性的。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印度,都有许多使用手织机的纺织工人由于动力织机的采用而真正是没有了活路。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机器所造成的灾难是暂时性的。但是机器生产在不断发展,如果说这种发展在同一时间内把大批人吸收到生产中来,使他们获得工作,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断地使许多工人失去工作。被排挤出来的人口经常过剩,这种人口过剩不是像马尔萨斯主义者所断言的那种对国内的产品而言的人口过剩,而是劳动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排挤的人的过剩。

在农业中使用机器,造成了不断增长的人口过剩,这些人已经不能找到职业。这种过剩的人口涌向城市,不断给劳动市场以压力,从而使工资下降。伦敦东头的情况就是这种影响的例证之一³⁸⁷。

使用机器的实际后果,在那些未使用机器的劳动部门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最后,可以说,在目前,使用机器一方面导致联合的、有组织的劳动,另一方面则导致至今存在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破坏。

载于1868年8月1日《蜂房报》
第354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英文版第21卷翻译

* 卡·马克思关于缩短工作日的 发言记录³⁸⁸

摘自 1867 年 8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不能同意米尔纳³⁸⁹的意见,即工作日的缩短将造成生产的减少^①,因为在实行限制工作日的那些行业,生产工具较之其余的行业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工作日的限制引起了机器的更加广泛的使用,使小规模生产越来越不可能了,而这正是到达社会生产所必需的。保健问题已经谈过了³⁹⁰。但是缩短工作日之所以必要,还在于要使工人阶级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智力。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这是使工人阶级增强智力和体力并且获得最后解放的第一步。现在,谁也不会否认需要国家来维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了;而对他们的工作日的限制,在大多数场合也会导致男子劳动时间的缩短。英国已经带了头,别的国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英国的做法。在德国已经展开了认真的鼓动工作,人们期待着伦敦的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这个问题原则上在以往历次代表大会上已作出决定,现

① “生产的减少”是埃卡留斯作的订正,在《蜂房报》上这里是“对劳动需求的增加”。——编者注

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载于 1868 年 8 月 22 日《蜂房
报》第 35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英文版第 21 卷翻译

告伦敦德国工人书³⁹¹

工人们!

今年9月7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三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讨论工人国际联盟的扩大、加强和共同活动的最好方法,此外还有同工人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最后,必须就宣传措施相互取得一致意见。

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如下:

1. 缩短和调整工作日;
2. 资本家掌握的机器的影响;
3. 地产的性质;
4. 工人阶级的教育;
5. 建立信贷机构以促进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
6. 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最好方法。

为了协助实施由于时间和形势的要求而采取的步骤,我们号召你们不论是作为团体或作为个人都要竭尽所能地进行工作。必须通过自愿捐款募集足够的经费,以便使伦敦的德国工人能够派出一名或数名代表。如果在目前这种动荡的时刻,数以千计的伦敦德国工人中间对本阶级利益没有足够的共同认识来保证自己有代表出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那将是可耻的。

因此,行动起来吧!是时候了!各国工人应当联合起来并且认

识到：为了有效地进行反对资本家的统治的斗争，必须有一个由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强大同盟。

不应当忘记，在北美合众国八小时工作日已经被宣布为所有国营工场应当遵守的法律。

让我们也回想一下卡尔·马克思于1867年在他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写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内涵丰富的话！

“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²⁰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①

捐款可于每星期一、三、六晚9时起交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秘书和出纳员处。

代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

理事会

西中央区朗·爱克街温莎堡27号

大约写于1868年8月11日以前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8年8月15日《海耳曼》报第50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3年德文版第16卷翻译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9页。——编者注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主义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举行。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见注119)。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马志尼制定、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见注355)。马克思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提出批评;文件被退回小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订。小委员会于10月20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马克思在10月21—27日之间加工修改后用英文写成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并于10月27日得到了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经已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载入史册的机关,在1866年9月8日以前大都称为中央委员会。

协会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1864年11月,宣言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1864年12月10日《矿工和工人辩护报》第93号刊登了这份宣言。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上以《给欧洲工人阶级的宣言》为题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译文。1866年8月根据同年5月9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宣言和章程及其他文件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出版了英文版。1865、1866年以及后来,宣言的各种译本相继出版。在巴黎、日内瓦和布鲁塞尔有法文本;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有意大利文本;在莱比锡、日内瓦、柏林和维也纳有德文本;1868年在佩斯有匈牙利文本;1871年在日内瓦有俄文本;1873年在马德里和里斯本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过马克思校勘的。

收入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5。

- 2 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5。
- 3 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6。
- 4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这里提到的蓝皮书是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6。

- 5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造成棉花危机,使欧洲大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就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60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更加重了工人的贫困,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

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

美国内战即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堡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6、24、25、30、98、151、169、172、528。

- 6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出自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于70年代掀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因为《汉萨德》的文字是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给了布伦坦诺一个借口,他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作了回答。

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琳娜·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4版的序言中、于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这部著作中,都彻底地揭穿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胡说。——8。

-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称宪

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1、219、525。

- 8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例如,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35—336页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82—288、299—310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11、107、166、587。

- 9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14。
- 10 “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的讲话。以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作“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14。
- 11 指美国内战(见注5)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别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和逮捕坐上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

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没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14。

- 12 《协会临时章程》是马克思在1864年10月21—27日之间与《协会成立宣言》(见注1)同时用英文写成的。拟写《章程》时,马克思彻底改写了1864年10月18日临时委员会会议上提交的文件中引言部分,又把章程条款部分由40条缩减为10条。在修订组织原则时,只保留了个别有关组织形式的条款,如组织名称、确定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以及会员由一国迁居另一国时给予帮助等等。

马克思拟就的《协会临时章程》于1864年10月27日得到起草委员会的赞同,11月1日由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协会临时章程》和《协会成立宣言》一起印成了小册子,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它还发表在1864年11月12日《蜂房报》第161号以及1864年12月10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3号上。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底翻译的临时章程的法译文中有几个不准确和曲解的地方,后被利用来反对总委员会(见马克思1870年1月1日写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3月28日写的《机密通知》)。该法译文曾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多家报刊上发表。1866年,《协会临时章程》的另一种法译文由沙·龙格翻译,并经马克思核对,和《协会成立宣言》一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协会临时章程》的德译文发表在1865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和1866年4、5月《先驱》第4、5期上。意大利译文发表在1865年2月18日《意大利统一报》第49号及其他报刊上。《协会临时章程》经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5日的会议批准,称《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两天后,9月8日的会议批准的补充修改内容,后来被称为《组织条例》附在《章程》后面。——16。

- 13 这两段中的“权利”“义务”以及“真理、正义和道德”等字眼,是马克思在小委员会的几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委员的坚持下写进去的。见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11月29日给莱·菲力浦斯的信。——17。

- 14 协会章程规定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

会,一直到1866年9月3—8日才在日内瓦举行(见注212)。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是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坚决要求下于1865年7月25日作出的。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够巩固,建议先在伦敦召开一个预备会议(见注171)。在伦敦代表会议召开前,马克思为会议准备了一项关于1866年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本卷第213页),该决议于1865年9月19日由中央委员会通过。——17、213。

15 这几项决议是马克思于1864年11月8日—1865年4月25日期间在总委员会几次会议上就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组成问题提出的,它们是对《协会临时章程》第4、5、6条(见本卷第17—18页)中扼要阐述的一般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这些决议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该书1962年莫斯科版又用原文发表了这些决议。——20。

16 这项决议的文字采自1864年11月12日《蜂房报》第161号的报道。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4年11月8日的会议记录中的文字则比较简单:“凡不能出席会议者,都不能成为委员会委员。”这个决议取消了当时盛行的名誉会员制,避免统治阶级的代表再利用名誉会员的资格钻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机构。——20。

17 这两项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1864年11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并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1865年6月常务委员会以决议草案为基础,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各工人团体书》(见本卷第503—504页)。

决议草案的原文记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中。1864年11月26日《蜂房报》第163号刊载的关于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发表了这两项决议。第二项决议在《蜂房报》上发表时文字较为详细。其中写道:“加入协会的伦敦团体有权各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但中央委员会保留接纳或拒绝这些代表的权利,至于伦敦以外的愿意加入协会的团体,则有权选出一名协会通讯员”。这两项决议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23。

18 致美国总统阿·林肯的贺信是马克思于1864年11月22—29日之间用英文写成的。11月22日中央委员会根据委员迪克和豪威耳的建议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于1864年11月8日再度当选总统。

常务委员会(亦称小委员会,见注 119)将起草贺信的工作委托给马克思。当时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是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他通过常务委员会来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马克思起草的贺信得到常务委员会的赞同,1864年11月29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并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林肯总统。1865年1月28日中央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该信于1月31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刊登在1865年2月4日《蜂房报》第173号上。后来又以《林肯先生和国际工人协会》为题刊登在1865年2月6日的《泰晤士报》第25101号上。正如马克思在1865年5月写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那样,林肯在给他收到的各种团体的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

致林肯的贺信首先发表在1864年12月23日的英国报纸《每日新闻》上,随后又发表在12月24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5号、12月25日《雷诺新闻》第750号和1865年1月7日《蜂房报》第169号上。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贺信发表在1864年12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附刊、1865年1月5日《柏林改革报》第4号和1865年1月7日《海尔曼》周报第314号上。——24。

- 19 人权宣言指独立宣言,它是由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独立战争(见注20)中于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的大会上通过的,主要由杰弗逊起草的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如个人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民主权的原则,等等。当时,当封建专制制度还统治着欧洲的时候,这些原则的宣布对欧洲革命的民主运动、特别是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很大。但是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从一开始就破坏了宣言中宣布的民主权利,他们把人民群众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并把剥夺了占共和国居民很大部分的黑人的基本人权的奴隶制度保存了下来。——24。
- 20 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它是英国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

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0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1781年9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讲和,最后战争双方于1783年9月签订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民建立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25、580、592。

- 21 这封信是马克思为发表有关卡·布林德的声明(见本卷第28—31页)写给《观察家报》编辑部的。

布林德在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第268号匿名发表了一篇来自布拉德福德的通讯,再次否认他是1859年6月《人民报》和《总汇报》上发表的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马克思在1860年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曾揭露了布林德在关于《警告》作者的那场争论中的胆怯行为:因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警告》的作者。布拉德福德通讯的发表迫使马克思发表声明再次揭露布林德是一个无耻的说谎者,同时还驳斥了布林德对自己在美国的影响的吹嘘。此外,马克思应索·哈茨费尔特的请求,在声明中反击了布林德对拉萨尔的攻击(见1864年12月22日马克思给索·哈茨费尔特的信)。

马克思大约于1864年11月26日开始写作本文。他的夫人燕妮根据他的口授作了笔录,并抄写了几份。留传下来两份。本文注明日期为1864年11月28日。声明和附信一起于1864年11月28日寄出。

《观察家报》编辑部收到声明和附信后,在该报1864年12月3日第282号上只发表了附信及编辑部对声明的评论,声明本身却没有见报。

马克思预料到《观察家报》编辑部不会刊登他的声明,便把声明的副本寄给了索·哈茨费尔特,以便在其他德国报纸上发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把它寄给了汉堡的《北极星》报,被发表在该报1864年12月10日第287号上。马克思还将声明寄给《莱茵报》编辑部,但是没被发表。——27、28。

- 22 斯嘉本是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马克思称布林德为荒唐的马志尼-斯嘉本,可能是因为后者曾试图通过同朱·马志尼的密切

关系,让人误以为他也是位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在《北极星》报上发表的声明中“荒唐的马志尼-斯嘉本”一词印成了“荒唐的小丑”。这可能是索·哈茨费尔特考虑到马志尼的关系而作的修改。——31。

- 23 1864年11月29日,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34周年。会议接受了彼·福克斯的建议:以协会英国成员的名义发表一封致波兰人民的公开信。受托起草公开信的小委员会将起草任务交给了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的福克斯。1864年12月6日福克斯在小委员会宣读了他起草的公开信。信中关于法国传统外交政策有利于波兰的重建和独立的观点引起了一场争论。马克思在1864年12月6日小委员会会议、1864年12月13日和1865年1月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分析批判了福克斯的观点。《关于法国对波兰的态度的演讲草稿》就是在这两次会议中间写的,其中扼要记述了1815年以前法国对波兰的外交政策。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在18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对争论作了总结性发言,用实际事例说明福克斯美化了法国对波兰的外交政策。在马克思的影响下,福克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中央委员会建议发表马克思这一演说内容,并根据荣克的建议通过决议对福克斯起草的公开信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使其符合历史事实。

这篇草稿第一次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在《关于波兰问题的手稿(1863—1864年)》1961年海牙版第165—196页。1971年用德文和波兰文发表在《关于波兰历史问题的补充手稿(1863—1864年)》华沙版第352—393页。同年用原文和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版第14卷第322—357页。——32。

- 24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结束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反哈布斯堡王朝联盟的胜利,加速了法国在欧洲取得霸权地位,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2。
- 25 1670年路易十四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签订了反对荷兰的多佛尔秘密条约。根据密约规定法国向查理二世支付大宗钱款。——33。
- 26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年)是法国、西班牙、撒丁与俄国、奥地利为争夺波兰王位而进行的战争。1733年2月1日,波兰国王、萨克森选

帝侯奥古斯特二世病故。波兰贵族中的一派在俄国和奥地利的支持下，企图选举奥古斯特二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为国王，而波兰多数贵族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提名斯塔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继承王位，此人当时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1733年9月12日，莱什琴斯基以绝对多数当选波兰国王，遭到俄、奥反对，战争随之爆发。俄军占领华沙，莱什琴斯基逃到但泽（今格但斯克）。10月5日俄军强迫波兰议会选举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为波兰国王，称奥古斯特三世。1734年5月29日，俄军攻陷但泽，莱什琴斯基逃往普鲁士。1735年10月3日，法国同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签订了维也纳和约（见注31），承认奥古斯特三世为波兰国王。波兰王位继承战争遂告结束。——33。

- 27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以法国、奥地利、俄国等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英、法争夺殖民地和商业霸权以及普、奥之间争夺西里西亚是战争的起因。

在欧洲，普鲁士与奥地利等国之间的战争进行到1762年5月，俄国与普鲁士签订一项条约，退出反普联盟，战局改观，最后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而结束，根据1763年签订的胡贝图斯堡和约，普鲁士夺得西里西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新兴强国。

英法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海上、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1755年英国不断攻击法国商船，法遂占领英国梅诺卡岛。1756年英国对法国宣战，在东方主战场印度与法国人及其走卒印度王公作战，1757年控制了印度孟加拉，1761年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与此同时，法国在北美失去了加拿大，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及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蒙受巨大损失，被迫讲和，于1763年签订了巴黎和约。该和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取的殖民地，此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33、35、38。

- 28 第一次瓜分波兰的建议是1770年普鲁士王储亨利希访问彼得堡时提出的。1772年2月俄普两国订立了瓜分波兰的条约，奥地利在同年8月5日参加进来。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三个签约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协定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的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33、36、39、221。

- 29 波兰领地库尔兰公国是波兰、普鲁士和俄国之间长期争夺的地方。俄国军队在北方战争(1700—1721年)期间于1705年驱逐瑞典人之后占领了库尔兰。1710年,彼得一世的侄女和俄国未来的女沙皇安娜·伊万诺夫娜与库尔兰公爵结婚,这桩婚姻进一步巩固了沙皇政府在库尔兰的权力。——33。
- 30 国事诏书是1713年奥地利颁布的王位继承法令。根据原哈布斯堡家族的宗室继承法,女性无王位继承权。奥皇查理六世无子嗣,为避免死后帝国领地被瓜分,1710年与各领地的君主达成协议,于1713年立此诏书,宣布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领地不可分割,立公主玛丽-泰莉莎为王位继承人。诏书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帝国内部各成员国和欧洲各国君主的承认(巴伐利亚和法国除外)后,于1724年作为国家法令正式公布。1740年查理六世去世,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国对奥怀有领土野心,拒绝承认该诏书,遂引起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33)。——33。
- 31 维也纳和约是奥地利和法国1735年10月3日在维也纳签署的、结束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初步和约。这个和约承认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岳父斯塔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没有在波兰取得王位但得到洛林公国,不过在他去世(1766年)以后该公国应归法兰西所有。那不勒斯和撒丁岛被划归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幼支,而奥地利得到了意大利的另一些地区。俄国和其他国家赞同维也纳和约。和约的条款于1738年11月18日才在维也纳最终确定下来。——34。
- 32 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和约是结束俄土战争(1735—1739年)的条约。1739年,在法国使节维尔纽夫调解下,俄国与土耳其于9月18日在贝尔格莱德缔结了这项和约。和约中不利于波兰的条款是废除他们之间于1711年7月12日在普鲁特签订的和约,条约第二款规定,双方不得再介入波兰问题。——34。
- 33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因奥地利王位继承权引起的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国与英国、荷兰、俄国之间的战争。1740年10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六世死后,其女玛丽-泰莉莎依据《国事诏书》(见注30)继承王位,普鲁士等国企图瓜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反对《国事诏书》。1740年12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

- 奥地利的西里西亚。1741年,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国等结成反奥联盟,英国、荷兰与俄国支持奥地利。因而形成欧洲范围内的战争。174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单独与奥地利签约,获得下西里西亚。1745年,普鲁士为夺取上西里西亚,再次出兵,获胜并单独同奥地利媾和,获得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同时承认玛丽-泰莉莎继承王位。1748年10月18日战争结束签订亚琛和约,和约确认《国事诏书》,承认玛丽-泰莉莎继承王位的权利。普鲁士得到整个西里西亚。这一条约加剧了普奥之间的矛盾。——35。
- 34 奥利瓦条约是北方战争(1655—1660年)结束时波兰、勃兰登堡、奥地利与瑞典之间于1660年5月3日在奥利瓦缔结的和约,根据这一和约,瑞典得到了埃斯特兰和厄塞尔岛以及几乎整个利夫兰。条约第36款规定作为调停者的法国负有保证和平和保护波兰共和国的义务。——37。
- 35 波兰在七年战争期间(见注27),虽宣布保持中立,但是作为萨克森选帝侯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加入了反普鲁士联盟。参战各国的军队都穿越并蹂躏波兰。——37。
- 36 韦劳条约是1657年9月19日波兰国王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在韦劳缔结的和平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波兰国王放弃对普鲁士公国的权力。双方保证在战争爆发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37。
- 37 1764年条约指的是普鲁士和俄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倡议下,于1764年4月11日(俄历3月31日)在彼得堡签署的同盟条约(彼得堡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战时相互援助,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规定,俄国和普鲁士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的宪法。另一项秘密条款还规定,普鲁士有义务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这一条约为1772年瓜分波兰(见注28)打下了基础。——38。
- 38 巴尔同盟战争指1768—1772年波兰武装抗俄斗争。巴尔同盟是1768年2月29日波兰的主要是保守的贵族在与土耳其接壤的巴尔成立的。同盟反对新选出的波兰国王,维护天主教会特权;反对限制封建特权并且反对改革国内的政治制度。在反对俄国武装入侵的斗争中,巴尔同盟得到了法国和土耳其的支援。波兰国内展开了抗俄的武装斗争。同盟

- 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同盟成为欧洲国家外交斗争的傀儡。法国派往波兰的军人在兰斯克鲁纳遭到俄国军队的打击。俄国政府支持下的乌克兰哥萨克部队进入土耳其境内追捕巴尔同盟的人,土耳其于1768年10月6日对俄宣战。波兰国内武装抗俄斗争在1772年被俄军镇压,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根据当年签订的彼得堡条约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见注28)。——39。
- 39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俄土战争(1768—1774年)后两国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战胜国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亚速、刻赤和叶尼卡列三个城市。土耳其被迫承认了克里木和其他鞑靼人居住地区的独立,为俄国以后吞并这些地区造成了有利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苏丹应给予在土耳其的希腊正教教会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第十四款即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正教教堂的规定。——39。
- 40 俄国1770年的远征指俄土战争(1768—1774年)的一次重要战役。1770年7月6—7日,从波罗的海驶来的俄国舰队在小亚细亚西海岸切斯美海湾摧毁了土耳其舰队。俄国的这次胜利对于它在俄土战争中最终获胜起了重要的作用。——39。
- 41 1772年8月19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法国的财政和外交援助下,依靠本国军队发动政变,废除了以贵族统治为基础的旧宪法,制定了加强国王的统治权力的新宪法。——40。
- 42 督政府是1795—1799年间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权。1794年7月雅各宾专政被推翻之后,根据1795年制定的共和三年宪法,解散国民公会,成立由五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每年改选一人。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799年11月9日(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41。
- 43 第二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是1793年1月23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在此之前,1793年1月4日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关于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同盟条约。这次瓜分波兰,奥地利被排挤在外。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两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但泽(今格但斯克)、托伦以

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41。

- 44 对法国的第一次征讨即反雅各宾战争,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普、奥、俄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二十三年战争。

第一次征讨指1792年2月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对革命的法国发动的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1793年1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1793年春,反法同盟从四面向法国本土进攻,并支持法国王党叛乱。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反法联军被击败。1797年10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见注52),同盟瓦解。

1798年12月,英、俄、奥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1800年6月,拿破仑在意大利马伦戈战役(见注54)中击败奥军主力,迫使奥地利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后又迫使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同盟解散。

1805年夏,英、俄、奥、瑞典等国第三次组成反法同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俄、奥联军,签订普拉茨堡和约。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击败普军主力,1807年2月8日在埃劳,6月14日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打败俄军,迫使俄、普签订蒂尔西特和约(见注59),第四次反法同盟联军失败。

1809年春,英、奥等国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同年7月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胜奥军,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至此,拿破仑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

1813年由英、俄、普、奥、瑞典等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同年10月在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1814年3月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1815年3月拿破仑回到巴黎复位,英、俄、普、奥等国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6月22日第二次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长达23年的反雅各宾战争最后结束。——41、151、202、282、287。

- 45 凡尔登会议(1792年10月)是在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倡议下召开的,会议最初在卢森堡附近的梅尔勒举行,参加的还有英国与荷兰的代表。会议商讨了反法战争(见注44)各参战国的领土赔偿问题。普鲁士在

- 1792年10月25日提交的照会中把参加瓜分波兰领土作为它继续参加反法战争的条件。——41。
- 46 1793年波兰被第二次瓜分(见注43)后,波兰国内反抗占领者的斗争日益加剧。1794年3月,在考斯丘什科领导下爆发了反对分割波兰、反对出卖波兰封建主的起义,组成了一个波兰临时政府向俄国和普鲁士宣战。波兰爱国者的起义曾取得最初的胜利,最终还是遭到失败,1795年10月波兰被第三次瓜分。——41。
- 47 1794年,普鲁士与法国就单独媾和以及普鲁士退出反法同盟事宜进行了非正式(7月)和正式(11月)谈判。法国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普鲁士退还波兰领土的要求,而在后来的谈判中以及在1795年4月5日签订的巴塞尔和约(见注51)中又承认普鲁士瓜分到的波兰领土,同意普鲁士继续保留在东部占有的领土。为此普鲁士应满足法国在西部的领土要求,并保证退出反法同盟(见注44)。——42。
- 48 第三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是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795年10月24日签订的圣彼得堡公约。在此之前三国曾于1月30日就瓜分波兰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次瓜分的借口是维护波兰国内的和平安宁。俄国分得了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大部分划归普鲁士。第三次瓜分波兰后的一百多年里,波兰共和国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42、228。
- 49 指俄土战争(1787—1791年)。战争以缔结雅西条约(1792年)而告终。土耳其为夺回克里木等领土,于1787年8月向俄国宣战,首先占领第聂伯河口的金布恩要塞。俄国军队于同年10月消灭了登陆土军后不断向前推进。雅西条约重新确认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见注39),土耳其承认1783年被俄国吞并的克里木汗国划归俄国,把南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割给俄国,使俄国西南边界延伸至德涅斯特河。——42。
- 50 救国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是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于1793年4月创立,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委员会分六个部,分别主管军事、海军、外交、税收、内政、司法。据1793年12月

4日法令,救国委员会成为国民公会所有21个委员会的领导者,负责监督和推动政府各部的工作。1793年4—7月,救国委员会中最有影响的成员是丹东;7月,国民公会改组救国委员会,由9人组成,丹东落选。此后,委员会改由12人组成,成员有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库东、卡诺等人,又称“大救国委员会”,领导人是罗伯斯比尔。1794年,救国委员会内部分歧日益尖锐,以卡诺为首的多数派,在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ûreté générale)的支持下,发动了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被处死,救国委员会权力削弱。1795年10月26日,它同国民公会一起被解散。——43。

51 巴塞尔和约(1795年4月5日)是参加了反法同盟(见注44)的普鲁士同法国单独缔结的,和约规定普鲁士把西部领土转让法国,但继续占有东部的波兰领土,为此必须退出反法同盟。这个和约的签订导致了欧洲各国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44。

52 坎波福米奥和约是1797年10月17日参加反法同盟(见注44)的奥地利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地利退出第一次反法同盟,放弃原有的尼德兰(今比利时),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法国把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连同威尼斯城以及伊斯特里亚半岛和达尔马提亚转让给奥地利以换取奥地利在莱茵河疆界上的让步。原威尼斯共和国的另一部分并入拿破仑第一于1797年夏在意大利北部夺来的土地上建立的山南共和国。归属法国的还有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地区的领地。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终结。——45。

53 大军是对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中在主战场作战的法军主力部队的称呼。大军中除法国军队外,还包括拿破仑第一所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分遣部队以及波兰军团。——45。

54 在马伦戈战役(1800年6月14日)中,拿破仑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梅拉斯的军队。

在霍恩林登战役(1800年12月3日)中,拿破仑的军队在莫罗指挥下击败了约翰大公的奥地利军队。

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导致第二次欧洲国家(英、俄、奥等)反法同盟(见注44)的解体。——46。

- 55 吕内维尔条约是法国和奥地利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条约确认1797年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各项条款(见注52)。它是第二次反法同盟(见注44)瓦解的标志。——46。
- 56 巴黎条约(1801年10月8日)是参加了反法同盟(见注44)的俄国与法国签订的和约。在此之前两国曾于1801年1月在巴黎进行和平谈判。和约宣扬俄法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恢复两国间的贸易关系。——46。
- 57 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奥斯曼帝国时代常训练马木留克作为苏丹的卫队。——付排稿46。
- 58 亚眠条约是法国和英国于1802年3月27日签订的和约。第二次反法同盟(见注44)由于这个和约的签订而解散了。但是和平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英国不履行条约中规定的撤出马耳他岛的条款,1803年5月英法之间重新开战。——47。
- 59 蒂尔西特和约(蒂尔西特条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见注44)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7日(同俄国)和9日(同普鲁士)签订的。和约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对俄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的大陆封锁,见注60)。——48。
- 60 大陆封锁或大陆体系,是拿破仑第一在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于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政策。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俄国和奥地利等国。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封锁便瓦解了。——49。
- 61 伊奥尼亚群岛自坎波福米奥和约(见注52)签订以来归属法国,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8—1801年)期间被俄国、英国和土耳其组成的联合舰队占领。直至1807年蒂尔西特和约(见注59)签订,该岛一直在俄国的控制之下。蒂尔西特和约的秘密条款确认法国对该岛拥有统治权,但俄

国一直到1808年8月才把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交给拿破仑。七年之后,1815年6月9日欧洲各国与法国缔结的维也纳条约最终确定该岛为英国的保护领地。——49。

- 62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参加爱尔福特会议的结果是1808年10月30日签订的同盟条约。该条约重申了蒂尔西特和约(见注59)的条款。拿破仑第一承认俄国对芬兰和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50。
- 63 指1809年10月14日法国和参加第五次反法同盟(见注44)的奥地利在维也纳的申布伦宫签订的申布伦和约,又称维也纳和约。该和约结束了奥地利于当年对法国发起的战争。根据这个和约,奥地利放弃了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见注48)时获得的西加利西亚(新加利西亚),这片领土被并入华沙公国。塔尔诺波尔被分给俄国。拿破仑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加深奥俄之间的矛盾,并且防止这两国再度结成联盟。——50。
- 64 指1810年1月4日俄国外交官尼·彼·鲁缅采夫和拿破仑第一的大使阿·奥·路·科兰库在圣彼得堡签署的秘密协定。由于彼得堡皇宫拒绝同意女王储安娜·巴甫洛夫娜同拿破仑结婚,这个秘密协定未获批准。——51。
- 65 百日指拿破仑在法国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拿破仑逃出流放地厄尔巴岛,率军重返巴黎执政。欧洲许多国家组成反法联盟,反对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在6月18日滑铁卢战役中遭到失败,6月22日再次退位。——50。
- 66 本文是马克思在1865年1月24日为当天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所作报告而写的草稿,报告以威·李卜克内西1月21日写给他的信为基础。马克思先画出信中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然后将报告的草稿用英文写在信文的行与行之间,草稿中大量借用了李卜克内西用德文写下的内容。在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简要地记录了马克思的报告。当马克思讲到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67)加入国际工人协会时,他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的宗派立场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宗派主义对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阻碍作用不亚于当时普鲁士和德国其他邦实行的政治禁令(1850年普鲁士关于协会的法律中禁止工人正式加入任何外国团体,等等)。

本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53。

- 67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1864年底—1865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使联合会转变成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未获成功。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合并后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53、464、471、474、512。

- 68 国际工人协会于1865年9月25—29日在伦敦举行代表会议,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事实上柏林印刷工人和排字工人协会的代表并没有参加这两次大会。——53。
- 69 《论蒲鲁东》一文写于1865年1月24日。蒲鲁东于1865年1月19日去世,威·李卜克内西于1865年1月21日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信给马克思,请求他写一篇或几篇有关蒲鲁东的文章。马克思以给该报编辑施韦泽的一封信的形式写成本文,于1月28日寄到编辑部。从施韦泽2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希望他的文章保留书信的形式。所以施韦泽将该文刊登在报纸副刊上,于1865年2月1、3和5日第16—18号上发表。

马克思在文章中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作了全面

的评价。他对蒲鲁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参看马克思 1865 年 1 月 25 日给恩格斯的信)。

《论蒲鲁东》一文的部分手稿的草稿还保存着,全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又收入经恩格斯校订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 1 版(1885 年)和第 2 版(1892 年)。本文的法译文由恩格斯 1884 年翻译并经过保·拉法格校阅,收入《哲学的贫困》1896 年巴黎版。本文的俄译文收入《哲学的贫困》1886 年俄文版。——54。

- 70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 2 章第 1 节《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在经恩格斯校阅的、于 1885 年和 1892 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中转载这篇文章时删去了法文的引文。——58。
- 71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 2 章第 1 节《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的结尾段落。——59。
- 72 指埃·卡贝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起的作用。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和《1841 年人民报》上除了宣传自己的空想计划外,还批评了七月王朝的制度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他的这些活动却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60。
- 73 二月革命是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60、287。
- 74 指蒲鲁东在 1848 年 7 月 31 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演说的全文刊登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770—782 页。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除了谈论利息和降低利率、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之外,在谈到对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起义者的镇压时,他说这是暴力和

专横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1848年8月5日《新莱茵报》第66号上的文章《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对这篇演说作了详细评价。——60。

- 75 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见注73)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60、107、462、578。
- 76 指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1848年7月31日蒲鲁东发表演说之后,梯也尔的演说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后来又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60。
- 7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62。
- 78 指蒲鲁东的著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波兰的决议(见注184),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62。
- 79 恩格斯这篇诗歌译作大约完成于1865年1月27日。此前马克思于1月25日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已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见注69)。马克思希望恩格斯也为该报投稿。1月27日恩格斯回信说,他寄去了“一首短短的关于提德曼的丹麦民歌,提德曼由于向农民征收新税,被一位老人在司法会议上打死。这种行动是革命的,根本不应该受惩罚,而且它首先反对的是封建贵族,这也是报纸应无条件反对的。我给它适当地注上了几笔。”

恩格斯翻译的民歌《提德曼老爷》可能译自古丹麦诗集《英雄诗歌》

(见恩格斯1860年6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1865年2月5日被发表在拉萨尔派的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8号上。1883年11月29日刊载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49期。1893年收载于亨克尔的《自由书》柏林版第2卷。——64。

- 80 这篇声明是马克思1865年2月6日写成并寄给恩格斯的。1865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是在继续推行拉萨尔向俾斯麦政府献媚的政策并赞同拉萨尔轻视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自己作为国际的德国通讯书记有责任对施韦泽提出警告。写这篇声明的直接动因是2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该报驻巴黎记者莫·赫斯的一篇短文,文章诬蔑国际的法国会员和波拿巴分子有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使该报编辑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报纸的调子。1865年2月12日该报第21号刊登了赫斯收回他的观点的一篇短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不再坚持发表这篇声明。同时,他们决定暂时不再为该报撰稿(见马克思1865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并于1865年2月23日发表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见本卷第116页)。

寄给施韦泽的这篇声明当时没有发表,声明原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草稿保留了下来,马克思在1865年2月6日把它随信寄给了恩格斯。声明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马克思在《关于不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中曾引用了本篇声明中有关巴黎无产阶级反波拿巴的行为的内容(见本卷第130—131页)。——67。

- 81 罗亚尔宫是拿破仑第三的堂弟约瑟夫·波拿巴(绰号普隆-普隆)在巴黎的官邸。约·波拿巴领导的一个波拿巴主义者集团企图通过广泛的社会蛊惑宣传,并通过伪装成拿破仑第三的反对派来使人民群众脱离反对政府的斗争。——67、131。
- 82 土伊勒里宫是拿破仑第三在巴黎的官邸,这里指的是拿破仑第三领导的波拿巴主义者集团。——67、131。
- 83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他们的历史荣誉”是套用“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这句话,它出典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份让给我。

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第29—34节)。这句话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67。

- 84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不仅详细分析了普鲁士军队的改组问题,而且阐明了工人政党对由这个问题引起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中自由资产阶级多数之间的所谓宪制冲突的策略。1860年2月普鲁士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的提案。但是政府很快就做到了使资产阶级批准“维持军队的战斗准备状态”的拨款,这意味着实际上开始实行预计的改组。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事开支并要求成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指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成立了俾斯麦的反革命内阁,这个内阁在同年10月再次解散议会,并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为此所需的费用不须议会批准。这场冲突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和容克之间的权力之争。直到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以后普鲁士资产阶级投降俾斯麦的时候才最终解决。

在马克思的建议下,恩格斯起初同意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文章。但是该报向俾斯麦政府的献媚使他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同马克思商量之后,他决定把自己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表。他于1865年1月27日开始写作,2月9日前完成了大部分。随后他把手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在1865年2月11日的回信中对文章提了一些建议,恩格斯后来又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作了大量修改,并于2月12日将手稿寄给汉堡的出版商迈斯纳。

小册子于1865年2月底在汉堡出版,它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反应。许多工人报纸和民主派报纸都刊登了该书出版的广告及简介。威·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某些工人联合会中组织了对这本小册子的讨论。小册子的某些片断曾经在不同时期发表在社会民主派的报刊上:1866年3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71号、1890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10—11期、1891年1月3日《柏林人民论坛》第1期。——69、127。

- 85 1850年11月初普鲁士军队的动员是由于在德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普奥关系尖锐化而引起的。1859年6月,法国、皮埃蒙特同奥地利在意大利进行战争(1859年4—7月)时,普鲁士军队又进行了动员,因为法国的吞

并企图也威胁到了德国的安全。两次动员暴露出了普鲁士军队在组织、装备和训练方面的严重缺陷。——74。

- 86 1830年的风暴指法国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和这次革命以后在欧洲各地发生的起义。法国在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七月革命在比利时、波兰、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的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汉诺威和巴伐利亚等地引起了革命起义。——74、223、282。
- 87 根据普鲁士1814年9月3日《义务兵役制》的规定,第一类野战军由常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组成。常备军由年龄在20—25岁的三年期正规军人和二年期预备军人组成。后备军是在1813年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以独立的民兵形式组建的,从1814年起成为普鲁士陆军的组成部分。后备军的人员构成是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在和平时期,后备军只进行一些集训。1815年普鲁士战时后备军规章制度,只有在战时和每年军事演习时才能征召后备军。在战争时期第一类后备军(应征人员年龄在26—32岁)被用于补充作战部队,第二类后备军(应征人员年龄在33—39岁)则作为守备部队的增援部队担任要塞驻军等警备勤务。——74、237。
- 88 丹麦战争(1864年)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3年11月,丹麦王国违反1852年的伦敦议定书,颁布《十一月宪章》,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三公国并入丹麦,引起当地日耳曼居民的反抗。普鲁士和奥地利向丹麦提出废除新宪章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遂于1864年2月1日发动战争,战争以丹麦失败结束,1864年10月30日双方签订《维也纳和约》,上述三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后并入普鲁士。这场战争是俾斯麦政府实现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一个重要阶段。——75、95、239。
- 89 征兵制是以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补充军队的制度,义务兵役制规定一定年龄的人有服兵役的义务。征兵制与普遍义务兵役制不同之点是它有

各种免役的办法,主要是允许赎买和代役。

抽签制是通过抽签办法实行的义务兵役制。19世纪时在西欧某些国家当服役年龄的人数超过需要时,就通过抽签决定谁服现役。其余的或者编入预备队,或者像某些国家所做的那样,召集起来进行短期军训。——77。

- 90 补充预备队是普鲁士军队中对后备应征人员的称呼,他们由于身体稍有缺陷或特殊的家庭情况而允许延期服役;在战争时期他们被编为预备部队来补充军队。——78。
- 91 基干制是19世纪60年代的法奥军事制度的特点,它以正规的基干军队为主,实行长期限的兵役。在法国服役期为7年,其中6年在正规军队,另一年在预备队。在奥地利服役期为10年,其中8年在正规军队,2年在预备队。它实行的征兵制不同于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征兵制。根据1814年的法律建立的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征兵制是没有代役的普遍义务兵役制。——84、125、237。
- 92 阿尔及利亚远征指1830年法国政府为征服阿尔及利亚而发动的战争。这一殖民地掠夺战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84。
- 93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是法国、英国、土耳其及撒丁王国的联军与俄国进行的战争。俄国力图控制黑海海峡,向近东扩张,于1853年7月以保护土耳其东正教居民权利为借口,进军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土耳其于10月对俄宣战。随后英法舰队开到黑海干涉,并于1854年3月先后对俄宣战。1855年1月撒丁参战。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1856年3月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俄国被迫让出多瑙河三角洲,比萨拉比亚南部归还摩尔多瓦,取消俄国对土耳其属下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黑海中立,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禁止俄国在黑海保留海军事械库和舰队。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受到严重的打击。——84、168、221。
- 94 意大利战争(1859年4月29日—7月8日)是法国及撒丁王国与奥地利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去扩张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

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奥军在马真塔会战和索尔费里诺会战(见注 201)中遭到失败后,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于 7 月 11 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今维罗纳自由镇)初步和约。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管辖。——84。

95 指发生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这一天的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普鲁士军队在这两场会战中被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击溃,最后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 1807 年 7 月 9 日在蒂尔西特签订了普法和约(见注 59)。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附属国的地位。——85、239。

96 卡茨巴赫是西里西亚的一条河。欧洲国家第六次反法同盟(见注 44)与拿破仑法国作战时,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在布吕歇尔指挥下于 1813 年 8 月 26 日在卡茨巴赫击溃法国部队。1814 年 3 月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覆灭,战争遂告结束。——85。

97 瑞士型的后备军包括在瑞士军队(定期集合受训的非正规军)中服役期满的预备役军人。瑞士型的后备军的应征人员年龄为 33—34 岁,兵役期限是 12 年。瑞士型的后备军和普鲁士型的后备军一样,在战争时用来加强军队,在遇到战争危险时他们被征集入伍。——85。

98 杜佩尔(丹麦人称为:杜贝尔)是在石勒苏益格的丹麦防御工事,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作战期间(见注 88),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被普鲁士军队摧毁。

“内部的杜佩尔”(Düppel im Innern)一词在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北德总汇报》1864 年 9 月 30 日第 229 号上的“每日政治新闻”专栏中被用来表示“内部敌人”,后来被广泛引用,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86、98。

99 1849 年,德国西南部发生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巴登部队转到起义人民一边,并形成巴登革命军的核心。在巴登部队中骑兵团队最不可靠。1849 年 6 月 21 日起义部队在瓦格霍伊瑟尔城下同普鲁士人作战时,由于巴登龙骑兵的几个骑兵连的指挥官贝克尔特中校的叛变而溃

散。——87。

- 100 “新纪元”指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89、470。
- 101 曼托伊费尔时期指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掌权的时期(1850—1858年10月)。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同时又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资产阶级,站到了贵族和残酷地镇压了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普鲁士革命的民主成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改,变成了一纸空文;在全国恢复了贵族的等级特权,政权完全掌握在土地贵族和贵族的手中。——90。
- 102 普鲁士各省和专区的等级会议即省议会,成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谏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省等级会议在19世纪50年代,即反动统治时期,又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90。
- 103 这句话恩格斯引自马克思1865年2月11日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这篇文章提出具体修改意见。——91。
- 104 舒尔采-德里奇的贮钱罐鼓动指他鼓吹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活动。这种宣传的核心思想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工人通过节约来自助,也就是说工人应该节省以获得必要的资本,从而使自己也能够成为企业主。他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小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91。

- 105 自由的进步党资产阶级指 1861 年 6 月成立的普鲁士进步党的代表,1866 年普奥战争以前,他们一直在众议院中保持多数。其著名的代表是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霍弗贝克等。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集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1866 年进步党右翼脱离该党,成立了一个屈服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92、127、499。
- 106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得国债剧增,危及国家。——93、399、445。
- 107 特许制度指 19 世纪 60 年代中在普鲁士许多工业部门实行的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度,不得到这种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制度阻碍了生产的发展。1869 年 6 月 21 日《工商业管理条例》颁布后,特许制度的种种限制才得以取消,实行了完全的经营自由。——100。
- 108 帝国宪法是 1849 年 3 月 28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德国宪法。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帝国宪法没有提出通过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半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以及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最自由的发展机会的任务,它规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予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的主要缺点,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它的惟一保护者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发动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的人民群众。——102。
- 109 普鲁士领导地位(Preußische Spitze)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 1848 年 3 月 20 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领导地位”。在争取德意志统一的时期,这一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102。
- 110 三位一体是德意志联邦的改组计划之一,计划规定将德意志国家分为三

个部分：奥地利、普鲁士和一个由德意志中、小各邦组成的联邦。这个计划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特别受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拥护，其目的是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领导权，代表了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的德意志中、小各邦的割据倾向。——102。

- 111 恩格斯考虑了马克思在 1865 年 2 月 11 日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因此在论及全德工人联合会所提出的这些要求时，有意表述得不致让人理解为同意拉萨尔派的基本政治观点。——104。

- 112 工人结社权即工人为了经济斗争而进行联合的权利，首先是建立工会组织的权利和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罢工的权利。

1865 年 1 月，由于工人起来反对当时通行的工商业条例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问题。资产阶级议员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力求首先废除条例中束缚资本家的那些条款。进步党人海·舒尔采-德里奇和茹·孚赫曾把关于废除条例第 181 条的建议提交众议院讨论，这一条规定企业家不得为了迫使工人让步而停止生产。为了达到蛊惑性的目的，进步党人也要求废除第 182 条，即关于对煽动罢工和怠工的工人进行刑法追究的规定。而工人首先要求废除第 183 条，即关于必须经警察当局允许方可组织工人团体的规定，以及第 184 条关于禁止罢工的规定。

1865 年 2 月 14 日普鲁士议会只废除了工商业条例的第 181 条和第 182 条，而工人关于联合自由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107。

- 113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是一首英雄史诗，是 8 世纪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112。

- 114 1832 年改革法案是英国议会上院于 1832 年 6 月 7 日最后批准生效的选举权改革法案。这项法案最初由辉格党内阁首相格雷和副首相罗素于 1831 年 3 月在英国议会中提出。这个法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这项法案被英国议会批准生效，但是为此项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未获得选举权。按照 1832 年的选举法，在城市里，年收入租金不少于 10 英镑的房东和承租人有选举权；在农村只有年缴租金 50 英镑以上的租地者有选举权。关于这项议会改革法案，可参看恩格斯的《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

第 299—310 页)。——113。

- 115 这篇关于停止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是马克思 1865 年 2 月 18 日写的,他把声明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完全赞同,并在声明上签字,然后又寄给马克思;1865 年 2 月 23 日马克思把它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在写这篇声明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确认已经不可能纠正该报的政治路线。这种认识来自 1865 年 2 月 15 日施韦泽给马克思的信(详见本卷第 128—129 页),以及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在这组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1865 年 2 月 18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认为施韦泽是不可救药的(他可能和俾斯麦取得了秘密的协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组文章的发表当作公开同该报决裂的契机,使这件事容易为群众所了解。

马克思把声明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同时采取措施迫使施韦泽把它刊登出来。他委托李卜克内西,一旦施韦泽拒绝发表这个声明,就把它发表在《柏林改革报》上。此外,马克思把声明的两份副本寄给卡·济贝耳,请他在收到信以后两天就把声明刊登在《莱茵报》或《杜塞尔多夫日报》上。

由于李卜克内西和济贝耳的帮助,声明于 1865 年 2 月 28 日发表于《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 59 号、《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59 号,1865 年 3 月 1 日又发表于《巴门日报》第 51 号、《莱茵报》第 60 号、《柏林改革报》第 51 号、《新法兰克福报》第 60 号、《布雷斯劳报》第 102 号、《公民报》第 60 号以及许多其他德国报纸上。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广泛地发表在德国报刊上,施韦泽不得不于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 29 号上发表它,从该报编辑部在《声明》之前加的编者按语中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该报撰稿。不久,格·海尔维格、弗·吕斯托夫和约·菲·贝克尔也作了类似的声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在先进的德国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1865 年 3 月受到柏林印刷工人协会的赞许,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作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决裂的报告。《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订户,特别是柏林工人中的订户。——116。

- 116 这篇匿名简介是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27 日亲自起草的。简介的内容是在他当天写给济贝耳的信中保存下来的。当恩格斯准备继续加工《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 69—115 页)时,马克思在 1865 年 2 月 10 日给恩格斯回信说应尽快使之出版并事先在柏林和莱茵地区的报纸上宣传这部著作。

1865 年 2 月 27 日恩格斯写信给埃尔伯费尔德的卡·济贝耳、柏林的威·李卜克内西和科隆的约·克莱因,请他们在德国的报纸上报道有关他的著作出版的消息(见恩格斯 1865 年 2 月 27 日给马克思的信)。这篇简介通过威·李卜克内西、卡·济贝耳和卡·克莱因的帮助匿名发表在以下德国报纸上:1865 年 3 月 3 日《柏林改革报》第 53 号、《杜塞尔多夫日报》第 62 号、《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 62 号和《莱茵报》第 62 号;1865 年 3 月 7 日《上莱茵信使报》第 56 号、1865 年 3 月 9 日《奥斯纳布吕克报》第 250 号和 1865 年 3 月 11 日《新汉诺威通报》第 70 号。——118。

- 117 这个札记是马克思 1865 年 3 月 4 日写的,同时他还起草了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最初方案(见注 118)。中央委员会驻巴黎的全权代表、德国流亡者维·席利 1865 年 2 月 25—28 日给马克思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了巴黎支部中发生的冲突和他与支部代表谈判的情况。为了向小委员会作报告,马克思用德文和英文对这封信作了札记,有些句子末尾还附上了该信的页码。

这个札记是证明马克思积极关注 1865 年初在巴黎支部中发生的冲突的第一份材料。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 年莫斯科版。——119。

- 118 马克思 1865 年 3 月 4 日起草的这个决议最初方案是为 1865 年 3 月 4 日和 6 日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法国的国际组织问题而准备的。1864 年 12 月底—1865 年 1 月初,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个法国支部开始在巴黎创建,这个巴黎支部的理事会成员是 1864 年 9 月 28 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见注 1)的参加者,具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工人厄·弗里布尔、沙·利穆赞和昂·托伦。支部有固定的会址,1865 年 1 月还出版了协会临时章程的法文译本(见马克思 1870 年 1 月 1 日写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和 3 月 28 日写的《机密通知》)。同时,曾经参加 1864 年 9 月 28 日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法国律师昂·勒福尔,却以国际的

奠基人之一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自居。勒福尔同中央委员会的法国通讯书记勒吕贝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代表人物保持友好的联系。

1865年1月24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被迫着手研究巴黎支部的事情,原因是在1月13日的柏林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了莫·赫斯的文章,文章指责托伦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见本卷第67页)。马克思委托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维·席利进行有关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来自几个靠近《联合》杂志的人,勒福尔是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马克思试图把一部分受资产阶级合作社派影响的法国工人吸引到国际的队伍中来,并且利用《联合》杂志来宣传国际的思想;由于马克思的坚决要求,中央委员会在1865年2月7日采纳了勒福尔的建议,委派他作为负责在法国报刊上捍卫国际的“报刊辩护人”。这个委派引起巴黎支部成员的不满;2月24日有32个国际会员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表示完全信任托伦、弗里布尔和利穆赞,并且要求领导职务只能委派工人担任。2月28日托伦和弗里布尔带着这个决议来到伦敦。当天,关于巴黎支部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经过第一次讨论后,晚上又被转交常务委员会研究。1865年3月4日和6日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1864—1865年的笔记本里记有这份决议的最初方案,它是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见本卷第123—124页)的最终文本的基础。——121。

- 119 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国际工人协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1864年10月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为制定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见注1),它在纲领性文件批准之后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称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它的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常务主席(到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建议废除这个职务为止)、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中央委员会审阅的国际文件。从1872年6月起改称总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实际领导小委员会的是以德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该组织的马克思。——121、279、498。

- 120 马克思思想通过吸收1848年革命的老战士、工人政论家皮·万萨德参加巴

黎支部理事会,使法国的国际会员接受4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但是,万萨德借口生病和工作繁忙,没有接受这一委任。——121。

- 121 1865年3月4日,马克思向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小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巴黎支部冲突的决议最初方案》(见本卷第121—122页)后,小委员会于3月6日拟订了一份集体建议,其主要内容是指责在巴黎支部与昂·勒福尔的冲突中站在后者一边的维·勒吕贝和路·沃尔弗周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试图加强勒福尔在巴黎支部理事会中的地位,同时排挤昂·托伦。中央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于3月7日将这份建议呈交中央委员会。建议经中央委员讨论形成了五项决议,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曾对它们逐项进行表决,五项决议均获多数通过。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建议稿未能找到,会议记录本上记载的大多是经表决后成文的决议。从1865年3月13日马克思给海·荣克的信中看出,有些建议被修改了,例如涉及勒福尔在巴黎支部中的地位的第二、四两项决议,无论是内容还是措词,都与建议稿有明显出入。决议内容记入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本,马克思1865年3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附有决议的手抄稿以及给席利个人的指示。——123。
- 122 昂·托伦由于被指责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而请求中央委员会免除其巴黎通讯员的职务。中央委员会在1865年2月7、14和21日曾经拒绝了托伦的申请,由于对托伦的指责没有任何证据,这次中央委员会又拒绝了他的申请。——123。
- 123 在1865年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围绕这一项决议展开了长时间激烈的讨论。从会议记录本中可以看到,反对这项决议的勒吕贝、路·沃尔弗、惠勒和惠特洛克要求保留对勒福尔的委派,即委派他担任在法国报刊上捍卫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刊辩护人。马克思同卡特、杜邦、福克斯等人支持这项决议。它以11票对9票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不过,马克思在1865年3月13日给海·荣克的信中认为决议在措辞方面本来是可以更委婉一些,更有逻辑一些。——123。
- 124 在对总章程和条例进行讨论时,托伦曾建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必须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且应当在条例中作出相应的规定。他的建议遭到英国代表的强烈反对。克里默和卡特强调说,第一国际的产生就应归

功于许多并非从事体力劳动的公民,尤其是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正如克里默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已将工人阶级的胜利当作他毕生的事业。这次中央委员会再次反对只有工人才可以在国际工人协会担任职务的原则。——123。

- 125 人民银行指皮·贝律兹于1863年在巴黎创立的劳动信贷银行,其目的是贷款给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并动员工人通过储蓄来开展合作运动。这个银行存在到1868年。——124。

- 126 本文是马克思为支持宣传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69—115页)而写的两篇短文之一(另一篇见本卷第127页)。马克思在1865年3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打算通过埃卡留斯在《伦敦通讯》和《海尔曼》上刊登两篇短评。这一篇原本为《伦敦通讯》写的简介大约完成于3月13日以前(见马克思1865年3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应《海尔曼》的编辑尤赫的请求,马克思将它寄给了《海尔曼》。简介匿名发表在1865年3月18日《海尔曼》第324号。

本文原稿没有保存下来。——125。

- 127 本文是马克思为支持宣传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而写的两篇短文之一(另一篇见本卷第125—126页)。马克思在将他为《伦敦通讯》写的简介寄给《海尔曼》报之后(见注126),又于1865年3月14—16日之间写了这篇简介寄给《伦敦通讯》。马克思认为在《伦敦通讯》上介绍恩格斯的小册子很重要,因为它的出版者本德尔“无疑最有办法在英国传播这种东西”(见马克思1865年3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简介匿名发表在该报1865年3月17日第12号上。

本文原稿没有保存下来。——127。

- 12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5年2月23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本卷第111—112页)中表示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彻底决裂之后,该报的其他几名撰稿人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在1865年3月8日该报第31号发表了一篇评论,其中引用了卡·布林德发表在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4号上的文章,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态度,捏造他们不再给该报撰稿的原因。因此马克思于1865年3月15日写下了本篇声明。

马克思3月18日把声明的副本分别寄给了几家德国报纸。1865年

3月19日《柏林改革报》第67号首先刊登了本篇声明。随后刊登该声明的有1865年3月20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79号、1865年3月20日《公民报》第79号和1865年3月25日《海尔曼》第325号。卡·席林的小册子《伯恩哈德·贝克尔主席被全德工人联合会开除和〈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柏林版第58—61页收入了该声明。

本篇声明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128。

129 这句话出自卡·布林德发表在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第64号上的文章。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时已被告知该报是拉萨尔主义的机关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撰稿了。——128。

130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巨大损失指它的创建人斐·拉萨尔于1864年8月31日在决斗中死亡。——128。

131 1864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第1号登载了题为《斐迪南·拉萨尔》的文章，其开场白和结束语用的是马克思1864年9月12日给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吊唁信中的一句话：“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像阿基里斯那样”。——130。

132 可能指马克思1865年1月16日写给施韦泽的信。他在信中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64年12月30日试刊第3号和1865年1月13日第8号两次攻击国际工人协会提出了抗议。——130。

133 中央委员会委托海·荣克对巴黎支部的冲突经过起草一篇简短的述评，用以通报法国的国际会员。荣克于1865年3月12日将此事告诉马克思并请求给予帮助。3月13日马克思给荣克写信表示同意，并希望后者把写好的述评寄给他。马克思在3月14—18日之间写了这一便函，并于3月18日两人见面时把它交给了荣克。双方研究后又加上了最后的几段（从“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开始），用法文和英文写在便函第1页的背面，其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部分是荣克写的。

便函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5》1961年莫斯科版。——133。

134 在1865年3月1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勒吕贝宣读了有他签名的抗议书，抗议书反对委派任何法国以外的外籍成员担任中央委员会驻巴黎理

事会的代表。中央委员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通过反对德国人席利——马克思的朋友——来削弱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影响。——134。

- 135 马克思 1865 年 3 月 18 日写给海·荣克的这一便函涉及国际对英国选举改革的策略。马克思的朋友厄·琼斯两天前给他来信表示支持第一国际派代表参加即将在曼彻斯特召开的选举法改革全国代表会议。马克思主张让广大工人群众加入民主改革的运动,对中央委员会围绕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一切举措均予以支持。马克思因 3 月 19 日要去荷兰而不能亲自把琼斯来信的内容通知中央委员会。3 月 18 日,他和荣克讨论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时,在给荣克的便函(见本卷 133—138 页)的最后一页的背面写下了本便函。从 1865 年 3 月 2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可以确定,荣克把便函带到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当天根据威·克里默的提议,通过了派遣代表参加曼彻斯特代表会议的决议。

这份便函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 年莫斯科版。——139。

- 136 指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全国改革同盟于 1865 年 5 月 15—16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选举法改革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90 个地区的将近二百名代表,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成员威·克里默、乔·豪威耳和厄·琼斯以及其他改革同盟的代表建议在会议决议中写上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他们的建议以 95 票对 50 票被否决。——139。

- 137 指 1865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改革同盟曼彻斯特支部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毫无保留地支持给予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及秘密投票选举的要求。——139。

- 138 马克思于 1865 年 3 月 28 日写这篇声明的动因是,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改革报》上把马克思同《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说成是他个人对拉萨尔怀有敌意。除《柏林改革报》之外,马克思可能还把声明寄给了汉堡的《北极星》报。保存下来的声明手稿的开头写有:“编辑先生,如果您能刊登以下几行文字我将感激不尽。您最忠实的卡·马克思。卡·布伦先生,《北极星》报编辑。”但《北极星》报没有刊发。

声明发表在 1865 年 4 月 1 日《柏林改革报》第 78 号上,1865 年 4 月 9 日又被《德意志工人总汇报》第 119 号转载。——140。

- 139 《“人类的主席”》是马克思反驳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伯·贝克尔的声明。186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发表了贝克尔1865年3月22日在联合会汉堡分会会议上的讲话,贝克尔在讲话中诽谤国际工人协会,并且诽谤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于1865年4月8日针对贝克尔的讲话写了这篇声明。

马克思将本文寄给《莱茵报》(杜塞尔多夫-科隆)和《杜塞尔多夫日报》,后者未予刊发。文章发表在1865年4月12日《莱茵报》第102号和4月13日《柏林改革报》第88号。文章发表后恩格斯在1865年5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赞扬说:“反对‘人类的主席’这篇声明很出色。恰到好处,不必再多了。”——142。

- 140 阿魏(Asa fétida)是一种药用植物的树脂,含有机硫化物,发出类似洋葱、大蒜的强烈气味。在印度和伊朗用作调味品;在欧美用作香料及调味品。——142。

- 141 指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位,拉萨尔在遗嘱中把这个职位交给了伯·贝克尔。——144。

- 142 1859年6月10日,马克思因拉萨尔匿名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的出版给他写了一封信。在这本小册子中拉萨尔坚持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思想。马克思在信中写道:“关于小册子:绝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在英国的我的党内朋友的观点。不过,我们可能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观点。”——146。

- 143 这段引文出自拉萨尔1859年6月中旬对马克思6月10日来信的复信。见斐·拉萨尔《遗著。书信和著作》1922年斯图加特—柏林版第3卷第221页。——146。

- 144 这里的国际协会指1855年在厄·琼斯倡议下,由伦敦宪章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德国、波兰等国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厄·琼斯,其宗旨是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合作。1856年它改名为国际协会,一直存在到1859年。协会从1857年3月—1858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国际协会通报》。从马克思1855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他不支持该协会的活动。——146。

- 145 伯·贝克尔在1865年3月22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分会上的讲话中抱怨说,他作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秘书还得履行家庭仆人的义务,为她去买面包和黄油。——147。
- 146 1865年3月1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见注147)两周年的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中央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和波兰独立全国同盟、英国和爱尔兰的波兰民族委员会发起的。中央委员会在大会的准备和召开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865年2月2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曾通过决议号召全体成员以及他们的拥护者支持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马克思在1865年3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波兰大会开得很好”。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其中包括伦敦的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只报道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比尔斯、利弗森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对以国际的名义提出的决议和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格·埃卡留斯和维·勒吕贝的发言却只字不提。国际的机关报《蜂房报》于1865年3月4日第177号全面报道了有关大会的情况。此后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仍对此保持缄默。而且1865年3月11日瑞士《白鹰报》第30号又刊登了一篇转自英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歪曲报道,为此马克思于1865年4月13日利用《蜂房报》上的那篇报道写出这篇更正,并于当日寄给了海·荣克。他在信中请他以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讯书记身份去敦促《白鹰报》刊登这一篇更正说明。短文经海·荣克稍作改动后刊登在1865年4月22日《白鹰报》第48号上,署名国际工人协会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148。
- 147 指1863—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国民政府(委员会)在1863年1月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了下去。个别起义队伍的斗争继续到1864年底。具有保守思想的起义领导者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欧列强政府的干涉上,但它们只在外交上作了些表示。支援波兰解放斗争的是欧洲各国的进步力量。国际无产阶级抗议沙皇政府残酷压迫波兰,抗议各国政府对波兰解放斗争的旁观态度,这种抗议行动对国际工人协会(见注1)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148、220。
- 148 1865年4月14日美国总统阿·林肯被南部农场主和纽约银行家的代理

人、演员蒲斯刺杀；原来的副总统安·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中央委员会在1865年5月2日的会议上通过决定，就这一事件给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根据这个决定，马克思于2—9日之间写了《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并于9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这封公开信通过美国驻伦敦公使亚当斯转交给总统。公开信先后刊登在1865年5月20日《蜂房报》第188号、1865年5月21日《雷诺新闻》第771号和1865年6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7536号上。1865年6月4日《芝加哥星期日报》第23号还刊登了公开信的德译文，译者不详。由马克思本人译成德文的公开信刊载于1865年6月15日《上莱茵信使报》第140号。——150。

149 “特殊制度”即美国南部的奴隶占有制度，它是南部同盟副主席亚·斯蒂芬斯于1861年3月22日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所作的为奴隶制辩护的演说中使用的名词。——150。

150 维护宗教裁判所的战斗，指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对尼德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镇压。从16世纪中叶起，尼德兰就不断爆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动而残暴的天主教宗教裁判所是西班牙国王实行专制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尼德兰武装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天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在维护宗教裁判所的战斗中，1584年7月10日，菲力浦二世的间谍热拉尔刺杀了尼德兰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奥伦治的威廉亲王。——150。

151 “不可遏制的冲突”是威·西华德1858年10月25日在罗切斯特的群众集会上所作演说中的话，他在演说中把美国奴隶制的辩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说成是不可遏制的冲突，并认为这冲突必将使美国或者变成“奴隶占有制的国家”，或者变成“自由劳动的国家”。

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时，西华德和他的儿子都受了重伤。——151。

152 1861年4月15日林肯政府为对付叛乱的南部各州同盟挑起的军事行动（见注5），宣布招募75000名志愿军。按照当时的总统签署的国会法律，志愿军在一年内被征用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林肯政府认为，国内战争在这三个月即九十天内就会胜利结束。实际上美国内战直到1865年才结束。——151。

153 百年战争(1337—1453年)是英法两国为争夺日安(12世纪起为英国的领地)、诺曼底、安茹(英国于13世纪丧失)和佛兰德所进行的战争。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法王菲力浦四世的外孙)要求继承法国王位,于1337年11月对法宣战。战争初期英国于1340年在斯列伊萨、1346年在克雷西和1356年在普瓦捷都取得了胜利。1360年双方缔结布雷蒂尼和约,法国大片领土划归英国,14世纪60年代末法国军队接连发动攻势,至70年代,英国人几乎全部被赶出法国。英国在1415年阿赞库尔大捷以后,又侵入法国北部。1429年以贞德为首的法军反抗英国侵略者,解除了奥尔良之围。百年战争以英国1453年在波尔多投降而告终。——151。

154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引起的。德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51。

155 马克思于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用英文拟写的这份决议草案,是他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报告结尾部分的手稿,决议草案的最后定稿见本卷第212页。——153。

156 这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用英文作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委员约·韦斯顿在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并由此作出工会“有害”的结论。马克思遂于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写成这篇报告,报告中不仅揭穿了商品价格取决于工资水平这一虚假理论,而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关键问题。

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标题,开头写着:“1865年6月20日星期二向总委员会宣读”。全文由作者用阿拉伯数字分为十四节。这篇报告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过。因为他担心发表这篇报告,会过早地挪用他当时正在紧张写作的《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原理。1898

- 年,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以《价值、价格和利润》为题首次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艾威林写的序。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是没有标题的,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在本卷中,除了总标题以外,这些小标题都保留下来了。这篇报告的德译文发表在1898年《新时代》第6年卷第2册,由伯恩施坦翻译的德译文用的标题是《工资、价格和利润》。——155。
- 157 关于在协会帮助下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的问题、缩短工作日以及女工和童工等问题已经列入1865年9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见本卷第505—507页)。——157。
- 158 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出典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贫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163。
- 159 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指法国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1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的固定的最高价格。——167。
- 160 马克思在这里错把纽马奇写成纽曼。1861年9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次会议,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作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威·纽马奇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167。
- 161 英国经济学家托·图克的《价格史》指他的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39年》1840年伦敦版和《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1857年伦敦版,共两卷,是《价格史》的第5—6

卷。——167。

- 162 19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和伴随着相对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的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居住在他的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在加剧大批拆毁农村住宅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的、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在《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5节e中也有关于农业工人住宅被毁的描述。——168。
- 163 技艺协会即技艺和手工业协会,它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它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169。
- 164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于1815年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更迅速的发展。——169、580。
- 165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有魁奈和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反对重商主义的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它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

资本主义生产作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惟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185。

166 指 1770 年在伦敦出版的《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这本匿名的书被认为是约·肯宁安的作品。——203。

167 习艺所是依据 1834 年英国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令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是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它所采取的制度与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参看恩格斯 1844 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203、352。

168 1832 年 2—3 月,英国议会对 1831 年中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的法案(见注 8)进行辩论时,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认为童工的工作日应为 12 小时。——203。

169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204。

170 济贫法(Poor laws)是英国 1601 年颁布的,它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不能维持自己和自己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以后济贫法经过不断修改。

1834 年通过的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 167)。——208、352。

171 指 1865 年 9 月 25—29 日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这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见注 14)的预备会议。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各支部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代表会议听取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和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排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终于把恢复

波兰的独立这一要求列入代表大会议程。由马克思领导筹备和举行的伦敦代表会议在国际的建立和健全组织的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213、216。

- 172 马克思认为拟定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十分重要。他把讨论并通过大会议程看作是由他倡议于1865年9月25—29日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见注171)的最主要任务。可能在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用法文拟写了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草稿,他将中央委员会建议的所有议题都列入议程,并参考巴黎和日内瓦代表的几点建议作了补充。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代表在1865年9月26和27日的会议上讨论了6月20日的议程草稿。伦敦代表会议之后,马克思受托根据会议记录对议程草稿进行校订整理,他将会议通过的12项议程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大约于1865年11月20日写出这份议程。1866年在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再次对大会议程作了审校(见本卷第260—261页),并在此基础上为参加大会的代表写了《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本卷第265—277页)。——214。
- 173 这份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1月16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是马克思记在单独的一张纸上的。它在文字上与收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中的由克里默执笔的记录有所不同。该记录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216。
- 174 芬尼运动是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它以詹·斯蒂芬斯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即爱尔兰共和革命兄弟会)为核心。该组织于19世纪50年代末先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不久即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的古爱尔兰语 Fiann,是传说中爱尔兰古代英雄芬恩·麦库尔统帅的武装民团的名称。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即自称芬尼社。芬尼运动的宗旨为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废除大地主所有制、建立共和国。芬尼社曾广泛活动于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等地。

1865年,芬尼社社员准备了武装起义,但是他们的密谋活动没有成功。在同年9月,英国政府逮捕了芬尼运动的首脑(卢比、奥利里、奥顿诺凡-罗萨),芬尼社的报纸被查封,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在英国掀起的声援被判罪的芬尼社社员的运动,得到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1866

和 1870 年芬尼社社员曾两度从美国进攻加拿大,企图挑起国际冲突,从而为爱尔兰解放创造有利条件,1867 年 3 月芬尼社发动武装起义,遭英国政府镇压。由于芬尼社领导内部的分歧和英、美政府的镇压,这一运动在 19 世纪 70 年代后即迅速衰落。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芬尼运动的弱点,批评芬尼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运动共同行动的道路。——216、321、341、462、528。

175 指庆祝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三周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国际工人协会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倡议,于 1866 年 1 月 22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对波兰的解放事业予以援助的决议。该决议由福克斯提出,得到马克思的赞同。——217。

176 在 1866 年 1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约·韦斯顿建议开始讨论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并由马克思整理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内容以后,马克思提出了本决议。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本决议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 年莫斯科版。——218。

177 这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于 1866 年 1 月底—4 月 6 日之间写成的。1865 年 9 月,伦敦代表会议(见注 171)期间,中央委员会围绕把波兰独立的问题列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决议,展开了一场争论。文章在阐明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时,既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又揭露了波拿巴集团的所谓“民族原则”(见注 182)的反动本质。

在完成这三篇文章之后,恩格斯本打算就同一问题再写几篇文章(见恩格斯 1866 年 5 月 1 日给马克思的信),但是,《共和国》周报编辑部发表了反对这组文章的声明使恩格斯感到不快(见恩格斯 1866 年 5 月 25 日给马克思的信),而且从 5 月起又接连发生了几起导致 1866 年普奥战争的事件。恩格斯就中止了这组文章的写作。

这三篇文章于 1866 年 3 月 24、31 日和 5 月 5 日发表在《共和国》周报第 159、160 和 165 期,1895 年 7 月用波兰文发表在《黎明》杂志第 7 期上。——219。

- 178 1848年5月15日巴黎民众在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等人领导下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口号是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革命运动。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主要是革命俱乐部的成员和工人。游行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争取独立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由于这些要求遭到拒绝,游行曾企图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新的临时政府,然而他们被用武力驱散了。——219。
- 179 这里指的是德国民主派报刊和工人报刊,首先是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的、由马克思编辑的日报《新莱茵报》。作为民主运动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坚决支持波兰的独立,把波兰的解放和推翻俄国的反动沙皇制度联系起来,后者在当时是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220。
- 180 指1830年11月—1831年10月发生在华沙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1830年,法国发生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首都华沙之后,居民、青年和军队充满革命激情。俄国沙皇却在此时下达了对波兰军队的动员令,要波兰军队和俄国军队一起开赴西欧去镇压革命运动。11月29日夜,一批青年军官和学生发动起义,袭击了俄国派驻波兰王国的总司令康斯坦丁大公的官邸。大公惶惶出逃,起义军在爱国市民的配合下于次日解放了华沙。1831年1月波兰议会宣布取消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波兰王位,成立民族政府。2月俄国派出大军镇压起义。同年9月8日,华沙重又陷于俄军之手,起义失败。——220、282。
- 181 指1846年2月波兰民族解放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有在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220。
- 182 “民族原则”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年)统治集团为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而提出的。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

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它的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沙皇俄国的外交也利用这个原则来扩大沙皇在巴尔干,在中欧各斯拉夫民族中的影响。对欧洲国家当权派蛊惑人心地利用“民族原则”的行为的揭露,除本文外,还可参看马克思在1860年撰写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220、223。

- 183 指1864年3—7月在《人民论坛报》上连续刊载的、蒲鲁东主义者埃·德尼的一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中的观点,以及1865年12月16和18日《韦尔维耶回声报》第293、294号上的匿名文章中对中央委员会的责难(见注350)。——221。
- 184 1815年条约即维也纳条约。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代表和复辟的波旁王朝代表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了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根据1815年条约的规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好望角与锡兰殖民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维也纳会议决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223。
- 185 1821—1823年意大利的革命尝试指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根据1815年维也纳条约(见注184)的规定,在意大利那些原来依附于拿破仑法国的王国里都复辟了封建专制制度;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被划归奥地利。19世纪初意大利建立了一个由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烧炭党,其宗旨为争取意大利独立,推翻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1817—1831年间烧炭党曾在意大利多次发动起义。其中只有1820年那不勒斯起义获得成功,一度迫使国王斐迪南一世颁布宪法。1821年3月4日皮埃蒙特起义于当年4月初被镇压。1821—1823年起义被反动派和奥地利军队联合镇压。

- 1821—1823年西班牙的革命尝试指西班牙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斐迪南七世复辟后,废除《1812年宪法》和加的斯议会的一切改革法令,恢复专制制度,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1820年1月,列戈-努涅斯领导加的斯起义,掀起全国革命高潮。3月恢复《1812年宪法》,任命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化贵族利益的温和派自由党人组成政府。1822年8月,政权转入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派手中。1823年4月,法国军队根据神圣同盟条约侵入西班牙镇压革命,5月革命失败,斐迪南七世复辟,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一切法令。——223。
- 186** 指“青年欧洲”,它是各国政治流亡者组织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34年在瑞士成立,1836年解散。“青年欧洲”由“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民族组织组成,其宗旨是为民族统一、民族独立和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而斗争。——223、526。
- 187** 1848年,在巴黎二月革命和维也纳三月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首都佩斯于3月15日举行起义,提出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的十二条要求。奥皇被迫同意成立以自由派贵族为领导的匈牙利民族政府。奥地利皇室在镇压了维也纳十月起义后,于1849年1月攻陷佩斯,3月14日在新宪法中把匈牙利变为奥地利的一个行省。4月,匈牙利革命力量重新集结,击败奥军后,匈牙利国民议会宣布匈牙利独立,科苏特当选为国家元首。5月底奥地利向俄国求援,奥俄联军于1849年8月镇压了革命。匈牙利丧失了一切宪法权利,10月重新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个行省。——223。
- 188** 恩格斯对于小民族历史命运的观点是:小民族通常缺乏独立的民族生存的能力,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更大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吞并。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集中化和建立大国的趋向,却没有涉及另一趋向,即小民族为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进行斗争,它们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小民族也能独立治理自己的国家。——226。
- 189** 1385年波兰立陶宛两国缔结联盟条约,共同反击条顿骑士团的侵略。该条约为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奠定了基础。——228。
- 190** 1605年6月—1606年5月波兰军队曾占领莫斯科,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1610年9月波兰军队再次进入莫斯科,夺取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王

位。直到 1612 年 10 月莫斯科被人民自卫团解放为止。——229。

- 191 合并派希腊正教是从希腊正教会(亦称东正教会)分离出来的,其正式名称为东仪天主教会(Eastern Rite Catholic Churches)。合并派希腊正教徒承认罗马教皇的首脑地位,但继续保持原有的东派传统礼仪和典制,而不受拉丁语系天主教会礼仪和规章的约束。主教自行祝圣,不由教皇任命。——230。
- 19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本是 1864 年普奥结盟进攻丹麦而夺得的两个相连的地区。石勒苏益格由普鲁士占领,荷尔斯泰因由奥地利占领。夺取荷尔斯泰因也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的目标之一。意大利为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地区,在这场战争中加入了普鲁士一方。根据普奥战争后签订的布拉格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归属于普鲁士。威尼斯地区重新合并于意大利。俄国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了中立。波兰并未遭到重新分割。——232。
- 193 《警告》是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针对当时把德国和丹麦的裁缝帮工输入苏格兰破坏工人运动的事件而写的呼吁书。恩格斯在 1866 年 5 月 1 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有 57 名德国裁缝帮工被运到爱丁堡,估计还有几批工人要运来。同一天,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列斯纳在会上说,伦敦的企业主也想利用从德国运来的工人。因此伦敦的德国裁缝帮工成立了以列斯纳和豪弗为首的委员会(见注 194),决定同中央委员会联合行动,以粉碎企业主及其在德国的代理人的计划。中央委员会派出两名代表前往爱丁堡,说服外来工人废除了合同并返回祖国。

列斯纳和豪弗应马克思的请求于 5 月 3 日给他寄去了关于爱丁堡事件的详细材料。马克思在 5 月 4 日写的《警告》刊登在下列报纸上:1866 年 5 月 13 日《德意志工人总汇报》第 176 号、1866 年 5 月 13 日《下莱茵信使报》第 57 号、1866 年 5 月 15 日《上莱茵信使报》第 113 号、1866 年 5 月《工人报》第 1 年卷第 5 期和 1866 年 8 月 10 日《中德意志人民报》第 184 号。

与此同时,列斯纳和豪弗在伦敦散发了传单,阐明伦敦德国裁缝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并向伦敦的德国工人发出捐款的号召。1866 年 7 月,委员会散发了由列斯纳和豪弗署名的致德国裁缝帮工的第二批传

单。——233。

- 194 指伦敦裁缝帮工开始罢工后于1866年3月在伦敦成立的联合会。马·劳伦斯任主席。这个联合会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它同中央委员会一道胜利地领导了裁缝帮工的罢工斗争；1866年4月该联合会加入了国际。裁缝代表劳伦斯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工作。——233。
- 195 中央委员会根据它1866年3月27日会议的决定，向欧洲大陆有关国家的裁缝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拒绝应招去英国。警告刊登在1866年4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报》第5期、4月《先驱》（日内瓦）第4期、4月15日《左岸》第15期、4月22日《人民论坛报》（布鲁塞尔）第16号。——233。
- 196 这组题为《德国战争短评》的文章是恩格斯于1866年6月18日—7月5日之间写出的1866年普奥战争的评述。这次战争结束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多年的争雄局面，基本上完成了德意志在普鲁士霸权下的统一。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的有德意志的几个邦（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普鲁士则和意大利结成了同盟。军事行动于6月和7月在波希米亚境内和意大利境内同时展开。奥军于7月3日在萨多瓦（见注205）惨败之后，奥地利便开始议和，最后于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把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权利让给普鲁士，偿付了一笔不大的赔款，并把威尼斯地区交给意大利王国；早在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见注184）建立的、联合着三十多个德意志邦的德意志联邦就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在普鲁士领导下没有奥地利参加的北德意志联邦。由于这次战争，普鲁士吞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自由市。

这一组文章载于1866年6月20日—7月6日期间的《曼彻斯特卫报》第6190、6194、6197、6201和6204号。本文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235、462。

- 197 四边形要塞区又称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是意大利北部维罗纳、莱尼亚戈、曼图亚和佩斯基耶拉四个要塞组成的极为坚固的筑垒阵地。在19世纪战争中，四边形要塞区作为军队作战的基地曾起过很大作用。1848年革命以后，控制这个要塞区的奥军按照当时战术的要求改建了这群要塞。——237、247。

- 198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94)期间奥地利军队的两次失败。一次是 1859 年 6 月 4 日的马真塔会战,一次是同年 6 月 24 日的索尔费里诺会战。关于这些会战中的战术详见恩格斯 1859 年写的文章《意大利战争》、《马真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等。——239。
- 199 库斯托扎会战是普奥战争(见注 196)在意大利境内发生的一场战役。1866 年 6 月 24 日,8 万奥地利陆军在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率领下击溃了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统率的 12 万意大利陆军。——247。
- 200 1796—1797 年波拿巴对意大利远征时期,1796 年 7 月 29 日和 8 月 5 日在洛纳托会战和斯蒂维耶雷堡会战(在北意大利)中,法国军队打败了武尔姆泽尔元帅指挥的奥地利军队。——248。
- 201 1859 年 6 月 24 日的索尔费里诺会战是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94)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军使奥军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248。
- 202 指意大利独立战争期间于 1848 年 7 月 23—25 日这三天里发生的库斯托扎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拉德茨基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击败了皮埃蒙特军队。——248。
- 203 千人团指 1860 年参加朱·加里波第统领的远征的一千多名战士。这次谋求意大利民族独立及统一的远征推翻了西西里(那不勒斯)王国波旁王朝,实现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与北意大利的统一。——251。
- 204 1866 年普奥战争初期普鲁士军队占领西北部的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萨克森,这些小邦的君主都被驱逐出境。——254。
- 205 指普奥战争中的萨多瓦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会战。1866 年 7 月 3 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在克尼格雷茨城(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韦)附近离萨多瓦村不远的地方遭遇。在战斗中奥军曾有被包围的危险。但是普军司令官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错过了时机,使奥军得以渡过易北河向奥尔米茨退却。萨多瓦会战中奥军遭到惨败,从而决定了普奥战争的结局。——258。
- 206 利尼会战是 1815 年 6 月 16 日拿破仑的军队和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在利尼(比利时境内)附近进行的会战。普鲁士军队在会战

中失败。普军虽然战败,但布吕歇尔率领他的军队摆脱了法军的追击,与在滑铁卢和法军主力进行激战的英荷联军会合。6月18日,本已胜利在望的法军,因30000普军的来到终于失败。滑铁卢战役是拿破仑第一与反法同盟进行的最后一次会战。拿破仑第一于6月22日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告终。——259。

- 207 1866年夏,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在筹备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212)期间打算由马克思主持出版协会成立的文献的标准法文文本,因此,马克思再次审校了1865年经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并由他校订整理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见本卷第214—215页)。为了使议程能同协会成立的文献一起发表,马克思大概于6月底完成了审校工作。再次审校后的这份大会议程内容与1865年的完全一致,只是不再分为四个部分,对个别文字作了改动。它发表在1866年7月8日《左岸》第27期。

1866年7月31日,马克思受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之托,作了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报告,他建议将他在6月底审校的这份议程的顺序改变一下,将第12条与第1条合并,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在起草《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本卷第265—277页)时,他只是将大会议程的第5和6条顺序互换了。——260。

- 208 本决议是马克思和克里默就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一事提出的建议,经1866年7月2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吸收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国际,必将加快意大利工人摆脱马志尼派影响的过程。但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没有派代表参加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262。

- 209 本建议是马克思在1866年7月3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263。

- 210 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所流传的代表大会议程同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通过并由马克思整理的文本(见本卷第202—203页)有出入。因此,马克思在1866年夏主持出版作为国际主要文件的依据的法文文本时,再次对代表大会议程文本进行了整理,作为议程的正式文本即本文所说的“用法文公布的议程”(见本卷第260页)与

上述文件同在一本小册子里刊印。1866年7月31日马克思受常务委员会委托就代表大会议程问题向中央委员会做报告时,建议把上述议程正式文本中的最后一项,即关于建立互助会和帮助协会会员遗孤问题的第十二条合并于第一条之中。后来,马克思在写《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时就这么做了(见本卷第265—277页)。——263。

211 这个调查大纲是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的大纲之一。这个大纲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后收入《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本卷第265—277页)。总委员会成员欧·杜邦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就此作了报告。——263。

212 这是马克思1866年8月底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写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这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中央委员会曾在1866年7月17日的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详细制定和讨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的议程。7月31日,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就议程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稍后马克思用英文整理出来(见本卷第263—264页),并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

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共有60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指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曾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份《指示》,他们在一份专门的意见书中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纲领。马克思提出的《指示》共有9点,其中作为大会决议通过的有以下6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限制工作日、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合作劳动、工会、常备军。关于波兰问题,通过了约·菲·贝克尔的折衷性的决议草案。日内瓦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

《指示》和有关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其他报告及文件第一次用德文收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载于1866年10和11月《先驱》(日内瓦)第10和11期;后用英文发表在1867年2月20日和3月13日《国际信使》第6—7号和第8—10号,以及1867年3月1日和4月6日《工人报》(伦敦);用法文发表在1867年3月9和16日《国际信使》第8—11号上。在此之后,该文件还被国际的其他新闻报刊全部或部分转载。《指

示)中的要点(以大会决议形式)收入威·艾希霍夫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8年柏林版和《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1868年》1869年伦敦版。——265。

- 213 马克思建议的工人阶级状况统计调查大纲(见注 211)为日内瓦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但由于中央委员会经费不足和地方组织对此事的疏忽,难以完成统计资料的搜集并将其以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形式予以出版。在协会的以后几次代表大会——1867年的洛桑代表大会、1868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都提到了实行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工人统计的决议的必要性,1871年的伦敦代表会议把《指示》第二点中的(c)项全部写入协会的组织条例。——267。
- 214 美国内战(见注 5)结束后,美国国内争取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加强了。全国成立了许多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联盟。全国劳工同盟(见注 322)在1866年8月召开的巴尔的摩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是把劳动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条件。——268。
- 215 “最近的政治运动”指英国1865—1867年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一般民主运动。

根据国际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与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法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会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某些住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会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改革同盟领导层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动摇,由于工会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中央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

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73、299、477、528。

216 在美国内战(见注 5)期间,美国工会积极支援北部各州与奴隶主斗争;1864 年春工会曾起来反对反动的哈斯丁-福尔杰罢工法案。——273。

217 见《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告。代表会议于 1866 年 7 月 17 日及其后四天在设菲尔德举行》1866 年设菲尔德版。1866 年 7 月 17—21 日英国工会在设菲尔德举行了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 138 位代表代表 20 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问题,曾专门开过几次会,会议作出这项号召各工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273。

218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 1815 年 9 月 26 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 年亚琛会议,1820—1821 年特罗保会议,1821 年 5 月莱巴赫会议和 1822 年的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 1820—1821 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 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276。

219 这个决议是马克思在 1866 年 9 月 18 日总委员会(它作为根据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共同章程正式任命的中央委员会行使职能)会议上提交并获得通过的。这次会议听取了参加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 212)总委员会的代表们关于大会工作和结果的报告。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代表有詹·卡特、乔·奥哲尔、约·格·埃卡留斯、海·荣克,还有代表伦敦法国人支部的欧·杜邦,代表伦敦裁缝协会的马·劳伦斯和代表伦敦粗木工联合会的威·兰·克里默等。——278。

220 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 9 月 3—8 日)上讨论、批准章程时,

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企图让代表们接受如下观点：不仅担任工人组织领导职务的人，而且工人组织的成员都必须是工人。大会后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马·劳伦斯反对这种观点，提议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但是马克思拒绝当候选人。——279。

- 221 不委任常务主席的建议是总委员会委员约·黑尔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在1867年9月24日的会议上提出的。马克思在1867年10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有人提出要连选奥哲尔之后，根据我的提议，废除了主席一职”。英国工联首领奥哲尔从1864年以来一直担任常务主席的职务。为削弱工联在国际中的影响，马克思提议废除这一职务，总委员会一致决定不再委任常务主席。——280。

- 222 本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1867年1月22日于伦敦召开的波兰会议一开始提出来的（见注223）。1867年2月10日《自由之声》第130号在刊登马克思的大会演说词时提到了本文的这句话。——281。

- 223 马克思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剑桥大厅举行的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4周年的大会上发表的这篇英文演说，最早于1867年1月7日开始起草，最迟于1月22日完成。这次会议是国际总委员会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共同组织的。马克思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1867年3月12日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对总委员会组织这次大会和马克思以及其他演讲人所作的报告表示感谢。

1867年1月31日和2月10日波兰文报纸《自由之声》第129、130号对大会作了详细报道。刊登马克思演说波兰译文的第130号《自由之声》报编辑部在按语中说：“本报一字不易地刊登了这篇以观察精湛缜密、结论合乎逻辑而见称的演说。”此外，该报编辑部在这篇演说前面加了一段话：“大会一开始，德国人马克思博士就提出了一项简短但意义极为重大的决议草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见第281页）

演说的英文草稿可能曾保存在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处，她把手稿交给《社会主义报》，该报编辑部将它译成法文发表在1908年3月15日第18号。据《社会主义报》编辑部说，手稿带有草稿的性质，没有注明日期；其中有几个段落被马克思划掉了。对比演说的波兰译文和法译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手稿上划掉的段落并非在发表演说时要删除的，只是次序有所变动。英文原稿和波兰译文除上述的位置挪动和正文的

细微改动之外,几乎每个字都一样。

本卷收入的演说是根据英文原稿译出的。——282。

- 224 指1848年7月6日涅谢尔罗德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的大使们的通告。马克思在《俄国的照会》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个通告。——283。
- 225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又称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7月24—26日讨论了多项涉及波兰问题的提案。在7月27日的辩论中通过记名投票,以331对101票否决了下面的提案:“国民议会能否宣布瓜分波兰是可耻的错误行动,并承认德国人民有援助重建独立的波兰的神圣义务?”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莱比锡版第2卷第1242页。
- 恩格斯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中,详细批判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283。
- 226 1863—1864年波兰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颁布了几项法律,旨在消除波兰王国的民族传统和仅剩的一点自治权利。教育、财政和司法部门以及邮政和通讯业务,从1867年1月1日起,均由圣彼得堡相应的各部监管。行政管理部门从5个增加到10个,并且和俄国的行政区域属于同一级别。——284。
- 227 1866年11月4日英国和荷兰与俄国签署协议,以5%的利息向俄国提供600万英镑的贷款。参见马克思《1866年格莱斯顿先生给英格兰银行的信怎样使俄国得到了六百万英镑的公债》。——284。
- 228 会议波兰即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184)决定所并吞的波兰领土。——285。
- 229 1466年,控制着普鲁士的宗教军事组织条顿骑士团被波兰击败。双方签订了托伦和约,规定西普鲁士归属波兰,东普鲁士仍为该骑士团领地,但臣服于波兰。——286。
- 230 这里套用了法国作家雨果的话。1851年7月17日,雨果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说时说道:“这些人在我们这个光明自由的年代,总是带着吓人的、起码是可笑的绝望表情对着北方;每当我们讲到自由、人道、民主、进步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就惊恐地匍匐在地,把耳朵贴在地上,倾听俄国的大炮是否终于打了过来。”——287。

- 231 马克思于1867年2月18日把这份辟谣声明寄给在汉诺威的路·库格曼,请他设法刊登在当地报纸《北德报》或任何其他的地方报上。当时,马克思急需刊登这个辟谣声明,因为再过几个星期马克思要动身到德国去,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带给奥·迈斯纳,并和他商谈该书的出版事宜。

《北德报》接到马克思的声明之后,于1867年2月21日第5527号刊登了如下一则简讯:“据卡尔·马克思先生从伦敦寄给我们的声明,英国报纸所传他打算积极参与在波兰即将爆发的起义的筹划并准备为着这个目的周游大陆各国的消息(见《北德报》第5522号),纯系杜撰。”

辟谣声明第一次发表于1901—1902年《新时代》第20年卷第3期(第2卷)第92页。——288。

- 232 《瑞典和丹麦旅行札记》是恩格斯1867年7月游历这两个国家时于7月6—18日写的。

恩格斯1867年6月26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旅游计划时说:“我打算一星期以后和莉希经过格里姆斯比去汉堡、石勒苏益格和哥本哈根等地”。保存下来的恩格斯在旅馆账单、轮船票和其他旅行文件上做的记载,使我们得以准确地知道他旅行的路线和在各地停留的时间。恩格斯偕夫人莉迪娅·白恩士7月9日在哥德堡停留,7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14日在马尔默,18日在哥本哈根,20日已经是在德国的弗伦斯堡了。1867年8月初恩格斯返回曼彻斯特。

《札记》是惟一保存下来的1867年6月26日—8月10日期间恩格斯的文献(恩格斯这段时间的书信至今没有发现)。这份手稿无论作为恩格斯对斯堪的那维亚诸国生活的观察还是作为他的传记资料都很有意义。保存下来的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写在三张单页纸上的,在其中一张较大的纸上还附有要塞平面图(显然是文中提到的卡尔斯堡),这张平面图为恩格斯亲手所画,并有文字说明(本卷作为插图刊于第291页)。

《札记》第一次发表在恩格斯《旅行记》1966年柏林版。——289。

- 233 暗指1848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丹麦和普鲁士的代表在马尔默进行缔结两国单独停战协定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见恩格斯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和丹麦的休战》、《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294。

- 234 1867年6月4日,正值筹办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之际,总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一份呼吁书。在7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这份呼吁书时,马克思就大会日程的第一项提出了建议,这项建议被写进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见本卷第298—301页)。
- 第二项决议是马克思在7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它针对的是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在1867年7月20日《法兰西信使报》第33号上向所有工人团体发出的呼吁书。巴黎支部在他们的呼吁书中撇开总委员会,对即将召开的洛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充满蒲鲁东主义味的议程。——296。
- 235 这份用法文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最初是1867年6月4日由总委员会指定的委员会用英文写的,在7月9日的会议上讨论通过。会议决定把呼吁书首先译成法文,因为巴黎各支部的蒲鲁东主义的领导人背着总委员会制定了自已的代表大会议程。拉法格受托把呼吁书译成法文。1867年7月10—13日马克思对译出的法文本呼吁书进行校订,它与英文本有很大的区别。1867年7月它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印发,标题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书》。致会员、各所属团体和全体工人),并且在1867年7月30日《国际信使》第28—29期,1867年8月4日《未来呼声报》第31期和1867年8月31日《人民论坛报》第8号等许多报刊上转载。由约·菲·贝克尔从法文译成德文的呼吁书被收入1867年夏在日内瓦印发的小册子《邀请参加9月2—8日在洛桑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来又被转登在1867年8月《先驱》第8期上。——298。
- 236 马谢讷大屠杀指1867年2月在马谢讷枪杀比利时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事件。3月13日《国际信使》发表了总委员会的呼吁书,抗议这次大屠杀,并号召英国矿工和冶金工人援助死者遗属和受伤者。——298、575。
- 237 指1867年2—3月间发生的巴黎铜匠和裁缝的罢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为支援这一行动在英国工人中为他们募集资金,使他们成功地让雇主实行了固定工资额。——298、575。
- 238 对工联的调查是由于工会日益活跃而引起的。英国统治阶级于1867年2月12日任命了皇家英国工联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目的是借口某些犯法行为来宣布工联为非法,并且建议制定限制和禁止工会及其他

联合会的新规章。为了对付政府的这个措施,工联在全国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并于1867年3月5—6日在伦敦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皇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没能对工联提起控诉。——299。

- 239 这一决议草案是马克思在1867年8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问题作了发言(见本卷第552—553页)之后提出来的。本决议草案发表在1867年8月17日《蜂房报》第305号。总委员会记录本中的决议草案是从这份《蜂房报》剪下贴入的。

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和平和自由同盟成立大会原定于1867年9月5日在日内瓦召开。同盟组织委员会谋取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领导人(约·斯·穆勒、勒克律兄弟和其他人)的支持,它还期望欧洲无产阶级及其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同盟的工作。该委员会因此邀请了国际各支部及其领导人参加大会,其中包括马克思。同时还决定将大会开幕延期至9月9日,以便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9月2—8日)的代表可以参加。

国际总委员会和地方支部都曾讨论过国际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态度。根据马克思1867年8月13日的发言以及他提出的决议草案的精神,国际总委员会决定不正式参加同盟的成立大会。但考虑到同盟争取和平的斗争的进步性,允许国际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大会。——302、485。

- 240 这篇摘记是马克思在1867年9月4日前不久,或4日用法文写的,发表在1867年9月6日《法兰西信使报》第81号第1版“新闻”栏。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9月2—8日)筹备工作期间致力于研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他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发言、报告等都涉及这一问题,并且强调了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必要

性(见本卷第 298—301、554—576 页)。马克思摘记的这段话采自柏林中央统计档案馆馆长奥·许布纳尔发表在 1867 年 8 月 25 日《未来报》第 198 号上的一篇声明,马克思认为这段论述是对德国阶级对立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303。

- 241 这篇评论是恩格斯为粉碎官方资产阶级学者以沉默来抵制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1867 年 9 月 14 日)的阴谋而写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

在《资本论》第 1 卷出版之前,正如恩格斯在 1867 年 9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写的,为了引起公众的关注,他考虑“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赞赏这个主意,并在 12 日的回信中称之为“最好的作战方法”。恩格斯给几家资产阶级报纸写的评论看似是一位和书的作者持不同观点的公正的资产阶级学者写的,而这位学者又不得不承认书的科学见解和价值。给《未来报》写的评论和其他的评论格调类似,正如恩格斯 1867 年 11 月 5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这是“最不得罪人”的一篇,这样写可以让任何一家报纸都能刊登它。在为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的报纸所写的评论中,恩格斯打算不加任何掩饰地介绍《资本论》的内容。

恩格斯这篇书评写于 1867 年 10 月 12 日。通过路·库格曼的帮助发表在 1867 年 10 月 30 日《未来报》第 254 号附刊上,没有署名。第二天,报纸的编辑吉·魏斯把评论的单行本交给了马克思。——304。

- 242 恩格斯在 1867 年 10 月 12 日除了为《未来报》写了评论外,还写了本篇评论。他同时将两篇评论寄给库格曼,以便在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库格曼想让它发表在《莱茵报》上,但是由于曾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该报编辑亨·毕尔格尔斯这时已成为自由主义者,他拒绝刊登这篇评论。评论的手稿保留了下来(丢失一页),1927 年首次用原文德文发表在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2 卷,同年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 4 期。——308。

- 243 指 1867 年 8 月 15 日通过的关于把工厂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新的工作部门的法律。另见注 8。——310。

- 244 恩格斯 1867 年 10 月 22 日写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 1867 年 11 月 2 日《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第 302 号上,没有署名。——313。

- 245 《西里西亚的十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在1849年3月22日—4月25日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上的一组文章,1886年出版单行本,内容略有改动,书前有恩格斯写的序言。该序言由《威廉·沃尔弗》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两篇文章组成。——313。
- 246 恩格斯1867年11月3—8日之间写的这篇评论,于11月9日就交给了当时正在利物浦逗留的卡·济贝耳(见恩格斯1867年11月8—1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通过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1867年11月16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316号上,没有署名。——316。
- 247 本文是马克思为救援囚禁于曼彻斯特被判死刑的芬尼社社员而用英文起草的致英国内务大臣格桑-哈第的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在1867年11月20日总委员会非常会议上通过。由于工联领导人的反对,英国工人报刊没有用英文发表这份请愿书。而是在1867年11月23日《蜂房报》第319号上刊登了一篇有关这次非常会议的报道,报道只对请愿书作了概括,并列举了签名的总委员会成员的名单。请愿书的法译文发表在1867年11月24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63号上。

1867年秋,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英国工人中发起了一场广泛的救援芬尼社社员(见注174)的运动,以支持芬尼社社员领导的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的这份请愿书就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芬尼社社员指从事芬尼运动(见注174)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参加者。1867年2—3月间,芬尼社社员长期准备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在各郡分散进行的零星发动遭到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并交法庭审判。9月18日,为了营救两名被捕的芬尼社领导人凯利和迪西,在曼彻斯特组织了对囚车的武装袭击。凯利和迪西逃跑成功,但在冲突中有一名警察被击毙。参加袭击囚车的五人(马圭尔、康登、拉金、艾伦和奥勃莱恩)当场被捕,他们被控杀害警察并被判处死刑。(马圭尔后来被赦免,康登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其余三人于1867年11月23日被处决。死刑的判决在爱尔兰和英国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浪潮。总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法国通讯书记杜邦参加了抗议活动,杜邦于1867年10月14日在巴黎报纸《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芬尼运动的文章。但是声援芬尼社社员的行动没有得到沾染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

观点的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支持。关于这一点,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10月23、30日和11月1日改革同盟委员会讨论谴责芬尼社社员为叛乱者的决议时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一个证明。马克思力求制定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统一策略并在英国工人中间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为此他坚持在总委员会中就爱尔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辩论时邀请爱尔兰和英国报界的代表出席。1867年11月19和26日进行了辩论(见本卷第321—328页)。

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手抄的该请愿书副本保存下来了,副本的文字和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的文字完全相同。——319。

- 248 暗指林肯总统在1863年和约翰逊总统在1865年对站在南部各州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的人实行的大赦。——319。
- 249 本文是马克思为1867年11月26日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问题时准备的发言提纲。写于11月19—26日之间。11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开始爱尔兰问题的讨论(见注247),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改在下次(11月26日)会议上进行。马克思准备在下次会议上发言。但是在会议前不久,在11月23日,三名被判罪的芬尼社社员(拉金、艾伦和奥勃莱恩)在曼彻斯特被处决。马克思认为,在处决使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这篇发言提纲已经不适用了。而且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由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出面对爱尔兰人表示同情并谴责英国政府的血腥行为更为合适,于是他改让彼·福克斯发言。马克思在1867年11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叙述了这次会议。以后,马克思在准备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中就爱尔兰问题作报告(1867年12月16日马克思所作的报告的提纲见本卷第322—339页,这一报告的记录见本卷第554—556页)时,利用了这一发言提纲和准备提纲时收集的材料。——321。
- 250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

在1641—1652年爱尔兰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被英国镇压以后,长期国会于1652年8月12日通过了处理爱尔兰法令(Act of Settlement,亦称

整顿法令)。法令从法律上巩固了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建立的血腥暴力和恐怖的统治制度,并且准许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大批地掠夺爱尔兰土地。根据这一法令,大多数的爱尔兰本地居民都犯有“暴乱罪”。“罪犯”中甚至包括那些虽然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是没有对英国表示应有的“忠诚”的爱尔兰人。被宣布为“罪犯”的人按参加起义的情节分成几类,分别受到残酷的镇压:判处死刑、驱逐出境、财产充公。1653年9月26日,对处理爱尔兰法令又补充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法令规定将财产被充公的爱尔兰人强迫移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克莱尔郡,并规定了一种制度:将充公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配给国会的债权人、英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这两个法令都巩固并扩大了英国大地主势力在爱尔兰的经济基础。——321、344、345。

- 251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是英国在1660年重新建立君主制后,于1679年5月27日由议会通过的。这项法令规定,未经法院授权,不准逮捕任何人。凡被捕者均可要求在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说明其被捕原因,否则应予释放。此外,多数被告有权在被起诉前交保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经常采取这种措施。——321。
- 252 1867年11月19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向议会致词时曾经用“暗杀和暴行”这几个字评价芬尼运动(见注174),马克思也就借用这几个字形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芬尼社社员的血腥政策。——322。
- 253 1840年,路易·波拿巴在布洛涅发动政变时,枪伤了一个政府军的军官。这一罪行未能阻止英国政府在1851年路易·波拿巴夺取政权后卑躬屈膝地承认波拿巴政权,而三名芬尼社社员仅仅因被怀疑在曼彻斯特袭击囚车时企图杀害一名警察就被送上绞架。见恩格斯1867年11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322。
- 254 谷地制(corn-acre system)是爱尔兰特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较大的租佃者——通常是投机中间人——将土地划成半英亩或一英亩的小块,以极苛刻的条件转租给最贫困的租佃者或雇农。18世纪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出租的小块土地种植谷类作物,谷地制即由此得名。——325、348、354。

- 255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见注164)引起了谷物价格的下跌(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粮食的需求减少),同时在爱尔兰对羊毛及其他畜产品的需求却增加了,这促使大地主和富有的农场主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畜牧业,结果,在19世纪中叶导致了把爱尔兰小租佃者大规模地逐出土地(“清地”)。——325。
- 256 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和苏格兰贵族用暴力夺取苏格兰高地居民(盖尔人)的土地。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评述见他的《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2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20—875页)。——326。
- 257 圆颅党(Roundhead)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保皇派对议会派的称呼,因为他们按清教徒的习惯剪短发,而不是像骑士党(王党)那样留长发。——326。
- 258 英国政府在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把英爱合并的法令强加给爱尔兰。合并法令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合并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臻于巩固。实行合并的后果之一是取消了18世纪末爱尔兰议会为维护新生的爱尔兰工业而制定的保护关税政策,导致爱尔兰的企业无法与英国工业竞争而纷纷破产,爱尔兰变成了英国的农业附属地。——326,580。
- 259 天主教徒解放运动是19世纪前几十年中争取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运动。从亨利八世以来英国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的政治权利就受到限制,即天主教徒不能被选入议会,不能担任国家职务。1823年,丹·奥康奈尔创立了爱尔兰天主教联合会,重新开始了争取天主教徒的政治平等权利的斗争。以后这种斗争在爱尔兰发展成为民族运动。1824年和1828年下院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两项关于取消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的法案,但上院予以否决。由于爱尔兰民族运动不断加强,罗·皮尔爵士于1829年3月递交的新的法案在上、下两院得到通过。天主教徒获得了被选为议会议员、能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但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却提高了四倍。英国统治阶级企图利用这种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奉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以便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326。

- 260 指改革同盟(见注 215)的领导人拒绝支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在 1867 年 11 月 1 日的改革同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资产阶级激进派提出的指摘芬尼运动的决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 1867 年 11 月讨论爱尔兰问题时,对改革同盟委员会的这一决议进行了严厉的谴责。——328。
- 261 拉萨尔分子霍夫施泰滕于 1867 年 11 月 24 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些段落,歪曲它们的意思,而且既不提及书名,也不提及作者。关于这次大会的详细报道刊登在 1867 年 11 月 29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9 号附刊上。
马克思于 1867 年 12 月 6 日针对霍夫施泰滕的发言写了这篇题为《剽窃》的文章,把它发表在 1867 年 12 月 12 日《未来报》第 291 号附刊上,没有署名。——329。
- 262 这段话引自 1866 年 9 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它是在马克思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本卷第 265—277 页)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334。
- 263 恩格斯在写这篇评论时不仅接受了马克思 1867 年 12 月 7 日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建议,即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观察家报》编辑卡·迈尔的反普鲁士情绪,而且在评论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利用了马克思信中的相关段落。本篇评论写于 1867 年 12 月 12—13 日,通过库格曼的介绍发表在 1867 年 12 月 27 日《观察家报》第 303 号上,没有署名。——335。
- 264 恩格斯 1867 年 12 月 12—13 日写的这篇评论,通过路·库格曼的介绍发表在 1867 年 12 月 27 日《符腾堡工商业报》第 306 号上,没有署名。
1868 年 7 月 4 日《汉诺威信使》第 4232 号附刊登载了这篇评论,应库格曼的要求,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介绍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该报又印发了 25 份评论的单行本。后来,这篇评论还在 1890 年 10 月 5 日《萨克森工人报》第 122 号上发表。——338。
- 265 新的关税同盟条约是 1865 年 5 月 16 日和 1867 年 7 月 8 日签订的。关税同盟是 1834 年 1 月 1 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德意志各邦的共同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以及这些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

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 1853 年恢复了关税同盟。1865 年新的关税同盟条约的目的在于鼓励自由贸易。1867 年北德意志联邦(见注 285)建立后,又与未加入关税同盟的德意志西南部诸邦签订关税同盟条约,规定了共同的关税措施和贸易措施。此后,关税同盟的中、小邦逐渐接受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的经济立法,实现了从保护贸易到自由贸易的转变。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 1871 年。——339。

- 266 这一提纲是马克思在 1867 年 12 月 16 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议上就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报告的基础。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伦敦许多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以及国际总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报告时间是一个半小时,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马克思被邀请就同一题目在伦敦其他的德国工人团体中作报告。尽管这个提纲相当详细,但它还是没有包含马克思所作报告的全部内容。

国际总委员会成员埃卡留斯认为这篇报告极为重要,他做了记录准备发表(见本卷第 579—581 页)。记录的副本寄给了《先驱》的编辑约·菲·贝克尔,但是没有发表。

提纲是马克思于 1867 年 12 月 16 日以前用德文和英文写的。它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16 卷。第一次用英文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爱尔兰和爱尔兰问题》1971 年莫斯科版。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又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 1840 年 2 月 7 日正义者同盟盟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作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从 50 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 1918 年为英国政府所查封。——341。

- 267 指反对克伦威尔的起义(1641—1652年),起义的起因是英国专制政体实行的、并且在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和“新兴的”贵族继续执行的殖民政策。大多数起义者是在被没收领地的克兰首领和天主教教士领导下的爱尔兰平民。参加起义的还有第一批英国征服者的后裔英格兰爱尔兰贵族(他们和爱尔兰克兰贵族结下亲缘关系并接受了很多爱尔兰风俗习惯)。1642年10月,起义者在基尔肯尼成立了爱尔兰联盟。联盟内部发生了分裂,一方是爱尔兰本土人,他们主张爱尔兰独立并且反对长期国会(见注250)和英国保皇派,另一方是英格兰爱尔兰贵族,他们试图以保持贵族地位并获得信奉天主教的自由为条件,和查理一世达成妥协。英格兰爱尔兰贵族曾占上风,并且和查理一世的代理人签订了协议。保皇派在英国失败后,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人奥·克伦威尔在搜捕保皇党人的借口下,组织了对爱尔兰的征讨,镇压了这次起义。——341。
- 268 指反对威廉三世的起义(1689—1691年),起义的起因是英国1688—1689年政变(即光荣革命)。这次政变推翻了詹姆斯二世,在英国建立了以奥伦治王朝的威廉三世为首的资产阶级贵族的立宪君主制。爱尔兰天主教贵族在不满殖民政权的群众的支持下,起义反对威廉三世。在保卫斯图亚特王朝的旗帜下,起义者为废除爱尔兰政治和宗教的不平等以及归还被没收的爱尔兰财产而斗争。被英国放逐躲在爱尔兰的詹姆斯二世企图利用爱尔兰运动夺回王位,并且曾正式领导起义,在起义者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承认了爱尔兰议会的独立。但是,起义者尽管进行了顽强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341。
- 269 爱尔兰1798年革命即1798年起义,它是受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而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组织这次起义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西·沃·汤恩、爱·菲茨杰拉德和其他人),他们于1791年在贝尔法斯特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爱尔兰人联合会”,宣称为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而战。然而,在起义前夜,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大部分领导人就被政府逮捕。起义于1798年5月23日爆发,持续到6月17日止。爆发起义的有爱尔兰东南部和北部的很多郡,尤其是韦克斯福德郡。大多数起义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1798年8月和9月在支援爱尔兰爱国者的一支法国部队登陆之后,起义扩展到康诺特省的很多地方。英国政府在

残酷镇压了起义之后,通过了英爱合并法令(见注 258)。——341。

- 270 这个礼物指的是罗马教皇阿德里安四世 1155 年左右颁布的一个训谕,赏赐英王亨利二世以爱尔兰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并且准许他在整顿宗教事务的借口下征服这一国家,作为交换条件,英王答应使爱尔兰教会服从罗马教皇。亨利二世就利用这一“礼物”,于 1171 年发动了对爱尔兰的征讨。

1576 年,由于信奉新教的英国和天主教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化,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宣布剥夺伊丽莎白女王的爱尔兰王位。——342。

- 271 佩耳(Pale,意为“栅栏”)是中世纪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的名称,这种殖民区是 12 世纪时英格兰诺曼封建主征服爱尔兰岛东南部以后建立的。征服者在殖民区的四周筑起了围栅(上述名称即由此而来),并利用它作为基地,对爱尔兰未被征服部分的居民不断发动战争,最后终于在 16—17 世纪征服了爱尔兰全国。——343。

- 272 “冒险家们”是 16 和 17 世纪对参与殖民掠夺和金融投机的,尤其是来自伦敦西蒂区的商人和银行家的称呼。他们因一家英国商业公司“商人冒险家公司”而得名。17 世纪中叶英国革命时期,这些“冒险家”借给议会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资助同保皇派的战争,以此交换没收来的爱尔兰土地。

“冒险家”中还有很多政治家、中上层阶级成员以及公务员。——343。

- 273 指 13 世纪末首次召集的英爱议会,最初由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区(佩耳)的大封建主和上层教士的代表组成。随着英国人的势力扩大到爱尔兰全岛,议会成为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属下的英格兰贵族和英格兰爱尔兰贵族的代表机构,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根据 1495 年颁布的法律,只有在皇家枢密院的准许之下,议会才能召开并通过法令。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实际上并无主动立法权的英爱议会,在长时期中只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工具。直到 18 世纪 80 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下,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同意扩大爱尔兰议会的权力。不过,自 1801 年实行英爱合并(见注 258)后,爱尔兰议会就被根本取消了。——344、345、579。

- 274 亚玛力人指古代生活在西奈半岛上的游牧部族。亚玛力人曾劫掠巴勒斯坦,并且囚禁当地居民。实际上,他们在公元前10世纪末至9世纪初就被消灭了。此处用“亚玛力人”喻指杀人越货的强盗。——344。
- 275 指利默里克投降协定。该协定于1691年10月由爱尔兰起义者和英国司令部的代表在爱尔兰利默里克郡签订并经英王威廉三世批准。根据协定,起义军在保持荣誉的条件下投降;士兵和军官有权就职国外或加入威廉三世的军队;允许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爱尔兰居民获得大赦,保留财产,并享有选举权及信仰自由等。利默里克协定签订几个月之前,戈尔韦等城市起义的守军投降时,也签订过类似的协定。这些协定中所规定的条件很快就为英国殖民者所破坏。——344。
- 276 在外地主源于 absentee(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345。
- 277 惩治法典(Penal Code 或 Penal Laws)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以反对天主教阴谋和反对英国国教的敌人作借口,对爱尔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剥夺了本地爱尔兰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这些法律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享有继承、接受和转让财产的权利,并且广泛采取因极小的一点过失就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做法,因而成为剥夺还保有土地的爱尔兰人的工具。惩治法典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规定了苛刻的租佃条件,更便于英国的大地主和土地中间人奴役他们。这一法典也企图消灭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封闭爱尔兰本民族的学校,对教师、爱尔兰天主教教士规定严厉的惩罚措施,禁止天主教徒参加选举、担任公职、占有土地、将罗马宗教文件传入英国、发表或出售天主教教义读本或担任教学职务等等。直至18世纪末,由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实施1791年的天主教宽容法令之后,惩治法典才被部分废除。——346、579。
- 278 罗马天主教徒补偿法案是在美国独立战争(见注20)期间美国军队于1777年10月在萨拉托加取得胜利后施行的,它说明英国政府不得不对爱尔兰作出的一系列让步,以及这一事件在英国的反应。爱尔兰人深恶痛绝的惩治法典中有些法令被废除了(1778年政府废除了禁止天主教徒从新教徒手中租种两英亩以上的土地,或同新教徒签订商业或信贷协定

- 的法律)。然而,天主教徒仍像以前一样被剥夺选举议员的权利。——347。
- 279** 自由地产是小地产的一种,这种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自由地产的所有者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在爱尔兰,自由地产的所有者主要是英国殖民者及其后裔。——347。
- 280** 茅舍贫农是对中世纪爱尔兰少地或无地农民的称呼。这样的农民在爱尔兰很难得到土地,他们被迫接受极为苛刻的条件租佃土地,为获得一小块土地和一间小屋(茅舍)而替大地主或富有的土地租佃者从事繁重的劳动。茅舍贫农的地位接近于农业短工。——349。
- 281**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见注164)。——350。
- 282** 取消合并运动是以取消1801年的英爱合并为口号的运动。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运动在爱尔兰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领导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促使英国政府作出些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奈尔和辉格党的领导人订立了利奇菲尔德府邸协定(谈判在伦敦的利奇菲尔德勋爵府邸中举行,故名),根据这一协定,辉格党允许给爱尔兰有产阶级一些特惠,奥康奈尔则答应在议会中支持辉格党人并促使爱尔兰的群众运动结束,作为交换条件。根据这一勾结,奥康奈尔及其追随者停止了取消合并的鼓动,但是在爱尔兰人民不满情绪高涨的影响下,他们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但是力图使这个协会向英国统治阶级妥协,协会在19世纪40年代末解散。——351。

- 283 恩格斯于1868年1月上半月写的这篇评论通过卡·济贝耳的介绍发表在1868年1月21日《新巴登报》第20号上,没有署名。——359。
- 284 恩格斯于1868年3月2—13日之间写的本篇评论不同于那些为资产阶级报纸写的《资本论》第1卷书评。它是为工人报纸而写,目的是向工人推荐马克思的这本书,并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性。
本篇评论发表在1868年3月21、28日《民主周报》第12、13期上,没有署名。后来在1871年4月5、8日《人民国家报》第28、29号上转载,评论的法译文刊登在1870年6月6、9日《自由报》(布鲁塞尔)第47、50号上。——362。
- 285 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使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368。
- 286 恩格斯1868年写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要》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内容只包括《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1版的前三分之二。恩格斯原来想利用它写文章和评论,可能的话编一本小册子来宣传马克思的书。但是他的计划未能实现。
《提要》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9年版第4卷,1933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用原文出版了单行本。——371。
- 287 《提要》中的章节标题是《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1版的章节标题,圆括号内的页码是恩格斯标出的同一版本的页码。《资本论》第1卷这一版全书分为六章,最后附有《第一册注释的增补》和《第一章第一节附录》。该书出版后,马克思不仅对其中的一些章节又作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并且改动了全书的结构。在1872年的德文第2版及以后的各版中,《资本论》第1卷分成了七篇共25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371。

- 288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意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390、433。
- 289 指后来的《资本论》第3卷,这一卷的主要手稿马克思写于1864—1865年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手稿进行了加工整理,于1894年出版。——397。
- 290 组织规程(Règlement organique)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两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贵族、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从而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1848—1849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取消。——398、443。
- 291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中作了考察。——406。
- 292 鲁德分子是指英国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即鲁德运动的参加者。鲁德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于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19。
- 293 马克思这篇短评是根据约·巴·施韦泽的要求(见马克思1868年5月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于1868年5月5—12日写成的。它曾发表在1868年5月16日《蜂房报》第344号关于1868年5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但是没有收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424。
- 294 恩格斯这篇《资本论》书评写于1868年5月22日—6月28日。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曾就这篇书评的内容和形式交换

意见。马克思提出的一些意见,甚至个别段落的表述方案都被恩格斯采纳了。恩格斯原计划书评至少要包括两篇文章。他于6月28日完成第一篇,并将它交给好友赛·穆尔律师(后来《资本论》的英文译者)过目,以便将书评用穆尔的名字寄出发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来希望通过爱·比斯利的关系将书评发表在《双周评论》上,但是,该杂志的自由派编辑约·莫利拒绝发表,故此恩格斯没有再写第二篇书评。书评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第1期。——426。

- 295 “通货论者”指所谓“通货学派”或“通货原理”的拥护者。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cy theory)是19世纪30—50年代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德(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他们除了金属货币以外,还把银行券算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的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1844年和1845年的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果,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资本论》第3卷第26、28章中也有对通货原理的评介。——426。
- 29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72年德文第2版中把《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1版中的第1章改为第1篇,其中包括3章。——427。
- 297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是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439。
- 298 大宪章(Magna 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 Charta Libertatum),它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英国大封建主和大主教强加给英王“无地王约翰”的。这个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无地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权力,首先使大封建主和贵族获得了好处,甚至规定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大宪章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也作了某些让步,但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任何权利。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

律。——446。

- 299 在国际 1867 年洛桑代表大会上曾确定 1868 年度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地点为布鲁塞尔,1868 年 2 月 24 日总委员会敦促各支部就代表大会的议程进行准备。但是,当年 5 月 16 日比利时司法大臣茹·巴拉在下院宣布不许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并要求议员们将 1835 年的外侨法(见注 300)的有效期延长。根据该法,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受到政治可疑的指控而被驱逐出境。因此,马克思在 5 月 26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不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会后,马克思起草了本决议草案。在 6 月 2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由于马克思已赴曼彻斯特看望恩格斯,决议草案由荣克宣读。这个决议草案由埃卡留斯记在总委员会 1868 年 6 月 2 日的会议记录中,并于 1868 年 6 月 6 日《蜂房报》第 347 号发表。

巴拉的禁令和延长外侨法的有效期的做法,在比利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国际布鲁塞尔支部向司法大臣提出抗议,抗议书载于 1868 年 5 月 24 日《人民论坛报》第 5 号。

布鲁塞尔支部的领导人德巴普和万丹胡亨写信给总委员会,建议不要对政府让步,因为这一让步将使国际在比利时的继续存在受到威胁。总委员会接到这封信后在 6 月 16 日的会议上撤销了 6 月 2 日的决议草案,决定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仍旧是布鲁塞尔。——451。

- 300 指比利时 1835 年 9 月 22 日通过的每三年延长一次的外侨法。尽管新闻界和公众普遍抗议,外侨法于 1865 年 6 月底还是获准延期。1868 年 5 月,比利时政府由于害怕新的群众行动,未经下院讨论就将外侨法的有效期延长了三年。——451、464、506。
- 301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66)和其他流亡者组织当时每年都举行纪念 1848 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群众集会。1868 年 6 月 29 日在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这类集会上,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发表了演说,号召采取恐怖行动反对拿破仑第三。布鲁塞尔的《淘气鬼》报 1868 年 7 月 5 日第 25 期有关此次会议的报道中把这次集会说成是一次国际会议,并把费·皮阿说成是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这种说法被其他报纸一再重复。总委员会考虑到这会在工人的心目中破坏国际的威信,而且会给波拿巴政府提供一个求之不得的、迫害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国际会员的借口,于是马克思在 1868 年 7 月 7 日的会议上提出了这

个决议。

被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由埃卡留斯记录在1868年7月7日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中。最先刊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第55号,后又转载于1868年7月19日《蟋蟀报》第29期、1868年7月26日《人民论坛报》第7号和其他报纸。

决议在报刊上出现之后,费·皮阿所在的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发生了分裂。不赞同皮阿的挑拨性和冒险性的策略的无产阶级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中断联系,但他们继续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的路线的各个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1870年5月10日总委员会正式与这一小伙人划清了界限(见马克思1870年提出的《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

本决议第一次用英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4年莫斯科版。——452。

- 302** 《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是马克思于1868年7月11日前后针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的污蔑而写的,他们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这些非难散见于某些《资本论》书评之中,例如尤·孚赫参加出版的杂志《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第5年卷第20期(1868年)的匿名书评,以及1868年7月4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期的另一个匿名作者的书评。

本文在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1版第13卷第1册。——453。

- 303** 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早在与拿破仑法国战争时期德国就已经产生了许多学生会,许多会员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后反对德国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赞德尔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采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一词便流传开来。——454。

- 304** 1867—1868年间,沙皇政府为在波兰强迫推行俄罗斯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手段来废除波兰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机构。英国政府对此采取奴颜

婢膝的态度。马克思于1868年7月14日在总委员会提出这份声明,声明获得通过,声明内容记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中。1868年7月18日发表在《蜂房报》第352号上。——456。

- 305**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问题,是由总委员会于1868年1月28日提出并列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议程的。总委员会在7月28日和8月4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一开始,马克思首先讲述了他在《资本论》第1卷《机器和现代工业》这一章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马克思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586—588页)。

8月4日的讨论会上,马克思在总结时提议把总委员会讨论的结果以决议的形式记录在案。决议草案由马克思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即8月11日的会议上获得通过。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决议草案由格·埃卡留斯在1868年9月9日的会议上提出并被纳入大会决议的引言部分。在这次会议上,弗·列斯纳为论证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还宣读了摘自《资本论》的引文。

决议草案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1868年9月11日《比利时人民报》第38号附刊,后又用英文发表在1868年9月14日《泰晤士报》第26229号(见埃卡留斯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和1868年9月19日《蜂房报》第362号上。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收入了这一决议草案。——457。

- 306** 本文是马克思1868年8月18日为答复1868年7月6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正式邀请而写的。联合会邀请马克思以贵宾身分出席在汉堡召开的年会。在邀请信上签名的有联合会主席施韦泽以及来自德国各个地区的20多名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理事)。

邀请马克思出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会这件事本身以及大会的议程表明,在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影响下,联合会中的进步会员已经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联合会的领导人不得不采取这些做法。马克思在1868年8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在答复时不得不考虑到那些工人理事,说明不能出席的理由,并对他们的大会议程感到高兴。

1868年8月22—26日的汉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些重要决定：大会原则上赞成罢工运动，一致公认“马克思通过他的《资本论》为工人阶级作出了卓越贡献”，大会还指出了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反对组织罢工，并且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

马克思给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在大会的1868年8月24日秘密会议上宣读，受到鼓掌欢迎。这封信发表在1868年8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0号和1868年8月29日《民主周报》第35期。后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周年，1886年3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又刊登了这封信。——458。

- 307 这个决议草案是在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过程中，于1868年8月25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由马克思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记入这次会议的记录本中。第一次发表于1868年8月29日《蜂房报》第359号（马克思论证该项决议的发言记录见本卷第589—590页）。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该决议草案由埃卡留斯提出，得到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赞同并在1868年9月12日会议上宣读通过。——460。

- 308 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是马克思为1868年9月6—1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

马克思1868年9月1日用英文写的这份报告由杜邦在代表大会9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宣读。报告的英文本首次见报是在1868年9月9日《泰晤士报》第26225号埃卡留斯的通讯里。接着又被1868年9月12日《蜂房报》第361号转载。马克思写的德文稿发表在1868年9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6号、1868年9月12日《民主周报》第38期附刊和1868年9月12日《海尔曼》第506号上。报告除收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的法文版以外，还用法文刊载于1868年9月8日《比利时人民报》的特刊，以及1868年9月13日《自由报》第46号。

本文是根据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手抄的德文稿本译出的，和英文稿稍有不同，主要的不同之处均在脚注中说明。——461。

- 309 十二月二日王朝（十二月二日政府）指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解散立法议会发动政变，于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的第二帝国，即十二月二日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461、458。

310 1867年7月,亚眠发生了染色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其他行业工人的支援。

1867年3月,鲁贝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起因是,由于采用机器后大批工人被解雇。

1867年2月,巴黎铜器工人开始罢工,他们拒绝按企业主的要求退出互助会。由于总委员会的协助,巴黎工人得到英国工联的援款。罢工以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组织。

1868年3—4月,日内瓦有3 000名建筑工人举行罢工。工人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要求提高工资并把计日工资改为计时工资;除建筑工人外,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由于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支援,日内瓦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462。

311 指巴黎支部提交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报告,报告详细揭示了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斗争的主要问题上的观点,得到里昂支部和鲁昂支部的赞同,在1866年9月4日的大会上作为法国代表的报告宣读。报告的全文于1866年9月在布鲁塞尔出版,题为《日内瓦代表大会。法国代表的报告》。——462、556。

312 1867年12月,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理事的住宅遭到搜查,随后开始了侦讯,接着在1868年3月6和20日对国际的法国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在法国警察搜查时所没收的信件当中,有一封信是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于1867年11月23日写给巴黎支部的成员安·缪拉的,其中谈到国际的法国会员营救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的活动情况。法国当局企图利用这封信给国际加上组织芬尼社社员进行密谋的罪名。法庭宣告巴黎支部解散,并对理事会成员处以罚款。——463。

313 在法国,按照刑法法典第291条和1834年4月10日法令,成立20人以上的社团,必须经有关当局批准。——463。

314 沙勒罗瓦事件指围绕着比利时沙勒罗瓦矿工的罢工发生的事件。1868年春天,沙勒罗瓦煤矿矿主把每周生产减至4天,工资降低10%,矿工宣布罢工,矿工和警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22人被逮捕审判。比利时支部在国内外广泛展开了支援罢工者的运动。支部组织了多次抗议集会。在《人民论坛报》、《自由报》等报刊上广泛报道了沙勒罗瓦事件。1868年4月12日发表了告比利时工人及各国工人书(见1868年4月19

- 日《人民论坛报》第4号)。支部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总委员会在1868年4月21日、5月12日和6月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沙勒罗瓦事件;组织了对罢工者的援助。比利时支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为被捕者聘请律师。律师设法取得有利于被告的公众舆论,被捕者于8月15日被陪审团宣告无罪。由于这些事件,国际在比利时的会员人数大大增加。——464、582。
- 315** 门塔纳大屠杀指1867年11月3日法国军队同教皇的雇佣卫队一起在门塔纳附近击败再次进攻罗马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进攻罗马的目的是要把罗马从法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归入意大利的版图。——464。
- 316** 指普鲁士1850年3月11日颁布的反动的结社法。——464。
- 317** 日内瓦委员会是约·菲·贝克尔所领导的在瑞士的各德国人支部中央委员会,它于1865年11月起成为各支部的组织中心,这些支部不仅把在瑞士的德国工人,而且把德国、奥地利、美国以及有德国工人流亡者居住的国家里的德国工人联合起来了。贝克尔所进行的活动,特别是他所办的《先驱》月刊,在德国国内还缺少建立组织的条件的时候,大大地促进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工人中间的传播。——464。
- 318** 指1868年8月22—26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见注306)通过的关于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决议。该决议载于1868年9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2号。——464、473。
- 319** 指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于1868年9月5—7日在纽伦堡举行的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派格·埃卡留斯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69对46)通过了关于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一个由16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实施这一决议。1868年9月22日,总委员会批准该委员会为国际工人协会在德国的执行委员会。——465、483。
- 320** 彼·福克斯被指定为总委员会出席预定于1868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匈各族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465。
- 321** 在瑞士的50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1868年8月9—10日在纳沙泰尔(诺因堡)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加入国际的决定。决定发表在1868年8月《先驱》第8期上。——465。

- 322 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于1866年8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地参加了同盟的筹建工作。1866年10月,同盟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7年8月的全国劳工同盟芝加哥代表大会选出特里维利克为出席国际工人协会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洛桑)的代表,但他没能出席。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在同盟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卡梅伦通报了他参加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同盟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466、570。
- 323 1868年6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在所有政府机构和联邦机构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466。
- 324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并且和它保持距离。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曾为协会的活动付出了很多时间,发挥了很大作用。
- 1868年9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于是恩格斯1868年9月16日写了这封信,表示这项决定使他必须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理事会秘书戴维森于1868年10月2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不要辞职,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
- 这封信一直到1950年才发表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公报》第2期上。——468。
- 325 恩格斯在1868年9月底写的《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一文没有署名,发表在1868年10月3日《民主周报》第40期上,1868年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当局查封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该会的中央在莱比锡),并且封闭了联合会在柏林的地方分会。但是,1868年10月10日,即查封后过

了三个星期,以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子用同一名称恢复了联合会,并把会址迁到柏林。他们在1868年10月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9号上刊登的新章程中,表示决心严格遵守普鲁士的法律,并且只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径进行活动。为了附和普鲁士法律的要求,联合会的领导取消了地方分会。

恩格斯在工人联合会解散之际写出这篇文章,对拉萨尔派进行分析批判。马克思在1868年9月2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篇文章会起到瓦解破坏拉萨尔派的作用。——470。

- 326**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补充)》是恩格斯1868年10月初按马克思的建议写的,没有署名,发表在1868年10月10日《民主周报》第41期上。马克思在1868年9月25日的信中提到1868年施莱茨版的伯·贝克尔的小册子《斐迪南·拉萨尔悲惨离世内情》时说,向这个“拉萨尔主义”进攻的时刻来到了,绝不应对它保持沉默。——474。

- 327** 拉萨尔在他的遗嘱中推荐伯·贝克尔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位的继承人。贝克尔在他的《斐迪南·拉萨尔悲惨离世内情》(1868年施莱茨版)的扉页上,称自己是“拉萨尔遗嘱继承人”。

在1865年3月22日联合会汉堡分会的会议上,贝克尔对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进行诽谤(见186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附刊)。马克思在他的《人类的主席》一文(见本卷第142—147页)中揭露了贝克尔的诽谤。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普通成员日渐反对贝克尔,柏林支部决定开除贝克尔,并且建议其他组织照此办理。很多支部召开了类似会议。1865年6月,贝克尔不得不暂时把他的主席权力委托给他的副手弗里茨舍,同年11月,他彻底放弃了他的主席权力。——474。

- 328** 一小批拉萨尔分子在索·哈茨费尔特影响下脱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于1867年组织了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主席最初是弗尔斯特林,后来是门德。这个联合会在工人当中没有任何威信,在1872年实际上已不存在了。——474。

- 329**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9月29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希尔施的关于所有主要的英国工联已退出协会的声明。接着马克思于10月4日写了这篇驳斥希尔施的短文寄给《民主周报》,发表在该报1868年10月17

日第42期。报纸编辑显然对第一段作了一些改动。这篇文章第一次用英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1966年莫斯科版。——476。

330 指国际总委员会和英国各工联共同组织的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援助。

在巴黎铜器工人罢工期间(1867年2—3月),总委员会在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英国工人的公开信,号召给罢工者给以物质援助。鞋匠、裁缝、木工等工联通过总委员会寄了好几百英镑到法国去。

由于马谢讷的比利时矿工和冶金工人被枪杀(1867年2月),总委员会在1867年3月13日《国际信使》上发表《致大不列颠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公开信,号召援助遭到残酷镇压的受害者。受害者工人的家属得到了经济援助。

在日内瓦建筑工人罢工和被大批解雇期间(1868年3—4月,见注310),总委员会每月都从英国寄去4万法郎的拨款。这些寄到日内瓦去的钱是粗细木工,纺织工人,以及装订工人等工联寄去的。——476。

331 指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的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会领导着伦敦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60年代上半叶,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以及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以下各大工联的领导人:粗细木工联合会(罗·阿普尔加思)、鞋匠协会(乔·奥哲尔)、泥水匠协会(埃·科尔森和乔·豪威耳)和机械工联合会(威·阿林)。除阿林以外,这些领导人都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成员。

总委员会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引导到国际工人协会中来,设法使地方工联组织加入国际,并使工联伦敦理事会作为英国支部加入国际。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他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现在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根据总委员会委员们的动议,工联伦敦理事会在1866年秋的历次会议上都讨论了关于加入国际的问题。

由于伦敦理事会中反对加入国际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和各地方工联之

间的斗争而使加入国际的问题一拖再拖,最终在1867年1月9日和14日的理事会会议上决定,“为进一步解决所有影响工人利益的问题”和国际工人协会合作,“同时保持工联伦敦理事会和以往一样是一个独特并且独立的团体”(1867年1月15日《泰晤士报》第25708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7年1月15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工联伦敦理事会的这一决议,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委员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477。

332 全国改革联合会指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布·奥勃莱恩和雷诺等人于1849年在伦敦建立的全国改革同盟。同盟的目的是争取普选权和实行社会改革。1866年它加入国际并在总委员会领导下开展活动,成为改革同盟的一个分支机构。全国改革同盟的领导人阿·沃尔顿和乔·米尔纳都是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国际多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477。

333 指德国政论家、曾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埃·鲍威尔于1863年到普鲁士出版局供职一事。——478。

334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外交评论》的出版者查·多·科勒特的请求,于1868年11月9日写的。

《外交评论》的编辑是保守的政论家、当过外交官的戴·乌尔卡尔特,他从19世纪30年代初起就在自己的杂志《公文集》上,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有关欧洲列强秘密外交的文件,其中包括揭露帕麦斯顿这个英国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人的外交活动的文件。

马克思对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进行了不倦的揭露和批判,1853年他在一组揭露性的文章《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395—478页)中,除了利用其他文件,也利用了乌尔卡尔特发表的许多文件。后来马克思的某些文章也在乌尔卡尔特的杂志《自由新闻》上刊载。同时,马克思也激烈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且经常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的根本区别。

1868年12月2日的《外交评论》发表了马克思这篇文章,编辑部在发表时加了一个按语,介绍马克思是《18世纪外交史内幕》和《资本论》的作者。——479。

335 1844年银行法令是英国政府为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根

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的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它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金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然而,尽管1844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弥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曾被迫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法令,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

例如,1866年的危机在英国的信贷领域里表现得特别尖锐;1866年5月,当时财政恐慌达到极点,英格兰银行受到破产的威胁,银行董事会收到了首相罗素和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签署的信,批准1844年法令暂停生效,这样才使贷款业务得以扩大并使国内财政恐慌有所缓和。——479。

- 336 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的代表在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会议上签订了结束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马克思称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克拉伦登为巴黎会议上的英雄,是暗指他在英法矛盾和法俄亲善已趋明朗的情况下未能充分实现英国外交计划一事。——480。

- 337 1868年10月6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决定,将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编为单行本出版,由马克思负责编辑工作。本文是马克思1868年10月底—11月3日之间为小册子写的出版说明。

小册子所刊印的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是代表大会按照会上宣读的总委员会报告内容通过的,涉及协会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八小时工作日、儿童和妇女的劳动保护、合作生产、工会的任务等问题,即马克思起草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第2—6点(见本卷第266—274页)。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法国蒲鲁东派掌握着三分之一的票数,他们对总委员会的报告,即马克思起草的《指示》持反对态度。他们提出的一些修正案也为代表大会所通过。这些修正案未收入小册子,因此,小册子里刊印的只是日内瓦代表大会的部分决议。

小册子全称是《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1869年2月在伦敦出版。在小册子出版之

前,其第一部分连同马克思写的出版说明于1868年11月3日经总委员会会议通过,并刊载于11月21日《蜂房报》第371号上。——482。

338 马克思于1868年11月23日写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266)的这篇声明,是由协会对1868年的拉萨尔派柏林代表大会以及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纽伦堡代表大会(见注319)上建立的工人组织所持的立场引起的。马克思于1868年11月2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从巴黎和德国进口的拉萨尔分子——他们同施韦泽有秘密的来往——利用列斯纳由于妻子生病而未能出席的机会,强使这里对施韦泽投信任票而反对纽伦堡派”。后来列斯纳在同协会里的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得到了马克思的支持。——483。

339 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大会(见注306)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份于1868年9月26日在柏林召开了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206名,代表142 000多名工人(主要来自北德意志各城镇)。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下属的各个工人协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

马克思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483。

340 民主工人联合会是在柏林工人联合会发生分裂后于1868年10月在柏林建立的。同马克思保持经常的联系并且任国际总委员会柏林通讯员的威·艾希霍夫,在民主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中起了很大作用。根据他的建议,这个新的联合会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各工人协会的纽伦堡组织,接受它的以第一国际的原则为依据的纲领。联合会同国际的柏林支部也保持密切联系,几乎联合会所有会员同时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联合会为强调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选举了两名工人——维耳克和凯默勒为主席。民主工人联合会积极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威·李卜克内西经常在它的会议上发表演说。1869年,联合会加入了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484。

341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同盟临时委员会的成员除巴枯宁外,还有布罗塞、杜瓦尔、格塔、佩龙、扎哥尔斯基和约·菲·贝克尔。1868年,同盟把它的纲领和章程以传单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印发。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这两个文件寄给国际的总委员会,希图总委员会承认同盟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12月15日,总委员会讨论了同盟的纲领和章程。马克思认为接纳另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加入国际协会同协会的共同章程相抵触,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这个意见决定不接纳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并委托马克思起草一个文件作为对同盟的公开答复。马克思通过书信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于12月22日写成《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一文(见本卷第492—494页),当日经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并稍加修改后一致通过。这个文件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

马克思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可能是在起草该文件之前于12月15日写的,写在纲领和章程的法文文本的页边上,荣克在页边上记下了熟悉该文件并在讨论时发言的杜邦和若昂纳尔两人的名字。——485。

342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革命报》于1871—1872年出版。这里所说的看来不是《革命报》,而是《平等报》。1868年11月20日,亚·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即将在日内瓦创刊的《平等报》撰稿,但在信中未提及报纸的名称。1868年12月3日,沙·佩龙就《平等报》出版事宜写信给海·荣克,信中提出请马克思、埃卡留斯和荣克为报纸撰稿。12月16日《平等报》在一期特刊上登载了埃卡留斯和荣克的复信。编辑同时加了一段附言:“公民马克思向编委会表示,他很遗憾,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工作太忙,不可能保证参与本报的工作。但我们仍然希望这位工人阶级的英勇斗士能不时为瑞士罗曼语区支部的机关报执笔撰稿。”——490。

343 本文是马克思在1868年12月22日写成并于当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文件(见注341),是总委员会在讨论了社会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

以后对该组织的一个公开答复,并以通告的形式寄发给国际的所有支部。该文件第一次发表于1872年5月底在日内瓦刊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本小册子,随后又刊登在1872年6月《法兰西信使报》和1872年6月23日《激进党人报》第175号上。通告的几个彼此差异不大的手稿也保存了下来(其中两个是马克思的手稿:一个是1868年12月22日写的,另一个是附在他1870年8月6日写给荣克的信中的;两个手抄副本:一个是荣克抄写的,另一个是杜邦和恩格斯抄写的)。——492。

- 344** 反对和平同盟的决议指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12日通过的就国际被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239)邀请参加1868年9月在伯尔尼召开的该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国际拒绝参加伯尔尼代表大会,但允许国际会员只以私人的身份参加这个代表大会。邀请是根据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巴枯宁的倡议发出的。他力图将国际工人协会置于资产阶级的同盟的支配之下。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既然已经有国际工人协会存在,这个企图对国际工人运动实行领导的和平主义的同盟的存在是多余的。建议同盟并入协会,其成员加入协会的各个支部。——494。

- 345** 本决议是克里默代表小委员会(见注119)在1865年2月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马克思附议,决议获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同1864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决议(见本卷第23页)有直接的联系。本决议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1961年莫斯科版。——498。

- 346** 这是马克思在1865年2月初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266)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惟一一份记录,马克思在讲话中批评了由资产阶级国家指导工人联合的想法以及拉萨尔派和蒲鲁东派的教条,这份记录出自格·埃卡留斯的手笔。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以及1865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埃卡留斯记录中有些地方所包含的意思同实际的讲话完全相反。——499。

- 347** 中央委员会在1865年2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印制这种证件的决议(见本卷第498页)。这份特殊的复印件是伦敦泥水匠协会执行委员会为本

协会填写的。接纳泥水匠协会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日期(1865年2月21日)极有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因为从证件上的通讯书记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份证件是1865年夏天才印制的。名单包括1865年4月11日当选为法国通讯书记的欧·杜邦和1865年5月30日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并于6月6日当选为美国通讯书记的莱·路易斯。——501。

348 告各工人团体书是中央委员会在国际建立时期发表的,这时中央委员会正在争取各工人团体、首先是英国工联加入国际。在1865年6月6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受委托草拟号召加入协会的告各工人团体书。号召书于1865年夏季印成传单,内容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兹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和其他工人团体……加入……”号召书是以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条件的基础的(见本卷第23页)。——503。

349 常务委员会根据6月13日中央委员会决定起草的关于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是彼·福克斯在1865年7月25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是马克思积极活动的结果,他成功地说服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于1865年在伦敦召开预备性的代表会议(见注171),而不在布鲁塞尔召开临时章程所规定的代表大会。马克思认为,国际的各个地方支部还不够巩固,召开代表大会还为时过早。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就这个报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特别认真地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议程。讨论结果,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程经稍加补充后获得通过,补充的是:根据克里默和埃卡留斯的建议,把巴黎支部提出讨论的关于常备军问题作为第十项列入议程。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议程是同报告正文贴在一起的。

伦敦代表会议的议程曾经刊载在中央委员会于1865年在伦敦印发的传单上,开头写道:“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希腊街18号。将要在9月25日和接连的几天内召开协会各主要支部的代表会议……”议程还刊登在1865年8月12日《蜂房报》第200号上,关于代表会议的通知刊登在1865年9月2、9、16和23日《工人辩护士报》第130、131、132和133号上。

这份报告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年俄文第2

版第 16 卷。——505。

- 350** 这封公开信是中央委员会对 1865 年 12 月 16 和 18 日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韦尔维耶回声报》第 293 和 294 号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的答复,这篇文章诬蔑性地歪曲了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和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流亡在比利时的皮·韦济尼埃,他是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中敌视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的小资产阶级的传声筒。中央委员会在 1865 年 12 月 26 日、1866 年 1 月 2 和 9 日讨论了韦济尼埃的文章。马克思出席了这几次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韦济尼埃不能以事实来证实他的责难,就把他开除出国际。

这封信是海·荣克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于 1 月中旬—2 月 15 日之间起草的,并且由马克思校阅过。1866 年 1 月 30 日荣克在中央委员会宣读了这封信,2 月 6 日中央委员会一致决定将信寄给《韦尔维耶回声报》。这封信发表在该报 1866 年 2 月 20 日第 43 号。——508。

- 351** 出席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66)会员的马克思、埃卡留斯、列斯纳、沙佩尔等人。——512。
- 352**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 1849 年,其核心人物是巴黎的流氓无产者。该会因纪念路易·波拿巴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这一组织作过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184—187 页)。——514。
- 353** 格吕特利联盟是瑞士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组织,1838 年 5 月 6 日成立于日内瓦。该组织的宗旨是宣传和教育手工业者和工人,之所以采用“格吕特利”作为名称,是为了表现其瑞士的民族性。“格吕特利”是瑞士中部乌里湖边的一片草地。据传说,1307 年湖周围三个州的代表曾在格吕特利草地集会并缔结了联盟,宣誓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515。
- 354** 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 1866 年 3 月 13 日会议上的发言反映出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中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歪曲国际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真

正性质的一个斗争情节。1865年春季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马志尼分子路·沃尔弗出席了1866年3月6日的委员会会议,并且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批评中央委员会给《韦尔维耶回声报》的信(见本卷第508—518页)。他提出,这封信错误地描述了马志尼对国际及其纲领文件的态度。他想让中央委员会承认这些文件是建立在马志尼的原则基础上的。在具有机会主义情绪的英国委员的影响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向马志尼和沃尔弗本人表示道歉。3月10日通讯书记杜邦、荣克、龙格、拉法格、博勃钦斯基在马克思家里开会,并决定由马克思在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对3月6日的决议提出抗议。

在1866年3月13日会议上,在马克思发言之后,中央委员会取消了3月6日的决议,马克思的发言记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中。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6卷。——519。

- 355 沃尔弗的方案指他在1864年10月8日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章程草案,它是马志尼为了联合各意大利工人团体而起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这个草案是《意大利工人联合会互助条例》的基础,该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作社报》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519。
- 356 德巴普的这个声明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见注171)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得到反映。——519。
- 357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是当时的席勒协会(见注324)主席恩格斯直接参与起草的文件,共三篇,分别写于1866年3月19日、1867年2月8日和6月28日。这三篇《通告》表明了他的广泛的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另外两篇通告见本卷第539—541、544—548页。——521、539、544。
- 358 本文是马克思与拉法格合作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它是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塔朗迪埃1866年5月28日给《左岸》的一封读者来信的回复。塔朗迪埃在信中追忆弗朗索瓦-大卫·拉尔多为国际协会所作的工作并称他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先驱。拉法格在1866年5月29日和6月2日之间起草这篇答复文章时与马克思密切合作,文中使用的资料都是由马克思提供的。文章发表于1866年6月3日《左岸》第22期,适逢1866年展开的有关工人协会性质的讨论。

本文手稿没有保存下来。——525。

- 359 1855年的国际协会见本卷注144,1864年的国际协会见本卷注1。——525。
- 360 国际民主协会即民主协会,它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民主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73)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逐渐成为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525。
- 361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派左翼代表人物(乔·哈尼、厄·琼斯)和革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等)为了在各国民主运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1845年9月22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竭力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协会会员,特别是教育1847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协会的无产阶级核心,并通过协会从思想上影响宪章运动。协会会员在理论上的幼稚观点,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1848年宪章运动失败以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弱,到1853年协会就完全解体了。——525。
- 362 1866年5月,在筹备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期间,《左岸》周报发行人莱·封丹准备在该报发表经作者审阅的法译文《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见注1),同时他可能请求马克思提供有关国际工人协会活动情况的材料。由于发表有关协会作用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而迄今尚未发表过总委员会关于协会活动的报告,总委员会于1866年5月29日商讨了他的请求,委托荣克等三名委员为《左岸》

提供材料,荣克承担了为《左岸》撰写这篇概述文章的任务。荣克在草稿中利用了他起草的《给皮埃尔·韦济尼埃的公开信》(见本卷第508—518页)的某些内容。他将草稿交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对正文表述作了修改并确定了篇名之后,将草稿转交给拉法格,大概是请他为文章的发表再作一些校改。1866年6月12日,拉法格向中央委员会宣读了经他校改过的文章。文章中的精确表述,所选用的材料以及马克思的审阅工作,都证明马克思对本文的影响,它因此成为直至1866年6月的第一份国际工人协会史概述。本文大约完成于1866年5月30日—6月13日之间,发表在1866年6月17日《左岸》第24期。

本文手稿没有保存下来。——527。

- 363 1866年6月19、26日和7月1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进行了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问题的辩论。6月26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个决议案,除博勃钦斯基和卡特的决议案外,一个是克里默和达顿提出的,另一个是福克斯提出的。1866年7月1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些决议案进行表决之前,马克思发言批评了它们,结果克里默和达顿的决议案以及福克斯的决议案被撤销。前者虽然原则上谴责了侵略战争,但是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必须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斗争。后者除同样的缺点外,没有表达无产阶级对战争的态度。中央委员会在稍加修改后一致通过了博勃钦斯基和卡特的这一决议案。通过后的决议发表在1866年7月21日《共和国》报第176期和1866年7月22日《左岸》第29期。——533。

- 364 这是由马克思和拉法格于1866年10月底审校完成的法文本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它与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5和8日会议上批准的这两个文件的原文稍有出入。日内瓦代表大会之后,在被法国当局没收的代表大会材料尚未发还总委员会期间,国际的法国各支部纷纷要求把章程和条例寄给它们。因此,1866年10月16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伦敦用法文出版这些文件。由马克思和拉法格审校的法文本《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于1866年11月底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在当时出版的1000册中,运往法国的800册在边境上被扣留,因此,这个版本没有流传下来。此后不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材料发还给了总委员会,当时总委员会正在着手准备在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国际信使》上以英

文和法文正式公布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它所批准的文件。1867年在伦敦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单行本。——534。

- 365 这是马克思 1867 年 2 月 28 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266)成立 27 周年纪念会上所作演讲的记录。和德国工人一起参加庆祝会的还有国际在伦敦的法国会员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在会上演讲的除马克思以外还有总委员会委员彼·福克斯、格·埃卡留斯等人。

包括马克思的演讲记录在内的会议报道是由弗·列斯纳于 1867 年 3 月初写的,并由他寄给约·菲·贝克尔,发表在 1867 年 3 月《先驱》第 3 期上。——542。

- 366 马克思的这份发言记录,是从 1867 年 7 月 27 日《工人报》第 18 期上剪下来保存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里的,上面还附有在核实记录时所提出的修改。马克思所做的摘录取自议会蓝皮书(见注 4)中的《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7 年伦敦版第 5 号第 594—595 页。这份议会蓝皮书中的数字错误保留未动。报纸印错的数字根据蓝皮书原文作了订正。——549。

- 367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如何对待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 239)代表大会问题的发言,是马克思在 1867 年 8 月 1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发言结束时,马克思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见本卷第 302 页)。

正如马克思在 1867 年 9 月 4 日写信告诉恩格斯的那样,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多议论,使得和平和自由同盟的领导们不得不给将于 1867 年 9 月 9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成立大会提出更民主的纲领。马克思在同一封信中说,他的发言历时半小时,但是担任书记兼记录员的埃卡留斯在会议报道中只提及几句话。报道载于 1867 年 8 月 17 日《蜂房报》第 305 号。埃卡留斯的手稿我们没有找到。保存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本中的发言记录是从这份《蜂房报》剪下贴入的。马克思的发言曾经更简略地在 1867 年 8 月 25 日《自由报》第 8 号和 1867 年 9 月 2 日《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过。——552。

- 368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 19 世纪常备军的作用的观点,在恩格斯 1865 年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本卷第 69—115 页)中,以及在他于 1870—1871 年写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中有详尽的阐述。——552。

369 总委员会向 1867 年洛桑代表大会的报告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于 1867 年 8 月 20—27 日之间用法文写成的,它包括总的叙述和有关各个国家情况的报告,它在洛桑代表大会(9 月 2—8 日)9 月 3 日的会议上由吉约姆宣读,埃卡留斯在会上宣读了报告的德译文文本。报告获得大会代表的一致通过。它被载入 1868 年 4 月问世的《向 1867 年 9 月 2—8 日在洛桑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宣读的报告》(1867 年拉绍德封版)一书中。报告的手稿没有保留下来。报告中有关美国的部分是彼·福克斯写的,他的手稿还保存着,附在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本中。

马克思因忙于《资本论》第 1 卷的付印工作没有出席洛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个地方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巩固起来。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使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议程上所拟定的真正迫切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草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仍设在伦敦。——554。

370 伦敦编筐工人同盟歇业发生在 1866 年 10—11 月。——558。

371 在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见注 215)过程中,伦敦的工人不得不为在首都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的权利而斗争。尽管政府禁止预定在 1866 年 7 月 23 日在海德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还是召开了,而且参加大会的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内务大臣同意改革同盟使用伦敦的公园举行群众大会。然而在筹备 7 月 30 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第二次群众大会时,改革同盟委员会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通过决议一概不在露天举行群众大会。——559。

372 总委员会于 1867 年 6 月 18 日通过决议,表示感谢巴黎人民群众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到巴黎时所采取的示威行动,并且赞扬他们表示同俄国沙皇制度压迫下的波兰人团结一致的示威。决议发表在 1867 年 7 月 22 日《共和国》周报第 224 期上。——569。

373 国际铸工联合会是美国工人的一个大的工会,它是在西尔维斯的领导下于 1859 年开始筹建,最后于 1863 年成立的,主席是西尔维斯。联合会联

合了全国范围内的地方铸工联合会,并且在英属哥伦比亚和加拿大建立了它的组织;它为地方联合会的集中活动而斗争,有组织地领导罢工运动,对于全国其他工会的巩固有重大的影响。——570。

374 纽约工人联合会是纽约各工会的一个联合组织,成立于1863年,任务是团结纽约工人向企业主作斗争,保证对罢工者的支援,并且在解决工人和企业主的冲突时起中介作用。——573。

375 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所附的彼·福克斯的手稿上接着指出,马克思除了把弗·阿·左尔格1867年7月10日的信交给福克斯以外,还交给他加入了协会的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一份章程。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是参加过1848—1849年革命的德国流亡者弗·康姆和阿·康普等人于1857年秋成立的。俱乐部约有50名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它从一开始就努力与约·魏德迈和马克思接触。1867年7月2日俱乐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并成立了第一个美国支部。马克思的战友约·魏德迈、弗·阿·左尔格、海·迈耶尔、奥·福格特在它的活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573。

376 这里指的是国际铸工联合会(见注373),在1867年7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联合会领导人西尔维斯的一封信,信中说,1866—1867年它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帮助罢工的工人。——575。

377 在1867年伦敦缝纫工人罢工期间,工会领导成员和几个罢工纠察员由于告密者的阴谋活动而被提交法庭审判。1867年8月21日,13名罢工领导人被宣判有罪。在伦敦的工会理事会的其他互助联合会取保释放了他们。但是,更多的工人被监禁三个月。政府禁止设立罢工纠察岗,这很不利于罢工行动。伦敦缝纫工人的罢工未能取得成功,不得不于1867年10月19日结束。——575。

378 这是欧·杜邦1867年9月10日在日内瓦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即和平和自由同盟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239)上的讲演稿,写于8月底—9月10日之间。据推测,杜邦在8月底前往洛桑之前曾同马克思商讨在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上阐述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立场一事。他在这篇讲演中阐述的协会对争取和平斗争的立场,正是马克思1867年8月13日在总委员会提出的(见第552—553页)。讲演稿发表在1867年9月10日《日

内瓦和平代表大会简报)第4期。

本文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577。

- 379 这是马克思于1867年12月16日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记录。马克思本人为作这一报告所写的提纲见本卷第341—358页,这一记录是埃卡留斯作的,原拟在《先驱》杂志上发表,为此弗·列斯纳把它寄给了在瑞士的约·菲·贝克尔,但后来没有发表。——579。
- 380 指英国宗教改革,它是16世纪英国王权为加强专制统治而进行的。当时英格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对罗马教皇干预英国事务日益不满。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禁止英格兰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亨利八世以教皇不准其与王后西班牙公主喀德琳离婚为理由,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格兰教会不再受制于教皇而以英王为最高元首,并将英格兰教会立为英格兰地区的国教,称英国国教会。此后,英国国王加强了对教会的控制。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重申国王对宗教事务的至尊地位,颁布《三十九条信纲》,否认或背离这个信纲,均被视为异端,予以惩罚。三十九条从1563年起是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宣誓恪守的英国国教会的信条。1571年,三十九条经议会通过,正式成为英国国教会信守的教义。把改革引入爱尔兰天主教,是以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为借口,使爱尔兰服从英国君主制政体并没收爱尔兰居民财产以利于英国殖民者的一种手段。——579。
- 381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于1660年复辟。复辟时期的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一直统治到1688年光荣革命。这一时期爱尔兰受到的优待,参看本卷第345页。——579。
- 382 这是马克思关于改变大会地点的建议和撤销有关决议的两次发言的记录,它于1868年5月30日和6月20日分两次发表在《蜂房报》第346、349号,内容比总委员会会议记录要详细得多。——582。
- 383 迫使委员会放弃《关于改变国际1868年度代表大会地点的决议》(见本卷第451页)的情况(见注299),还可参看马克思1868年6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582。
- 384 马克思这份发言记录摘自1868年7月25日《蜂房报》第353号的报道。在1868年7月2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

记录的：“公民马克思。德国。工人总联合会打算用迂回的办法做普鲁士法律所禁止公开做的事情。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各邦里存在着另一个工人联合会，它在瑞士有若干分会，它们也打算参加。赖德律-洛兰的朋友们出版的新报纸《觉醒报》对国际协会反映较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1964年莫斯科版第228页）。——584。

385 南德意志各邦的工人团体联合会指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见注319）。威·李卜克内西在1868年7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介绍了联合会全体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以及他和倍倍尔打算提出加入国际的问题。——584。

386 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7月2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的记录，记录人是总委员会书记埃卡留斯。保存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里的记录是从1868年8月1日《蜂房报》第354号剪下贴入的。

这次发言以后，1868年8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57页）。——586。

387 1866年的危机以后伦敦特别是它的东部（东头）赤贫现象加剧。1868年8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缩短工作日问题时也提到过伦敦东头的情况。——588。

388 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8月1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缩短工作日问题时作的发言的记录，这个问题当时已列入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

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员会会议记录里，它是从1868年8月22日《蜂房报》第358号剪下贴入的，在剪贴时书记埃卡留斯作了一些订正。——589。

389 在记录里米尔纳的名字被误写为埃卡留斯。实际上是米尔纳反对埃卡留斯的意见，断言工作日的缩短虽然是件合乎愿望的事，但它会造成生产的减少。——589。

390 指埃卡留斯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过长的工作日对工人健康的危害问题所作的详尽论证。——589。

391 弗·列斯纳为即将于1868年9月召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写了这篇《告伦敦德国工人书》，并把它寄给马克思审阅。马克思在1868年8月11日

把它寄给列斯纳,并在信中说:“由于有些字写错了,我在下面把它整个重新抄了一遍。”被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手稿同发表在1868年8月15日伦敦《海尔曼》第502号上的《告伦敦德国工人书》完全相同。——591。

人名索引

A

- 阿伯康公爵, 詹姆士·汉密尔顿 (Abercorn, James Hamilton, Duke of 1811 — 1885)——英国国务活动家, 保守党人; 爱尔兰总督 (1866 — 1868 和 1874 — 1876); 反对通过爱尔兰 1881 年的土地法。——326、353、358。
- 阿德里安四世 (尼古拉斯·布雷克斯比尔) (Adrian IV (Nicholas Braksper) 死于 1159 年)——罗马教皇 (1154 — 1159), 英国人。——342。
- 阿尔丹, 安东 (Ardin, Anton 死于 1898 年以后)——瑞士工人, 集体加入国际的马车制造工人和铁匠协会的主席; 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488。
- 阿尔多夫兰迪 (Aldovrandi, P.)——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0 月 — 1865 年)。——26。
- 阿尔芒, 路易 (Allement, Louis)——489。
- 阿普尔加思, 罗伯特 (Applegarth, Robert 1834 — 1924)——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 职业是红木工; 粗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 (1862 — 1871),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 (1863 年起); 1865 年起为国际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8 — 1872); 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改革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1871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 后脱离工人运动。——477。
- 埃德尔斯海姆, 莱奥波德·威廉, 1868 年起称埃德尔斯海姆-久洛伊 (Edelsheim, Leopold Wilhelm, Edelsheim-Gyulai 1826 — 1893)——奥地利将军,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任骑兵师师长。——253、257。
- 埃兰格, 拉斐尔·冯 (Erlanger, Raphael von)——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银行家。——98。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 — 1889)——国际工人

- 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26、148、151、216、301、320、467、499、576、589。
- 埃里迪埃,马尔克(Héridier, Mark)——489。
- 艾尔顿,亨利(Ireton, Henry 1611—1651)——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派思想家之一,议会军将军,曾参加奥·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讨伐(1649—1650),后继克伦威尔为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0—1651)。——344。
- 艾尔皮金,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Элп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5—1908)——60年代初喀山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5年侨居日内瓦,在那里创办了俄国印刷所,《人民事业》杂志就由这一印刷所印制出版;国际会员,巴枯宁同盟盟员,后来成为沙皇暗探局密探。——488。
- 艾吉永公爵,埃曼纽埃尔·阿尔芒·维涅罗·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iguillon, Emmanuel-Armand Vignerot du Plessis de Richelieu, duc d' 1720—1788)——法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大臣(1770—1774)。——39、40。
- 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12—1377)——英国国王(1327—1377)。——399、445。
-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60。
- 安·斯图亚特(Anna [Ann, Anne] 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344、345、346、579。
- 安贝尔,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40年代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525。
- 安娜·巴甫洛夫娜(Анна Павловна 1795—1865)——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威廉二世(1840年起为尼德兰国王)的妻子。——51。
- 安娜·伊万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俄国女皇(1730—

1740)。——33。

奥勃莱恩,詹姆斯(O'Brien, James (笔名布朗特 Bronterre 1802—1864)——英国政论家,宪章运动活动家,30年代为《贫民卫报》编辑,许多空想的社会改革草案的起草人;1848—1849年革命后脱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1849年创立全国改革同盟。——477。

奥顿诺凡,玛丽(O'Donovan, Mary J.)——耶利米·奥顿诺凡的妻子,1865—1866年组织募捐救济爱尔兰政治犯的家属。——216。

奥尔西尼,切扎雷(Orsini, Cesare)——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费利切·奥尔西尼的兄弟。——571。

奥古斯特二世——见奥古斯特三世。

奥古斯特二世·厉王(August II, der Starke [Mochny] 1670—1733)——波兰国王(1697—1706和1709—1733),萨克森选帝侯(1694年起),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33。

奥古斯特三世(August III 1696—1763)——波兰国王(1734年起),萨克森选帝侯(1733年起),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33、34。

奥金斯基伯爵,米哈乌·克莱奥法斯(Ogiński [Oginski], Michaz Kleofas Graf 1765—1833)——波兰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作曲家,所作战斗歌曲《波兰不会亡》后成为波兰国歌;1794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在法国和土耳其的波兰流亡者代表;1802年返回波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为俄国参政员。——43—45。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领袖。——326、341、351。

奥斯本,约翰(Osborne, John)——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抹灰工;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积极参加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活动,改良主义者。——26、151—152。

奥斯特罗夫斯基伯爵,托马斯·亚当(Ostrowski, Tamasz Adam Graf 1735—1817)——波兰国务活动家,1811年起为华沙大公国参议院议长;安东尼·扬·奥斯特罗夫斯基伯爵的父亲。——47。

奥托,路·——见布赖特施韦特,奥托·路德维希。

奥哲尔,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

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以及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26、152、279、301、477、502、504、513、529、576。

B

巴顿,约翰(Barton, John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10。

巴尔斯,弗兰蒂舍克(Barss, Franciszek 1760—1812)——波兰律师,主张改革;1793年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第二次瓜分波兰后流亡国外;曾参加1794年波兰起义的准备工作;法国国民公会中的起义者代表。——43、44。

巴尔田涅夫,维克多·伊万诺维奇(Бартнев, 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假名阿列克谢耶夫,涅托夫 Алексеев, Нетов 生于1838年)——俄国军官,同情波兰1863年起义,不久即辞职;1867年迁居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起小组成员;1869年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的斗争。——490。

巴尔田涅娃,叶卡捷琳娜·格里戈里耶夫娜(Бартенева Екатери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1843—1914)——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起小组成员;1869年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参加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创建工作,积极反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参加第二国际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1889);维·伊·巴尔田涅夫的妻子。——489。

巴凯,约瑟夫(Baquet, Joseph)——489。

巴克利,詹姆斯(Buckley, James 死于1869年左右)——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彩画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起);改革同盟盟员。——26、152、477。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

- 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488。
- 巴枯宁娜,安东尼娜·克萨维尔耶夫娜(Бакунина Антонина Ксаверьевна 父姓克维亚特科夫斯卡娅 Квятковская 1840左右—1887)——米·亚·巴枯宁的妻子。——489。
- 巴拉,茹尔(Bara, Jules 1835—1900)——比利时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司法大臣(1865—1870、1878—1884)。——464、582—583。
-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61、146、305、453—455。
-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和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科苏特的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活动。——142、143。
- 班尼亚加蒂(Bagnagatti, G.)——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26。
- 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1796—1801)。——43、46、285。
- 鲍威尔,埃德加(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478。
- 贝多(Bédeau, J.)——489。
- 贝尔,安德烈(Bel, André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工人,细木工,日内瓦细木工协会书记。——489。
- 贝尔尼斯,弗朗索瓦·若阿尚·德·皮埃尔·德(Bernis, François-Joachim de Pierre de 1715—1794)——法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作家;神父,红衣主教(1758年起);外交大臣(1757—1758)。——35。
- 贝克尔,伯恩哈德(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派;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全德工

- 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代表, 后任主席(1864—1865); 1870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1874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142—147、474。
- 贝克尔, 恩斯特(Becker, Ernst 死于 1898 年以后)——488。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1848年加入瑞士籍; 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民团; 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 瑞士“革命中央”成员(1850), 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 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 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45、488、512、515、569。
- 贝律兹, 让·皮埃尔(Béluzé, Jean-Pierre 1821—1908)——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职业是红木工, 卡贝的学生和信徒, “劳动信贷”银行经理(1863—1868), 《联合》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国际会员, 后来脱离工人运动。——123、124、514。
- 贝姆, 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之一; 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 入伊斯兰教, 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 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284。
- 贝奈德克, 路德维希·奥古斯特(Benedek, Ludwig August Ritter von 1804—1881)——奥地利将军, 曾参加镇压 1846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和 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1859年奥意战争时期任奥军第八军军长, 1860—1864年任奥军参谋长, 匈牙利军政总督, 1866年奥普战争时期任奥军总司令。——239、241、246、250、252、253、255、256—258。
- 贝努瓦, 盖德翁(Benoît, Gedeon)——普鲁士外交官, 曾任普鲁士驻华沙公使馆秘书和公使(1763—1776)。——38。
- 贝松, 亚历山大(Besson, Alexandre)——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职业是钳工,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8), 比利时通讯书记,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之一, 加入费里克斯·皮阿集团; 未被国际接受的 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成

员。——300、320、568、569、576。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84。

比尔斯,埃德蒙(Beales, Edmond 1803—1881)——英国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1855年为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来扩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宣传家之一;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主席,英国奴隶解放协会会员,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北部;曾为改革同盟主席(1865—1869)。——148。

比斯康普,埃拉尔德(Biscampe [Biskamp], Elard)——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9年创办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周报《人民报》,报纸从第2号起就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478。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62、285。

彼得逊,彼得(Petersen, Peter)——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26、152。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 [Bismar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96、109、118、239、337、471、499、512。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

(1835—1839)。——285。

波克罕,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 民主主义者, 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 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144。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 约瑟夫(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那不勒斯国王(1806—1808)和西班牙国王(1808—1813); 拿破仑第一的长兄。——47。

波尼亚托夫斯基, 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Poniatowski, Stanisław August 1732—1798)——波兰国王, 称斯塔尼斯拉夫二世(1764—1795)。——37、42。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 1814—1815和1815—1830)。——32、34、46。

波斯特莱布(Postleb, Ch.)——489。

波特尔, 乔治(Potter, George 1832—1893)——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工,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 《蜂房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 在报纸上一贯实行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477。

波托, 让(Potot, Jean)——489。

勃朗, 让·雅克(Blanc, Jean-Jacques)——法国《民论报》排字工人, 国际会员。——119。

博尔达日(Bordage, 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 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26、152。

博费蒂, 弗朗索瓦(Bofféty, François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细木工。——489。

博凯, 让·巴蒂斯特(Bocquet, Jean-Baptiste)——法国教师, 共和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 曾参加法国1848年革命, 后流亡伦敦;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72年由于支持巴黎公社被判流放5年。——26。

博勒特, 亨利希(Bolleter, Heinrich)——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索霍区拿骚街2号一家小饭馆老板, 工人经常在他的饭馆里开会;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

- 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26,152。
- 博雷,埃蒂耶纳(Borret, Étienne)——489。
-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 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384。
- 布尔加科夫,雅柯夫·伊万诺维奇(Булгаков, 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1743—1809)——俄国外交官,曾任驻波兰公使(1790—1792)。——42。
- 布克哈德(Burkhard, A.)——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19世纪60年代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秘书。——524。
- 布莱克本,弗兰西斯(Blackburne, Francis 1782—1867)——爱尔兰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担任英国爱尔兰司法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350。
- 布莱克莫尔(Blackmore [Blackmoor], W.)——英国面包工人;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改革同盟盟员。——26。
- 布赖特施韦特,奥托·路德维希(Breitschwert, Otto Ludwig 笔名路德维希·奥托 Ludwig Otto 1836—1890)——德国新闻工作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26。
- 布兰特,亨利希·冯(Brandt, Heinrich von 1789—1868)——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一书的作者。——283。
- 布朗,约翰(Brown, John 1800—1859)——美国农民,废奴运动革命派活动家之一;堪萨斯反奴隶主武装斗争(1854—1856)的积极参加者;1859年打算在弗吉尼亚州发动黑奴起义,被送交法院,后被处死。——321。
- 布朗沙尔(Blanchard, D. A. 死于1869年)——日内瓦印刷厂主,国际会员。——489。
- 布雷布鲁克(Braybrooke, S. H.)——540。
- 布雷希特尔(Brechtel, C. 死于1898年以后)——1866年起为瑞士德语区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成员(1870年1—3月)。——489。
- 布里斯梅,德西雷·让·弗朗索瓦(Brismée, Désiré-Jean-François 1822—1888)——比利时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部(1865)创建人之一,1869年起为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总

- 委员会)委员,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追随巴枯宁派,后抛弃无政府主义,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568。
- 布里索,雅克·让·皮埃尔(Brissot, Jacques-Jean-Pierre 1754—1793)——法国政治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后为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56。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27、28—31。
- 布罗纳,爱德华(Bronner, Eduard)——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制宪议会议员,后侨居英国。——28。
- 布罗伊伯爵,沙尔·弗朗索瓦(Brogie [Broglio], Charles-François, comte de 1719—1781)——法国外交家,1752年起为驻波兰公使,路易十五时期为秘密外交工作主管大臣。——35—37。

C

- 策勒,菲·(Zöller, Phil.)——488。
- 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弗里德里克·米哈乌(Czartoryski, Fryderyk Michał, Fürst 1696—1775)——波兰国务活动家,1724年起为立陶宛副总管和1752年起为总管。——36。
- 查耳迪尼,恩里科(Cialdini, Enrico 1811—1892)——意大利将军,曾参加1848—1849年民族解放战争和克里木战争,1855年为克里木撒丁军旅长,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师,1860—1861年指挥撒丁军队同那不勒斯军队作战,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军长。——247、250。
-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343、344。
-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33、345。
- 查理六世(Karl VI 1685—174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1740),莱奥波德一世之子。——33、34。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282。

查理十二世(Karl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34。

查塔姆——见皮特(老皮特),威廉。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18、336。

达弗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 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Temple-Blackwood, Marquess of 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曾参加格莱斯顿内阁(1868—1872),加拿大总督(1872—1878),驻彼得堡大使(1879—1881),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81—1882),驻埃及大使(1882—1883),印度总督(1884—1888)。——323、358。

达武,路易·尼古拉(Davout, Louis-Nicolas 1770—1823)——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密友,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48。

戴特拉(Détraz, Ch.)——489。

戴维森(Davisson, A. N.)——曼彻斯特席勒协会秘书(1867—约1870)。——468、548。

戴维斯,杰弗逊(Davis, 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大种植场主奴隶主,属于民主党,南部奴隶主叛乱策划者之一;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积极参加者;曾任美国陆军部长(1853—1857),南部同盟总统(1861—1865)。——150。

德巴普,塞扎尔·艾梅·德西雷(De Paeppe, César-Aimé-Désiré 1841—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1865);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书记(1868—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85)。——514、515、519。

德比伯爵——见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史密斯。

德尔,威廉(Dell,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裱糊

工；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和财务委员(1865和1866—1867)，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26、151、278、301、477、576。

德金德伦(Derkinderen)——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荷兰通讯书记(1867)。——320。

德拉克鲁瓦·德·孔托,沙尔(Delacroix de Contaut [de la Croix], Charles 1741—1805)——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国民公会代表；曾任外交部长(1795—1797)。——45。

德拉罗卡——见莫罗佐·德拉罗卡,恩里科。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142。

德勒克吕兹,路易·沙尔(Delescluze, Louis-Charles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北部省政府委员,曾被缺席判处流放,后逃往英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回到法国；1854年因密谋反对第二帝国而被捕；1868年是《觉醒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参加者,1871年国民会议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福利委员会委员(5月)和军事代表,1871年5月25日在巴黎巷战中阵亡。——585。

德努阿尔,茹尔(Denoual, Jules)——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26、509。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de 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406。

德韦特(De Witte, J.)——比利时彩画工人,1867年建立的国际列日支部临时

- 委员会委员。——569。
- 狄德罗, 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
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 启蒙思想家, 百科全书派领袖;
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230。
- 迪克, 亚历山大(Dick, Alexander)——英国工联主义者, 职业是面包工人, 面包
工人联合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 1865年因迁
居新西兰, 被委任为国际新西兰通讯书记。——26。
- 蒂博多伯爵, 安东·克莱尔(Thibaudeau, Antoine-Clair, comte 1765—
185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民公会代表;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1852年起为元老院议员。——49。
- 蒂尔, 伊什特万(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 意大利和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和土耳其;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站
在联军一边; 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 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
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1861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142。
- 东布罗夫斯基, 扬·亨利克(Dąbrowski [Dombrowski], Jan Henryk 1755—
1818)——波兰将军; 波兰1794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1806年起义的组织
者, 拿破仑第一远征(1806—1807、1809和1812)的参加者。——44—47。
- 杜邦, 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法国工人, 国际工人运动活
动家,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者, 1862年起住在伦敦, 1870年起住在曼彻
斯特,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 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 伦敦
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 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
主席,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的代表; 《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 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1868年以前),
曼彻斯特法国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1874年迁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26、152、
217、300、320、490、494、502、503、576、577。
- 杜尔哥, 安娜·罗伯尔·雅克, 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重农学派的
最大的代表, 魁奈的学生; 财政总稽查(1774—1776)。——427。
- 杜兰多, 贾科莫(Durando, Giacomo 1807—1894)——意大利将军, 1866年普奥
战争时期任意军第一军军长。——249。
- 杜梅尼尔-马里尼, 茹尔(Dumesnil-Marigny [Du Mesnil-Marigny], Jules 1810—

1885)——法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际会员,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514。

杜诺,安东(Dunaud, Anton)——瑞士刻版工;在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封代表大会(1870年4月)上反对巴枯宁派。——489。

杜诺瓦耶,巴泰勒米·沙尔·皮埃尔·约瑟夫(Dunoyer, Barthélemy-Charles-Pierre-Joseph 1786—1862)——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60。

杜普拉,路易(Dupras, Louis)——1869年春建筑工人罢工时期同政府谈判的日内瓦建筑工人代表。——489。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305、314、476。

多纳(Donat)——489。

E

恩斯特(Ernst 1824—1899)——奥地利大公,将军,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奥军第三军军长。——258。

F

法维埃,让·路易(Favier, Jean-Louis 1711—1784)——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路易十五时期为密使。——36、38、39、40。

方塔纳,朱泽培(Fontana, Giuseppe 1840—1876)——意大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会委员(1864—1865),意大利通讯书记(1864—1865)。——26。

菲茨杰拉德,爱德华(Fitzgerald, Edward 1763—1798)——爱尔兰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组织者之一,曾领导1798年爱尔兰起义的准备工作。——341、347—348。

菲力浦二世(Felipe [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150。

菲利浦斯,温德尔(Phillips, Wendell 1811—1884)——美国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演说家,废奴运动革命派领袖之一,主张用革命的方法反对南方奴隶主,全国反奴隶制协会主席(1865—1870);7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主张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1871年加入国际。——571。

- 菲利凯, 路易(Fulliquet, Louis)——瑞士工人; 国际会员, 日内瓦细木工和硬木工支部书记。——489。
- 菲耶塔(Fillietaz, G.)——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489。
- 斐迪南, 卡尔·约瑟夫(Ferdinand, Karl Josef 1781—1850)——奥地利大公; 陆军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50。
- 斐迪南多二世,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两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34。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F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55、286。
- 费格勒, 奥古斯特(Vögele, August)——德国流亡者, 1859年是伦敦霍林格勒的印刷所排字工人。——29。
- 费里埃, 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 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 国家官员。——304。
- 封丹, 莱昂(Fontaine, Léon 1834—1895)——比利时新闻工作者, 蒲鲁东主义者, 比利时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1865年为比利时支部临时通讯员,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519。
- 弗尔斯特林, 埃米尔(Försterling, Emil 1827—1872)——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职业是铜匠,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建立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68),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7—1870)。——474。
- 弗格森, 亚当(Ferguson, Adam 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休谟的追随者, 亚·斯密的老师。——412。
-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 称弗兰茨二世。——52。
- 弗里布尔, 厄内斯特·爱德华(Fribourg, Ernest-Édouard)——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工, 后为商人;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 各种工人报纸编辑部成员; 1867年作为记者参加洛桑代表大会; 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119、121、124、133、509、513、514。
-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35、36。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I 1750—1827)——萨克森选帝侯(1763—1806),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国王(1806—1827)。——48、51。
-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Friedrich Karl, Prinz 1828—1885)——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为普军总司令,后为联军总司令;普奥战争时期(1866)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普法战争时期(1871—1872)任第二军团司令,80年代为骑兵总监。——239、253、256、257。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德国将军,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团司令,1870年10月起为元帅;1888年起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239、252、256、257。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35—38、41、44。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49、238。
- 弗里蒙特,约翰·查理(Fremont, John Charles 1813—1890)——美国探险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1856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期为密苏里州(1861年11月以前)和弗吉尼亚州(1862)的北军指挥官。——30。
- 弗里斯(Friess, J. [Fries])——国际会员和瑞士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488。
- 弗利斯,爱德华(Flies, Eduard 1802—1886)——普鲁士将军,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骑兵旅旅长,后为骑兵师师长。——255。
- 弗利特伍德,查理(Fleetwood, Charles 死于1692年)——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将军,1652年起任爱尔兰英军总司令,爱尔兰总督(1654—1657)。——344。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525。
- 福尔纳雄(Fornachon, L. H. 死于1898年以后)——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489。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

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28、29、142、468。

福克斯,彼得(Fox, Peter 原名福克斯·安德烈 Fox André 1831/1832—1869)——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实证论者;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1866年9—11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美国通讯书记(1866—1867);《共和国》周报的编辑之一(1866),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26、32、33、35、134、148、152、216、300、301、575、576。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62、63、230。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5、314、363。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181。

G

盖,德西雷(Gay, Désirée)——489。

盖,弗朗索瓦(Gay, François)——489。

盖,茹尔(Gay, Jules 1807—1876以后)——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主义者;1849年在巴黎出版《共产主义者》;国际会员。——488。

盖布,威廉·莱奥波德·奥古斯特(Geib, Wilhelm Leopold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334。

盖里(Guerry)——489。

冈迪永,阿米(Gandillon, Ami)——489。

哥特罗,茹尔(Gottraux, Jules)——英国籍的瑞士人,国际会员。——555。

哥特洛布,瓦尔特(Gottlob, Walter)——489。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5、7、321、479、480。

格朗热, 沙尔(Grange, Charles)——瑞士抹灰工, 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员。——489。

格雷, 罗吉尔(Gray, Roger)——英国泥水匠, 《蜂房报》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长,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改革同盟盟员。——26。

格雷戈里十三世(Gregorio XIII 1502—1585)——罗马教皇(1572—1585)。——343。

格罗斯, 亨利希(Gross [Гросс], Heinrich 死于1765年)——俄国外交家, 德国人; 曾任俄国驻华沙公使, 1765年任驻伦敦公使。——36、38。

格罗斯密斯, 约翰(Grossmith [Grosmith], John 死于1870年以前)——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和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26。

格律恩, 卡尔(Grün, Karl 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 属于左翼,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 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 1861年回到德国, 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 1870年到维也纳; 1874年出版了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57。

格桑-哈第, 格桑(Gathorne-Hardy, Gathorne 1814—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 保守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1867—1868)。——319。

古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 1746—1792)——瑞典国王(1771—1792)。——40。

H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129、144、145、474。

哈尼, 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民主派

- 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525。
- 哈特韦耳, 罗伯特(Hartwell, Robert 死于1812年左右)——英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后为印刷所老板;宪章主义者,《蜂房报》编辑之一;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会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伦敦工人协会书记。——26。
- 海伯林, 阿道夫(Haerberling, Adolphe)——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发起委员会成员。——489。
-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128。
- 海涅, 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40。
- 海特男爵, 奥古斯特(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银行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12月—1862年)和财政大臣(1862、1866—1869);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333。
- 海伍德, 奥利弗(Heywood, Oliver 1825—1892)——541。
- 汉森, 内尔斯·彼得(Hansen, Niels Peter)——丹麦裁缝;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2月—1867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参加者,丹麦通讯书记(1866),丹麦和荷兰通讯书记(1867)。——26、151、301、576。
- 豪弗, 阿尔伯特(Haufe, Albert F.)——德国裁缝,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234。
- 豪威耳, 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书记(1865—1869),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议会议员(1885—1895)。——26、152、

277、477、513。

荷兰的威廉——见威廉三世(奥伦治的)。

赫斯,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12月为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67。

黑尔斯,约翰(Hales, John 生于1839年)——英国工人,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人代表同盟的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曾参加巴枯宁的少数派,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年11月);从1872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和分裂派;该派伦敦代表大会(1873)的组织者;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477。

黑尔瓦尔特·冯·比滕费尔德,卡尔·埃伯哈德(Herwarth von Bittenfeld, Karl Eberhard 1796—1884)——普鲁士将军,1871年起为元帅;1864年丹麦战争的参加者,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易北河军团司令。——253、256、257。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55、57、58、449。

亨利二世(金雀花王朝的)(Henry II Plantagenet 1133—1189)——英国国王(1154—1189)。——342。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399。

亨尼西,约翰·波普(Hennessy, John Pope 1834—189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保守党人,60年代初曾在议会提出在爱尔兰实行一系列小改良的提案。——358。

胡森,爱德华(Hooson, Edward 1825—1869)——英国工人,宪章运动的拥护者。——139。

华金,爱德华·威廉(Watkin, Edward William 1819—1901)——英国工业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480。

惠勒,乔治·威廉(Wheeler, 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年

- 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4—1865和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成员。——26、152、217、502、504、513。
- 惠特洛克,约翰(Whitlock, John)——英国工联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总委员会财务书记,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26、152。
-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 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 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88。
- 霍尔托普,扬·埃米尔(Holtorp, Jan Emile)——在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6年),波兰通讯书记(1864—1865),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1866年参加马志尼创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26、152、502、503。
- 霍夫(Hoff)——31。
- 霍夫施泰滕,约翰·巴蒂斯特(Hofstetten, Johann Baptist 死于1887年)——巴伐利亚军官,后为新闻工作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4—1868);《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和编辑之一(1864—1867);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代表;后脱离工人运动。——329、331、334。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286。
- 霍吉科,莱奥纳德(Chodźko [Chodzko], Leonard 1800—1871)——波兰作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时期为驻巴黎公使馆成员。——44。
- 霍林格尔,菲德利奥(Hollinger, Fiedelio)——瑞士排字工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后为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29。
- 霍洛韦(Holloway)——31。

J

- 基谢廖夫伯爵,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рав 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将军;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1829—1834),枢密院农民问题委员会常务委员(1835),国家产业大臣(1837—1856);1837—1841年实行了温和的改革;俄国驻巴黎大

- 使(1856—1862)。——443。
- 吉布森,威廉(Gibson, William C.)——美国全国劳工同盟盟员,同盟的国际联络书记(1866—1867)。——571—574。
- 吉尔莫(Guillmeaux)——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会员,钳工和机械工支部书记。——489。
- 吉奈,珍妮(Guinet, Jenny)——489。
- 济贝耳,卡尔(Siebel, Karl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远亲。——118、145。
- 加布伦茨,路德维希·卡尔·威廉(Gablenz, Ludwig Karl Wilhelm 1814—1874)——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1859年奥意法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的参加者。——257。
- 加德纳,罗伯特(Gardner, Robert)——英国棉纺织厂厂主,1844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顿各企业的工作日从12小时缩减到11小时。——418。
- 加尔巴尼,保尔(Garbani, Paul)——489。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251。
- 焦耳,本杰明·圣约翰(Joule, Benjamin St. John B. 1817—1895)——英国教堂乐师。——541。
- 杰瑟普,威廉(Jessup, William J. 1827—1873)——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1866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1867年起为同盟纽约州通讯书记,纽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加入国际。——573。
- 居约(Guyot, Ch.)——489。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

- 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60。
-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编纂家。——285。
-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798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起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799—1801),陆军和殖民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327。
- 卡塔兰,阿道夫(Catalan, Adolphe)——瑞士新闻工作者,《自由报》编辑,国际会员。——489。
- 卡特,詹姆斯(Carter,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理发师,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意大利通讯书记(1866—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26、152、301、576。
-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inor 公元前95—46)——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领袖。——30。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55、56、57。
- 考布,卡尔(Kaub, Karl)——德国商人,侨居伦敦,1865年后侨居巴黎;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和1870—1871),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26、151。
-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555。
-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szko [Kosciuszko], 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波兰军队总司令;1796年流亡美国,1798年移居法国,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合作。——41、44。

- 柯普,詹姆斯(Cope, James)——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曾参加伦敦鞋匠协会委员会、工联伦敦理事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513。
- 柯普兰(Copeland)——英国无神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477。
- 科恩,詹姆斯(Cohn [Cohe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丹麦通讯书记(1870—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工人代表同盟执行委员会成员(1870)。——477。
- 科尔森,埃德温(Coulson, Edwin 1828左右—1893)——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泥水匠协会伦敦分会书记(1860—1890),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51、513。
-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144。
- 科兰库,阿尔芒·奥古斯坦·路易(Caulaincourt, Armand-Augustin-Louis 1772—1827)——法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驻俄国大使(1807—1811),外交大臣(1813—1814和1815)。——51。
- 科勒,约瑟夫(Collet, Joseph)——法国新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者,侨居伦敦,全国改革同盟成员;《国际信使》(英文版和法文版)和《工人报》的出版人和编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555、572。
- 科佩,路易·德(Coppet, Louis de)——489。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42。
- 科塔姆,赛米尔(Cottam, Samuel 1827—1896)——540。
- 科谢克(Koszek)——572。
- 克拉里奥尔(克拉里翁)(Clariol [Clarion])——1865年参加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巴黎印刷工人协会的代表。——514。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 George

-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480。
- 克拉姆-加拉斯,爱德华(Clam-Gallas, Eduard 1805—1891)——奥地利将军,原系匈牙利人,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1859年奥意法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军长。——256。
- 克拉普卡,乔治(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年流亡国外;50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曾一度任拿破仑·约·沙·保·波拿巴的秘书;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143。
- 克朗普顿(Crompton, J.)——541。
- 克雷蒂诺-若利,雅克(Créteineau-Joly, Jacques 1803—1875)——法国文学家和历史学家。——51。
- 克雷斯佩耳(Grespelle)——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在支部中捍卫了总委员会的路线。——216。
- 克里默,威廉·兰德尔(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粗细木工联合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普法战争时期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1885—1895和1900—1908)。——26、139、152、217、502、504、506、513。
- 克利莫什(Klimosch, 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52。
- 克林斯,卡尔(Klings, Karl 1825左右—1874以后)——德国五金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5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国际芝加哥支部的活动。——145。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

- 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326、341、343、344、579。
- 克伦威尔,亨利(Cromwell, Henry 1628—1674)——英国议会军将军,曾参加奥·克伦威尔对爱尔兰的讨伐(1649—1650),1654年任爱尔兰军队司令,总督(1657—1658),爱尔兰总督(1658—1659),奥·克伦威尔的儿子。——344。
- 克罗塞,爱德华(Crosset, Edouard)——瑞士印刷工人,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成立大会(1869年1月)的参加者。——489。
- 克罗谢,弗朗索瓦(Crochet, François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木工。——489。
- 克罗泽(Croset, J.)——489。
- 克罗泽,叙泽特(Croset, Suzette)——489。
- 克尼亚杰维奇,卡罗尔·奥托(Kniaziewicz, Karol Otto 1762—1842)——波兰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1794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任拿破仑军队中的波兰军团指挥官,法军旅长,1812年指挥一个师;1831年为在巴黎的波兰起义代表。——46。
-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德(Condillac, Étienne-Bonnot de 1715—1780)——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约·洛克的追随者。——389、431。
- 库尔图瓦,雅克(Courtois, Jacques)——瑞士家具工,国际会员。——489。
- 库尔基亚里,多梅尼科(Cucchiari, Domenico 1806—1900)——意大利将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皮埃蒙特师,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意军第二军军长。——249。
- 库拉金公爵,亚历山大·波里索维奇(Кура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князь 1752—1818)——俄国外交家,副总理大臣(1796—1798和1801—1802),1807年参加签订俄法之间蒂尔西特和约,曾任驻巴黎大使(1808—1812)。——50。
- 库兰(Coulin, L.)——489。
-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405。

L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

- 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248、285。
- 拉尔多,弗朗索瓦-大卫(Lardaux, François - David 1814 —1866)——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政变后被流放非洲,后流亡伦敦;索霍区一家小饭馆的老板,流亡者曾在他的饭馆里集会;国际会员,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525。
-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笔名保尔·洛朗 Paul Laurent 1842 —191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马德里新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301、320、525、526、527、532、576。
- 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莫蒂埃(Lafayette, Marie - Joseph - Paul - Roch - Yves - 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 —1834)——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282。
- 拉克勒泰尔,让·沙尔·多米尼克·德(Lacretelle, Jean - Charles - Dominique de 1766 —185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1809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1816年起任法兰西学院院长。——43。
- 拉马,多梅尼科(Lama, Domenico)——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主席,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26。
-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 —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 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210。
-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1796),在概率论(1812)等方面有重要贡献。——318。
- 拉普拉斯,雅克(Laplace, Jacques)——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会员。——489。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30、31、110、128、129、130、140、144、145、146、304、305、308、314、316、336、337、470、471、473、474、475、512。
- 拉萨西(Lassassie, F. de)——法国理发师,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8),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在支部中捍卫了总委员会的路线。——152。
- 莱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1747—1792)——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1792)。——42。
- 莱克,乔治(Lake, George)——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细木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和改革同盟盟员。——26。
- 莱波克(Leppoc, H. J.)——541。
- 莱什琴斯基,斯塔尼斯拉夫(Leszczynski [Leszczynski], Stanisław 1677—1766)——波森伯爵,波兰国王,称斯塔尼斯拉夫一世(1704—1709和1733—1736),1736年起为洛林公爵;路易十五的岳父。——34。
- 莱斯利,托马斯·爱德华·克利夫(Leslie, Thomas Edward Cliffe 1827左右—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24、357。
-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584。
- 兰伯特,约翰(Lambert, John 1619—1683)——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议会军的将军,参加了跟王党军队作战的历次重要战役和出征苏格兰,1652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344。

-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62。
- 朗梅德,约翰(Longmaid, John H.)——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26、152。
- 朗敏,威廉(Ramming, Wilhelm 1815—1876)——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1848—1849年革命,1859年奥意法战争时期任旅长,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军长。——255—257。
-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304、314。
- 劳,威廉(Rau, Wilhelm 约生于1827年)——瑞士木工,1866年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国际瑞士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成员。——489。
- 劳默,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奥尔格·冯(Raumer, Friedrich Ludwig Georg von 1781—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教授,1848年任驻巴黎公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62。
- 勒福尔,昂利(Lefort, Henry 1835—1917)——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联合》杂志编辑部成员;曾参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准备,1865年3月断绝同国际的一切联系。——119、121、123、124、133—137、509。
- 勒鲁(Le Roux)——在伦敦的法国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26。
- 勒吕贝,维克多(Le Lubez, Victor 生于1824年)——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作为法国侨民的儿子在泽西岛长大,1858年侨居伦敦;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6),法国通讯书记(1864—1865),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25、119、134—138、149、217、508、509、519。
- 雷布钦斯基,弗兰齐谢克(Rybczyński [Rybczinski], Franciszek)——在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26。
- 雷蒙,沙尔(Raymond, Charles)——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成立大会(1869年1

- 月)的代表,日内瓦中央支部书记(1870)。——489。
- 雷米,泰奥多尔(Remy, Theodor)——瑞士教师,约翰·菲利浦·贝克尔所领导的国际瑞士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书记,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小组的成员。——488。
- 雷斯,埃米尔(Reiss, Emil 1836左右—1913)——商人,雷斯兄弟公司共有人。——541。
- 雷斯,詹姆斯·爱德华(Reiss, James Edward)——商人,雷斯兄弟公司共有人。——541。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44、145、474、484。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58、146、178、210、305、306、309、336。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304。
- 利弗森,蒙塔古(Leverson, Montague)——英国人,1865年3月1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大会的参加者。——148。
- 利穆赞,安东(Limousin, Antoine)——法国工人,合作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1865年中以前为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沙·利穆赞的父亲。——133。
- 利穆赞,沙尔·马蒂厄(Limousin, Charles-Mathieu 1840—1909)——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后为新闻工作者,《联合》杂志管理委员会秘书,参加《工人论坛》编辑部;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者;国际会员,1865年为巴黎支部成员,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1870年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合作运动的参加者和许多杂志的出版者;安·利穆赞的儿子。——121、513、514。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民主派

- 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48、50、525。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bner [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3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6、151、217、542。
- 林德格尔,安东(Lindegger, Antoine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装卸工;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成员。——488。
-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采取革命措施进行战争;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24、25、150、151、528。
- 刘易斯,乔治·康沃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2—1855年为《爱丁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1855—1858),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480。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左岸》的编辑(1864—1866);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和1871—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66),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主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80—90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女儿燕妮的丈夫。——216。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62、63、

230。

鲁埃, 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 --188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 1849—1852年曾断续地担任司法部长和司法大臣; 第二帝国时期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国务大臣(1863—1869)、参议院议长(1869—1870); 第二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 70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领袖之一。——462。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器匠,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26、152、477。

鲁缅采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Румянце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1754—1826)——俄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外交大臣(1807—1814), 国务会议议长(1810—1812)。——42、49、51。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32、33、384。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33、34、40。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40。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 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0。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斯, 莱昂(Lewis, Leon)——美国新闻工作者, 1865年在伦敦被选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502、504。

吕利埃尔, 克劳德·卡洛芒·德(Rulhière, Claude-Carloman de 1735—1791)——法国历史学家和诗人, 1787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34、35、36。

吕宁, 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德国医生和政论家, 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 后一度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威悉河汽船》(1844)、《威斯特伐利亚汽船》(1845—1848)和《新德意志报》(1848—1850)

- 编辑;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9。
- 吕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60年以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加里波第对南意大利的远征,拉萨尔的朋友。——128。
- 吕谢(Ruchet, Ch.)——489。
- 罗,哈丽雅特(Law, Harriet 1832—1897)——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477。
- 罗昂伯爵,阿尔布雷希特·泰奥多尔·埃米尔(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1803—1879)——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普鲁士首相(1873年1—11月)。——78、81、83、88。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167。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6、151。
- 罗塞蒂,布莱兹——见罗塞蒂,比亚乔。
- 罗塞蒂,比亚乔(Rossety [Rossetti], Biagio)(布莱兹 Blaise)——意大利工人,国际日内瓦意大利支部主席,1870年起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489。
- 罗沙(Rochat, F.)——488。
- 罗斯,乔治(Rose, George 1744—181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财政大臣(1782—1801),议会议员。——208。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56—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

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479、480。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304、314。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304。

M

马蒂斯(Matis, A.)——489。

马尔,托马斯·弗兰西斯(Meagher, Thomas Francis 1823—1867)——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爱尔兰同盟创始人之一(1847);1848年由于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1852年逃到美国;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为爱尔兰志愿兵旅长,站在北部方面作战。——349、358、580。

马尔蒙,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路易·德(Marmont, August-Frédéric-Louis de 1774—1852)——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4年4月投靠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时期为查理十世军队的指挥官。——49。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55、203。

马尔提尼(Martini)——奥地利军官,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团长。——254。

马圭尔,托马斯(Maguire, Thomas)——爱尔兰水手,1867年被控图谋组织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越狱而被非法逮捕,被判处绞刑;不久获释。——319。

马劳达(Marauda)——488。

马里伊,约瑟夫(Marilly, Joseph)——489。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31、

510、519、526。

玛丽·路易莎(Marie Louise 1791—1847)——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的女儿，奥地利女大公，拿破仑第一个妻子的第二个妻子，法国皇后。——52。

玛丽·路易莎·约瑟芬(波旁的)(Marie-Louise-Joséphine de Bourbon 1782—1824)——1798年起为帕尔马公爵路易·波旁的妻子，伊特鲁里亚女王(1801—1807)。——46。

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索菲娅·多罗苔娅)(Мария Фёдоровна [geb. Sophia Dorothea, Prinzessin von Württemberg] 1759—1828)——符腾堡公主，俄国皇帝保罗一世的第二个妻子，亚历山大一世的母亲。——51。

迈尔，卡尔(Mayer, Karl 1819—1889)——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63年返回德国，60年代为德国人民党领导成员，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28。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德国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118、125、127、304、308、313、316、335、338、359。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405。

曼托伊费尔男爵，埃德温·汉斯·卡尔(Manteuffel, Edwin Hans Karl Freiherr von 1809—1885)——普鲁士将军，1873年起为元帅，石勒苏益格总督和驻石勒苏益格普军司令(1865—1866)，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为第一军团(1870年10月起)和南方军团(1871年1月起)司令，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871—1873)；奥·泰·曼托伊费尔的弟弟。——255。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埃·汉·卡·曼托伊费尔的哥哥。——90、92、93、97、100、109、333。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

- 职,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238。
- 梅尔西·达尔让托伯爵,弗洛里蒙德(Mercy d'Argenteau, Florimund Graf 1727—1794)——奥地利外交家,1761年起任驻彼得堡公使,1780年任驻巴黎公使和1790年任驻伦敦公使。——40。
- 梅利奈,弗朗索瓦(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法国人,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爾民主协会名誉主席,里斯孔图案件的被告之一,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1849年9月被赦免。——525。
- 梅米约,弗朗索瓦(Mermillod, François)——瑞士制盒工人;国际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副主席。——489。
-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163。
- 门德,弗里茨(Mende, Fritz 死于1879年)——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建立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9—1872),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9)。——474。
-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87。
- 米尔纳,乔治(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职业是裁缝;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秋起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反对脱离派。——477、589。
- 米切尔,安德鲁(Mitchell, Sir Andrew 1708—1771)——英国外交家和政治家,1753年起任驻柏林公使。——38。
-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Morton, John Chalmers 1821—1888)——英国农学家,《农业报》编辑(1844—1888),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169。

- 摩尔根, 威廉 (Morgan,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0 月—1868 年) 和改革同盟盟员。——26、152、513。
- 莫莱 (Maulet, J.)——489。
- 莫里斯, 捷维 (Maurice, Zévy)——匈牙利裁缝和店主, 流亡伦敦;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72), 匈牙利通讯书记 (1870—1871)。——477。
- 莫里索 (Morisot [Morrissot])——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26。
- 莫利纽, 威廉 (Molyneux, William 1656—1698)——爱尔兰哲学家, 曾研究数学和天文学。——346。
- 莫罗, 让·维克多·玛丽 (Moreau, Jean-Victor-Marie 1763—1813)——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46。
- 莫罗佐·德拉罗卡, 恩里科 (Morozzo della Rocca [Della Rocca], Enrico 1807—1897)——意大利将军, 1848—1849 年和 1859 年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陆军和海军大臣 (1849), 1859 年奥意法战争时期任意大利军队总参谋长,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任意军第三军军长。——249。
- 莫纳雄 (Monachon, L.)——489。
- 姆罗奇科夫斯基, 瓦列里扬 (Mroczkowsky Walerjan 1840—1889)——波兰 1863 年起义的参加者, 职业为摄影师; 巴枯宁主义者, 公开同盟和秘密同盟的成员。——488。

N

-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 (1804—1814 和 1815)。——41—52、63、238、283、285、348。
-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 (1848—1851), 法国皇帝 (1852—1870), 拿破仑第一的侄子。——62、63、107、130、224、226、322、469。
- 纳皮尔, 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奇 (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 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 (1808—1814)。——85。
- 内森, 爱德华 (Nathan, Edward)——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德一家公司共有人。——541。

内森, 保罗(Nathan, Paul)——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德一家公司共有人。——541。

尼德格尔, 路易(Niedegger, Louis)——488。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48、282、283。

尼科尔森(Nicholson, R.)——541。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54—68)。——9。

尼亚斯, 约翰(Nieass, John D.)——英国泥水匠,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26、152。

涅姆采维奇, 尤利安·乌尔森(Niemcewicz, Julian Ursyn 1757—1841)——波兰国务活动家和作家; 主张改革; 1794年和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写有回忆录。——44。

涅谢尔罗德伯爵, 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 总理大臣(1845年起)。——283。

纽马奇, 威廉(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67。

纽曼, 弗兰西斯·威廉(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167、389。

诺德林格(Nördlinger, S.)——541。

诺思, 弗雷德里克(North, Frederick 1732—1792)——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财政大臣(1767), 首相(1770—1782), 内务大臣(1783)。——39。

诺文斯, 雅克·马尔凯·德, 蒙布雷东男爵(Norvins, Jacques Marquet, baron de Monbreton de 1769—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52。

O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3、167、363、586。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13—14、220、327。

帕斯凯维奇公爵,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282。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

培列,昂利(Perret, Henri)——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雕刻工,在瑞士的国际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1868—1869),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1869—1873),《平等报》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69年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但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和主义立场。——488。

佩拉顿(Pellaton, S.)——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书记。——489。

佩莱格林-德鲁瓦(Pellegrin-Druat, A.)——489。

佩里埃(Perrié)——489。

佩龙,沙尔·欧仁(Perron, Charles-Eugène 1837—1919)——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珐琅彩绘工,后为绘图员;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员,《平等报》编辑(1869),《团结报》编辑和汝拉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工人运动。——488。

皮阿,费利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在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9年回到法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公社报》(1880年9—11月)的出版人和编辑。——452。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 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年); 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479—481、586。
- 皮金(Pidgeon, W.)——英国工联主义者, 面包工人; 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 改革同盟盟员。——26。
- 皮尼埃(Pinière [Pinier] 死于1898年以后)——瑞士小铺老板, 巴枯宁主义者。——489。
- 皮什格吕, 沙尔(Pichegru, Charles 1761—1804)——法国将军, 1794—1795年在荷兰指挥作战。——42。
- 皮斯特尔(Pisteur, Fr.)——489。
- 皮特(Pitt, L. K.)——小威廉·皮特的堂兄弟, 驻彼得堡的英国海外商馆的牧师。——43。
- 皮特(老皮特), 威廉, 查塔姆伯爵(Pitt, William, the Elder, Earl of Chatham 1708—1778)——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之一; 外交大臣(1756—1761), 陆军大臣(1757—1761), 首相(1766—1768)。——39、43。
- 蒲鲁东, 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54—63、130、220、314、454、525。
- 蒲斯, 约翰·威尔克斯(Booth, John Wilkes 1839—1865)——美国演员, 美国内战结束时受南部种植场主的指使刺杀了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150。
- 普尔茨, 路德维希(Pulz, Ludwig 1823—1881)——奥地利将军, 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骑兵旅旅长。——249。
- 普芬德, 卡尔(Pfänder, 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家,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1845年起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6、151。
- 普莱西德, 玛格丽特(Placide, Margaret)——489。

普吕斯曼(Prüsmann, G.)——541。

Q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346。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210。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律师、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139、525。

R

热拉尔,巴尔塔扎尔(Gérard, Balthasar 1558—1584)——狂热的天主教徒,1584年刺杀了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150。

荣克,海尔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26、133、139、149、152、216、217、300、320、490、502、504、508、518、527、576。

茹尔丹,古斯塔夫(Jourdain, Gustave)——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1年起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65),加入费利克斯·皮阿集团。——26。

茹弗鲁瓦,昂利(Jouffroy, Henri)——普鲁士枢密顾问,法国人,写有和翻译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19世纪20—40年代)。——454。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60年代初彼得堡革命小组的参加者;1862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书记,1872年为抗议开除巴枯宁

而退出国际。——488。

若昂纳尔, 茹尔(Johannard, Jules)——489。

若斯特, 让(Jost, Jean)——瑞士日内瓦钳工、机械工和铸工支部书记。——489。

S

萨尔瓦特拉, 纳尔西索(Salvatella, Narciso)——在伦敦的西班牙侨民;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52。

萨朗, 贝尔纳(Sarrans, Bernard 1795—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282。

萨姆森, 亨利(Samson, Henry)——541。

萨瓦里, 安娜·让·玛丽·勒奈, 罗维戈公爵(Savary, Anne-Jean-Marie-René, duc de Rovigo 1774—1833)——法国将军,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警务大臣(1810—1814), 阿尔及利亚总督(1831—1833)。——49。

萨瓦什凯维奇, 莱昂·莱奥波德(Sawaszkiwicz, Leon Leopold 1806—1870)——波兰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法国、比利时和英国。——48。

塞塔奇(Setacci, C.)——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副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0月—1865年)。——26。

赛德, 罗伯特·亨利(Side, Robert Henry)——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6年)。——26。

赛居尔伯爵, 路易·菲利浦(Ségur, Louis-Philippe, comte de 1753—1830)——法国外交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保皇党人; 驻俄国公使(1783—1789)。——37、39、40。

桑顿, 威廉·托马斯(Thornton, William Thomas 1813—18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约·斯·穆勒的追随者。——207。

桑吉内德(Sanguinède, J.)——489。

桑吉内德, 罗莎莉(Sanguinède, Rosalie)——489。

瑟美列, 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 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 1865年回到匈牙利。——143。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520。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51。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208。
- 尚帕尼,让·巴蒂斯特(Champagny, Jean-Baptiste 1756—1834)——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驻奥地利公使(1801—1804),内务大臣(1804—1807),外交大臣(1807—1811)。——51。
-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210。
- 舍伐利埃,弗朗索瓦(Chevallier, François)——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支部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委员会的成员。——490。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5、363。
- 施马尔茨,泰奥多尔·安东·亨利希(Schmalz, Theodor Anton Heinrich 1760—1831)——德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454、455。
- 施派尔,卡尔(Speyer, Carl 生于1845年)——德国细木工;1868年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国际会员,1870年侨居美国,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2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员,1874年9月起为纽约总委员会委员。——483。
- 施泰恩,西吉斯蒙德(Stern, Sigismund J. 1807—1885)——541。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

- 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142。
- 施托伊布,路德维希(Steub, Ludwig 1812—1888)——德国民族志学家,语言学家和著作家,写有许多有关蒂罗尔的专著和介绍。——289。
- 施韦泽,约翰·巴蒂斯特·冯(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拉萨尔派,《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1);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3年起)和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国会议员(1867—1871);1872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54、57、63、128—131、140、483、484。
- 舒尔采-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 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91、146、305、476、512。
- 舒瓦泽尔(舒瓦泽尔-昂布瓦兹)公爵,埃蒂耶纳·弗朗索瓦,斯坦维尔伯爵(Choiseul [Choiseul-Amboise], Étienne-François, comte de Stainville, duc de 1719—1785)——法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驻罗马大使(1753—1757)和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1758—1770年任法国第一大臣,兼外交大臣(1758—1761和1766—1770)和陆军与海军大臣(1761—1766)。——35、39。
- 斯蒂芬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Stephens, Alexander Hamilton 1812—1883)——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1843—1859和1873—1882);南部同盟副总统(1861—1865);1882年任佐治亚州州长。——25。
- 斯蒂芬斯,詹姆斯(Stephens, James 1825—1901)——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机械工程师;芬尼社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领导人;1866年流亡美国。——571。
- 斯科皮尼(Scopini, J. J.)——瑞士日内瓦钳工、机械工和铸工支部书记,后为副

- 书记,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封代表大会(1870年4月)的参加者。——489。
-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46、178、185、210、336、412。
- 史密斯,爱德华(Smith, Edward 1818左右—1874)——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医务专使,济贫委员会委员。——6。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史密斯,德比伯爵(Stanley, Lord Edward Henry Smith,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60—70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1852)、殖民大臣(1858—1859和1882—1885)、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和1874—1878);爱·德比伯爵的儿子。——461、555。
- 斯坦斯比,威廉·狄克逊(Stainsby, William Dixon)——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裁缝;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8),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和工人代表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26、152。
- 斯特普尼,考埃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477。
-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426。
-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344。
- 斯托蒙特子爵,戴维·默里(Stormont, David Murray, Viscount of 1727—1796)——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托利党人;曾任驻华沙公使(1756—1761)、维也纳公使(1763—1772)和巴黎公使(1772—1778),外交大臣(1779—1782)。——40。
- 斯维滕男爵,哥特弗里德(Swieten, Gottfried Freiherr van 1734—1803)——奥地利外交家,70年代任驻柏林公使。——40。
-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

1730—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1756—1763)和俄土战争(1768—1774和1787—1791)的参加者,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1799);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著有《团谟》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著作。——42、45。

苏歇,查理(Souchay, Charles 死于1872年)——英国曼彻斯特商人。——541。

索尔斯比(Saulsby)——英雄号轮船船长;恩格斯曾搭乘该船去瑞典旅行(1867年7月)。——289。

索莱尔,托马斯(Sowler, Sir Thomas 1818—1891)——英国上校,《曼彻斯特信使报》(1825年由他父亲创办)的所有人。——541。

索卢斯特里(Solustri, F.)——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65年)。——26。

T

塔尔博,爱德华(Talbot, Édouard)——法国医生和新闻工作者;1865年为国际会员,卡昂支部创建人之一和通讯员。——217。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Tuckett, John Debell 1786—1864)——英国政论家。——412。

塔朗迪埃,皮埃尔·泰奥多尔·阿尔弗勒德(Talandier, Pierre-Théodore-Alfred 1822—1890)——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协会》杂志的撰稿人;1870年返回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876—1880、1881—1885)。——26、525。

汤恩,西奥博尔德·沃尔夫(Tone, Theobald Wolfe 1763—1798)——爱尔兰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爱尔兰1798年起义的组织者之一。——341、347。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Tremenheere, Hugh Seymour 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屡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9。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46、51、60。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167、186、426。

托伦,昂利·路易(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第三共和国时期为参议员。——121、123、134、137、509、513、514。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389。

W

瓦尔蒂埃(Valltier, A.)——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法国人。——152。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法国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曾一度流亡比利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25日起为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28日即被凡尔赛分子杀害。——513。

瓦瑟(Vasseur, T. 1838左右—1868)——法国白铁工人,国际会员,马赛支部和非沃支部的组织者和通讯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565。

万丹胡亭,阿尔丰斯(Vandenhouten, Alphonse 1842—1894)——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彩画工,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1865),国际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对外联络书记和沙勒罗瓦煤田各城的通讯员。——568、569。

万萨德,皮埃尔·德尼(Vinçard, Pierre-Denis 1820—1882)——法国工人和政论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卢森堡宫委员会;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写有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国际巴黎支部成员。——133、137。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 Benjamin Franklin 1800—187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参议院议长(1867),曾任副总统(1867—1869);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299。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238、252。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341、344、345、579。
- 威廉斯,查理·欧文(Williams, Charles Owen)——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抹灰工,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477。
- 韦济尼埃,皮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0—190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后流亡伦敦,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6),曾参加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于1866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决议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1880年大赦后返回法国。——508、510、514、517。
- 韦雷茨基,约瑟夫·米哈乌(Werecki, Józef Michaz)——波兰画家;民主主义者;1851年移居英国,波兰民主协会领导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217。
- 韦纳(Wehner, J. G.)——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19世纪60年代为席勒协会的司库,恩格斯的熟人。——524、541、548。
-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26、152、157、158、161、162、165—170、172—176、178、209、320、477。
- 维厄,约翰·弗里德里希(Wiehe, Johann Friedrich)——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1859年为伦敦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排字工。——29。
- 维尔霍斯基,约瑟夫·米哈乌(Wielhorski [Vielhorski], Józef Michał 1759—1817)——波兰将军;1794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任拿破仑军队的波兰军团指挥官;1812年为华沙大公国陆军大臣。——45。
- 维尔纽夫,路易·索弗尔·德(Villeneuve, Louis-Sauveur de 1675—1745)——法国外交家,驻土耳其公使(1728—1744);1739年奥地利、俄国和土耳其三国之间缔结贝尔格莱德和约谈判时为中间调停人。——34。

维尔特, 麦克斯(Wirth, Max 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314。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维克多-艾曼努埃尔)(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 撒丁国王(1849—1861), 意大利国王(1861—1878)。——247, 249。

魏德迈, 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 《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 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 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 1851 年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9, 30。

魏斯, 路易(路德维希)(Weiss, Louis [Ludwig] 死于 1898 年以前)——瑞士首饰工人, 约·菲·贝克尔领导的德语区中央委员会委员。——488。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 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 1848 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 1849 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285。

沃邦侯爵, 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384。

沃尔顿, 阿尔弗勒德·阿姆斯特朗(Walton, Alfred Armstrong 生于 1816 年)——英国民主运动活动家, 建筑师, 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改革同盟盟员, 全国改革同盟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0), 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 英国土地占有史一书的作者。——477。

沃尔弗(Wolff, N.)——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26。

沃尔弗, 路易吉(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 马志尼的拥护者,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871 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 被开除出国际。——26, 509, 513, 519。

沃利, 威廉(Worley, William C.)——英国印刷工人, 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盟员, 改革同盟盟员; 1864 年 9 月 28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

- 委员(1864—1867)。——26、152。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169。
- 武赫尔,莱奥波德(Wucher, Leopold 死于1898年以前)——德国裁缝,国际会员,日内瓦裁缝支部主席。——489。

X

- 西尔维斯,威廉(Sylvis, William 1828—1869)——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铸工,国际铸工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59)和主席(1863—1869);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创始人之一(1866)和主席(1868—1869);赞成加入国际。——570—572。
- 西华德,弗雷德里克·威廉(Seward, Frederick William 1830—1915)——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外交官,威廉·亨利·西华德的儿子。——151。
- 西华德,威廉·亨利(Seward, William Henry 1801—1872)——美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共和党右翼领袖之一;纽约州州长(1839—1843),参议员(1849—1861),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国务卿(1861—1869);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151。
-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12、166、167、398、405、440。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210、305。
- 希尔施,麦克斯(Hirsch, Max 1832—1905)——德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弗兰茨·敦克尔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国会议员(1869—1893)。——143、476—478。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468、469、521—523、539、540、544、546。
- 席利,维克多(Schily, Victor 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

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19、121、124、133—137、145、514。

肖,罗伯特(Shaw, Robert 1829左右—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彩画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积极参加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在工联基层组织中宣传国际的思想;总书记(1866—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7—1868),美国通讯书记(1867—1869),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参加者。——26、152、301、320、466、477、513、576。

肖罗克,约瑟夫(Shorrock, Joseph)——541。

谢纳瓦尔(Cheneval, L.J.)——489。

许布纳尔,奥托(Hübner, Otto 1818—1877)——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柏林中央统计档案馆创办人(1849)和馆长,抵押保险公司创办人和董事长(1862—1877)。——303。

Y

雅克拉尔,沙尔·维克多(Jaillard, Charles-Victor 1840—1903)——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1870年起为国际会员,马克思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动。——489。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47—51、285、456。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33、62、222、231、286、287、456、469。

亚历山大,黑森-达姆施塔特亲王(Alexander, Prinz von Hessen-Darmstadt 1823—1888)——奥地利将军,曾参加奥意法战争(1859),1866年普奥战争时指挥几个小邦的联军。——246、255。

耶拉契奇,约西普,布日姆伯爵(Jellačić, Josip Graf von Buzim 1801—1859)——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285。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

(1762—1796)。——36、38、42、43、230、285。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326、343、344、579。

伊索(Aesop [Aisopos]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31。

伊万三世(Иван III 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229。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2、166、167、405。

约翰逊,安德鲁(Johnson, Andrew 1808—1875)——美国国务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田纳西州州长(1853—1857和1862—1865),参议员(1857—1862);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美国副总统(1864—1865年4月)和总统(1865—1869),实行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150、151。

约瑟芬(Joséphine 1763—1814)——拿破仑第一的妻子(1796—1809),法国皇后(1804—1809)。——51。

Z

赞佩里尼(Zamperini, J.)——意大利制帽工,国际意大利日内瓦支部成员。——488。

扎比茨基,安东尼(Zabicki, Antoni 1810左右—1889)——波兰排字工人,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1年后从波兰流亡国外,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起侨居英国,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人,1863年起出版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自由之声》,波兰全国委员会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1),波兰通讯书记(1866—1871)。——300、320、576。

扎哥尔斯基,扬(Zagorsky, Jan)——在瑞士的波兰侨民,和平自由同盟委员会委员。——488、490。

扎梅耳松,阿道夫(Samelson, Adolf 1817—1888)——德国眼外科医生,持自由主义观点,1857年起侨居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席勒协会会员。——541。

詹克斯(Janks, A.)——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52。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343、344。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541、545。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德国教

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 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84、573。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12。

S

塞米拉米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著称。——230。

斯嘉本——莫里哀的喜剧《斯嘉本的诡计》中的人物。——31。

T

提德曼——古代丹麦民歌中的人物。——64—66。

X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313。

希尔德布兰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主要人物。——112。

息息法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

到山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下。“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吃力而徒劳的工作。——382。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204。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Herr Vogt. London 1860)。——28、29、142、468。
- 《[关于不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报》第67号(Erklärung [über die Ursachen des Bruchs mit dem "Social-Demokraten"]。In: Berliner Reform. Nr. 67, 19. März 1865)。——140。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伦敦)第160号。[标题]:《国际工人协会》([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The Bee-Hive Newspaper. London. Nr. 160, 5. November 1864. [U. d. T.];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519。
-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501、510、519。
- 《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载于1865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0号(Provisorische Bestimm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ciation"。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10, 18. Januar 1865)。——265。
-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载于《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

- 日在伦敦成立), 1867年由威斯敏斯特出版公司出版(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Printed by the Westminster Printing Company, 1867)。——451、488、493。
- 《鉴于:(1)比利时议会……》, 载于1868年6月6日《蜂房报》(伦敦)第347号(Considering 1st, that the Belgian Parliament... In: The Bee-Hive Newspaper. London. No. 347, June 6, 1868)。——582。
- 《(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载于1847年9月12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3号(Der Kommunismus des Rheinischen Beobachters.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73, 12. September 1847)。——116。
- 《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译], 载于1865年12月17日《国际工人协会报》(日内瓦)第1期(Règlement provisoire. [Trad. par le Bureau de Paris de l' A. I. T.] In: Journal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Nr. 1, 17. Dezember 1865)。——265。
- 《伦敦代表会议(1865年)通过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Programme du Congrès de Genève adopté à la Conférence de Londres (1865))。——516。
-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6、17和18号“小品文”专栏(Über P. J. Proudhon. [Brief an 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16, 1. Februar 1865; Nr. 17, 3. Februar 1865; Nr. 18, 5. Februar 1865. Rubrik: Feuilleton)。——130。
-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议程》〕,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临时章程》1866年布鲁塞尔版([Programme du Congrès de Genève. (1866.)] In: Manifeste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uivi du Règlement provisoire. Bruxelles 1866)。——263。
-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议程》〕, 载于1866年7月8日《左岸》(布鲁塞尔)第27期。[标题]:《国际工人协会》([Programme du Congrès de Genève. (1866.)] In: La Rive Gauche. Bruxelles. Nr. 27, 8. Juli 1866. [U. d. 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263。
- 《希尔施的自供》, 载于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8期(Hirsch's Selbstbekenntnisse.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8, 5. Mai 1853)。——143。

- 《协会临时章程》，载于[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In: [Karl Marx];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1864)。——124、137、265、501、519。
- 《宣言》，载于《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In: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501。
- 《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Outline of a Report on the Irish Question Delivered to the 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Society in London on December 16, 1867)。——324—325。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57—59、454。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 1. Berlin 1859)。——61、146、305、309、314。
-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一份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声明的草稿》(An die Redaction des "Social-Demokrat". Entwurf für eine gemeinsam mit Friedrich Engels abgegebene Erklärung)。——131。
-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载于1864年12月10日《北极星》(汉堡)第287号(An den Redakteur des "Beobachters" zu Stuttgart. In: Nordstern. Hamburg. Nr. 287, 10. Dezember 1864)。——27、144。
- 《中央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议》(Resolutions of the Central Council on the conflict in the Section de Paris)。——133、134、137、138。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304—318、329—340、359—423、426—450。

弗·恩格斯

- 《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载于1868年10月3日《民主周报》第40期（Zur Auflösung des Lassalleianischen Arbeiter-Vereins. In: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Nr. 40, 3. Oktober 1868）。——474。
-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汉堡版（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118、125—127、470—474。
- 《提德曼老爷 古代丹麦民歌》，载于1865年2月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8号“小品文”专栏（Herr Tidmann. Altdänisches Volkslied.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18, 5. Februar 1865. Rubrik: Feuilleton）。——13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865]年度会费卡》[1865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Member's Annual Subscription Card [for 1865]. [London 1865]）。——20—21、137、217、506。
- 《国际工人协会。会员[1866]年度会费卡》[1865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Member's Annual Subscription Card [for 1866]. [London 1865]）。——266。
-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各协会注册声明]》[1865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Central Council. [Declaration of enrolment for societies.][London 1865]）。——266。
-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致各工人协会的呼吁书。]申请表》[1865年伦敦版]（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Central Council. [Address to working men's societies.]Form of Application. [London 1865]）。——217。
- 《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年版（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1852）。——143。
-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通告（1866年3月19日）]》[传单][1866年曼彻斯特版]（[Zirkular der Manchester Schiller-Anstalt vom 19. März 1866.][Manchester 1866.][Flugbl.]）。——544。
-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872年日内瓦版（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Circulaire privé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2)。——493。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 1865 年 3 月 3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 29 号([Erklärung.] An die Redaction des "Social-Demokrat".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29, 3. März 1865)。——130。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爱尔维修《论精神》(两卷集)1784 年伦敦版第 1 卷(Helvétius: De l' esprit. T. 1. 2. T. 1 Londres 1784)。——60。

〔奥顿诺凡, 玛·J./卢比〕《政治犯。致爱尔兰妇女呼吁书》, 载于 1866 年 1 月 6 日《工人辩护士报》(伦敦)第 148 号。[标题]: 《芬尼运动》([O' Donovan, M. J./Luby]: The State prisoners. An appeal to the women of Ireland. In: The Workman's Advocate. London. Nr. 148, 6. Januar 1866. [U. d. T.]: Fenianism)。——216。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事力量》, 载于 1866 年 5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5507 号(Austrian and Prussian armament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5507, 25. Mai 1866)。——241。

《奥地利军队》, 载于 1866 年 6 月 23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5532 号(The Austrian army.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5532, 23. Juni 1866)。——245。

奥金斯基, 米·《米哈乌·奥金斯基关于 1788—1815 年底波兰和波兰人回忆录》1826 年巴黎—日内瓦版第 1—2 卷(Oginski, M.: Mémoires de Michał Oginski sur la Pologne et les polonais, depuis 1788 jusqu' à la fin de 1815. T. 1. 2. Paris, Genève 1826)。——43—45。

〔奥斯特罗夫斯基, 安·〕《奥斯特罗夫斯基传》(两卷集)1836 年巴黎版第 1 卷([Ostrowski, A.]: Żywot Tomasza Ostrowskiego, Ministra Rzeczypospolitej później prezesa Senatu Księstwa Warszawskiego i Królestwa Polskiego, oraz rys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的著作的版本, 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Wypadków Krajowych od 1763 r. do 1817. T. 1. 2. T. 1. Paryż 1836)。——47。

B

巴拉, 茹·〔(1868年5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8年5月17日《自由报》第47号(Bara, J.: [Speech in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on May 16, 1868.] In: La Liberté, No. 47, 17 mai 1868)。——464, 583。

巴师夏, 弗·《经济的和谐》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 Harmonies économiques. Paris, 1850)。——454。

巴师夏, 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 [P.-J.] Proudhon: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61。

贝克尔, 伯·《斐迪南·拉萨尔悲惨离世内情》1868年施莱茨版(Becker, B.: Enthüllungen über das tragische Lebensende Ferdinand Lassalle's. Schleiz, 1868)。——474。

贝克尔, 伯·《联合会主席 1865年3月22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会员大会上的讲话》, 载于1865年3月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39号附刊(Becker, B.: Rede des Vereins-Präsidenten. . . , gehalten in der Versammlung der Hamburger Mitglieder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am 22. März 1865.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39, 26. März 1865. Beil.)。——142—147。

波措-迪-博尔哥, [沙·安·]《回忆[亚历山大一世]。1814年10月8(20)日》。引自伊·戈洛文《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传》1859年莱比锡—巴黎版(Pozzo di Borgo, [Ch. A.]: Mémoire [à Alexandre I^{er}], 8(20) octobre 1814. Nach: Ivan Golovine: Histoire d' Alexandre I^{er}, Empereur de Russie. Leipzig, Paris 1859)。——285。

布阿吉尔贝尔, 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 P.: 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 argent et des tributs.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384。

[布兰特, 亨·冯]《俄国近年来的政策和军队》1852年柏林版([Brandt, H. von]: Rußland's Politik und He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Berlin 1852)。——283。

- 布里索,雅·皮·《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巴黎—里昂版第6卷(Brisot, J. P.: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et sur le vol, considérées dans la nature et dans la société. In: Bibliothèque philosophique du législateur, du politique, du jurisconsulte. T. 6. Berlin, Paris, Lyon 1782)。——56。
- [布林德,卡·]《共和派的抗议》,载于1864年10月8日《海尔曼》(伦敦)第301号([Blind, K.]: Republikanischer Protest. In: Hermann. London. Nr. 301, 8. Oktober 1864)。——30。
- [布林德,卡·]《尽管观点相近……》,布拉德福德10月25日[通讯],载于1864年11月17日《观察家报》(斯图加特)第268号。[标题]:《卡尔·布林德》([Blind, K.]: Trotz Gesinnungsverwandtschaft... [Korrespondenz aus]: Bradford, 25. Oct. In: Der Beobachter. Stuttgart, Nr. 268, 17. November 1864. [U. d. T.]: Karl Blind)。——28、29。
- [布林德,卡·]《警告》[1859年于伦敦][传单]([Blind, K.]: Zur Warnung. [London 1859.][Flugbl.])。——28。
- [布林德,卡·]《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载于1865年3月5日《新法兰克福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64号“政治概览”栏([Blind, K.]: Die Herren Marx und Engels... In: Neue Frankfurter Zeitung. Frankfurt/Main. Nr. 64, 5. März 1865. Rubrik: Politische Übersicht)。——128。
- 布林德,卡·《声明:驳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說法》,载于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13号附刊(Blind, K.: Erklärung. Zur Abweisung der Angabe als sey ich der Verfasser des Flugblattes “Zur Warn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13, 9. November 1859. Beil.)。——28、29。
- [布林德,卡·]《死亡是伟大的和解者……》,伦敦9月[通讯],载于1864年9月29日《新法兰克福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270号“大不列颠”栏([Blind, K.]: Der Tod ist ein großer Versöhner...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im Sept. In: Neue Frankfurter Zeitung. Frankfurt/Main. Nr. 270, 29. September, 1864. Rubrik: Großbritannien)。——30。

D

《大会对波兰的意义》,载于1865年3月4日《蜂房报》(伦敦)第177号(Great

- meeting for Poland. In: The Bee-Hive Newspaper. London. Nr. 177, 4. März 1865)。——148。
- 德勒克吕兹,沙·《结社权。在正义面前》,载于1868年7月9日《觉醒报》第2号(Delescluze, Ch.: Le droit d'Association. Devant la justice. In: Le Réveil, No. 2, 9 juillet 1868)。——585。
- 德尼,埃·《波兰问题和民主(1—4)》,载于1864年3月5、26日、4月17日、5月29日和6月30日《人民论坛报》(布鲁塞尔)第41、42、43、45和46号(Denis, H.: La question polonaise et la démocratie. I.—IV. In: La Tribune du Peuple. Bruxelles. Nr. 41, 5. März 1864; Nr. 42, 26. März 1864; Nr. 43, 17. April 1864; Nr. 45, 29. Mai 1864; Nr. 46, 30. Juni 1864)。——221。
-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 L. C.: Éléments d'idéologie. Paris 1826)。——406。
- 蒂博多,安·克·《执政府和帝国,或法国和拿破仑·波拿巴的历史(1799—1815)》(十卷集)1835年巴黎版第3卷(Thibaudeau, A. C.: Le Consulat et l'Empire, ou histoire de la France et de Napoléon Bonaparte de 1799 à 1815. T. 1—10. T. 3. Paris 1835)。——49。
-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 [A. R. J.]: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Oeuvres de Turgot. Tome I. Paris 1844)。——427。
- 杜诺瓦耶,沙·《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Dunoyer, Ch.: 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 ou simple exposé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les forces humaines s'exercent avec le puls de puissance. T. 1—3. Paris 1845)。——60。

E

- 《俄国备忘录》,载于1859年7月13日《自由新闻》(伦敦)第7卷第7期(Memoir on Russia,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Emperor. Drawn up by the cabinet in 1837.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Vol. 7. Nr. 7, 13. Juli 1859)。——33。
- 《俄国照会》,载于1848年7月28日《法兰克福总邮报》第210号第2附刊(Die russische Note. In: 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 Nr. 210, 28. Juli 1848. 2. Beil.)。——283。

恩格尔, (恩·)《1855—1862年普鲁士国家征兵活动的结果》, 载于1864年3月《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柏林)第4年卷第3期(Engel, (E.): Resultate des Ersatz-Aushebungsgeschäfts im preussischen Staate in den Jahren von 1855 bis mit 1862. In: 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s. Berlin. Jg. 4. Nr. 3, März 1864)。——77。

F

法维埃, [让·路·]《法国在欧洲政治体系中现状的合理推测》(三卷集)1801年巴黎版第1—2卷(Favier, [J.-L.]: Conjectures raisonnées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France dans le système politique de l'Europe. T. 1—3. T. 1. 2. Paris 1801)。——36—40。

《斐迪南·拉萨尔》, 载于1864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试刊第1号(Ferdinand Lassalle.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1, Probenr., 15. Dezember 1864)。——129—130。

费尔巴哈, 路·《宗教本质讲演录。附附录和注释》1851年莱比锡版(《费尔巴哈全集》第8卷)(Feuerbach, L.: Vorlesungen über das Wesen der Religion. Nebst Zusätzen und Anmerkungen. Leipzig 1851. (Sämtliche Werke. Bd. 8))。——286。

费里埃, 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 F. L. A.: 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304。

福克斯, 彼·《不列颠在爱尔兰的政变》, 载于1865年10月14日《工人辩护士报》(伦敦)第136号(Fox, P.: The British coup d'état in Ireland. In: The Workman's Advocate. London. Nr. 136, 14. Oktober 1865)。——216。

福克斯, 彼·《致〈工人辩护士报〉编辑》, 载于1865年10月21日《工人辩护士报》(伦敦)第137号。[标题]:《爱尔兰民族感情对大不列颠和合众国之间的关系的影晌》(Fox, P.: To the Editor of "The Workman's Advocate". In: The Workman's Advocate. London. Nr. 137, 21. Oktober 1865. [U. d. T.]: The influence of Irish national feeling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216。

福克斯, 彼·《致〈工人辩护士报〉编辑》, 载于1865年10月28日《工人辩护士报》(伦敦)第138号。[标题]:《爱尔兰步履艰难。附附录》(Fox, P.: To the

Editor of "The Workman's Advocate". In: *The Workman's Advocate*. London. Nr. 138, 28. Oktober 1865. [U. d. T.]: *The Irish difficulty. Continued. A postscript*). ——216。

富兰克林, 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 载于贾·斯帕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十卷集), 附注释和作者传记, 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 B.: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In: *The works. 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 Sparks. In 10 vol. Vol. 2. Boston 1836)。——181。

G

盖布, 奥·[《1867年11月24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 载于1867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附刊(Geib, A.: [Speech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 November 24, 1867.] In: *Der Social-Demokrat*, Nr. 139, 29. November 1867, 1. Beilage.)。——334。

格莱斯顿, 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35号。[标题]:《预算》(Gladstone, W.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April 186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35, 17. April 1863. [U. d. T.]: *The budget*)。——8。

格莱斯顿, 威·尤·[《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841号。[标题]:《预算》(Gladstone, W.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7. April 1864.]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841, 8. April 1864. [U. d. T.]: *The budget*)。——5。

格莱斯顿, 威·尤·/约·罗素[1866年5月11日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的信], 载于1866年5月14日《泰晤士报》第25497号(Gladstone, W. E./J. Russell: *To the Governor and Deputy-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May 11, 1866. In: *The Times*, No. 25497, May 14, 1866)。——479。

《工人协会》, [署名]: 昂·托伦, 瓦尔兰, 卡梅利纳, 载于1867年7月20日《法兰西信使报》(巴黎)第33号。[标题]:《国际工人协会》(*Aux sociétés ouvrières*. [Gez.]: H. Tolain, Varlin, Camélinat. In: *Le Courrier français*. Paris. Nr. 33, 20. Juli 1867. [U. d. 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296。

- 《关于“德国作为中欧强国”的军事思想》(续完),载于1864年5月18日《军事总汇报》(达姆施塔特—莱比锡)第39年卷第20期(Militärische Gedanken über die “deutsche Mittelmacht”. (Schluß.) In: 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 Darmstadt, Leipzig. Jg. 39. Nr. 20, 18 Mai 1864)。——82。
- 《关于工业问题和工联与皇家海外机构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with Her Majesty's missions abroad, regarding industrial questions and trades unions. London 1867)。——299。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载于1850年8月10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63期(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returns.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363, 10. August 1850)。——5。

H

- 赫斯, [莫·]《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巴黎1月10日[通讯],载于1865年1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8号“国外”专栏(Heß, [M.]: Die Londoner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10. Jan.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8, 13. Januar 1865. Rubrik: Ausland)。——67、130。
- 赫斯, [莫·]《我最终来了……》,巴黎2月7日[通讯],载于1865年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21号“国外”专栏(Heß, [M.]: Ich komme schließlich...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7. Febr.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21, 12. Februar 1865. Rubrik: Ausland)。——131。
- 赫斯, [莫·]《在下一号上……》,巴黎1月28日[通讯],载于1865年2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6号“国外”专栏(Heß, [M.]: In der, nächster Tage erscheinenden, Nummer...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28. Januar.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16, 1. Februar 1865. Rubrik: Ausland)。——67、131。
-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uch 2. Berlin 1834. Werke. Bd. 4)。——449。
- 华金, 爱·威·[《1866年7月3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6年8月1日《泰晤士报》第25565号(Watkin, E. W.: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July 31, 1866.] In: The Times, No. 25565, August 1, 1866)。——480。

- 怀特,詹·〔(1865年4月2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5年伦敦版第178卷(White,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7. April 1865.]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178. London 1865)。——164。
-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集》(十一卷集),威·莫尔斯沃思第一次收集和出版,1839年伦敦版第3卷(Hobbes, 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 The English works of Hobbes. Now first coll. and ed. by W. Molesworth. In 11 vol. Vol. 3. London 1839)。——188。
- 霍夫施泰滕,约·〔(1867年11月24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上的发言)〕,载于1867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9号第1附刊(Hofstetten, J.: [Speech at the general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 November 24, 1867.] In: Der Social-Demokrat, Nr. 139, 29. November 1867, 1. Beilage)。——329—334。
- 霍吉科,莱·《东布罗夫斯基将军指挥下的波兰军团在意大利的历史》(两卷集)1829年巴黎—日内瓦第2版第1卷(Chodzko, L.: Histoire des légions polonaises en Italie, sous le commandement du Général Dombrowski. 2. éd. T. 1. 2. T. 1. Paris, Genève 1829)。——44。

K

- 〔卡拉姆津,尼·米·〕《俄罗斯国家史》(十一卷集)1835年圣彼得堡第4版第11卷([Карамзин, Н. М.]: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аго. 4. изд. Т. 1—11. Т. 11.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1835)。——285。
-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1838年莱比锡版(《康德全集》第2卷)(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Leipzig 1838. Sämmtliche Werke. Th. 2.)。——55, 57—58。
- 克拉伦登,乔·威·《外交部。5月12日》,载于1866年5月22日《泰晤士报》第25504号。标题:《近来的商业恐慌》(Clarendon, G. W.: Foreign office. May 12. In: The Times, No. 25504, May 22, 1866, in the article "The Recent Commercial Panic")。——480。
- 克雷蒂诺-若利,雅·《面临革命的罗马教会》(两卷集)1859年巴黎版第1卷(Crétineau-Joly, J.: L'eglise romaine en face de la révolution. T. 1. 2. T. 1.

Paris 1859)。——51。

[克里默,威·兰·]《中央委员会英国委员致联合王国工人同志的呼吁书》[1866年伦敦版][传单]([Cremer, W.R.]:An appeal from the British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uncil to their fellow working m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1866.][Flugbl.])。——217。

[肯宁安,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Cunningham, J.]: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 London 1770)。——203。

孔狄亚克,埃·博·《商业和政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选》,附欧·德尔和古·莫利纳里的注释,1847年巴黎版第1卷(Condillac, É. B.: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 In: Mélanges d'économie politique, Tome 1. Commentaire et notes, Par E. Daire et G. Molinari. Paris 1847)。——389,431。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 F.: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In: Physiocrat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artie I, Paris 1846)。——405。

L

拉克勒泰尔,沙·《18世纪法国史》(十四卷集)1825年巴黎—斯特拉斯堡—伦敦版第12卷(Lacretelle, Ch.:Histoire de France, pendant le dix-huitième siècle. T.1—14. T.12. Paris, Strasbourg, Londres 1825)。——43。

拉萨尔,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Lassalle, F.: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Capital und Arbeit. Berlin 1864)。——146,305。

拉萨尔,斐·《就全德工人联合会召开莱比锡代表大会的问题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1863年苏黎世版(Lassalle, F.: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 Zürich 1863)。——471。

拉萨尔,斐·《遗著。书信和著作》1922年斯图加特—柏林版(Lassalle, F.:Nachgelassene Briefe und Schriften. Stuttgart-Berlin 1922)。——146。

莱斯利,克·[《论爱尔兰的经济地位》],载于1867年2月9日《经济学家》(Leslie, C.: [Article on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Ireland.] In: The Economist,

- February 9, 1867)。——324, 357。
- [兰盖, 西·尼·昂·]《民法论, 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 ([Linguet, S.-N.-H.]: *Théorie des lois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 1. 2. Londres 1767)。——62。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17)。——178。
-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 (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210。
- 列列韦尔, 约·《波兰史》(三卷集) 1844年巴黎—里尔版第1卷 (Lelevel, J.: *Histoire de Pologne*. T. 1—3. T. 1. Paris, Lille 1844)。——48, 50。
- 龙格, 沙·《伦敦的缝纫工人……》, 载于1866年4月15日《左岸》(布鲁塞尔) 第15期“公告”栏 (Longuet, Ch.: *Les ouvriers tailleurs de Londres...* In: *La Rive Gauche*. Bruxelles. Nr. 15, 15. April 1866. Rubrik: Avis)。——233。
- 龙格, 沙·《伦敦的缝纫工人……》, 载于1866年4月22日《人民论坛报》(布鲁塞尔) 第16号“公告”栏 (Longuet, Ch.: *Les ouvriers tailleurs de Londres...* In: *La Tribune du Peuple*. Bruxelles. Nr. 16, 22. April 1866. Rubrik: Avis)。——233。
- 鲁埃, 欧·[《1867年3月10日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执行委员会的一位委员的会谈》], 载于1868年5月1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12号 (Rouher, E.: [Interview with a delegate of the Paris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March 10, 1867.] In: *Le Courrier français*, No. 112, 1 mai 1868)。——462。
- 路德, 马·《给牧师们的谕示: 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Luther, M.: *An die Pfarrherrn Wider den Wucher zu predigen*. Vermanung. Wittenberg, 1540)。——454。
- 吕利埃尔, 克·卡·德《波兰无政府状态的历史》, 载于《法兰西学院院士吕利埃尔遗著》(四卷集) 1819年巴黎版第1卷 (Rulhière, C. C. de: *Histoire de l'anarchie de Pologne*. In: *Œuvres posthumes de Rulhiè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En 4 t. T. 1. Paris 1819)。——35, 36。
- 吕斯托夫, 威·/格·海尔维格《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载于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 第31号 (Rüstow, W./G. Herwegh: *An die Redaktion des "Social-Demokrat"*.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31, 8.

März 1865)。——128。

罗斯, 乔·《对大不列颠 1792—1799 年的收入、商业和工业增长的调查简要》1799 年伦敦增补第 7 版, 引自威·科贝特《纸币对黄金》1828 年伦敦版 (Rose, G.: A brief examination into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of Great Britain, from 1792 to 1799. 7. ed., with considerable add. London 1799. Nach: W. Cobbett; Paper against gold. London 1828)。——208。

罗素, 约·/查·伍德(1847 年 10 月 25 日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的信), 载于《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危机的原因……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1848 年伦敦版 (Russell, J./Ch. Wood: To Governor and Deputy-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October 25, 1847. In: 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tress...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endix. London, 1848)。——480。

M

马尔萨斯, 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 年伦敦版 (Malthus, Th. R.: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203。

[马尔萨斯, 托·罗·]《人口原理》1798 年伦敦版 ([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55。

[迈尔, 卡·]《谦逊——一件礼服》, 载于 1864 年 10 月 21 日《观察家报》(斯图加特) 第 245 号 ([Mayer, K.]: Bescheidenheit — ein Ehrenkleid. In: Beobachter. Stuttgart. Nr. 245, 21. Oktober 1864)。——28。

摩尔顿, 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 载于 1859 年 12 月 9 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 第 368 期。[标题]: 《第四次例会》(Morton, J. Ch.: 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London. Nr. 368, 9. Dezember 1859. [U. d. T.]: Fourth ordinary meeting)。——169。

莫利纽, 威·《英国议会法令束缚下的爱尔兰的状况》1698 年都柏林版 (Molyneux, W.: The Case of Ireland's Being Bound by Acts of Parliament in

England Stated. Dublin, 1698)。——346。

N

纳皮尔,威·弗·帕·《1807—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六卷集)1831年伦敦版第3卷(Napier, W. F. 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1—6. Vol. 3. London 1831)。——86。

涅姆采维奇,尤·乌·《1794—1796年我在圣彼得堡被俘期间的笔记》1843年巴黎版(Niemcewicz, J. U.; Notes sur ma captivité à Saint-Petersbourg, en 1794, 1795 et 1796. Paris 1843)。——44。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Newmann, S. Ph.;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over and New York, 1835)。——389。

诺文斯,[雅·]德·《拿破仑传》(四卷集)1828年巴黎版第3卷(Norvins, [J.] de; Histoire de Napoléon. T. 1—4. T. 3. Paris 1828)。——52。

O

欧文,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意见》1817年伦敦第2版(Owen, R.;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hi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are most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morals. 2. ed. London 1817)。——167。

P

帕麦斯顿,[亨·约·坦·][《1863年6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6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93号。[标题]:《地主与佃户》(Palmerston, [H. J. T.];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3. Juni 186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593, 24. Juni 1863. [U. d. T.]; Landlord and tenant)。——13—14。

帕麦斯顿,亨·约·坦·/乔·康·刘易斯[《1857年11月12日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和副行长的信》],载于1857年11月13日《泰晤士报》第22837号(Palmerston, H. J. T./G. C. Lewis; [Letter to the Governor and Deputy-Governor of the Bank of England. November 12, 1857.] In: The Times, No. 22837, November 13, 1857)。——480。

- 皮阿,费·〔1868年6月29日在伦敦克利夫兰大厅举行的大会上的演讲〕,载于1868年7月5日《淘气鬼》第25期(Pyat, F.: [Speech at a Public Meeting at Cleveland Hall in London on June 29, 1868.] In: L'Espègle, No. 25, 5 juillet 1868)。——452。
- 皮特《关于保罗皇帝在位初期俄国情况的报告》,引自卡·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内幕》,载于1856年7月5日《自由新闻》(设菲尔德)第13期(Pitt, L. K.: Account of Russia during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Paul. Nach: Karl Marx: 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In: The Free Press. Sheffield. Nr. 13, 5. Juli 1856)。——43。
- 〔评〕萨朗的《回忆拉斐德将军》,载于1832年10月《波兰》(伦敦)第3期[Rezenson zu]: Memoirs of General Lafayette, by M. Sarrans. In: Polonia. London. Nr. 3, Oktober 1832)。——282。
-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62。
-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2. Paris 1846)。——57、59、61。
- 蒲鲁东,皮·约·《论革命时期和教会中的正义》1858年巴黎版第1—3卷(Proudhon, P. J.: De la 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église. T. 1—3. Paris 1858)。——62。
- 〔蒲鲁东,皮·约·〕《论通用文法》,载于贝尔吉埃《语文的基本原理》1837年贝桑松版([Proudhon, P. J.]: 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 In: Bergier: Les éléments primitifs des langues. Besançon 1837)。——54。
-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aris 1840)。——55—59。
- 蒲鲁东,皮·约·《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1861年布鲁塞尔—巴黎版(Proudhon, P. J.: Théorie de l'impôt, question mise au concours par le conseil d'état du canton de Vaud en 1860. Bruxelles, Paris 1861)。——61。
- 蒲鲁东,皮·约·《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

- 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 Si les traités de 1815 ont cessé d'exister? Actes du futur congrès. Paris 1863)。——62。
- 蒲鲁东,皮·约·[《1848年7月3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Proudhon, P. J. :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31. Juli 1848.] In: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T. 2. Paris 1849)。——60。
- 《普鲁士的统计和普遍义务兵役制。I》,载于1864年9月21日《军事总汇报》(达姆施塔特—莱比锡)第39年卷第38期(Die Statistik und die allgemeine Wehrpflicht in Preußen. I. In: 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 Darmstadt, Leipzig. Jg. 39. Nr. 38, 21. September 1864)。——77—80。

S

- 萨朗(小萨朗),贝·《拉斐德和1830年革命》(两卷集)1832年巴黎版第2卷(Sarrans, B., jeune: Lafayette et la Révolution de 1830. T. 1. 2. T. 2. Paris 1832)。——282。
- 萨瓦里,安·让·玛·勒·《罗维戈公爵回忆录》(八卷集)1828年布鲁塞尔版第3卷(Savary, A. J. M. R. : Mémoires du Duc Rovigo. En 8 t. T. 3. Bruxelles 1828)。——49。
- 萨瓦什凯维奇,莱·《波兰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命运的影响概述》1848年巴黎第3版(Sawaszkiwicz, L. : Tableau de l'influence de la Pologne sur les destiné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de l'Empire. 3. éd. Paris 1848)。——48。
- 赛居尔,路·菲·《欧洲各国内阁的政策》(三卷集)1801年巴黎版第1、2卷(Ségur, L. P. : Politique de tous les cabinets de l'Europe. T. 1—3. T. 1. 2. Paris 1801)。——37—40。
- 桑顿,威·托·《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Thornton, W. Th. : 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 London 1846)。——207。
- 沙尔腊斯,[让·巴·阿·]《1815年战役始末。滑铁卢》1858年伦敦第2版(Charras, [J. B. A.] :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2. éd. Londres 1858)。——52。
- 施马尔茨,泰·安·亨·《国民经济学。致德意志某王储书柬》1818年柏林版第1册(Schmalz, Th. A. H. : Staatswirthschaftslehre in Briefen an einen teutschen Erbprinzen. Th. 1, Berlin, 1818)。——454。

- 施马尔茨, 泰·安·亨·《政治经济学》, 昂·茹弗鲁瓦译, 1826年巴黎版第1卷 (Schmalz, Th. A. H.: *Économie politique*. Trad. par H. Jouffroy. T. 1. Paris, 1826)。——454。
- 施派尔, 卡·《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给德国工人的信。1868年12月9日于伦敦》, 载于1868年12月《先驱》第12期和1869年1月《先驱》第1期 (Speyer, K.: *Der deutsche Arbeiter-Bildungsverein in London an die Arbeiter Deutschlands*. London am 9. Dezember 1868. In: *Der Vorbote*, Nr. 12, Dezember 1868; Nr. 1, Januar 1869)。——483。
- 施托伊布, 路·《雷蒂亚的原始居民及其与伊特鲁里亚人的关系》1843年慕尼黑版 (Steub, L.: *Über die Urbewohner Rhätians und ihren Zusammenhang mit den Etruskern*. München 1843)。——293。
- 施托伊布, 路·《雷蒂亚民族学》1854年斯图加特版 (Steub, L.: *Zur rhätischen Ethnologie*. Stuttgart 1854)。——293。
- [施韦泽, 约·巴·]《关于有名的……》, 载于1865年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37号 ([Schweitzer, J. B.]: *In Betreff der bekannten...*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37, 22. März 1865)。——140。
- 施韦泽, 约·巴·《简评上一号发表的〈马克思的声明〉》, 载于1865年3月21日《柏林改革报》第68号 (Schweitzer, J. B.: *Kurze Bemerkungen zur Marx'schen Erklärung in voriger Nummer*. In: *Berliner Reform*. Nr. 68, 21. März 1865)。——140。
- [施韦泽, 约·巴·]《我们对轻率辞职……》, 载于1865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31号 ([Schweitzer, J. B.]: *Wir würden den an sich gleichgültigen Rücktritt...*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31, 8. März 1865)。——128。
- 斯蒂芬斯, 亚·汉·[《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演说。1861年3月22日》], 载于1861年3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215号。[标题]:《副总统对其新政府的解释》(Stephens, A. H.: [Rede in Savannah, Georgia, 22. März 1861.]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6215, 27. März 1861. [U. d. T.]: *The new government explained by its Vice-President*)。——25。
-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六卷集[可能是四卷集]), 附《英国和美国》一书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评注, 1835年伦敦版第1卷 (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 [d. i. E. G. Wakefield]. In 6 [vielm. 4] vol. Vol. 1. London 1835)。——185。
-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载于《詹姆斯·斯图亚特著作集》(六卷集)1805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 In: The Works of Sir James Steuart. In six volumes. Vol. 1, London, 1805)。——426。
- 《所得税与财产税。对下院 1864 年 2 月 9 日的一项决议的答复》1864 年[伦敦]版(Income and property tax. 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9. February 1864. [London] 1864)。——9。

T

- 特里门希尔,休·西·《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附证词》1862 年伦敦版(Tremenheere, H. S.: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with app. of evidence. London 1862)。——9。
- 特里门希尔,休·西·《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号报告》1863 年伦敦版(Tremenheere, H. S.: 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 1863)。——9。
- 梯也尔,阿·《论财产》1848 年巴黎版(Thiers, A.: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60。
- 梯也尔,阿·《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二十卷集)1845 年巴黎版第 3 卷,1851 年巴黎版第 11 卷(Thiers, A.: 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Empire. T. 1—20. T. 3. Paris 1845. T. 11. Paris 1851)。——46, 51。
-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六卷集)[第 5、6 卷作者为]:托·图克/威·纽马奇,1838—1857 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Vol. 1—6. [Vol. 5. 6. Verf.]: Th. Tooke/W. Newmarch. London 1838—1857)。——167, 186。
- 图克,托·《通货原理研究》1844 年伦敦第 2 版(Tooke,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2 ed. London 1844)。——426。
-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 年伦敦版(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Pro-

duction of Wealth. London, 1821)。——389。

W

[韦济尼埃,皮·]《国际协会。一个委员会成员……》,载于1865年12月16和18日《韦尔维耶回声报》第293和294号([Vésinier, P.]: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Un des membres du comité... In: L'Écho de Verviers. Nr. 293, 16. Dezember 1865; Nr. 294, 18. Dezember 1865)。——508, 512—517。

维多利亚, R. [致英国议会的声明。1867年11月19日], 载于1867年11月20日《泰晤士报》第25973号(Victoria, R.: [Address 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on November 19, 1867.] In: The Times, No. 25973, November 20, 1867)。——322。

《我们的纲领》, 载于1864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试刊第1号和1865年1月4日该报第4号(Unser Programm.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1, Probenr., 15. Dezember 1864; Nr. 4, 4. Januar 1865)。——128—129。

沃邦, 塞·《王室什一税草案》, 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Vauban, S.: Projet d'une dime royale.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843)。——384。

沃尔弗, 威·《西里西亚的十亿》, 载于1849年3月22、25、27、29日和4月5、12、13、14、25日《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281号(Wolf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Nr. 252, 255, 256, 258, 264, 270—272, 281; 22., 25., 27., 29. März; 5., 12., 13., 14., 25. April 1849)。——313。

乌尔卡尔特, 戴·《调查的权利, 两篇演讲。(1862年1月20和27日)》1862年伦敦版(Urquhart, D.: The right of search: two speeches. < January 20 and 27, 1862. > London 1862)。——169。

X

西华德, 威·亨·《不可遏制的冲突。1858年10月25日于罗切斯特》, 载于乔·贝克编《西华德文集》(四卷集)1861年纽约版第4卷(Seward, W. H.: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Rochester, October 25, 1858. In: The works. Ed. by G. Baker. In 4. vol. Vol. 4 New York 1861)。——151。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德蒙·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eon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dmund Ashworth, Mr. Thomp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166、398、440。

Y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陛下的圣旨……圣彼得堡 1809年11月1日》,载于1809年11月9日《圣彼得堡消息报》第90号(Александр I: Высочайший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Рескриптъ, послѣдовавшій... Въ С. Петербургѣ 1го Ноября 1809. In: С. Петербургскія Вѣдомости. Nr. 90, 9. November 1809)。——49。

亚历山大一世《皇帝陛下的圣旨……圣彼得堡 11月9日〔通讯〕》,载于1809年11月17日《莫斯科消息报》第92号(Александр I: Высочайший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Рескриптъ, послѣдовавшій... [Korrespondenz]: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Ноября 9. In: Московскія Вѣдомости. Nr. 92, 17. November 1809)。——49。

亚历山大二世(1866年12月19日(俄历31日)经皇帝陛下批准的波兰王国省县行政管理条例的补充条款和1868年2月29日颁布的撤销波兰王国国家内政委员会的命令)(Александр II.: Об упразднені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іи Внутреннихъ Дѣлъ въ Царствѣ Польскомъ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ъ правилъ къ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му 19(31) декабря 1866 года Положенію о губернскомъ и уездномъ управленіи въ губерніяхъ Царства Польскаго. 29 февраля 1868 г. In: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іе законовъ Россійской имперіи. Собрание 2. т. 43, Отд. I, СПБ., 1873)。——456。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表》1863年伦敦版(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3)。——9。

《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程》,载于1867年4月13日《国际信使》(伦敦)第15期(Compte rendu du Congrès de Genève. In: Le Courrier International. Londres. Nr. 15, 13. April 1867)。——277。

《一次对伦敦的波兰人有利的会议》,载于1865年3月11日《白鹰报》(苏黎世)

第 30 号 (Ein Meeting zu Gunsten Polens in London. In: Der weiße Adler. Zürich. Nr. 30, 11. März 1865)。——148。

尤尔, 安·《工厂哲学: 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 年伦敦修订第 2 版 (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2. ed. corr. London 1835)。——166。

Z

《政治进程。第八阶段》, 载于 1847 年 7 月 25 日《莱茵观察家》(科隆) 第 206 号 (Politische Gänge. Achter Gang. In: Rheinischer Beobachter. Köln. Nr. 206, 25. Juli 1847)。——116。

《重农学派。魁奈、杜邦·德奈穆尔、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勃多神父、勒特罗纳》, 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1846 年巴黎版第 1 部(《主要的经济学家文集》第 1 卷)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è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 Pt. I. Paris 1846. 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 T. 1.)。——185。

《最近的波兰起义》, 载于 1865 年 3 月 2 日《每日新闻》(伦敦) 第 5872 号 (The late Polish insurrection.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5872, 2. März 1865)。——149。

法律、法令、法案、条例

A

《爱尔兰推进负债地产的出售与转让法令的增补法令(1853 年)》(An Act for Continuing and Amending the Act for Facilitating the Sale and Transfer of Encumbered Estates in Ireland (1853))。——352。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Irish Tenants' Right Bill)。——14。

B

《比利时外侨法》, 载于《比利时议会编年史》。1864 年 11 月 8 日—1865 年 8 月 5

日众议院立法会)1865年布鲁塞尔版(*Loi relative aux étrangers résidant en Belgique*. In: *Annales parlementaires de Belgique. Session législative de 1864 — 1865. 8 novembre au 5 août. Chambre des représentants. Bruxelles 1865*). — 506。

C

《惩治法典》(*Penal Laws*)。——346。

F

[《法庭对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的判决。1868年3月20日》],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诉讼案件。巴黎支部》1868年巴黎舍伐利埃出版社版([*Judgement of tribunal at the trial of the Paris section of the IWMA, March 20, 1868.*] In: *Proc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Bureau de Paris. Paris, Chevalier, 1868*)。——463。

[《法庭对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的判决。1868年5月22日》],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诉讼案件。巴黎支部》1868年巴黎舍伐利埃出版社版([*Judgement of tribunal at the trial of the Paris section of the IWMA, May 22, 1868.*] In: *Proc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Bureau de Paris. Paris, Chevalier, 1868*)。——463。

G

《工厂法补充条款。[1867年8月15日]》(*An Act for the Extention of Factory Acts [15th August 1867]*)。——422。

《谷物法》(*Corn Laws*)——169, 350。

《关于防止滥用集会与结社权破坏合法性自由和秩序的条例》, 载于《普鲁士王国法律汇编》1850年柏林版第3261号(*Verordnung über die Verhütung eines die gesetzliche Freiheit und Ordnung gefährdenden Mißbrauchs des Versammlungs- und Vereinsrechtes*.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0. Nr. 3261*)。——53。

《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 载于《威廉四世国王三至四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29th August 1833.)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William the Fourth; be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33). —586。

《关于限制工厂童工和女工劳动时间的法令(1847年6月8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十至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四届议会第七次会议》1847年伦敦版(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ur of young persons and females in factories. <8th June 1847. >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 being the seventh session of the fourte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47)。——587。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年]日内瓦版(Programme et Règlement de l' 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Genève [1868.])。——492—494。

J

《济贫法》(Encumbered Estates Act)——208、352。

《结社法。1834年4月10—11日》,载于《国家会议的法律、法令、命令、法规和通告……》,让·巴·杜韦尔日耶编,1835年巴黎版第34卷(Loi sur les associations, 10—11 avril 1834. In: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 décrets, ordonnances, règlements et avis du Coseil d'État… Par J. B. Duvergier, T. 34. Paris, 1835)。——464。

L

《罗马天主教徒补偿法案。[1704年]》(The Bill for Relieving his Majesty's Roman Catholic Subjects[1704])。——347。

R

《人身保护法。1679年》(Habeas Corpus Act. 1679)。——321。

W

《外侨法。1835年9月22日》(La loi des étrangers, 22 septembre 1835)。——451、464。

《外侨法。1868年5月22日》(La loi des étrangers, 22 mai 1868)。——451。

《为修改与消除贫穷有关的法律修改女王陛下十年法令的法令》(1847)(An Act to Amend an Act of the Tenth Year of Her Present Majesty, for Amending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Removal of the Poor (1847))。——352。

X

《新闻出版法》，载于《普鲁士王国法律汇编》1851年柏林版第3392号(Gesetz über die Presse.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1. Nr. 3392.)。——92。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1810年科隆版(Code pénal, ou code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 Cologne, 1810)。——463。

Y

《英格兰银行改革法。1844年7月19日》(An Act to Regulate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and for Giving to 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Certain Privileges for a Limited Period, July 19, 1844)。——479—481。

文 件

D

《德国工人联合会本部向纽伦堡代表大会提出接受下列提案的建议》，载于1868年8月29日《民主周报》第35期(Der Vorort der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e wird dem Vereinstage zu Nürnberg folgende Anträge zur Annahme vorschlagen... In: 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 Nr. 35, 29. August 1868)。——464。

F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第1卷《正文与

附录),第2卷(证词记录),1863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 Vol. 1: Report and appendix. Vol. 2: Minutes of evidence. London 1863)。——6。

G

《给内务大臣先生的信。1867年3月9日星期五》,载于1868年5月1日《法兰西信使报》第112号(A M.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Vendredi. 9 mars 1867. In: Le Courrier français, No. 112, may 1, 1868)。——462。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1842—1867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1840s—1860s], London 1842—1867)。——333、444。

《工联和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委员第1号报告。附证词》1867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rganisation and rules of trade unions and other associations. Together with minutes of evidence. London 1867)。——299。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录》1864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 1863. London 1864)。——6、8。

《公共卫生。第1—8号报告》1861—1866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First-Eighth Reports, London 1861—1866)。——444。

《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68年8月22日《蜂房报》(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The Bee-Hive, August 22, 1868)。——465。

《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1869年]伦敦版(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Geneva, 1866, and the Congress of Brussels, 1868. London [1869])。——460、482、493。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1867年由威斯敏斯特出版公司出版(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Printed by the Westminster Printing Company, 1867)。——451、487、493。

L

- [《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在柏林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草稿》], 载于 1868 年 9 月 2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12 号附刊([Draft Rules of Lassallean trade unions adopted at a General German Workers' Congress in Berlin.] In: Der Social-Demokrat, Nr. 112, 25. September 1868, Beilage)。——484。
- 《联合王国工联代表会议的报道。代表会议于 1866 年 7 月 17 日及其后四天在设菲尔德举行》1866 年设菲尔德版(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rades' delega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held in ... Sheffield, on July 17th, 1866, and four following days. Sheffield 1866)。——273。

M

- 《曼彻斯特席勒协会章程和补充规定》1862 年曼彻斯特版(Statuten und Ergänzungs-Verordnungen der Schiller-Anstalt 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1862)。——539, 544。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莱比锡版第 2 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2. Frankfurt/Main, Leipzig 1848)。——283。

N

- 《女王陛下公使馆秘书彼得先生关于比利时对外贸易的报告》, 载于《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7 年伦敦版(Report by Mr. Petre, Her Majesty's Secretary of Legation,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Belgium. In: 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e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London 1867)。——549。

Q

- 《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第 2 号主席通告》, 载于 1864 年 12 月 30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试刊第 3 号(Die erste General-Versammlung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II. Botschaft des Präsidenten. In: Der Social-Demokrat. Berlin. Nr. 3, Probenr., 30. Dezember 1864)。——131。
《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载于1868年8月28日和9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0和102号(Die Generalversammlung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In: Der Social-Demokrat, Nr. 100, 102, 28. August, 2. September 1868)。——464, 473。

R

《日内瓦代表大会。法国代表的报告》1866年布鲁塞尔版(Congrès de Genève. Mémoire des délégués français. Bruxelles 1866)。——462。

T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London 1863)。——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6号报告》1863—1867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First-Sixth Reports. London 1863—1867)。——444, 44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Fourth Report. London 1865)。——450。

W

《维也纳工人给法国和英国工人的信》，载于1868年8月《先驱》第8期(Der Arbeiter Wien's an die französischen und englischen Arbeiter. In: Der Vorbote, Nr. 8, August 1868)。——465。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北德报》

—1867年2月15日第5522号:(Die Art und Weise…)。——288。

K

《科隆日报》

—1866年6月29日第179号第1版:(Es ist ein eigenes Verhängniß…)。——255。

T

《泰晤士报》

—1868年9月9日第26225号:([The Leader])。——476。

—1868年9月12日第26228号:([The Leader])。——476。

—1868年9月15日第26230号:([The Leader])。——476。

—1868年9月19日第26234号:([The Leader])。——476。

W

《未来报》

—1867年8月25日第198号:(Bei Herrn Dr. Otto Hübner…)。——304。

X

《先驱》

—1868年8月第8期:(Neuenburg 9. August)。——465。

文学著作

F

伏尔泰《老实人》。——439。

H

海涅《新春曲。序诗》。——140。

M

莫里哀《斯嘉本的诡计》。——31。

S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208。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208。

X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112、115、126。

Y

伊索《年老的狮子》。——31。

伊索《说大话的人》。——390、433。

圣经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67。

—《新约全书·路加福音》。——92。

报 刊 索 引

A

-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0年创刊,1834—190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 Vereinigte Allgemeine Zeitung und Provinzial-Zeitung [nebst Intelligenzblatt]),继续出版至1926年;1839—1843年主编是马·伦克尔,1844—1862年为伯·腊韦;19世纪30—40年代报纸持有福音教会正统派和保守派的观点。——313、315。
-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周报,1858—1885年先后在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出版者为理·皮戈特(1865—1879);报纸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曾为芬尼社社员辩护。——358。
- 《奥格斯堡总汇报》([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见《总汇报》。

B

- 《白鹰报》(Der weiße Adler)——瑞士的一家自由派报纸,由波兰流亡者创办,1864年2月—1865年6月用德文在苏黎世出版,每周出版三次。——148。
- 《北德报》(Zeitung für Nord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晨报,1848—1872年在汉诺威出版;持自由主义观点。——288。
-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61—1918年在柏林出版;60—80年代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出版者和主编是奥·布拉斯(1861—1872),1872年起埃·弗·品特继其后任主编。——86。
- 《柏林改革报》(Berliner Reform)——德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61—1868年在柏林出版;编辑是爱·梅因(1861—1863)和吉·魏斯(1863—1866);1865年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几篇声明和文章。——140。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478。

D

《德国中央文学报》(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für 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1850—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453。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16。

《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45年创刊,1826—1926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60年代奉行温和自由主义方针。——316—318。

F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报,各工联的刊物,1861—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出版者为乔·波特尔,撰稿人有罗·哈特韦耳、爱·比斯利和弗·哈里逊;1861年11月—1865年9月为工联伦敦理事会的机关报;1864年11月—1870年4月为国际的机关报,在此期间报纸上刊登国际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会议报道,但刊登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从1869年起报纸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148、477。

《法兰西信使报。政治周报》(Le Courrier français. Journal politique de la semaine)——法国的一家周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1—1868年在巴黎出版,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1866年5月起报纸实际上成为国际在

- 法国的机关报；1866—1867年奥古斯特·韦莫雷尔任主编，撰稿人有欧仁·杜邦和昂利·路易·托伦；报纸刊登过总委员会的文件以及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296、320、462。
- 《符腾堡工商业报》(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德国的一家周报，中德意志工商界的刊物，1849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每周作为《符腾堡邦报》的附刊随报附送。——338。
- 《符腾堡邦报》(Staats-Anzeiger für Württemberg)——德国的一家日报，符腾堡政府机关报，1849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每周随报附送附刊《符腾堡工商业报》(Gewerbeblatt aus Württemberg)。——338。

G

-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洛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525。
- 《戈尔韦信使和康诺特周报》(The Galway Mercury and Connaught Weekly Advertiser)——爱尔兰的一家周报，马克思曾根据1853年2月19日《人民报》引用了原先在该报发表的《爱尔兰西部人口减少》一文。——353。
- 《革命报》(La Révolution)——见《社会革命报》。
- 《工人报》(The Working Man)——英国的一家周报，1861—1867年在伦敦间断出版；出版者是约·科勒；1867年初起发表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刊登总委员会关于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报告以及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报道。——551、556。
-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英国的工人报纸，1865年9月—1866年2月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它的前身是《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te)。1865年9月25日起成为国际总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报纸理事会成员有阿普尔加思、埃卡留斯、奥哲尔、克里默、马克思、荣克等，撰稿人有阿普尔加思、奥哲尔、福克斯、克里默、莱诺、韦斯顿等；曾刊登国际伦敦代表大会(1865)的报告，以及国际和改革同盟的文件和有关情况的报道；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主义分子的实力增强，报纸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216、217、511、517、571、572。

-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工人报纸,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1866年2月10日—1867年7月20日在伦敦作为《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en's Advocate)的续刊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出版者为阿·迈奥尔,1866年2—3月约·格·埃卡留斯任主编,4月乔·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1866年6月前马克思为报纸理事会成员,其他成员有阿普尔加思、埃卡留斯、奥哲尔、科尔森、莱诺、勒吕贝、列斯纳和韦斯顿,撰稿人有埃卡留斯、恩格斯、福克斯等,曾刊登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由于参加报纸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们的妥协政策,报纸在选举改革的斗争中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喉舌。——219、223、528、570。
- 《观察家报》(Der Beobacht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33年起用这个名称在斯图加特出版;19世纪60年代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机关报,副标题是《士瓦本人民报》(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卡尔·迈尔任编辑(60年代)。——27、28、335、337。
- 《观察家报。士瓦本人民报》(Der Beobachter. Ein Volksblatt aus Schwaben)——见《观察家报》。
-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瑞士的一家月报,1865年12月—1867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出版者是让·巴·杜普莱克斯,编辑是约·卡尔德;沙·利穆赞为撰稿人;曾刊登国际总委员会文件和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的工作报告;1867年4月26日与《未来呼声报》(La Voix de l'Avenir)合并。——233、517、529。
- 《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英国的一家刊物,1864年11月—1867年7月在伦敦出版,1865年4月前用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出版,报名为《国际信使》(The International Courier. Le Courier international),大半为月刊,也有半月刊,1867年1—7月为周刊,1865年5月起英文版和法文版分开出版;出版者为约·科勒;1867年是国际的机关刊物;刊登总委员会的文件、总委员会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报告,以及国际法国支部、比利时支部和瑞士支部的文件。——554、556、571、572。
- 《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经济杂志,1863—1893年在柏林出版。——453。

H

-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Lon-

don Weekly German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刊物;1859—1869年用德文在伦敦出版;出版者为海·尤赫,编辑是哥·金克尔(1859年1—7月)、海·尤赫(1859年7月起)和恩·尤赫(1859—1869)。——30、144。

《呼声报》(La Voice)——在波士顿出版的日报。——571。

《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见《泰晤士报》。

J

《纪事》(The Chronicle)——英国的天主教派的周刊,1867—1868年在伦敦出版。——322。

《技艺协会杂志》(The Journal of Society of Arts)——1852年在伦敦创办的周刊,技艺和古代文化研究杂志。——169。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324、357。

《觉醒报》(Le Réveil)——法国的一家周报,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8年7月—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曾刊登国际的文件和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584。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är-Zeitung)——德国的一家军事问题周刊,1826—1902年由德国军官与现役军人协会在达姆施塔特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曾刊登恩格斯的一些文章。——77、82。

K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的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255。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63—1866年在杜塞尔多

- 夫出版,1867—1874年在科隆出版;编辑为海·贝克尔。——308。
-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44—1848年初在科隆出版;由普鲁士政府给予资助。——116。
- 《联合》(L'Association)——法国的一家杂志,是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影响的合作社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864年11月—1866年8月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最初为月刊,1866年1月14日起为周刊;编辑部设在巴黎;创办人之一为让·皮·贝律兹,出版者为贝罗,编辑之一为昂·勒福尔,撰稿人有阿·塔朗迪埃。——67、514。

M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K.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H.J.林肯,总编辑约·鲁宾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另一个所有者为赛·莫利,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49。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鲁·莱克索在纽约创办的德文周报,从1852年3月20日开始出版到1911年12月29日停刊止曾几易其名,1853年3月18日—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又先后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如《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和《刑法报》(Criminal-Zeitung)等等。——143。
-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工人报纸,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1868年1月4日—1869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1869年8月28日起每周出两次,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1868年12月5日起同时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周报最初受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影响,但很快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重要作用;1869年8月在爱森纳赫代

表大会上报纸被宣布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并于10月改名为《人民国家报》(Der Volkstaat)。——362。

《莫斯科消息报》(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俄国最早的报纸之一,1756—1917年出版;1859年起改为日报;19世纪40年代是自由派的主要报纸,主编为瓦·费·科尔什(1856—1862);1863年起成为反动报纸,编辑为米·尼·卡特柯夫(1850—1855和1863—1887)和帕·米·列昂季耶夫(1865年起);1917年被查封。——50、284。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150。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P

《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Zeitschrift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每月出版的普鲁士官方统计杂志,1860—1905年在柏林出版。——77、78。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476。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1年5月—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由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参加无神论“人民协会”的人创办;1865年8月起实际上

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1866年1月起正式成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编辑为欧·斯滕斯,撰稿人有德巴普、拉法格等人。——531、555、568、583。

S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瑞士的一家周报,1871年10月—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编辑为阿·克拉里斯(1871—1872)。——490。

《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 Social-Demokrat. Organ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6日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年每周出版,1865年1月起每周出版三次,有时六次;1865年12月起副标题改为《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所有人和出版者为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主编为施韦泽,1865年2月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撰稿人还有伯·贝克尔、约·菲·贝克尔、约·格·埃卡留斯、格·海尔维格、莫·赫斯、威·吕斯托夫和亨·武特克。——53、54、67、116、128—131、140、142、145、329。

《圣彼得堡消息报。政治和文学报》(С.-Петербургскія Вѣдомости. Газ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俄国最早的报纸,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14年改名为《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ерградскіе вѣдомости);1728年起由科学院出版,1800年改为日报;1863—1874年是自由派的主要报纸,主编为瓦·费·科尔什(1863—1874),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17年被查封。——50。

《圣路易斯每日新闻》(The St. Louis Daily Press)——美国的一家工人报纸,1864年起在圣路易斯出版。——497。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杂志,1865—1934年在伦敦出版;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编辑为乔·亨·路易斯(1865—1866),约·莫利继其后任主编(1867—1882)。——420、426。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

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5、8、230、241、245、283、284、358、461—467、476、478—480。

《淘气鬼。讽刺、政治、艺术和文学报》(L'Espègle. Journal satirique, politique, artistique et littéraire)——比利时的一家反波拿巴主义和反教权主义派的周报,1864—186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由法国流亡者先用佛拉芒文,1865年起用法文出版;编辑为奥·德利马尔,撰稿人有皮·韦济尼埃、费·皮阿和J.德穆兰;此外,同编辑部有联系的有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和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报纸经常刊登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材料。——452。

W

《威悉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44—1930年在不来梅出版。——478。

《韦尔维耶回声报》(L'Écho de Verviers)——比利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64—1866年在韦尔维耶出版;出版者为莱·封丹,撰稿人为皮·韦济尼埃;报纸刊登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文件及国际总委员会给皮·韦济尼埃的公开信。——508、510、512、514、515、516、517、518。

《未来报》(Die Zukunf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1867—1871年在柏林出版;创办人约·雅科比,编辑吉·魏斯(1867—1871);曾刊登《资本论》第1卷序言和恩格斯的《资本论》第1卷书评。——304。

《未来呼声报》(La Voix de l'Avenir)——瑞士的一家周报,1865年12月31日—1868年11月8日在拉绍德封出版,1867年与《国际工人协会报》合并后成为国际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正式机关报;报纸最初的副标题为《科学、劳动、

社会和工人联合会通报),1867年5月26日起更名为《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报》;出版者和编辑为皮·库莱里,撰稿人有厄·勒布卢瓦、埃·波托尼埃和阿·里沙尔。——517、529。

X

《西邮报》(Die Westliche Post)——美国的一家日报,1857—1938年用德文在圣路易斯出版;19世纪60年代是流亡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30。

《先驱》(Der Vorbote)——瑞士的一家德文月刊,1866年1月—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出版者和主编是约·菲·贝克尔,撰稿人有约·格·埃卡留斯、莱·弗兰克尔、莫·赫斯、弗·列斯纳和保·施土姆普弗;1867年起为政治和社会经济月刊;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机关刊物;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经常刊登国际的文件,报道国际工人协会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517、529。

《新巴登报》(Neue Badische Landes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67—1933年用这个名称在曼海姆出版。——359。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7月1日—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施塔特,4月1日以后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编辑是奥·吕宁(1849年10月1日以前)、格·君特和约·魏德迈(10月1日以后);报纸持左派民主主义立场,1848—1849年在魏德迈的影响下接近《新莱茵报》,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后因其编辑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停刊。——30。

《新法兰克福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1859—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66年起用《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这个名称出版,出版者为莱·宗内曼,编辑为格·弗·科尔布(1859—1866)。——30、128。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

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18、313。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6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98。

《信使报》(Der Botschafter)——奥地利的一家日报,政府的官方刊物;1862—1865年在维也纳出版,创办人为阿道夫·科拉切克。——143、144。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Z

《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478。

《中央文学报》(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见《德国中央文学报》。

《自由报》(La Liberté)——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5—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72—1873年每周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583。

《自由之声》(Głos Wolny)——流亡者民主派的报纸,1863年1月起在伦敦用波兰文出版,每月出三期;编辑是安·扎比茨基。——282。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29、478。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

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46。

《左岸》(La Rive Gauche)——民主派的周报,1864年10月—1866年8月先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由法国左派共和党人流亡者集团创办;出版者为莱·封丹,主编为沙·龙格,撰稿人有塞·德巴普、古·弗路朗斯、保·拉法格和皮·韦济尼埃,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总委员会的文件。——526、532。

地名索引

A

阿迪杰河 248。
 阿尔巴尼亚 49。
 阿尔卑斯山 42、248。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尔 84、327、
 567。
 阿尔萨斯 41、225。
 阿尔斯特 341、343、344、347、349、
 358、580。
 阿让唐 530、566。
 埃尔伯费尔德 424。
 埃及 284、354。
 艾佩尔(乌皮采) 257。
 爱丁堡 233。
 爱尔福特 50。
 爱尔兰 7、276、285、321、325—327、
 341—358、462、562、571、579—
 581。
 爱森纳赫 246。
 昂韦尔(安特卫普) 531。
 奥地利 32—42、45、46、48—50、
 221、230、243、251、285、286、465。
 奥恩省 217。
 奥尔良 566。

奥尔米茨(奥洛穆茨) 243—245、
 258。
 奥尔施泰特 238—239。
 奥格斯堡 29、478。
 奥胡斯 66。

B

巴登 289、515。
 巴尔布里根 349。
 巴尔的摩 570。
 巴伐利亚 255、359。
 巴勒 529。
 巴黎 37、40、43、44、48、57、60、67、
 85、121、123、131、133、134、137、
 143、145、282、296、454、461、462、
 511、513—515、530、553、556、558、
 566、569、575、580、584。
 巴门 145、424、471。
 巴塞尔 567。
 白俄罗斯 231。
 百蒙德西区 558。
 班登 349。
 北爱尔兰 343。
 北部省 401。
 北非沿岸 49。

- 贝尔法斯特 347。
贝尔格莱德 35。
贝尔格桥 293。
贝尔维尔 511。
比安(比尔) 515、529、567。
比利牛斯半岛 86。
比利牛斯山 42。
比利时 17、33、38、41、42、216、233、
234、298、300、347、464、465、506、
514、515、527、531、558、568、569、
575、576、582。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波茨坦 82。
波尔多 530、566。
波河 247、250。
波莱塞拉 247。
波兰 14、25、26、32—43、46、48、
50—52、148、215、219—224、
226—232、260、275、276、281、
283—287、300、327、502、503、507、
527、562、576。
波朗特吕 529。
波罗的海 40。
波罗的海沿岸 228。
波美拉尼亚 37。
波森 38、41、243、283。
波士顿 571。
波希米亚(捷克) 237、242—245、
247、252、253、256、257、259。
伯尔尼 485、567。
伯克郡 7。
伯明翰 327、352、410、560。
柏林 37、38、40、53、61、82、140、143、
145、146、242—244、282、283、483、
484、525、530。
勃兰登堡 37。
博库尔 567。
布拉德福德 28。
布拉格 242。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243、244、
253。
布列塔尼 225。
布鲁塞尔 457、458、460、462、464、
482、485、486、492、505、519、531、
569、582、583、591。
布索伦戈 248。
- C**
- 蔡茨 245。
柴郡 6。
- D**
- 达尔马提亚 49。
达灵顿 562、563。
达姆施塔特 77。
大西洋 11、14、25、285。
丹麦 26、49、50、289、301、576。
丹讷韦克 254。
但泽 34、47、48。
德国(德意志) 14、32—34、36、44、
77、103、110、233、235、289、290、
293、298、300、303、345、359、424、
465、472、499、502、503、512、513、
525、527、530、569、576、584、591。

德特福德 509。
地中海 39、40。
第聂伯河 229。
蒂奥内河 248、249。
蒂尔西特 49、85。
蒂里阿库尔(阿库尔蒂里) 567。
东头——见伦敦
都柏林 343、344、346、348、349。
杜佩尔(迪伯尔) 86、98。
多瑙河 46、244。
多瑙河两公园(摩尔多瓦, 瓦拉几亚)
49、225、398、442、443。

E

俄国 32—44、46—48、50、52、169、
223、227、285、286、481、486、487、
516。
恩斯多夫 530。

F

法国 14、25、32—46、49、50、52、62、
134、169、224、225、233、234、282、
286、293、298、300、327、345、347、
401、465、471、502、503、505、506、
511、515、525、527、530、554—556、
564、565、575、576、584。
法兰克福 29、30、237、246。
凡尔赛 40。
非洲 353。
菲沃 565、567。
费城 570。
芬兰 49、289。

佛罗伦萨 580。

G

高加索(地区) 14、285。
戈尔韦 346。
戈伊托 249。
哥本哈根 294、295。
哥德堡 289、294。
格尔利茨 245。
格拉茨(克沃兹科) 257、258。
格拉斯哥 352。
格朗维尔 531、566。
格洛高(格沃古夫) 243。
根特 531。
瓜德罗普岛 566。

H

哈珀斯费里 321。
汉堡 118、125、127、304、308、313、
316、334、335、338、359、362、426、
458、464、470、484。
汉诺威 37、233、246、530。
荷尔斯泰因——见石勒苏益格—荷
尔斯泰因
荷兰 33、42、44、45、142、289、301。
赫尔 290、560。
黑海 285。
黑林山 293。
黑森 246。
黑森选帝侯国(黑森-卡塞尔) 478。
洪伯 289。
华沙 36、38、41、47、48、50、282、285。

华盛顿 574。
滑铁卢 259。
稻博肯 573。
霍恩林登 46。
霍尔门 289。

J

基尔肯尼 348、349。
吉钦(伊钦) 252—254、257。
吉森 246。
吉斯 530。
加尔达湖 248。
加尔各答 284。
加利福尼亚州 574。
加利西亚 45、50、231。
金塞尔 345。
旧波多利亚 50。
旧加利西亚 50、52。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229、
284。

K

卡昂 217、511、513、530、565、566。
卡茨巴赫(卡恰瓦) 85。
卡尔斯堡 293。
卡尔瓦多斯省 217。
卡鲁日 567。
卡斯泰尔诺达里 566。
康涅狄格州 570。
康诺特 344、357。
考文垂 555、562。
柯尼斯堡 254。

科布伦茨 246。
科克 349。
科隆 116、525。
科莫恩 143。
科西嘉 39。
克里木 84。
克罗地亚 45。
肯德尔 562。
孔代叙努瓦罗 567。
库尔兰 33。
库斯托扎 247—250、252、258。

L

拉蒂博尔(拉齐布日) 245。
拉芒什海峡 10、11、171、462。
拉芒什省 217。
拉绍德封 529、530、567。
拉施塔特 237。
拉斯德拉姆 349。
莱奥本 45。
莱比锡 242、530。
莱布勒勒 567。
莱茵河 42、282。
莱茵河左岸 42、44。
莱茵省 424。
赖兴贝格(利贝雷茨) 243、256。
兰开夏郡 6、9、172、204、563。
朗根比劳 530。
勒阿弗尔 567。
勒包 243—245。
勒布瓦 567。
雷恩 530。

- 里昂 383、506、511、513、530、531、565、566、572。
- 里窝那 47。
- 里沃利 248。
- 理森山(克尔科诺谢山) 243、244、252、256。
- 立陶宛 52、228、231。
- 利默里克 345、346。
- 利尼 259。
- 利物浦 352。
- 利雪 511、567。
- 列日 531、569。
- 鲁昂 511、530—531、566。
- 鲁贝 462。
- 伦巴第平原 248。
- 伦敦(东头,西头) 5—9、17、18、27、29—31、53、54、67、116、121、128、132、142—144、147—149、151、203、210、214、233、234、241、245、265、281、282、288、440、451、458、462、466—468、476—478、480、483、493、494、499、501、503、505、506、508、512、525、527、528、555、558、562—564、568、569、571—573、580、582、588、591。
- 伦斯特 344。
- 罗马尼亚 398。
- 罗讷河口省 565。
- 罗陀斯 390、433。
- 洛克勒(勒洛克勒) 567。
- 洛纳托 248。
- 洛桑 61、296、485、492、511、529、530、554、567、569、570、573、582。
- M**
- 马尔默 294。
- 马耳他 49。
- 马格德堡 530。
- 马伦戈 46。
- 马伦湖 293。
- 马其顿 49。
- 马萨诸塞州 532、571。
- 马赛 46、565、566。
- 马谢讷 298、575。
- 曼彻斯特 67、116、139、167、319、321、352、441、462、468、521、523、539、540、548。
- 曼图亚 45、248。
- 芒斯特 344、357。
- 梅克伦堡 233。
- 美国(北美合众国) 30、150、273、299、300、326、333、341、398、486、502、504、532、564、570、572、575、576、578、580、581、592。
- 美因茨 237、530。
- 美因河 255。
- 美洲 36、501。
- 门塔纳 464。
- 蒙特勒 511、529、567。
- 米兰 248、531、569。
- 密苏里州 30。
- 明登 246。
- 明乔河 247—250。
- 明兴格雷茨(慕尼黑城堡) 257。

摩拉维亚(地区) 243、245。

莫德林 285。

莫尔多瓦河(伏尔塔瓦河) 242。

莫塞巴肯 293。

莫斯科 50、215、229。

穆捷 567。

穆塔拉河谷 293。

N

那不勒斯 34、513、519、569。

那慕尔 531。

纳霍德 257。

纳沙泰尔(诺因堡) 465、567。

纳沙泰尔州 511。

讷沙托 511、513、530、566。

尼斯河(尼斯-乌日茨卡河) 245。

南德意志 584。

南法兰西 294。

南特 511、566。

涅曼河 47。

牛津 440、441。

牛津郡 7。

纽黑文 570、572。

纽伦堡 465、483、484、584。

纽约 466、571—573。

纽约州 574。

挪威 50。

诺丁汉 562。

诺尔布罗桥 293。

诺威奇 570、572。

诺因堡——见纳沙泰尔

O

欧博讷 529。

欧什 566。

欧洲 10、14、16、32、33、36、42、43、
48、60、98、148、215、225、229、260、
281、282、480、486、501、516、527、
529、531、552、584。

P

帕蒂尼 531。

帕尔杜比茨(帕尔杜比采) 243、
245。

庞坦 511、566。

佩耳 343、344。

佩斯基耶拉 248、249。

佩特斯瓦尔道 530。

蓬莱韦克 511。

蓬泰拉戈斯库罗 247。

皮埃蒙特 33、94、248。

皮托(郊区) 511、566。

平讷贝格 530。

葡萄牙 49。

普拉加 42。

普鲁士 35—38、40—42、44、46—
49、75、76、98、145、221、230、243、
282、286、424、464。

Q

切斯美 39。

钦讷库勒山 293。

R

热那亚 47、531、569。
 日本 384。
 日德兰半岛 66。
 日内瓦 145、214、260、262、263、275、
 277、278、293、462、465、482、485、
 487、492、511、515—517、520、529、
 530、552、554、556、557、560、561、
 564、567—574、577。
 瑞典 32、33、36、40、49、50、289、293。
 瑞士 225、233、234、293、298、300、
 465、502、504、505、511、515、527、
 529、554、567、576。

S

萨尔茨堡 246。
 萨克森 37、48、237、245、530。
 萨拉托加斯普林斯 347。
 萨利翁泽 249。
 萨默塞特郡 7。
 沙勒罗瓦 464、582。
 上塞尔克 254。
 设菲尔德 273、529。
 圣彼得堡(彼得堡) 11、14、37、43、
 49、50、282、481。
 圣但尼 511、566。
 圣多明各 47。
 圣克鲁瓦 567。
 圣路易斯 30、31。
 圣伊米耶 529、567。
 圣朱斯蒂纳 248。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95、97、
 145、232、237、246、254。
 舒尔河畔卡里克 349。
 斯德哥尔摩 293、294。
 斯蒂维耶雷堡 248。
 斯堪的纳维亚 224。
 斯塔福德郡 8。
 斯图加特 27、28。
 松维利耶 529、567。
 苏格兰 6、7、168、169、171、224、233、
 326、345、358、562。
 苏黎世 529、567。
 苏台德山脉 243。
 索恩河畔讷维尔 565、566。
 索尔费里诺 248—250。
 索林根 145、512、530。
 索马坎帕尼亚 248、249。
 索纳 248、249。

T

塔尔诺波尔 50。
 特拉姆朗 567。
 特劳特瑙(特鲁特诺夫) 243、257。
 特吕包(摩拉瓦特热博瓦) 245。
 特罗尔海坦 293。
 提契诺河 248。
 图尔瑙(图尔诺夫) 257。
 图林根 37。
 土耳其 32、34、39、40、42、49、226、
 285、384。
 托尔高 245。

W

瓦尔登堡(瓦乌布日赫) 245。
 瓦拉几亚——见多瑙河两公国
 瓦莱焦(明乔河畔瓦莱焦)
 248、249。
 威尔士 7、9、327、345、562。
 威克洛 349。
 威尼斯 232。
 威斯特伐利亚 37。
 韦茨拉尔 237、246。
 韦尔维耶 531、583。
 韦齐孔 529、567。
 韦特恩湖 293。
 维埃纳 565、566。
 维尔纳 52。
 维勒弗朗什 566。
 维罗纳 248—250。
 维纳恩湖 293。
 维斯图拉河(维斯瓦河) 285。
 维滕贝格 454。
 维也纳 37、40、42、45、50、144、
 242—244、254、258、283、285、465。
 魏斯基兴(赫拉尼采) 245。
 文加 289。
 沃里克郡 555。
 沃特福德 349。
 沃韦 511、529、567。
 乌斯特—吉尔斯多夫 530。

X

西班牙 32、33、49、50、224、301、511、

576。

西蒂区 144、466。
 西里西亚(地区) 37、243、245。
 西南德意志 255。
 西头——见伦敦
 西西里(岛) 34、354。
 西印度(群岛) 344、579。
 希尔施贝格(耶莱尼亚古拉) 243、
 245。
 香农河 343。
 小俄罗斯 229、231。
 新加利西亚 50、52。
 新拉纳克(拉纳克) 167。
 新泽西州 573。
 匈牙利 45、223、224、226、244、284、
 285。

Y

牙买加岛 233。
 亚眠 47、462。
 亚洲 285、287、384。
 岩岛 293。
 岩岛湖 293。
 耶拿 85、238、259。
 伊奥尼亚群岛 49。
 伊利诺伊州 571。
 伊万城 285。
 伊泽尔河 253。
 伊泽尔河谷 243。
 伊泽尔省 565。
 易北河 242、243、245、246。
 意大利 14、32、34、44、45、84、223、

- 247、262、285、301、464、513、527、
531、569、576。
- 印度 233、284、420、588。
- 英格兰 6、7、9、168、169、171、233、
327、341、345、346、350、352。
- 英国 5、13、14、33—36、38—40、
42、43、61、77、147、224、273、284、
285、290、299、321、325—328、333、
341、343、345—348、359、360、424、
465、505、511、527、529、554、555、
558—562、567、568、570、575、579、
580、588。
- 约塔河 289、293。

Z

- 扎尔特博默尔 140。
- 扎莫希奇 50。
- 芝加哥 571—574、578。
- 中国 581。